

毛选第一卷解读全文

作者/小庄

目录

毛选第一卷解读全文.....	1
第一篇，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2
第二篇，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9
第三篇，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24
第四篇， 井冈山的斗争.....	33
第五篇，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43
第六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2
第七篇， 《反对本本主义》	63
第八篇，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69
第九篇，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77
第十篇， 《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81
第十一篇，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86
第十二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05
第十三篇，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138
第十四篇，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142
第十五篇，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54
第十六篇， 《实践论》	159
第十七篇， 《矛盾论》	166

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非常感谢大家加入这个读书群，今天开始，我们就在这里从《毛选》的第一篇文章开始读起，一篇不漏，扎扎实实的把《毛选》四卷中的文章一一读完吧。

我们按照顺序来，今天是第一篇，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

一、

这篇文章中，有一句非常耳熟能详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句话也是此文开篇的第一句话，其实《毛选》里所有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篇文章，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大家面临的重大难题而写的，每一篇都是。

它不像我们平时写文章，想到一个新奇的观点，或者有什么经验总结、分享，然后便写下来了。

《毛选》中的文章不是如此，大家可以提前有这个意识，就是说《毛选》中的每一篇文章，针对性都是非常强的，都是为了解决或者应对当时的某种具体问题，具体情况而写。

甚至像《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看起来似乎是纯理论的文章，其实当时也是为了解决党内长时期地，大量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各种“左”或者“右”的思想错误问题，因此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理论文章，为党内成员提供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工具，为后来的整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意识呢？是因为有了这个意识，我们再去读《毛选》中的任何一篇文章，首先就可以先看看这篇文章，到底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大难题，而这些难题会不会换一个形式，也同样成为我们今天成长中，生活里同样会面临的问题？

如果我们也会面临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怎样去思考、去解决？然后我们再看看毛主席当时又是怎样去思考，怎样去解决的？

有了这样一个对比，分析，那么我们从《毛选》中才能汲取真正的营养。

二、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当时就是为了解决一个党内面临的大难题而写，这个大难题就是：**找不到革命的力量。**

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创业、或者工作中常常会面临一种无力感一样，这种无力感就来源于我们不知道该向哪里发力，不知道力量该用到何处，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总觉得干点啥都是白费力气，找不到着力点一样。

说得再通俗一些，就好像做内容的，不知道怎么定位，
做产品的不知道产品卖给谁，
写程序的，不知道用户真正的痛点，诸如此类。

当时党内就面临这样的大难题，解决不了“产品”的定位，找不到发力点，没有革命力量的来源。

在这种问题下，衍生出两种倾向，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只得把力气花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上，因此不利于建立起自己独立自主的运作体系。

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一种倾向，是把力气都花在了工人运动上，但是当时中国的工人数量比例还非常低。

事实上，这两种倾向，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衍变下去，必然走向死胡同。

前者，发展下去，会使得自己成为了国民党的附庸，逐渐失去主动权，甚至任人宰割，须知主动权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毛泽东思想里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主动权的意义，这个观点我们后面会详细讲到。

而张国焘的倾向发展下去，我们不难看到，最后会使得革命无法前进，因为当时工人阶级的力量就算是全部发挥出来，也不可能丝毫撼动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势力，最终也是要失败的。

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大难题，但是又毫无办法，这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出现的历史背景。

没有力量，上哪里去找力量，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中国还有一个最广大的同盟军——农民。

首次提出了将革命的力量，寄托到农民的身上。

但是，在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看来，农民虽多，但是愚昧落后，具有农民天然无法避免的狭隘性，到底能不能使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理论上指出了什么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什么阶级是我们的朋友？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知道上哪里去找我们的力量，同时也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力量到底该向何处使。

那么，接着我们就看看，毛泽东到底是如何具体的分析当时各个阶级的具体情况的呢？

在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应该先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即：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中生活，其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就好像，网上一个很有趣的视频，是金星采访潘石屹的，当时金星就说到：有钱人只帮有钱人。

其实这句话包含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亲不亲，阶级分。

可能有人会说，那也有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站到一个阵营的情况啊。

这种情况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阶级分析，是从整个社会经济地位去看的，一个阶级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共性，由这种共性去分析和看待各种衍生出来的现象，由此来解决现实问题。

所以不管怎么分析，实际上落到实处的运用，都离不了一句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好了，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分析当时的社会各阶级的？

一、 地主、买办阶级

地主我们都很清楚，是封建时代遗留的产物，而买办阶级呢？

买办，实际上指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当初，侵略者用枪炮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将鸦片、工业品销售到中国，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帝国主义逐渐扶植起了一批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由此形成了后来的买办阶级。

所以，买办阶级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其利益来源是附属于帝国主义身上的，因此这个阶级其实是跟着帝国主义一起压迫和剥削最广大群众的一个阶级。

所以由封建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创造出来的，这两个压迫、剥削中国人民最残酷的阶级，即地主、买办阶级，就成为了革命要推翻的阶级。

二、

中产阶级

这个阶级指的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我们自己国家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文章中分析到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性。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这里分析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性？其实原理还是一样的，这是由他们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这个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是同时自己的生活水准又比较好。

所以当革命在打击到帝国主义，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赞成革命；同理，当革命斗争到他们头上，损害到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畏惧革命。

于是这个阶级的矛盾、动摇、两面性就呈现出来了。

其根本的革命态度，取决于他们的利益。

其实每个阶级，都是如此，不管是革命还是政策，还是任何什么别的东西，一个人或者一个阶级是否赞同，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合乎他们的利益。

而区别的地方在于，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每个人对于“利益”二字的衡量是不同的，有的人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做自己的利益；而有的人，则只看重自己的那点私利，把自己的利益完全凌驾于别人，或者整个国家之上。

正是因为大家对“利益”二字各有衡量，各有标准，所以我们会看到也有资产阶级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的，同理，也会有工人阶级的叛徒等等现象。

但是究其总体来讲，整个阶级往往呈现出某种共同的利益观点，表现出其共有的特性。

我们有了这个关于阶级性的认识，那么在以后读《毛选》文章的时候，很多地方就能更明白了。

比如，后来抗日时期，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对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我们就能看的明白。

为什么在抗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倒向了统一战线，选择一致抗日，那是因为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随着日本侵略的发生，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所有人一致抗日成为了共有的目标。

这一点，将来我们还会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之中继续分析。

三、

好了，有了以上观点，我们再看《毛选》中接下来分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特点，就很清楚了。

比如小资产阶级，我们可以把这个阶级分为三种：

第一种：有余钱剩米的。

这种情况的小资产阶级，发财观念很重，总想着能爬到中产阶级的地位。他们胆子小、怕官、也害怕革命。

第二种：经济上大体自给，但是生活越发艰难，越发艰苦，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这种人则对革命采取中立态度，既不敢贸然参加，也不断然否认。

第三种：日益走向破产，生活已经开始变得越发难以继。

这种人则在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值得密切关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同一个阶级里，其实也各有区别，究其根本，还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由此，我们再去看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什么他们会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和坚实的盟友？

一样的原因，也是由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

在中国，广大的农民，其中又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因其经济地位低下，处于完全的被剥削、被压榨的最沉重最残酷的阶级。

四、

所以，其实《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归根结底分析的是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或者反过来说，不同的经济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当我们把每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分析清楚之后，那么这个阶级会表现出来的共性，就可以被掌握了。

由此，也就得出了文章最开始那个问题的答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

友？

结论是：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里我们可以再加上一句：农民，其中的贫下中农，是我们革命需要依靠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此处所说的左翼，右翼，指的就是同一个阶级中，比较赞成革命的，成为左翼，相对保守不愿革命的，则称为右翼。

这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概要了。

这篇文章其实交给我们一些思维方法。

其一：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首先是应该对所面对的人、物，对他们的性质、特点进行分析，只有把这些遇到的事物的特点加以分析出来，才会找得出解决的办法。

这篇文章分析事物特点，用的是阶级分析的方法，从不同阶级所处经济地位出发，分析其特点，最后得出其革命的态度，从而确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后面很多毛选文章用到的则是矛盾分析的方法，《毛选》中很多文章都是首先开始分析事物的特点，性质等等，只要把事物特点、性质分析清楚了，那么办法自然也就有了。

关于矛盾分析问题的文章，我们后面会大量提到，大家不要着急，我们慢慢读下去。

其二：我们做生意也好，做产品也好，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同样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

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变成了谁是我们的用户？谁是我们的困难？

我们做任何一个项目，创业项目也好，内部项目也好，首先要面对的也是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对吧，你连自己要干些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要扩展那些用户都没搞清楚，这个事就会陷于停顿。

所以，我们考察任何一个项目之前，也需要首先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

话说回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接着新的问题就来了，

农民要以怎样的形式去斗争呢？你说革命，那农民到底该怎么去革命？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解决了力量来源问题，但是却没有解决斗争形式的问题。

经过那么一分析，谁都知道了农民力量很强大，但是这股力量该以怎样的形式去发挥，去斗争，去革命？

这又成了摆在大家心里的一道大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就有了《毛选》中的第二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解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

一、农民创造历史

我们上一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说道：那篇文章解决的是上何处寻找力量的问题，分析了农民这个群体的革命性是最强烈的。

但是那篇文章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农民以何种形式参与斗争呢？他们要怎样去斗争呢？

这就是这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解决的问题。

在读此文之前，我们先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农民运动？还是先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肯定是先有农民运动，你才能针对这个运动搞调查，最后写成这个报告啊，否则你调查什么呢？

这样子看上去啊，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必然是先有农民运动，才会有这个报告。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问法：是毛泽东创造了农民运动，还是农民自己创造了农民运动？

这个答案还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是先有农民运动，那必然是农民自己创造了农民运动啊。

如果到这里，我们没有什么疑惑的话，那么我们再换一个问法：是毛泽东创造了历史？还是农民创造了历史？

这时候，大家心里可能就要打个问号了。

这个问题怎么看？到底是谁在创造历史？

这就是我们最常看到的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的争议了。

有时候，这两种观点争议起来没完没了，资产阶级是要坚持英雄史观的，而群众则是要坚持群众史观的。

原因很简单，各自有利于不同阶级的利益，这个我们在公众号里也写过。

有时候，我们在争论一些抽象的理论和概念的时候，是很难争出个什么结果的，但是一旦我们代入到实际的历史中，抽象的理论就会变得异常的清晰起来。

农民运动，作为一种反对封建地主剥削、压迫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很显然热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的，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而后来将农民运动更好的组织、管理，使得其成长和发展成一个政权组织的，则是我们所说的伟大的领袖（也就是组织、管理阶层）。

这就是我们说的，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我们也不否认英雄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谁创造了历史，是含糊不得的。

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实际上就是把群众的作用抹杀了，把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地位严重削弱了，其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实现“英雄阶级”的利益，然而这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二、

我们来看看农民运动是怎么起来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道：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你看，这种农民自发起来的农民运动，就像暴风骤雨一般来临了，这不是某个人

发明的，也不是某个英雄创造的，而是农民在常年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下，自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

是这些农民，创造了农民运动，这一点是任何人无法抹杀和歪曲的，也是区别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的一个很好的案例，事实上，以后我们还会大量读到这种案列。

这种农民运动，仅仅就湖南这个省，我们看看规模有多大？

“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

我们看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如果和红军数量做一个对比，实际上后来整个的苏维埃历史时期，所有根据地红军加起来，都没有超过 30 万，中央苏区的红军最高时期也才十几万。

当然，农会会员不能和红军直接对比，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愿意组织起来同地主阶级作斗争的农民，仅湖南一地，占了半数以上。

其实，我们说红军从哪里来？最终还不是就从农民群体中来。

这个农民运动，就是中国庞大的农民组织真正参加革命的前奏，也是无产阶级在惨烈的压迫和剥削下，觉醒的前奏。

说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农民运动之前的历史。

我们说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随后就有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后来又有了义和团的农民运动，但是这些农民运动都相继归于失败，为什么呢？是因为农民阶级自身的狭隘性和落后性。

这种狭隘和落后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四个方面：

1，从经济上看，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决定了这个阶级目光是非常短浅的，不可能制定出一个战略上的目标，一个长远的蓝图和愿景。（参考后来毛选中的新民主主义愿景）

2，从政治上看，他们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不管是《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还是扶清灭洋这样迂腐的口号，都很难切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际，他们也没有现代化的价值观，用来约束大家的行动。（参考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历史任务）

3，从思想理论上看，他们完全没有指导的科学理论，太平天国大搞封建迷信那一套，义和团搞什么刀枪不入的活动，都是如此，这些东西会在实际斗争中，迅速被实践检验，走向彻底失败。（而后来用到的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

4，从组织上看，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局限，无法形成强大的组织领导体系。（参考后来的红军组织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的组织纪律等等）

所以，我们也说，单靠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这事也不行。辩证法里常常看到一些观点，这个也重要，那个也重要，这个条件是必要的，那个条件也是必要的等等。

这不是含糊其辞，搞清一色团圆和谐哈，而是看待事物的全面性的必然要求。但是辩证法的好处就在于，每个阶级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都要尽可能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

但是总体上，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它也确确实实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就是这篇文章，我们提前说的一个问题，是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后面在新的《毛选》解读中，我们还会重复提到这个问题。

下一篇，我们就正式看看农民运动到底是怎么组织起来作斗争的？

解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期

怎样斗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记载的农民运动，影响是非常深远，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比如里面的给地主戴高帽，比如开群众大会进行清算和批判，这些都在后来的群众运动中有着长远的影响力，成为一种群众斗争的主要形式。

然而这些终归只是形式，抛开这些斗争形式，我们来看看这次农民运动斗争的高明之处。

文中这样说道：“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疾风骤雨，顺之者存，逆之者灭”。

这一段关于农民运动的斗争高明之处，已经一语道破了，我们会看到，农民们的击打目标非常明确。

明确的击打目标，有个什么好处？

这个好处有两个方面。

其一：不会伤害无辜，或者客观上会伤及一些无辜，但是主观上不会伤害无辜，避免了随意伤害泛滥化。

其二：明确的击打目标，能把有着同样目标的人迅速的团结在一起，有共同的敌人，那我们就是朋友嘛，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湖南的农民运动，会员激增的速度非常之快，一年的时间，迅速由几十万人，上升到百万会员。

当然，明确的击打目标，是其第一个高明之处。

农民运动的第二个高明之处：

所有参加进农会的成员们，都能从中获得利益，切切实实的利益。

我们如果读原文，那么先把它翻到报告里，十四件大事那里，我们来看看这个原则到底高明在哪里？

农会组织成立以后啊，干了十四件大事，这十四件大事，可以说，都是可以使得加入到农会的成员，获得非常实际的利益的大事，都围绕农会成员的利益出发。我们来一一复述一下吧：

第一件：将所有农民组织起来，加入农会，从而使得农民团结起来，有了自己的组织，使得零散的力量能统一起来，创造了斗争的条件。

第二件：打击地主阶级

把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打下去，把农民的社会地位提上来。这就是第二件事，我们看一下原文中农民是怎样做的，比如清算贪污、舞弊、徇私的行为作风；比如禁止赌牌、消灭大烟的活动斗争；比如，对以前欺压过农民的一些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批判；比如，恶行昭著的，驱逐甚至枪毙。

第三件：经济上打击地主，争取权益

比如不准谷米出境，高抬物价，囤积居奇，同时在减租减息，退佃退耕，废除高利贷等方面，不余余力的去做这些事。

第四件：打倒都团，封建地主的地方机关

第五件：打倒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第六件：推翻以前县老爷的衙门差役

第七件：推翻族权、神权、男权

这一点很有意思，着重说明一下，推翻族权、神权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农民为什么要推翻男权？推翻男权其实就意味着恢复女权，解放妇女。给妇女以更多的权力，比如以前裹小脚、妇女不能进祠堂等等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废除。

这里面不是说他们的意识多么强烈，他们选择做一件事，往往是这件事对他们阶级最有利，推翻男权也是如此，因为只有给妇女以更多的解放，权力，才能避免农民的女儿遭受极大的凌辱。

而且还有一点，文中提到：“夫权这种东西，历来在贫农中地位就比较弱，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他们取得对家事的发言权已致决定权是比较多些。”

我们看到，妇女的权力，家庭地位，同样是由在家里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很有意思吧，跟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换句话说，什么是田园女权？对家里大事小事既无任何贡献，又无任何参与，却一味强调自己权力的女权，就是田园女权。

第八件：普及政治宣传

这一点，是搞宣传的应该好好学习一下的，早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就发现一个重要的宣传手段，既通俗宣传，口碑宣传。

就是说，你的宣传语啊，一定要接地气，要能口口相传，而不是故作高深。

这里面农民编的民谣、孩子打闹用到的口语，就是最好的宣传。

孩子打架的时候，口中说着：“打倒帝国主义。”

你说如果，你给孩子解释帝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演变而来，是矛盾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形态，是庸俗进化论发展的畸形结果，请问孩子听得懂吗？这样的宣传是好的宣传吗？

反倒是在农民那里，他们口中的宣传语，往往是最好的文案。这一点，是搞宣传的人需要注意的。

第九件：农民诸禁，禁烟、禁牌，禁赌，禁杀牛，禁大摆酒席等等。

第十件：清匪

这个可不容易，应该说，匪患是军队、政府都十分头疼的事，可是农民组织起来，这事办得比什么军队、政府还好。

“在农会势胜的地方，盗匪连影子都不见了”

第十一件：废苛捐

第十二件：文化运动

他们开办符合自己农民孩子上学的夜校，聘请乡村教师等等。

第十三件：合作社运动

第十四件：修道路、修塘坝

这就是以上十四件，农民组成的农会干的事。

我们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到什么？其中的高明到底体现在哪里？

其实这十四件事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加入这个农会的所有成员感受到切身的利益。

你看，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还是社会秩序上，他们清盗匪，清大烟，禁止赌博等等，都会使得进入到农会以后，大家有更多的安全感。

而且尤其是普通农民，都更愿意加入这个群体。

相反，我们假设，如果他们的农会干的竟是打家劫舍、坑蒙拐骗的勾当，那这事可持续吗？

答案是：不可持续。

甚至，假使他们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虽然打家劫舍，但是也劫富济贫，那这事可持续吗？

答案还是一样：不可持续。

原理并无不同：你要使得加入到这个群体里的人，都能获益，且不断有人加进来，那就绝不可能全是些打家劫舍之徒。因为地主永远都是少数，你哪来那么多地主供你“打家劫舍”呢？最后这种暴力还不是又变成了恃强凌弱吗？

那随着组织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不就陷入瓶颈，无法发展了吗？

所以我们从十四件事里看到什么？看到他们组织起来，清盗匪，保护耕牛，保护农具，维持生产，减租减息，所有的工作，都在维护更好的治安环境，维护更好的生产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加入到这个群体里的农民，真正的获取利益，一种可以持续的利益。

所以，以上两点：

- 1,确定精准的打击目标；
- 2,保证农会的会员们的切身实际的利益。

这两点就是体现农民运动最高超的地方，同时又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任何一个组织，如果里面充满了混乱，不安定因素，霸道，不和谐的东西，使得加入到这个组织的群体不能获益，那么这个群体必然走向崩溃和解体。

大家把这个观点，拿去分析很多社会现象，以及历史现象，就会发现，这个观点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未来很长时间，或许都不会过时。

这篇文章，就讲这两点，下一篇，我们还要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一下运动中的过分举动，讲一下立场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

一、

立场问题

我们这篇文章还是解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今天主要讲讲里面涉及到的关于立场问题和调查问题的观点。

我们上一篇文章，把十四件事提前说了，这篇正好就针对这十四件事来聊这个立场问题。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篇调查报告呢？是因为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农民运动，在海陆丰地区，已经带领群众开展农民运动的彭湃已经把农民运动搞得有一定的影响力了。

这种农民运动的影响力，自然也会在共产党内部反应出来。

这时候，我们回过头看那十四件事，就立刻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因为农民运动说穿了，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不是温和的，而是激烈的。

你把地主戴上高帽子去游街，你自动废除以前的高利贷，你逼迫那些开烟管的老板们关门，你组织力量调查地主们的账目，搞清算罚款等等，这些事会严重触碰到地主的利益。

这种社会斗争，也必然从党内反映出来。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几个观点的解释：

“好得很”和“糟得很”

所谓“过分”的问题

所谓“痞子运动”

“革命先锋”。

报告里这几个专题下，讲得就是当时各界对农民运动的看法。

同样的事情，你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那就得出结论：好得很。

反之，你站在地主的立场上看，那就得出结论：糟得很。

同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还是革命先锋？是过分了，还是就得那么干？这些问题就深刻的从立场上反映出来了，如果所占的立场不同，那么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这时候，我们把之前解读《矛盾论》中的观点，对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那一节拿出来。

这个时候就用得上了，你对矛盾的估计，它到底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

即使你占农民立场，如果你的估计不对，认为还没有发展到对抗性矛盾，那么你自然得出方法应该是采用调和，温和，改良主义的办法来实现民主、独立的需求。同理，如果你估计到的是对抗性矛盾，那么革命就是你最合适的方法。

大家读到此处，可以回过头去重读一下《矛盾论》中最后一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你对那一节的理解，立刻深刻起来。

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当然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不革命，是不可能迅速扫清旧中国的污泥浊水，使得它朝着新中国的独立、民主的方向发展的。

任何调和主义、改良主义，实际上是助长了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继续的腐朽统治。

然而，在那个时候，大家的看法却并不一致，应该说，不触及到自身生存的人，几乎很少有人会接受暴力革命的观点。

于是，我们就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说道：

“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弊之曰：糟得很。”

而用毛泽东所持立场和观点来看则正好相反：“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凡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几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的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的理论，阻碍新秩序的理论。”

我们看到，这就是立场问题不同，折射出来的完全不同的观点。

以后，大家看待很多事物的时候，你就要想想背后争论的到底是什么？

是争论的方案、策略问题？还是立场问题？

如果是前者，争论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嘛，实在不行，就到实践中检验吧。

但是如果是后者，立场问题，那么你的任何争论都是结果的。

二、

调查问题

在搞清楚了立场问题以后，就能得出结论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判定“农民运动”中是否存在过火的地方，或者有偏差的地方，那才会有所谓的“理中客”的分析。

立场不同的“理中客”分析，是永远不会有。

所以我们接着读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出了“所谓过分问题”。

比如农运中出现“动不动拉人戴高帽子”、“不许地主说话发言”、“一群人涌进地主家吃大户”、“跑到地主少奶奶牙床上滚一滚的恶作剧”、“罚款勒捐”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把它单独拿出来看，无论你怎么看，哪怕是站在农民立场上看，都是过分的举动了。

可是这些事，你一旦深入调查，把这些事的实际发生情况搞清楚，你的观点立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上面那些事单独看，是很过分的，因为革命本身不是说要去整地主这个人，而是要消灭一个阶级，消灭一种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一种等级思想。

可是当你调查了实际这些事发生在哪些人身上以后，你就会发现，农民其实有着十分精明的算计。

其一，哪些事都是被不法地主逼出来的，他们干这些事，往往也很有针对性，他们把地主的劣与不劣分得很清楚，简直比今天互联网数据分析还要清楚很多。

看原文怎么写：“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

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以上，我们看到，这即是调查的意义，没有调查，坐而论道，那么同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这太过分了。

反之，有了实际调查，那么你就能知道是不是真的过分。

毕竟，你推翻一种制度，就要触及到实际的很多人，这一点谁也无法避免，这就是革命的残酷之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段话大家都听过，其实历史背景便是我们上述那些环境下说出来的了。

这段话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常常难以矫枉”。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注意到了调查的重要意义，一切如果不够了解实际情况，没有掌握一定的信息，你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片面的。

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读完了。

我们把这篇文章的一些核心观点做个总结：

1，农民运动的兴起，我们可以看到是群众在创造历史，我们不否认精英、领袖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但是归根结底，群众创造历史的原则不能变，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则。

2，农民运动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兴起，本质上是已达极致的剥削和压迫这个根本矛盾推动的，但是他们在组织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这里面有两点：

其一：他们有精准的打击目标，不会借着运动，搞暴乱，打砸抢这样的事。

其二：他们的斗争内容，保证了加入这个群体的会员们的切身利益，那十四件大事，不管用什么立场看，这些事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3，同一件事，不同的立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关于立场的观点，我们将来在第三卷的时候，会有大量论述）。

4，实际调查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写的。

那时候，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两种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矛盾，已经清晰可见。

如果你因为双方还处于密切合作期，而看不到两者的矛盾将不断走向激化，而只是把这种矛盾当做了两党之间的差异，那么就要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事实是，后来历史的发展，确实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熟读马列，因此没能用矛盾的观点把未来趋势的衍变分析出来。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因为双方还在合作期，所以或许他预料到了将来合作的破裂，但是没有写进文章中去。

但是无论如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农民运动、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方法，这种方法事实上，即使到了很多年以后，还在沿用。

然而单单这两篇文章解决的问题还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之前说了，农民阶级的狭隘性、落后性、局限性，这样的农民运动，如果没有一个党去组织，去领导，去发展，终将避免不了走向失败的命运。

于是，该如何运用这股力量，该如何组织这股力量？如何建立起一个领导这股强大力量的机构？

在建设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极端险境和挫折？该如何面对这个建设中遇到的挫折？该如何从极端的黑暗中去寻找那一点点的希望？

这就是接下来《毛选》中的几篇文章要解决的问题了，这些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成

长中都会遇到的问题，虽则困难，但是却有一些思想理论，方法技巧可循。这些方法技巧，思想理论，就在我接下来要解读的文章《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中。

第三篇，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读《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上）

一、

先看历史背景：

上一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记录的是当时农民运动的斗争形式，但是我们之前的解读中也简单说过，农民运动因为其小生产的特点，有其特有的狭隘性、落后性，这种运动靠其自发去发展，并取得最后的胜利，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种力量必须有一个党派去把它组织起来，通过一定的形式，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强大的力量，一种能够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的力量。

我们知道，在 1927 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七一五政变以后，国共第一次合作走向破裂，也是在这之后，我们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策略和口号。

随后各地开始举行武装起义，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应该说，《毛选》中如果有一篇文章，写一写论述“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起源的文章的话，那就更好了，只可惜因为当时的斗争环境太过凶险，所以没有这方面的文章遗留下来，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随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毛泽东领着 800 多残部去了井冈山，在井冈

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起了第一个红色政权。随后，朱德又领着一部分南昌起义的残部，也到了井冈山，也即是我们熟悉的井冈山会师，从此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启了红军时代。

这支军队在井冈山周边的县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政府、发展农民运动等等，形成了一个红色政权。

但是随后，问题自然也就来了，红色政权必然要遭到国民党中央、以及地方军阀势力的围剿，随着井冈山先后出现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红军力量以及红色政权都遭到严重的打击，这个时候，就必然出现一个问题，信心动摇的问题。

很多人会觉得，在这大山里那么搞下去到底有没有前途？有没有意义？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发展？

这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在不同阶段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干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前途？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发展的空间？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那就是悲观失望、放弃斗争、妥协逃跑等等。

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怀疑自己现在干的事没有前途，自己没有发展空间，看不到希望。

所以这篇文章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从这篇文章的名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我们就能看出来，它就是解决的红色政权能不能干下去，有没有前途和发展空间的问题。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就无法前进，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整天悲观失望，

干什么都提不起劲，甚至想要就此放弃，那么这事也就干不下去了。

这也是《毛选》中常说的一句话：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一步。

二、

所以，如何解决希望和前途的问题？

很显然，这个问题靠鸡汤是解决不了的，你每天告诉大家要坚持下去才能看到希望，要有共产主义的信念，要学会顽强，要学会忍耐，再举出一堆头悬梁、锥刺股、卧薪尝胆的例子等等等，都毫无意义。

因为鸡汤这种东西，也许能有一时的鼓舞和兴奋的作用，但是一旦放到现实的实践斗争中，既不能填饱肚子，也不能取暖御寒，很快就会被群众扔进粪坑里去。

你要想在这个问题上让大家相信你，你就必须要找出这件事能干下去的理论依据。

而且这种理论依据不能抽象，不能说的云山雾里的让大家听不懂。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中，提到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生的原因，都有哪些理论上的依据？

文中提到了五点：

第一：

这种独特的红色政权，发生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有其独特的原因，就是中国处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之下。

帝国主义之间，通过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控制不同的区域、地盘，而买办阶级又通过他们的代言人——军阀，实现他们对中国人民大众的统治。

因为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现实因素，所以各军阀势力之间是不统一的，为了争夺各自的利益，常年的军阀内战是永无休止的。

因此，只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分裂和控制还在，他们之间不统一，那么军阀之间常年的混战就不会停止，对于底层劳苦大众的剥削和压迫也就不会停止。

也是因此，就伴随着在各个军阀统治的边界地区，也就是军阀们力量薄弱，又有点三不管性质的地区，便使得这种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来。

那么，随着这种剥削和压迫还在深入，那么这种革命的力量就会不断的发展起来。

第二：

它发生的地方，不是那种还没有被民主革命洗礼过的地方，而是已经经过革命的锻炼，有了一定的农民组织、工会组织的地方，比如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地。

第三：

存在下来的这种红色政权，能不能持续？取决于军阀之间的战争是否持续，那么现实的情况是蒋桂的矛盾正在激烈发展，同时蒋、阎、冯的矛盾也在激烈的发展之中，斗争局面非常之惨烈，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只要这种战争持续，那么红色政权就必然发展。

第四：

红色政权必须辅以相应的红军存在，没有红军组织起来，参加武装斗争，那么红色政权同样不可能存在。

第五：

有共产党的领导，还有政策上不要犯严重的错误。

以上五个原因是这篇文章中列举出来的五个原因。

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其实前三个原因，是客观存在的，是矛盾发展的必然结

果。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蛮横、各种丧失主权的条约的继续存在等等，这些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见的，是所有人都清清楚楚的。

大家唯一不太清楚的，是帝国主义通过买办阶级实行间接统治的这种统治方式和流程，但是因为前面有了阶级分析那篇文章，其实参加革命的人，大家也都比较清楚。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的通俗易懂，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里面，也正是如此，所以大家才真的能够信服。

其二，军阀之间的不断的战争，这个也是客观的，大家都看得见的，而且事实是在这篇文章写完的第二年，也就是 1929 年，爆发了蒋桂战争。1930 年又接着爆发了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非但当时是这样，而且后来的历史还证明了当初的论点，这样大家就会更加信服。

其三，是由前两个依据来的，也就是说只要这种军阀混战持续，那么红色政权自然就能发展。

后面两个原因，准确说应该是条件：即红军的存在和共产党的领导。

这两个原因是主观的，也就是说是我们要努力去建设和实现的。

客观上有了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主观上努力建设，不犯严重错误，那么这事就有希望和前途能干的成。

这就是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三、

有什么启示？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启示，我们可以把这些理念、观点、思想代入我们实际生活中，看一看，比一比，看看是不是这样？

一件事能不能干，靠不靠谱，既取决于客观上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也取决于主观上是否做得正确。

缺一不可，缺一不可，过分的强调客观，或者过分的强调主观，都是不对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现实中，如果过分的强调主观，忽视客观实际，实际上就会犯主观主义错误，觉得自己可以人定胜天，可以脱离客观条件完成任务，这是不切实际的。

反之，如果一切归咎于客观原因，忽视主观上的指导、主观上的努力、主观上的正确路线，那么实际上就变成了机械被动论去了。

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客观上军阀混战的原因，也必须依靠主观上建设红军，保卫果实，组织领导，不犯错误。

当然，这里说的错误，不是说完全避免，而是说要尽可能不要犯那种毁灭性的错误，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要主观上尽可能去避免。

认为有了客观原因，红色政权就能存在和发展下去；或者单纯的主要主观上努力就能使得这种政权存在和发展下去，这两种思想都是不对的，都会陷入片面性。

所以，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这篇《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吧。

第一个思想观点：

要找到希望，不能依靠大饼和鸡汤，要依靠切切实实的理论依据，这种理论依据不是抽象的，而是大家真真实实能看到的。

帝国主义的分裂、侵略，大家可以看到，军阀混战大家可以看到，红色政权发生在民主革命洗礼过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都不是虚的，只不过很多人不能将这些看到的东西整理和分析出来其中的原因和逻辑，不能把本质梳理

出来而已。

在这些客观事实面前，你得出的结论：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生的原因的结论，大家就会信服，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放到实践中一检验，确实如此，大家就能感受到希望。

虽然现在苦点、累点，但是有希望，大家就不会恐惧，也不会悲观，事情才能干下去，发展下去，否则就不能前进一步。

有了这种思想和观点，大家识别鸡汤也好，帮助自己分析一件事有没有前途，寻找希望等等，能获益很多，至少能避免吃一些不必要的亏，上一些不必要的当。

第二个思想观点：

主观的努力和客观的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

人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的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条件的基础上干出什么事来。

任何人做出的事，都是在当时的一定的环境、资源之中来完成的。

但是同时，客观条件具备了，主观上如果不努力，犯错误，也会导致事情走向失败，甚至彻底的失败。

这里面任何一项都忽略不得。

客观上有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主观上如果不去建设红军，不去建设根据地，或者犯了严重的左或者右的错误，都是有可能断送这件事的前途的。

这一点，我们最近更新的长征，其实就很好的说明了。

我们总在说《毛选》里充满辩证法，其实这就是辩证法，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统一就是辩证法嘛。

以上就是我们读《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所提炼出的思想和观点，希望对大家实际生活有帮助。

大家可以把这里面的观点拿到现实中去解释现象，只有解释了大家在实践中遇到

的问题，困惑，我们读《毛选》才有意义嘛。

而经典的思想和理论，是经得起长时间的检验的。

读《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下）

上一篇我们解读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中的两个主要的思想观点。

上篇基本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这篇我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补充一个生活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有这样一些人，其中主要以精英为主，他们在宣扬自己的某项成功或者某项成果的时候，喜欢过分的强调主观原因。

比如喜欢强调个人的努力，个人的选择的重要性，个人奋斗的历程，个人吃苦能力，个人付出的艰辛等等。

当然，也不一定全是个人，谦虚的也会说是团队的努力等等。

我们说，这样的品质重不重要？简直可以说太重要了。

事实上，我们非常希望社会宣扬勤奋、努力、奋斗的意义。

但是，大家如果把所有的原因，或者只要某某一出现落后、失败、混得不好之类的原因，统统归结到什么自私、懒惰、不上进上面去，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原因我们上篇文章说得很清楚了，任何事物的成功，都离不开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的共同作用，过渡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不对。

精英阶层为什么喜欢过分强调主观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客观条件，所以他们希望有意识或者无意

识的淡化他们所拥有的客观资源和条件，把他们在某件事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尽可能的归结于主观能力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团队，因为这对他们有利。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宣传的时候，要警惕，应该分析一下，客观上有几分，主观上又有几分？

不信大家可以去看看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的演讲哈，不管他们把自己曾经的苦难描述的多么绘声绘色，讲述自己曾经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挨了多少白眼，受过多少委屈，才取得今天的成就。

但是其实这种宣传背后还有一个目的，主题很明确，就是告诉你们，我今天取得这些都是我应得的，是我自己或者我们团队努力赚来的。

所以这些人的话里，你可以看到所有他们努力的过程，但是你永远看不到他们描述他们到底拥有过哪些资源。

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例外。

而反过来呢？我们有时候又会看到一些人，他们很多时候又喜欢过分的强调客观条件。

只要一提到谁取得某项成果，动不动就是他拥有哪些资源，他拥有什么样的条件，如果我也拥有那些条件，我说不定比他还做得好之类的言论。

这种言论，刚好和上面那种反过来，把一切的成功取决于了客观条件上，其实这也是不对的。

这种言论发展下去，就忽略了个人的努力、奋斗、智慧在一件事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抹杀了个人的贡献，抹杀了勤奋、努力等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

发展下去，就变成了自暴自弃、怨天尤人，这样也不好。

我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重新强调了主观、客观的意义呢，在这里我们不讨论社会问题，只讨论思想、方法问题。

还是重复我们上篇文章说到的这个观点：一件事能否取得成功，就像红色政权能不能发展，既有客观条件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努力、正确判断的原因。把两者都考虑进去，才不会轻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好了，这篇文章我们就读完了。

这篇文后面还有几小块：分别是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湘赣边界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经济问题；军事根据地问题；

原文中，这几个类别，是当时的会议决议，这些决议和问题在后面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更有详细的阐述，我们这篇解读文不作详解，下一篇《井冈山的斗争》中，再解释这些问题。

有兴趣的读原文的时候可以读一下，没有兴趣的忽略不计也可以的。

我们下一篇读《井冈山的斗争》

第四篇，井冈山的斗争

读《井冈山的斗争》（上）

这篇《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汇报工作的报告，里面有部分观点就是从我们上一篇文章《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延续过来的。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军阀混战的矛盾本质，从而揭示了只要买办豪绅阶级的代言人文阀之间的战争是持续的，那么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就必然是持续的。

同时又分析了各种主客观条件。

然后这篇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就把着眼点放在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搞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

此文一开篇，就罗列了这几个条件：

- (1) 有很好的群众
- (2) 有很好的党
- (3) 有相当力量的红军
- (4) 有便于作战的地势
- (5) 有足够寄养的经济力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观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呢？

是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依赖一定的条件。

其实这个观点背后有一个理论：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之中。

这就是告诉我们，不管做任何一件事，这件事到底能不能成，有没有希望，大家需要分析一下这件事需要什么条件，这是一个基础工作。

这里面的条件，我们可以分一下类，可以按照我们上一篇《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那篇文章中那样，把条件分为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我们看一下《井冈山的斗争》中，分析工农武装割据需要的五个条件中，哪些是主观的，哪些是客观的？

实际上很容易看出来，有很好的群众、有便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的经济寄养这些是客观条件。

而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则是主观条件，是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建设才会有。

当然，客观条件其实最后也需要主观能动的去引导、组织、发挥作用。

这种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分析的越准确，我们就能清楚的知道哪些事现在能做，哪些事努力了有可能完成，哪些事是条件还不具备的，眼下还做不了。

如果有时候，我们分析完以后，不能确定是否正确，那么就需要去请教一下同行业的做的好的，去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分析漏掉什么条件，去学一下相关的专业知识等等。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完成的方法论。

大家可以给这个理论起一个名字，自己可以多用来分析自己实际情况。

我把它叫做“条件的方法论”，大家也可以自己起个拉风的名字，以后就可以用起来了。

这个方法论和矛盾分析的方法论联合起来，其实我们就得出了一个很久以前我们在公众号说过的结论：

事物的发展由内部矛盾规定，外部条件促成。

所以我们把《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同我们之前的《矛盾论》《实践论》结合起来，慢慢研读，就会慢慢形成一个我们看待一切事物的观点，这些观点就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

内部矛盾规定了事物的性质，规定了事物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而外部条件决定了它具体发展成什么样。

我们把鸡蛋看做一个整体，鸡蛋内部原子、分子等等内部矛盾规定了它是一个鸡蛋，它绝不可能变成钢、变成铁，而是有可能变成炒蛋、变成小鸡、变成鸡蛋羹等等。

而外部条件，即给它一定的温度、孵化条件，或者给它一个爆炒的条件，或者给它一个砸碎的外力条件，这些条件则决定了它最终具体变成什么，也就是朝哪个

方向发展。

现实生活各种复杂事物中，同时存在各种复杂矛盾，使得分析变得异常困难，但是我们掌握了这个理论工具，加以练习，慢慢的会提升我们分析周围事物的能力。

这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斗争》给我们提供的一种方法论，其实其中也包含了一种世界观，读来多有益处。

下一篇，我们还要继续读《井冈山的斗争》，把里面的一些斗争策略、遇到的困难，方法再简单分析一下。

读《井冈山的斗争》（下）

这篇文章我们顺着《井冈山的斗争》，看一看工农武装割据最开始，面临的诸多困难，我们说为什么井冈山时期，常常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队伍里的悲观失望情绪，大家看了《井冈山的斗争》里面那些实实在在的困难就明白了。

第一个困难：

工农武装割据初期，先后在三月和八月，经历了两次大挫折，损兵折将，其中尤其以八月失败，导致队伍遭受极大损失，井冈山根据地遭到白军极大的报复为一次大大的挫折。

这里面暴露出了初创团队的自由散漫性、无组织无纪律的特点。

出现八月失败这种挫折的原因并不复杂，不考察敌情，在统治阶级处于稳定时期，分兵冒进，结果是朱德带出去的队伍陷入孤军，而毛泽东留守井冈山的队伍，兵力缺乏，最后为敌人各个击破。

大家对八月失败感兴趣，也可以看一下我在公众号里写的毛泽东传第一部分，里

面有一章讲了八月失败。

这里《毛选》里总结了这次失败的原因：

- 1，一部分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分官兵不愿意往湘南，缺乏积极性。
- 2，盛夏远征，兵力疲惫
- 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
- 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军事冒险
- 5，敌情不明
- 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意义。

我们把这 6 个原因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支初创团队，保留着非常原始的初创团队的散漫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特点。

我们看到，这支初创团队，因为自己思念家乡，结果就煽动回家；

对于群众基础毫不重视；

不明白自己和白军的区别，不了解红军作战的意义

盛夏之时，孤军深入，不听指挥，跟组织对着干，组织还得照顾他们的情绪。

等等这些特点，都毫无疑问的暴露出这种初创团队的严重问题。这几乎是每个初创团队都有的。

我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困难：

物质条件、经济条件很差，资源匮乏以达极致。

这种缺乏体现在红军士兵的衣食问题、医疗问题、武器装备来源、士兵来源等众多问题上，原文里都有分析。

比如：士兵牺牲太大，不好补充；

士兵伙食太差，五分钱的柴米油盐都难以维继；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良，受冻，药品短缺，伤兵很难得到适当

的医治；

士兵没有训练资源，一上来就要打仗，军事技术差；

武器缺乏，很多士兵手里拿的是梭镖、鸟枪、大刀，还有一些已经坏掉的破枪；

缺乏干部，支部建在连上，可以想找个合格的书记也非常困难；

这些困难，都体现为资源的极度匮乏，士兵们总是在生存极限上打仗。

第三个困难：

白军的围剿，封锁

《井冈山的斗争》中这样记录：

因为这种经济压迫（白军的封锁），不但中等阶级忍受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是极贵。布匹、药材没有，宁冈、永新西部，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你看，这都是关乎百姓生活的大事，经济封锁，导致大家没有盐、没有药，自己种的茶油卖不出去，这些都必然影响到工农割据能不能持续下去，因为这直接使得百姓的生活遇到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困难：

中间阶级的反水

由第三个困难引发而来，白军的围剿，导致很多中间阶级反水。

文中这样记录：

支部和区委的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反水分子，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坍塌。

事实上，这个中间阶级反水问题啊，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很多年，这个我们公众号曾经提到过，这也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第五个困难：

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思想，土客籍矛盾，地方保护主义依旧普遍存在。

你看，自己队伍里也充满了矛盾，这些都是一些封建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后来一度发展出宗派主义，内斗等问题。

第六个困难：

土地分配问题

任何事情最后都要人去做，都要人去落实，分土地这事也是一样。当时井冈山边界地区的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左右在农民手里，像遂川等地，地主几乎占去百分之八十。

这里面，如果是针对大地主，这事尚且好办，打土豪、分田地没得说。

可是这里面同时涉及太多中间阶级，也就是小地主、富农，甚至中农，这是个比较庞大的群体，你不可能完全和这个群体对立，总体上还是希望可以拉拢这个群体的，不然贫农很容易陷于孤立，很多事情单靠贫农也做不了。

于是很多时候多吃多占，谁又分了肥田，谁又分了瘦田等等问题也跳出来了，这些问题实际上，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摸索，土地分配才慢慢的完善起来。

第七个困难：

封建独裁专断的恶习，在自己队伍里，干部里十分明显。

民主集中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时候干部包办一切，不讲民主，而群众也习惯了这种不发言，不发表意见的文化习惯。

这个困难后来又发展到相反的方向去了，当号召大家搞民主以后啊，大家又统统起来发言，以至于军事问题，也大搞民主，这个说要那么打，那个说要那么打，又发展成了极端民主现象。

不过整体上这个困难纠正非常快，没有造成过非常严重的影响。

第八个困难：

指挥和命令的问题。

当时井冈山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与组织的沟通完全靠信件，一封信有时候由上头送来，已经过了几个月了，情形大有变化了。

结果出现了很多瞎指挥，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令，造成过非常严重的损失。

这个情况直到后来离开井冈山，到了苏区以后，第一次反围剿缴获了一部电台，这事才有好转。

期间，因为这个消息不能及时沟通，很多党的命令被机械的执行，造成过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

这一点，我们公众号里写毛泽东传里讲过很多。

以上这些，都是在井冈山时期队伍刚刚创建，根据地也在初创的时候，遇到过的大难题，大困难。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其中任何一项，都有可能击溃这支队伍。

我为什么把这些困难全部罗列出来，其实目的只有一个：

我们之前说了，很多事情的发展需要一些条件，但是同时我们需要知道，有时候很多主观上需要我们创建的条件，是非常之难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就是在缺这个、缺那个之中，慢慢发展起来的。我们几乎看不到那种所有条件都满足，然后一蹴而就的事情，而绝大多数事情，就是在慢慢的斗争中，逐渐创造出需要的条件，最后走向胜利的。

当然，这篇文章我们如果只是拆解到这里，那么就有点陷入了鸡汤学说里去了。

我们必须去探索一下，为什么当时的井冈山红军能够在面对如此近乎生存极限下的困难中，战胜它们，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呢？

其中有两个制度上的原因，就是：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

我们看一下《井冈山斗争》中，里面是如何描述红军面对这些困难的：

“红军士兵大部分由雇佣军过来的，但是一旦到了红军，则变了性质，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得士兵感觉不是为了他人打仗，而是为了自己打仗，为了人民打仗。”

“连、营都有了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官兵一致，从军长到伙夫，什么人都一样苦，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伙食。发零用钱，两角一律是两角，四角一律是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红军的物质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会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军队实行民主。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口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的军队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上得到了解放。同一个兵，在昨天作战不勇敢，今天在红军中就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如果我们一味强调说红军战胜了很多困难，红军怎么样怎么样厉害，怎么样怎么样吃苦，这就容易让人产生疑惑：为啥偏偏他们那么能吃苦，那么能战斗？

但是当我们分析了红军的另外一面，里面平等，自由，民主，分土地，为自己打仗等等之后，我们就能明白，红军战斗力强，忍受如此巨大的困难，不是没有原因的。

否则，你如何解释，今天在白军里面浑浑噩噩，明天到红军里面就成了战斗英雄的人呢？

所以，当你需要别人忍受巨大困难，经受很多苦难环境的时候，请问一下，你给了人家什么？

我们不能只讲义务，不讲权力，只讲付出，不讲回报。

红军虽然在物质上匮乏，条件上差，可是他们在尊严上，精神上，以及土地上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东西。

而保障士兵们这些权益，又需要一定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说过的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

文末，我们总结一下《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

从历史角度看，《井冈山的斗争》记录了当时红军在井冈山上经历的种种困难，以及其奋斗历程。

从现实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都要经历诸般苦难，但是这背后，我们应该尝试着去找出支撑我们战胜这些困难的东西，井冈山时期是平等、土地、民主，那么当我们需要战胜一些极度困难的东西的时候，想想需要什么支撑我们走下去？

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坚强的意志背后，往往都有某种支撑它的东西。

从思想层面讲：

平等、尊严、民主、话语权，是任何时代永恒的主题，是我们永远都在不断追求的东西。

由以上观点，大家也可以轻易看透很多现象，比如很多老板只一味强调狼性，那么请问支撑狼性文化的背后，是什么呢？

人家红军官兵平等，你可以跟他们讲狼性，讲奉献，那么你们是否给了员工平等？

再比如，有的领导特别喜欢谈指导思想，可是实际上任何的思想最后都需要付诸行动，需要行动就需要有制度。

井冈山有士兵委员会，士兵可以举报、监督，有相关的人会负责处罚、处理，维持监督秩序。

那么你的指导思想，应该配合一套什么样的制度来实现并约束脱轨的现象？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需要去应用的。

此文就分析到这里，下一篇，我们读一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第五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解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上）

《毛选》中的这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一篇非常值得精读的文章，而且生活代入感很强，大家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在原著文上。

我们对这篇文章的背景，以及它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等做一些简单的拆解。

文章开篇第一句话：“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这句话中有一个词汇：“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个值得我们去解读一下，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了，那么什么又是“无产阶级思想”？

我们先说一下“无产阶级思想”。

无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两大理论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两大理论体系中有很多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形成了一种宇宙观、世界观，从而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等。

里面像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理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理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等，由这些观点、理论出发，形成了我们看待世界、观察世界、指导我们能动的改造世界的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这种思想理论为基础，衍生出的种种思想，我们就叫它无产阶级思想。

反之，与之对立的种种思想观点，我们称为“非无产阶级思想”，比如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等级思想、特权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指导下的“个人利益至上”为原则衍生出的一些本位主义思想，享乐主义思想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说你是无产阶级，那么你的思想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是这样区别的，当时恰恰就是军队里的俘虏兵逐渐增多，而且军队的来源主要都是农民，在他们的思想中还大量的存在种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封建时代等级思想等等，所以清除这些思想，才成为了一种必要。

那么当时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我们也简单说一下：

此文写于 1929 年 12 月这个阶段。我们知道，在 1929 年 1 月，红四军从井冈山转移，到了赣南一带开始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又发展出闽西根据地，形成了后来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基础。

但是在建设过程中，随着军队的扩大，这种扩大的过程中，就有一部分兵源来源于俘虏兵，这些俘虏兵自然也会把军阀军队的一些思想带来，比如闹饷、打骂士兵，不愿意作群众工作，自由散漫，个人享乐等等。

同时，我们之前的一些建军的观点，又有了过渡的发展，比如我们倡导平等，倡导民主，但是这种平等和民主过度以后，又出现了大家闹极端平均主义，闹极端民主化的现象。

极端平均主义就表现为，房子要住一样大的，士兵没有马骑，长官也不能骑马，给伤兵们发补贴，不管伤轻伤重，一律要求平均等等。

而极端民主化就是，任何军队的，政治的，生活的大事小事，全部要交给士兵们开会讨论，而且讨论不出结果就得慢慢的拖下去，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哪怕一件小事，大家也七嘴八舌的争论半天，但是还是得不出一个结果来。

而在领导的高层里，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就表现为军队的性质和任务上，如何判断军队性质以及他们的工作任务？

当时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毛泽东为代表，军队并非只是单纯打仗的，它应该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

而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以朱德为代表，军队就是打仗的，其他事情不应该由军队担负。

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以斗争的方式表现了出来，造成了毛泽东失掉前委书记一职，离开红四军去休养的局面。

（这一段历史我们在公众号苏区斗争里，第三章-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里交代过，大家可以去看看。）

经过实践的检验，最后大家发现还是毛泽东是对的，周恩来也来信支持了毛泽东，于是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召开了这个会议，把他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如何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继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在随后召开的“古田会议”上发表并演讲，所以其实这篇文章也是古田会议决议的一部分。

其主要核心，就是解决建设一支怎样的军队，如何建设这支军队的问题，从古田会议开始，中国红军的基本建军原则就比较的完善了，整个框架出来了，后来发展起来的八路军、解放军的原则，都是沿袭了这个框架。

我们下一篇文章，就讲一下里面具体讲到的一些建军原则和思想。

解读《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下）

一、

任务和工具

《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之中，第一个纠正的就是——单纯军事化观点。

这个观点提倡：把军事和政治分开，认为军事好了政治才会好，换个说法：军事第一、政治第二，军人只管打仗，仗打好了，革命也就胜利了。

这种观点有很多演化版本：比如，管他三七二十一，能打胜仗的就是好军队；不要管它是人民军队，还是什么旧式军阀队伍，能打赢敌人的队伍就是好队伍。

大家把这个观点代入到很多类似的场景中，有没有感觉很熟悉？

这个观点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搞不清楚什么是任务，什么是工具。

红军并不是生来打仗的，它的顺序应该是唤醒群众、武装群众、反动群众、土地革命、争权益、求公平、打破封建制度、驱逐帝国主义、完成独立等等。

这一切都需要建设根据地，在根据地里来实现我们想要创造的世界，才能达到以

上目的。

而打仗，是因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势力、买办阶级势力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此大家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矛盾。

这既是打仗的哲学含义。

只有明白这一点，才会明白打仗的意义，才会明白为什么红军除了打仗之外，还必须需要担负起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建设政权等等工作。

也只有明白了这一点，这支军队才会懂得，时时刻刻不忘联系群众，最后才有了所谓的群众战争，和使得敌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的局面。

那么，把红军单独剥离出来，只管打仗，谁打得好谁就牛逼，谁就是革命的主力，这里面问题在哪里呢？

如果红军只管打仗，把这些武装群众、发动群众的事单独交给其他某个机构去干，难道不是更好吗？

很简单：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必然慢慢走向军队控制政治的局面，走向慢慢脱离群众的局面，最后实际上会跟当时的军阀没什么区别，何谈什么人民战争，群众又如何会去拥护呢？

同理，如果一切以打胜仗为标准，实际上长期发展下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会形同废纸，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心里都认为只要打了胜仗，军事搞得好，其他的政治排第二，那么他们就会不断的一次次突破纪律的底线，实际上，如此发展下去，最终这支军队是打不好仗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任务和工具，这两者一定要很明确，很明确，任务是什么？工具是什么？

时时刻刻要记得：工具是为了实现任务而存在的，不能取代了任务。

这种单纯军事化思想，在社会上有广泛的运用，唯业绩论、唯高分论、唯生产力论、唯经济论等等。

这些问题如果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就纠正甚至杜绝，那么后期会好处理很多，但是如果等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实就很难处理了，变得非常棘手。

毛泽东纠正单纯军事化观点，其实是从刚刚建军开始，从井冈山就开始不断强调和纠正，直到古田会议，一直在做这件事。

因此等后来红军长大，最后发展成百万级别的解放军的时候，才不会出问题。

反之，你等它发展成一直庞大的队伍以后，再去纠正，那就不可能了，至少会变得困难百倍。

所以，单纯军事化观点的核心其实就在于：要搞清楚什么是任务，什么是工具？工具不能取代任务。

二、

民主集中制

这个问题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第二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叫民主集中制。

针对的就是搞极端民主化的现象。

这也是辩证法的一种运用，既要民主，也要集中。

这个可以那么理解：集中的决策机构，它是一个加工厂，它负责收集、筛选、设计、制造成品。

但是它要加工、生产必须要有生产的原料，没有原料，谈不上生产加工。

而这个原料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人民群众。

所以理解民主集中制就简单了，领导层负责到群众中搞调查，收集原料，也就是各种群众遇到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和思考，想法和情绪等等。

但是这些收集而来的东西是杂乱无章的，甚至有些群众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你就必须要加以处理、分析、甄别，最后形成成品，也就是好的政策。

这个成品到了群众那里，群众用了以后啊，又会提升想法和意见，然后又循环收集起来，对成品进行新的改造、加工，这叫产品升级换代。

这既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含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民主是不行的，群众没有提供原材料的渠道，领导闭门造车，那就必然要出问题，生产不出好的产品。

反过来，如果对群众的民主意见，不加以鉴别，改造，筛选，最后统一以后执行，那就还是一堆原料，毫无价值。

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家里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就非常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好处。

有的家长，不尊重孩子的意见，觉得小孩子能提出啥好意见，于是很多事情，甚至是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兴趣，学习，思考等方面的问题，无视孩子的想法和意见，大搞包办代替，孩子完全没有发言权，实际上长久发展下去，是不利于孩子的独立思考和独立成长的。

那么反过来，有的家长又一切听从孩子，甚至孩子还有什么投票权、决定权，什么都尊重孩子的想法，大搞所谓“家庭民主”，其实这也是有问题的，过渡发展下去，有任性、自私的危险。

这里面就非常体现民主集中制的技巧，总的原则就是：既要民主，也就是既要孩子们独立发言，提出想法意见，但是又不能不加以鉴别和筛选、把关。

三、

反对主观主义思想

这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第三个很有意义的点，值得读一下：

什么是主观主义？其实也就是说一切只从自己主观臆想出发，毫不联系客观实际而得出的想法、结论、观点，我们就认为这是主观主义。

我们说这是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的。

这个主观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其实没有大力度的纠正，也没有从理论上找出主观主义的根源，因此有点隔空瘙痒的感觉，以至于后来主观主义泛滥成灾，直接在领导层中也大肆泛滥起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结果，直至延安整风大力整顿主观主义思想，才从根源上大面积解决了主观主义问题。

当时，此文只揭露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比如毫无调查的主观分析，毫无依据的主观决策，毫无证据的批评、打击同志等等。

直到后来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写出了《实践论》，才开始从理论上找出主观主义的根源。

所有的主观主义，其核心来源于理论与实际脱离，抛弃了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

因此，当只强调理论的时候，就变成了教条主义；反之，当只强调实践的时候，就变成了经验主义。

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恰恰就是主观主义最直接的两种表现形式。

所以大家在读《毛选》的过程中，其实从前后对照着来看，也会发现，毛泽东思想也是在逐渐的发展，提升的，并不是一上来就洞察宇宙先机那种。

要杜绝主观主义，就要明白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明白主观思想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读一读我们之前解读的《实践论》，或者原文的《实践论》，我想对理解主观主义，破除自己的主观主义是很有帮助的。

四、

个人主义

文中还纠正了一种思想，也就是——个人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来源来小资产阶级思想中的，一切以个人利益原则为主。

这种思想有很多表现形式：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等。

这里面原文中都有直接简单精辟的解读，我们就不越俎代庖了。

我们值得思考的是什么呢？应该是所有的行为、其实背后必然是某种思想在指导的。

思想指导着行动，最后表现在各种行为上，要从行为上纠正，就必须找出其背后的思想根源。

他为什么那么做，源自于他为什么那么想，搞不清楚他为什么那么想，实际上无法纠正他行为上的错误的。

这就是一切行为都有其思想根源。

后面，我们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一切的行为，不管对的还是错的，也都有其历史根源。

很多时候，只有把根源找到了，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个历史根源的问题，我们在后面的《毛选》文中还会经常遇到，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解读一下。

《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篇文章，还有几个部分，文中还说了“关于非组织观点”、“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关于流寇思想”、“关于盲动主义残余”几个部分，说得都很通俗易懂，这篇文章，大家可以主要以直接阅读原文为主，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

好了，下一篇，我们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六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上）

一、我们说一下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

这篇文章写于 1930 年 1 月，实际上就是刚刚召开完古田会议后便写了此文。

当时以林彪为代表，党内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到底要不要花巨大的精力去建设根据地？建设政权？发动群众？武装群众？

之所以会有这种思想存在，并非全无来由。我们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也就是 1927 年 10 月份以后，实际上到 1929 年 1 月，大概一年几个月的时间，井冈山根据地就在白军的围剿中崩溃了。

后来毛泽东、朱德领兵去了赣南，在赣南和闽西一带又重新建立根据地，但是这个根据地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处于敌人的围剿中，今天一个两省合剿、明天一个三省会剿，实际上红军部队一直都是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之下。

而且很多时候好不容易分好的土地、建好的政府、组织起来的政权组织机构，白军一来，就把这些东西摧毁了。

比如，分好的土地，可能不作数了，建好的政府，里面很多人要么反水，要么悲观失望不干了，群众要是再埋怨上几句，就很容易使大家也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林彪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阐述了他的疑问。同时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没有必要建设这种政权，大家就打打游击，等到革命高潮起来以后，再借用红军的力量组织武装起义，那时成功的概率高一些。

实际上，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大概就是走的这个流程，尤其是武昌起义就是这样操作的。

当时信虽然是林彪写的，但是持林彪这类观点的人却绝不是他一个，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组织基础，才会反应到毛泽东那里。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也就是这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实际上看得十分透彻，他明白以林彪为代表的这种悲观失望的情绪，究其根源：

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暂时不会到来，因此很多建设性的工作是非常徒劳的。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观点来理解就是：风口大势还没有到来，那么很多艰苦细致的积累工作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要解决他们的疑惑，你就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革命的高潮到底会不会来？如果会，那它到底什么时候来？

第二：这些艰苦细致的，看似徒劳的建设积累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

第一个问题又是第二个问题的前提，因为如果革命高潮确实无法到来，实际上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那些工作确实都是徒劳的。

原因很简单：如果确实没有革命的基础，没有愿意参加革命的群众，那你就是付出再多的革命的主观努力，实际上最终都是要失败的。

因此，中国革命高潮到底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就成了这篇文章首先要答复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都读了几篇《毛选》了，有一个基础观点应该已经明确了：

你要回答人家的问题，就必须找出问题的理论依据，把事物矛盾、性质给分析清楚了才能真的说服人，否则就是鸡汤、忽悠。

你不能跟大家伙儿说：“兄弟们，相信我，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我们要坚定我们的意志，伟大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

你说这个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除了打打鸡血之外，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看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如何分析革命高潮必然很快到来的。

三、

第一点：文中首先指出，革命高潮要到来，是中国半殖民地的基本性质决定的。这一点，实际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中，已经有过分析，只要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现实继续存在，那么他们的代理人买办、大地主之间的矛盾就会继续存在，军阀之间的混战就会不断发展，因此造成群众革命的因素实际上就会不断的发展。

这里我们直接引用文中的一段原话，来阐述这种革命高潮必然来临的理论依据：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以上一切，都是由中国的当时所处的基本性质——即半殖民地这一性质发展和衍化而来。

因为是半殖民地，受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由此伴随着军阀之间的混战，由此又使

得赋税加重，企业破产，农民生存压力增大，工人失业，学生无钱上学等一系列现象。

这些现象由基本性质所规定，大家都可以看到现象的存在，这些现象当时是普遍存在于中国各个角落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就如遍布在满山遍野的干柴一般，随处可见。

只不过大家不知道引发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即内部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基本性质而已。

大家不知道引发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也就不知道这些干柴是否还会继续发展，是否会变成大火燃起来，什么时候才能燃起来，怎么使得它燃起来等等。

因此，当局部的干柴被大雨（围剿军阀）浇上几次，大家的悲观失望情绪便由此而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说到底，是没有看清楚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其决定了干柴必然越堆越多，虽然伴随着时不时的大雨，但是阻挡不住干柴迟早发展成大火的根本趋势。

所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首先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即革命高潮会不会到来的问题。

它给我们什么启示？

其实我们之前在《矛盾论》中已经解说过了：事物的根本性质，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

中国的半殖民地这一性质，也由众多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分裂、侵略、殖民（间接，即扶植代理人）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

因此，大家从这篇文章中，应该就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搞清楚一件事情的性质是

多么的重要。

可以说，我们搞清楚了一件事物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分析清楚了它的各种矛盾，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然后再去看种种现象，就能看得异常的清晰，也就可以帮助我们作出更准确的选择和判断。

所以，找出事物的矛盾，分析主要矛盾，分析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明确事物的性质，看清事物的本质，再去找出对应的方法论，就成了《毛选》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的一个基本思路。

大家记住这个思路，也不必急于要理解到什么程度，因为后来很多《毛选》文章都会用到这个思路，等我们解读的文章再多一点，大家会对这个思路越来越深切的感受，最后形成自己分析问题的思路，可以获益良多。

以上，是毛泽东给大家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革命高潮一定会来，遍布各个角落的干柴就是证据。

问题解决到这个地步，实际上还是不够的，我们回顾一下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就知道：

实际上你解决了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明确它到底什么时候到来？

都知道要来，但是什么时候来，大家也要有个数，否则谁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所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际上还要解决革命高潮到底丫的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双方力量的准确估计。

就算是柴，但是如果是一块很大的木头，甚至是潮湿的木头，而你只有一根火柴，实际上你也不容易把它点燃，因此这就涉及到双方力量的估计，星星之火具体是

多大的火？漫山的柴，到底是什么样的柴？

我们下一篇文章再继续解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下）

我们继续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

上一篇文章，我们说了，通过明确事物的性质，解决了矛盾发展的趋势问题，就是说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此刻已经是遍布干柴了。

但是革命高潮到底什么时候来，哪天来？以及，我们要做好什么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是这篇文章《毛选》要解决的问题。

要整清楚革命高潮哪天来？就要清楚双方的力量对比。

这个就不是理论问题可以解决的了，它必须要对双方的政治、军事、文化实力等等都有十分充分的了解，才能估计双方实力对比。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对双方实力作了分析：

（一），我们革命的主观力量是弱的，但是反革命力量也是弱的。

（二），我们力量虽然很小，尤其是经过一些挫折和打击，但是它的发展速度很快。

（三），敌人力量很强，但是内部矛盾，军阀混战正在酝酿，这种矛盾会促使军阀力量走向衰弱。

关于第三点：文中估计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的混战形势已经形成，

马上就会爆发。而历史证明，就在毛泽东 1930 年 1 月份写完这篇文章，过了 4 个月，也就是 1930 年 5 月份开始，中原大战便开始爆发了，也就是蒋桂冯阎之间的战争。

这个估计准确度是非常高的。

(四)，目前中国革命力量遍布在各个角落，只等着星星之火去点燃，革命高潮会在不远的将来到来。

这四点估计没有什么数据支撑，如果只是那么去看的话，实际上有点难以说服的意思在里面。

这四点估计得出的结论很简单：我们虽然弱，但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弱，敌人虽然强，但是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强。

那个年代不可能有十分完整的数据支撑这种敌我力量的对比和估计，即使有估计也是很片面的、不完整的数据，所以它没法像我们今天这样，搞个数据分析，来得出我们的结论。

但是，《毛选》厉害之处就在于，它里面对时局的估计和判断，往往会在不远的将来，立刻得到验证。

从《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再到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再到《论持久战》，再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系列文章，皆是如此。

你什么数据分析，都没有事实的很快验证来得准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没有去说，他是怎么估计的，用什么方法去估计的，为啥他能估计得那么准确，所以我们只看到他把结论放在那里，告诉大家通过以上四点，我们知道革命高潮就要来了，至于他是如何对以上四点估计那么准确，此文并没有交代，也不可能交代。

因为文章不是写方法论的。

要找这个方法论的答案，我们就要去重读一下《实践论》这篇文章。

我们之所以提前写那篇文章，就是为了大家读其他文章的时候，能心里有个谱。

要对事物的量作出准确估计，对敌我双方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实际上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就离不开具体的实践，在同敌人的交战中，在对中国革命长久以来的各种现象的认识过程中，在不断的把形成的理论付诸于实践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这种对敌我力量准确估计的能力了。

这种能力不是我们现在读了几篇《毛选》就能学到的，《毛选》只能告诉我们方法，我们只有把这种方法用到我们的实践中，长久的练习，总结，思考，才会真正转化成我们对自己所处的行业的分析能力。

毛泽东后来写《实践论》的目的也在于此，他要把自己的方法，从理论上给大家讲清楚，让大家也都可以学着去分析实际情况。

这种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归根结底还是《实践论》中讲的那样：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循环往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对敌我双方力量作出一个估计，通过这个估计判断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

这个估计是准确的，因为不久之后中原大战开始，实际上那段时间是苏区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过后来的历史我们也清楚，随后出现了李立三冒险主义，又过分的高估了革命高潮带来的影响力，结果冒进的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是后来的事了，看过我写的毛泽东传，应该比较清楚这段历史。

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革命高潮来临之前，我们要干些什么？

二、

这个问题是针对林彪提出的，要不要建设政权，组织群众，武装赤卫队，搞土地

革命等等。

我们看看毛泽东的观点：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观点很明确，建设政权，发展红色区域，扩大地方武装，土地革命这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是能够促进革命高潮的。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作用：在革命高潮真的来临的时候，你作好了迎接它的一切准备。

原理不复杂：

其一，农民只有在亲自体会过了苏区那种拥有土地、拥有话语权、拥有公平、拥有参与感的生活以后，将来革命高潮起来，他们才会毫无疑问的选择红军。

其二，不做这些艰苦细致的工作，实际上红军单纯的游击会有落入流寇主义的危险。

其三，红军的扩大就成了无水之源，只有在根据地发展政权，武装群众，建设民兵、赤卫队组织，将来这些组织随时都可以参加红军，因此红军才有扩大的可能性。

这就是在“风口”来临的时候，提前准备的意义所在。

当然，后来我们看到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就是毛泽东这种思想的发展的体现。

由此，我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继续得出一个观点：

行业趋势判断不准是不行的，判断准确但是不做好准备工作也是不行的。

你看，这又是一个简单的辩证法的统一思想，毛选中处处充满了这种思想。

好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就解读到这里，文某我们再讲一个小历史，之所以会有这篇文章，实际上跟当时的具体政策和行动有关系。

当时中央提出一个计划：一年之内争取江西的胜利，换句话说，一年之内打下江西。

但是，林彪他们认为，现在都被逼的只能打打游击了，还谈什么一年之内打下江西？

所以毛泽东这篇文章，分析出的结论，也是为了告诉大家，别那么悲观，打下江西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认为，是有可能实现打下江西的，但是不能机械的规定时间为一年。

于是原文中有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但是历史是比较讽刺的哈，事实上后来确实是没有打下江西，因为紧接着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候，就马上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

再接着，李立三之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明“左倾”路线的持续统治，毛泽东就此靠边了，几年后别说打下江西，连整个赣南、闽西全丢了，开始了万里长征。

所以，我们回过头再看《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那篇文章，就会发现《毛选》确实很厉害。

大家还记得我们解读过的，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中的第五条吗？

“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

只可惜后来的历史证明了，第五个条件的实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观上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确确实实需要一个非常具有领导力的领袖。

好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解读完了，下一篇，我们读《反对本本主义》

第七篇，《反对本本主义》

读《反对本本主义》

这篇文章，是《毛选》里少有的几乎完全不用解读，也不需要什么历史背景，读来就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而且句句经典的文章。

也是毛泽东说过的他自己本人比较满意和喜欢的一篇文章。

此文前半部分，我们就不解读了，那么好的文章，我们就摘抄一些经典名句吧，

其实此文前半部分，几乎句句都可以成为经典名句。

后半部分，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和“调查的技术”两个小节，我们再简单解读下。

先上前半部分的经典名言：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二，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三，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四，

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五，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六，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七，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八，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

九，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

十，

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

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十一，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十二，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十三，

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

十四，

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十五，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以上几乎全文摘录，都是经典名句，而且十分通俗易懂，大家有时间就可以读一读，能背下来就更妙了，当然，主要是明白这些话的含义。

下面，我们聊一聊这篇《反对本本主义》的后两段，

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和“调查的技术”。

在“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小节里，其实毛泽东已经预感到领导策略上要出严重问题了。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说道：

“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

在这里，他单独的强调了主观政策的正确，不犯错误，对于取得革命胜利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上一篇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到，毛泽东当时对争取江西的全省的胜利，其实是比较乐观的，但是是否能实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领导上不犯错误，斗争策略上不犯错误。

在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就是刚写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的差不多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时候李立三已经以中央的名义，开始批评毛泽东的路线有问题，这个时候或许毛泽东就已经感觉到了，领导上的策略要出现严重的挫折，只可惜他的强调并没有改变什么，最后还是出现了立三路线，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错误，乃至发展出了“李文林事件”等等，这些历史我们在苏区斗争里写的比较详细，大家可以看一看。

为什么说胜利要靠自己的同志了解自己的情况？

这里面是矛盾论里的一个基本原理：

任何矛盾都有特殊性，中国的情况有中国的特殊性，每个人的情况也有每个人的

特殊性，这就意味着，任何理论，原理都必须要结合实际，否则实际上就违背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

在最后一节“调查的技术”里，总结了一些调查的注意事项：

1，做讨论式调查。

这个说的是，调查要全面，被调查的对象都能说话，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你得到的结果才不会是某个人的一面之词，才会更全面。

2，调查些什么人？

这说的是，调查对象也要全面，各个阶层的人都要收集材料，如果是调查的事物，则同理要每个层次、各个方面都要有相关的调查，不能漏。

3，调查时人多还是人少？

这个根据实际调查的项目去确定即可。

4，调查要提前有纲目

也就是在调查之前，你大概要了解什么东西，要得到哪些类信息，在调查之前就要确定好一些基本的目的，整理出大纲。没有目标的调查，是非常容易变成泛泛而谈的。

5，要亲自出马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不能假手余人。

6，要深入

不能浅尝辄止，要深挖到各种材料都能起到实际的意义。

7，要自己做记录。

以上，是《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之中，讲述的几点调查注意事项。

但是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对于调查这件事，最难的是他根本不知道要调查什么，也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甚至不知道要调查什么项目。

我跟他们说，这不是困于调查，而是困于迷茫。

解决迷茫没有什么技巧，如果你还年轻，家里条件比较好，那么多读书，多锻炼，多参与项目实践。

如果你有过一些人生经验和阅历了，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复盘一下，搞清楚哪个阶段犯了左的错误，哪个阶段犯了右的错误，把问题找出来，再去对比一下同行业，差不多的资源条件下，做得最好的那个，有没有什么规律？这些规律可不可以模仿？

这就是解决迷茫最切实的方法了，这个建议跟《毛选》无关，纯粹是我个人建议。

如果非要从《毛选》中找点依据，那么回到本文第二条：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下一篇，我们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第八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一、

这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不是一篇很出名的文章，但是却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

文章。

这篇文章写于 1933 年 8 月份。

从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已经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在 1932 年的宁都会议上），工作开始转移到政府工作上。

因为是在战争年代，所以当时内部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思想，即很多人认为：“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做经济工作，大家忙着打仗的事情”。

这一点原文中交待了：

“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有闲功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这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全文其实就是围绕着这种思想问题展开的。

大家不要觉得这种思想，似乎只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存在，其实不然。我们今天的很多思想，行为其实也会存在这种情况，那天我们在群里聊起孩子的教育，不是还说到过这个问题吗？

如果“赚钱”、“工作”是家庭面临的主要矛盾，那么确实应该集中精力放在赚钱上，或者说大部分精力放在赚钱上。

因为实际上，如果在工作上不顺利，家庭经济上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的话，你会发现家庭也会随之暴露出很多的矛盾。

但是同时，这不意味着你完全不分时间和精力给家庭，不分出时间放到孩子的教育上，否则发展下去，将来孩子教育出了问题，会反过来影响你工作和赚钱。

这种情况其实在生活里并不少见。

再比如，有的家长让孩子一味的只管学习和考试，等到工作年龄了，结婚年龄了，才发现好像在实践和男女交往方面出现了严重的短板。

大家如果注意观察，其实这类现象在工作上，生活里是经常会碰到的，很多也是我们自己犯过的错误。

这个时候，我们从理论上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就会用到之前《矛盾论》里的原理了。

即：永远要抓住主要矛盾，但同时必须兼顾次要矛盾，否则次要矛盾就有可能转化成主要矛盾。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如果不抓经济工作，那么战士们生活就得不到保障，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不到保障，这样一来，你的仗也就不可能打好。

同时，因为群众物质生活不好，就会影响到他们参军的热情，然后你扩大红军就变得困难起来，最后，如果经济工作长期得不到重视，那么前线战争就会越来越难，经济问题就有可能转化成主要矛盾，最后就是你一个问题都没解决好，仗也没打好，经济也没搞好。

我们可以看到，道理很简单，很通俗，这样说，其实大家就明白了。

二、

那么反过来，我们说经济工作和战争工作两件事，能不能平均去看待呢？
也不行。

必须要有侧重，也就是说，两件事都必须抓，一件都不能落下，但是你的侧重点又必须放在主要矛盾上，也就是打仗这件事上。

换句话说：只要你的主要矛盾还是“打仗”这件事，那么你的主要精力就得放在这件事上。

以上观点，后来被毛泽东总结成这样一句话：

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离开两点谈重点或离开重点谈两点都是错误的。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重点论和两点论。

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表达的含义就是：你在处理任何两件事、或者三件事、四件事时，这些事件中必然有且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是主要矛盾，必须集中全力解决主要矛盾。

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表达的含义就是：处理任何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都必须清楚知道，其中一定还包含着某些次要矛盾，必须要兼顾到，不能让它影响到主要矛盾的解决。

离开两点谈重点，指的就是只关注到主要矛盾，完全不顾及次要矛盾。

离开重点谈两点，指的就是把所有矛盾平均看待，不分主次。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利于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

以上，就是我们说的重点论和两点论的含义。

其实，我们明白了矛盾的原理以后啊，这个两点论和重点论是非常好理解的，大家一旦在现实生活里陷入一种迷茫困惑，或者一团乱麻的状态的时候，这个分析的方法就非常管用了。

去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当下哪个问题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

我是不是只抓主要矛盾，忽略了次要矛盾？

还是想萝卜白菜一把抓，导致忽略了什么才是主要矛盾？

我们一旦陷入混乱，就一定要记得去思考这几个问题，因为混乱一定是这几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

当然，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把主要矛盾给找错了，或者在精力分配上，并没有做得合理，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意义。

不过大家知道了这里面的原理，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能避免陷入一些无谓的思考，把这些原理化成方法论，去帮助我们处理实际生活和工作遇到的种种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文章，其实我们读的是什么呢？

读的就是一个“两点论”和“重点论”。

这是这篇文章我们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三、

除了“重点论”和“两点论”之外，这篇文章还讲到了建设经济工作的几个注意事项，也颇有阅读价值。

这些注意事项有四点，我们一一分析一下：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

这一点讲得是不仅要把经济工作时常放在干部群里讨论，而且必须要把经济工作拿来同群众讨论，并把政策给群众解释清楚。

很有意思吧，拿到干部群里讨论，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为啥强调要把经济工作拿去跟群众讨论，并把每一次经济政策都跟群众解释清楚呢？

原理并不复杂，这是《毛选》思想里群众观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和体现。

为啥经济建设要跟群众讨论？为啥要吸取他们的意见？还要把政策给他们讲清楚？

就是因为不管什么政策，其最终落脚点总归还是要放到群众身上，今年种什么农作物，群众对具体政策有什么反应？如何跟他们推销公债？

这些东西最终实际上都是要落实到群众身上去的。

因此，干部不要总觉得自己聪明，整天闭门造车，瞧不起群众。

这些具体的政策，必须在实践中充分注意群众的反应，他们的想法，你才能最终做到实事求是，这也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这个观点核心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不应该是命令主义的。

这里很有意思，大家可以读一下原文。

这应该是我看到过的最早的不要设 KPI 的管理方式了。

上原文：

“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的这样多，只是蛮横的按照自己的数目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的推销。我们一定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的表现

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杂，去做一切经济动员工作。”

大家读到这种话的时候，不知道心里会不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觉得好体贴的感觉。

其实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表现，根据具体的群众热情，当地经济情况去做具体的经济建设工作，而不是机械的派数字。

其实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执行起来很困难，因为你总要去防范偷懒的，防范不自觉的，防范那些明明是工作做不好，然后找理由说是群众基础不好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很多公司设了 KPI 不行，不设 KPI 问题更严重。

为什么？

因为员工拿薪水办事嘛，人家给你干的，能偷奸耍滑的怎么可能不偷奸耍滑呢？

第三点：经济建设的展开，需要很大塑料的工作干部。

这些干部从哪里来？组织上给你派？

别想这种事了，所有的干部就从干经济工作的这些人中去培养，去发现，去创造，如果还不够，就从群众里面去找，从群众中去提拔，去发现。

这就是《毛选》式解决和培养干部的方法。

后来，在延安时期，办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办人民性质的大学，培养人民干部，这些干部从哪里来？

不仅从各地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去培养和发展，也从那些在实践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群众上去寻和培养。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任务也不能分离。这一条，讲的是要做好经济工作，那么如何发展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如何实行好劳动法？

因为只有这些工作做好，群众积极性有了，经济建设才会做好。

以上四点，其实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密切的联系群众，才能做好一切工作。

《毛选》里的群众观，是从始至终的，这只是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个体现，这种群众观放到战争指导中，就变成了人民战争。

后来发展出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其实都是人民战争的性质。

那些元帅、大将们指挥艺术固然高超，但是归根结底他们指挥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淮海战役是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个说法，丝毫没有什么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比较熟悉的“孟良崮战役”，那次战役每一个战士，几乎能配备一个后勤人员。当时的担架队，粮食运输队，能同战士达成近乎一比一的比例，这些人不是军人，都是群众，是人民。

这就是群众观的胜利。

后面的很多《毛选》文章中，都会重复讲到群众观。

这个群众观，组成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体系，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后我们会逐渐在解读中，把这个理论体系的运用，实践效果分析出来。

大家就会逐渐对里面的“群众观”有一个很好的理解了。

第九篇，《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读《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一、

这篇文章是一篇《毛选》里的小短文，是为了解决当时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划分成分的时候出现的偏差而写的。

这也算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技术难点。

当时的背景是，王明路线对“地主”“富农”的打击政策非常严重，把“地主”当成要消灭的对象，把“富农”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区在 1933 年 6 月份左右，就开始了一场苏区的“查田运动”。

而这篇《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写于 1933 年 10 月份左右，就是针对王明路线中出现的很多过火现象而写的。

“查田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实际的结果是把很多中农，甚至贫农，全给打成了富农，把很多富农打成了地主。

比如当时就出现过这样一些情况：

有的家里面有一台碾米机，可能就是上一辈留下来的，然后就因为你有这台碾米机，平时给村民们碾米，收了几文碾米钱，就把你划成了富农，因为你参与了“剥削”。

有的曾经雇佣过“长工”，或者还在继续雇佣“长工”，那就把你划分成地主，因为你压迫劳动者。

还有的放过一些高利贷，但是你说他家有多富裕，那也不见得，但是就因为你放

过高利贷，甚至借钱给别人收了一点利息，那你的成分也不会很好了。

因为整个指导思想，对地主、富农的打击比较严重，所以一旦成分被划成了地主、富农，实际上受到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不仅仅是没收家里的财产，（地主完全没收，富农只分给坏田），而且每次开群众大会的时候，动不动就要进“学习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所以当时“查田运动”带来的破坏非常严重，一度导致苏区的富农、地主，甚至中农的逃跑现象。

然后，毛泽东为了防止这种错误的蔓延，因此设定了很多的标准，其目的就在于希望一定程度上保护“地主”、“富农”，不要对他们开展过火的斗争。

因此在如何划分成分的问题上，做了更多的明确，于是就有了《毛选》中收录的这篇《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其实当时还不止这一篇，毛泽东还制定了很多更具体的标准，只不过《毛选》里只收录了这一篇带有原则和纲领性的标准的文章。

大家读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以这篇文章去划分，那么不管你家里是不是有碾米机，家里是不是放过高利贷，是不是雇佣过长工，这些都不是划分的标准。

真正的标准，其实全文讲来讲去都只围绕四个字：剥削程度。

其核心就在于，看你家的收入来源，主要的是靠剥削还是劳动。

即使你家有碾米机，但是只要你家里的衣食来源，收入渠道主要是靠劳动，那么你就不是地主。

原则就是：家里来源靠剥削而来的比重越大，那么你的成分就越往地主靠近。

这样一来，那些查田运动中的偏差，比如雇佣过长工，但是其实就是个中农的，就解放了；家里放过高利贷，但是或许就是个贫农的，也解放了。

实际的结果就是这篇文章，解放了大量被划错，被冤枉成分不好的人。

这就是我们说的，做任何事情，你设定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是很重要的。

像家里有碾米机也好，雇佣过长工，放过高利贷，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现象，并不能作为是否是地主阶级、富农成分的依据。

但是因为很多时候，一旦标准原则不清晰，群众中就一定会不可避免的造成一种混乱，所以那些原则性的标准，就非常重要。

有了原则性的纲领以后，再去制定具体的划分依据，它不会跑偏了。

比如，按照剥削程度去划分，那么你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看是剥削程度达到多少，比如 15% 是中农， 50% 富农， 60% 以上是地主，总之不管你怎么去划分，都不会过于跑偏，至少不会存在把家里有台碾米机的都给打成富农或地主的现象。

然后你再根据具体每个地方不同的实际情况，去制定一定的具体标准，事情就好办一些了，也就不会过于“左”或者“右”了。

当然了，即使有标准，实际上执行也必然出现各种偏差，这是正常的，但是有原则性的东西在那里，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错误。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标准很重要，但是标准直接触及事物本质也很重要。

这是此文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我们再聊聊关于指导思想的问题。

当时的查田运动，尽管毛泽东全力纠错，但是因为整个指导思想是左的，所以结果就是仅仅只是纠正了一些偏差，把一些划错的拉了回来，并没有根本改变对地主、富农的打击。

我们当时说过，下一篇文文章也会讲到，毛泽东制定土改政策，以及针对工商业、手工业的经济政策，是非常侧重于保护他们的积极性的。

所以，当时他搞了很多鼓励私营经济的政策，发展私营经济的措施。

为什么他会支持私营经济？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切以消灭剥削为主的吗？

原因其实毛泽东解释得很清楚：当时的苏区经济太落后，生产力太低下，一定程度的私营经济对农民是有非常大的好处和利益的。

这就是“实事求是”。

但是他也考虑到私营经济将来会遇到的瓶颈，所以他强调说，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都要鼓励和支持。

总之原则只有一个：一切有利于农民、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都应该鼓励。

这其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个表现。

而王明路线的政策来源于什么呢？并不是来源于苏区实际，而是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的想象，来源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

但是这东西，还不符合当时苏区那种落后，生产力低下，群众觉悟还没起来，客观环境还面临着白区的残酷封锁等等的实际现象。

因此盲目的执行了一系列所谓的苏联成功的“社会主义经验”，其最终的结果就导致了查田运动的过左倾向。

当然，这种“左”的影响，还覆盖到了军事、政治上。

我们说，思想决定行动，思想上出了严重的问题，行动上尽管各种纠正，往往只起到治标的作用。

而思想来源于哪里？就必须来源于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从理论、从设想等等出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实事求是”是《毛选》里非常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渗透到每一篇文章里，成为了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东西。

第十篇，《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读《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我们的经济政策》

这两篇文章，我们放到一起读，因为它们都出自一个报告，即 1934 年 1 月份到 2 月份期间，召开的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

这两篇文章都是报告中的一部分。

从时间点上看，我们可以知道，这时候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了差不多 4-5 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毛泽东直到遵义会议之前，都没有参与到军事工作中，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两篇关于政府工作的文章。

读来多少有些令人唏嘘的感觉。

首先《经济政策》这篇文章，给我们还原了当时苏区建设中的基本经济成分，经济制度。

我们前两年炒得非常火热的“共享经济”，以为是多么新奇的概念，多么牛 X 的创意，其实在这篇《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早就出现并使用起来了。

它就是当时的经济成分中的“合作社经济”。

当时生产工具非常缺乏，文中讲到“耕牛”、“农具”等等，都是非常缺乏的生产工具，很多贫农分到了土地，但是连基本的生产工具都没有。

所以啊，政府就组织了统一的机构，属于合作社的其中一个职能，就是把生产工具集中起来，按照一定的单位和次序，进行更合理的利用，保证生产工具的使用率最大化，这就是当时苏区出现的“共享经济”。

“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牛队，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了耕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

你说它原理复杂吗，讲真，一点都不复杂，无非是国家通过一定的调节、干预，使得生产效率最大化，工具利用率最大化。

而且这里面很多创意啊，不是来源于毛泽东本人，而是来源于群众，然后由毛泽东加以分析、程序化以后，把它用一种政策的形式制定出来并推广。

你看，这又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体现，也是群众观的一个体现。

从积极性这个问题去看，当时文中也记载，苏区还不适合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很多年以后采用的生产队，人民公社中解决和处理农业问题的方法。

之所以那么提，就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落后，农业集体化条件不成熟，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条件，你一没有机械，二没有和平的环境，三土改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

这些条件不成熟，所以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农业集体化。

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实际，去制定具体的政策，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表现。

而从经济成分上来看，当时也是三种经济并存的。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

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这里没什么观点可以提炼，有的话就是“实事求是”。

之所以在这里先提出来，是因为后面《论联合政府》的时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会讲到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

大家可以提前先搞清楚当时苏区的基本经济成分和制度。

二、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这篇文章，其实文章标题就解释的非常清楚了，一是要关心群众生活，二是要注意工作方法。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战争的一个内在逻辑，为什么是人民战争？

《毛选》中这样说：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

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多么朴实的道理，你要群众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参加战争之前，你必须先问问自己？你给群众带来了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人民战争的内在逻辑。

创业、生活、工作、家庭无处不运用到这个简单的道理。

之前我们的《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提到，红军不仅是打仗的，还要组织群众、帮助群众、武装群众等等。

其目的是什么呢？建设一个好的政权，让处于这个政权中的百姓喜欢上这个政权，喜欢这个政府，喜欢生活在这里。

打仗之外，为什么还要在苏区办学校，搞扫盲运动，搞农村医疗，解放妇女，提高生产，等等一系列政府工作？

原因就在这里：在你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里，群众百姓感受到生活在里面比以前过得更好，因此他们就会主动起来保护这份果实，保护这个家园，保护苏区，保护解放区。

当这种思想落实到具体工作的时候，就变成了此文的前半句话：**关心群众生活。**

你只有关心群众的生活，关心他们的方方面面，群众才会拥护你，但是到了现实生活里，大家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类人，他们从来只会提要求，提权利，提他们要干嘛要干嘛，从来不会过问他提的要求，别人为什么要答应？他们讲权利的时候，又尽了哪些义务？

当时这篇文章针对的就是工作中出现这种问题的人员。

当时很多人推销政府公债，号召群众参加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等等，都是只讲任务，其他事情一概不管，说难听点就是只要百姓承担责任，但是从来不考虑他要为百姓干些什么。

最后的结果呢？

往往就是工作也做不好，群众也不买账，扩红也完不成。

所以，当你要求别人为你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最好应该先想想，我们能为别人做什么，或者我们已经为别人做了些什么？

靠强迫或者是强压，或者耍一些小手段，都是不行的，既不长久也不可持续。

而另外一点：注意工作方法。

我们提出了很多任务，可是如果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一顿瞎说。

我们说《毛选》是一本操作手册，就在于它针对当时具体问题提出的方法，大家可以直接照着去做，能直接解决当时的某个具体问题。

只提任务是简单的，但是要把方法找出来，就需要很多的调查研究，不是走马观花的研究，而是切切实实的调查，找出方法。

这种方法，大家照着去做，就能取得相应的成果，那么工作才能真的开展下去。如果每次只提任务，不讲完成任务的方法，那就会变成命令主义。

所以，任务和方法一定是配套的。

我们常常会给自己定计划，定任务，定一段时期的目标，但是常常忽略的也是，完成这些计划目标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这个方法应该是可执行性很高的，我们按着这个方法去一步步走，然后适当调节、休整，甚至大规模变更的情况，都是有的。

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年度计划也好，月度计划也好，是配套了方法的，否则常常就会沦为空谈。

哪怕是一个减肥计划，那也是要配套方法的，每天多少时间，饮食上如何安排，做哪些项目，可能会出现哪些预料之外的情况？

这些东西配套以后，大家执行起来就有了落实感，否则计划往往沦为空谈。

而且这个方法，应该尽可能的具体，越具体越好，不一定准确，但是要具体。

当你执行的时候，发现执行不下去，你就要思考是计划有问题还是方法有问题？是计划太不切实际呢？还是方法上还需要改善？

找出原因，长此以往，你对生活就会有越来越强烈的掌控感，也就是主动权，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

第十一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读《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上）

一

还是一样，我们先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

之前读《毛选》文，我们已经数次提到过，《毛选》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个或者一类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而写的。

这篇文章题目看上去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实际上呢，它要解决的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

此文作于 1935 年 12 月 27 日，这时中央红军已经长征到了陕北，并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明确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路线。

应该说，瓦窑堡会议算得上是遵义会议的一个衍生和继续，因为当初遵义会议，因为时局和战事的紧迫，于是只能在军事路线上作出合理的纠正，并在遵义会议后很快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路线。

但是那时候正在长征途中，纠正“政治路线”的时机并不成熟，于是政治路线问题就被遗留了下来，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时机方才成熟，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这次会议算是纠正“政治路线”的一个开端，因为后来在纠正政治路线问题上，实际上也走了很漫长的路，远比纠正军事路线要困难和复杂很多。

瓦窑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路线转变就是从以前的动不动“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关门主义路线，转变成了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换句话说，此刻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已经由阶级矛盾转变成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

这里需要提一个观点，其实也是重复一下我们之前的“矛盾论”的观点：即：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切策略、制度、方法的基本前提，因为一切的策略、制度、方法，都是围绕着主要矛盾，并兼顾着次要矛盾进行的。

统一战线大家并无太大争议，但是如何具体的执行统一战线？如何确定哪些可以联合？哪些不能联合？就成了会议最具有争论性质的问题。

而其中争议性质最大的，就是这个“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当时中国自己的企

业家、资本家、民族实业家、富裕的手工、商业个体户等。

如何看待这个阶级？如何看待他们的转变？如何给他们定性？如何团结他们？这一系列的问题便衍生出来。

于是，在“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随即写了这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就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作了分析和讲解，就是为了解决以上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

这就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的历史背景。

其文章实质，是统一战线。

我们《毛选》里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理论，便由这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正式开启了。

这个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也是一个整体体系，后来第二卷《毛选》中，又产生了很多关于如何斗争、如何团结、如何既斗争又团结的思想，这些所有的文章组成并完成了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

讨论“民主资产阶级”只是统一战争思想的一部分。以后，我们读到第二卷的时候，还会看到很多关于“统一战线”的实践问题。

以上，就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大背景，接着，我们解读一下此文中的具体思想和观点。

二、

此文开篇是这样一段话，这段话特别值得拿出来单独说一说，因为看上去平平无奇的一句话，其实已经包含了好几个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先分析一下这段话用到

哪些知识点。

原文如下：

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这几句话，如果是初读者，看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话，没有什么值得解读的地方，但是对《毛选》比较熟悉的就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些知识点了。

首先，“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讲到一个“形势”的问题。

我们生活里啊，看到一个人盲目、不会做选择、乱搞瞎搞，常常会说这个人看不清形势，处于当局者迷的状态，因此常常作出十分错误甚至愚蠢的判断。

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会看不清形势呢？其根本就在于没有分析好当下所面临的诸多矛盾中，哪个是主要矛盾，哪个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个是次要矛盾等等。

我们上面讲了，这篇文章是瓦窑堡会议之后两天发表的，解决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当时瓦窑堡会议已经分析了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分析了阶级矛盾等一系列矛盾，再分析完了矛盾之后，才看清楚了当下的政治形势。

因此此处涉及这样一个知识点：认清形势的本质，就是认清了矛盾。

因为此文是衔接着瓦窑堡会议决议的，所以开篇我们便看到了这句话：

“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句话的实质其实就是这样：“同志们，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然后接着，又是这样一句话：“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我们以后还会经常看到这类似的话，就是形势和任务两个词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认清了形势，也就能看得清任务，看得清任务，也就能制定自己的目标，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方法。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矛盾的分析之中。

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每个时期，都要先明确当下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了吧？因为后面的形势、任务、目标、执行、回馈、再确认、再修整、再执行，这样的整个处理复杂事物的操作顺序，都是建立在矛盾分析的基础上的，分析过后，是什么矛盾，决定了后面一系列的策略和方法。

我们自己处理自己身边的所有事情的顺序，其实和这个流程是一致的。

三、

矛盾的各种衍变、发展、等等知识点，我们在解读《矛盾论》的几篇文章里都说过，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这里说，如何找出这些矛盾？找不出矛盾自然也谈不上分析矛盾。

找出矛盾并没有什么秘诀，但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关键点有两个：

第一个：事物涉及的所有信息一定要收集的全面。

这个全面有两个含义，这两个含义用两个词语概括就是：**历史和现状**。

《毛选》里经常可以看到这两个词语，它表达的含义其实就是把握事物的全面性，防止沦为片面的理解。

而要把握事物的全面性，就要搞清楚事物的历史和现状。

就好像我们说的，哪怕是劝两个打架的人何解，那劝之前你也得先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这里说的来龙去脉，其实就是事物的历史和现状，没搞清楚这个，提出的合解方法一定是胡说八道一通的主观主义的方案。

我们说要实事求是，也是这个道理，任何的理论、原理，如果不是在搞清楚具体事情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去运用，那都是教条主义。

换句话说，任何的理论方法，都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对象之上，找出了研究对象的历史、现状的一切信息，才能把科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得正确、合理。

第二个关键点：预判矛盾的发展和衍变趋势。

这句话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表达方式就是：你要知道这件事这样去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很多人办事啊，不考虑后果，其结果往往容易产生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使得自己失去了主动权。

过几天我们公众号在《长征》中会更新到四渡赤水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不断的去争取主动权，而争取主动权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思考每一个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你要思考一渡赤水，会有什么后果，有什么局面？

然后二渡、三渡能否调动敌人？敌人会因为你的决策作出哪些部署的变化？

只有这样去思考，才谈得上“调动敌人”，否则你都不知道你下这一步棋，会引起敌人的哪些变化，自己的哪些变化，那么何谈调动敌人呢？何谈主动权呢？

然后继续有人问，要如何预判矛盾的发展和衍变趋势呢？

这个问题，你就可以想想，你是怎么知道走路不小心碰到障碍物会摔跤的？

你摔过一次，总结一次，下一次不就知道走路不小心碰到障碍物会摔跤了吗？

对于复杂事物，这离不开大量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经验的掌握，不如此，则无法对事物的发展衍变趋势作出合理的判断。

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说的你实践了，碰壁了，然后总结并找出了碰壁的原因，那么下一次你就能预判碰到障碍物的后果。

我们又说，失败不一定是成功之母，就是说你实践了，碰壁了，然后没有总结和找出碰壁原因，那就白碰了，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你还是会碰，那它就不是成功之母。

所以，失败是不是成功之母，实际上取决于你自己。

换个方式，什么挫折是成功之母、黑暗是成功之母，成功是成功之母等等这些说法其实是一个意思，本质不取决于这些东西是否发生，本质取决于你自己是否善于利用这些失败经验、成功经验、挫折经验、甚至黑暗经验，来提升自己的预判能力，提升自己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能力。

所以，总结一下，要想找出自己面临的诸多矛盾，就必须得尽量全面的获取足够的信息，搞清楚身边那些事物、包括自己的历史和现状。

然后，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逐渐搞清楚这些事物可能的各种发展趋势。

只有这样，才能找出矛盾，才谈得上分析矛盾。

大家可能看到这一套方法，觉得这样太复杂了，生活里谁会想那么多？

事实上并不复杂，我们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矛盾的含义，很多人也从来没读过《毛选》，但是一样很会处理事情。

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没有总结过，但是凭着自己学到的其他理论、自己的实践经验，处理事物的方法其实吻合了矛盾分析的方法。

而我们知道了这里面的理论和方法，其实再去做，会少走很多弯路，会更加善于分析和总结，会更容易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这就是读《毛选》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意义。

读《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

一、

这一章我们主要讲变化和独立自主的意义。

首先说变化，即由于矛盾之间的互相转化，从而带来的各种事物内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矛盾的变化。

一般来讲，我们在生活里，成长中常常需要注意观察两种事物，一种是变化着的事物，一种是常年不变的事物。

拿《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里的内容来看，哪些很长时期内都是不变的呢？

“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毛选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哪些是变化的呢？

“当着革命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毛选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长时期不会变化的是，我们总的任务是追求独立、自主、自由、领土完整，这些东西是长时期内都不会变化的。

而我们具体的斗争目标、策略、方法则因为矛盾的变化，环境和形势的变化，需要时刻拥抱变化，否则就不足以应对时刻变化着的外部环境。

我自己在生活里把这个经验用到很多地方，会觉得颇有益处。

比如在个人价值观方面，我会认为善良、勤奋、换位思考等等，这些品质啊，一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不变的东西的，这里说的不变，也是一个相对的时期，要表达的含义是它们相对稳定，是我们需要恪守和坚持的一些东西，有利于我们设置一些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而有的东西就是变化非常迅速的，比如某个技术、某门手艺、某种糊口方式、当下的某种观念、某种习俗、某种风格、某种设计等等，这些啊常常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

当然，并不是说它们时刻会变化，我们就弃之如履，而是说我们应对这些东西的态度，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保持一种随时作好应对准备的状态，这样一旦它们开始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手足无措。

当然也不是要搞得紧张兮兮的，凭空制造焦虑，这个度大家还是自己去体会。

二、

然后我们回到《毛选》原文，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当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各阶级、各团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

我们说，自近代史以来，旧中国始终面临着两大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但是，在同一个时期，必有一个主要矛盾，两大矛盾虽然都很重要，但是并非并列，这也是我们《矛盾论》里说过的，同一个阶段之内，有且仅有一个主要矛盾。

当军阀混战、帝国主义采取温和的进攻策略，扶植代理人的殖民策略的时候，帝国主义之间也相互斗争的状态下，很长一段时期内，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 1924 年到 1927 年的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革命力量团结在一起反对各系军阀的斗争，看到了 1927 年至 1936 年由红军组织的土地革命战争，由共产党组织农民开始的土地革命。

这些斗争都是体现了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但是当日本开始转变政策，要从原来半殖民地的控制手段改为将中国全部变为它的殖民地的时候，这种矛盾立刻发生了变化。

即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

当这种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各阶级之间的革命态度就必然发生变化。

于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就需要分析各阶级的态度到底变成了什么？

于是我们看到，文中分析：

首先，工人、农民是坚定反抗者，也是最坚决的反日力量。

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性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各城市间的反日运动、青年学生的反日运动都是剧烈的发展了，而不是减少了。他们所面临的状况日益严重，越发的走向破产、失业的局面，因此我们说他们这个阶级也是坚定的反日力量。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则是完全扔掉了民族的界限，充当着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是没有变化的，是我们需要斗争并打倒的，他们的头头就是蒋介石。

（这里，因为还没有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向着陕北的围剿还在继续，因此这里并没有将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分析进去。但是文章后半段也分析了，即使是大军阀内部，也存在分化的可能）

文章最重点要分析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内部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然的软弱性、不彻底性、动摇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阶级，我们的革命队伍需要纯粹又纯粹，不应该把这个中间阶级拉到我们的阵营中来。

第二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也会变化，至少他们的左翼是会参与革命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他们，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

大家如果只是简单的从这两个方案去看，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肯定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是对的啊。

但是大家如果熟悉第一次国共合作，熟悉后来中间阶级反水造成过的严重伤害，可能就能理解第一种观点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坚持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到了破裂初期，首先叛变的就是这个中间阶级，也是就我们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害怕革命的彻底，因为这会革到他们的头上，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那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军阀，也同样参与了对我们的残酷围剿。

而后来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也就是井冈山和苏区时期，每次只要蒋介石来围剿的

时候，这个中间阶级反水的情况就接踵而来。（这个看过公众号里毛传的应该很清楚了）。

前面我们读《井冈山的斗争》也提到过，中间阶级拿不住的现象，一直都没有解决，以至于后来造成了很严重的内部斗争。

加上以前两个阶级互相斗争，留下的一些历史问题，所以持第一种观点的并不奇怪，相反，我觉得很能理解。

三、

那么第一种观点的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就在于，当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各阶级面临的矛盾也会发生变化。

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的矛盾，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发生变化，这个阶级同日本之间的矛盾，也同样成为了他们面临的主要矛盾。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蔡廷锴十九路军的抗日、看到了马占山等军阀在东三省的抗日等行为。

只要他们把原本向着红军的火力，转向日本帝国主义，那么我们都认为是有利于中国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团结和支持。

把矛盾分析清楚了，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时大家顾虑的，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前面分析了，主要矛盾的变化，会引起很多事物矛盾同样发生变化，那么好，既然你说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策略也要变化，以前的关门主义要不得了，要开展统一战线。

那么请问，万一当初的事件重演？万一中间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到了某个时期又开始兴风作浪、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又暴露出来，再次把屠刀对准我们怎么

办？

咱不合作，就不用提防，反正是把他们当敌人看待。可是一旦合作，他们就具有了欺骗性，就混进了我们的内部，内部的敌人往往最可怕，最难以拿捏，最容易造成极大的破坏。

这一点大家可能都能了解，堡垒往往被敌人从内部打破嘛，统一战线之所以难以开展，就在于怕坏人钻进来，我们难以识别，往往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

这个顾虑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

我们说同志同道合的同志合作，是最好的，也是最完美的。

但是同这种具有软弱性、动摇性的中间分子合作啊，是非常困难的，既要一起合作抗日，又要时时刻刻提防他们耍诈，时时刻刻提防他们把枪头扭转过来对着我们。

这种最是难以提防，也最容易造成损害，讲真，和这样的中间分子合作，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尺度要掌握的很好，否则就要出问题。

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这种局面如果是你，怎么办？怎么去分析和看待？

所以我们从《毛选》里会看到，其实关门主义者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确确实实有这方面的顾虑和实际问题。

按照我以往的性格啊，也是有可能站关门主义的一边的。因为我确实很反感这种拿不住的中间派，动摇分子，所以就不用说跟他们合作了。

所以，其实不管是哪种观点，大家都有自己一方的道理，都是值得思考的。

因此，我们才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

那么这个问题，《毛选》里是怎么解答的？

说起来也只是四个字：实事求是。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里，分析了今天的实际情况，原文如下（略长，大家可以细细读一下）：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

当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我们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

的影响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人退出去。一些坏人受敌人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影响加进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毛选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我来翻译翻译吧，意思其实也就是说：以前我们第一次合作，是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没有红军，没有武装，也没有成熟的组织，因此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最后人家要整你，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表现出来的就是机会主义路线。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独立自主了，有了这个基础，他好好合作，那大家就一起抗日，他要是想搞阴谋，搞纵横捭阖的手段，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去对付他。

在主要矛盾的变化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变化，要团结，要统一战线，但是又要时刻坚持独立自主，时刻提防他们的破坏。

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你要选择统一战线，那么你就要接受统一战线带来的种种困难，这个世界上没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选项。

你选择了一个东西，就要承担它带来的另外一些危险的、不好的东西，世界上所

有的选择都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东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就不是选择了嘛，那叫争取对不对？

之所以选择，就是因为有利有弊，你选择的时候需要知道自己要什么，选了以后要承担什么？

连结婚都是这样的，你选择婚姻，既获得了婚姻带来的好处，也必然承担这婚姻带来的不好的东西。

你选择一样的东西，就要作好准备，承担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而要如何承担，如何防止不好的东西对你的影响和破坏？

原则只有一个，这个原则我觉得也是一个长时期内不会变的好东西——独立自主。

失去独立自主，就失去了主动权，就会任人宰割。

拥有了独立自主，才能拥有拥抱变化的能力，才能适应各种不可控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需要独立自主。

上面那段原文摘录，其实核心要点就是四个字：独立自主。

现在和过去不同了，现在我们有红军，有锻炼过的党，有坚定的组织，这一点长征已经证明了。

原文中，还提到了长征，就是说明，现在的党是一个成熟的党，一个衡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独立自主。

这个独立自主从遵义会议开始，真正的形成了。在这个基础上来谈统一战线，才

是有可能的。

我们拿着这个观点，再回去看看以前的苏区历史，也就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想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困难，为什么同福建十九路军的合作最终走向失败？

我们说是因为迷信苏联的政策，迷信苏联的路线，那么迷信这些东西，归根结底是什么呢？

还不是无法独立自主，需要依靠别人的思想、方法、路线等等？

所以，这篇文章后半段，我们表达的主题只有一个——独立自主。

《毛选》中还有很多关于阐述统一战线的文章，后期我们还会看到这个“独立自主”在实践中会有哪些好处，会怎么帮助构建统一战线。

应该说，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统一战线，大家把这个规律代入到一切联合、合作的关系之中，你就会发现，这个规律的正确性。

读《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下）

一、

我们读这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时候，会看到里面有一节：人民共和国。

这里提到了人民，以前苏维埃时期却不是那么提的，最早的提法叫工农兵政府，后来的提法是参考苏联，叫苏维埃政府，也就是我们说的苏区。

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这个政府里包含的群众阶级是哪些？

工农兵政府、乃至后来的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只包含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

那么这篇文章既然讨论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团结的对象，那么你的政府包含的阶级就不同了，至少应该加入民族资产阶级。

这是一点。

实际上，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还把范围扩大了一点，就是说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抗日的民族分子，都是人民中的一员，所以我们要把工农兵政府、苏维埃政府，改一下名称，也改一下成分。

即一切愿意参与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阵营里的人，都可以算作人民的一份子。即使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只要你抗日，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

那么改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很大。

如果说以前我们工人同民族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那么现在就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因为只要他反日，抗日，那他就是人民的一份子，那么我们内部还存在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那就要用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去对待。

这样的改动，带来的一系列的政策就会发生变化。

比如以前打土豪、分田地，就变成了减租减息、不没收任何抗日资产阶级的财产，相反，还要鼓励他们、保护他们的发展。

当然，这也是有原则的，因为毕竟抗日中间力量是工农阶级，所以改动不能触及工农利益的底线，只能说作出一定的妥协、让步，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鼓励民族资本家。

我们上期说变化，这就是因为矛盾变化之后，引起的一系列的各种变化。

二、

我们再补充一点：此文中说到了当时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怎么理解这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

含义只有一个，就是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任务，当时的任务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主独立的革命性质，所以我们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大家只需要记住一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而我们也听到过民主主义革命也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也只有一点：依靠的动力和领导力量不同。

旧时代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依靠资产阶级，由国民党领导的。

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依靠无产阶级，由共产党领导的，这就是区别。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最后，还讲到一点——国际援助。

这一点此文并没有展开说太多，但是此刻实际上我们可以初步看到，在毛泽东看来，这次战争是异常持久的，同时，也不是孤立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而是在不远的将来，会把全世界很多国家卷进来，而跟我们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苏联，

我们得到援助的国家也是苏联。

这场战争将来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成为世界战争的一部分，这一点应该说是很有预见性了。

好了，这篇文章我们就解读完了。

下一篇，我们要读一篇长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十二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篇经典长文，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解读一下，此文大家一定要对照原文来读，因为它是一篇通过解释“中国革命战争”来阐述“战略”二字精髓和含义的一篇文章。

以往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场景中提到“战略”二字，很多人会认为战略离我们普通人好像比较遥远，应用场景比较少，其实不然，我们对自己的个人规划，对事业的规划，对家庭的规划等等，都和战略二字密切相关。

应该说，战略二字不应该是某个阶级的专有名词，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对“战略”二字意义的思考，来指导和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生活里的烦恼和问题，甚至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还是一样，我们先聊一聊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

此文写于 1936 年 12 月，从这个时间上就可以看出来，红军已经完成了长征中的三大主力会师，三大主力会师意味着哪些信息？

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过包括遵义会议，以及遵义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转变了我们的军事路线，换句话说，此时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对的，而此前从苏联那里搬过来的军事路线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开始着手调整和确定我们新的政治路线，因为此前在遵义会议上，实际上并没有合适的条件去纠正政治路线上的问题，而政治和军事又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政治路线问题，纠正起来远远比军事问题难得多，因此首先把军事路线问题作一个总结和阐述，会大大的有利于纠正政治路线的问题。

而此时陕北红军大学开学，刚好有这个机会，那就正好把这个军事路线问题作一个总结，给学校的学生们学习和理解。

因此，就有了这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它除了要把自红军创立以来的所有红军战略战术作一个总结之外，另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辅助纠正政治路线。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历史背景。

二、

此文开篇就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义，就单独摘抄出来解读一下吧。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三段话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背后有这样一个理论依据：研究任何事物都有一

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

我们知道，理论的诞生和应用过程，其实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

这三段话侧重的是后半句，也就是说，任何革命战争的规律，都需要根据具体事物的具体情况去研究和运用。

战争的规律固然重要，但是革命战争又是战争的一种特殊情形，而中国革命战争，又是革命战争中的一种特殊情形。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战争的规律，而且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还要研究我们所处的具体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这段话阐述的意思，可以运用到任何行业，认识事物，因为它就是一种客观规律。

用《毛选》中的另外一句话来说：**理论一定要结合实际**。

这个规律并不难以理解，我们就不作过多阐述，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大家在读《毛选》的过程中，会逐步的发现，里面所有的观点、理论、思想都是统一的，是有内部联系的。

它不会今天提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然后明天又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出现不符合这个观点的其他观点。

比如，它绝不会在说完要“防止单纯军事化观点”之后，突然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出现“军事好了政治自然会好”的观点。

也绝不会在说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之后，又在某一篇文章中看到“打击一切中间派”这样的观点。

所以，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开篇的三段话，它表达的观点，跟后面《实践论》所表达的观点理论是一致的。

比如《毛选》中经常传达出来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际等等，这些观点都是一脉相承。

从这些观点发展出去，就会看到研究在中国搞革命战争，除了要研究战争规律、革命战争规律，还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

我们读到现在，其实已经总结了不少的观点，大家在读原文的时候，也可以去尝试自己总结观点，然后在读新文章的时候，可以不断的把原来的观点同新文章里的很多观点相对照，看看是不是统一的。

比如：《矛盾论》里提到，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同一个阶段有且仅有一个主要矛盾。

那么，你记住这个观点以后，在以后读《毛选》里那些分析当时具体实践中的文章时，你就去看看它是否违背了这个理论，看看它是否一致，看看它具体是如何运用这个观点。

那么，长此以往，我们就能更深刻的理解，并慢慢的学会运用里面的东西了。

这也是我们要系统化，一篇篇去解读《毛选》的一个意义。

有时候啊，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各种各样新奇的观点，有的 APP 专门搞个读书会，输出各种高大上的名词，什么这样思维，那样思维等等。

看上去很新奇，可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常常会互相冲突，其实就是因为不成体系。

在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前，我们讲这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去尝试，就是说只要理解了某个观点，就多去对照原文，看他这个分析是用到的那个观点，那个分析又是用到的那个理论？

这样子比较有助于我们消化。

好了。明天我们继续解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二）

一，

上一节我们讲了，研究事物规律有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缺了这样一个过程，就有演变成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险。

那么今天这节我们聊一聊“战略”。

文章就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如果不讲一下什么是战略，那么就很难全篇理解这篇毛选文了。

我们先看一下，《毛选》中这篇文章是如何解释战略问题的：

原文如下：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

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那么来看是比较清楚的了，战略指的就是一种从全局出发制定的策略、规划等，我们就可以称为战略。

一般来说，我们从这一段原文中，知道战略指的是一种带有全局性的东西，可以是规划、策略、计划、思考等等，总之是研究事物全局性规律的一门学问，了解到这个地方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对“战略”二字了解的更深刻，要能逐步的培养出我们的战略眼光和战略规划能力，我们更需要注意原文中这句话：“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有的。

它讲到了《矛盾论》中的一个基本理论，也就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联系”和“运动”的观点。

原文说，照顾各方面，其实就需要一个“联系”的观点，只有看到了一事物与周围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我们才谈得上说是照顾到了各方面。

同时，要有“运动”的观点，也就是说看到了一个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阶段之间的变化，衍变趋势，我们才谈得上说是照顾各阶段的性质。

所以什么是全局观？什么是战略观？

其实就是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然后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各种联系，以及每一件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就形成了我们的战略眼光。

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在练习我们的战略眼光、培养我们的战略意识的时候，就会有目标，有方法。

当你学会看待一切事物，都首先去观察这件事物与周围可能发生关系的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件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长此以往，战略意识、战略眼光也就逐步发展起来了。

我们上一篇说，战略不是某个阶级的专有名词，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去学习和理解，《毛选》说，一个世界可以有全局，一个国家、地区、战场都存在它们的全局。

同理，一个家庭，一个项目等等都有属于它的全局。

这样又回到了我们以前不断提到过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事物要尽可能全面，这个全面就包含了一事物与周围事物，以及这件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历史渊源。

这就是战略，以及战略的练习方法，它复杂吗？不复杂的。

但是要不断的看得准，看得好，看的全面，那就需要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实践，我们看到，其实又回到了《毛选》实践论中的原理去了。

所以，上一篇文章，我说《毛选》里面的思想、理论是相通的，常常可以拿来互相印证、互相解释现实问题。

大家可以多用里面的观点互相印证，看到一个观点也可以拿到现实中去不断印证，这样学习效果是比较好的。

二，

针对上面说的联系和运动的观点，我们这几天正好更新完四渡赤水，就用四渡赤水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

比如今天我们更新的四渡赤水中，讲到鸭溪计划，这个计划里，首先就要分析我们与各路围剿军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联系。

与黔军之前，因为他们已经处于被打残的状态，所以在考虑他们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太大的攻击性。

而川军郭勋祺部，因为他们的目的主要是阻止红军进入四川，只要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作战，那么就不会那么积极。

而湘军更不会跨过乌江，放弃防守进入湖南的封锁线而进入遵义，所以他们也不再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基于这几种相互之间的联系的判断，就得出了可以集中一、三、五军团打击周浑元部的计划。

这是联系的观点。

可是，这时候战场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周浑元不肯孤军冒进了，所有围剿部队全局采取逐步推进，碉堡合围的战略。

那么从运动的角度去看，这种碉堡推进战略如果发展下去会如何衍变呢？

必然演变成逐渐把红军压缩到一个狭小的空间，最后凭借优势兵力将红军歼灭。

由着这种运动的方向发展下去，如果我们不采取应变措施，那么就有灭亡的危险。

这时候，实际上我们就用到了运动的观点，去分析事物发展到不同阶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分析出来以后，我们就采取对应的措施，于是就有了三渡赤水，将敌人调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在敌人的运动之中，我们找到缝隙进行穿插，从而躲开敌人的四面合围战略。

而在三渡赤水中，这种战略的分析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比如，我们大张旗鼓的渡过赤水河，这件事会引起敌人哪些变化？
我们派出一个团佯攻古蔺，这件事又会引起敌人哪些变化？
我们让这个佯攻的团带上电台，频繁发射信号，又会引起敌人哪些变化？

这三件事的发生，用运动的眼光去推测一下就可以预料到，有极大的可能将敌人调动到古蔺一带，从而使得我主力军可以四渡赤水甩开敌人。

这里面实际上处处用到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当我们用这两种观点去看待事物时，其实就是用全局的观点去看事物，这种眼光就是我们说的战略眼光。

三，

复杂事物涉及的元素是很多的，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分析开始练习。

有多简单的呢？

只需要在作每一个决定、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思考每一个决策的时候，问自己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决策、这句话、这件事如果做了，会对周围的哪些人、哪些事，产生哪些影响？

第二，这个决策、这句话、这件事如果做了，会对自己的未来哪些方面产生哪些影响？

当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都简单的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那么你就能逐渐培养出来自己的战略眼光了。

当你思考越多，联系越多，那么在你想要达到某个目的时候，就会去考虑各事物之间的可能性，各种阶段的可能性，从而帮你作出合理的规划。

这既是战略，它没那么高不可攀，却又没那么容易掌握好。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了，人要活得那么累吗？做什么事都要考虑那么多，还有什么乐趣呢？

这个问题，用最近长征中出现的一段话来讲：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天下的事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这样偏一下子办不到，等转一圈回来事情恰又办成了。”

很多事就是这样的，为了少思考而多思考，为了少烦恼而多烦恼，为了少经历曲折，而提前多经历曲折等等皆是如此。

如果觉得累，那么也是这个道理，为了活得不那么累，就得先活得累一些，不还是同样的道理吗？

考虑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看事物更频繁一些，不是说的要斤斤计较、事必躬亲，而是一种养成的看待事物、分析事物的习惯和方法。

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三）

一、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说“战略眼光”，其实就是学会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待事物。

然而仅仅如此还不够，还得学会观察在全局之中，带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部分。

原文中所说：

“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致前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所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性的东西。”

任何一个战略规划中的某个阶段，一定有一个决定性的一部分，比如四渡赤水后，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招，就是把滇军调出来。

前三次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招，就是把敌人的一路或几路诱入根据地内部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如果放到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具体事物中，比如写一个公众号吧，第一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招，通常就是定位。

定位就包含了在以后运营过程中，你的读者是谁？你产出的内容是哪个领域？你
的内容来源在哪？等等问题，其实都由最开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招——定位，
决定了。

假如一个公众号发展到一定阶段，你是否能持续产出，是否能找到赢利点，是否
能输出对读者有价值的内容，往往成为不同的号面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

它不是抽象的，而是根据具体不同的事物情况，阶段去看待和分析的。

我们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往往也是如此，绝大部分的精力都要尽可能的放在具有
战略意义的要点之上，这样才能以有限的精力处理无限的事物关系。

二、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
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段话也是原文，我们对照一下生活里的实践经验，会发现这段话非常之正确。

那么，如何掌握事物的规律，还是如《毛选》所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那么，又如何学习呢？

“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
自己的行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我们之前在《实践论》解读里说过，一件事要成功，必须使自己的主观思想同外
界的客观规律相合，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学习任何事物，本质都是要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也就是实现你的主观认识同客观规律一致。

“在战争中，指挥员需要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查手段，将侦查得来的敌方情况和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把这个原则用到我们实际生活里，在我们对一件事，或者对我们自己作出一个战略计划时，同样需要将我们要做的事，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以及人生规划等，对事物以及我们自己作足够充分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处理，才能得出合理的，能执行的战略规划。

没有足够的信息支撑，对信息又没有经过处理、分析，是不足以作出好的计划的。

所以，什么是善于学习？首先你学习的目标就要放在事物的客观规律上面，客观规律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不是表面的、堆砌起来的东西。

我们说的，对信息的分析处理，也就是《毛选》说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过程，就是设法通过足够的信息，找出事物内部联系的过程，只要找出来内部联系，那么我们就掌握了规律了。

而学习的过程，不仅在计划开始之前，也在计划开始的过程之中。

因为这个世界上实际是没有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主观认识的，这是由事物的特殊性决定的。

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主观认识同客观规律不符合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不断的根据新出现的情况，根据获取的新的认识，去不断修正之前的计划，甚至是全盘否定之前的计划，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为什么说，不要搞机会主义，不要不留退路，不要搞冒险主义，不要孤注一掷，不要赌徒心态？

就是因为主观符合客观的时候是很少的，尤其是你自己都没有完全把握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就已经宣告了主观思想同客观规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了。

这个时候，你还要孤注一掷，那么多半就会面临惨痛的失败。

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

很多时候，不是等你学好了再去用，而是在实践和使用中去不断的学习。

我们读《毛选》也是这样，不是说得把四卷《毛选》，甚至后三卷也学透了，你再去用，这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学得透。

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从毛选中提炼出观点，然后把这个观点用于同我们生活实践去对照，看看哪些用得着，哪些用不着。

然后当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的时候，又尝试着去书里找答案，不一定《毛选》，而是很多原则、理论方面的书籍，如果能找到答案，那么又要重新把这些答案放到实践中去检验。

平时看书也是这样，看到一个理论、一个观点、一种思想，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要把它拿去对照现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书是没有局限或者缺陷的，因为时代在发展，事物在运动，原先的东西放到今天也会有变化，放到不同的个体上也会有变化。

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照现实的时候，也来一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过程。

客观规律、客观条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不同人的主观思考能力，主观能动性不同，因而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人干出来的效果往往差别很大。

人不能脱离客观条件办事，但是相同的客观条件，却可以导演出完全不同的剧目来。

四、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第三章，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值得大家细细研读一番。

因为我们平时所指的战略战术，其根本上来说是由事物的特点衍生出来的，所以不同的事物需要搭配自己的战略战术，不能生搬硬套。

比如你要开一个店，准备为这个店的发展制定一套战略计划，那么首先应该搞清楚的就是这个店的定位、选址、单品种类、包括老板实力、货源等等。

只有在这些特点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它发展的战略计划。

《毛选》中也是如此，要制定出红军的革命战略计划，就首先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只有把特点找准了，那么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战略计划。

因此我们看到原文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

即第一，中国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

第二，是敌人的强大。

第三，是红军的弱小

第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原文对这四个特点进行了分析，然后在这四个特点之上，才来分析由这四个特点规定的我们的战略战术。

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整体上我们有胜利的可能，但是第二个、第三个特点，又规定了战略上的持久和困难。

明白了这样的基本特点，就衍生出下一系列战略战术：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以上这些在军事中出现的战略战术，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很多的应用场景，下一篇章，我们就把它们做一个具体的讲解。

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四）

一、

整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到了第五章战略防御部分就结束了，但是实际上在写的最初，还准备要写“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其他问题”三部分，结果因为写完“战略防御”之后，就随即爆发了西安事变，也是就搁笔了，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部分，也就是到战略防御就终止了，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这篇文章，我们就解读一下最后的一部分——战略防御。

这一部分分为九个小节，分别是：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第一节：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因为之前所说，敌人强大，红军弱小的特点，就导致红军的作战常年的都是与白军发生的“围剿”与“反围剿”的作战。

为了保存力量，应该说在十年围剿之中，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处于防御状态，在防御中找寻进攻的机会，从而打破围剿。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问题不仅是在军事上，在所有人身上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即原文所说：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感触颇深吧，我们自己也会经常发生这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困难，一种是为困难所吓倒。

革命时期有这种情况，就是突然看到哪里取得了一个胜利，一时的环境很顺，或者有严重的环境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

在轻视敌人的情况下，就会发起冒险进攻，甚至发起毫无胜算的进攻计划，结果造成极大的失败和损失。

红军时期李立三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就是很好的例子。

而在遇到了极大的挫折以后啊，又开始十分的畏惧敌人，啥也不敢干，也不敢进攻，也不敢打仗，不敢诱敌深入，又不敢放手打出去。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第五次反围剿节节抵制、处处设防、逃跑主义等现象，结果又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这一切归咎于什么呢？

根本原因我们之前已经反复说过，即：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不相符。

也就是说，不仅对敌人的实际力量、进攻方法、弱点等等不了解，就连对自己的实力、战法、优点、劣势也不了解。

主观上认为的双方力量对比，战略战术方法等，与客观实际的力量对比，战略战术方法差距越大，失败就越大。

由此，也就出现了我们说的，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不符，那么就要失败。

所以啊，少说一些“我觉得”，多说一些“事实是什么”。除非你的“我觉得”是在阐述客观事实。

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即主观思考永远与客观事实不符这样一个矛盾。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联系一下之前读过的《反对本本主义》那篇文章，有这样一段话。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

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反对本本主义》

这里所说的一个方法，是去调查。

因为你要解决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不符的矛盾，根本上就是需要尽可能的把客观事实调查清楚。

如果放到今天，放到不同行业中，那就是学习也好，实践也好，试错也好，向同行业请教也好，尝试也好，你根本目的就是一个，要尽肯能的搞清楚你要做的这件事的方方面面，搞清楚它的实际情况，这样子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只有解决了这个矛盾，我们才不会或是少出现，过于高估自己、低估困难，或者过于低估自己，高估困难的局面。

所以，大家搞清楚了这个基本矛盾，即主观思想同客观实际始终不能完全相符，只能尽可能相符的矛盾。

那么其他所有的问题就围绕着这个根本问题衍生出来了。

因此，我们就知道悲观的时候，喝鸡汤是没用的，鼓励也只能缓解一下情绪，要解决根本问题，就得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和我们自己的方方面面尽可能搞清楚，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目标，看到符合自己的希望，避免悲观失望。

同理，当自己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要尽可能搞清楚实际情况里到底有没有困难了？还有哪些没解决的问题？如果哪些方面搞不好，那么会带来什么样严重后果？

而这一切，都要避免纯主观的揣测、没有依据的瞎说，而应该是多调查、多学习、多实践。

第二节：反围剿的准备

《毛选》里经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

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争议，稍微有点生活常识都知道，做一件事情应该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这个难点主要在于，何时准备？准备到什么程度？

准备早了，不免有些浪费精力；准备晚了，可能又会遭遇措手不及。

我们的原则是：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利于不败之地。

也就是说，尽可能在嗅到危险，甚至预测到可能会有某种危险的可能性的时候，就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了。

“晴天修屋顶”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大家读的时候，还会看到这样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哈。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

最后一句话，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前公众号提到过的“shu fan”

这里面也就是一笔带过了，但是如果我们清楚的知道那段历史，就会明白，仅仅是这样一个准备工作，期间又充满了太多的辛酸与痛苦，同样走过了太多的弯路了。

这一节末尾说到：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一段读来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清楚这个度啊，是非常难以掌握的，因为这件事损失的革命力量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有时候知道理论是非常单薄的，实践、只有大量的理论结合实践，才能真的掌握好关于“度”的问题。

当时的苏区说实话，不缺理论素养非常好的人，可是就是在实践中，他们就频频犯错，一部分当然也是路线问题。

但是有很多，也就是度的问题没有掌握好。

而关于这个“度”的问题，毫无疑问，只有实践能解决。

今天暂时读到这里，明天我们把后面几节一并读完。

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五）

第三节，战略退却

1，为什么有时候必须退却？

在强大的困难面前，在自身实力非常弱小而不足以应对当下的客观环境中的困难、压力的时候，选择战略退却，是战略上的一个必要步骤。

这一点，我想每个人都很清楚，那种只讲进攻，只讲克服困难，只讲发扬斗争精神就可以战胜一切的主观唯心思想是要不得的。

历史上因为这种过分的强调了主观能动性，而忽略了客观实际的悲剧其实是很多的。

战略退却和逃跑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主动权的掌握，战略退却非但不是丧失主动权，反而是在强大的困难面前为了争取主动权的一种战略手段。

什么时候该退？就是当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之中，主动权已经不断丧失，甚至完全丧失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选择战略退却。

而战略退却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重新夺回主动权。

举个今天非常普遍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学毕业以后是否要留在大城市，或者说是否要留在北上广深？是否要留在一线城市？

回小县城，或者考县城公务员，或者考乡镇公务员，或者去小城里当老师？

这些选择啊，其实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着很多刚毕业几年以内的大学生。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过很多答案，有的说选择留在大城市的各种好处，有的说其实在小县城、小乡镇上也挺好。

说来说去，最后大家可能也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好吧，这句话是对的吗？我个人觉得是对的。

但是这句话背后是什么含义？很多人都没有搞清楚。

什么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答案是：能够掌握命运的主动权，那么就可以说得上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是不是这样，不管是大城市也好，小县城也好，如果你感觉自己过得很幸福，那么一定是因为你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可控的。

你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结婚、怎样花你的工资，怎样规划自己的未来等等，这些东西只要是可控的，那么你就会感觉到幸福。

反之，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是失去了控制能力的，比如你在这个城市，想要买房，却遥遥无期；想要加薪，却时刻面临这被炒鱿鱼的风险；想要结婚，可是却总感觉无法创造结婚的条件，你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你没有主动权，甚至只能随波逐流的时候，那么你是会感到巨大的痛苦的。

所以，是否留在大城市，还是选择回小县城，这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你如何通过战略上的一些步骤，去掌握自己生命的主动权。

战略进攻也好，战略退却也好，都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为了掌握主动权。

如果我们说得再大一些，中国近代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主义者手里夺回主动权的一部历史。

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能自己做主，自己决定，自己发展。

我们欢迎一切帮助、合作、互相支援等等，但是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

而这个独立自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就是掌握主动权嘛。

二、

那么，为什么说战略退却有时候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夺回主动权呢？

在军事上，战略退却是为了保存实力，以待将来转入反攻，退却的目标是为了取得以下几个条件，而每一个条件都是为了夺取主动权，转入反攻。

我们先看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是怎么说的：

在战略退却中，须取得诸种条件中，至少两种以上，才算得上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

这些条件是：

- 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 2，有利作战的阵地；
- 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 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 5，使敌人疲劳沮丧；
- 6，是敌人发生过失。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更深刻的看出来，战略退却和逃跑主义的不同，战略退却的每一步是有目标和计划的。

你的撤退是为了什么？为了创造哪些条件？哪怕是为了保存实力也行。

总之，你每一步撤退是要实现某个目的的，不是说单纯的撤退，否则就变成了逃

跑主义。

以上六个条件我们都可以看出来，都是为了在撤退中实现这样的条件，从而为转入战略反攻作准备。

而从战略退却到战略反攻，就是主动权逐步拿回手里的过程。

我们分析一下这几个条件吧。

像前三个条件，人民、地形、集中兵力，都是前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可以通过战略退却实现的条件。

那时候也叫“诱敌深入”，不管怎么叫，撤退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反攻。

可是，前两次反围剿，敌人来的力量很多是地方军阀的杂牌军，所以战斗力有限，因此啊前三个条件掌握好，基本就能打胜仗。

而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就是说强大到，即使你配合根据地人民、即使你找到有利阵地，即使你红军主力集中，但是因为敌人实在太强，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仍然不足以打破围剿。

那么就要继续战略退却，实现后面三个条件，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历史上，由罗炳辉率一支队伍声东击西，佯攻诱敌的操作。

也出现了不断的同敌人玩游击战术，把敌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现象，在拖的过程中，善于寻找敌人犯错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创造出局部的我军强于敌军的状况，这样就可以转入反攻，赢取胜利了。

也就是说，通过战略退却实现这些条件，从而在局部战役中，创造出来我军强于敌军的情况，从而通过歼灭战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这种在战役上不断创造局部优势，从而最后实现战略翻盘的操作，后来在《论持久战》中更是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

三、

但是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摸透了我军的战略战术，于是开始利用其强大的政治、军事资源，采取了碉堡战术。

就是说，人家再也不孤军冒进，再也不给你创造歼灭一路或几路的机会，通过不断的合围最后困死你。

这个时候，对于我军来讲，就出现了变化，敌人开始转变战略战术，我们红军以往的那一套被破解了。

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你不是搞碉堡战术吗？不好意思，我们不陪你玩，我们跳碉堡圈，放弃根据地去跟你打运动战。

这样一来，你的碉堡就失去了意义，我又可以通过发挥我以往的优势来打击里，从而打破围剿了。

可是这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就需要下定决心，放弃根据地。

这个决心是不好下的，为什么呢？

《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

一方面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躁病；

另外一方面来自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

这两句话在苏区的表现就是，在上层普遍认为这是国与国的战争，不能丢掉根据

地，必须想办法把敌人打出去。

在群众百姓那里，就表现为不愿意打破坛坛罐罐，不愿意搬迁，不愿意跑到山里，希望红军保卫家园，保卫根据地。

百姓受眼界的局限和制约，因此有这种想法。

而主观主义的领导者，因为对敌我双方各方面估计不足，因此迎合了群众的想法，没有战略意识，于是出现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双拳打敌人，短处突击等等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打法，不愿意跳出敌人堡垒线外作战，最后走向失败。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战略是全局，是全局，必须要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问题，保证视野的全面而不是局部，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用《毛选》原文来讲：

“他们看问题仅从一个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意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

这就是战略上的近视眼。

四，

战略退却当然也是有困难的。

军事上，在领导人没有足够的威望的时候，号召大家放弃根据地，号召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入根据地来打，这些都是难以说服群众，甚至难以说服部分官兵的。

人民因为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因此退却起来也很困难。

个人规划里面，有时候战略退却也会被人不理解，也会遭受各种困难，这是必然

的。

而破解的唯一方法，没有其他的取巧术，就是要更加的了解实际情况，尊重客观规律，只要你自己心里有底的，总是会想到办法的。

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六）

一、

战略反攻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于战略反攻，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为三点：

第一点，首战问题。

第二点，照顾全战役计划。

第三点，照顾下一阶段的战略。

第一，首战问题。

《毛选》中多次出现对于首战问题的观点。

首战的原则：

可能很多人看影视剧的时候都听过，叫：“首战必胜”。

所谓“首战必胜”指的就是在你开始一个战役计划的时候，对于第一仗需要尽最大可能打胜。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不打无准备之仗，宁可准备的充分一些，甚至浪费一些资源，都要力求首战的胜利。

首战胜利的好处自然是非常多的，首先是胜利能使你牢牢把握着主动权，反之，如果首战不利，则往往立刻处于被动。

土城战役就是典型的例子，土城一战失败，后面一系列的北渡长江计划全部打乱，主动权立刻失去，直到二渡赤水之后，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比如攻克天险娄山关中的损失）之后，方才重新拿回主动权。

其次，首战的胜利不仅仅只是鼓舞士气，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增加勇气和自信，更重要的在于首战的胜利往往说明你的整个战役计划是符合实际的。

否则，一旦首战失利，往往也意味着你的整个战役计划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甚至需要推到重来。

以上两点对于做项目，做计划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放到两军之中，当然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打击敌人的气势，增加对方的失败因素。

要做到首战胜利，有两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自然就是做最充分的战前准备。

第二个，是切忌急躁冒进。

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具体的某个计划之中的首战胜利，不是说你选择进入一个行业，选择做某种探索的时候，也要啥都准备好了再去干。

所谓的具体战役计划，指的是做这件事需要哪些条件你是很清楚的，那么你就要尽最大可能把所有条件都准备好，力求胜利。

而现实中，往往也经常存在很多探索性的东西，那时候我们还不清楚做这件事需要哪些条件，所以更谈不上什么准备了。

这个时候，往往就反过来，要求先干起来再去研究需要哪些条件，然后再想办法创造条件。

这种时候，我们一般用到的原则就是：做最坏的打算。

也就是提前想好，尝试和摸索完全失败，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个后果必须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否则这个事情最好不要尝试。

比如你要创业，但是对于要做的这个领域又不是完全了解，那么你在探索的时候，就必须提前想好失败了怎么办？而不是只想着成功了会怎样。

第二，照顾全战役计划。

首战之后，余下几步打法必须提前想好。

“打第一仗之前，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致最后一仗大体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打胜了，敌军全局会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绝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全局，仔细切实的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里其实讲的就是如何制定出一个好的战役计划，其中除了首战之外，对于首战之后的每一步的变化，都要考虑进去，讲的是一个战役的全局问题。

第三，照顾下一战略阶段。

每个战役本身是一个全局，有它自己的战略步骤。但是再从一个更高维、更长远的阶段去看，它同时又是一个长期战略计划中的一个局部。

因此，战略指导者处于一个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该是计算到下一个阶段。

以上，是关于战略反攻部分的内容。

其实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发展。

在一个战役全局中，各因素之间有哪些联系，而每一个局部在每个阶段，会朝着哪些可能的方向变化？

我们看的越详细，越远，越清晰，那么制定的战役计划和战略计划就会更符合客观实际。

二、

集中兵力问题

其实，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即使不常读《毛选》，很多人也知道。

从物理常识来讲，人人都清楚，三个打一个胜利更快一些，更有把握一些。

因此，从原则上讲，我们要尽可能的创造出这种局面，也就是在局部上不断的创造出以多胜少的情况。

当然，集中优势兵力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毛选》此文例举的：

侦查信息，确定对方到底谁最弱；

说服群众，配合战役计划的调动，实现诱敌深入；

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根据地，把兵力集中到一处；

有游击战争负责骚扰敌人余部，支撑主力红军歼敌；

负责钳制其余各路军队的部队，要能完成钳制的任务。

所以说，集中优势兵力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心里还是要有这个原则，与其把精力分散到四处，结果往往处处捉襟见肘，处置不当。还不如把精力集中到一处，各个击破。

集中到什么程度呢？以往战争中，是尽可能三倍到五倍于敌人的兵力，至少也要

两倍以上，因为我方武器比较弱嘛。

其实原则就是，集中到有足够的把握打败对方。

我们集中精力也往往是这样，集中到足够战胜这个困难。

现实中，我们也一样会遇到各种困难，使得人的精力难于集中到一处。

其中根本原因，在于难于取舍，不知道该放弃什么，该攻破哪里？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判断清楚主要矛盾是什么，你看，又回到《矛盾论》的原则去了。

所以，我们经常都会遇到关于取舍的问题，就像第五次反围剿，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舍弃根据地，最后只有毛泽东选择暂时舍弃，其他所有人选择不舍，因此结果是换来了全部完全的丢失根据地，换来了一个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舍弃是一门艺术，我们生活里不断的学习和体验吧，这个谁都没法代劳了。

三，

根据特点选择战略战术

再讲一下最后一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到了最后几点，就是关于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的问题。

其实如果扩展一下，还有内线作战，外线作战；战略持久，战役速决等等问题。

原文大家可以去读一读，本身并不难以理解，后面《论持久战》还会提到。

这里面真正比较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所有的战术方法，不是谁凭空发明的。

如果说凭空发明，为什么偏偏蒋介石军队里一个也发明不出来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根据自己军队的特点，去创造出匹配自己特点的战略战术方法。

为什么红军要打运动战，因为太弱小，只能依靠地形、人民、以及自身的灵活去同敌人周旋。

井冈山时期一开始叫打圈子，后来发展成游击战十六字要诀，最后发展出运动战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等等。

这些都是根据红军自身弱小，在面对围剿之时，必须用流动游击，运动中歼敌的方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否则就只有失败。

为什么要打歼灭战，因为红军常年居于农村，没有军工工业，又没有帝国主义军事支援，所以他不打歼灭战，就解决不了枪支弹药的来源问题。

同时不打歼灭战，又解决不了敌我力量对比的问题，因此他们往往要求每战力求歼灭，有所缴获，否则红军就无法发展。

这些战法后来又有了很多变化，尤其是解放后期，因为特点发生了变化，因此战法也加入了阵地战，攻坚战，这都是根据当时的特点制定的。

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值得注意，任何的具体的方法，都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匹配使用。

再高明的方法，如果不适合自己的特点，用起来往往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副作用。

而哪怕是看上去再简单，再普通的方法，只要是符合自己的特点，就是好方法。

这就好像，郭靖要练降龙十八掌，黄蓉要练逍遥游那种花式繁多的武功是一个道理。

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自己办事的方法；根据事物的特点，去找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是我们需要不断去掌握的一个技能。

好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就读到这里吧。

这两天身体略有不适，更新慢了些，后面会把速度提一下，谢谢大家支持。

解读的文章，配合原文一起读，感受会更深刻。

第十三篇，《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读《关于蒋介石的声明的声明》

一、

历史背景：

这是一篇公关稿，是在西安事变后，针对蒋介石发表的一篇名为《对张杨的训词》一文作出的回应。

我们借这篇文章简单聊一下西安事变。

应该说只把西安事变单独拎出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共产党这边都完全没有想到，张学良和杨虎城居然能整出这一次事变来。

这次事变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应该说它是蒋介石开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转折点，尽管这种转折是蒋介石迫于无奈之下的一个选择。

但是读《毛选》那么长时间，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会是孤立的，也不是静止的，它的发生必然可以往回找到原因。

同时任何一件事物的发展，必定同时包含着偶然性因素和必然性因素，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用这个观点去看，西安事变就同时包含着两个部分的因素，也就是说有偶然性的成分在里面，也有必然性的成分在里面。

偶然性指的是张学良、杨虎城所采取的“逼蒋抗日”的形式、时间、方法带有偶然性，说它偶然是因为这几乎可以说连张学良本人之前都没有想过蒋介石会来西安，甚至可以说他都没有预谋过要用兵谏的形式。

而必然性指的是，“逼蒋抗日”已经成为了当时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同共产党三者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和理念，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西安事变，他们也会采取一切措施，实行逼蒋抗日的政策。

而这背后必然性的原因，有很多个，比如此文《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提到的几个原因：

- 1，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
- 2，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高涨；
- 3，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
- 4，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
- 5，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 6，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

这几句话听上去似乎有些官腔，那是因为这些话不仅是写给蒋介石看的，也是写给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看的，所以要大大的呼吁抗日。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去看，就会明白，真正原因就是我们之前所读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分析的那样，当整个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各阶级的情况都会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必然从政治、军事上体现出来，而具体到各路军阀之中，就变成了张学良、杨虎城对于继续同红军打仗的极度反感，以及他们所预感到继续执行“剿灭红军”计划，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们的生存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和挑战。

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学良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和共产党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秘密关系，双方心照不宣。

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蒋介石最终走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蕴含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里面。

客观的环境，连同各方主观的努力，最后促成了逼蒋抗日，促成了民族统一战线。

二、

而这封《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就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回南京的途中，发表了一个《对张杨的训词》，毛泽东对蒋介石这个声明作出的一个回应。

此文同样符合《毛选》一贯采用的辩证法，一方面揭露了蒋介石那个声明中含糊其辞、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既然同意抗日，同意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又说促成这个统一战线的张、杨等人是反动派？

另一方面呢？又极力的提醒蒋介石，不要忘了你说过的话，不要忘了你承诺的抗日政策，不要忘了停止内战，不要忘了释放爱国分子、还人民民主自由等等。

总之，就是提醒你，不要忘了自己承认的抗日主张，否则你就在全国人民面前失去了信誉。

而我们，在这次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也是出了力的，说明我们的抗日立场、抗日态度是坚定的，为了抗日，是愿意放弃一切内战，支持一切和平相处的。

所以，谁违背了和平的原则，再妄想发动内战，谁就是违背抗日原则的卖国分子。

而且，此文还不忘记提醒蒋介石，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了停止内战之外，还需要干些什么？

-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
- 3，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
- 4，召集号召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
-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其实把这些具体方式写出来，用意很明显，就是杜绝你蒋介石空喊口号的幻想，你既然统一联合抗日，那么这些应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作为抗日民主力量，有义务提醒你这几个基本要求。

一方面督促你那么去做，另一方面绝了你发动内战的念头，从舆论上在来一把逼蒋抗日的策略。

应该说是一篇很好的公关文了。

三、

大家读一读这篇原文，也可以感受一下写公关文的几个技巧，这篇文章就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文章通俗易懂，毕竟是写给爱国知识分子看的，写给所有民主人士，抗日同仁看的，所以一定要写的尽可能通俗一些。

第二，逻辑非常清晰，你蒋介石既然同意了取消内战，一致抗日，那么就一致抗日的几个基本条件就等于也是同意了的，日后你犯了这里面哪一条，那么你自然就是丢掉信誉，破坏和平了。

第三，考虑十分周全，一面夸蒋介石采取这样的政策是英明的，一面又预防蒋介石将来说话不算话，提前打好预防针。

最后第四点，鲜明的表达我方观点，把我们支持和平、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态度说的很明确。

《关于蒋介石的声明的声明》是一篇比较简短的文章，但是也值得大家花时间读上一读，我们就不说太多了。

第十四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这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写于西安事变之后，卢沟桥事变之前。

发布时间是 1937 年 5 月 3 日，我们如果读了下一篇文章《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就会发现，即使是时间已经来到了 1937 年 5 月这个时间点上，依然还有人会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不是全面的，亡国的，殖民地性质的侵略。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时建立这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困难。

还是一样，我们先简单交代一下历史背景：

我们今天听到“统一战线”四个字，咋听上去，会觉得理论和实践并不复杂，无非是“拉一派、打一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这些思想原则。

这当然没有错了，可是这些原则啊，一旦放入到具体环境之中，要实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会遇到诸多困难，这种困难不仅来源于外部，也来源于内部。

所以，其实从我们之前读那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开始，后面很多文章都围绕着解决同一个问题而写，那就是“民族统一战线”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你要是不去专门研究一下，你都难以想象，原来一个统一战线会遇到那么多的破事。

但是通过后面许多文章，我们对于“统一战线”整个历史过程有了了解以后，能学到的东西还是很有价值的，起码我们能真正的去了解完一条路线从提出，到实现，到运用，到发挥巨大历史意义，到最后重新走向破灭的整个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称为“国共第二次历史合作”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实现的，最后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而彻底宣告破裂和失败。

那么，这一次合作，在有了第一次经验的基础上，在经过了建立根据地、苏区斗争、长征等一系列成长历程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有什么变化呢？为什么这一次又成功了呢？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思考和吸收经验的东西。

而这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我们该干些什么？我们的口号是什么？红军的任务又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

就比如，两个人合作，大家首先就要解决任务、分工、领导权等等问题，否则合作就不能前进一步。

接下来，我们具体解读此文：

一、

矛盾分析

此文开篇，还是在重复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民族统一战线可以建立起来的依据。你做任何一件事情，背后都必须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或现实依据，这一点我想经过之前的很多解读，应该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了，我们就不多解释了。

当时统一战线的这个依据就是全国人民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因为中日之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所发生的阶级矛盾的变化。

这一点我们之前也已经重复说过，因为中日矛盾变成主要矛盾，所以各阶级之间面临的矛盾都会发生变化。

其中就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例子，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失去东北以后，如果说东北军尚能徘徊在西北一带勉强延续生存的话，那么当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以后，那东北军别说重新打回老家了，就连西北这一带是否还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就已经变得玄之又玄了。

这时候，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老蒋再继续让张学良去参与剿共，然后张学良又吃了几个败仗的情况下，他就发现，如果继续按照老蒋这一套搞下去，他们不仅回东北再也无望，就是西北也可能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地。

也就是说，此时的东北军，已经开始面临着生存下去的严重威胁，而执行蒋介石那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最先没有立足之地的就是他张学良的东北军。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西安事变，这背后其实就是当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不同阶级、集团之间所面临的矛盾立刻发生变化。

张学良仅仅只是其中一个集团而已，从 1935 年以来，各文化界、学生界、商界、舆论界等等，都在以各种形式表现出这种矛盾变化。

两广事变，绥远战争，援绥运动等等，都在揭示这种矛盾变化以后发生的种种具体事件。

因此，当通过这种矛盾的分析之后，我们得出了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了要争取和平的口号。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看到了共产党最终选择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八卦，就是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写：“当时我们有很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但是毛泽东说，就算要杀这话也不能我们来说。”言下之意，当时毛泽东似乎也赞成杀掉老蒋。

这里面有几种可能：也许是张国焘信口雌黄的，因为那本回忆录里刻意抹黑的地方很多；也有一种可能是当时情况还不甚明了时，毛泽东也并未确定采取哪种方案合适；甚至还有可能是毛泽东一时搪塞“杀蒋派”的说辞而已。

当然不管真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在对于是否“杀蒋”这个问题上，也必然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最终的结果，共产党是以“争取和平”为出发点，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然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我们下一步在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是什么？其中哪个又是最核心的任务？就成了接下来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了。

二、

毛泽东提出：

“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的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

“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是不行的，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所以，其实此文描述的所谓的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围绕着“争取民主”四个字展开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此文的第二部分：**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需要民主、自由才能更好的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吗？

这个需要争取民主自由，才能保证统一战线的观点，与之相反的另外一种观点是什么？

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回忆一下之前那篇《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文章中，提到的“单纯军事化思想”。

什么意思呢？那时候的“单纯军事化”思想就是，红军只管打仗，打土豪，分浮财就行了，不需要干建设根据地，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活。

而毛泽东认为呢？你如果不干这些活，你红军就无法扩大；打了胜仗就不能巩固；打起仗来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群众也无法享受到红军给他们带来的切实利益，从而支持根据地的建设；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那就是脱离群众的战争，就不是人民战争，最后必然沦为流寇，走向彻底的失败。

这条规律在苏区的发展，历次反围剿，长征之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那么现在呢？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要强调民主？我们要强调自由？换句话说我们要强调人民的利益？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难道不是一个道理吗？

同日本人开展全面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的，长期的，困难的战争，如果我们在对于人民利益的维护上，还不上心，还不想办法，还不发动他们抗日的热情，那光靠国民党军队那点实力，红军那点实力，难道能指望把日本给打出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里面不管当时国民党军队强于红军多少倍，哪怕红军只有 2 万，国民党军有 200 万，加起来 202 万而已嘛，看起来好像国民党军是红军的一百倍，但是你就算把这 202 万全部压上去？那又怎么样呢？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跟一个强大的工业帝国比这种单纯的军事实力，非但幼稚，而且愚蠢。

我们简单对比一下双方在军事上的差异，大家就能直观的感受出来：

侵华战争全面开始的 1937 年，中日两国的主要经济指标是：

工业总产值：日本 60 亿美金，中国 13 亿 6 千万美金。

钢铁产量：日本 580 万吨，中国 4 万吨，+，4 万吨对比 580 万吨。

煤炭产量：日本 5070 万吨，中国 2800 万吨。

铜产量：日本 87000 吨，中国 700 吨。

石油产量：日本 169 万吨，中国 1 万 3 千吨。

而且中国的工业产值，很多指的都是棉纱，纺织，手工业产品等轻工业，少有的重工业，很多都掌握在各个帝国主义的手里，跟中国压根没有半毛钱关系。

唯一能够掣肘日本工业能力的，是岛国本土资源缺乏，特别是棉花，橡胶，铅，锡，锌等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等。

但是中国东北，煤炭，铁，蕴含量极其丰富，却早在九一八之后，被关东军占据。

从工业能力的对比上，就可以感受到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和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之间的巨大差距。

但是工业能力的差距，仍旧只是一方面的差距。

其二，是军事工业生产能力的差距。

1937 年的日本，具备年产各种作战飞机 **1580** 架，大口径火炮 **747** 门，坦克 **330** 辆，军用汽车 **9900** 辆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

至于步枪，机枪，小口径炮等，基本可以管够。

而中国，还记得第一辆解放牌汽车是多少年后的事了吗？

如果说 **1937** 年的中国有军事工业，那也只是李鸿章，张之洞时期，遗留下来的洋务时期的生产能力。

大口径炮，坦克，飞机，汽车，统统要依赖国外进口，虽有少量船舶制造能力，但是主要零部件也同样只能依靠进口。

在海军和空军方面，

日本海军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强于德国、苏联。

全面抗战爆发时，日本海军已经服役的作战舰和辅助舰有：航空母舰 **4** 艘，主力战舰 **9** 艘，重巡洋舰 **12** 艘，轻巡洋舰 **21** 艘，驱逐舰 **102** 艘，潜水艇 **59** 艘，水上机母舰 **2** 艘，布雷舰 **6** 艘，扫雷舰 **12** 艘，以及什么修理舰，特务舰，测量舰等等，总计 **285** 艘。

总排水量达一百一十五万三千吨。

而中国海军，当时各种舰艇加起来 **120** 艘，切都是小舰艇，总排水量 **11** 万吨，连日本的零头的零头都不够。

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光绪二十二年，北洋水师从英国购买的。

可想而知，在海上作战的话，中国遇上日本会遭遇什么样的打击。

在空军方面，日本拥有各种作战飞机 **960** 架，此外还有运输机，训练机，和研究机数百架。

在后来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正面抗战中，这些飞机起到了绝对的领头军的作用，发挥出的威力难以估计。

在少有的几次我军占据优势的战役中，比如台儿庄，万家岭战斗中，原本可以全歼其整个师团，但是都因为日军飞机的掩护，而失去机会。（当然，也有史学家认为万家岭算是全歼了日军 **106** 师团）。

而中国拥有的 **600** 多架飞机中，能参战的仅 **300** 余架，要命的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工业，这些参战飞机，但凡出现一丁点故障，便得不到及时的维修，而彻底失去作战能力。

除了以上差异，在军队组织能力，调动能力上，日本军队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领先的军队了。

所以今天，很多人在争论抗日战争，到底是谁出力多，谁把日本给打出去的，然后就把当时国民党的参战军队数目，共产党的参战军队数目，以及双方的牺牲，打过哪些仗拿出来作对比。

这种对比从一开始就错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脱开这两个视角去看抗日战争，那就是单纯军事化思想的翻版而已。

很多人还说，抗日战争，八路军就只想着发展自己去了。这种说法更显幼稚，请问我不发展自己，不发动群众起来，怎么和日本作斗争呢？怎么把被日本占领的广大的华北、西北地区变成敌后作战区，从而使日本陷入战争泥潭里呢？

如果日本不陷入战争泥潭，不被广大八路军把在中国的 60%以上军力，90%以上的伪军拖在敌后区，那怎么可能打了 8 年之久？要知道，从一开始日本全面进攻，到打到武汉，也才用了一年时间而已。

这里面说这个的意义就是：从红军时代开始，从井冈山时代开始，甚至在往前从三湾改编开始，毛泽东对于战争的定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军队比拼，背后真正要比拼的是人民的力量，要实现的是人民的战争。

脱离了这个视角，就永远看不懂持久战的意义，看不懂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为什么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一路看过来，为什么毛泽东强调要真正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争取和平以后，必须要巩固和平，而巩固和平最核心的是什么？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要给人民利益，切实可见的利益，那么抗战才能得到最广大群众的拥护，持久战才有了胜利的条件，抗日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当然，这时候毛泽东还没写出论持久战，但是人民战争的核心意义，已经是早就形成的了。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他说统一战线，最核心的首先是实现民主和自由了吧？

看上去似乎是没有关联的两件事，但是却恰恰是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没有同人民建立起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关系，那统一战线是不可能巩固的。

放到具体抗战中，就很明显的感受出来了，人民军队在前线打仗，后面家中地主老财正在疯狂收租，压榨家里父老姐妹，抢夺人家女儿做丫鬟和小妾，这还让人民打仗？还打个屁的仗啊？

是吧，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

三、

大家清楚了以上环节，那么再去读原文中第二部分“**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理解起来就深刻许多了。

然后我们再看其中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说为了实现这种民主、自由，我们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作出一些让步。

这种让步有以下几项：

- 1，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名称，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南京政府的**指导**。（你看，**指导**二字用得惟妙惟肖，是“**指导**”，不是“**指挥**”。）
- 2，在特区政府，实行彻底的民主。
- 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
- 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这些大家仔细一看，其实都体现着同样一个原则：有条件的让步。

这个有条件的让步，是一门艺术，我们生活里也需要经常性的用到，大家一定要学会有条件的让步。

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是不能让步的，但是非原则和底线的东西，有时候为了实现一定的合作，获取一定的利益等等，实现一定条件下的让步，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关键的，否则就变成了关门主义和“左派幼稚病”了嘛。

但是同时，触碰到原则和底线的东西，一旦让步，则又造成极大的危险和被动。

这个尺度，大家需要在实际生活中，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去感悟和制定了。

这里面还提到一个问题，后面也会用到，就是说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称号。

这个称号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往我们的政权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或者说无产阶级的政权，但是现在因为要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政权性质就变成了“人民性质”的，而这个人民里面，就从以前的只包含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无产阶级为主体，变成了现在的加入了资产阶级这个阶级。

区别就在这里，以往我们政权中不包含资产阶级，现在应该包括了。

这里我们提到这个，是因为后面《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里，也会大量提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民主体到底是谁，是怎样变化的。

其实在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这样一种认定，或是说提法。

后来到了第五卷的时候，这种说法又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这里提前简单提一下，以后我们还会具体说它。

四、

最后，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的领导责任。

看懂原文这一节，要明白这样一句话，才好理解，这句话是：“你领导你的，我领导我的。”

是不是很熟悉？是的，我们在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时候，刚刚说过，战略中运用到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这里面什么含义呢？既然要合作，那么就存在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谁服从谁的领导？

这个问题，当然是老蒋说，一切要归我们国民党领导，这是合作的基础。

那么我们呢？非原则性问题上，我们尊重这个提法，也就是说承认老蒋是最高领袖。

但是实际呢？我们运用的原则就是：“你领导你的，我领导我的。”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反对两种倾向：第一是关门主义，也就是说完全不服从老蒋，拒绝合作，拒绝一切形式的统一战线。

这种关门主义思想，我们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解读中，提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已经详细说过了，这里不解释了。

另外一种就是作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继续犯陈独秀以前的右倾机会主义。

会有这样一种思想存在，就是这些人哪，只觉得红军目前也就几万兵力，而且还一穷二白，啥都没有，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在领导抗战？自己发挥了多大作用呢？

一旦有了这种思想，那么就陷入右倾机会主义，变成了国民党的附庸，唯人家的话马首是瞻，最后必然要吃大亏。

这种思想是因为没有看到单纯兵力之外的东西，比如土地革命、发动群众的能力、武装群众的能力、宣传群众的能力、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建设农村根据地的能力等等，他们只会作军事力量的对比，只会作财政力量的对比，而不会作政治力量，以及其他综合力量的对比。

因此处处觉得自己不如人家，自己太渺小，太卑微了，于是右倾机会主义由此而来。

所以，要实现这样的民主政策，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最值得警惕的两种倾向。

以上，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解读》

第十五篇，《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读《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篇文章，是为了解答当时的一些关于统一战线的疑问而写的。

在毛泽东作了上篇我们读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以后，当时的党内提出了很多疑惑不解的问题，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回答那些问题而写。

所以此文，其实和上一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种疑问：和平到底能不能实现，两党到底能不能合作？统一战线是我们的
一厢情愿还是客观事实。**

之所以有人提出这种疑问，是因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以后，虽然表示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随后又发生了佐藤外交、苏州审判、压制罢工、杨虎城出洋等事件。

这几个事件大致是这样的：

佐藤外交：即日本开始宣布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同时支持其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且还在侵华这件事上，制造舆论，说是要修复中日关系、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等等无耻之言，以至于大家开始怀疑，日本是不是真的要全面侵华？如果不是，那么之前对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否就有问题？

一旦这个判断有问题，那么后面的统一战线就没有任何基础和意义了，因为它不可能实现。

苏州审判：是原先的著名爱国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被国民党逮捕，可是西安事变以后，国民党依然对爱国人士审判，并宣布他们违反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同时还有压制工人罢工、以及让杨虎城“出国学习”，等等事件。

这些事件发生以后，自然就会有人怀疑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国民党是否有诚意？以及统一战线的基础还能不能存在等问题。

毛泽东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国民党已经转变了，但是又不可能马上、立刻的转变得非常愿意抗日、愿意实行统一战线，所以我们会局部的，时常的看到种种破坏统一战线的事件发生，但是又不能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从而不坚定统一战线。

因为不管表面的东西如何迷惑你，人民想要统一战线，反人民的人就必然会采取各种硬的、软的措施来破坏这种统一战线。

不管是日本，还是国民党亲日分子都是试图破坏团结。

日本侵略中国是既定了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基本矛盾不变，中日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就不会变，那么统一战线就不会变。

只要警惕并针对具体的破坏行为采取措施就可以了，不能因此放弃统一战线。

第二种疑问：强调民主是错误的，应该强调抗日。

这个我们上一篇文章解释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强调民主。

但是这里我们发现，其实当时党内还是有人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居然还能成为一个主要问题被提出来讨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错误真的是循环着、又循环着的犯，不过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形式犯同样的错误罢了。

这里面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只有一个——脱离群众。

从来不把群众看做一个主体，所以考虑问题的时候，永远都局限在单纯军事化，单纯政府化，单纯厂长化，单纯科技化等等。

总之，跟群众是没啥关系的，一群“牛逼的人”采取包办代替的态度和主张，认为所有事都是他们干的，他们完成的，对于群众，只不过把他们看成“交纳粮食、上税出力”的工具人罢了。

到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简直把他们当做社会负担，社会累赘一样去看。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怀念毛主席，这里面单单是对群众的认识和态度上，就能暴露出很多问题。

把这种问题极端到某个程度，比如当时的抗日战争，国民党历来是瞧不起群众，只依赖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阶级的，他们的片面抗战打成什么样子了，是吧，你能指望他们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吗？

最后归根结底靠了谁？还是靠了群众。

这种单纯军事化思想啊，其实有很多的衍生版本，这篇文章中还在怀疑提“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的那些人，就是这种单纯军事化思想的衍生版。

根本就在于，无法把抗日这样伟大的任务，同群众之间的紧密程度结合起来，只看得到国民党军、红军那点力量。

这种思想发展下去，猜都不用猜，就知道会衍生出什么错误，大家想一下，会衍生出什么错误？

很显然吧，只要他眼里只看得到国民党军队，红军军队那点力量，他就必然悲观、右倾，永远看不到希望，轻者摇摆不定，犯陈独秀式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红军彻底沦为国民党军队的尾巴，走上第一次合作的旧路。

重者，投敌卖国，叛变革命也是有的。

比如，提出“强调民主是错误的，应该强调抗日”的人是谁呢？

哈哈，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的张国焘先生。

虽然说，这个人最后投到国民党那里，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压根就没看到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所以遇到危险和挫折，他就很难坚持下来，最终走上一条遗臭万年的道路。

而张国焘这个人，历来就有这种单纯军事化的旧军阀思想，他的一生也没能摆脱这种思想，这确实是他身上最具有悲剧色彩的一面。

他的具体心理、思想问题，将来我们公众号更新到张国焘的时候，会重点分析，这里我们就不过多讲了。

第三种疑问：革命前途问题

这个疑问倒是很有些道理的，能思考出这个问题来的，也都可以得上一声好同志了。

这个问题讲的是，有人怀疑那么搞下去，咱这个革命到底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

对吧，共产党人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使命的，这意味着将来我们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是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信仰的东西，它会大量的，不断的创造出剥削，且无法抑制。

那你现在既然跟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合作，那将来这个革命的前途到底是什么呢？是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呢？

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提出来，应该说是很超前了，也很有意义，它显示了一种顾虑，并且这种顾虑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怎么解决这个疑问呢？

其实这篇文章概括起来，解决这个疑问也就一句话：“什么阶段，就谈什么阶段的任务。”

这就好像一个小学生，问家长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一样？是吧，没这个必要，什么阶段干什么事，往后的固然要考虑，但是眼下还不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集中精力把眼下的事情干好。

眼下的事情是什么？是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主自由，争取民权民生等，用我们的话来说，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而当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任务就只有一个：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小日本。

将来这个前途要不要考虑？要考虑。

它无非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个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

不管是哪个前途，都必须且一定要跨过这个阶段，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小日本。

我们可以声明我们的信仰，声明我们是要为着社会主义奋斗，将来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但是当下还处于打倒帝国主义的阶段，那么我们就认为，一切有利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对的，一切不利于打倒帝国主义的是错的。

至于以后会衍变成什么，我们的回答是：只要先赶跑了日本人，我们才能谈得上是走向什么前途，否则一个前途都不可能的。

当然，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远远超出了当下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发展，简直超出了很多人掌控的范围，只能说历史在某个阶段都呈现出一定的局限吧。

将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将会大量出现，这是我们后面解读的时候，再去讲的了。

四、

干部，团结等问题。

这几个问题，就不是什么专门值得讨论的问题了，而是鼓励大家发扬斗争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伟大的革命事业。

印证了文章的标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第十六篇，《实践论》

解读实践论：

一、为什么会有《实践论》这篇文章？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历史背景是一致的，其目的是从理论上解决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问题。

这两篇文章，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世界观。

《实践论》着眼点在如何看待人类认识真理的过程，由此衍生出认识的方法论，以及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打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考行为方式。

而《矛盾论》，则是从理论上解决正确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简单说，可以那么看待这两篇文章。

《实践论》告诉你，为什么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错的。

而《矛盾论》告诉你，怎样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才是对的。

这两篇文章，放到一起来读，简直就是爽歪歪。

这篇文章，我们就读一读《实践论》。

二、

我们说一件事能不能做成，就看你办这件事的指导思想，是不是符合外界的客观规律，你对一件事物的认识达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你能办成这件事的概率有多大。就算是开个小店都是如此，你对开店的地段选择、人群流量、自己产品质量、竞争优势、管理水平，自己拥有的资源等等，总之关于开店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你的认识在哪个阶段？是全面的还是片面的，是否足够深入？

认识程度越低，那么成功的概率也就越低。

所以，我们对我们所接触的事物的认识，最终形成了我们的思想，然后我们就用这些思想和认识去指导我们的实践。

这样一来，我们从哪里去获取对事物的正确的认识，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教条主义者把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主要地寄托于纯粹的理论上，而经验主义者把认识事物的方法，主要寄托于自己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上。

这两种方法，都容易造成看待事物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旦用于指导工作，就存

在了非常大的风险。

因此，只有从理论上，搞清楚人类认识的来源，发展过程，才能真正意义上，破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

三、 人类认识的过程

由此《实践论》中解读了人类认识的过程。

首先，我们认识任何一件事物，都是从第一个阶段——感性阶段开始的。

即感性认识，是我们认识一件事物的初使阶段。

比如你接触一个人吧，一开始只能是从外表、谈吐、修养、物质条件等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去认识，这就是认识的感性阶段。

随着认识的深入，你开始关注和思考他的本质，比如他的物质条件，是富二代的身份带来的，还是自己奋斗出来的？

他的谈吐和修养，是一时的伪装，还是本人思想、三观的衍生物呢？

不同的本质，会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现象，现象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但是本质的变化则很小，抓住了本质，就掌握了事物的规律性，那么就算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了。

通过感性接触，形成了对事物的感性认识，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感性认识取得的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形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认识，那么我们就上升到第二个阶段，理性认识的阶段了。

一旦触及对事物的理性认识，那么就可以说我们已经达到了抓住事物的规律性，抓住事物的本质的阶段了。

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首先经历这样的阶段，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没有例外。

理性认识必须由感性认识发展而来，而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更

好的指导我们的实践。

这就是认识的第一个突破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有什么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呢？

最值得警惕和注意的是，如何区别自己对事物的认识到底是处于哪个阶段？

也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的认识已经处于理性阶段了呢？

很多人犯错，就在于把感性认识，当作了理性认识，以为自己已经抓到了本质，可以按照这种认识去指导实践了，但是其实他依旧停留在感性阶段，这样的情况往往是最容易犯错误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是因为人的认识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也可以说有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区别。

人类最基础的活动，是生产实践活动，在原始社会时期，没有阶级，人和人之间以协作的关系，开始物质生产，打猎，养殖，以及早期的种植等等。

后来，随着农业得到发展，生产力提升，开始出现了阶级的分化，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又以一定的生产关系开始物质生产实践。

我们的理论认识便从物质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前人或者古人用他们的亲身实践，总结出了很多的理论，这些理论同样是经过他们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认识以后，总结并记录下来。

人的认识不可能完全依赖自己的直接实践，往往需要借鉴前人的理论，因此就出现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别人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在别人那里，是直接经验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理性认识。

但是这些前人总结出来的理论经验，在我们还没亲自用实践检验之前，对于我们来说，则为间接经验，或者我们对这个理论的认识，其实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

我以前说的，牛顿对牛顿三大定律的认识，和我们从物理课本上学习后认识到的牛顿三大定律是不一样的。

在他那里，这是他的理性认识，但是在我这里，我们如果没有将三大定律用于实践，实际上这个三大定律还是我们的感性认识。

教条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把这种理性认识的定律，当做了自己的直接经验去使用，因此往往无法跟特殊的环境结合起来，造成了理论与实际的脱离。

“知识里手”的可笑之处，便在于此。

在别人处为直接经验者，在我们这里可能还是间接经验，在别人那里是理性认识，在我们这里则为感性认识。

无法看清这种区别，教条主义思想便衍生出来。

这就是认识的第一个过程——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明白了认识的这个阶段，就能减少很多错误，就知道该如何去学习和提升自己。

其根本就在于，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其根本前提就是先把对这件事的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没有这个过程，凭着感性认识去办事，就必然产生冒险主义，吃亏的概率就是极大的了。

感性认识——理性认识，这个观点，就是《实践论》里首先要学习的观点。

大家带着这个观点，去读《实践论》，就更深刻的理解和运用了。

接着，我们聊一聊《实践论》的第二个观点：把理性认识继续运用到实践中。

解读《实践论》2

我们首先从实践中发现真理，也就是从实践中得到了理性认识，但是我们还需要把这种理性认识重新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和发展。

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处在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人在一定阶段和时期内对事物的具体认识，都是相对的真理。

所以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都是会变化的和发展的。

理论的东西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这个检验的过程，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阶段，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必须把它们再重新放到实践之中，方才可以得到验证，这就是我们说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那么问题接着就来了，如何判断这个理论是否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呢？

我们就看它是否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比如《论持久战》，我们说它是那个时期的真理，它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原因就在于它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即通过这种持久战的方式，取得了预想中出现的胜利，并且这种胜利的过程，同持久战中预测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于是，我们说持久战是当时的相对真理。

如果说你的目的是做一个熟人社交的APP，你要把你对如何做这个APP的认识、思考付诸实践，你预想将来这个APP能够达到1千万的下载量，这是你的目的。

结果呢？下载了连一万都破不了，项目损失惨重，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那么我们就说你的理论有问题，是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的。

现实中，完全按照自己预想的目的出现，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同时包含着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所以完全的预想局面，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大体的目标，是可以作出预测的，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理论水平的标准。

在实践的过程中，因为事物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理论、思想、方法、策略

都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理论认识，也得到了发展，也就是我们说的发展了理论。

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情况的变化，会引起思想、策略、方法等诸般变化，甚至完全变化的情形也是有的。

那么我们遇到变化以后，就会及时的纠正原先的思想、理论、策略、方法上的错误，使得它朝着我们预想的目的前进。

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就看他的思想、理论是否达到了他原先预想的目的，如果没有达到，他是否及时纠正错误，以达到目的，为这件事作出他的功绩。

所以，有些错误我们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发现错误，得及时纠正才行。

以上，就是认识真理的第二个阶段，即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又在实践中发展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在某个阶段上的认识过程就算是完成了。

总结一下：我们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把理性认识用于实践——在实践中纠正和发展真理，就是我们一个阶段上的全部认识论。

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认识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升。

这既是《实践论》中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

那么，我们通读实践论可以明白些什么呢？

一、人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践，从感性到理性这个阶段，是必经的过程，没有人可以跳过感性认识，直达理性认识。也就是说，你不能妄想不实践，就直接从书本上汲取现成观点，当做自己的理性认识，这样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二、人的经验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人不可能事事都是直接经验，因此我们必须汲取前人的智慧、理论，用于指导我们实践，当我们在实践中，把

我们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以后，那么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掌握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三、当我们在实践中，掌握了事物的规律性，本质以后，还要把它付诸新的实践中去检验和发展，原先的认识在纠正和检验中，继续向前发展。

因此，忽略前人理论不行，自己不亲自实践也不行，这就是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多问自己几个问题，能减少很多错误。

这些问题：

我对这件事的认识，到底处于感性阶段，还是理性阶段？

我的思想，是否达到了我预想的目的？如果没有达到，是哪里出了问题？

当我们经常问自己这两个问题，经常按照认识事物的过程去学习理论，去取得经验，那我们的成长速度会变得非常之快。

这就是《实践论》。大家拿着这些观点，再回过头去看看《实践论》原文，感受是不是发生了变化了呢？

第十七篇，《矛盾论》

解读《矛盾论》1

联系和运动的观点：

《矛盾论》的历史背景同《实践论》是一致的，《实践论》告诉你为什么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错的，而《矛盾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矛盾论》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既是一种世界观（文中也称宇宙观），同时又是一种方法论。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点论，重点论这些几乎已经深入到《毛选》爱好者的骨髓里的方法，其最早的理论依据就来源于这篇伟大的著作《矛盾论》。

《矛盾论》中涉及到很多思想观点，哲学理论，但是我们也无需把它想得太过深奥，以致于产生了畏难情绪。

应该说，虽然这篇文章包含内容非常庞大，但是又有十分通俗且易于应用的东西，我们可以先读起来，学到一点是一点嘛，这篇文章可以常读常新，过一段时间再读，往往又会有更深的体会，这就是经典文章的魅力。

此文我也是初读，就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和一些方法论，以及有趣的内容。

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就按照文中给出的几个板块的内容顺序，一一来读吧。

这几个板块的内容顺序是：

- 1, 两种宇宙观,
- 2, 矛盾普遍性
- 2, 矛盾特殊性
- 4,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 5,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 6, 对抗在矛盾中的作用。

第一、我们聊一聊两种宇宙观：

文中所说的两种宇宙观是哪两种？简单说，即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与之相对立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唯心主义观。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唯物辩证法看世界的一切观点，都是联系的、运动的。

那么，反之，形而上学，或者说唯心主义观，其看待一切事物的观点则是：孤立的，静止的。

所以也就是：

唯物辩证法：联系的、运动的观点看世界。

唯心的形而上学：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世界。

我们一一讲一下联系、运动、孤立、静止的四个观点吧。

联系的观点不难理解，讲的是这个世界，或者文中说的宇宙中的一切，都是联系的，就好像一张网一样，每件事物的发生、运动、终结都会受周边事物的影响，同时它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它周围的事物。

我们为什么要用联系的观点看世界？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掌握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

你比方说打仗，因为世界是联系的，所以指挥打仗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这一仗的胜利和失败，同时必须看到此仗的胜利或者失败，会引起周围事物的怎样的变化？

比如四渡赤水，一度赤水，显然是因为土城战役失败，于是被迫一度赤水。

很显然，这是一种失败，而且因为是被迫撤退的，所以几乎把所有可以用到的炮类重武器都扔进了河里。

如果用敌军的视角看，这是打了败仗的逃跑。

但是你一旦把一度赤水可能对周围事物产生的变化来看，就不一样了，一度赤水丢了重型武器，所有人轻装上阵，形成了可以迅速的移动的状态。

一度赤水后红军到了扎西，遵义的守卫和城防又短暂的空虚了起来，而且对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红军会返回遵义。

这些情况，就是一度赤水后发生的变化，一旦用联系视角看问题，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变化，于是就有了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役，此战一战成功，得到了修养和补充。

这样一来，又为三渡赤水创造了新的条件。

那么，我们从这个例子去看，很显然就会发现，用联系的观点看世界，你就能瞬

间感受到，什么叫战略。

以前项羽打仗就是没有联系的观点看世界，他每战必胜，但是他没有考虑每件事可能引起的新的变化，以及此战虽胜，但是它会引起其他各种势力怎样的变化？这是项羽在战略意识上的弱项，也就是不会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迁都也好、鸿门宴上放过刘邦也好，这些都体现了，项羽没有思考，这件事可能引起怎样的变化，怎样的结果，如果他思考了，那么可能历史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说的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大家把这个观点放到生活里，也是如此，任何一件事，都是和周围事物有联系的，甚至和一些隔得很远的事物，也会产生联系，这是我们说的蝴蝶效应。

但是和周围的事物联系是最密切的，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现实意义就是，你会学会一个词，叫：战略，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全局观。

什么是全局观？就是把所有的事物联系起来看，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能发生联系的事物，这就是全局观，用这个视角去看，又衍生出看事物要全面的观点。

好了，以上是联系的观点，这个观点大家一旦代入生活，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很好理解，并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东西。

由此观点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衍生出来的观点，大家可以代入生活里去想一想，思考思考。

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再去看运动的观点，就不用说太多，大家也就理解了。

联系讲得是事物同周边事物的联系，运动，则是一件事物前后的联系。

运动的观点，在辩证法里，也可以衍生出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观点，原因和结果。

因为事物是运动的，所以它的今天必然由之前的种种原因发生衍变而来，任何事物的产生，都可以找到原因，同时，它的现在，也会成为一种原因，衍变成它将来的局面。

比如一个孩子的成长，假使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那么我们用孤立、静止的观点去看他，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孩子似乎天生就是自私自利，这个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你看，其实生活里用静止、孤立观点看问题的人不是还很多吗？

比如他们看到一个农民很懒，他们就会说：“懒人就是活该穷”。看到一个富人比较勤奋，他们就会说：“果然，有钱人就是很勤奋，勤奋致富啊”。

这样的观点，今天依然很有市场，且大量存在于很多小资青年的头脑里。

但是如果我们用运动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就知道，懒惰这件事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它的发生必然有发生的某种原因导致了今天的懒惰。

如果不找出这个原因，那么实际上我们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的，只有找出原因，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改变一件不好的事，怎么去促进一件好的事。

就比如这个懒惰，我们就必须看它是在怎样的运动中发生起来的，如果是社会原因多余个人原因，那么我们就得想办法从制度上去解决，从社会问题上去解决。

如果是个人原因，那么我们就得从它本人身上去解决。

当然，现实就复杂一些，通常懒惰的发生，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无缘无故的。

只有把这个原因找出来，我们才能更好的解决，也能更好的预防。

把这个观点代入到生活里，去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观点，你就会发现，会带来很大的变化。

总之，任何事物都是运动的，既然是运动的，那么它今天的情况，必然是由昨天某种情况衍变而来，而今天已经出现的情况，又必然引起未来新的变动。

有了这个观点，其实也对一个人的战略意识，规划意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帮助我们预判事物的发展衍生前途。

这就是运动的观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用联系的、运动的观点看世界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家可以把这两种世界观，放到我们生活里，重新把自己已经发生的事，和即将发生的事，尽可能的去对照，去分析，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即静止、孤立的观点。

了解了运动、联系的观点，再对比这两个观点，就很好理解了。

也就是刚好和联系、运动相反，看事物不会和周边事物联系，同一个事物，不会作前后的对比，这就是静止和孤立的观点。

我们说，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哲学观点，都是可以演变出很多花样千奇的观点的。

我们上面说的，战略意识，全局观，运动观，是方法论层面的东西。

在文化意识领域，其实也有很多这类观点的演变形态。

比如哈：古代皇帝喜欢用静止、孤立的观点看问题，那么就会得出一个观点：皇帝生来就是皇帝。同理也是，贵族生来就是贵族。

他们认为事物的变化是外因，不是内因，所以如果皇帝要下马，必须是外因，比如自然灾害、比如将领造反，比如上天要亡他（项羽不是如此吗？天亡我，非战之罪）。

这样一来，就掩盖了阶级的观点，掩盖了封建特权的剥削和压迫，所以，《矛盾论》中说：“形而上学曾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后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又为资产阶级拥护”。

这句话，如果大家只是单出的读一读，感受不到为什么它那么说，但是你一旦代入历史，把联系、运动的观点代入进去，就立刻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秘密。

所以，这篇文章，只讲了两个观点：

其一，联系、运动的看世界，由此而衍生出全局观，战略观的方法论。

其二，静止、孤立的看世界，那么我们的视角就会陷入局部、片面、单一的视角。

并且，简单讲了一下，两种观点在文化领域展现出来的不同意识。让我们也明白，为什么静止、孤立观点，会有如此广大的市场。这些东西，大家可以细细品味。

这篇文章讲到这里，下篇文章，我们就讲一下，为什么说用联系的观点，运动的观点，会看到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内因，即内部矛盾推动的？为什么说矛盾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和运动？由此，我们才真正进入到矛盾的世界。

小提示：

大家一定要把联系、运动的观点放到现实生活中，前后对比，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含义，才能更好的掌握。

有疑问，可以社区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

解读《矛盾论》2

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

一、

上一期我们讲了用联系的，运动的视角去看事物，这一期我们讲一讲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

可能经常看我公众号的读者，对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这一对概念已经听腻了，但是为了系统全面一些，以前讲过的观点，我们也不怕重复，多讲一些，加深印象。

首先我们说一下什么是矛盾？

矛盾指的是一种关系，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矛盾不是指的具体的某个事物，而是处于事物内部，或者一事物与另外一个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其核心，就在于对立统一这四个字，矛盾的一切规律，都是对立统一的规律，这种对立统一的规律，也就是我们说的唯物辩证法。

所以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唯物辩证法研究的一切范围，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

前段时间，有人说搞不清楚什么是矛盾，什么是内部矛盾，什么是外部矛盾，什么是内因，什么是外因，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什么是同一性，什么是斗争性，什么是对抗性等等。

这些概念性的东西，我以前在公众号也没写过，这次在知识星球，我们就系统的理一理，通过几篇文章，把这些东西尽可能讲清楚一些。

大家不用去记这种概念性的东西，一来不太好记，而来概念本身意义不大，学习《矛盾论》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学会用矛盾的眼光看世界，用矛盾的方法分析事物。

二、

首先矛盾的概念我们说了，是一种事物内部，或者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那么内部矛盾，自然就是事物内部所有对立统一关系，而外部矛盾，就是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了。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比如你把中国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处于中国内部所有的矛盾，都是它的内部矛盾。

但是如果你把其中一个组织看成一个整体，比如红军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处于红军系统内的就是内部矛盾，处于这个系统外，与红军之间形成对立统一关系的矛盾，就是外部矛盾。

你把这个概念放到家庭里也是如此。

如果你把自己家庭里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看做一个整体，那么这个家庭内

部的所有矛盾，就是内部矛盾。

如果你这个整体没有把亲戚包含进去，那么你们家和亲戚之间的矛盾，就是外部矛盾了。

同理，如果你把亲戚也包含进了你的大家庭，把一个大家庭看做一个整体去分析问题，那么你们和亲戚之间的矛盾，就又变成了内部矛盾。

所以大家很容易明白了吧，是内部矛盾还是外部矛盾，是由你选择分析的整体对象而言的。你选择了把一个事物看做一个整体研究，那么处于这个事物内部所有的矛盾，我们就称为内部矛盾。

而事物之外的，与此事物发生对立统一关系的其他事物之间的矛盾，就是外部矛盾。

好了，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关系讲清楚了，那么我们说矛盾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所说的矛盾，既包含了内部矛盾，也包含了外部矛盾。

提到这里，想说一下，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解释，是内部矛盾即内因，外部矛盾即外因。

百度百科目前也是这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其结果是把大家搞得一团乱麻，最后混淆了什么是矛盾，搞不清楚什么是矛盾了。

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不好，矛盾指的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而内因、外因指的是一种因素，条件，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内因和外因呢？

一句话：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

这个内因，也就是根据，它是由事物内部矛盾性规定的，比如以前我们历史书上说，近代史中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由当时中国内部封建地主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规定的。

这些内部矛盾，规定了当时中国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我们说的内部根据，既运动变化中的内因。

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如何变化？走向何种命运？则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是走向彻底的殖民地？继续维持封建社会的性质？

还是走向独立、自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

这就出现了两个方向，两种命运，而最终它到底走向哪种命运？则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因，指的就是外部条件，比如当时出现的一个外部条件，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有了新的指导理论，思想，方法。

当然，这只是一个外因，这个外因就通过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内因，而起作用。

这么说，大家如果觉得难以理解，我们就用《矛盾论》中鸡蛋的原理说一说。

鸡蛋内部的一切矛盾性，规定了这个东西的性质是一个鸡蛋，而这个鸡蛋会走向何种变化？

则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是走向被人炒着吃了，还是走向被打碎了，还是走向孵出小鸡等等命运？走向何种命运？

回到我们那句话，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

比如，我们给他创造温度、时间、孵化上的各种条件，那么它就走向了小鸡的命运。

如果我们给他创造外力打击的条件，那么它就走向破碎的命运。

如果我们给它创造油炸，爆炒的条件，那么它就走向被充当食物的局面。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外因并不是说不重要，相反它很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事物变化的方向和命运。

但是反过来，你创造了温度、时间、孵化等条件，但是它是一个石头，那么便不可能走向变成小鸡的命运。

所以，我们说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

这个根据啊，就是由内部矛盾规定的，所有有人说内部矛盾，就是内因，这种说法来源便在这里。

但是我们要清楚它们的区别，所有的矛盾规定出来的性质，才是我们说的内因，根据，而不是说内因就是矛盾，这不对，矛盾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内因是一种规定出来的性质。

只不过内因都是由内部矛盾规定的，仅此而已。

区别它们有什么意义呢？稍后我们就分析一下。

世界上的很多事物，现实中的很多事物，不是鸡蛋这样简单明了直接的东西，你一眼就看出它是个鸡蛋，很多时候，一些事物的性质，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鸡蛋，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它是鸡蛋，你要爆炒，还是油炸，还是孵化小鸡，你只需要搞清楚这三种命运需要什么条件，想办法创造出来就行了。

要爆炒，你就想办法买油，备锅。

要小鸡，你就准备找只母鸡，给它一定的孵化条件。

只有分析准确了，才能走向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分析不准确，比如你把一个鸡蛋，分析成了石头，那你就是做无用功了嘛，最后不仅事倍功半，而且简直就是白费力，只有失败，没有成功。

而现实中，我们要判断一件事物的性质，是不容易的，比如今天我们知道当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知道了当时的旧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但是在当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不容易的，归根结底，就是把矛盾分析清楚了，明确的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找出来能规定中国性质的主要矛盾，既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两个主要矛盾。

这两个主要矛盾，规定了当时旧中国的性质。

明白了性质，我们才能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使得它变化到我们想要的方向去。是变化到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去呢？还是变化到完全的殖民地，封建主义去呢？如果我们要第一个前途，那么我们就要用尽一切力气，去创造实现第一个前途的条件。

而反之，敌人则是想要第二个前途的，他们也在拼命的创造实现第二个前途的条件，比如后来日本全面侵略战争，就是要创造第二个前途，把我们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读到这里，大家知道研究矛盾的意义了吗？

我们必须通过研究矛盾，从而确定事物的性质，特点，也就是搞清楚它是蛋、是石头、还是西瓜？

搞清楚了基本性质，那么我们就能找出它的各种运动、变化需要什么条件，剩下的任务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得它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生变化。

这就是努力的意义。

论持久战里，就分析了日本的矛盾，中国的矛盾，从而得出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又得出中国抗日的性质。

然后又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场抗日战争要向着何种方向演变？

最后，得出打赢抗日战争的条件，并附上了实现这些条件的操作手册，比如游击战、持久战、歼灭战，统一战线这些条件。

为了实现这些条件，我们不计较一切代价，促成这些条件的发生、发展，最后终

于打赢了这场战争。

这就是内部矛盾，外部条件的全部运用流程。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我估计没有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分析矛盾？就是要搞清楚事物的性质、特点，才能掌握它变化的方向，从而创造条件，使得它朝着我们想要出现的变化方向前进。

因为矛盾是一种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或者事物与外部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所以我们只有用联系的观点看世界，同时又用运动的眼光看世界，才能看到我们上面讲的那些东西。

才能看到它们的矛盾，才能看到它的发展变化，以及所需要的条件。

所以我们也说，要建立体系的思想理论，方法技巧，我们可以看到，用联系、运动的视角看事物，就看到了矛盾，条件，运动等等。

因此，我们说它是一个体系，这个理论是一个体系，一个完整的方法论。

要分析好矛盾，前提就是我们上一篇文章所说的，用联系，运动的观点看一切事物，否则还说什么不同的命运，前途，还说什么创造条件，就毫无意义了嘛。

正因为联系，所有一切皆有矛盾，正因为运动，所以一切皆有方向。

我们要稳步的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必须把这些分析清楚了，才能创造条件(努力)，去实现或者达到我们的目的。

这既是我们要体系化思想理论的意义，只有如此，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分析准确，而不是今天用这个方法，明天又用那个方法，最后乱成一团。

好了，这一篇我们就分析到这，大家还没明白，也没事，因为《矛盾论》概念性

的东西太多，容易混乱。

我们后面要一篇篇的文章去读的，那些文章大量涉及矛盾分析，条件创造，事物性质，特点等等。

以后随着分析的多了，用的多了，可能回过头来，自然就明白了矛盾论了。

以上，则是我们《矛盾论》中，第一个议题，两种宇宙观中的核心观点：

第一篇文，讲了联系、运动的视角。

这篇文，即第二篇，讲了矛盾，内部矛盾，外部矛盾，内因，外因，根据，条件。

那么，问题立刻就来了，到底该怎么分析复杂事物的矛盾呢？

这既是我们下一篇文章，需要解答的问题了，既如何分析矛盾？

解读《矛盾论》3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这一节内容，我们平时都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在用到，所以相对比较好理解，我们主要讲一下，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在实际分析问题中的应用。

首先说明一下矛盾的普遍性，这里面包含两个含义：

其一，既一切事物的发展运动过程中，都包含着矛盾。

其二，同一事物发展的至始至终的过程中，都包含着矛盾。

没有矛盾，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一切事物的运动都包含着矛盾，而运动是绝对，静止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世界处处都是矛盾。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一点：差异是不是矛盾？

比如哈，两口子组成一个家庭，我们把这个家庭看做一个整体，那么实际上这个家庭内部的所有矛盾，都是内部矛盾。

但是呢，这小两口感情特别好，从来都不吵架，也不撕逼，也可能会偶尔拌嘴，但是仅仅只是一些观点的差异，最后双方都会互相谦让，互相妥协，因此从来也没有出现矛盾斗争的画面。

因此就出现一种观点，认为矛盾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很多时候，事物只有差异，没有矛盾。

《矛盾论》里当然反驳了这个观点，因为它不符合矛盾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即一事物发展的至始至终过程里，都充满了矛盾。

但是我们说，一切观点的对错，只有放到实践中去检验，方才有意义。

到底有没有矛盾，我们分析一下：

比如杨过和小龙女哈，这感情够好了吧，他们有观念上的差异，杨过喜欢外面世界的热闹，小龙女只喜欢古墓的安安静静，这就是矛盾。

如果我们把这对矛盾，只看做差异，观点或者认识上的差异，那么就估计不到它发展中出现的可能性。

在杨过英雄大会上重见小龙女之后，便决定要跟她回到古墓，看样子似乎就一切顺利了，只有差异，没有矛盾，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只不过是他们的矛盾并没有激化而已。

当着黄蓉在小龙女耳边吹了一些风以后，英雄大会上人人不齿师徒恋爱的画面上演以后，以及杨过本身说了以后还是可以到花花世界游览一番之后，当这些条件出现以后，矛盾就激化了，于是出现了小龙女独自离开的局面。

这就是只认识到差异，没看清其矛盾实质，从而导致局面不由自己控制了，丧失了主动权，小龙女差一点嫁给了公孙止。

你看，这就是只看到差异，看不到矛盾的后果。

如果你看到的是矛盾，那么我们前文说过，你就能大致推断出矛盾会在什么条件下激化，激化以后会是什么结果？然后提前作好准备，来控制住事物的发展。

《矛盾论》里还有一个例子，比如当时的富农，贫农之间，似乎都是农民，大家都穷，所以这两者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矛盾。

无非是一个家里稍微有点余量，一个家里常年饿肚子罢了，半斤八两，所以只有差异，没有矛盾。

如果那么估计，实际上同样会丧失警惕性，一旦出现某种条件，矛盾就会激化，如果不提前准备，提前看到矛盾发展和运动的方向性，可能性，那么就要出问题。比如井冈山时期的八月失败，就是没看到富农，贫农的矛盾，当白军围剿来临时，这两者矛盾就会激化，富农可能会投机反水，反过来参与白军围剿贫农。

大家现在明白了吧，有些矛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激化，但是并不是说它不存在，它时时刻刻都存在，只不过有些激化它的条件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出现。

比如一个家庭原本很好的感情，万一其中一方出现了天灾人祸之类的情况，实际上以前一些我们看似只有差异的东西，立刻就激化了。

因此，差异就是矛盾，我们明白它的意义在哪里呢？主要是分析矛盾的时候，要关注到矛盾的方方面面，注意到一些看似还没有激化的矛盾，当条件变化的时候，是否有可能激化？

条件的变化有没有可能？如果有可能，各种复杂的矛盾，会发生哪些变化？哪些矛盾会激化？哪些不会？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的看到复杂事物的方方面面，把事物分析的清清楚楚。

否则，有时候就会出现局面失控，甚至是大意失荆州的情况。

说道大意失荆州，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来，当时如果关羽提前关注到了蜀国、吴国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了解了在什么条件下，矛盾可能激化，导致吴国趁机取荆州，那么大意失荆州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了。

所以，矛盾具有普遍性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暂时不会激化的矛盾，它也是矛盾，我们在分析复杂事物的多对矛盾的时候，把一切存在的矛盾都分析进去，当条件

变化的时候，各种不同的矛盾是否激化，是否发展，等等，只有如此，才能牢牢把握主动权。

好了，说完了矛盾普遍性，我们再来说说矛盾特殊性。

我们说矛盾为什么会具有特殊性？这是因为任何事物，它们都不可能处于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环境之中，所具有的矛盾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也即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其特殊的矛盾，是区分它与其他一切事物的依据。

这里面，就讲到一个教条主义的问题了，教条主义的问题就在于，把一些适用于解决普遍意义上的矛盾的方法，直接照搬，用到了看似相似的事物上，由此带来巨大的灾难。

第五次反围剿前期，教条主义照搬苏联革命经验，不注意到中国具有特殊的性质，认为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都可以走城市进攻路线，因此种种策略，种种思想理论照搬而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沉痛的失败。

须知，一切矛盾都具有特殊性，我们中国看做一个整体，那么它必然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

我们把一个家庭看做一个整体，每个家庭也有它的特殊性。

我们把一个人看做一个整体，这个人也必定有其特殊性。

我们认识事物，也可以说，就是认清事物所有的矛盾，找出这些矛盾的规律性，从而把事物推向我们想要的方向和结果。

很多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理论和方法，是前人总结出来的，是一般性的规律，我们应该要重视。

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理论、方法，用到具体事务中的时候，因为具体事物会有其特殊性，所以就必须结合实际情况，作出调整，改变，以适应事物的特殊性，

否则就会出大问题。

这一点，我想不难理解，所以我们不举例了。

矛盾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不同的事物之间，而且表现在同一个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上。

一个女孩一开始喜欢你，但是随着感情的发展，各种矛盾的发展，可能过段时间她就不喜欢你了，这也是矛盾不同阶段的特殊性。

我们常说，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干什么事，讲的就是矛盾的特殊性。

我们也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讲得就是矛盾不同阶段的特殊性。

不研究这种特殊性，把一般的规律直接照搬，问题也就容易出现了。

所以我们也说，认识事物是从特殊到一般，就是说从一个局部的东西开始，不断研究，找出规律，共性等等。

然后还要把这个共同的规律，理论，重新用到具体的事物中去，又必须对实际事物加以认识分析。

这既是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缺少了任何一个过程，都是不对的。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大致如此，其难点在于实际分析过程中，如何判断矛盾所处阶段，矛盾的转化，变化等等，以后我们会在其他篇目中，看看具体问题的矛盾，是如何分析的，否则单单说矛盾，还是比较抽象哈。

下一篇，我们聊一聊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何判断事物的性质？

解读《矛盾论》4，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上文讲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这篇文章我们继续讲《矛盾论》，主要讲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起的作用，帮助我们实际解决若干矛盾。

我们都知道，你要抓主要矛盾，前提是首先得把影响事物发展，以及可能会因为某种条件的变化，引起某个矛盾的激化，从而影响事物的发展的矛盾先找出来。

这句话有些绕口，我们换句话表达：

即抓主要矛盾的前提是：你先找出所有影响着事物发展、运动的矛盾，以及可能会在某些条件下，激化以后导致影响事物发展、运动的矛盾都找出来。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学了某个理论，就能一蹴而就的事，所以《矛盾论》中，其实并没有具体的“如何找出矛盾的论述和方法。”

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些矛盾的特点：这些特点均由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衍变而来，比如：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等等。

听上去非常之抽象，我们说研究任何问题，我们都要避免抽象，而应该落实到实处，矛盾听起来似乎抽象，但是只要我们不断的去分析生活里的矛盾，分析历史上我们看到过的那些矛盾，长久分析，时间长了，分析多了，慢慢的也就能熟练掌握，至少分析自己身边的矛盾，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找出矛盾比较困难，那也不必着急，因为这不是看一篇文章就能迅速解决的，后面我们还会从《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开始慢慢读，这些文章都大量涉及到矛盾分析的实操案例，今天不能马上理解的东西，以后看多了，用多了，会慢慢理解的。

比如，我们直接搬运一下《矛盾论》中的例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有哪些矛盾存在着呢？

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矛盾。

其实生活里，只要用心想一想，实际看一看，我们也可以找出很多矛盾。

工作上同老板之间的矛盾，与同事之间的矛盾，与客户之间的矛盾，家庭里与父母妻子的矛盾，与孩子的矛盾，社会上，各种社会关系之间，也往往充满着矛盾。

而我们这篇文章要说的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当我们面临复杂矛盾的过程中，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任何阶段，都有且仅有一个主要矛盾。

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很多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你感觉到身边处处存在矛盾，却没有找出主要矛盾来，那一定是你没有分析好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因此无法找出主要矛盾。

这样一来，生活陷入一团乱麻，实在是糟心得很。

任何复杂事物的发展，都必然充满着很多影响着它发展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中一定有一个是主要矛盾。

比如上面《矛盾论》中的那个例子，资本主义蕴含着的若干矛盾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存在影响和规定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所以，区别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根本点就在于：

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抓主要矛盾的核心原则，就是这个。

当然，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和次要矛盾有时候会发生转化。

比如，当帝国主义全力展开侵略战争的时候，那么主要矛盾就变成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除开少数叛徒之外，所有阶级能够暂时性的团结起来，一切反对侵略战争。

此时，阶级矛盾，就变成了次要地位的矛盾，取服从地位。

但是，当帝国主义采取的不是武装侵略，而是文化、政治、经济上的温和型的方式以后，则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就会投降，站到帝国主义一边，共同实行对本国人民的压迫。

这个时候，主要矛盾就发生了变化，阶级矛盾成为矛盾斗争的主要形式了。

中国近代史从北伐、到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再到解放，均符合这个规律。

所以，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忽略了这种变化，认为主要矛盾不会发生变化，那么也会犯错，会在不同阶段，出现抓错主要矛盾的情况。

但是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即使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是有一点不变，就是只有一种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这一点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不要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我们要反对矛盾的均衡论，矛盾的基本形态是不平衡，其中必有主要矛盾。

这就是我们说的抓主要矛盾，这一点其实我们之前公众号写过，没什么新鲜的，以后我们在读《毛选》的时候，多分析主要矛盾即可。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点，即一对矛盾中的两个方面，是否是均衡的呢？比如，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日本和中国即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

均衡的吗？谁又起着主要作用呢？

再比如：如果你和你老婆发生矛盾，那么你们两个人之间，对矛盾的发展和运动方向所起的作用，是均衡的吗？

答案：不是。

其中必有一方，即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更为重要的领导作用。

也就是对矛盾发展和演变的方向，起着更重要，更有决定性的作用。

比如抗日的三个阶段中，在前期，日本力量极强，我方极弱，则发动侵略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本手里。

双方的矛盾以何种形态发展，将向着什么样的方向衍变，起主要作用的在日本方面。

而随着持久战的继续，此消彼长，日本将逐渐走向战争泥潭，走向帝国主义的毁灭状态，而我方，则因为统一战线的持续，持久战的坚持，人民战争的发动，逐渐把主动权夺回自己的手里，那时候，矛盾着的双方，地位开始发生转化，我方成为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而对方成为次要方面。

那时，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是否反攻？何时反攻？怎样反攻？这些决定战争走向和命运的主要决定权，又回到了我们的手里，于是我们说，矛盾的两个方面发生了转化。

看清了这一点的意义就在于，当着我们处于困难局面的时候，就必须观察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否有可能发生转化？

如果有可能，则我们就要想办法，促成这种转化，尽早掌握主动权。

这个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间，会发生转化的应用，在解放战争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解放战争中，主要矛盾自然没有什么疑义了，但是一开始，双方的矛盾的发展，

变化，将会走向何种命运的主动权，其实是掌握在国民党手里。

他们起着是否发动战争的主要作用，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性质。

但是当着我们分析了这种矛盾，发现我们有人民、土地革命等几个有利条件，随着战争的进行，力量将逐步强大，而敌方的有利条件如武器，装备，税收，外交支援等等，则随着战争的继续，将逐渐衰弱。

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随着矛盾的持续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国民党方面，会逐步转化，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我方将逐渐掌握主动权。

成为规定解放战争进程，结果的一方。

而要实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要创造一些条件，比如：存人失地，人地皆存；每战必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打歼灭战，而非消耗战等等，总之，为着实现矛盾的转化，付出一切努力，最后赢取胜利。

这种思维方式，我们会发现，在《毛选》涉及的军事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应该说，从井冈山时期开始，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

当然了，矛盾是否一定会发生转化呢？当然不一定了。

是否转化，取决于对矛盾性质的判断，以及发展的判断，这个问题此处不作深入分析，以后我们还会聊。

所以总结一下：

这一篇文，主要内容即是：

1，复杂事物的发展，必然同时包含若干复杂的矛盾运动，而这些矛盾中，必然有一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会影响个规定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2，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主要矛盾会转化为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会转化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我们应该从矛盾的发展中，去创造条件，使

之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向和前途去发展。

3，矛盾的主要方面固定了事物的性质，这一条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因为比较抽象，以后我们会用实例分析。

解读《矛盾论》5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讲的是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着的两方面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互相合作，一方的存在以另外一方的存在为条件。

就好比，正和负、好和坏、善与恶、生与死、困难和顺利等等，一方的存在都是以另外一方的存在为条件。

没有好，也就无所谓坏，没有对，也就无所谓错。

矛盾着的东西，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在一个体系中共同促进事物的发展。

抽象吗？是挺抽象的，但是我们一放到具体的案列中，就不抽象了。

比如现实生活里，没有老板，也就没有所谓的员工，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无所谓无产阶级，没有地主，也就没有所谓的佃户。

一方的存在，以另外一方存在为条件。

这似乎并不难以理解，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绝不研究那些抽象的东西，搞清楚同一性的意义在哪里？

研究它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意义有两个方面：

其一，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着的双方，会互相联结，互相合作，共同促进事物的

发展。

其二，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

我们先说说第一个意义，比如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这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在共同抗日这样的条件下，互相联结，互相合作，共同促使事物的发展。

如果看不到这方面的意义，那么就陷入了关门主义，自己干自己的，否认了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联结，互相合作。

比如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会存在共同合作，共同促进社会发展的局面。

这里新民主主义，我们暂时在此文中不作解释，后面解读《毛选》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时候，会着重讲这个新民主主义。

这就是矛盾同一性原理，衍生出来的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结，互相合作的意义，忽略了这种意义，那么就会出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时候，关门主义的观点。

所以，由上面我们可以看出，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才会出现互相联结，互相合作，互相渗透等现象。

那么相反，条件一旦破坏，则矛盾就可能激化，演变成对抗性矛盾。

所以不管什么矛盾，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矛盾会如何衍变？是激化，还是处于一种暂时的平衡？

以上，是矛盾同一性的第一个意义。

矛盾同一性的第二个意义，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可能会出现互相转化的局面。

地主可能随着矛盾的变化，失去土地，农民可能会随着矛盾的变化，拥有土地，这一切都是矛盾着的双方斗争的结果。

这一个意义我们在上一节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会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已经说过了，其原理是一样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再说说矛盾的斗争性。

同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斗争性却不同，斗争性是绝对的，是一定的。

还是说国共第二次合作，斗争就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老蒋团队一方面有抗日的需求，当着抗日的压力巨大的时候，双方暂时性的统一起来。

而当这种压力稍微减轻，则其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意图又立刻表现出来。

忽略了这种斗争性，就会出现王明的观点：即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归于统一战线。

相反，看清这种同一性和斗争性，则出现了毛泽东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这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它无时无刻不在斗争。

关注到斗争性，同样可以创造条件，使得斗争的方向，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进行衍变。同时避免损失，减少斗争性对自己的伤害。

这一点，将来我们在读到《国共合作中的独立自主》的问题时，将会有充分的体现。

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下一篇，我们讲讲《矛盾论》的最后一节，即对抗性在矛盾中的作用，《矛盾论》的解读便暂时告一段落，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

一篇篇的来读《毛选》了。

解读《矛盾论》6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是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难以调和，必须采取激烈的对抗形式才能解决的矛盾，我们便称其为对抗性矛盾。

这一点看《毛选》怎么说：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著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著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著，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矛盾的斗争体现为多种形式，是否发展为对抗性，则因矛盾的阶段不同，性质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分析。

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告诉我们，当着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时候，斗争已经非常激烈的时候，妥协是没有用的，必须采取对抗的形式来解决这个矛盾。

那么，同理，当矛盾还没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则往往需要采取温和的方式，尽可能不要通过激烈的手段，来解决矛盾，否则也会造成很大的破

坏。

我们拿着这两个观点，去看看历史。

肃反运动中，过左的现象，就是第二种情况，矛盾并没有估计的那么严重，但是采取的斗争形式，是十分过火的，死伤无数。

又或者，家庭里小两口吵架，如果不是难以调和的矛盾，一般咱不建议人家离婚对吧？

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是难以调和的矛盾，那离婚却又成为了最佳的选择。

如何估计矛盾，当然是困难的，但是这个理论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这样的理论后，就可以有理有据的，对过左，过右的倾向提出依据。

这个理论其实我们社会上非常常见：

其关键点，就在于估计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还是其他的什么矛盾？是否要采取激烈的斗争形式？

人家犯了一点小错误，你就要开展无情打击，残酷斗争，这自然不妥。但是如果有人犯了严重错误，你又在那里讲仁慈，讲善良，讲调和，这也是不妥的。关键，就在于对矛盾的判断。

在革命时期，只有采取这种革命的激烈手段，才能使得事物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即通过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转变到独立，自主，有自我主权，有人民民主，有幸福生活的新中国去。

这时，谁如果反对革命，谁就是阻碍矛盾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人，我们就要打倒和推翻。

反之，如果矛盾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过早的革命斗争，过于激烈的斗争手段，

也是不可取的。

和平年代，有些矛盾我们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会采取温和，调节的方式去解决，比如一些民事纠纷等等。

而有些矛盾，触犯到刑事犯罪，甚至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它当做敌我矛盾，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去解决。

我们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那么对于激烈程度不同的矛盾，我们就往往采取了不合理的对抗手段，要么过于妥协，要么过于激进，从而不能达到妥善解决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以上，就是对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的意义。

到此，我们解读《矛盾论》的文章就写完了。

《实践论》告诉我们，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的感受它。

生活里，社会上，思想中，处处充满了矛盾，很多矛盾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但是并不能深刻理解它，我们把《矛盾论》进行解读，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那么再把它放到生活里，加以不断的运用和对照，久而久之，用矛盾的眼光看世界的世界观就形成了。

长此以往，对我们的益处实在是非常大的。

这几篇文章，分别对应着《矛盾论》中的几个模块，大家可以参照原文一起读，当然，是在大家时间允许的基础之上，也不必过于着急，学习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我们单单读《实践论》和《矛盾论》则往往是抽象的，容易陷入抽象的研究。

大家能代入实际生活，可以代入实际生活，还无法代入进去的，我们后面还会慢慢从《毛选》文章中去解读。

以后很多观点可能会重复，只是因为《毛选》中的文章，其背后本身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所以很多观点，都会在不同的文章中重复出现，我们不怕重复，因为可以加深印象，对形成体系，非常有帮助。

第一卷解读文，全文完。

毛选第二卷解读全文

目录

第一篇，《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2
读《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上）	2
读《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下）	5
第二篇，《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9
第三篇，《反对自由主义》	13
第四篇，《国共合作成立以后的迫切任务》	18
第五篇，《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23
第六篇，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27
第七篇，《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31
第八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33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	33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二）	39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三）	42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四）	47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五）	49
第九篇，解读论持久战	53
论持久战（一）	53
论持久战（二）	65
第十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69
第十一篇，《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74
第十二篇，战争和战略问题.....	78
第十三篇，《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	83
第十四篇，《反对投降活动》和《必须制裁反动派》	88
第十五篇，战略相持、反共摩擦、利益一致.....	93

第十六篇，《共产党人发刊词》	99
第十七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07
第十八篇，《新民主主义论》	112
第十九篇，《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119
第二十篇，《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124
第二十一篇，统一战线问题.....	128
第二十二篇，独立自主问题.....	133
第二十三篇，战略战术问题.....	137
第二卷全文完.....	143

第一篇，《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读《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上）

一、方针、办法、前途的思维架构

这里我们先聊一个题外话，就是这篇文章的写作方法，抛开内容不谈，此文的写作方法就非常值得学习。

文章围绕着“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这样一个主题进行，实际上却是争锋相对的提出了两种方针、办法和前途。

首先，我们知道，你提出一种方针，就必然有相应的一套围绕着方针开展的具体执行办法，而按照马克思可知论的观点，任何方针、办法在实施以后，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大致预测其前途和结果的。

所以文章的行文结构就非常完整，而且很有说服力，就是说他不但提出了方针，还提出了围绕方针的展开办法，最后预测在实行这种方针之后，会收到什么样的结果。

大家如果写文章，做演讲，甚至平时关于某个主题的交流也常常需要用到这种架构：

即：方针、办法、前途三者统一的架构。

我们生活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提出一个观点的时候，只顾倾泻自己的情绪，比如只提方针，不配合相应的办法和可能的前途。

比如以前苏区早期，提到“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时候，就不怎么去讲具体的方法，或者是讲了，但是方法非常不切合实际，只是搞盲目的暴动，对于可能的前途，则是一概不提。

于是，就只能是失败，挨打，盲目的损耗革命力量。

今天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尤其是创业领域比较明显，这两年可能因为每个行业的行情都不是很好，所以稍微好点了。我记得再往前三四年左右的样子，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人盲目的进入到某个行业。

他们通常只喊口号，比如某个行业非常火，某某人在这个行业赚了多少钱等等，但是从来不提自己进入这个行业，要具体干嘛，要配合怎样的操作方法，实施办法，以及这些办法每一步实施以后，大致会收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些东西不提的背后，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想清楚的表现，其行动就往往伴随着机会主义的诞生。

我们平时提个论点，也要辅以相应的论据，何况是决定一件事情的实施方针、实施办法呢？

大家如果要说服别人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某件事的时候，不说大的东西，就是家里有了分歧，你想要说服家人支持你，那你至少就得按照这个模板，即方针、办法、前途的模板来说服大家。

你说现在要做哪件事？然后这件事为什么要那么做，具体的办法是什么？这样做了以后会收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样一个整套流程有了以后，大家再去推敲，你的办法和你的方针是否匹配，这样做的结果到底能不能达到你所说的目的和结果？

自己提出来之前，肯定也是反复思考，然后给大家提出的时候，大家再帮你推敲其中是否有错误，有不合理的地方，再试图改进。

这样，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其实才能提高成功的概率，才能更靠谱。

生活里，我们常常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行来判断此人是不是很浮夸，是不是踏实，是不是着调，常常也是从他的言行之中，看他思考问题的方式。

一个顾头不顾尾，瞻前不顾后的人，只提口号不讲方法，只讲方法不预测可能性，或者方针、方法、前途三者并不统一，完全是拼凑起来，三者之间没有内部联系，那这个人指定是不靠谱的。

所以，以上我就是提出一种写作，或者说思考问题、表达观点的一个基本架构，即，方针、方法、前途的架构。

这种架构在关于作决策、定方针、找方法等问题上，是非常实用的。

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用到这种方法就差不多了，但是回到《毛选》原文，它不但用了这种架构，而且还提出了两种方针、办法、前途，然后进行了对比，使得整个主题更显强烈，表达的立场更加坚定。

文章第一种方针，是坚决抗战的方针。

围绕着坚决抗战的方针，然后提出了需要执行的一系列操作办法。

继而，再提出执行了这样一套操作办法以后，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前途？——当然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而与之相反的，还有一个整套的方针、办法、前途，这就是当时投降派、妥协派、亲日派所采取并正在执行的一种方针、办法。

这套方针围绕着“妥协投降”四个字展开。

围绕着的办法，则刚好与“坚决抗战”的一套反着来。

最后迎来的前途，就必然是日本占领中国，中国人民迎来做牛、做马的前途。

文章将两种方针、办法、前途放在一起说明，对比就会非常强烈，那么说服全国人民一起实行第一种方针、办法就会更加有力量。

同时，对于揭露第二种方针，即妥协退让的方针的阴谋、虚伪、可耻的手段等等，都有很好的警醒作用。

大家再讨论不同方针的时候，也可以将不同方针、搭配的方法，以及可能的前途，进行反复对比，综合排序，以此得出一个最好的方针、办法、前途。

这篇文章我们聊这个题外话，下一篇，我们继续解读此文中提到的具体的方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方法。

读《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下）

文中提出了两种方针：

第一种：坚决抗战。

由此方针，配合一套坚决抗战的办法，以及坚决抗战的前途。

第二种，妥协退让。

由此方针，配合一套妥协退让的办法，以及妥协退让的前途。

方针、前途是比较明确的，才去坚决抗战，那么我们就能迎来自由解放的前途。反之，采取妥协退让，那么我们就会迎来亡国奴的命运，做牛做马的前途。

全文的重点，当然就是放在第一种方针的具体办法上了。

所有围绕“坚决抗战”方针，需要采取的办法一共写了八条，我们一一读一下：

第一：全国军队总动员。

这里面重点提到，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一条原则：

“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一条就是整个第一条里的精髓，也就是说要实现坚决抗战，就必须改革军队，使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否则军队就不会有力量。

这几天我们更新长征，大家可以看到一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有平等和尊严的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惊人的意志和革命力量。

中国在军事工业，单纯军事力量方面不足以对抗日本，那么就必须改革制度，使得在组织、抵抗意志、凝聚力等上面超过对手。

这是对于军事改革的最核心的手段。

当然，我们后来都知道，这样的改造在蒋介石那里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他自己的军队本来就是在封建军阀、军队私有、地盘割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他所面对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那么，可能有人会说了，那毛泽东还写这个干嘛，反正他们也改不了那臭毛病。

这一点，一来是政治需要，我们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么做的嘛，我们自然也要号召其他人也按照我们的方法来执行坚决抗战的方针。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要表达我们自己的主张，使得同样有这种主张，即拥护官兵平等、拥护军民一致的各种力量，能够被我们集聚到自己的抗日力量中来。

第二、全国人民总动员

这一点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种种针对爱国力量的法律、规定所说的。国民党本质上代表的是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政党。

因此，在抗战之中，要发动群众起来，就必然会有内部之间的阶级斗争，就必然会产生很多针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活动，党派，当然，很显然，在老蒋那里看来，最危险的首先就是我党了。

所以当时就有什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新闻检查条例》等，其实本质就是针对我党的，以及在舆论上，反对可能出现的种种阶级斗争的言论。

因此我们看到第二条，就是针对全国人民总动员，必须先从废除这些法律法规，允许所有爱国力量的主张出现等等。

其实这一条，老蒋也是做不到的，原因和上面一样，你要发动群众，就必然触碰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但是，我们把这条说了，同样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把拥护同样主张的人集聚到我们这里来，同时即使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里，也会有支持我们这种主张的力量存在，这样也可以使得支持“坚决抗战”的力量又多几分，不管他是不是我们阵营，只要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有利于增加坚持抗战的力量。

第三、改革政治机构

这一点重点讲的，是要给人民以更多的民主和自由。此前，我们在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重点讲过“为什么要给人民以足够的民主和自由”，这里简单重复，本质就是为了能发动群众的力量，依靠全民抗战，而不是政府的单纯军事、政治力量的抗战。

第四、抗日外交

这一条很简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外交力量，坚决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其中就包含了这样一条原则：“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敌人的。”

第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

这一条也是针对如何发动群众的，也就是要在人民生活、税收、待遇等问题上执行具体方针，包括工人的工资，生活待遇，灾荒救济等等。

总之原则就是，必须要考虑群众的生活，他们的实际情况，要照顾他们，组织他们，发展他们的力量等等。

这里面当然隐藏了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这些改革政策，必然会损坏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

比方说，废除高利贷，这有利于人民，但是就不利于放高利贷的人，而放高利贷的人里，占比最大的就是军阀、地主。

所以，这其实也是老蒋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内部矛盾。

第六、国防教育

增强一切有利于国防，抗日的教育，禁止汉奸宣传

第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

这一条非常霸气，我原文复制一段：

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钱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原则基础上。

意思就是说，除了抵制日货，支持国货之外，所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直接开抢，不要客气。

人家都打上门来抢你的东西了，你难道还要跟人客气不成？只有坚持“妥协退让”的人，才会在这件事上谈“客气”二字。

第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这一条着重讲，国共合作要精诚团结，要诚心实意，共赴国难，不应该只讲得好听，还要做得好看。

其中一段话很经典，摘抄一下：

“团结要真正的团结，尔虞我诈是不行的。办事要大方一点，手笔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Q主义，实际上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用于对付敌人都不行，用于对付自己同胞，简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该从大道理上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上。”

以上八条，是针对第一个方针，即“坚决抵抗”的方针采取的。

那么，相反的，如果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自然就是按照这八条原则反着来就是了。

两种方针提出来以后，其实很明显，这也是一种宣誓，宣誓我们坚决的执行“坚持抗战”方针的主张和意志。

其实我们从这八条中可以看到另一层含义，就是说毛泽东其实就像一个医生，他给蒋介石开了一张药方。从这张药方中，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病症。

病症的核心，在于他不敢发动群众，即使在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候，他依然恐惧群众，这八条里，其实有七条都是讲得如何发动群众，给群众利益，帮助群众武装起来，实现人民的战争的。

我们自己是那么做的，也希望认同这种做法和主张的人一起加入进来，实现全民族的抗战。

只可惜，老蒋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其解放战争以后，都始终没治好自己的顽疾。

第二篇，《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读《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这篇文章，是洛川会议的一个决议，其核心在于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所谓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我们上一篇文章《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到的八条办法的一个补充。

这个补充主要是两个地方：

第一：增加了两条办法，一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条是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第二：将全部的十条办法更加详细和具体的加以说明了，然后就组成我们熟知的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我们上一篇文章，已经复述过八条办法，此文加上最新的两条，以及将最终的十条进行了具体的说明补充，大家直接读原文就可以了。

这篇文章我们着重说一下发布这个“十大纲领”的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川会议”，它算是“十大纲领”的一个历史背景。

为什么要说一下洛川会议呢？是因为最后确定会议内容之前，出现了很多具有争议的东西，大家意见很不一致，为了最终实现这个洛川会议决议，实际上毛泽东是花费了很多周折的。

这些具有争议的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是运动战还是游击战？
- 2，是独立自主，还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 3，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

第一个争议点：是运动战还是游击战？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争议呢？当时毛泽东坚决主张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当然阵地战肯定是大家都反对的。

另外一种意见是：红军经过那么多的锻炼，已经拥有足够的运动战经验，所以应该坚持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多多少少有些看不起游击战，而且觉得以游击战为主，有些遭人诟病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的军队只会打游击，没多大作用。

总之，有点想表现一下自己，不想打那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虽说也不敢打阵地战，但是至少觉得应该坚持运动战。

其实说法也不是没道理，后来八路军不就一直遭人诟病，说什么“游而不击”之类的吗？

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在意别人的看法，总归还是要坚持一个原则：实事求是。

认为游击战上不得台面的思想，本身来源于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艰苦性，没有看到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我们军事力量的弱小。

他们不明白，在人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力量的巨大消耗，会损害打持久战的能力，持久战的核心就在于，我方力量虽然很小，但是却处于不断的壮大之中，敌人力量虽大，却处于不断的衰弱之中。

因此，在前期阶段，全面发动群众，全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最迫切的任务，因此游击战才是最符合当下的一种抗日战术。

这一点，是符合当时八路军的实力估计的。

毛泽东认为，当下八路军（红军改编过来的），还不适合运动战，只有当八路军实力发展到一个阶段以后，才能改变战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而目前状态，只适合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且运动战必须在打成歼灭战的条件下，才能发动。

这个原则，对于八路军早期的发展，以及后来快速扩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应该说没有这个原则的制定，后来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变数。

作出这种判断，本质上还是来源于对自我能力的准确认知，没有这种认识，就出现了以运动战为主的过左的偏向。

我们抽时间，也单独写一篇文章聊一聊自我认知的问题，这里不多说了。

第二个争议的问题是：是独立自主，还是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洛川会议争，后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内，都在争。

之所以争这个问题，本质上还是没有看清楚国民党身上存在的一个基本立场问题，也就是说阶级利益的立场问题。

只要这个阶级立场不变，他们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企图就永远存在，因此要对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这种高度的警惕性就在于：军队的指挥权，万万不可交到蒋介石的手里，也就是八路军决不可听从蒋介石的调遣。

这个是最基本的，缺失了这一点，一切的独立自主无从谈起。

当时有一种观点就是：既然合作了，又承认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那人家调你去抗日，去同日本人硬抗，打几个漂亮仗，这有什么不对呢？

你不去，是不是反而有点说不过去了？人家会不会说你的合作没有诚意呢？

但是毛泽东想的是：八路军只能打游击战，持久战，在敌后行动，否则你听蒋介石的，就会变成八路军被蒋介石借日本人的手彻底消灭。

而国民党，向来是不敢发动群众的，如此一般，抗日必将沦为片面抗战，哪还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可言呢？

总之，宋江的那种投降招安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最后是自己的军事力量被消灭以后，国民党再腾出手来彻底消灭你一切力量。

所以，任何涉及战略、战术、行动方针、抗日办法等等关系到八路军命运前途的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独立自主。

一旦右倾，把自己沦为国民党的尾巴或者附庸，那就会彻底走向失败。

宋江的投降、招安政策，必将使自己走向覆灭，那么最终抗日也要走向失败。

第三：是敌后还是正面。

如果是正面，那就是直接上前线同日本人打仗；

如果是敌后，那就是在日本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小城镇、小县城里去创建根据地，发展抗日力量，发展八路军的力量。

中国面积广阔，日本如果仅凭军事力量，想要完全占领中国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而共产党扎根于农村，最后也可以形成苏区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把日本牢牢托在战争泥潭里，牢牢钉在根据地的包围圈中。

这样持续下去，此消彼长，最终我方的力量会逐渐强于敌人，才能在持久战中取得胜利。

相反，认为要打正面战场的，本质上还是没有看到战争的持久性，没有看到全民抗战，而是只看到了单纯的军事力量的抗战。

以上三点，是洛川会议争议的三个重要的点。

应该说，这三点的争议，其实本质上是对抗日战争怎么打而发出的种种争议。

只要认识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全民抗战，合作关系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原则之上这三点，那么你就会认同毛泽东的观点。

反之，如果你没有意识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全民抗战，没有意识到独立自主在合作关系之中的重要性，那么你就会持同毛泽东相反的观点。

第三篇，《反对自由主义》

这篇文章很经典，文中例举了十一种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我觉得有必要把原文的这十一种自由主义的表现摘抄过来一下，欢迎大家对号入座：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
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

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反对自由主义》

以上是原文，接着我们来聊一聊这篇文章所能解读的一些内容：

首先，我们都知道，思想决定行动，也就是说以上例举的十一种自由主义的表现，其实背后必然有一种支持自由主义的思想。

这也是一种方法论，即从一个人的行动之中，去判断产生这种行动背后的思想根源，找出这种思想根源，就找到了行动的依据，能帮助预判这种思想可能产生的种种行动。

放到具体的人身上，只要看清了这个人的思想，其实也就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人有可能干出些啥事。

生活里所谓的识人、观人的本领，其背后的本质，无外乎认清了这个人的思想，因此就能大致判断此人的种种行为、品格、举动等等。

这篇《毛选》文里，对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行为背后的思想作出一个剖析：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反对自由主义》

这句话的含义，包含了一种方法，就是如何识别思想的方法。

我们上面说，要预判一个人的行动，行为等等，就要找出其思想根源，那么这个思想根源在哪里？

首先，思想诞生于社会物质基础之中，而在阶级社会里，我们所有的人都处在一定的阶级当中，那么由此去看，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

因此，我们看待一个人的思想，首先会从这个人的阶级身份去看。

处于什么样的阶级，其思想就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

当然，这只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任何个体又具有特殊性，需要综合分析。

其次，这篇文章讲到了自由，原本自由是人类都追求实现的目的，那为什么这个自由主义又作为一种主义被批判呢？

这里我们就需要对自由有一个认识。

《共产党宣言》里这样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们之前无数次强调过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待一切事物，这里就用到这个观点去解释。

如何解释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这里，要先说一件我自己家的小事，以前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家里就开始做小本生意，做了几年，生活还算勉强过得去了。可是我爹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叔家，生活就几乎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家里孩子都快没钱上学的那种情况。

然后我妈就讲，一定要想办法帮他，但是也不能直接借钱给他，因为借出去就等于打水漂了，而且这不是个持久的事，最后搞不好还惹出怨气来。

因此，就说要把他扶起来也做点小本生意，总之，要让他把日子过下去。

因此，就帮他找铺面，找可以批发的货源，找客户，告诉他方法，还借了他最初进货用的钱。

几乎是用自己的资源给他整了个现成的生意去做。

但是啊，我那个小叔，是一个特别不懂感恩，也很自私的人，从来不领情，还总觉得我妈是义务帮他的，有时候甚至还会因为一点小事埋怨我家里人。

那时候我已经读高中了，我有时候就会感觉愤愤不平，我说为啥要那么帮他？他既然都不领情，又何苦浪费精力去帮他们呢？

我妈说的理由是：“不管他领不领情都要帮他，他是你爸最亲的兄弟，和我们是一家人，如果他混不下去了，那他的三个孩子，你爸要不要帮他负担起来？他在外面不务正业，惹出什么事来，会不会把麻烦带到我们家来？”

如果他没有出路，实际上我们家的麻烦就会成倍增加，我们家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我妈的原话大致如此，讲真，以前读书的时候，其实感受不到，现在想想，我妈真的可以说很有智慧了。

她本人小学文化，可是直到今天，有时候我依然觉得我妈的思维里充满了辩证法。

她讲的道理很朴素，但是又很真实，如果我小叔最后不务正业，连家都养不活了，那他那三个孩子，我把肯定不可能放任不管啊，那万一到了那个时候，我爸妈就得承担他们三兄妹，和我家两兄弟的抚养，这简直可以把一个家庭完全拖垮。

更何况，确确实实的，一个人一旦不务正业，必然会惹出诸多是非，那时候我把是他的亲哥哥，这事你管还是不管？最后是不是又要承担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所以，只有我小叔家能过好，能维持家庭生活，能有个持续正经的工作，我家才能真的安宁。

现在那些所谓的扶弟魔，背后原理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家庭里，有一个存在大问题，那么这个家庭，甚至两个家庭都会遭殃。

如果要用自由二字去解释，那我家的那种情况就可以解释为：我小叔家不能获得自由，那我家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所以，只从家庭来看，这里面其实就已经包含了那句话的含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把这个原则放到全社会上：不管你资产阶级过的多么优越，拥有多么良好的条件，但是只要这个社会在存在着不自由的无产阶级，整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的自由。

而如果这种不自由的矛盾会持续发展，那迟早有一天，无产阶级会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所以，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个相对的概念，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

直到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自由了，这里面每人才可能真正的自由。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甚至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终极目标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不自由，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思想上的问题，有制度上的问题，有社会形态的问题等等，太多了。

但是究其本质，只要这个剥削关系还存在，这个固有矛盾还在发展，那这个不自由就永远存在，按照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还会不断的扩大。

所以原文《反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主义，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这跟当时的无产阶级思想是不兼容的，无产阶级思想则强调集体主义，即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之间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

在那个形态里，当所有人都能摒弃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的时候，其实最后所有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这就是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的立足点和来源。

第四篇，《国共合作成立以后的迫切任务》

读《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一、背景

在第一卷末尾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着重讲了民主，也就是发动全体人民起来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随后到了第二卷开篇的前两篇文章《反对日本进攻的办法》、《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这十大纲领的根本切入点是两个：

- 一个是改革政府机构，实现发动群众的作用。
- 一个是改革军队，实现建设人民军队的目的。

然而，要实现这两个基本任务，不是你主观愿望想要实现就能实现的，国民党内部面临着一系列内在的矛盾。

这种内在矛盾表现在两个根本的方面：

其一：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立场，决定了它不敢、也不可能完全的发动群众，因为这会严重触动到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

一旦发动群众起来，群众又是要民主、又是要自由、又要免除高利贷、又要废除苛捐杂税等等，这就让老蒋集团很难办了，可以说他根本就办不了。

其二：封建军阀性质的军队，军队私有的特点，别说实现官兵平等、党指挥枪，就算是想要完全地把地方军阀统一，那都是一件千难万难的事。

老蒋在红军长征时期，可谓是绞尽脑汁、使劲浑身解数，除了完完全全搞定一个王家烈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完全搞定。

甚至搞定的王家烈，实际上也不过是在贵州换了一个所谓的“自己人”，但是这个自己人一旦到了贵州，还是会想办法割据，对抗，王家烈最开始不就是老蒋提拔起来的自己人吗？

所以，国民党内部在军队问题上的矛盾，又规定了老蒋想要实现军队改革，同样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当全国范围内的主要矛盾，变成了民族矛盾，也就是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其他的各种矛盾，包括两党的矛盾，就会被弱化，于是有了我们看到了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否能够巩固，是否能稳定发展，是否能爆发出其强大的威力，是否能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里面的关键点就在于十大纲领是否能够贯彻。

这十大纲领的本质，就是**发动群众，改革军队**。

为了使得国民党也能深入贯彻十大纲领，于是就有了这篇《国共合作成立以后的迫切任务》

所谓的迫切任务，就是以上两项：

发动群众

改革军队

二、舆论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声音，什么声音呢？

就是说你们两党不过是迫于某种压力，搭伙过日子罢了，根本不是精诚合作。

说这个话的人也有两类：

第一类，他们真的只是以为事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当时的合作，除了停战、改变了红军名称（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外，毫无实质上的合作形式。

包括我们自己队伍里，也有这种议论，其中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人强调要把队伍开到前线去，而不是蜗居在敌后。

后来过了一年，又以回国的王明为代表，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这类人没有看到停战已经是伟大的意义，它获得了两军的和平，增添了国人的信心，为号召和发动群众奠定了最重要的根基。

第二类，则是别有居心的人，他们是妄图使八路军全部调归国民党指挥，或者把他们开到前线去同日本人血拼而尽。

所以他们总说，现在合作太虚了，只有八路军开到前线，才是实打实的合作。

为了纠正第一类人的右倾思想，为了打消第二类人的阴谋计划，而且也切切实实的需要巩固真正的统一战线，所以毛泽东写了《国共合作成立以后的迫切任务》。

就是要告诉大家，只有发动群众、改革军队，才是抗日统一战线最伟大的前途，才能切实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而做到这两点，就是要尽快的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三、

三民主义

这篇文章写得十分高明，所谓“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最高境界尽显其中。

它要求国民党尽快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没有让其按照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去实现，而是完完全全的用到了三民主义的理论。

所谓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然而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拯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前的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究竟是根据什么理由一定不肯实行这个遗嘱？谁也明白，统制、镇压，是和“唤起民众”的原则相违背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文中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一个事，我们现在要求搞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最本质的一条就是“唤醒民众”，不过我们叫“发动群众”而已。

是什么理由让你们不敢这样做呢？你们自己不实行三民主义，难道此刻我们帮你们指出来了，你们还不愿意实行吗？

这好歹是你们的信仰，我们都替你们着急，你们却一点不着急？

这一点，在这次全国抗疫中，或许所有的人才真真实实能感受到这种全民力量的伟大，才能更加感受到这种《毛选》中所说，只有人民的战争，才是制胜的法宝的切实含义，而不是抽象的理解。也更能明白，为什么说单纯的政府抗战、军队抗战，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这句话的切实含义。

这篇文章现在读来，我们没处在那个历史环境中，感受不到这种杀伤力和号召力，但是我们一旦尝试代入那个历史，就会发现这种文章对国民党的杀伤力，对群众的号召力，对团结国民党中愿意真诚抗日，打击国民党中还存在的那种妥协力量，是具有非常大的能量的。

对于改造军队的问题，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个抗战，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虽然是全国性的，却还限制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我们早已指出，这样的抗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现在的军队都在执行抗战的任务，我们对于所有这样的军队，特别是在前线抗战的军队，都是具有钦敬之忱的。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制度不适宜于执行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不适宜于顺利地执行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必须加以改变，这在三个月来的抗战教训中已经证明了。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是基本上违反这两个原则的。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因此旧制度应该迅速地开始改造。不是说把仗停下来改造了制度再打，一面打仗一面就可以改变制度。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那么，军队方面要如何改造呢？

这篇文章也给了老蒋一个很好的操作手册，也就是建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个经验，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你看，文章不仅仅指出了问题，还给了方法，这你要不去做，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以上是文章解读。

因为部分读者不是按照顺序来，会跳跃性读，所以文末再补充一下一个疑问，就是毛泽东明知道蒋介石内部矛盾不可调和，不可能按照这个来，为什么还要去写，去宣传？

之前的文章已经说了，这里简单总结一下：

- 第一，表明我方的立场和态度，宣传我方的主张；也统一我们自己内部的思想；
- 第二，将全国真诚抗日的各界群众、力量，尤其是持有同我方同样主张的各界力量，按照这个主张团结组织起来；
- 第三，打击国民党内部那种妥协投降派，呼吁抗战派起来，真正的实现民族统一战线；

第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稳固。

第五篇，《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一、

我们读第二卷的所有文章，始终绕不开两个主要核心问题：一个是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展开两党合作的问题。

应该说第二卷的文章皆是围绕这两个根本主题展开，只要我们在读之前，把这两个主题带进去，很多看不明白的地方也就看明白了。

此文《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是一篇采访文，毛泽东回答了当时针对两党合作，以及如何抗日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爆发后，干了些什么？

答：

1，在战争前就指出了抗日战争不可避免，要早做准备，任何同日本搞“和平妥协”的言论都要指出其危害。

2，号召统一战线

3，动员人民群众

4，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问：抗日三个多月以后，取得了哪些成绩和教训？

答：

成绩很大，教训也不少。

成绩：

1，地域上实现了全国革命战争，全国抗日战争

2，国共实现了放弃内战，团结合作，地方军阀也实现了空前的一致对外。

3，唤起了舆论同情

4，给了日寇很大消耗，以前占领东三省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那现在每占领一个城市，都必须付出极大代价。

5，从战争中取得了抗战的经验。

教训：

政治上，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现在虽然是全面战争，但是这种全面抗战是集中在单纯政策抗战，这样是绝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的。

军事上，还没有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改革。

总结说，就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没有被认真实行。

因此就出现了现象层面的，节节抵抗，节节失败，军事上我们叫做“单纯防御”，而不是积极防御。

问：那如何动员民众实现全民抗战？如何改革军队？

答：政治上：

1，改组政府，让人民代表有资格提出建议，参加统一战线。

2，允许出版集会，言论自由，武装抵抗自由。

3，改善人民生活，废除苛捐杂税。

4，改善官兵待遇，有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5，救济灾民等等，总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6，改革文化教育，外交等政策

7，严惩汉奸

（这个我们上面分析过，这些政策，其实就是十大纲领的政策，倒不是老蒋不认可，而是一旦实施会触碰到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老蒋怎么改也改不起来）

军事上：

1，战略战术上放弃单纯防御，改为积极防御

2，改以前的强迫军人参军，为鼓动军人参军

3，统一指挥

4，运用人民支持之下的游击战争，主力要布置在侧后，打迂回的游击战，而不是正面硬扛。

问：共产党如何让这个纲领实施起来：

答：

一方面，号召国民党实行；（不过这很困难）

另一方面，他们不实行，我们实行，并且要依靠这种策略，逐渐发展强大，形成敌后巨大的抗日力量。（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是那么说的，也是完全那么做的）

问：八路军的情形？

答：

战斗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虽然微小，但都是胜利。

战略战术上，我们主要采取敌军侧翼和后方的作战，这种作战比正面单纯防御要好得多。

主要在于其：能独立自主的攻击敌人，还能保存自己的力量。

（说明一下，当时国民党舆论攻击我党很强烈，意思就是说国军都在正面硬抗，付出巨大牺牲，而红军只会躲在后面搞点偷袭，破坏等工作，不是真心抗日，这话说多了以后，就连我们自己内部，也有人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偷懒，不愿干活的感觉）。

但是毛泽东说得很明确，抗日不是比谁牺牲大，谁死得多，而是比在相对力量下，谁击毙的敌人多，也就是说比的是资源的利用率，军队的利用率，从战略上比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这一点，他毫不晦言。

八路军在战术上，主要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第一要义，是一句话：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在政治上：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对人民秋毫无犯的军事纪律。

瓦解敌军，宽待俘虏。

问：这种政策是否适用于其他军队（指国民党军）

答：完全适用。（哈哈，绝不双标）

问：对日本人采取宽待俘虏的政策有用吗？比如，你把俘虏的日军放回去以后，日军将其全部杀了，你怎么瓦解对方军心？

答：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在已公开声称要对八路军释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依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虏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予宽大处理，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

有些不愿意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持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释放和平空气，其目的何在？

答：

- 1，巩固已得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出发地。
- 2，分裂抗日阵线
- 3，拆散援助中国的阵线

危险在于，有部分动摇分子会上了日本和平烟幕的当，会妥协投降。

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

- 1，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
- 2，投降主义的根源在于悲观主义，民族失败主义，认为中国打了败仗，就再也无力抗日，于是只能选择投降。

悲观主义者的问题就在于：无法从我国的失败中看到胜利的因素，又无法从日本的胜利中看到失败的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向全国同胞指出抗战胜利的前途，才能根源上避免失败主义，投降主义。

问：民主制度中的“民主集中”不矛盾吗？

不矛盾，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人民自由的支持政府，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是民主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只要不违背民意的基本方针，又需要有集中的一面，才能在具体的执行时候畅通无阻。

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意义。

问：那么你们准备经过怎样的步骤，实现这些新的政治、军事的改革呢？

关键在于两党合作。（这里，其实毛泽东知道，根本就实现不了，我们上篇文章说过，这是蒋介石内部矛盾决定了的，是不已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独立自主就派上用场了，如果实现把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希望，完全放在国民党改革上，那就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虽然倡导国共合作，一起实现，但是我们首先就是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去实现，自己朝着这种目标去努力，将来能一起朝同一个方向衍变固然好，如果不能，那么我们通过独立自主的奋斗，我们将来也能承担起历史赋予八路军，赋予共产党的任务，因为我们是团结的人民大多数，我们要实现的，是联合全民族一起实现的历史抗日的伟大任务）

第六篇，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一、

这篇文章，其核心在于批判和预防党内已经衍生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

七七事变以后，到上海、太原失陷，时间已经过去了 4 个多月，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变化，党内的主要危险由一开始的左倾关门主义，开始衍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很巧的事情是，现在这批持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人，几乎同原来搞左倾关门主义的是同一批人。

其实历史上很多时候都是如此，左的不行的人，换一个环境就可能右得不行，本质上还是缺乏实事求是分析能力的一种体现。

思想、理论、策略完全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左右，无法把外部因素剥离开，看清楚当前问题的实质，所以他们往往忽左忽右。

一开始的左倾关门主义者，因为国民党还没有发表抗日宣言，也没有真正开始抗日，所以他们始终无法看清国民党在中日民族矛盾中，同样会起来抗日的基本事实。

等到后来抗日战争打了 4 个多月，国民党已经起来打响了抗日战争，他们又开始了朝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

这种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比如听从国民党对政治部门的改编，甚至取消政委的意见，表示愿意服从国民党的指挥，只要是是打日本人等等。

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力量实在太小，打辅助都觉得不够，就不要整天“指手画脚”的给国民党提意见，一会儿是全民抗战，一会儿是改革军队，搞得好像你才是抗日主力战场一样。

这种意见，以章乃器为代表，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

这两种右倾机会主义，可以用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来回答：

“到底是谁指挥谁？谁领导谁？”

问这个问题过分吗？其实不过分。

名义上，此时的红军已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头上戴的不是红军的八角帽，而是国民党军的青天白日徽。

看上去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

可是，实质呢？确是违背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这里主要说说第二种倾向，即“少号召，多建议”。

他们的这种思想来源于哪里？如果用在个人身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些自卑，觉得自己不配号召国民党，而最多只是“建议”人家就可以了。

毕竟你自己那么弱，又是打的敌后战场，主要在农村根据地，还打的都是讨巧的游击战，所以怎么看觉得怎么自卑。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少号召，多建议”的说法。

这种思想，本质上就是不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们前面说了，我们号召除了是要给蒋介石听，给他团队里的抗日坚决分子听，以扩大抗日整体的力量。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说给全国人民听，借以能够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动员坚决抗战的那些力量团结到我们的领导之下。

这才是我们号召的目的，这不是对国民党指指点点，而是深刻、全面的表达自己的主张。

有了这种主张，坚持独立自主，才保有现在根据地的条件下，发展根据地，发展八路军力量，发展抗日力量，动员全民起来抗日，这才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办法。

自己力量不强大起来，如何实现最终抗日的胜利呢？4个月，华北、上海、山西等重要城市的相继失落，不是正好证明了单纯的片面抗战没有前途吗？

如果只是从眼下的力量去对比，就有陷入悲观、妥协、投降的危险，这种投降指的是投降国民党，一切听从国民党的指挥。

这就是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错误根源。

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刚巧又碰上了后来王明因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领导，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而给党内带来了严重危机，这是后面我们要交待的事情了。

于是才有了“谁领导谁”的尖锐的问题：

这个问题，文章并没有明确回答，而是用一句话去说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也就是说，不存在谁领导谁，谁服从谁，谁吸引谁，谁命令谁的问题，一切都是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互帮互助、互相增援，互相赞助，共同以自己的方式，去展开抗日战争。

因为我党的整体力量是很弱的，所以为了更好的践行抗日责任，有必要尽快扩展八路军力量，争取在半年到一年内，组织起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左右的红军。这样，就有了共产党的军事基础，这是有利于抗日，也有利于独立自主的。

毛泽东以上的这些观点和决策，在一年之后，实际上是超预期完成了的，八路军的发展速度和党员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他的原本的估计，但是整体上全是按照现在的策略衍变的。

二、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还作了一种估计：

除了阶级对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即我党内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外，还有一种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这个投降主义指的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一位的追求和平，减少自己的财产损失，因为对于日军的侵略，往往持投降态度。

而日本呢，又正好借这些人，来维持占领区的统治，因为各种和平招降的诡计也层出不穷，就出现了所谓的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也就是中华民资对日本的投降。

这种估计，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直到后来出现了“汪精卫政权”，于是大家才纷纷意识到，原来当初毛泽东的估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一系列的文章，一切都以独立自主，（即国共合作的基本政策），和如何抗日两个主题展开。

这篇讲的的独立自主，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接着的文章侧重点就在于分析具体的红军提出的战略战术，即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具体打法了，这又涉及战略战术的问题了。

下一篇我们再继续读。

第七篇，《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这是一篇体现“以斗争求团结”的文章。

我们说，以斗争求团结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此前说到的八路军军事指挥权、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八路军的政治建设、八路军的行政结构等等，这些是原则性的东西，是需要不惜一切斗争手段，都要维护和保存的，不如此，则独立自主四个字无从谈起。

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方面，实际上还有比较小的。

这篇文章，就是在比较小的方面的一种斗争形式，以布告的形式出现而已。

这些比较小的斗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比如：

之前红军已经分好的土地，现在国共合作了，原来那些被分了土地的地主，就带着民团回来想要重新拿回他们以前的土地。

从前废除的债务，地主阶级要重新以原来的规则继续履行。

国民党开始往共产党区域里派间谍、特务等等。

破坏民主制度，也就是在一些国共边界地区，禁止共产党实行的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

煽动地方土匪、带领民团哗变。

秘密到我军内部调查、收集情报、信息、测绘地图等等。

这些行为，集中体现在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所以为了对付这些局部出现的破坏活动，毛泽东草拟了这个布告，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这是《毛选》中一篇很短小的文章，但是表现出的是当时斗争的复杂性，用一句话说：“**斗争无处不在**”。

说到这里，我们值得聊一聊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次合作中，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暗探、间谍、特务打入我们内部。

以往在苏区早期的时候，为了打特务、打中间派、打叛变分子等等，衍生出了肃反那样的历史性悲剧事件。

当然，那时候还伴随着地方宗派主义等等情况。

但是总体上讲，后来在肃清潜藏的特务、反革命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恶性事件，没有发展成“肃反”那样的悲剧性事件呢？

原因总结起来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了，阶级矛盾被民族矛盾所掩盖，也就是抗日成为全国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成为次要矛盾，这是客观环境方面。

客观环境是内部的和平成为主题，斗争是以局部的方式展开，整体上是和平，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剿共不存在了。

因此共产党内部的大规模的叛变、反水行为大大弱化了。

另一方面，就是共产党成熟了，这种成熟体现在处理复杂局面的思想、策略方面。

从毛泽东刚到延安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遏制住了在肃反中的泛滥、扩大化局面。

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件事，被程序、规范的开展起来。

核心的领导开始逐渐形成，斗争思想开始成熟。

这些特点，在后来处理皖南事变，打退若干次的反共高潮等事件上，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后续的文章中，我们还会一一解读到关于处理这种复杂局面，以及如何实现“以斗争求团结”的艺术策略。

接下来，是我们要读的长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第八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

这篇文章，我们要重新讲一下战略战术的问题。

大家可能说，我们之前在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时候，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讲，但凡还有一点值得挖掘的东西，我们就要尽可能的把它挖掘干净。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之前我们讲什么是战略眼光？

答案是：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世界，看待一切事物的发展，就是战略眼光。

当你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世界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一个全局，而不是一点或者一面，不是一刻或者一时。

当你对某件具体事物可以全盘在胸，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来的？可能发展到何处去？

那么你就具有了战略眼光。

这一点，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强调，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实在是太重要了，现在网上诸多“科学思维”、“成功思维”、“富人思维”、“提升思维”，都不可能绕出战略思维的范畴，都是由联系和运动的根本点衍变发展而来。

只不过在资本市场环境的背景之下，这些所谓的这样思维，那样思维，被包装的变了味道，成了一些很片面的东西，一股浓厚的成功学味道泛滥得让人反感。

比如，有一个知乎上点赞很高的“富人思维”，说的是富人做任何事，不是等什么都准备好了才去做，而是想好了要做什么，然后拼命去准备这些东西。

这个思维，其实就是我们战略思维的一个演变，你要用联系的观点去看事物，就必须看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各种矛盾关系，看到事物的方方面面，看到这些以后，你才能确定它的发展需要什么外部条件，确定了外部条件，你才可以估计是否有可能创造，需要哪些资源才能创造出这些条件？

有这样的可能性，然后我们才会发挥个人主观能动，去创造这些条件，然后促成事物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结果去发展。

我们有了这样的理解，那么就可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偏右的保守，啥也不敢干；另外一种是偏左的冒进，机会主义的盲干。

如果你没理解透，只是听了一句，啥事不要等都准备好了再去干，然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莽莽撞撞的去干了，那就可能遭受极大的失败和风险。

反之，如果真的是要等什么都成熟了再去干，那可能经常会错失很多机会。

所以，科学的原理是什么，就是分析清楚事物的矛盾，我们就说特点吧，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干这件事需要哪些条件，然后再确定现在是否时机已经成熟，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然后才去创造条件，最后才把事情尽可能的按照自己想的那样去办成。

即避免了左的冒进，又避免了右的保守。

这其实就是战略思维的一个表现形式嘛，对不对。

我们只有对这些思维背后的原理搞清楚了，才能真的运用到生活实际的。

否则，很多理论容易陷入片面或者局部当中，别人可以用，但是你用起来，就发现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理论，都是别人的个人经验总结，大家实际情况不同，因此也就很难具体被应用。

只有把很多原理背后的思想，理论搞清楚，成一个系统的东西，你才能针对实际情况作出更好的反应。

大家有时间可以把之前我们解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拿出来一起读，配合第二卷的《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下一篇解读文《论持久战》一起读。

这三篇基本已经把战略战术的思想理论问题讲透了，再也没有能超出这个范畴和界限的理论了，大家读完以后，多对照自己实际生活，拿去分析实际生活，帮助实际生活，想来也是颇有现实益处的。

好了，我们开始提出这篇“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一个基本观点：
“针对一切事物制定的战略战术，都是由事物的根本特点发生的”

也就是说，战略眼光，我们说是联系和运动的眼光去看问题，然后就有了战略眼光。

但是，你针对具体事物，作出的战略计划，战术计划，却都是由这件事物的根本特点决定的。

也就是说，流程是这样的：你用联系和运动的眼光去观察一个具体事物，然后你就看到了具体事物的矛盾，具体事物与周围事物之间的矛盾，看到了这些矛盾，你就能清楚事物的特点，再然后，一切的战略战术计划，就由这些基本特点衍变发生出来了。

所以，任何战略战术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任何事物的矛盾、特点都有其特殊性，你必须根据具体事物的特点来制定战略战术计划。

当然了，有很多事物因为所处环境、以及特点很类似，所以也会用到同样的战略战术，比如不同根据地的红军，虽然处于不同的根据地，但是却有很多基本特点，所以他们往往使用共同的战略方针，只不过根据地域不同的特殊性，往往有一些局部的差异。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分析事物的流程，不是先有战略战术计划，而是先分析出了事物特点，然后根据事物的特点去制定战略战术计划。

这个顺序错不得。

为什么错不得，因为你要要是搞错了这个顺序，那么就容易陷入抽象的教条主义，就容易丢掉实事求是的原则。

就不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一切从概念（也就是别人总结的某些战略战术原则）出发了。

所以，再强调一遍，我们制定任何战略战术性质的计划，顺序决不能错，首先是分析具体事物的特点，然后再根据这些特点，运用思想、理论工具去制定计划，决不能反着来，先有一个计划，然后拿着这个计划去胡乱套用。

我们先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为例：

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如何确定主要矛盾，可以回顾一下矛盾论的解读）

那么，针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必须由这个矛盾的双方的基本特点决定。

这里说的是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而后面《论持久战》就是整个中日矛盾中，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篇文章只是把游击战单独拿出来分析和制定计划，我们先从这篇开始，后面就更好理解《论持久战》。

分析中日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先搞清楚矛盾着的双方的各种情况。

此文分析：

中方：

- 1，是一个大国
- 2，是一个弱国
- 3，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攻击

4，是一个处于进步之中的国家（这个进步性，后面论持久战我们再专门讲解，进步的含义是什么？）

5，战场在中国

日方：

1，是一个小国

2，是一个强国

3，是一个处于落后时代的国家（这里的进步和落后，不是我们常识理解的科技、工业，指的是社会意义上的，这里不多做说明，留在持久战那一章吧）

4，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

这是矛盾着的双方的基本情况，由这些基本情况可以得出这次战争的一些基本特点：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里说的几个特点，就是根据我方是大而弱，但是处于进步时代的国家，而且战场是在中国，日本虽然强但是小，又是侵略进入别人的国家等双方的具体情况。由这些具体情况，决定了战争具有长期性；日军占领区会有很多空虚的地方；日军每占一地，皆要派兵防守，兵力会逐渐衰竭；双方会处于内外线的交替作战等等特点。

由这些特点，因此才有了我们的战略战术问题，也就是说，此文的所有战略战术，是根据矛盾着的双方，也就是日方和中方的基本情况确定的。

而不是从哪本《战争论》、《孙子兵法》中找来套用的，是先有了这些基本特点，才有了针对基本特点制定出来的战略战术。

那么，为什么游击战争会有一个战略问题呢？

原文作了回答：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当然不仅仅只有游击战一种类型，但是因为以上的特点，所以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层面的高度，因此才有了必须要把它的战略战术研究清楚的必要。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篇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先聊那么多，下一篇，我们根据游击战的实际战略问题，再解读一些新的方法论。

这篇文章，着重强调的就是一点：一切战略战术计划，是由事物基本特点衍变发生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制定任何计划，都是先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再根据情况制定计划。

之前，我们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蒋介石学不了，就是因为两者具体情况不同，所以套用不了。

就比如其中的一点，游击战需要密切配合当地群众，就单单这一点，老蒋的阶级立场摆在那里，你就做不到啊，所以他的战略你就没法套用。

我们学《毛选》，并不是我们要去打游击战，要去闹革命，要去搞群众运动，时代不一样了嘛，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战略战术背后的原理，就能避免很多弯路，就能把一些理不清楚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最后才能把很多思想用于指导实践。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二）

一、

此文第二章说到一个战争的基本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即：“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其实，这个原则，即使是不懂战争的人，只要稍微思考一下，也能够想明白。

由着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由此衍变出来的其他军事原则。

比如：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

“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每仗必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

“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这些话，都是《毛选》里，或者相关语录文集里，最常见的军事指挥原则，但是我们只要稍微深挖一下，就会发现，所有的原则本质都符合军事的基本原则，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也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样的军事原则，战略战术，其实最终目的就是朝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标前进。

道理并不难理解，可是真正执行起来，很多人却未必做得到。

可能有的人会想，那么简单的原则，即使是我这个没学过军事，完全不懂打仗，更没有经历过战乱年代的人都能想明白的事，有谁做不到呢？

可是偏偏就有很多人做不到。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集团军，就根本上违背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原则。

实际上，也就是违背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

抗日战争初期，虽然国民党军队也一致抗日，可是打的很多都是阵地战，要么损兵折将，要么一溃千里。

仔细想想，一样是违背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根本原则的。

如果你觉得老蒋愚蠢，那么请思考一下生活里的自己。

在我们现实生活环境里，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都必不可少的要跟人合作，谈判，交易等等，即使你的工作，是属于行政、后勤一类，甚至哪怕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但是你总是要跟人打交道的吧？

人的社会性，很多时候就表现在与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个问题上。

只要提到人与人之间合作，打交道，那么往往遵循一些基本原则，比如：**互利共赢**。

当然，如果层面再宽一些，那么我们把我国外交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拿出来，修改一下，也很适用人与人之间合作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个大家自己可以修改，总结，发展一下，看看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关系等等，是否遵守这样的一些原则。

就拿互利共赢来讲，它应该算是我们很多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合作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了。

可是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他们在做抉择的时候，在判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是否会先想想这个抉择，这么做，是否符合互利共赢的原则呢？

很多人嘴上也喜欢说，甚至心底也很认可互利共赢，可是做起来往往遭遇诸般困难。

从客观上来讲，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如果说社会风气上，全是唯利是图、自私自利、完全以个人利益为中心，那么就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从主观上讲，你至少得有这样的一些原则作为自己行为处事的行动指南，作为培养自己价值观的一些基本准则，一个人能换位思考，考虑自己的同时，也一定会考虑到对方的利益，有了这种主观意识，才有可能互利共赢嘛。

所以啊，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原则，有时候实施起来却又很难。

蒋介石当时践行不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也有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

从主观意识上来讲，是其战略眼光，战术指挥能力的问题，他以为只要把解放军驱逐出去，把解放军的根据地，尤其是城市的根据地全面占领，那么解放军就会变成流寇，自然而然也就失败了，毕竟历史上从来没有流寇成功的案例出现。

可是，他偏偏就忽略了，共产党在广大乡村中，那种超强的运动能力，那种依托于人民之中，独立自主开展战争的能力。

总之一句话：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别人，于是有了一系列以抢占解放区，尤其是城市解放区的战略战术计划，最后军事上走入死角。

从客观上讲：国民党不具备持久作战的能力，老蒋自己也很清楚，国民党内部矛盾非常剧烈，各军阀之间的分裂，经济上的矛盾，内部贪腐，各自为政，军队战斗力低下等等。

所以，他想借着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尽快解决战斗，也可以理解。

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你总是违背了军事上的基本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以不管你怎麽想，客观规律总是不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要讨论老蒋集团失败的原因，这种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以前大致也讲过，到了第四卷我们还会专门总结。

这里只是围绕着一个话题，即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和困难性。

所谓重要性，指的是很多事情往往都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因为它总是遵循着某种客观规律，而原则就是客观规律的理论经验方面的总结。

由一些基本原则，往往可以衍变发展出各种具体实施中可能会用到的原则，只有把握了基本原则，才有可能把握好具体原则。

也就是说，只有把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你才能保证在处理实际事物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方向跑不偏，不犯严重机会主义错误。

这是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而基本原则的困难性：指的是很多原则受制于主客观条件的约束，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实施起来往往异常困难。

但是不管如何困难，只要你思考问题的方向，围绕着基本原则不变，那么你就不会迷失方向，否则你的人生一定是抽满了投机、冒险、保守等等机会主义错误。

聊到这里，我们说几个《毛选》里的基本原则吧。

比如最基本的三个：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这三个原则是最最基本的原则，不管你的什么理论，什么逻辑，什么闭环，什么道理，你一定要思考一下是否违背了这三个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违背了，你就要思考一下是否是哪里出现了严重的理论漏洞，但是你没有发现。

当然，这三个原则，只是对于共产党提出的基本原则，但是其实它们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甚至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然不必说了，拿群众路线来说，本质上不脱离群众路线，就是不脱离社会实际，因为群众是构成社会实际最基础的基础嘛。

只要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学会这样去思考：

它是否符合独立自主的原则？它是否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如果符合，是哪里符合？如果不符？又是哪里不符？

长此以往，我们才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行动指南，形成自己的处事方针，才会成为一个比较有原则的人。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三）

一、战略和战术

战略研究的是事物的全局，这个全局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空间意义上的，即事物本身，以及全局之中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各种矛盾关系，另一个是时间意义上的，即事物发展周期的整个过程。

我们所说的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看事物的全局，也可以说是从空间和时间上去看待事物的。

而战术研究的是局部，是构成整个战略规划的其中一个部分。

当然，我们单独去看局部的时候，其实局部本身也是一个整体，也有它自己的全局和局部，因此也有它自己的战略战术，只不过这个全局和局部，隶属于那个总体的、更大的全局而已。

我们之前说，一切的战略战术计划，都要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去制定，根据这种特点，就有了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由于敌强我弱，所以从整个战争全局去看，我们在战略上必然首先处于防御的地位，而不是进攻的地位。

时间上，我们只能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作战线上，我们是处于被包围的内线作战，敌人是包围我们的外线作战。

这是从整个全局上来看。

但是，当我们至于局部去看，则必须执行局部战役的主动进攻作战，战役或战斗上的速决战，以及包围敌人，而不是被包围的外线作战。

为什么战役上不能持久、不能单纯防御、不能内线作战。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战斗上的速决、战斗中的进攻、战斗中的包围敌人（外线作战），那就无法保证战略上能持久、能防御、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也即是说：战役或战斗上的速决、进攻、包围，是保证战略得以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这几个特点去看？要实现最终的战略目的，是有必须的条件的。

我们的战略目的很简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

要实现这样的战略目的，就要辅以相应的战略计划，而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计划，就必须得创造一定的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敌强我弱，决定了战略的持久。但是，持久战就一定能胜利吗？那不一定。如果你越大越弱，越大越小，越大越无力，最后不管你多持久，也必然走向消亡。

所以，持久战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就是在持久的过程中，你必须越来越强，而敌人应该要越来越弱，由此发展下去，此长彼消，则随着时间线上的推进，我们的战略目的就必然能够实现。

所以，这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持久战是万能的，没有一个此长彼消的条件，则持久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客观上，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条件呢？有的。

中华民族民众正在觉醒，群众正在从无组织状态，被共产党逐渐的组织起来，抗日的力量正在从单纯片面走向全民抗日，从世界上看，反法西斯的力量开始逐步走向强大。

这些证据都在表明一件事：我方正在持续的增长、变强，所以持久战就有了伟大的意义。

其次，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而日本地域狭小、兵力虽强却少，又极难补充，而且他们还是侵入他国。

这就从客观上有了打持久战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使日本动用全部兵力，他也无法完全占领中国，这就给持久战创立了条件。

因为，如果我们地域狭小，虽然处于此长彼消的过程中，但是你还没涨起来，就被别人给灭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有了中国地域辽阔的客观条件，这又保障了持久战的进行。

上面的条件是客观上的，但是客观的东西往往需要主观力量再加以推动，促进和发展，否则持久战也无法继续。

什么是主观上的条件呢？

就是战役或者战斗上发挥主观能动性。

只有在局部战役中不断地打胜仗、不断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断的包围敌人有所缴获、不断的以进攻来达到防御的目的，最后才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持久战能顺利进行。

没有这种主观上的努力，没有这种主观上的斗争，那就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最终事物就会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很可能走向失败。

因此，分析出持久战所需要的客观条件，使得人们有信心能够战胜敌人；另一方面，指出主观上我们可以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使得我们促进战争朝着我们预想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矛盾的分析。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战略上的持久和战役上的速决，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上的进攻，战略

上的内线和战役上的外线。

这就是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

总结一下吧：

战略的制定，需要根据事物的实际特点出发。

战略计划能否实现，既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也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而战役就是从主观条件上保证战略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二、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这个主动性，我们倒不是第一次提了，不管是在公众号还是在知识星球，我们都在不断的强调主动性的重要意义。

物理学上有个熵增原理：指孤立热力学系统的熵不减少，总是增大或者不变。

用在社会学上，就是说事物的发展，总是朝着紊乱无序的状态衍变的，除非有外力来规范、约束它的无序的衍变。

此前我们读矛盾论的时候也说过，我们的主观能动的努力，都是为了给矛盾的发展，创造一定的外部条件，使得它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和衍变。

这里都提到了主观上创造条件。

其实啊，我们生活里干的一切事情，干这干那，都是为实现我们的某个目的，而不断的创造条件。

本文提到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就是我们创造条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有这些原则，则事情往往顺利，没有这些原则，则事情往往归于失败。

教员常说：“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把握，其实就是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体现。

所以，还是强调一下，**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是我们保证胜利的基础，是我们应该要坚守的原则。**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使得我们时刻牢牢的把握主动权，保证灵活性，又有计划性呢？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往往处于极端的恶劣环境之中，客观条件不具备，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教员遵义会议之后，一渡赤水实际上就是陷入被动之后的无奈之举。

一旦陷入被动，则灵活性和计划性也随之立刻丧失。

因为你会被外界巨大的压力推着走，就好像掉入急流之中又不会游泳一样，身不由己，随波逐流。

这种感觉当然是很要命的，因为你会感觉到自己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此文中讲到游击队，也说到这种情形：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所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办法上一句话已经说了：

只有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才能得到主动权。

也就是说，只有现实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才能牢牢把握主动权。

这是不是又回到实践论里去了，所以说毛选是一个体系。

要获得正确的估计，那就非不可要从实践中调查清楚详细情况，从理论中去找正确的处置方法。

然而，还是有时候，因为错误的估计，处置方法的不恰当，或者巨大的外力等不可抗因素，导致我们丧失了主动，这种时候就要想办法摆脱被动地位。

一般来讲，“走”就成了最必要的一种方式。

这个原则也用于职场中，如果你所处的行业，使你觉得完全无主动权可言，处处被动，客观条件又使得你无力去改变这种被动，那么走就成了最恰当的方式。

当然，有时候局面的改变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无法判断的，到底是该走了，还是该坚持一下。

因此，我们也说，每个人都要犯很多错误以后，才会慢慢的学会更加准确的分析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的。

这一点不必沮丧，教员也有分析错的时候。

只要我们有这个意识，才能在错误之中学会更好的思考，来为下一次正确的选择打下基础。

灵活性是主动性的一种体现，而计划性是主动性的一个保障。

做任何事，都需要有一定的计划性，在家里做饭都是这样，什么时候烧水，什么时候切菜，先做那个菜，后做哪个菜？

这些往往也有计划性在里面，不过平时习惯了并不察觉而已。

计划性不一定能保障主动性，但是主动性必须要有计划性的支撑。

最后，引用原文来强调一下计划性的重要性：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場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

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4）

一、

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从战略上说，广泛开展起来的游击战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种战略地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游击队会随着时间和发展，逐渐扩大为游击兵团，然后组建成正规军。

第二，游击战争可以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演变成运动战，甚至最后演变成战略决战中的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

第三，游击战争，可以起到配合正面战争的作用。

第四，游击战争可以起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群众的作用。

因此，游击战争实在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而要发展这种游击战争，有一个最根本也最必要的条件，就是——建立根据地。

二、

根据地的建设

这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 1938 年，也就是全面抗战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段。

从后面的历史和文章中，我们就会看到，根据地的问题已经完全达成共识了，也就是说思想是高度统一的。

即使是这篇文章中提到根据地的建设，侧重点也只是方法、管理、怎么建设的问题，而不是到底该不该建设的问题。

可是，熟悉以往历史，还有我们之前解读过的《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都应该非常清楚，那个时候，为了让大家意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为了把建设根据地的思想统一起来，付出了多少沉痛和惨重的代价。

根据地的建设，伴随着的是一个路线问题中的一部分，毛泽东曾经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过：“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的，

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是 1930 年，那时候就是为了争论这个路线问题，要不要建设根据地的问题，自肥式革命的问题，曾经出现过很多残酷的斗争。

像根据地的宗派主义啦，拉团队单干啦，不服从党指挥枪的原则等等，都是当时路线问题中的矛盾。

那时候的矛盾，往往伴随着巨大而无畏的牺牲。

所以，单就根据地的建设来看，它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完整和成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是经过曲折的矛盾发展和演变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很简单的事情，甚至被引为常识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经过很多的试错，很多的斗争，很多的牺牲才换回来的。

这一点，几乎没有例外。

三、

根据地建设的条件

前面我们说过一个方法论，就是说做任何事情啊，它的本质都是分析事物矛盾，然后创造矛盾所需要的外部条件。

根据地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

文章总结了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设所需要的条件：

第一，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

第二，可以用这个武装部队去打仗，去战胜敌人。

第三，能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武装力量。

这三个是基本条件，是决不可或缺的。

根据不同地方的条件，我们还可以确定具体的条件：

比如是否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平原地区需要哪些格外条件，当地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等等。

总之，在总的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还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加以实际的处置和安排。

根据地要能够从战略上，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就需要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这里我们又提到一个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应该说，没有巩固，是很难发展的，因为它可能经不起日本的进攻。

而没有发展，则往往又无法巩固，这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样。

对于根据地，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需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的流寇主义，是非常危险的。

大家如果注意观察的话，发现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长时间不能稳定下来自己的职业路线，这里上几天班，那里上几天班，行业也是跳来跳去，这个时候其实就处于比较危险和被动的局面之中了。

所谓根据地，无非是稳定的后方补给，不管是人力上的，经济上的，劳动上的等等。

如果体现在我们今天的职业生涯中，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或者稳定的职业提升，行业地位的提升等等。

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抵抗风险的东西，又是一个能促进你前进的东西。

根据地的特点也是如此，一方面它能保证你基本生活，能帮你抵御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它能促进你前进。

每个人都要思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在生意上，要有一项比较稳定的赚钱的东西。

在职业上，要有保证自己不轻易被淘汰的技能或者积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思考和启发一下，分析一下自己所处的行业，自己所经历的阶段，想办法把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起来，然后巩固和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五）

一、

这篇文章我们要讲的第五个大问题，是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

文中提到一点：“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的进攻的形势，必定惊慌失措，被敌击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我之前说过，什么是领袖？或者说什么是领导力？
就是三个字——预见力。

什么是预见？就是将矛盾发展演变的种种趋势加以判断，然后对自己主观能动性加以判断，最后得出事物发展演变趋势的最大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甚至必然性指出来，辅以相应的对策，最后取得胜利。

如果你的判断总是出错，那么你的对策则同样不可能正确，误打误撞的事情是机会主义，是不可取的。

《毛选》里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开始，就不断的预测矛盾的发展和演变趋

势。

比如：

“红色政权”一文，预测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必然带来的边界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预测各种主观、客观条件的变化下，建设这种根据地的前途和希望。

“星火燎原”一文，预测革命高潮的到来，苏维埃根据地的蓬勃发展趋势。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预测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到这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预测游击战的种种发展趋势和可能遭遇的种种挫折。

直至本卷“论持久战”，把整个抗日战争的形态、趋势、发展情况全部精准预测出来。

因为说，没有这些精准的预测，以及针对相应的预测提出的解决办法，革命的胜利是毫无希望的。

所以，为什么他能够预测？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东西。

至于打仗嘛，那些具体的军事战术的东西，大家可以作为业余了解一下，毕竟这种机会不多，你现在学习如何到山地里建设根据地，毫无意义。

所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预见力的问题。

二、

先讲最简单的几个现象。

一个受精的鸡蛋，然后你给它一定的温度、孵化、时间，那么你是否能预测一定时间后会生出小鸡？

一个技术一般，又经常饮酒驾驶的人，你是否可以预测他要么被交警给逮了、要么就得出车祸？

一对小夫妻，三条两头吵架，而且是那种撕心裂肺的互相伤害那种，你是否可以预测他们最终得离婚？

一个人聪明上进，勤奋好学，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你是否可以预测将来此人至少不会过得太差？

我们说的一个人有眼光，指的也是这种对人的判断和预测能力。

以前说真正的领导善于用人，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可塑性、发展趋势、潜能等等作出的各种可能性的预测。

只不过简单的事情，我们能看清，但是复杂的事情则往往不容易看清罢了。

而且，越是复杂的事物，它所处的变量的环境就越大，所蕴含的变数就越多，它的各种可能性就越多，因此就越发的难以预测。

比如，让你预测一种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种种发展和应用，因此它受市场、技术突破、投资、接受程度、国家政策等等变量的影响太大、太多，所以就变得异常复杂，使得人们很难预测。

但是不管如何复杂的事物，都是由简单的东西叠加起来的，或者本身事物所包含的矛盾因素比较多而已。

只要不断的加以学习和分析，这种预测能力，判断能力就会大幅度提升。

从技术上讲：

事物的发展，是由其内部矛盾规定，外部条件创造的。

那么，我们从理论上讲，只要明确了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那么我们原则上是可以 100% 的预测其发展结果的。

比如，这里有半斤米，你给它一个电饭锅，定额的水，给电饭锅通电，有了这三个外部条件，那么我们就能确定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它一定会变成熟米。

复杂事物同理，比如开一个便利店：

有一个店面，有适当的人流量，有符合这个地段的选品，有一定的定价策略，有一定的启动资金，有一定的进货渠道，有良好的管理能力，招聘有经验的员工，房租成本不要太高等。

有了这些条件，那么你其实是可以预测到这个店的盈利情况的。

但是为什么实际上很多人预测不了，是因为你无法创造这些外部条件，也许你管理能力不行，也许是市场环境不行，也许是房租成本问题，也许是进货渠道不行等等，总之，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不像一个电饭锅插电就完了。

所以，对于稍微复杂的事物，我们对它的预测就会越来越困难。

直至上升到创业也是如此，当你无法完全知道各种信息，各种需求，各种条件的时候，你是无法预测其可能性的。

我们常说创业失败是大概率事件，原因也是如此。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去做，不断的试错，不断的积累经验，不断地学习理论，不断的积累各种所需的条件，提到抗风险能力等等，都是不断提高自己的表现。

《毛选》中说，“不打无把握之仗”，那么什么是有把握呢？

说简单点，就是这场仗打出来，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你说 80%，起码 50% 以上你要能预测吧？

创业也是这样，如果说完全没办法预测，那你如果拿的是投资人的钱还好，要是你拿得是

自己的老本，父母的老本，那么请问，万一输了怎么办？
你是否有这样的抗风险能力？

说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那是吹牛逼的话，不过是装裱自己的说辞而已。
你以为他辞职的时候，不是因为掌握了国家某些信息，知道了某些渠道，掌握了一些资源，
有一定把握赚钱，至少不会亏，他才出来的吗？

那种拼胆子大的暴发户，在时代红利中谋取了暴力的不是没有，但是你问问自己是否还能赶上这种红利？

说回来，我们该如何提升这种预测能力？
本质上的方向，应该是擅长事物的矛盾分析，条件分析，一切的学习、努力、方法都应该围绕着这两个因素去发力。

这里，有兴趣的可以重新读一下我们的《实践论》、《矛盾论》。

三、

此文提到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为什么呢？

实际上啊，这里所提到的一切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并不是这里才发明创造出来，其实全都是十年土地革命时期，从井冈山到苏区，再到长征结束以后的一切红军战略战术的总结。

比如，面对日军对游击队的围剿，我们必须利用山地、人民群众等条件来反围剿。
日军同当初国民党的围剿有一定区别。

区别在于：日军战斗力远远强于国民党军，但是呢，其兵力却又不足，因此它的围剿往往更加残酷，但是却一般不会用到堡垒战术。

因此，打破围剿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后来日军大扫荡，还用了铁壁合围的战术），但是此时的八路军，已经不是第五次反围剿时候的红军了，也不会犯阵地对阵地，不丧失一寸苏维埃的愚蠢错误了。

所以，即使是后来的铁壁合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总体上没有出现长征那样的大逃亡，大撤退。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了，当初毛泽东提议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是可行的，是能打破围剿的。

此文，最后一块是指挥关系的问题。

这里如果是管理稍微中型、甚至大型企业的人，是可以学习的。

“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解读《论持久战》

第九篇，解读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一）

一、

今天，我们读一下《论持久战》。

我们都知道，《毛选》里的文章，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为了解决当时的某些具体问题而写的。

这篇《论持久战》也不例外。

它要解决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人们脑海里的几个疑问，这几个疑问我们归纳总结一下主要围绕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抗日战争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

第二：如果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那么为什么是持久战？

第三：如果确定了是持久战，那么这场持久战具体该怎么打？

虽然《论持久战》涉及到了整个战争的方方面面，但是实际上它总是围绕着以上三个问题展开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篇文章，也主要围绕着这三个问题去分析一下《论持久战》。

二、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胜利还是失败？

1. 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倾向

当时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就产生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速胜论。

而不同的观点，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行为倾向。

“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论持久战》

这种倾向在不同的社会角色身上，会体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

比如一个乡下农民，如果持有亡国论的观点，那么他在支援抗战这件事上就绝不会积极，他可能不会愿意加入游击队，不会愿意配合边区政府的政策。

如果这种观点再传播一下，受影响的就不是一个人，那么对于统一战线来讲，对于发动群众全民抗战来讲，都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同时，如果这种观点体现在某些高层身上，就可能会出现妥协、投降的种种举动，比如后来的投降派代表——汪精卫。

同样的，速胜论的观点也有极大的危险性，它同样会牵扯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比如，如果你认为中国可以速胜，那么对于是否还需要广泛的发动游击战争这个问题，你的答案可能就是否定的，因为马上就可以速胜了嘛，对不对？那还有啥必要去发动敌后游击战呢？

体现在改革制度上，比如是否还要改革军队制度？是否还要改善人民生活？是否还要维护统一战线？

你的答案都可以是否定的，因为马上就要胜利了，这些关于建设统一战线的工作实在没有必要。

反过来，可能倒是要开始积极准备应付国共之间的矛盾了，没事搞点边界摩擦啥的，整整内战啥的。

这一样是极其危险的，甚至会完全的妨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

所以，对于“亡国论”和“速胜论”就有加以驳斥的必要。

而世界上最好的驳斥，并非为了驳斥而驳斥，而是要把真正的客观规律，客观事实给摆出来，只有这样，那些虚无、错误的观点才会自动被消灭。

就好像止住谣言最好的方式，就是公布真相。

只不过对于毛泽东来讲，他要公布的，是还没有完全发生的，但是却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和真相，这一点就是领袖和普通人的区别。

这种还未完全暴露出来的真相和事实，前途和命运，绝大多数人是看不清的，所以它就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事实和结论。

也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真正的说服别人，才能有助于切实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因此，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毛泽东是如何分析这场战争的。

2，矛盾分析：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论》

所以，分析抗日战争也好，分析国共合作也好，本质上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而分析矛盾，首要的就是分析它的两个方面。

中日矛盾分析的是中国和日本两个方面，国共矛盾分析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方面，家里小两口闹矛盾，你也得分析小两口两个人，不能只分析一个。

所以，《论持久战》首要分析的，也是日本和中国两个方面的特点，只有把双方都分析透彻了，你才能看到矛盾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就是我们说的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前途。

于是《论持久战》正式拉开序幕。

首先日本方面的特点：

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强表现在其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能力三个主要方面。

第二，它的战争是退步和野蛮的。

其退步性表现为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其国家内部矛盾积累到不得不举行大规模的冒险战争的背景下发动的，它是一场侵略其他国家的战争，不仅遭到被侵略国的举国抵抗，而且还会遭遇日本本国人民的反对。

其野蛮性表现在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因此其侵略手段带有极强的暴力和野蛮。这种野蛮性，又激化了中日矛盾，以及日本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由此使得自己最大程度的陷入孤立。

第三，日本强而不大。

这种强而不大，体现在其自然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军事力量的补充几个方面，这决定了其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消耗。

这一个特点，也为毛泽东预测日本将来必将继续南下，占领西太平洋提供了依据。

第四，日本虽然能得到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是必将遭到更为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且后者力量会不断增长，逐渐抵消前者的援助力量。

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

以上四点，是《论持久战》总结的日本方面的四个特点，其后所有的战争形态都是由这些特点发生和衍变出来的。

而中国方面呢？也有四个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弱国，这种弱体现在我们的军事力、经济力、政治组织能力，皆不如日本，且差距很大。

第二，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

我们的正义性体现在我们举行的战争，是反对侵略的战争，这个战争必将得到全国所有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全体支持，能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甚至得到日本本国人民的同情。

而我们的进步性，体现在已经开始觉悟起来的全体中国人民。这种进步性与一般的进步性有质的不同。之前，我们说太平天国是进步的，辛亥革命是进步的，北伐战争是进步的，这没有错。

可是这种进步只有量的积累，却还没有达到质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最为广大的群众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

直到共产党以及由它领导的军队出现，中国的广大群众、无产阶级才开始觉醒起来，才逐渐的被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广泛的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统一战线。

第三，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撑起长期的战争。

第四，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够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是由于它的正义性和进步性规定的。

以上日本、中国不同方面的不同特点，是刚好对应和矛盾着的。

这些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场中日战争，其实背后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中，将逐渐依据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的现象层面的东西，就由这些基本特点发生和衍变出来。

比如，日本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能迅速占领上海、南京、太原等地，几乎可以说已经占据了半个中国，这一点就是由于它是一个军力、经济力、组织力极强的国家的特点决定的。

但是呢，它只能占领某个省的主要城市，而在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地区，它却无论如何无法占领了，这是因为它虽然是强国，但同时又是小国，兵力严重不足的原因。

而在日本所占领的华北、山西等地的广大农村，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开始蓬勃发展，这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性，决定了广大群众已经开始觉醒和被组织起来，并且由于中国地大物博，给了游击战争以广大的生存空间。

这种现象，也是双方特点的不同衍变形态。

所以啊，一切的现象层面的东西，背后都是其本质特征的不同形态，抓住了本质，我们就能更好的识别现象，判断现象。

由上面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日本强、中国弱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想要战胜日本，速胜是不可能的。

同时，由其他几个特点，

即：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和野蛮的、其失道寡助而得不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援助。

另一方面，与之对应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其战争史进步和正义的，其得道多助因此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从这些对比的特点去看，中国就存在着胜利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胜利一定不是速胜，而是持久战。

3，量的估计

那么，问题接着就来了，从这些特点去看，仅仅只是存在着胜利的可能性，并不能说中国一定胜利，日本一定失败。

目前，我们能准确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只有一个：

就是说，如果中国的抗战要胜利，那一定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但是至于到底是不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则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来。

因为，强而小的国家，消灭大而弱的国家，不是没有先例，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存在，在世界上，英国将印度完全变成殖民地的先例也是有的。

处于民族觉醒的进步国家，不一定就能战胜处于退步状态的帝国主义国家，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不是万能钥匙。

其中，是否决定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根本，还在于对双方不同特点，衍生出来的量的估计。

这种估计是非常之困难的，也是《论持久战》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所在。

其实啊，当时的舆论界，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提出来中国和日本的战争是持久战，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认识到双方的实力差距，因此提出这场抗战是持久战。

但是，如果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到它是一场持久战这里，那么可以说是完全不够的。

应该说，只要有一定的自我认知的将领，都能认识到这是一场持久战。

可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高明之处却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它能判断持久战打下去，为什么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这种结论你是哪里得来的依据？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点在于：这场持久战到底该怎么打？该怎么组织？该怎么制定持久战的战略战术？

这就不是当时的任何其他人可以提的出来的了。

一直以来，我们也看到一些舆论，说持久战并不是主席的原创，他们找到了最先的出处，是在国民党高层，比如，有个叫蒋百里的就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前，提出过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这种观点简直不值一驳，但凡稍微看一下《论持久战》原文，就知道这是多么滑稽。

原文一开始就说：

“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论持久战》

所以，《论持久战》提供的是战争中的胜败衍变依据，持久的依据，是配套的战略战术，而这种理论依据的分析，全部用的是矛盾分析法，配套的战略战术也全部是早期红军内部形成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这不是任何人可以复制的，是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逐渐发展和衍变出来的，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只要你稍微读一下原文，就能立马识别出来。

说回关于“量的估计”。

如果要给这场持久战中的双方打分，那么如果日本强的特点，能打十分，而其退步、野蛮，资源匮乏、地域狭小，失道寡助等特点，使得其力量遭到减杀，总体减去三分，那么它还有七分。

而中国虽然有进步、正义，地大物博，得道多助等特点能加分，但是如果加起来只有三分，而因为其太弱，实力原本只有一分，那么其实总体上看，它也只能有四分，还是干不过日本。

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既双方不同的特点，在这场战争中，能发挥几分的作用。

这是其一。

其二，这些特点并不是像我们打分一样，是静态的，相反所有的特点都是发展的，也就是说随着战争的进行，不同的特点在战争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它的分数是动态的，是变量。

就好像中国抗战的进步性，决定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将会逐渐聚拢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可是，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动态过程，具体表现为先是实现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内战停止的第一步。

其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起两党之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再然后，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正规军。

也就是说，进步性的特点，在战争的逐渐发展之中，它能发挥出来的作用，是变量，是逐渐增强的。

而像日本方面，其退步性和野蛮性、资源贫乏、失道寡助的特点，一开始显示不明显，但是随着战争的逐渐衍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这场大战之中。

那时候，失道寡助、资源越来越难以维继，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不同力量的反对就会越来越明显，这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因此，在整个战争中，不同的阶段，双方的特点可以衡量的分数，或者说力量是不同的。

但是从整体看上，中国的力量虽小，但是却处于不断的增长和强大之中，日本力量虽强，但是却处于逐渐的衰减和弱化之中。

因此，只要在日本最强，中国最弱的时候，中国能够坚持过来，能够不被灭亡，那么随着战争的持久，此消彼长，双方力量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找到，即使在日本最强，中国最弱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坚持下去的证据呢？可以找到。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多至两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其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论持久战》

在敌之进攻，我之防御阶段，是敌人极强，我之极弱的阶段，此阶段正在进行中，我们看看这一阶段的现状。

“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到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力，时间约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之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不堪设想。”——《论持久战》

这就是说啊，即使日本拼劲全力，冒着巨大的风险，实际上它离完全占领中国，使得中国亡国依旧还差得很远。

而此时呢？我方的力量正在急速增长中，这种增长表现为：

国共实现了合作，两党共同抗战的局面已然形成。日本每占领一个城市，就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而不会像之前占领东三省一样便宜了。

敌后抗日游击区域不断的发展壮大，大规模的群众游击战争正在酝酿和发展起来。

全国的抗日热情正在高涨，不同阶级都已经逐渐纳入统一战线之中。

国际援助正在越来越多，尤其是苏联的援助，而世界级的战争，此刻也开始逐渐酝酿起来。

这几个维度，都是最开始矛盾分析中，双方的不同特点的发展表现形式，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在以上的双方力量衍变的估计下，我们就可以完全得出结论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持久战。

而且，《论持久战》还描绘出了整个持久战中，不同阶段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也就是著名的持久战中的三个阶段预测。

这些预测，纷纷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其准确性。

当然，原文所记述的内容，远比这里所解说的详细。

比如，有人会问：你要使得自己的力量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最终超过日本，能够打败日本，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的工业、军事、技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积累，都不是中国在几年，几十年，甚至百年之内能赶上的。所以持久战是不可能的，中国最终无法超过日本力量，将其赶出中国。

这一点，原文如何回答的呢？

“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论持久战》

再比如，还有人会问：如果日本搞和平劝降的手段，使得中国妥协和投降成风，那么我们的力量还是会继续强大，如果日本以战养战，日本的力量是否会逐渐弱化？

这一疑问，原文也有精彩的论述，根本上还是从上述矛盾分析中的几个特点去分析。

日本的野蛮性，决定了他们的和平劝降的手段只是烟幕弹，这个政策根本上是实行不了的，同时，日本的以战养战，无非是参照原来在东北的那一套，然而因为全面抗战起来以后，大量敌后游击队的存在，全中国人民在各种不同角落里的反抗，加之日本资本有限，因此急遂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从已经进行了快一年的全面抗战中，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还有关于“日本是否会陷入世界战争之中，遭到世界国家的联合反对？”，这一点原文也有分析：

“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论持久战》

在此之前，毛泽东还精准的预测了后来日本南下，陷入太平洋战争的局面。

实际上这个时候，日本本身的战略计划中，也在为南下还是北上吵得不可开交，但是毛泽东却已经预测了日本将来几乎必然南下的结局。

他之所以那么预测，首先的根据在于日本是资源小国，它一旦陷入战争的泥潭，被拖进持久战，那么很快资源上的问题就会立马暴露出来。这个时候，对于石油、橡胶的需求将会急剧上升，成为左右日本战争的决定因素。

而北面，日本会面临一个强大的苏联，因此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日本必然南下。

所以啊，其实在日本内部为北上和南下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实际上毛泽东已经看到了日本将来南下，必将在太平洋战争中陷入困局的极大可能性了。

三、

主观能动性

在以上双方不同特点的竞赛中，我们已然可以得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足够地击破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不良影响。

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具体的布置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计划了。

因为，不管你的理论依据多么强大，客观条件分析得多么完备，但是实际上，不管是持久战还是什么战，都必有有人依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策略、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

“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论持久战》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

“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

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论持久战》

在这种能动性的作用下，一系列持久战中的战略、战术，以及相应的政治中的政策、理念、号召、路线都衍生和发展出来。

这里很多内容，就是我们之前解读《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重复提到过的很多战术行动。

我们大体上可以作如下总结：

在军事上：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改革军队，实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动员而不是强迫人民参加抗日。

在政治上：发动群众，改善群众生活，改善教育，给予人民政治上抗日的自由。

在战略战术上：实现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在战役实施上：保证战役和战斗中的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

在战术方法上：坚决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结合的方针，其最终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在战略战术目标中：尽一切可能打歼灭战，只有歼灭战才能给予敌人最大的消耗，同时给予我方最大的补充。

在每一局部战役和战斗中：坚决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消灭敌人的方针，并乘一切敌人之隙，造成敌人的错误，给予打击。

在决战问题上：避免一切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争取一切局部战役中，有把握条件下的决战。

在兵源问题上：民兵是胜利之本，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设游击队，然后又逐步发展游击队成为正规军，变游击战争为规模性的运动战。

以上是整个持久战中，我们为应对这场战争，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政策方针的总和。

四、

文末，我们需要来总结一下，《论持久战》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几个值得注意的点：

第一点，对矛盾的双方做定性的分析，由这种分析得出事物的不同特点；

第二点，对不同特点还需要做定量的分析，从而明确不同的特点，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大小。

第三点，对事物的分析，一定是动态的，因为矛盾是运动和发展的。

第四点，任何的战略战术，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来制定的，是先有事物本身，才会根据这种事物的特点去制定战略战术计划，而不是反过来，用某种战略战术去乱套。

第五点，主观能动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我们说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指的是客观上存在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条件，然后它还不是最终的事实。最终的事实，必须把主观能动性加上去，把我方的主观的努力作用加上去，没有这一条，坐着不动，怎么分析都是不能成为事实的。

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是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的，这种条件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而我们所谓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创造条件，使得矛盾的发展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进行。

我们需要抗日的胜利，就需要不断创造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大规模游击战和运动战，广泛的宣传和争取国际援助等等一系列的努力。

第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绝不仅仅是几个党派、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真正强大的力量，永远都来自人民。

论持久战（二）

这篇文章，我们还是要继续聊一聊《论持久战》

因为它能挖掘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篇文章我们主要聊一聊持久战的几个条件。

之所以要研究一下持久战的几个条件，是因为这种战略思想，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虽然，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任何的战略计划，个人计划，本身必须是建立在个人实际情况上的，而不是反过来去乱套。

但是你如果有一个模板，那么在实际情况中，你只需要根据一些变量作出调整，就会发现有

很多内容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而其中，尤其是这个持久战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科普价值，也具有极强的适用性。

所以，我们来研究一下，持久战适用的几个条件，那么就能方便我们在实践中去判断，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到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一、 极弱对极强

持久战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自身是极弱的，而对手是极强的。

这里我们所说的对手，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你也可以当做是面临的巨大困难。

也就是说，在本身极弱的情况下，而要面对的困难，却又是极强大的背景下，我们就可能会用到持久战。

所以，这一点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很多人都一定会遇到，也一定会经历。

因此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适合于很多人。

那么，到底需要哪些条件，我们才能打持久战呢？

二、 第一个条件——进步性。

持久战的第一个条件，是进步性。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战争，这种进步性的体现，就在于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力量会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

以前，我们说找工作，不怕一开始工资低，而怕它一直都没有进步的空间，提升的空间，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因此，进步性，是保证持久战最基础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你持久不了。

为什么老蒋在去了台湾以后，也在内地留下了很多的特务，他们不能用到持久战的战略，和游击战的战术呢？

是他们学不会吗？是他们不知道吗？

不是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变得越来越强，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弱，最后甚至不用怎么打，他们自己就在时代的进程中消失了。

抗日时期的持久战，因为进步性，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于是这种力量随着发动群众的深入，随着国际联盟的扩展，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同胞加入统一战线，它就是会越来越强。

所以，不管你处于什么行业，都要去分析，自己正在做的工作，是否有这种进步性可言？

当然，现在社会化大分工，一个人可以做的工作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不存在所谓的不可替代性。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判断，哪些工作具有进步性，具有可持续性，具有积累性，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增长，行业经验的积累，会变得越来越强，这种工作几乎可以说很少了。

但是工作只是形式，在人的身上其实有很多可以积累的东西。

这里面，比如说一个人独立思考能力，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人的方法论，一个人的价值体系等等。

这些东西是具有很好的积累性的，随着时间的增长，它能发挥出来的作用和价值会越来越大。

所以啊，能在具体的工作中，找到这种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或者能接触或者进入一个对于自己来讲，可持续的行业，是非常幸运的。

但是如果遇到，那么我们也可以首先这个人能力方面，做定量的积累。

这也算是为将来的持久战打下一个基础。

第二个条件：有能回旋的余地

持久战的第二个条件，是有回旋的余地，没有这种余地，可能直接就被打倒了，还谈什么进步性？

当时中国可以打持久战，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中国地大物博，这一点很重要。

也就是说，即使日本拼尽全力，我们还是有生存空间，有活下去继续发展的希望。

你如果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的持久战是持久不了的。

几个回合，几个困难击打之下，直接就嗝屁了，还谈什么持久呢？还谈什么进步呢？

你等不到了呀。

所以，我们也说，任何斗争，都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存往往是第一位的。

积累也好，进步也好，为将来打基础也好，追求自己的梦想，从事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等等，这一切的基础是生存下来。

中国地大物博，给了八路军巨大的生存空间，有了这种空间，才有了发展的机会和希望。

当时，获得生存发展空间的战术行动，是游击战。

后来大家都看到了游击战取得的成绩，自然不再说什么了，可是这个游击战啊，一开始是备受诟病的，不仅受国民党的诟病，连我们自己人，都颇有些看不起，觉得这种游击战没有前途，没有起到真正抗日的作用。

其实，生存下来，才能谈发展，发展以后才能谈贡献，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所以，持久战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有回旋的余地。放到我们很多人身上，就是生存。

第三个条件：根据地

持久战的第三个条件，是有根据地。

没有根据地的一切战争，都有沦为流寇的风险，那时候谈什么积累，进步，都是假的，你可能连生存都困难。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建设根据地的问题。

我们很多人，个体为主的人，往往把一个和谐的家庭当做根据地，或者说后备力量。

当然，如果是这种根据地，那就不是越多越好了。

所谓的根据地，本身的作用，是一个保障、支援和抗风险的作用。

我们做项目，做生意，往往在初期会集中所有的精力，做好其中个项目，使得这个项目能作为我们发展的后方，能作为持续提供能量的后援，能作为抗风险的一个后备力量。

所以，有一个建设根据地的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没有根据地，持久战也持久不了，它既无法巩固，也往往难以发展。

以上三个条件，其实是持久战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三个条件，所谓的持久战往往是持久不了的。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持久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里面，任何一个条件，可能都需要消耗巨大的精力，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你比方说，建设根据地吧？

很多人别说根据地了，就是一个小小的家庭建设，也是举步维艰，这也是无奈的地方。

总体上来讲，任何人做任何一件事，需要两类条件：

一类是客观的，一类是主观的。

客观条件需要去分析它到底存不存在？比如，中国是不是地大物博？中国是不是人口众多？

这是客观条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条件。

这种条件，我们分析不了，可以去找理论，找别人帮我们分析。

可是主观的条件，就是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促成的了，比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号召群众武装起来的运动，帮助群众分田分地的斗争，组织军力同日本进行游击战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做的事情。

如果现阶段，还打不了持久战，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回到第一卷温习一下《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可以先把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寻找希望，如何找到一个起点先学习和运用起来。

第十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读《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这篇文章，一定要在熟知历史背景的情况下，才可以看得懂，才能更加感受到当时的斗争之强烈。

整篇文章，说了很多内容，但是值得我们牢记于心，也是我们最常挂在嘴边的关于“毛泽东思想”中最具有实践和运用价值的一句话：独立自主。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独立自主。

关于这条路线的斗争，我们需要从王明这个人说起。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

我们都知道，随着中国主要矛盾的变化，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也就是说一切的斗争都围绕着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西安事变，有了前面我们反复强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了国共统一战线，有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有了持久战的战略规划。

可是问题接着就来了，当时合作之初，红军的实力简直不能说是弱，而是极弱之中的极弱。

王明曾经在苏联的时候，给斯大林作汇报，含糊其辞的说红军的数量大概是三十万。

那个时候，长征还没有结束，倒也不是王明刻意说假话，而是长征之后，红军和苏联的联系就彻底中断了。

以苏维埃时期去估算，中央苏区大概就有十万，张国焘任书记的鄂豫皖苏区，也就是四方面军也差不多有十万。

那么，加上湘鄂西苏区，以及一些散落在各自区域的红色区域加起来，勉强凑数凑三十万，其实也不算夸大。

可是，后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再到三大主力会师，与苏联取得联系以后，那时候所有的红军加起来也就差不多三万。

三万红军，同蒋介石的百万国民党军比起来，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即使是斯大林也是那么估计的。

这里再说一下王明这个人，他原本就是苏联一开始想要扶植的中共代理人，所以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看到博古的职位其实听上去很尴尬，叫什么“总负责”，说简单点就是王明的代理人。

后来遵义会议，改变了军事路线，取消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也扶张闻天担任一把手，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向共产国际汇报过，是在双方信息全部中断以后采取的一种方式。

这一点，也是后来张国焘之所以敢跟中央对着干，敢令立第二中央的重要原因，因为从当时的背景去看，遵义会议其实并不合法，也不符合程序，如果不是因为信息中断，有了理由自己决定一些事情，遵义会议的历史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版本了。

大家如果之前读过我们苏区的斗争那段历史，就知道当时我们对苏联不仅仅只是迷信，而且在思想、理论、甚至经济上，一度都依赖苏联。

早在中共二大上，也有这方面的协议，就是说中共算是共产国际的分支，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的。

这是因为，当时自己啥也不是，啥也不懂，而苏联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所以接受他们的帮助，指导，和各方面的援助也是很无奈的事情。

这事就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是当时为什么对共产国际迷信，同时又必须听苏联老大哥的话的原因。

即使是长征之中，我们也曾经无数次想要打通国际路线，以方便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否则长征中几乎已经走向绝境了。

这一切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苏联的地位，他们的指令是具有极大的含金量的。

王明在名义上，还是可以以一把手自居的。

到了 1937 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了。

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王明和毛泽东的区别就在于，王明的地位是共产国际赋予的，而毛泽东的地位是在实践中取得的。

看上去后者更具有优势，但是在苏联强大的控制体系下，王明同样具有很大的优势，那是因为当时红军力量确实很小，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是完全的能独立自主了。

就好像一个孩子，在他思想、精神、行为、经济都还没完全独立之前，他们其实是摆脱不了家长的束缚的一样。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条路线。

王明的地位是共产国际赋予的，而毛泽东的地位，是在实践斗争中自发确立起来的。

所以，王明的一切决议、思考，他首先站的就是苏联的利益，而毛泽东所有思考的出发点，都是红军的实际利益，中国广大群众的利益。

双方的立场本来就是不同的。

而王明来之前，斯大林给他的是什么指示呢？

就是要他，在统一战线中，一切工作的着眼点，是配合国民党抗日。

这是因为，斯大林觉得，王明你小子之前吹牛逼，说你们有三十万军队，可是现在却只有区区三万。

而苏联的一切思考立足于哪里呢？就是立足于希望中国把日本拖在那里，不要让日本有机会和实力进攻苏联。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双方的目的是一致的。

可是苏联却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红军身上，而是觉得你们就区区 3 万人，如果还不老老实实配合国民党，那你们怎么可能把日本大量军力拖在中国？

那时候，斯大林是那么认为的，而且就连我们自己红军内部，很多人也都是那么认为的。

于是出现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路线的代表人物，就是回国以后的王明。

王明认为，如果不老老实实配合国民党，不老老实实配合蒋介石，还在合作中谈什么改造人家的军队，谈什么共产党的领导，谈什么号召广大群众在共产党的麾下，这样只会激怒国民党和蒋介石。

到时候，万一蒋介石不抗日了，调转枪头对着我们，那拖住日本，包围苏联的任务如何能完成？

这就是王明一切行动的理论逻辑。

于是，在这样的理论逻辑之下，他就提出了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还提出了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这七个统一，其实就是变相的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服从蒋介石的指挥、编制、待遇、计划等等。

王明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的团结蒋介石抗日，才能真正的把日本困在中国，实现斯大林的计划。

这既是所谓的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

这一路线在王明回国以后，就以他为代表开始逐渐形成了，很多党内同样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也就是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实力太弱，抗日主要还是靠国民党的正规军的人，便逐渐团结到了王明的旗帜下，加上本就迷信共产国际的人，这整个的右倾路线颇有实力，以至于毛泽东不仅无可奈何，还曾一度只能妥协。

事情的变化在王稼祥回国以后，带来了苏联新的指示。

当初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实际情况，并与之取得联系，便派出王稼祥去了苏联。

在王稼祥把一切的长征经过汇报以后，共产国际也知道了所有的情况，也知道了必须由更懂中国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来领导，才不会犯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

于是，共产国际表了态，要求大家团结在毛泽东的指挥之下，让王明也服从毛泽东的领导，由此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当王稼祥把这个共产国际的态度带回中国以后，也直到此时，毛泽东才算是真正的取得了合法的，符合程序的，被共产国际认证过的一把手地位。

从此以后，中国的领导核心才算是真正的建立起来。

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终于可以毫无顾忌的执行自己的主张，执行自己的计划，再也没有谁能有异议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到底是什么地位？

讲来讲去就是四个字：独立自主。

一切服从老蒋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地位，我们永远不要，永远不妥协，永远要斗争，一

一切为了独立自主的斗争都是被许可的，一切反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意见，都要被批评。

然后，我们就看到文中第一段，就是说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

那些说，为了独立自主，就会容易得罪苏联，破坏同蒋介石的团结，最后完全只顾自己，不顾国际主义了，不顾苏联了。

而毛泽东认为，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发展强大了，红军实力强大了，才是真正帮助苏联，否则都是假的。

帮助自己，就是帮助苏联，强大自己，才能真的打击到日本，才是真的帮助苏联，也才是真的爱国主义。

一句话：爱苏联，首先要爱自己。

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我们今天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

就好像，你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真正的帮助父母，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真正的帮助家人，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真正的帮助朋友。

道理很简单，独立自主的原理也不复杂，所有人只要稍微想一下，都能想明白，王明可以想明白，斯大林更加可以想明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还会有王明这种错误呢？

原理也不复杂，但是却极难做到，四个字：实事求是。

王明并不是清楚的了解中国的实际，也从来没有参与过红军的创立，根据地的建设，没有看到红军是怎么发展的，也就是不知道它接下来还会怎么发展。

于是，他眼里就只能静止的看到 3 万人的数量，而看不到接下来的发展。

只要你认为红军永远只能有 3 万，只要你看不到红军该怎么发展，那么你就必然走到王明的一边。

因为你必然右倾悲观，3 万人？打个屁啊，怎么跟日本人打？

更何况，他更不明白，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是红军十年反围剿战争中验证过来的，是极其强大的和具有实用性的，王明哪里能懂这些？

相反，但凡是走过长征的人，包括博古和李德，他们都知道，只要红军骨干在，无数的中国农民、被压迫的群众会起来，被那面红旗号召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因为，红军一路长征，就是那么走到陕北的。

所以，毛泽东总说：“有些人就是为别人打算得太多，为自己打算的太少”，说的就是王明总是替苏联打算，却不去研究怎么为中国人，为红军，为广大群众打算。

当苏联确定了毛泽东的地位以后，他就可以明确的把“独立自主”的原则提出来，作为统一战线中的根本原则来制定一切计划。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其实它的实质就是要强调，统一战线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一切的合作都要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会年轻，也会犯错，也要经历很多挫折和努力，才有可能实现独立自主。

因为这四个字，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跟历史一样，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知道，妥协、悲观毫无意义，你可以暂时的做不到独立自主，但是它永远都要成为我们做事情的努力方向，和最终的落脚点。

第十一章，《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这篇文章，其实同上一篇文章，是一个会议报告的两部分。

所有的核心点都是围绕一个话题：独立自主。

只不过这篇文章，强调了一个界限的问题，就是说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到底以什么为界限？

哪些操作是坚持了独立自主？哪些操作违背了独立自主？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的巩固和扩大；人民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给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厂主改良待遇，同时积极做工以利抗日；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团结对外。这些都是互助的原则和方针，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消极的片面的方针。互让也是如此。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

这些都是合作中，让步的界限。

这些界限只是一部分，实际运作起来，还有很多具体的方针是变化的。

但是，根本原则只有一个，让步一定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什么是积极的让步呢？

就是说，为了双方能更好的合作，我们主动在界限范围内，原则范围内，底线范围内的让步。

这种让步不是被逼出来的，不是无奈之下的，不是被迫的，而是我方为了更好的团结，主动且愿意去做的。

而这些原则又不违背我们的独立自主，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积极的让步，而不是消极的。

那么，相反地，如果是消极的让步，也就是说让步是给对方逼出来的，是被迫的，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主动权，就容易一步步走向妥协，其后果是很严重的。

拿到当时的环境去看，一旦出现不断的妥协，那么就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我们被老蒋当做炮灰消灭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再也无法发展，被“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束缚手脚，不能放手发动群众，武装自己。

这两条路，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将红军引向灾难。

这种情况下的独立自主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坚持一些的。

因为你不坚持，可能就是毁灭，所以坚持的利益远远大于风险和弊端。

但是，其实还有一种独立自主，是非常难以坚持的，就是说你放弃独立自主，会在短期内获得巨大利益，而你坚持独立自主，却反而会遭到极大损失。

大家可能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说？

一个人坚持独立自主，怎么还会有损失？

单单从抗日战争来看，坚持独立自主的好处的很多的，很明显的，利益是直观的，可见的。

相反，放弃独立自主，随时可能被消灭。

所以，只要给大家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觉得我们还是能发展起来的，还是很有希望的，那么大家就会主动拥护这个方针。

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推行独立自主原则的时候，虽然遇到斗争，遇到困难，但是并没有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发展起来，谁愿意看别人脸色过日子？

可是，还有一种，就是你坚持独立自主，短期可能会遭到巨大的损失，相反，放弃独立

自主，却可以在短期获得巨大利益。

这件事，就是发生在建国以后的苏联援助上。

那时候，我们刚刚建国，国家要真的站起来，要真的强大，要真的能独立，并不仅仅是赶走了蒋介石就完了，根本还在于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富强。

这里面，要实现这种富强，少不了一件必须经历的事情，就是工业化。

那时候，民国留下的工业基础是很薄弱的，薄弱到连一盒火柴，一支钢笔都得买洋货。

所以，没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等重工业，以及日用品等轻工业的支撑，真正的独立自主，主权的维护是不能继续的。

而帝国主义，是不可能让你独立发展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事就很难办。

话句话说，你得白手起家，还得独立自主。

大家可以想象吗？科学技术，工业建设，这些东西其实远远比打仗还更难，周期更长，要克服的东西更多。

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的是全面封锁的策略。

于是，中国只得把外交政策倒向苏联一边，毕竟我们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上是没有冲突的。

可是啊，哪怕这样，苏联也不会白白帮助你，也不会白白的帮你建设工业体系。

还是那句话，就算是苏联，他和你一个阵线，但是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他怎么会白白援助？

所以，那个时候工业化真的是没有方向，没有着力点。

直到抗美援朝战争以后，苏联才发现，我去，原来中国那么牛逼，连他们都不敢轻易打的仗，中国居然敢打，还打赢了。

这个时候，苏联看到了这种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意义，于是才开始大规模的援助中国搞工业化建设。

这种援助虽然也是有条件的，比如给你的钱是贷款，可以少收点利息；我们派到中国的工程师，必须享受最好的物质待遇等等。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些都不涉及主权问题，都不干涉中国独立自主的问题。

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拉开了序幕。

本着良心说，苏联对我们的工业建设，技术支持是我们工业化得以开始的根本保障，这一点直到很多年以后，甚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还是念念不忘他们当初的援助。

可是，当时间来到了 1958 年，赫鲁晓夫要在中国搞核潜艇基地，搞长波电台，搞信息技术等等。

本来是好事，可是赫鲁晓夫提出的并不是教会中国怎么搞，然后中国以资金、农产品、劳动力等交换。

而是，提出由双方一起搞。

其实啊，说是一起搞，技术、核心秘密都是人家的，就是放在中国的地盘上而已，哪里有什么公平、平等可言？

你们把核潜艇搞到我们的领海，可是技术、操作、掌控能力全部在你们那里，这就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了，也就是触碰到了独立自主的底线。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如果坚持独立自主，那么苏联可能就会放弃一切援助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的相关内容。

而那时候，很多项目搞到一半，如果苏联撤出，尤其是技术方面，那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而你如果放弃独立自主，不但可以一起搞核潜艇，其他援助也不会中断，而且还可能扩大。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上面说的：

你坚持独立自主带来的坏处，短期内远远高于好处，你怎么选？

不好办吧？

这和我们抗日时期的独立自主完全不同，抗日时期独立自主的代价无非是自力更生，自己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但是我们能够扩展。

也就是说，独立自主的好处远远多于坏处，且立竿见影。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你要坚持独立自主，那么就得面临工业化建设的中断，面临苏联撤出一切援助，面临非常孤立的状态。

而你放弃独立自主，那就可以获得很多好处，而且是立马可以看得见的。

怎么选？

毛泽东的回答是：“如果你们要那么搞，那我就去井冈山。”

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主权和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这句话背后其实是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的。

在苏联援助撤出以后，我们必须独自面对工业化进程，怎么面对？

一句话：“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土法炼钢，土窑炼铁等等现象，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挫折。

直到走过了极其曲折的弯路之后，我们的工业化建设才重新回到正轨。

这里面从长远来看，独立自主，主权完整的意义，实在是大大的超过短期援助的利益，只是在当时啊，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就是说为了一个领海的问题，跟苏联把关系搞僵了，我们会很被动，工业化建设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所以，历史啊，有时候就是兜兜转转的在同一个问题上打转，不过是具体的情境不同罢了。

我们读《毛选》，越读得久，就越会发现，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很多东西，其实要做到是极难极难的。

可是它又是很原则，很符合客观规律的事情。

这些原则只要你去坚持，长久的坚持，你总会察觉到这种好处。

这两篇文章，讲得是同一件事：独立自主。

这个原则我们后面还会不断讲到，直到它刻进我们的行为准则。

第十二篇，战争和战略问题

读《战争和战略问题》

这篇《战争和战略问题》里所有的内容和观点，其实都是我们之前那几篇著名的军事著作里已经讲过的了。

为什么会有这篇文章呢？

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作用，不是要从理论上去讲当时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而是要重新明确之前

提出的那些战略战术问题。

为什么要重新明确？是因为此前受到王明路线的干扰，实际上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所确定的战略战术并没有被完全认可。

当初，《论持久战》写出来以后，要求王明所在的武汉长江局也印刷出版，结果就被王明找借口搪塞，不愿意出版。他还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妥协、拖延、悲观的论点。

也就是说当时思想其实是没有统一的，持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一切以服从统一战线，配合国民党，依靠蒋介石的思想路线并没有被肃清。

直到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六次会议，那时候王稼祥已经带来了苏联对毛泽东的认可，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于是才有了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的可能。

这篇文章，是此次会议上，重申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的一部分。

文章通过讲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军事历史，来重申了此前我们读过的《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结论。

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就不提具体的战略战术了，这些此前早已写过。

这篇文章着重写一点，就是关于学习两个字。

学习学什么？

我们常常说要学习，要提升，要武装头脑。

可是学习该学些什么？怎么学习？什么才是学习？

盲目的看很多书？盲目的调查一个事情？这种学习效率始终是低下的。

这一点，《毛选》里的很多文章，总结一下，都会提到以下三点，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方向。

第一点：事物的历史。

第二点：事物的现状。

第三点：针对处理这一事物，所需要的理论。

这三点其实已经明确了一个前提，就是说任何学习都首先是有针对性的，是要针对具体事物的，不要为了所谓的“学习”而学习。

单纯的为学习而学习，不仅有装逼的嫌疑，而且效率之低下简直让人发指。

第一：

学习历史

什么是学习历史？就是搞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发展而来的？

这里说的历史，不仅仅是我们说的中国史、近代史、古代史、世界史，而是泛指你要研究的

具体事物的历史。

比如，你学习《毛选》，有一个必须要搞清楚的就是文章的历史背景，没有相关的历史背景，你很难彻底搞清楚文章所述事件、理论、方法的适用场景，以及来龙去脉。

一不小心，就变成背诵《毛选》语录，把语录当成圣经和教条了，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不学是吧？

所以我们每一篇的解读文，都会把文章的历史背景解释一番，也是这个目的，希望大家可以更准确的了解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之下诞生的，这个时候你再看里面的理论会感受更加深刻。

我们在工作也好，创业也好，这些过程中，你必然接触到具体事物，比如做一个项目，接手一项工作，你必须先搞清楚这个项目的历史，它是怎么来的？涉及哪些具体工作？项目有哪些维度？它是如何演变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的。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也不一定需要多么深刻的历史了解，比如我们说《毛选》里的抓主要矛盾的方法论，需要了解什么历史呢？

当然也是需要的，如果你要真的理解矛盾的运用和原理，你需要知道矛盾论的那些观点，是如何发展而来的。

我们第一篇解读《矛盾论》的文章，其实讲的不是具体的矛盾观点，真正讲的是马克思运动和联系的观点。

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运动和联系的理论，才推导出了矛盾的一系列观点。

要不然写那么多文字干嘛？直接上一句话：“抓住事物主要矛盾”，不就完了。

之所以要把这个理论的历史过程，衍变过程，推导过程讲清楚，就是为了能更好的理解。

我在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物理老师，他讲物理课有一点就讲得非常好，就是每一个公式，它会把这个公式的整个推导过程给你讲清楚，其实这个推导过程是什么呢？

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公式？

有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就可以背下来的公式，他能花两三个课时来讲，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整个公式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对这个公式的理解，往往会十分深刻，这个时候再去解物理题目，你的感受和直接想办法套公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更加清楚的看到题目的变化，题目想考什么，甚至这个题目出的妙不妙你都可以感受出来。

虽然讲解基础公式花的时间多，但是后面讲题的时候，往往就一点，大家就明白了，这部分时间就节约下来了。

《毛选》里最常用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调查。

这个调查是调查什么呢？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个来龙去脉就是历史。

回到我们这篇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它为什么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又为什么强调国民党的战争史？

就是为了把双方的战略战术的发展历史给大家讲清楚，知道了它是怎么来的，才知道它要往哪去。

也才知道双方之间的战略战术是不相同的，是不能完全拿来对比的，是各自有各自的基因的。

大家生活里多代入这个观点，就明白历史的意义了。

第二，

事物的现状

所谓的事物的现状，就是要把事物目前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以及所有跟事物有关的内容搞清楚。

《战争与战略问题》这篇文章，开篇讲的是什么？

是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

《论持久战》开篇讲的是什么？

是中国的特点和日本的特点。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开篇讲的又是什么？

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也就是帝国主义支持不同军阀统治中国的特点。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开篇讲的是什么？

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然后才由着这种特点，发生出我们所研究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

我们把这个规律带进所有《毛选》文章里，所有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类型的文章，都是如此，一定是先把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分析出来，方方面面摆出来，然后才开始提解决办法。

为什么如此呢？

就是因为，一切没有建立在具体事物特点和实际情况上的办法，都违背了一个原则——实事求是。

我们说实事求是的第一条是什么呢？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第二条，才是研究规律。

没有从实际出发的根本着眼点，那一切都变成了空中楼阁。

上面我们说调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事物的来龙去脉，也就是历史。

而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就是事物的现状。

所以，调查到底要调查什么？

一句话：事物的历史和现状。

第三：

学习理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

我们常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理论要结合实践，这些话当然是对的，但是它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容易让人把实践的比例看的更重。

本来这也没什么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毛教员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背景是在极力反对当时的教条主义。

但是实际上，理论和实践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可能在具体的事件中，理论和实践各自的作用会有大小之分，但是普遍来看，两者的作用和地位是一样的。

《毛选》里教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理论当然不能被当做教条看待，学习理论的唯一目的：是用这个理论去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

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常常苦苦寻思找不到出路，找不到解决方案，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历史和现状之外，第三个原因就是没有用于指导解决这种问题的理论。

中国革命，是有了马克思理论以后，才真正的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做科研的，没有理论指导，想要突然凭空创新那是不可能的。

做项目的，没有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你会平白无故犯很多错误，冒很多风险。

做社会学的，没有一定的基础理论，就容易被公知欺骗，被鸡汤蒙蔽，被资本家疯狂割韭菜。

当然社会学的理论，往往需要一些基本的哲学观点做支撑，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学一点哲学，有一些基础常识，能帮助我们大大的认清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归纳一下：

学习到底是学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上述三个方面。

学习这件事物的历史，学习它的现状，学习它的理论。

第十三篇，读《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

一、

历史背景：

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时候写的，一篇发表在当时的延安日报上，一篇是给延安青年们作的一个演讲。

这和当时大量知识分子、有志青年、学生群体纷纷涌入延安有关系。

当时间到了 1939 年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两年。我们之前说过，共产党提出很多抗日救国的口号，尤其是其中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这十大纲领以改革军事、改革政治、改革民生为主，军事上要求实现官兵平等、政治上要求实现抗日自由、民生上要求改善群众生活条件。

除此之外，还包含了一系列的教育、文化领域的改革纲领。

这个纲领啊，我们说蒋介石其实是实现不了的，他们本身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他们或许可以作出一些让步，但是绝对不会作出任何改革。

就好像军事上的官兵平等，国民党军队本身就建立在军队私有的基础之上，常年军阀混战也是这种基本性质决定了的，这种性质的军队，你要实现官兵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你把上层官僚打碎了重来。

可是打碎了，它还是国民党吗？

对于号召群众这件事上，也是如此，你要号召群众不是嘴上说的，而是要在阶级利益上作出改革，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使农民也掌握土地。

这可能吗？这不可能。

所以，共产党提出的很多口号，国民党是办不到的。

虽然国民党办不到，但是群众听得到，于是就有了大量的群众在共产党的这种号召之下，被组织起来，被发动起来。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红军由原来的三万人，发展到近 30 万人，这个时候称呼已经是八路军。

也就是说，两年的时间军队扩张了十倍。

不仅仅如此，党员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延安以及解放区组建了大规模的民兵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党的基层组织。

其中，延安一带，吸引了大批量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我们说用运动的眼光看问题，这就是两年时间里，在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之下，迅速发展取得的伟大成绩。

有了这批力量，就为后来的百团大战，敌后大规模的游击战，歼灭 90% 伪军，把日军过半力量牢牢拖在敌后根据地的包围圈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没有这样的发展，没有群众参与进来，没有大量的民兵组织，大规模的游击队，这样的作战是不可能实现的。

以上是整个的大背景。

在这个背景之下，也衍生出一系列的新问题，比如后来我们看到的，关于文艺标准的大讨论，文艺该为谁服务？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如果搞文艺创作等等，甚至也出现了一些恋爱有关的问题。

而这两篇文章，《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为当时涌入延安的青年学生群体写的。

二、

五四运动

我们借着这两篇文章，来讲一讲五四运动真正的历史意义。

今天，我们只要一谈到五四，大抵上只是讲一批热血的学生，勇敢的走在时代前列，挑起民族大梁，宣扬爱国主义。

然后，就如《后浪》宣传片一样，将青年学生阿谀吹捧一阵，并谆谆告诫他们，要珍惜眼下这个美好的时代。

如果我们对五四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认识到五四的意义，五四的精神，五四的历史作用。

今天，我们从几个维度去重新认识一下五四运动：

第一：反抗精神。

五四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主权受损的背景下，首先从青年学生身上发起来的。

他们当时的运动反对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反对当时的北洋政府。

他们提出很多具体的要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抵制日货、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力，拒绝在和会上签字”等等。

这些都表明他们对现有北洋政府已经彻底失望，他们需要通过这样的群众运动，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他们知道政府已经无法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五四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反抗运动。

它的精神，是一种反抗精神。

这种反抗精神的背后，代表着的是一种觉醒，大家开始勇于表达自己的诉求，纷纷自觉主动的参与到国家政治里面，而不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第二：

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这是五四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从五四以后，中国的革命开始拉开新的序幕。

为什么要以五四作为标志？

因为五四不仅仅只是青年学生觉醒了，青年学生只是这个运动中最先觉悟，并最先组织起来的一个社会群体。

整个五四运动，在以学生运动拉开序幕以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小资产阶级等纷纷加入了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中来。

这才是五四的伟大意义。

而在此之前呢？应该说，这些社会群体并没有觉醒，尤其是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没有觉醒。

中国在 1952 年以前，近百年的革命运动，我们就是以五四运动作为分水岭，把它们划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为什么那么划？

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先后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这些斗争中，有农民运动，有封建势力的自救运动，有打击侵略的自卫运动，有维护皇权的内部改良革新运动，有封建色彩的打击帝国主义运动，还有以资产阶级为主的革命运动。

这些运动中，不管出发点如何，不管维护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

这个辛亥革命，是以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追求实现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革命，但是最终它还是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这是由于，要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买办性质，很多都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当初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工厂，倒卖洋货，开办银行等等，他们找的代理人就是中国的第一批买办。

所以，这个阶级在参与了一定的革命运动，追求自己利益完毕以后，其软弱性就体现出来，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任务。

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就意味着，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环境下，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无法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历史使命的。

于是，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最终就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

而无产阶级的兴起，以工人阶级为代表，以农民阶级为主要力量，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

它的序幕就是五四运动。

以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随后在五四期间，出现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从此标志着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力量起来了。

而这种力量一旦起来，就必然催生出一个领导这种力量的政党，于是随后的两年，一个伟大的政党出现了，他们代表的就是中国无产阶级。

这个政党，就是——共产党。

随着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领导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终于找到了一条可能成功的道路。

因为之前，靠资产阶级力量，已经是确定的不可能完成历史使命的了。

所以，我们就把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从此拉开了新的序幕。

也就是我们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那为什么不叫个新名字？非得也叫民主主义革命呢？

是因为它的历史任务并没有改变，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要消灭资本家，而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这两个历史任务，都是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革命所要实现的历史任务，只不过他们承担不起来罢了。

于是，我们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把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分为了两个历史时期。

即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时期。

所以，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无产阶级觉醒了。

在这种觉醒之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开始走向同一个战线，开始了他们伟大的革命斗争历史，直到经过了共产党的发展，农民被组织起来，红军成立，再到抗日战争，这个统一战线终于逐渐完成。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五四运动作为起点的，也代表着中国最先觉悟，最先起来的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三、

青年学生的任务

我们只有明白了五四的背景和意义，我们才能知道青年学生的方向在哪里。

他们该干些什么？这些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力量，该如何引导，该如何培育他们的价值观，使命感？

我们上面说了，五四以后，以青年学生为代表，工人阶级觉醒了，随后几年农民阶级觉醒了，再往后，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无产阶级被阻止起来，朝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目标而奋斗。

如此来看，知识青年，学生群体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和工人、农民为主的群众们结合在一起，发挥他们的革命作用。

所以，我们识别知识分子，识别青年学生们是不是革命，不是看谁嘴上说着信仰社会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不是看这些。

他们革命的标志，就是看是否愿意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

因为，中国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历史革命任务，主力军是工农阶级。

你同他们结合，你就是革命的，你不同他们结合，你就不是革命的。

怎么结合？

青年学生们自己必须团结；

青年学生必须同工农兵也搞好团结；
 青年学生也要学习抗日的革命理论；
 青年学生也要参加革命的生产运动，也就是你们也要种地，做工。
 青年学生的知识、技能要为工农群众服务；

这就是青年学生的方向，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他们奋斗的方向，是他们革命的方向。

这就是《毛选》第二卷里的这两篇文章所要讲述的东西，它告诉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五四精神，可能有反抗，也可能有团结；可能有破坏，也可能有进步；这些都只是表面，背后真正的意义在于，他们是在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作出他们的贡献。

他们反对北洋政府是推动社会进步，他们团结工农兵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他们破坏旧社会的秩序，是推动社会进步，他们维护新的统一战线，也是推动社会进步。

他们是反抗还是顺应，完全看的是对象而已。

他们当然是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但是他们的前途又不仅仅只是他们自己对小资生活幻想出来的前途。

在今天的中国，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也决不能改变。

推动一切社会进步因素，扫清一切社会落后因素，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才是他们真正的前途。

而不是前浪给他们营造出来的，属于少数资本家二代的命运和前途。

第十四篇，读《反对投降活动》和《必须制裁反动派》

一、

这两篇文章都是篇幅比较短的文章，但是从这两篇文章开始，意味着抗日的三个阶段里，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间点来临了。

此后的很多文章，其目标指向都是为了解决在战略相持阶段中，衍生发展出来的一系列十分棘手的问题。

之前，《论持久战》中，教员预测抗日的整个战争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守；

第二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

第三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

第二个阶段，我们也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当时教员是怎么预测战略相持阶段的，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接下来的一系列文章的背景。

我们贴一下原文吧。

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已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定，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定，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17）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论持久战》

方便大家阅读，我把战略相持阶段的原文直接引用过来了。

总结一下，这一段核心讲了什么？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

日本方面：

因为其兵力不足的原因，到了战略相持阶段，其力量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进攻了，这时候他们会选择用当初统治东北三省的办法，扶植傀儡代理人，实行对占领区的殖民统治。

同时，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他们会大力搜刮百姓财产，物资等，同时为了维持对占领地的统治，他们会对占领地的广大农村，举行大规模的战争。

八路军方面：因为我军所有的根据地，几乎都是在日本人占领的北方一带的广大农村、山区、及部分平原地带，所以当敌人停止进攻，就必然会接着清扫自己占领区的农村外围，这就意味着在这一阶段，不但会有大规模的游击战，而且我军将面临极其惨烈的“围剿”。

国民党方面：当日军停止大规模进攻，转入巩固占领区的阶段，正面战场的压力必然减少，这个时候，日本必然启用招降政策，诱降手段，破坏统一战线，分裂国民党内部。这个时候，在统一战线内大搞摩擦活动，搞分裂活动的危险就必然发生出来。

这就是战略相持阶段的三个不同方面会出现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都在相持阶段来临以后，相继准确的出现了。

二、

所以，这两篇文章，即《反对投降活动》和《必须制裁反对派》，当时针对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国民党开始在战略相持阶段，出现了妥协投降的危险，以及开始了针对共产党的一系列分裂活动。

这些活动中，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制造舆论“八路军游而不击”、“陕甘宁边区实行武装割据”、“根据地搞分裂，不统一”、“在后方捣乱，搞破坏”等等。

而此时，国际上，英、法、美等国开始了所谓的居中调停，这种调停就是之前《论持久战》中预测的，英、美帝国主义国家会出来发表什么“既成事实”的言论，也就是说日本既然已经侵略了，是既成事实了，那就承认这样的事实。

而此时，果然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就出来居中调停，力求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面，也就是希望日军继续占领东北，甚至华北。

由此召开了所谓的“太平洋会议”。

这个时候，教员在《反对投降活动》中，坚定的指出不能接受这种调停，要把日本赶出鸭绿江方才罢休。

随后两个月，又在《必须制裁反动派》中，针对国民党搞摩擦活动，制造平江惨案一事，表

明了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表明了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基本原则。

这是这两篇文章的历史背景。

三、

原本这两篇文章《反对投降活动》和《必须制裁反动派》没有什么值得去解读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挺值得研究一番。

教员为什么能把后面的这些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预测的那么精准？

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的预测中，把困难估计的过分严重了，其实是会打击自己的信心，犯一些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比如，不敢在敌后（也就是日军占领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如果你把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估计的过于简单了，那么当困难来临之际，自己往往手忙脚乱，全无应对之策，实际上也容易犯右的、左的各种错误。

也就是说，我们越估计的精准，那么准备工作和应对工作就会越恰当，越合理，犯的错误就会越少。

而毛泽东是怎么把战争的走向，预测到如此之精准的呢？

这一点我想是我们最值得研究和学习的。

总结一下，其实不外乎以下几种能力：

第一，战略眼光

所谓战略眼光，就是可以深刻的把握矛盾的运动规律。

我们此前说，战略眼光是什么？是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看问题。

其实，用这种眼光看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矛盾的运动规律。

拿上面战略相持阶段来讲，教员之所以可以推测如此精准，就在于对矛盾运动的深刻洞察。日本方面，当它无力再进攻的时候，它面临的矛盾，就变成了巩固占领区和占领区广大农村有八路军的根据地这一矛盾。

因此，它一方面要对国民党求得和平，借他们的手对付八路军，同时自己也开始制定计划，围剿八路军。

只要他们面临的矛盾，是占领区的巩固，与无法巩固之间的矛盾，那么他们的一切行为，就是朝着解决这个矛盾而发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一个事物，只要看清了它面临的主要矛盾，那么就能大致预测他的一切行为、行动。

第二，对事物的评估

有对矛盾的预测，只是第一步，是最基础的一步，但是如果你只看到了他面临的矛盾，但是对他本身没有合理的评估的话，其实还是无法判断他会采取什么行动。

比如，你知道一个人缺钱，他面临的矛盾就是想要钱，又赚不到的矛盾，其实你是无法判断他接下来的行动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人性格，能力，能干些什么？这些你都不了解，即使你知道他缺钱，他的一切行为必然围绕着赚钱展开，但是你却不知道他具体会朝哪个方向展开。

你只有对他的能力，能干些什么？
 他的性格，是否好高骛远？
 他的毅力，是否能吃苦？
 他的机会，也就是他所处的环境，有哪些资源可以供他利用？

我们只有对这些方方面面，都考察清楚了，除了有质的判断，还有量的估计，才可以对接下来事物的发展作出精准的预测。

第三，对可能性的估计

矛盾决定了事物的运动方向，对事物的评估决定了各种可能性的方向，那么接下来需要更精准的话，自然就是对各种可能性作出估计。

我们之前说过，任何事物的发展，除了有必然性之外，还有偶然性的因素同时存在，正是因为如此，人永远都不可能完全预知未来的发展情况。

那么，你需要尽可能的精准，除了矛盾、事物的评估，就必须对这种可能性也作出一定的估计。

比如，日军扫荡敌后根据地，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可能发动多少兵力？
 蒋介石要开始搞摩擦，那么他的摩擦会搞到什么程度？是直接搞到彻底分裂，还是只是维持摩擦的性质，不会像土地革命时期那样直接大规模围剿？

这些可能性都存在，那么你如何判断每个可能性的大小，决定了对事物的精准预测，能精准到什么程度。

比如，蒋介石在抗战相持阶段，矛盾发生一定的变化，必然会开始反共摩擦行动，他也可能发动之前的围剿。

都有可能，但是哪个可能性占比多少？

这种对每一种可能性的大小的估计，是极难的，你看《论持久战》预测了那么多未来的战争

局面，但是它也是算命先生，它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战略相持阶段来临，那个时候能爆发太平洋战争，更不知道未来美国会给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

这些都是它完全无法预测的。

所以，对于各种可能性的估计，也只能停留在估计。

但是最终要估计的准，除了上面最开始的对矛盾，事物的特征评估准确之外，对事物发展各种可能性的估计，就只有靠长期的理论和实践的积累了。

第十五篇，战略相持、反共摩擦、利益一致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三个主题。

第一个，战略相持；第二个，反共摩擦；第三个，利益一致。

第一：

战略相持

战略相持阶段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有点类似于黎明前的黑夜，异常的艰难，这是由于双方在此阶段，都会拼尽全力，想要谋取自己的胜利，所以战争就会陷入艰苦的拉锯之中。

这种战略上的拉锯，有几个表现：

其一：对敌后根据地开始大规模的军事扫荡行动；

其二：对占领区实行“以战养战”的残酷掠夺；

其三：释放虚假的和平信号，从政治上诱降，以期待把中国方面的投降派、妥协派拉到自己的阵营，同时培植大量伪军。

其四：开始破坏国共之间的团结、破坏统一战线。

其实啊，不仅仅是战争中会出现这种战略相持，我们每个人在奋斗生涯里，都可能会遇到这种战略相持阶段。

外部困难成数倍增加；内部出现裂痕；悲观情绪严重滋生出来，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黎明前的黑暗。

它是一个非常难熬的阶段，但是却又是迎来希望的阶段。

所以问题就来了，如何判断我们所处的战略相持阶段，黑暗时期，是黎明前的黑暗，还是崩溃前的苦难？

对吧，都是困难数倍增加，都是各种负面情绪，都是处于至暗时刻，但是它却又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我们说的黎明前的黑夜，一种也可能是崩溃前的苦难。

拿这场抗日战争来说，这个战略相持阶段会被历史证明，于我方而言，它是黎明前的黑夜，但是对日本来讲，它就是崩溃的前兆。

如果我们不能判断这种艰难期是什么性质，那么就无法作出合理的决策。

很显然，如果是黎明前的黑夜，那么我们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就是作好迎接困难的准备，再难也要咬牙挺过去，激发一切有利因素，排除一切不利因素，争取最后的胜利。

如果它是崩溃的前兆，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及时止损，把崩溃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你搞项目也是这样的，在困难期可能会遇到资金链的问题，用户增长的问题，产品技术突破的问题，运营上的各种问题。

尤其是当项目运行到一定阶段，一定规模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黑暗期，你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毫无意义的打气、吹捧，搞鸡血，甚至是带有冒险色彩的豪赌。

你首先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判断目前阶段的性质。

也就是我们说的它到底是黎明前的黑暗，还是崩溃的前夜？

如何判断？又要用到我们矛盾的分析方法了。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如果战争处于第一阶段，也就是日本进攻，我军防御退却的阶段，那么整个战争的决定权，其实是在日本手里。

战争的性质主要可以定义为：日军的侵略。

此时，战争的走向，主动权是掌握在日本的手里，它继续进攻，我们就只能继续退却，它停止进攻，我们就可以暂时的保留某些重要城市。

整个主动权是掌握在日本手里。

如果说，战争已经进行到我方反攻阶段，那么其实也不难判断：

战争的性质就是：我们的战略反攻。主动权完全在我。

我们的目标就是，彻底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

可是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这个性质就比较难以判断，难点在于此时矛盾的双方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

我们说矛盾时刻处于运动之中，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一定是运动的，一定是不平衡的，因为不平衡，所以它不断超前发展。

但是，在某个阶段，会处于相对的动态平衡，也就是看上去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化学方程式里的动态平衡，其发展方向完全取决于条件的变化，既可正向运动，也可以逆向运动。

战略相持阶段，就是这种矛盾的动态平衡阶段：

我方力量时而增长，时而减弱；

根据地时而扩大，时而减小；

群众参加统一战线的热情和程度，时而增长，时而低迷；

国共合作，时而稳定，时而波动。

这都是由于相持阶段，日本所采取的那一系列手段所造成的。

反之，日本方面，持续的投入兵力，但是中国却始终坚持抵抗，此时兵力不足，又深陷战争泥潭，资源难以维系，矛盾无法解决，进也不能，退也难退。

所以，双方为了赢取战争的胜利，在此阶段，就会使劲全力，改变外界条件，使得战争朝着对方期待的方向变化。

这种时候，对于战争的性质的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决定着战争的走向。

那么，我们回到开头，如何判断此时的困难期，是黎明前的黑夜，还是崩溃的前兆？

对这场战争而言，有两个要素：

一、我方力量的增长动力，是否还存在？

随着敌人大规模的破坏，导致我方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负增长，波动巨大，看起来有走向失败的可能性。

可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增长的动力源是否还在？

如果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还在，那么即使遭受巨大的损失，暂停增长，那么战争还是有极大的可能性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二、我方在外界巨大的困难和挫折之下，是否还能活下来？

如果可以，动力源还依旧存在，那么这就是黎明前的黑夜。

什么是动力源？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加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是否还在？

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是否能在巨大困难下活下来，这一点以当时的情势判断，也是肯定的。

由此，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坚持克服困难，坚持创造条件，这就是黎明前的黑夜，而不是崩溃的前奏。

而反之，日本就不同了，他们力量持续的增长，经济持续的增长，资源消耗的来源渠道，都没有稳定的动力源，要获取这些东西，需要他们耗费极大的成本才能换来，这种极大的成本

里面，就包含了太平洋冒险战争。

而冒险的战争，往往又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自我毁灭，所以他们的战略相持阶段，其性质就是崩溃的前奏。

其实，这两个要素的根源在哪里？

大家只要稍微想一下就能立刻明白，只不过是那四个字：人民群众。

第二： 反共摩擦

我们接着再聊聊反共摩擦的主题。

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诱降政策出现，必然就会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倒向日本侵略者的怀抱。

同时，随着正面战场的压力减弱，敌后根据地的快速发展，老蒋立刻就会回过头来开始制造反共摩擦。

我们当然可以想明白老蒋为什么要制造摩擦，一方面在抗日的这两年时间里，八路军根据地和队伍迅速扩大，力量不断增强，政治影响力也空前巨大了。

另一方面，随着大资产阶级妥协空气增长，在国民党内部抗日的情绪减弱了，阶级矛盾反而上升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老蒋在战略相持阶段的表现，即开始不断的制造两军摩擦，想要抑制或是消灭八路军势力。

可是呢，他的局面又很尴尬，一方面他不能把主要矛盾转移为阶级矛盾，不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却贸然发动两党战争。

但是，他又不能无视共产党力量的逐渐增强。

于是他就很矛盾了，一方面不敢公开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方面却又无法眼睁睁看着他们壮大。

这种矛盾就激发了一种合作中的畸形产物——摩擦。

一般来讲，这种摩擦的诱因，如果只是观点的不同，是可以调和的。

但是，如果这种摩擦的背后，是整套思想的不同，是整套理论，价值体系的不同，那么一般来讲，这种摩擦迟早走向破裂。

之所以还能维持住表面的团结，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双方面临着同样一个主要矛盾，也就是在某种条件下，双方达成了暂时的团结统一。

《毛选》里告诉我们，为了实现团结，实现统一战线的继续，我们的斗争可以总结为三点：

- 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 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 三，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我们也只有那么做。

可是，为什么矛盾的双方中，老蒋就急不可耐的要制造摩擦呢？
而我方却一直能避免则避免？能让步则让步？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把抗日放在第一位。

这里面原因很简单：

团结、抗战、进步，有利于八路军、新四军的继续发展，有利于抗日的继续进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尽快解放。

而这一切正是我们为之努力和奋斗的目标。

而对老蒋集团来说则不同：

团结、抗战、进步，除了可以打击日本之外，还有利于对手的做大。

看吧，老蒋的心思总是放在自己的集团利益之上，总是去关心对手是不是做大，却不关心一下，为什么同样是团结、抗战、进步，自己却做不大？

你为什么害怕你的对手？

实际上在抗战之中，国民党集团可以得到的国际援助、海外侨胞援助、国内舆论的支持等等资源，是要远超共产党的。

就连苏联给予的很多军事援助，给国民党的都比给共产党的多。

为什么你就整天担心对手做大？

你为什么不去思考，为什么对手能做那么大？他靠什么做大？

这些问题，如果蒋介石不想清楚根源在哪，不想清楚该如何解决，那么你的应对措施就起不到作用。

即使你要防止对手做大，但是你起码要搞清楚让他做大的核心动力在哪里吧？

它们不是因为你不剿，它就不大，当初你搞了五次围剿，剿灭了吗？还是没有啊。

它们的扩大，是因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这些群众需要温饱、需要土地、需要平等，需要教育，需要独立，需要这些。

这个时候，谁能给他们这些，谁能领导他们争取到这些，他们就会义无反顾的和谁站在一起。

这种力量，是你老蒋能剿灭的吗？

有这个心思，就去想想怎么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那才是最好的“摩擦”方法。

第三

利益一致

《毛选》中那篇“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讲到了战争的正义性，也讲到了利益的一致性，都颇有启发意义。

其实，利益本身它应该是个中性词，它是没有贬义，也没有褒义的。

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提到了利益二字，一点也么有什么避讳的，我们常常提到的阶级斗争，其实也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斗争。

我们也经常说到立场之争，说到站队，说到专政，这些背后都是意味着代表不同的利益。

反之，如果一段关系，合作，出现了利益不一致的情况，实际上它的风险就出来了，很可能走向破裂。

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只不过每个人对于利益中的具体要素权重比不一样而已。

有的人那里，感情的权重比更高些，有的人那里物质的权重比更高些，还有的人那里，人生追求的权重比更高些。

所以看起来就好像很复杂，其实背后还是利益的问题。

《毛选》第三卷中，引用了一句话，解释了夫妻关系，爱情关系：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知识分子爱工农群众，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命运是和工农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这句话我们换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说：知识分子爱工农群众，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工农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相反，如果某一天利益不一致了，这种爱就必然会消失。

男女之爱，其实也很类似，决定两个人是否拥有爱情，也可以用这句话去验证：就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归属，是否还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否是一致的？

如果两个人的命运和前途已经背离了，他们各自需要走向不同的轨迹，而对方的存在只会使得自己偏离这种轨迹，甚至阻碍自己命运走向的时候，矛盾就出来了。

我们说三观不同，理念不同，其实就是双方想要的命运走向不同，不管每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走向的看法是否正确，是否偏执，但是只要两者根本利益出现了矛盾，走向不同了，其实矛盾就出现了。

所以，找一个和自己有同样命运归属的人，就是爱情。

第十六篇，《共产党人发刊词》

党的建设

历史背景：

这篇文章，我们读一下《共产党人发刊词》，这个发刊词是为 1939 年 10 月出版的《共产党人》的刊物而写的，所以叫《共产党人发刊词》。

当时间来到 1939 年 10 月的时候，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此刻的现状是什么呢？

第一、日本方面，开始巩固占领区，所以敌后根据地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第二、国民党方面，开始制造反共摩擦，统一战线面临着被分裂和破坏的危险。

第三、共产党方面，随着党员组织、军队力量、根据地范围的迅速扩大，必须保证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方面跟上发展速度。

而这篇《共产党人发刊词》，就是具体的针对第三种形势，而写的一篇文章。

正如此文开篇所说：

“我们的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

而如何保证应对接下来的一系列可能遇到的困难呢？这就提到了共产党革命斗争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也即是说，只要掌握好这三个法宝，运用好这三个法宝，那么我们就能不断发展，同时能应接接下来的投降和分裂危险。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聊的核心内容，就是这三项：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一、

党的建设

任何一个群体，组织的建设，都是方方面面，涉及诸多因素的，比如常规我们一个群体的建设就包含这样几个大的方面：

思想建设，
制度建设，
组织建设，
文化建设。

当然，如果是官方机构，一般还会有政治建设、纪律建设等等。

一般来讲，所有建设项目中，最核心的是思想建设。

思想通了，其余的制度、文化、组织、纪律等等，都是跟思想体系配套的。

比如，我们之前说过三湾改编，那个时候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三湾改编，改编的是秋收起义失败以后剩下的那支残兵败将。

这个改编，是在前往井冈山的路上进行的，也就是说部队还没有上井冈山呢。

改编的两个主要内容是：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

这个看起来是制度建设的一部分吧？对吧。

你提出了要在连的单位上建立党支部，使得党的思想能够最大程度的贯穿到基层组织，同时基层组织的思想，又可以随时反应到上层那里。

由此，方便党和士兵们始终保持着思想上的一致，既能实现倾听基层想法，又能实现上层想法的及时贯彻。

这就是制度创造，或者说制度改革嘛，最多说得更宽泛一些，叫组织改革或组织建设嘛。

那个士兵委员会也是一样的，士兵成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直接监督上级，监督军费使用情况，监督军队的贪污、打骂士兵、违反纪律等等现象和行为。

这个也是制度建设，如果涉及组织变更或者调整，那么也可以说它是组织建设。

但是不管你叫它什么建设，其实背后最根本的却不是制度和组织的变更，而是思想的变更。

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

支部建在连上，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是民主集中制。

士兵委员会，背后的指导思想又是什么？
是官兵平等、官兵一致。

也就是说，你只有思想上，认为士兵也有发表意见，发表想法，发表看法的权力，你才会搞出这样一个支部建在连上，让他们去发言。

试想一下，如果你认为士兵是没有发言权的，士兵就仅仅只是听指示就可以了，那么你不可能在组织上，或者在制度上搞一个“支部建在连上”。

当然了，士兵也不能毫无休止的乱说一通，你们的意见和想法被收集上来以后，经过分析、处理，又回到士兵基层之中。

这个时候你又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发言，但是没有决定权。

这样就既保证了及时获取基层意见，又保证了执行上的准确无误。

那个士兵委员会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思想上不认为官兵应该平等，那你就不可能把监督权给到士兵委员会。

这个是很显然的事情，你只有思想上认为，官兵之间就是一致的，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那么你才可能把监督的经济、监督打骂现象、监督贪污现象的权力给到士兵们。

所以啊，这个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其实根本上还是思想建设。

你思想上通了，制度哪里不合理，哪里应该改进，你就能很清晰的看出来，而且如果群众思想通了，他们就会运用他们的智慧，想出很多办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来帮助完成制度、组织的改进和建设。

比如，你说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什么不打人、说话要和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这背后体现的就是一种群众观嘛，你怎么看待群众，群众是你的什么人？

你的看法决定了你会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

这种纪律建设、组织建设，在今天很多企业里面，也被叫做价值观建设，或者文化建设。

但是其根本上讲，还是思想建设。

所谓的制度、纪律、价值观、文化，不过是思想在具体行动里的表达。

之所以要把他们单独归纳出来，用于实际建设之中，是为了保证你的思想能准确的表达出来。

你不设立士兵委员会，那你官兵一致的思想也就无法通过具体的形式进行表达，你不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规则，你的群众观的思想，就无法在实践中进行表达。

所以，党的建设，本质上是思想建设，其余的制度、组织、文化，都是为了保证思想的畅通无阻。

因此，我们如果进行的是具体的制度、纪律等建设，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们提出的这个方案，背后是想表达什么思想？

思想上对不对？表达方式上对不对？

是思想出了问题，还是具体方案不能合理执行这种思想？

二、

好了，讲到这里，我们接着需要聊的自然就是这样一个话题了，如何进行思想上的建设？

因为，具体行业，具体公司，具体业务，需要的组织、纪律、文化都是不同的，需要大家根据自己的特点去进行建设。

但是，思想上的建设方法，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所以我们重点聊一聊思想建设。

什么是思想？

我们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大家不要小瞧这句话，我们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也就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所应该反映的，是社会一切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

正确的思想，必然是因为它正确的反映了客观规律，错误的思想也必然是因为它错误的反映了客观规律。

在目前条件下，人是要吃饭和睡觉的，这是客观规律，如果有人思想里认为人不需要吃饭和睡觉，那么他的思想就违背了客观规律，就是错误的。

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对于如何建设思想，就能找到办法了。

它应该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过程中，最基础的首先就是理论建设，什么样的理论呢？

支持我们思想建设的理论，是马列主义。

所以，党的建设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学习马列基础理论知识，否则你就不要加入共产党，对吧。

这一条，用在家庭里也可以的，不是说每个家庭都要学马列，我常常对我哥哥说，（他家有两个小孩），我说要在家里进行常识建设，要教育孩子多学习和领悟常识。

换位思考、珍惜粮食、努力学习、勤洗手爱健康，这些都是常识，都可以对孩子进行教育，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一种常识建设。

它的本质，就是客观规律的熏陶和掌握，就是思想的建设。

如果能把常识，提升到理论高度，更让孩子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那就更好了嘛。

这种思想建设，用在产品研发上也是一样，任何产品研发，必然有这款产品的理论作为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造。

第二：历史和现状

有了理论，还需要实践，任何的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改造世界而存在的。

你的思想如果不是用来指导实践，那么它将毫无意义。

所以，思想要稳固，要成熟，要正确，必须将其运用到实践中，也就是要运用到具体的事物中。

在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思想是需要用到革命实践中的，所以他强调，必须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

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就无法把思想准确的和实践结合起来，就要失败。

任何事情都是一样，你要把思想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实际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个来龙去脉就是我们说的事物的历史和现状。

《毛选》里面，经常讲到革命的历史，讲到共产党是怎么诞生的，中国革命走过那些弯路，遇到过哪些挫折，取得过哪些成就，有过哪些路线斗争等等。

这都是为了在思想建设中，让人们了解我们正在干的这件事的具体来龙去脉，否则你就干不好它。

我们常说，开个会把思想统一一下，写个历史决议，把思想统一一下，都是这个意思。

第三：事物特点、规律的总结

思想建设的第三项内容，就是把这个行业的特点，规律总结出来，让人们清楚这些特点和规律，以便于统一思想。

《毛选》里的很多文章啊，不厌其烦的讲革命的规律，中国的特点，战争的规律，战略的规律，战术的规律，甚至讲国民党的规律，军阀的规律，老蒋的规律等等。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已经掌握了的规律，讲的越清楚，人的头脑里的思想就越趋近于客观规律，就越正确，就越能发挥作用。

以上三点，是思想建设的必要内容。

它的本质没有例外，不管是理论建设、还是历史和现状的教育，还是事物特点、规律的教育，本质都是一样的。

你需要他们掌握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的客观规律，因为思想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建设思想，就是塑造正确的客观规律意识。

掌握了这一条规律，其实我们还可以就这个话题衍生出很多问题的答案。

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分析了。

这篇解读文，就先说党的建设吧，主要讲的其实是思想建设问题。

下一篇，我们再补充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上一篇文章，我们讲了党的建设。

这篇文章，我们接着聊一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党的统一战线，其实可以用那么一句话来总结：正确处理同各阶级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何搞好统一战线的本质，其实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同各阶级的关系。

当然了，我们推而广之一下，我们身边的统一战线，也可以翻译成如何处理同各部门的关系，如何处理同家庭各成员的关系，如何处理同身边各同事的关系，如何处理同各项目、公司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实质。

一、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统一战线为什么失败了？

首先，我们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怎么建立的呢？

当时原因并不复杂，主要是两个：

第一，孙中山闹革命闹了一辈子，可是屡屡失败，不是被袁世凯捡了便宜，就是各路军阀混战不休。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始终如两座大山一样，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就算换了皇帝，换了总统，但是并不改变这两座大山的实质。

因此，接近晚年的孙中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而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就是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两党合作的思想基础。

第二，孙中山想从苏联那里得到军事援助。

在这种背景之下，最后两党走向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共产党的优势是做群众工作，号召和发动群众，因此在第一次北伐战争的时候，群众的配合是国民革命军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保障。

可是，随着革命的进行，两党所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越发的激化起来。
工人运动的实质，必然伤害了资本家的利益，农民运动也必然伤害到地主的利益。

我们前面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农民运动对地主形成的剧烈冲击有多么可怕，以至于连我党内部很多人都说，农民运动太过火了，太左了等等。

后来我们自己也总结过工人运动，其中也说到一些过火现象，比如：
不顾实际的要求数倍以上的加工资，要求每天只工作 4 个小时，要求瓜分工厂等等。

随着两党合作的利益开始减少（北伐战争已经快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而两党合作的弊端开始逐渐增多（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其合作就必然走向分裂。

只不过看是谁先提出来，谁先开始行动而已。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汪精卫搞七一五，我们毫无还手和抵抗能力，造成巨大损失。

二、

随后即开展了土地革命战争，虽然我们与国民党已经完全对立，不存在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内部，对于小地主、富农、中农、中间派、知识分子等等，也有一个统一战线。

这个统一战线没有认识透，没有处理好，带来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我们知道，中间派、富农、富裕中农、知识分子等，他们往往具有两面性，当革命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比如革命中驱逐了大地主、恶霸、土匪等等，对他们也有利，他们就会支持和拥护。

反之，如果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打到了他们头上，分了他们家的地，他们就会跳出来反对革命。

他们不像贫农，怎么分都有利，所以他们很摇摆，这种摇摆时刻的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不清楚他们摇摆的实质，是因为利益不断的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就不能轻易的掌握他们，就不能从容的应对他们，其结果就是要么无原则的妥协，损害了革命，要么就是大规模的肃反，也伤害了很多好同志。

而且，像肃反这种事，如果制度不健全，思想不稳固，就容易被利用，最后的结果不但整了中间派，还整了无产阶级。

三、

再随后，就到了我们的国共第二次合作。

我们还是要处理各阶级的关系，这里面有这样几个阶级需要分析：

第一：民族资产阶级

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的资本家，民族企业家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在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候，是会毫不犹豫的站到抗日统一战线来的，这是同民族资本家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

但是，虽然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却和我们有根本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在同他们合作的时候，既要团结他们的力量，又要提防他们的思想、文化进攻。

第二：国民党集团

这个群体，也是一样，在面临日本要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时刻，他们是会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的，但是同时他们又时刻的想要消灭我们。

他们是否付诸行动，取决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第三：大资产阶级、大地主

这个阶级，是和我们完全对立的阶级，他们永远都不会赞同革命，但是因为他们往往背靠不同的帝国主义，所以同日本之间也会有矛盾，因此也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阶级，对我们有极端的排斥性，会时时刻刻惦记着消灭我们。

所以，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还是大资产阶级之间，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下考虑统一战线的建立。

但是又要时时刻刻的同他们在思想，组织上的进攻作斗争。

四、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如何处理同各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最基础的：独立自主。

没有独立自主，随着外部条件发生变化，你的风险会随着变大，生死存亡，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这种独立自主，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思想上，当然，革命中的话，还得加上武装斗争。

第二个：联合可以联合的，斗争需要斗争的。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识别哪些是需要斗争的，哪些是需要团结的，同一个阶级，或者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着需要团结的，和需要斗争的东西。

不能看到不利的一面，就全是斗争，就像肃反一样；也不能因为好的一面，就无原则的妥协，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第三个：在统一战线走向破裂时，提前做好斗争准备。

这就是说，一切行动以维护统一战线为原则，但是又要做好一切统一战线破裂的准备，放到

革命中，就是一旦破裂，时刻准备好武装斗争。

最后，说一下武装斗争。

不管是武装斗争，或者说战争，本质就是矛盾发展到无法调和的阶段，只能用战争来扫清政治发展的障碍，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武装斗争。

掌握军队，能够进行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1927年以前，轻视武装斗争，导致蒋介石反动四一二以后，我们毫无抵抗力。

1927年以后，准确说是毛泽东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开始重视武装斗争，但是武装斗争的发展，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去发展。

适合打游击战的时候，你不能打运动战，适合运动战的，你不能打阵地战。

红军的战略战术更加不同，其一切的战略战术，根基在人民群众那里，所谓的游击战、运动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人民群众。

缺少这个条件，游击战和运动战就打不了。

所以，红军的战略战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其本质就是你要学这一套，你先得学会把立场站在群众一边。

但是你要是立场都站在群众一边了，那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了，咱也不会打仗了。

这也算是军事上的阳谋吧。

《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文章，着重强调了我们的武装斗争，在现阶段就是游击战，同时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这就是为了杜绝大家的拼命主义，明白战争的含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第十七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这篇文章是一篇总结性的理论文章，是当时写的一个教育课本，通过读这篇文章，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如何分析中国革命的。

我们常常说他的一个身份是：革命家，那么这个革命家关于革命的认识、思想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篇文章所要讲到的内容了。

我们此前文章中，已经数次说过这样一个观点：任何的战略战术、方法论、策略计划等，都必须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制定的。

这个观点放到革命上也是一样，即是说一切关于革命的认识，以及尤其衍生出来的种种方法，都必须建立在中国本身的特点之上，也就是说，任何的思想、理论、方法都要符合中国国情。

这也是理论必须结合实际的根本观点衍变而成的。

所以，所谓的革命也好，其他一切战略战术都好，首要的第一件事，不是什么其他的事，就是先搞清楚中国的国情。

我们说一个人好为人师，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其实都是指的一个错误，主观的思考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符，因此他的建议、思考、方法也就与客观规律不符。

而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性，所以研究具体事物，就永远绕不开它本身的实际情况。

中国当时的国情是什么呢？

一开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日军占领东北，随后侵入中国腹地，中国开始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同时存在的社会。

这就是中国当时的性质。

而随后的一切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便由这个根本性质发生和衍变出来。

所以，还是那句话：任何的研究都必须首先建立在具体事物的实际情况之上，否则它们是没有意义的。

一，中国革命的对象

所谓的革命对象，就是我们的敌人。

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很清楚，你要攻击谁？你的力量来源于谁？

要搞清楚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要从中国当时的性质上去看，也就是中国当时的特点。

半殖民地：指的是中国是一个由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在中国扶植代理人、军阀、买办而间接统治的国家。

半封建社会：指的是中国原始的封建社会经济和形态，也就是地主同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大面积存在，而资本主义经济和形态，也在中国同时存在，因此是一个半封建社会。

殖民地：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以及随后占领了中国大量城市区域，实现了殖民地式的统治。

所以，由这个基本性质，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我们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中国要追求自己的民族独立，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期间，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所有主要对象是革日本帝国主义的命。

中国人民要追求自己的民主，就必须推翻国内的封建主义，封建的生产关系，消灭地主阶级。

革命的对象，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发生出来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毛选》里给大家分析清楚了，后来的历史又证明了它是对的，我们从小学习的历史课本上对这一段历史交待也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在此之前的中国百年近代史，就会发现搞清楚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经过了长期的，艰难的，曲折的发展才得到答案的。

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反清，并没有反帝的系统纲领。

后来由清政府内部开展起来的一系列强国自救运动，比如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这些都不触及明确的革命对象。

随后的义和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这个口号本身就是极其矛盾的，应该说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已经跟中国的封建官僚勾结在一起了，清朝甚至可以说就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中国的工具，只不过他们之间也有内部矛盾而已，但是本身已经是相互联结的。所以，这个革命目标也不对。

我们就不提之前的戊戌维新之类的改良主义了，他们根本连革命都不触及。

直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开始，才有了明确意义上的革命对象。

一开始的对象，也只是停留在封建主义的政权机构，统治机构，维护机构，也就是清王朝。

这个革命对象，看起来似乎已经有点准确了，可是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清政府垮台了，中国并没有实现想要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

因为，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有变，地主们不过是重新召集了新的代言人——军阀，来继续维持封建生产关系而已。

帝国主义，也仅仅只是把之前的代言人换成了新的代言人——军阀而已。

所以，革命行动还要继续，孙中山又连续奋斗在革命的路上，可是总是不得其法，因为革了这个军阀，又立刻出来一个新的军阀，换汤不换药而已。

当然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最后军阀分裂的局面，暂时性的，表面性的通过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实现了统一。

但是这种统一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改变，原因还是一样，它们并没有触及封建生产关系的实质，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形式没有根本变化。

而对于帝国主义来讲，也没有根本上触动到他们对中国的间接统治。

所以，尽管中华民国看上去是统一了，但是实质却并没有改变军阀混战，地主剥削，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因此革命依旧没有成功。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找到了明确的革命对象“反帝，反封建。”

可是由于我们此前说过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得这种革命永远无法成功，也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

所以，直到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的领导革命，革命任务才算是真正的有了意义，是真实的彻底的革命。

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仅仅只是确定革命的对象，我们就走了八十年的路，才摸清楚了革命的对象是谁。

也就是说，我们用了八十多年，才真正意义上搞清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

才由此可以确定我们的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目标，有了这些任务、目标，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革命前途，摆脱迷茫，走向胜利。

所以，我们说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是一个永恒且艰难的任务，是值得我们一辈子去不断探索和研究的事情，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由这个基本性质，有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有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打倒封建主义，实现民主自由。

随后，又分析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

说到这个革命的动力，不仅仅是革命需要动力，任何事情的发展和促成，都需要动力。

这个动力，也是由中国的基本性质决定和衍变出来的。

简单说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反抗的来源就是我们的动力，需要分析的仅仅是不同阶层的动力大小，波动情况而已。

无产阶级，农民群体，自然是被压迫最严重的阶级，所以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动力。

买办、大资产阶级，是附庸在帝国主义上面的，所以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直接的帝国主义者都是我们的革命对象。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一定历史时期会参加革命，一定历史时期会叛变革命，所以我们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矛盾变化，去判断是否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甚至一定时期内，买办阶级同样有革命的可能，只要有这个可能，就是革命的动力，就可以建立统一战线。

只要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可以了。

三、

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按照革命的阶段论去看，不同阶段的革命目标也不相同，这个后面的《新民主主义论》里，还有详细的论述，会涉及一堆现实问题。

我们这里只需要说的是，根据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我们就可以看出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因为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其实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革命的动力：中华民族，人民大众。

这就是代表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看清了矛盾的两个方面，也就可以判断矛盾的发展趋势，以及需要的条件。

因为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仍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任务，只不过因为中国情况的特殊性，它是由封建社会过渡而来，而不是直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革命的动力主要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阶级。

所以，它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过它依靠的动力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农民阶级而已。

因此，它虽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却主要依靠无产阶级来完成，因此我们又说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一点，我们之前文章《五四运动》说过，这里也不展开了，因为后面《新民主主义论》还要详细聊。

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此时仍然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

因为，我们还是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的，是要允许资本家的发展的，所以那个阶段的革命，我们就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而由着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性质，又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出来，这些问题包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为了分析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刻内涵，于是有了接下来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

第十八篇，《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中国革命可以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之所以都称为民主主义革命，是因为革命的任务是一致的，都是此前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目的的革命。

之所以有新旧的区别，在于此前这个革命任务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依靠资产阶级力量开展的革命，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他们已经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而五四以后，无产阶级开始觉醒，此时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接着成立，这一系列的变化，标志着民主革命的任务开始落到无产阶级的身上，其领导力量开始由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核心和体现，就是共产党。

这就是我们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

旧民主主义要建立的，自然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其实也就是当时蒋介石集团的中华民国。

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它与资产阶级共和国有什么区别？

这几个问题是带有蓝图性质的问题，就是说你共产党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你得描绘出一个蓝图来，让大家感受到他们是在为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奋斗？是在为什么样的文化奋斗，是在为什么样的政治奋斗？

你不回答这些问题，那么大家的信仰是无法凝聚起来的。

对于共产党内部来说，此时又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他们实际上并不清楚这个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

对外部来说，你要搞统一战线，把社会力量、人才、资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你也必须有一张蓝图，告诉人家你们将来革命成功了，要建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

没有这些，对内无法团结一心，也无法把信仰更加充实起来，对外则无法把更多

的社会力量纳入你的统一战线之中。

所以，给新民主主义画一张蓝图，就成了一种必要。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的时代背景。

而且啊，这个新民主主义，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难以名状，却又影响深远的历史地位，有人说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形态，就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当初如果一直坚持新民主主义，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发生和出现。很多人觉得，现在的特色，其实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要先把新民主主义搞清楚了，才会明白这些说法中，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一、 新民主主义之前的历史

我们一直主张，要搞清楚一个事物的面貌，必须要搞清楚它的历史和现状，看看它是怎么一步步衍变到我们看到的新民主主义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把新民主主义之前的历史简单梳理一下，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中学课本上学过的，可是那时候我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内涵。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看到的第一次巨大的历史运动，就是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运动带有完完全全的封建色彩，跟整个封建历史上，一个朝代推翻另外一个朝代具有相同的性质。

简单说，就是一帮农民受不了地主的压迫，组织起来要推翻地主，其目的是自己成为新的地主。

所以，洪秀全也好，那些东王、西王之类的，稍微取得一点成绩，立刻就变质了，所有的封建特权，在他们身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封建政权，在外有帝国主义势力，内有原来的封建势力的双重打击下，是必然要走向失败的。

我们今天说它是进步的，这个进步说的是它给予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沉重的打击，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把历史向前推了一把。

随后在地主阶级内部，也就是清朝的内部，一群实业救国和改良主义力量涌现出来，比如我们看到的李鸿章、张之洞兴办洋务运动，后来的康、梁戊戌变法。

这是地主阶级自己为了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已作出的一种自我变革，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自救。

这种自救行为的矛盾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们在不触及自己利益的条件下，愿意出来修修补补，以维持苟延残喘，但是一旦改良运动触碰到地主阶级本身的利益，地主就会出来疯狂围剿。

康、梁变法就是因为极大的触及了清王朝原先那些王亲国戚的利益，所以被统治阶级自己剿杀的。

实业救国，洋务运动同样如此，本来就是地主发起的，你不让地主阶级贪污，不让地主阶级捞好处，他能干吗？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用来办实业的白银，实际上有大量流入了统治阶级的口袋里，李鸿章买炮弹的钱，倒有一半以上，要么被贪污，要么被挪用，而最大的挪用者，就是最高的那个掌权者，慈禧太后。

你告诉我，这要怎么自救？

所以，毫无疑问的都失败了。

随后的义和团运动，以扶清灭洋为目的，这就不用多说了，一样的没有前途。

此时，离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近 60 多年，中国早已不是原来那个完全的封建社会，其中有大量的资产阶级，在这个时代开始兴起了。

同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兴起了，这其中就包括当初很多留洋海外的学子。

这些人，想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兴办自己的企业，实现自己的改革梦想，就必须扫清他们发展的障碍，这个障碍他们一开始以为是清朝的统治。

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论出现了，那些要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思想，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下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工业的新兴阶级，开始了他们的探索。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可是啊，清政府只不过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代理人，这两股势力依然广泛而深刻的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

资产阶级在他们面前，根本扛不住，所以依旧屡屡失败。

这种失败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封建势力面前，败给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势力面前，他们被迫继续承认当时清政府时期，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借、治外法权、以及势力范围完全没有被触动。

也就是说，清政府不见了，但是帝国主义依旧可以横行霸道，封建地主依旧还在残酷剥削，而且为了抢夺势力范围，背靠帝国主义的军阀诞生了，全国陷入一片战乱之中。

而在资产阶级兴起的过程中，自然也就造就了无产阶级，另外在农村中，随着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军阀混战越来越动荡，农村里也出现了大量破产者。

这些就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历史渊源。

当时间来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开始被传进中国，配合中国内部新兴的无产阶级力量，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起初，共产党只知道运用工人阶级的力量，革命始终找不了发力点，直到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人，把目光放到了农村，于是共产党的力量才有了发展和壮大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来源。

也就是新民主主革命的来源。

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革命，还是把目的放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基础上，但是推翻以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同蒋介石集团的中华民国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就出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

二、 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解释。

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

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的，是有相互联系的。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过来对经济基础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里我刻意的强调这种强大的反作用力和影响力，就是想说明，我们常常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而轻视了上层建筑的强大反作用，因而往往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始终不得力。

在实际的环境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往往是上层建筑强大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在后来的新中国建设中，简直体现的淋漓尽致。

首先先说一下经济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仅只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我们的统一战线中，还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部分大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

子等等。

那么，我们这个革命胜利以后，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如何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看看《新民主主义论》原文怎么说：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这一段原文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除了操纵国计民生，以及那种大项目由国家建设管理之外，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们可以促进经济。

只是，要严格规定，他们的发展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必须要有引导，有节制。

这是 1940 年的时候的说法，这个说法一直持续到后来的《论联合政府》都还是坚持这些主张的。

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那个时候是统一战线时期，你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双方是在一个统一战线之下的，你不可能说你要建立的是一个社会主义，没有资本家的国家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在毛泽东的设想里，中国革命必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只能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目标为导向，资产阶级可以帮助完成这个目标，而且它们确实可以发展经济，所以在第一阶段，我们不能走社会主义（那时候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是没有资本家，公有制等等），所以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将来我们要去实现的目标，眼下只能继续新民主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必须允许人家发展。

这话说的光明正大，而且随后还补充了一句，虽然眼下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是我们毫不避讳的说，将来我们是要走社会主义的，最终是要朝共产主义奋斗的，这也许在很多年甚至几百年后，但是这永远是我们的目标。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里强调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以及在遥远的未来，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经济。

这和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系列历史事件搭配起来看，还是很有意思的，这至少说明，在抗日时期，我们对于新中国的构想，还是新民主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接着我们要看看新民主主的政治，也就是国家机器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机器？

其实这里面讲的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国体问题，一个是政体问题。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其实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要建设的这个国家，到底是哪个阶级说了算？遇到难以解决的事，遇到无法调和的事，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

这是后来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最早来源，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一起说了算，也就是说，是几个阶级联合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有事大家商量着来。

其实，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当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其实你是难以商量的，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再往后我们都知道，联合专政老蒋不干，于是解放战争就把他们打跑了，最后换来了无产阶级专政。

当然，这个无产阶级如果再往后看，也没能完全坚持和维系下去，这是后来的历

史了，所以我们说要看今天的情况，就要看历史的情况。

这个新民主主义，还有一个如何实现大家联合专政的问题，这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政体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阶级在国家的意志体现。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体：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所以，什么是新民主主的政治，就是一句话：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三，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我们说，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给予经济基础伟大而深刻的影响。

我们当时的革命任务是什么？

两个：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抗日时期则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个，是打倒封建势力，这个主要指的是地主阶级。

怎么打倒？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把他们赶出中国，废除他们的一切特权，没收他们在中国的企业、工厂，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

而经济方面呢？不是消灭肉体上的地主，而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经济。也就是土地革命，重新分配，国家掌握经济命脉。

因此，我们要创造的文化，就必须是能够帮助我们摧毁这种剥削经济，打倒帝国主义的文化。

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文化，在我们宣传人民当家做主的时候，封建地主要宣传尊孔复礼的文化，要宣传奴役的文化，要宣传剥削合

理论，要宣传地主的伟大作用。

而帝国主义呢？日本呢，他们要宣传他们是来帮助建立大东亚共融圈的，要宣传“和平”文化，要宣传“良民文化”，要宣传国际共同文化，要宣传不抵抗、投降的文化。

这种文化界的斗争，其实在今天还是这个样子的，资本家要宣传福报文化，资本家创造世界文化，资本家养活工人文化，资本家艰难创业文化，资本家勤奋上进文化，资本家创造历史文化等等。

而我们呢？要宣传人民创造历史文化，宣传唯物主义文化，宣传劳动者文化，宣传平等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消除贫富差距的文化等等。

这种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过去不会有，今天不会有，未来还会一直持续斗争下去。

在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阐述得很清楚，什么是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你看，伟人还有一个特质，特别善于用简单的语言进行总结：
一切的宣传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以上，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我们说的要创造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这个国家的经济，是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发展，却又要节制它，使得它不能操纵国计民生。

而主要的经济形态，是国家掌握经济命脉。

后来，这一点又加入了国家集体经济是领导地位的补充。

这个国家的政治，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人民包括无产阶级，也包括资产阶级，大家商量着来。

当时是这样设想的，但是后来的历史并没有按照这个设想发展，这些我们以后会说到。

最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就是一切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

第十九篇，《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我们把这篇文章提前拿出来，因为它和前面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脉相承的。

从 1939 年开始，抗日战争逐渐转入相持阶段。

这个阶段的到来，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日本大大的减弱了正面战场的武装进攻，而是开始采用招降的手段，同时对于八路军敌后根据地则是加大了扫荡的力度。

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当正面战场压力减弱，而敌后战场也就是八路军根据地不断扩大，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就不断涌现出来。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相持阶段，国共之间的摩擦急剧升温。

这种摩擦也体现在很多方面，而其中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开展起来的战线也尤其瞩目。

你有你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那老蒋就有他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文化。

你有你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他就有他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在理论和舆论上的斗争就展开了，《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

所谓宪政，是蒋介石提出来的一种民主政治实施方式。

当他不断的号召，国民党实行宪政，给予民众普遍选举自由，代表全中国民意的理念下，自然就出来一批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对这个蒋介石要实行的宪政大吹特吹一番，然后其吹嘘的最终目的就是：既然现在国共合作是以国民党政权为核心，以服从蒋委员长为唯一领袖为前提的，那么共产党的边区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以往，你们总说国民党都是一党专政，搞独裁，不给人民抗日的自由。那么当蒋委员长已经宣布要实行民主的宪政的时候，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以党派的名义去号召群众呢？

你们不是搞分裂吗？

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知识分子制造的舆论，其目的是想说明共产党搞那一套是分裂，是扩充自己势力，是消极抗日，游而不击，却在背后大搞政治手腕。

这种舆论其实我们今天还可以听到，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只是简单的游而不击，只关注扩大自己的势力，却不关注抗日等等。

这些在《毛选》里都给予了完整的反驳，比如你说我游而不击，请问我们离日寇近还是你们离日寇近？

我们整天就呆在日本人的区域里，你们却躲到了大西南，难道躲得远的反而是抗日最积极的？

这些在以后的文章里都会详细讲到。

今天这篇，主要是讲国民党的民主宪政，和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到底哪个是真心诚意的发动群众，哪个是真心诚意的民主革命的。

首先，我们要从三民主义开始。

国民党提出过三民主义，这个三民主义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这个三民主义经过一定的发展，可以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一开始的时候，旧三民主义被总结为这一句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句话指向其实很明确，主要是推翻清政府实现民族主义，创建民国实现民权主义，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

可是后来，孙中山经过一辈子革命，发现清政府虽然推翻了，但是并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中华民国成立了，可是民权也没有实现，反而被封建旧势力和资产阶级所垄断了权力，而平均地权他们则完全没有做到。

后来到了晚年，孙中山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起初完全是因为想要借助苏联的军事援助，才答应跟共产党合作。

但是后来他发现，共产党的主张，其实能更好的从理念上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于是这个三民主义就经过发展，成为了新的三民主义。

虽然还是民族，民权，民生，但是意义已经大有不同。

他提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实现民族主义的斗争目标：由一开始的反封建，变成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

实现民权主义的目标：由一开始创建中华民国，变成了使民权为广大人民所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

实现民生主义的目标：由一开始的平均地权，变成了节制资本，平均地权。

大家如果去看一下这个新三民主义，就会发现，它根本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

这个是非常清晰的，而共产党所奋斗的目标，完全可以说就是为了真正意义上帮助国民党实现三民主义。

从这一点上看，国民党的主张，其实他们自己并没有用心去实现，因为他们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政党。

所以他们有着天然的无法克服的矛盾。

反而是共产党，因为背靠无产阶级，所以可以通过土地革命，节制资本，反帝反封建的彻底，

以及普遍的真正意义的给予所有人以民主，从而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实现三民主义。

所以，当毛泽东把这些给捋清楚以后，实际上国民党自己都有些汗颜无地，再谈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其实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

我们总说毛泽东的那一套策略都是阳谋，其实这个阳谋就是毛泽东自己本人说的。

这些东西你拆开以后看，就会发现你根本反驳不了。

你蒋介石天天喊着信仰三民主义，可是你怎么实现呢？你的民生主义，如果不给农民分土地，又怎么能真的民生呢？

你可以说通过二五减租，通过减少征粮等，可是那么多年了，百姓真的民生了吗？没有啊，反而是解放区，人民可以通过分土地以后提高生产，实现民生。

你天天喊民权，可是孙中山都知道，近代所谓的民权，是少数人所得而私，你真的去实现所谓的民权了吗？

你们的民权，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都是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民权，孙中山都看到了，为什么你蒋介石看不到？

反驳不了，真的反驳不了。如果说，蒋介石真的愿意通过土地革命，实现民生，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民权，那你国民党就变成共产党了。

这就是舆论斗争的阳谋。

二、为什么在中国无法通过资产阶级专政使得革命胜利？

有人又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是经过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以后，走向强大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蒋委员长专政的历史时期？

为什么非得搞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这一点，教员只需要给他们讲一下中国的特点就明白了，

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说中国不是由一个封建社会内部演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

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外国侵略者，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以后，才大量涌出来的。

这和资本主义国家自发的资本主义生长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那些在中国大地上的真正的大资本家，不是通过技术革命，通过制度革命，来奠定资产阶级基础的。

相反，中国的大资本家，全都是一群买办，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商品代理人。

在这个过程中，也涌现出一批名族资本家，不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但是他们的工业全部都集中在落后的手工业，落后的小生产性质的企业，这些企业是不可能帮助中国强大起来的。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些企业在帝国主义的欺虐之下，根本没有成长的空间。

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区别。

人家的发展，是在自己完全独立的状态下，因为技术革命的衍变，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形成的资本主义，它们有着极其强大的科技、技术、管理，和相应的生产关系来维护自己的资本主义制度，且都经过了百年的发展。其中还大量地侵略别的国家，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大量的转移矛盾到其他国家，来减少自己国家的阶级矛盾。

而中国呢？完全不同，中国是在被侵略以后，洋货打开国门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这是买办性质的资本主义，是被侵略的资本主义，是落后的技术生产下的资本主义。

这样的资本主义，怎么能够救中国？

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以后，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独立发展，才能实现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

在这种主义之下的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违背它的，就永远不可能成功，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国情下，走不通。

理论上走不通，实践上也走不通，因为蒋介石专政的 18 年里，专出了什么？

专出了东北三省全部沦为殖民地，落入日寇的手里，专出了日军的全面侵华，专出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长期横行霸道。

所以，国民党的宣传员们，那一套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靠不住的。

三.

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从这里面我们除了认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之外，我们还必需要认识到一个不变的道理：

任何的所谓制度也好，战略战术也好，政策方针也好，固然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可是更加重要的，是针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

如果只是因为西方国家经历了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专政的历史时期，就认为中国也要经历这样的时期，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分析事物也是一样，如果这种分析不是建立在事物本身的种种特点之上，那么是相当的不可靠的。

“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

第二十篇，《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这篇文章讲的是统一战线的策略斗争，里面讲到很经典的方法，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

首先，背景我们就不用强调了，因为以前说过很多次了，大体就是如何扩大统一战线，同时又同破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

之前，关于《新民主主义论》，是从政治上、理论上进行斗争，而这一篇则是从具体策略上进行斗争。

要从策略上，作好统一战线的扩大和斗争，就要首先分析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统一战线。

一、 抗日统一战线是个什么样的统一战线？

任何事物的发展，其决定因素都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进步因素，一种是中间因素，一种是退步因素。

区别只在于这三种因素，在事物之中所占据的比例而已。

答案是很简单的，当进步因素占比较高，则事物发展就是往前的，是顺利的，是能取得预期成功的。

反之，如果退步因素占比较高，则事物就会遇到巨大挑战和挫折，甚至暂时不可能完成，勉强去做，多半失败。

理论上很简单，但是实践起来就很难，因为要搞好统一战线，从策略上讲有三个重要步骤，每一步都要判断准确才行。

第一，你得先划分出来，哪些是进步因素，哪些是中间因素，哪些是退步因素。

比如，在这个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工农阶级的存在，共产党的领导，八路军的发展，根据地的壮大，是维系抗日统一战线的进步因素。

而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手工企业家，厂长之类的，他们就是中间因素。这个中间因素在抗日战线里，具体去说，就是很摇摆，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剧烈的矛盾，但是他们同无产阶级，工人之间也有矛盾。

因此，他们既想利用八路军的力量抗日，但是又不愿意工人因此提出一些有损他们利益的要求，比如废除 996，加班要给加班费，工伤要给钱等等。

而大地主、大买办，官僚资本，他们中的一部分则是退步因素，为什么说一部分？是因为也有一部分大资本家，他们有爱国情怀，会把国家看得比利益重要，同时又有一部分，他们也同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剧烈的矛盾，毕竟在国难面前，谁都有可能做亡国奴。

如此一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区别这三种因素。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尤其是具有一定难度和复杂因素的事情，都可以按照某种标准去做一个划分。

划分为进步因素，中间因素，退步因素。

这里面是按照阶级来的，我们一般做项目或者某些具体的事，不会有那么复杂，就是把促进这件事的所有条件罗列出来，看看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中间的，哪些是退步的。

比如你要做一个自媒体账号，那么你对内容很敏感，对热点很敏感，或者文笔上很厉害，有某方面特长可以拍摄视频等等，都是进步因素。

没有行业经验，不懂市场规律，身体素质不好，意志不坚定，这些都是中间因素，可以通过争取，努力去改变。当然，有些中间因素处理不好，就是退步因素了。

而没有资金，没有准确的定位，没有持续输出的能力，这些都是退步因素。

这需要我们实事求是的判断出来，否则这事儿就不好办，如果退步因素占据主流，那还可能失败。

以上是第一点，就是区别三种因素。

第二，要对这三种因素作具体的分析

干过坏事的人，不一定永远都是坏人，也不一定永远都干坏事，反过来也一样，有的好人也会在某种条件下变质。

如果我们不能根据具体环境和阶段去识别他们，就无法做到团结和利用好这些人，这些资源。

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经过很多阶段，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充当了主力军，但是随后他们就向袁世凯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买办势力妥协了。

后来在北伐战争时期，他们配合觉醒的无产阶级，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随后当无产阶级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又叛变了。

等到土地革命时期，他们则主要是反对派。

到了抗日时期，他们又成为了可靠的同盟者。

很有趣吧，同样的成分，但是会随着情景和阶段不同，作出不一样的选择。这是因为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受到周围环境影响作用是巨大的，人没有所谓的天生好人和天生坏人的说法，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合作的。

我们在生活里识别一个人也是这样的，不能因为某件事去简单判断一个人，而是要结合这个人的特点，以及不同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选择，来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说，不要认为人天生就是好的坏的，优秀的差的，人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环境中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放到阶级里来看，不同阶级的人其思想都带着阶级的烙印，不同环境的人，其身上也带着明显的环境塑造的影子。

根据不同环境的变化，以及每个人所处不同阶段，可能会出现的变化，来对人进行合理的判断，才是真正的识人之术。

当然，这不是说不在意一个人以往的历史，而是要学会分析它的历史，分析他干那些事的环境，条件，然后再对比今天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你才能真正的看懂一个人。

第三、促进进步因素，拉拢中间因素，削弱退步因素。

这当然听上去也是很简单的，关键在于实践。

促进进步因素，在那个时候很明显，就是不断扩大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扩大八路军，巩固八路军，强化党的领导，巩固党的领导。

这些都是促进进步因素的必要手段，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做这件事。

对于中间因素，一方面要拉拢，一方面又要提防，因为他们有两面性，不能让他们钻进我们的营垒，破坏我们的思想，同时又不能排斥他们，应该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好好的联合他们。

要联合人家，就要有一定的策略，比如凡事多和人家商量，在一些利益上要让步，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要妥协。

在政治地位上，也要给人家留一些位置，比如当时规定了政府机构里，要尽可能的留给民主人士 $1/3$ 的席位，这些都是一些具体措施。

具体措施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来制定，当时背后的原理就是：尽可能的联合中间派，但是又

要提防中间派。

对于顽固派，也就是退步因素，天天闹摩擦，起内讧的那种，也要敢于斗争，科学斗争。

来看看当时对退步的顽固派是怎么斗争的吧。

原则如下：

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

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有理、有利、有节，这就是我们对顽固派，对退步因素的斗争策略。

当然，这个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不仅仅只是用在顽固派，退步因素上，其实它有很多场景。

稍微变化一下，用来处理各种家庭矛盾，工作矛盾都是可以的。

以上三点总结起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最后，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区别。

唯物主义者，看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物质的，主观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说它是物质，是因为它也是可以塑造和改造的，会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说它特殊，是因为它有区别于其他物质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任何物质不具备的属性。

这就给人的认识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没有天生懒惰的人，没有天生的坏人，没有天生的好人，人是在和周围的环境中，不断的于矛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观察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表现，而要关注到他所处的环境，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他的变化，以及未来的变化。

同时，又要关注他的主观能动性，看这种主观能动性有多大的能量，从而判断他是否可以改造，能改造到什么程度？

只观察任何一面，都会陷入片面之中，只观察环境，就会得出结论：所有的坏人都可以变好，所有的好人都可能变坏，这就片面了。有的人思想已经完全变质，意识已经完全扭曲，这种人我们就应该对他实行专政。

而只观察人物的主观意识，就会得出结论：坏人果然是坏人，做过坏事的人，都不可原谅，都不能改变，烂泥永远是烂泥，懒人永远是懒人，是不能改造的。

这样就会给人打上标签，无异于给人判了死刑。

最简单的例子，封建社会末期，有很多父母卖儿卖女的现象，你说他们都是坏人吗？都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吗？

不是啊，这是当时的环境下，很多家庭没法选择的，要么全家饿死，要么卖掉一个，还能保全另外一个，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他们都是坏人吗？

所以革命的意义，就是要摧毁当时的经济基础，给穷苦人也某一条出路，这样就可以减少卖儿卖女，最后国家才会慢慢好起来。

这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和一些社会现象，这就是唯物主义者的视角。

第二十一篇，统一战线问题

大家好，第二卷到目前为止的核心内容，我们已经算是读完了。

其中还有几篇小短文，是针对当时的一些时局、会议、新闻的发言稿，其思想、方法都已经包含在了系统论述的那些文章里。

那些小短文，大家有兴趣可以简单读一读原文，没有兴趣就可以不读了，主要还是以系统化的那些核心文章为主。

因为第二篇文章数量比较多，有时候会给人繁杂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那些核心的系统性的文章，以及一些短文所阐述的内容，作一个总结，以方便大家在实际阅读原文的时候，可以消除这种繁杂之感。

这个总结分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其实就是整个第二卷中核心围绕着的三个主要问题。

这三个主要问题是：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战略战术。

也就是说，第二卷里所有的文章，其实讲来讲去就是三个主要问题下的总总具体问题，始终都没有跳开这三个主题。

统一战线，围绕着同蒋介石集团的合作和斗争展开。比如著名篇目：《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这些都是论述统一战线中的核心篇目。

独立自主，围绕着如何实现自己的独立自主，以及如何运用独立自主开展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

比如著名篇目：《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当然，也包括统一战线的文章，因为独立自主和统一战线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主题。

战略战术，围绕着抗日战争的一切战略战术问题展开。其中最著名的是《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些文章都是第二卷里的核心的，系统性的文章。

整个第二卷里，所有的文章实际上也是围绕着这三个主要方面展开的。

因此，把第二卷的这三个主要问题所涉及的思想和方法作一个简单地总结，以方便大家对第二卷的整体把握和阅读，是很有必要的。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先总结一下统一战线吧。

一、

统一战线成立的基础：主要矛盾。

所谓的统一战线的基础，首先是对于主要矛盾的有效把握，一切的策略方面的东西，都要围绕着主要矛盾开展起来。

国共第二次合作是在什么环境下成立的呢？就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那么当所有人的敌人都是同一个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有了团结起来，合作成立统一战线的基础。没有这个主要矛盾为基础，也就没有所谓的统一战线。

而随着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不同，也直接影响着统一战线的种种判断和变化。

比如，在文末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篇谴责蒋介石集团发动“皖南事变”的文章，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对主要矛盾的判断的问题。

因为皖南事变造成的影响十分巨大，新四军损失极其严重，所以当时八路军内部就有了一种思想认为：主要矛盾已经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转变成为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

针对这种我们内部思想上的转变，统一战线种种策略也就跟着改变。

因为如果主要矛盾不成立了，中日民族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了，那么统一战线实际上也就破裂了，也就再无所谓的种种斗争求团结的策略。

因此，统一战线首要的第一个核心，就是基于对主要矛盾的判断。

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后，这个统一战线还要不要延续，还要不要发展，一切都取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不是取决于主观的某种愿望。

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两种倾向：左的倾向认为人家都杀到头上了，而且损失那么大，你还继续统一战线，是不是太对不起死去的新四军战士？而且国民党已经没有诚意合作了，再勉强也是无用，干脆就既抗日，又反蒋吧。

而右的倾向认为：只有忍耐，才能实现团结，才能动用一切力量把日本赶出去，否则两党战端一起，只是便宜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再大的委屈我们也只有受着。

这些都是忽略了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导致的倾向，我们仔细想想，其实现实中针对皖南事变这类情形，会出现以上两种倾向的很多，尤其是第一种。

坦白讲，再没有读《毛选》之前，我也会倾向于第一种，就是干脆既抗日又反蒋，毕竟人家不是真心合作，都杀在头上了，咱没这个必要在坚持什么统一战线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统一战线首先是基于主要矛盾的把握和判断上去看待的，只要主要矛盾还是抗日，那么就要尽一切可能性维持统一战线，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原则。

二、

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以斗争求团结

我们上面说到的两种倾向，其实都反映出的是实际已经存在的问题，那么如何既坚持统一战线，同时又避免自己受到队友的伤害呢？

策略就是：以斗争求团结。

怎么斗争？用《毛选》的话说就是六个字：有理、有利、有节。

有理：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们的斗争都是建立在自己有理的基础上的，既自卫原则。

有利：既然要打，就打则必胜。不要打无把握的仗，必须打有利的仗，有好处的仗，因此就要全面准备，打则必胜，你一旦面对侵犯的时候，打了一个败仗，那么接下来更加严重的侵犯立刻就接踵而来。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准备，打则必胜。既必胜原则。

有节：既打完了胜仗，不要无止境的一直打下去，要有节制，否则统一战线即刻破裂。

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斗争策略。

三、

统一战线中的团结策略

上面既然讲了斗争，就自然也要讲到团结，你有斗争的方法，也要有团结的方法。当然了，

斗争也是团结的一种方法，不过主要是针对那种反对派、顽固派罢了。

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团结自己人，中间派。

这个是非常难，也非常有艺术讲究的。

对于反对派，主要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那么对于中间派就主要是拉拢，使他们支持我们，至少不反对我们。

对于自己人，则主要是想办法把他们团结起来，筑成一道坚固的长城。

所以，对于如何团结，就有了两个主要问题：如何团结自己人，如何团结中间派。

要团结自己人，不是一个个去告别别人，说我们是自己人，也不是天天喊着抗日的就一定是我自己人，因为那个时候谁都会去喊这个口号的。

要团结自己人，首先是识别自己人，而识别自己人的方法，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

一个人是不是真心抗日，是不是能彻底的抗日，是不是能坚持到底的抗日，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

因此针对不同的阶级，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是统一战线实现团结自己人，拉拢中间派的主要手段。

而如何把属于自己阶级的人组织起来，我们就必须要去发动，发动的核心方法，是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纲领。

纲领很重要，没有纲领实际上就是零散的，没有凝聚力的组织，《毛选》第二卷开始搞统一战线的时候，最根本的就是先搞出一个《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里面阐述我们抗日的态度、主张、方法、思想、策略、以及具体的措施。

你有了这个纲领，大家看到你要准备怎么抗日，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对具体的人有哪些具体的影响，然后大家才会被这个纲领凝聚起来，一同加入这个统一战线。

然后接下来的，才是对这个纲领的各种宣传，其中不乏跟蒋介石集团的大辩论等等，其实目的就是要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把这个纲领散布出去，然后把赞同这个纲领的人团结起来。

所以，纲领才是团结自己人最根本的方法，是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

那么对于中间派呢？

则主要是在具体的策略上，利用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发挥他们的抗日积极性。这种具体的策略，表现为给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发言权，选举权，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使得他们也成为一种主要的力量。

而对于反对派，对于那些进攻我们的反对派，就是坚决斗争的策略。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阶级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不是一定的，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阵营里，往往也会存在剧烈的矛盾。

比如日本的买办，和英美的买办，都是买办，但是利益就有碰撞，这个时候我们主张联合英美的买办，打击日本的买办。

这个原则，其实就是尽可能的缩小打击面，不要四面出击，搞得自己很被动。

简单来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统一战线中的团结。

四、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人所了解，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统一战线。

国共第一次合作，共产党没有军队，徒手任人宰割的事实已经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点往往也是最难，最艰苦的内容，应该说我们看到了整个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就是一部共产党如何实现独立自主的斗争。

这一节，我们在总结独立自主的时候再继续发展一下。

五、

统一战线的巩固

要知道，虽然我们简单的把力量划分成三种，一种是反对派，一种是中间派，一种是自己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从整个的反对派去看，里面也会有中间派和自己人，中间派里也会有反对派和自己人，自己人里也会有反对派和中间派。

我们说的阶级分析，是整体上的，虽然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但是有背叛阶级的个人。

如果忽略了背叛阶级的个人，就会出现很多左的策略，比如张国焘在鄂豫皖大反知识分子，肃反中大反中间派等等。

所以，统一战线的巩固，就意味着在自己人里面也必须要警惕奸细、精神上的地主阶级；同时，在反对派和中间派中也要注意那些能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

这就需要一些方法和措施，来完成这样的统一战线的巩固。

而其中最根本的巩固，是对自己阵营的巩固，方法就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理论建设。

所以，大家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整风吗？其实就是要统一思想，加强理论和组织原则。

所谓的延安整风，整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其核心就是把思想完全无法统一的踢出去，把思想还摇摆的巩固起来，把理论还不理解的学习透彻，把搞宗派主义的思想和组织上进行改造。

这样实际上就实现了自我内部的统一战线，就增强了自我凝聚力，和自己内部的大团结。

后来，毛泽东在整风完成以后，在七大的演讲中讲到了整风以后空前的大团结，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内部战线的巩固。

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理论建设，又属于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

以上五点，就是第二卷中涉及到的统一战线中的方方面面，其中关于延安整风，自我内部的大团结，理论建设等等，我们第三卷会大规模的讲到。

统一战线，它不是一种孤立的思想、方法、策略，而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大家发现没有，其实统一战线，就涉及到矛盾、党的建设、阶级分析、独立自主、理论体系等等系统科学。

这些科学最终组成了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在毛选里，我们大量看到了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理论分析，以及方法论上的斗争策略，战术方法等等。

当我们逐渐把这些东西学习的越来越多，最后他们就组成了一套完成的体系，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算是把握了毛选五卷的核心东西，才能够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方法体系，这就是学习毛选五卷的意义。

下一篇，我们总结一下独立自主。

第二十二篇，独立自主问题

总结第二卷：独立自主问题

独立自主是贯穿毛泽东整个思想理论的基本要素之一，我们通过这个要素，看到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走上独立自主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艰难曲折，以及在后来一直贯彻独立自主原则的各种政策，从来没有动摇过。

我们今天时常听到的永远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就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的。

应该说，在毛泽东思想体系里，独立自主不存在该不该的问题，只存在该如何实现的问题。

这篇文章我们结合第二卷，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明一下独立自主。

一、

独立自主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的诞生，是建立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是苏联在探索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在中国这块土壤之下诞生的。

用诞生这个词语，就是说明其实一开始的共产党它就像一个孩子，其经济、理论、思想等是严重受到苏联影响和制约的。

早在陈独秀时期，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可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到底要怎么具体化，怎么革命化，怎么操作？这个问题是只有在苏联被实践过的，并取得成功的。

所以，关于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我们都是从苏联那里开始继承，比如发动工人罢工，工人起义，以及革命的理论、策略等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制定出来的。

而经济上呢？在陈独秀时期，曾经长期是从苏联拿到经济支援，这就注定了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其实是很脆弱的。

就像我们今天的任何一个人，不能实现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一样，你的独立思考、经济收入完全受制于人，处处被动，一旦遇到挫折（蒋介石要打击你），你简直毫无办法。

所以，陈独秀时期的失败有其必然性。

你思想不独立（没能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没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经济不独立（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兵源、物资来源），所以是难以在当时的革命势力中立足的。

当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以后，毛泽东领着当时共产党手里掌握的一点点武装力量，奔向了井冈山，随后开始了土地革命的实践，而群众目标开始放在中国最为广大的农村上。

实现独立自主的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不仅解决经济问题，通过分田分地以后，可以征收农业税，粮食等等，同时它还解决兵源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上属于自己的那一套理论。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是典型的这种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表现。

但是这个探索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十年土地革命中，出现过立三路线、王明左倾路线两次巨大的错误，尤其以王明左倾路线，几乎把整个革命力量完全葬送。

这些历史我们已经说得太多，就不再赘述了。

二、

独立自主的成型

在经过了无数的挫折以后，于遵义会议，实现了党内独立自主的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的转折。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仅仅只是在军事指挥上，实现摆脱苏联的独立自主原则，但是在理论上、思想上、甚至当时的经济上来看，都还没有完全实现独立自主。

尤其长征刚刚到达陕北的时候，几乎山穷水尽，兵尽粮绝，旧的政治路线还没有扫清，新的统一战线还没有形成，因此此时也不能说是独立自主。

直到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被苏联确认，也在党内逐渐自己生成，这时候才开始逐渐完成独立自主。

这个过程中，在思想上，形成了后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在经济上已经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不依赖外援才能扩展的局面。

三、

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是通过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给穷人，打破了以前土地兼并过后，过于集中在地主手里，造成了生产力大大下降的情况。

当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那么红军的经济来源也就有了基础的保障。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土地革命的实施过程是异常艰难的。

以前洪秀全、孙中山都提出过要平均地权的口号，可是最终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洪秀全自己成了封建地主，而孙中山依赖的资产阶级，本身就是地主阶级转变过来的，所以他们的革命性不彻底，最终是不可能自己革自己的命的，所以土地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均分给广大农民。

从洪秀全到孙中山，这个过程就耗尽了中国百年近代史的 80 年，直到无产阶级革命起来，他们的彻底性才真正使得土地革命，平均地权从口号变成了现实。

然而即使如此，在实际分田中，怎么分？怎么土地改革等等，也涉及一系列技术性难题，最后才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土地方案。

这一点，我们之前公众号也有探讨过。

主要是划分农民成分，哪个是富农，哪个是地主，哪个是贫农方面；生产资料如耕牛、农具的分配上；地主阶级的反水和倒算等；

但是只要革命彻底，这些问题兜兜转转还是解决了。

然后才有我们看到的后来的经济独立，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本质上是人民有了相对充足的粮食可以供应嘛，否则这个大海也不可能形成。

而在思想、理论上的独立自主，也经过了艰辛的探索。

王明时期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等，本质都是思想和理论上出了问题，无法把马列主义当时中国的革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至于出现军事上一系列的错误。

比如，你思想上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土豪必须杀进杀绝，对待不同意见同志要残酷打击等等，这些思想自然衍生出一系列的政策，去为思想的实现而服务。

而王明路线的整套思想、理论之所以出现巨大错误，原因是因为几乎照搬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和理论，而中国当时的革命却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而且苏联前身是由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而中国却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照搬过来的错误也就使得革命必然遭受极大的挫折。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知道，思想、理论的独立自主，必须建立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之上。

有革命的理论，不结合实际，就会出现教条主义错误；反过来，没有革命的理论，只讲单纯的实际，就会变成摸着石头过河，也会犯极其严重的错误。

四，

所以讲来讲去，到底如何实现自己的独立自主？

大家如果细细回味一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过程，就会发现真的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来帮助你实现独立自主。

你今天不可能去土地革命吧，你也不能照搬革命那一套吧。

所以我们抄不到任何东西，也无法借鉴任何东西，因为独立自主所需的具体环境、条件变化了。

今天思想上要独立自主，必须有独立思考能力；经济上独立自主，你需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回忆一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他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如何形成的？

大家还记得三湾改编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所谓的三湾改编不过是毛泽东平等的哲学观的一种体现；

而建设人民军队，不过是毛泽东群众观的一种体现；

新民主主义论，认为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作为打击目标的思想，其实是民族独立的哲学观的体现；

毛泽东用到的一切矛盾分析的方法，写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矛盾分析，其实是毛泽东关于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体现。

所以如何实现思想上的独立自主？

你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零碎的，系统的而不是散乱的世界观，并由这个世界观构建出一套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才是思想上独立自主的根本途径。

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呢？

我们上面说了，共产党是通过土地革命的方式，然而这个土地革命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说，它提升了当时的生产力，它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它重新分配的生产资料等等，但是这些都还不是土地革命的本质。

土地革命过程中，为了保障胜利果实，共产党组建红军，建设政权，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建设完善的管理制度，这一切的一切是为了什么目的？

其实，后来毛泽东已经总结的很清楚了，就是一句话：为人民服务。

经济独立的基础，不是什么别的，不是割韭菜，不是欺骗，不是玩手段，炒概念，设局，骗术。

它的最根本的一条永远就是这句话：为人民服务。

第二十三篇，战略战术问题

总结第二卷：战略战术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准确的说，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所有战略战术，本质上也是他自己的思想在军事上的一种表达。

所以通过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一个简单的总结，从而去探索一下毛泽东思想领域的很多观点，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我们读完第二卷以后，其实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化，系统化，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时常运用到的新的军事十大原则，其实本质就是红军时期战略战术的升华。

而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成就，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到达了常人终身难以企及的巅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因为从《实践论》的原理来看，好像不是很科学，人们在认识一种对自己来说完全的新生事物的时候，是不可能一开始就掌握其规律的，而是首先建立感性认识，然后又在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不断总结认识，然后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地取得胜利。

像毛泽东这样，一出手就是三湾改编这种大手笔，实在是军事史上极其少有的现象。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总结起来大体是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军队建设

其二：战争原则

这篇文章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去探索和总结一下。

第一部分：军队建设

第一：党指挥枪和官兵平等

毛泽东对军队的建设始于三湾改编，也就是 1927 年 9 月由他和卢德铭参与领导的秋收起义失败以后，向井冈山转兵的过程中，剩下的那 1000 多人士气低迷、军纪混乱，最为严重的是，军队里保留着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阀作风。

这种军阀作风表现为长官随意打骂士兵，士兵毫无发言权，军队没有任何民主，自然也没有任何生气，那一刻简直有崩溃的风险。

为了防止这种崩溃，毛泽东提出了两项核心的改编内容，其一是支部建在连上，其二是士兵委员会。

支部建在连上，指的是在连上也成立党支部，专门负责向上反映士兵想法和意见，向下传达领导的思想、政策。

士兵委员会，则拥有监督上级，监督经济，监督贪污，监督军事纪律的权力，这就从根本上有了实现官兵平等的保障。

这两条的成立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应该说也恰恰是那个时候吃了败仗，军队涣散，士气低迷，而且前后就那么 1000 多人，有的开小差，有的直接回家了，最后就剩下 800 来人，在这点人中实现这两条就反而容易了许多。

前后 800 人，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干嘛，随时有崩溃的风险，这个时候谁也别装大爷，谁也别摆平时的官架子，大家如果有商有量的来共同研究接下來的方向和动作，那就好说，要不然这个时候随时有哗变的风险。

所以，这也是当时客观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的改编。

而毛泽东做这两项改编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

支部建在连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一一党指挥枪；

士兵委员会，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一一官兵平等。

而这两项又互相联结，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没有党指挥枪的原则，那就是谁枪多谁说了算，这就不可能有官兵平等，反过来，没有官兵平等，那党的威信就不能建立，还是封建军阀作风，那你想要党指挥枪，也注定之种幻想。

在毛泽东思想里，很多观点和策略都是相互联结又相互促进的，就比如前几天我们公众号里讲的，农业集体化有助于机械化，机械化又反过来能促进农业集体化。

你好好学习，能促进你取得好成绩，反过来取得好成绩又能促进你继续努力学习，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所以，三湾改编体现的背后的两种思想：党指挥枪，官兵平等，这就是毛泽东的世界观，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人和人可以有能力和技术上的差别，但是却没有因职位的不同，能力的不同，而出现等级的差别，以至于衍生出尊严、人格、发言权等等上面的不平等现象。

这种思想不仅仅在军事，在很多领域都有明显的体现。

而党指挥枪，体现的是一种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拿这件事说，搞军队建设的本质是什么？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以往因为没有军队，革命的任务也只是一种幻想，什么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人家又不是傻子，站在那里等着你推翻，所以必须要有军队，要有枪杆子，否则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反过来，你又不能为军队所左右，成为军队的奴隶。

也就是说，军队是实现革命目的的手段，什么是革命的目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军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你不能反过来让军队控制了，否则一旦衍变成军阀式的军队，那站在军队最顶层的枪最多的那个，立刻就会忘了革命的目的，自身会转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时候革命的目的也就不可能实现了，蒋介石就是如此。

所以党指挥枪，是根本的原则，谁也不能触动。

提打这里，顺便提一句，资本也应该是如此，它本质应该是提高生产力，提升社会效率的一种手段，是我们实现很多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本身绝不是目的。

一旦本末倒置，真是危险的很。

以上两项建军原则，它绝不仅仅只是关于军事的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体现，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思想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就搞出三湾改编的原因，因为他这是用哲学思想降维思考军事制度。

这是他建军的一大特色。

第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最早版本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增加了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后来经过发展，这个条文在新的环境中，也变化过，比如后来上门板，捆铺草删除了，因为实际情况很少出现了，增加了不损坏庄稼，不打人骂人。

这种军事纪律几乎可以说是红军的生命线，是红军能在百姓里面立足的根本保证。

在毛泽东刚刚上井冈山的时候，就发现这支由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军队，身上还严重保留着很多军阀队伍里士兵们的不良纪律，于是针对这些纪律作了规定和约束，慢慢地发展成了严格的军事纪律。

这个也是毛泽东的独创，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他？国民党那么多高级官员里怎么就没人创造出来？

就算创造不出来，直接照抄总可以吧？怎么会连抄都抄不了，国民党军队纪律始终被共产党军队秒杀，绝对的领先，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得看看毛泽东创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三大纪律，可以说是一种军队管理措施，而八项注意则完全讲的是军队如何和群众相处。

如果说三大纪律是党指挥枪的思想下的具体措施，那八项注意就完全是一种群众观的表达。

全部都是如何跟群众搞好关系的内容，这些内容要抄下来简直太容易了，可是要植入军队思想、意识、行动里，那就难上加难。

抄下来无非是一张纸，一支笔的问题，可是要学会它，你就必须是跟群众站在一个立场上，也就是说你们的利益跟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

国民党学不来，就是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同人民立场出现了严重的对立。

你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是你们的上级，老蒋从群众那里敛了多少财？他就是最富裕的四大家族之首，投机倒把的祖师爷，那你凭啥让底下兄弟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军阀的大佬们些，平时欺辱百姓，凌辱妇女，那你怎么让底下的官兵们去和群众处好关系？你看在苏区时期打死的那个闽西军阀郭凤鸣，他干下的那些罪恶行径，随意杀害群众，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强占百姓妇女，真真是罪恶滔天，这样的军阀手底下的士兵，怎么可能执行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虽然，国民党军队并不是都如此，可是仅仅只是手段不同罢了，那些地方小军阀手段往往暴烈，而大军阀的头头们，其实也好不到哪里，不过是把龌龊的手段光明化，程序化，合法化了而已。

你看财富最多的蒋介石，他的财富哪里来的？不还是底层群众的血汗吗？

可是人家直接光明正大的拥有，就是因为他们把这种占有合法化了，看上去好像没有强占，其实比强占还可怕，强占起码背负法律和道德风险，合法化占有则规避了这种风险，使得剥削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在这种体制和领导之下，你跟下面军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异于痴人说梦。

所以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第二点，关于军事纪律，其实背后体现的根本就是一种群众观。

是人民应该当家做主，是世界不应该存在剥削和压迫的思想意识。

第三：军队作风和素质

艰苦奋斗，学习文化，是红军良好的军队作风和素质。

我们在更长征的时候，总是看到红军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惊人意志力完成了一个个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这一点根本上，也是此前的建军原则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同时，毛泽东十分注意军队建设中文化素质的提升和教育，在第二卷里，就有一篇文章《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到如果在军队里增加知识分子，使得枪杆子和笔杆子能结合起来，那就会大大增加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影响力。

红军中开办扫盲班，红军大学，注重干部培养，这些都是加强军队作风和素质的良好办法，当然，这一点老蒋也做得不错。

但是区别还是有的，人民军队的文化教育，除了正常的文化知识教育，更侧重思想的塑造，也就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塑造。

毛泽东的文化教育，更加集中在反帝反封建上，也就是说他的文化教育很有针对性，集中学习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

第二卷里讲到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其实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大众文化。

以上是关于军队建设，它并不是具体制度的探讨，而是思想上的一种探索，我们总说毛泽东思想，他的世界观，哲学观其实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体现。

很多具体的制度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但是背后的思想却往往不会变化，那么多年了，平等、自由、群众创造历史、人民当家做主这些思想不应该变化，也不能变化，如果没有实现，仅仅是需要下一辈人接着上一辈的路，不断去探索新的方法去实现而已。

第二部分：战争原则

《毛选》里有很多战争指导原则，我们可以作一些简单的列举：

- “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 “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正的防御”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 “军队是个大学校”
- “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
- “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
- “对待战争，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 “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
-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 “兵民是胜利之本”
-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一切行动之目标”
- “我们的武器来自于敌人的支援”
- “每战必集中敌人三倍、五倍力量，力求全部歼灭”
- “先捡敌人弱的打”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原则，也是毛泽东战略战术在军事指挥上的策略方针。

这些军事原则里面，有六点非常值得学习和注意，这六点不仅仅只是在军事上，也在方方面面都有很有指导意义。

第一：牢牢把握主动权

时刻要记得牢牢把握主动权，即使是主动让步，退却，也一定是自己主动得来的结果，而不是被逼到某个角落，无奈之下的退却和让步。

所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本质上就是要牢牢把握主动权，即使有时候由于实在被逼得暂时失去主动权，也要想办法把失去的拿回来，否则你接下来的文章就不好做，就立刻伴随着机会主义的风险。

第二：发挥自己的长处战胜敌人

战胜敌人靠的不是全方位的压制，而是动用自己最强的一方面去赢得胜利，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十六字口诀，本质就是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去赢得胜利，同时又规避自己的短处，避免因为短板而失败。

红军长处是立足于人民中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而短处是装备、数量、资源，所以必须避免硬碰硬，只能是依靠自己的长处，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短处，最后赢取胜利。

第三：永远尊重常识

什么是常识？在战役层面，人多打人少更容易胜是常识，所以要集中优势兵力，最好是三到五倍，至少也是两倍，否则就要在装备和地形上远远占据优势，才能发动歼灭战。

这些都是常识，战场上固然会有奇袭取得胜利的情况，但是奇袭只是一种作战方式，集中优势兵力也是一种方法，任何好的方式都不应该放弃。

而可以普及的，容易推广的，就是常识中的常识，即战术上，就是要人多欺人少。

只有如此，才能在战略上最终赢得胜利。

当然，这是有条件的，就是钳制的侧翼，百姓的支持，否则就难以持续。

第四：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

武器是给人用的，地盘也是人抢来的，核心原则是要保存人，只要人还在，就有希望。所以，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是人，人地皆失。

第五：作足够的准备，杜绝机会主义

宁可准备的充足一些，也不要保有侥幸心理，尤其是关乎整个战局关键性的一步，宁可浪费一些资源，也不要因为准备不足，而出现巨大的失败。

这种思想影响很深远，后来大三线建设，其实就是为了避免战争爆发，使得我们沿海工业遭受死亡性质的打击，所以花费了巨大的代价进行大三线的工业建设。

这一点，后来被资本主义买办们斥责为费人费力，他们不明白，你准备不好，可能敌人就真的来了，相反，你准备好了，战争反而可能打不起来。

就算真的打仗，也是尽最大可能，准备好一切资源，力求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打无准备之仗，本质就是杜绝机会主义思想。

第六，一切行动的逻辑，立足于人民

兵、民是胜利之本，上面所说的一切，包括建军原则，战略战术原则，本质都是立足于人民之上，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二卷全文完

目录

毛选第三卷解读合集.....	2
第一篇， 读《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2
第二篇， 读《改造我们的学习》	7
第三篇， 读《整顿党的作风》	19
第四篇， 读《反对党八股》	26
第五篇， 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	33
第五篇， 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	40
第六篇， 读《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48
第七篇， 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54
第八篇， 读《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58
第九篇， 读《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61
第十篇， 读《质问国民党》	68
第十一篇， 读《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71
第十二篇， 读《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75
第十三篇， 读《组织起来》	82
第十四篇， 读《学习和时局》	88
第十五篇， 读《关于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上）	93
第十五篇， 读《关于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下）	99
第十六篇， 读《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110
第十七篇， 读《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114

第十八篇，读《两个中国之命运》	120
第十九篇，读《论联合政府》（一）	124
第十九篇，读《论联合政府》（二）	131
第十九篇，读《论联合政府》（三）	142
第十九篇，读《论联合政府》（四）	150
第十九篇，读《论联合政府》（五）	155
第二十篇：总结第三卷：整风、生产、群众路线.....	158
附文：毛泽东给刘少奇一封信的 66 处批语。	169

毛选第三卷解读合集

作者/小庄

第一篇，读《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一、

历史背景：

这篇文章是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篇文章，严格来说，它不是一篇文章，而是毛泽东为一份学习材料写的序和跋。

序，指的是一篇长文之前的一个序言。

跋，指的是一篇长文末尾的总结性的话。

《毛选》第三卷开篇用这份《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开头，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因为，我们说整风，主要是整什么风呢？

当时主要有三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这三种风气体现在党内的学习态度，办事方法，写文章等方方面面，所以毛泽东也说要整顿党风、整顿学风、整顿党八股等等。

要整顿这些不好的风气，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就是提出这些风气的反面。

你要整主观主义的作风，你就要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调查之风”；

你要整教条主义的作风，你就要提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办事作风”

你要整宗派主义的作风，你就要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致向前看之风”。

也就是说，你在说一种风气不好的时候，你必须告诉别人什么样的风气才是好的，有对比才有强烈的认识。

而对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作风的很好的反面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而这种良好作风里面，最值得立刻学习并实践的第一件可以落地的事情就是：开展农村调查。

为什么是农村调查，因为当时我们的占领区主要是在农村嘛，所以毛泽东就号召主要的干部，大力开展农村实际调查。

在这场农村调查的运动带动下，很多干部开始真正的深入农村，去调查农村一切现状，一切经济活动，组织秩序等等，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张闻天。

他也是一个著名的留苏派，曾经在苏区的时候，过左政策的执行人和发起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张闻天。

在这次调查之风兴起之后，他的足迹才真正开始走进农村，走进实际，才开始把曾经他们在苏联学习的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联系起来。

这是《农村调查》的序和跋这篇毛选文的背景。

为了开展这次农村调查，就要有一个很好的农村调查的范本，所以毛泽东给大家印刷了几分农村调查报告的范文，给大家学习如何做好农村调查。

当时印刷给大家的范本是《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几个报告。

这几个报告是毛泽东在苏区时期做的调查，现在网上也可以找到，大家可以抽时间看看。

这篇文章当然就是给这几个报告写的序言和跋。

二、

序言里讲了调查的重要意义，但是更主要讲的是调查的态度。

方法可以有很多，比如开调查会，比如找农民座谈，或者亲自参与农民的生活劳动，亲自参与政策在农村的具体实践，总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方法。

方法是可以复制的，但是态度却不行，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调查态度，那么就会沦为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就会使得调查沦为表面，甚至名曰：调查，实际却是到了农村以后好为人师的对农民指指点点，好像是给人家颁布法令一般。

这种官僚主义的调查方式，是严重的要不得的，也是不可取的。

方法可以改进，如果态度不行，那调查就会变成形式主义的东西，最后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大的。

在后来建国后，毛泽东也曾号召干部，大兴调查之风，可是很多干部实际到了下面以后，就变成了形式主义，一般人去到基层和工厂，去到农村和社会，不是去研究问题，而是去吃吃喝喝，去“指导”基层，去发号施令，去摆官架子。

这里面就体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和斗争。

就是说：如果你总是认为你比群众高明，你的想法都是先进的，科学的，而群众往往是愚昧的，落后的，那么你就不要去搞调查的，因为必然是一通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调查。

而如果反过来：你认为很多真正的创造往往来源于群众，群众里面才是实践出真知的渠道来源，那么你才能真正的从中汲取营养，用于帮助和指导群众。

所以这篇序言里这样说道：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地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毛选第三卷，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东张西望，道听途说，是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的”——《毛选第三卷，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这些干部（农村基层）、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前粮师爷，就是我最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毛选第三卷，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干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选第三卷，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选第三卷，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这些话，都在说明一件事，真正的知识在群众那里。

这不仅是一种群众观的表现，也是一种科学观的表现，为什么那么说呢？

我们知道知识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社会学知识，比如我们学习的文化、法律、经济、哲学、社会学、新闻学、金融学、管理学等等，这些都属于社会学知识，它解决的是生产关系问题，另外一种是自然科学，比如数学、物理、生物、工业、化学、热力学等等，它们属于自然科学，解决的是生产力的问题。

在这些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音乐、美术、琴棋书画等等，它们是建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上的辅助学科，是这两门学科的衍生品，本质上无法脱离这两种学科的影响和束缚。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以后，就会发现知识真的都是在群众那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描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和抑制生产力的种种学问，都从群众最基础的生产劳动上来。

也就是我们说的，理论来源于实践。

通过调查生产活动，以及种种与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关系的活动，把这些实践中的种种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推导总结以后，就成了我们的理论。

然后循环往复，这些理论又继续用到实践之中，跟事物的特殊性结合起来，由此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改造。

而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又必须对具体要结合的事物，做实际的调查，以明白它的特殊性在哪里，然后才能作出准确的决策。

因此，实际调查，掌握一切事物的具体情况和方方面面，也就是事物的特殊性，就变成了自始至终贯穿着做事的基本程序。因为事物总是具有特殊性的，所以这个程序就不能迈开。

所以，真正的知识就在群众那里，这不仅是一种群众观，也是一种科学观，没有这种正确的群众观和科学观，对群众的态度是不会真正的树立起来的。

第二篇，读《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历史背景

第三卷里有三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这三篇文章都是针对整风运动而写，分别对应的是整顿党的学风、作风、和党八股的风气。

这篇《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针对改造学风问题所写的，其背后所指就是主观主

义、教条主义式的学习风气。

大家读这三篇文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文章里有很多痛骂这种不良作风的段落语句，简直可以说是就差点名了，你几乎可以感受到作者那种痛心疾首的感觉。

为什么针对这些风气，毛泽东骂得那么重？

这得从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时说起。

我们都知道，在遵义会议上，为了应对红军极有可能覆灭的危险，大家通过遵义会议改变了军事路线，收回了军事权，由毛泽东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工作。

但是那时候却并没有能改变政治路线，这是因为在长征过程中，那种命悬一线的状态下，不适合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否则可能会引起红军的分裂，领导层的不团结。

但是我们也知道：所谓军事其实就是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它们是配套的，比如当时苏区的政治路线里就有不让敌人占领苏维埃一寸土地的观点，在这样的政治观点，毛泽东提出的跳出堡垒圈，到广大的无堡垒地带作战，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为政治观点里，就是要你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你怎么能跑到外围去作战呢？

因此，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这种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的观点下，自然也就无奈的变成了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战争。

所谓的“双拳打敌人”、“六路分兵，阻击敌人”的种种军事策略，自然也就衍生和发展出来。

原因还是我们所说的那样，军事是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所以政治路线几乎可以

决定军事路线的走向。

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来又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我们的后方才算是稳定下来。

于是，重新整顿政治路线的时间点也就到了。

在这种背景下，你要整改政治路线，就必须把当初的政治路线的问题指出来，哪些决策造成了哪些后果？那些决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些东西你说不清楚，而且你如果不是有理有据的说清楚，大家就不一定服气，也不一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更谈不上承认错误，那整改政治路线就变得异常困难。

毕竟自己同志，你只有让人家心服口服，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思想才真正的可以统一起来。

于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派人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有还能找到的各种政策资料，决策资料，以及种种历史材料统统找来，开始了非常系统而艰难的研究工作。

这不找不知道，把这些材料都找来研究一番以后，真的是越看越气，有很多当时的决策造成的红军无畏的损失，几乎是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为了把当时苏区后期的路线错误的问题讲清楚，毛泽东根据这些材料写成了两本书，一本是《六大以来》，另外一本是《两条路线》。

这两本书，前一本把自 1928 年时期开始，中共六大所作的决策的种种影响和后果全部进行了总结，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哪些决策造成了哪些后果，好的坏的，正确的错误的，都可以一目了然的看清楚。

而《两条路线》则把自留苏派归来以后，在苏区逐渐开始形成的两条路线做了深刻的剖析，这两条路线分别对应的思想、理论、观点、政策，都进行了说明。

有了对比，大家也就可以看到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情况，以及后来苏区是如何走向失败的原因。

因为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后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也是真实的，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看到的往往只是自己看到的和认识到的一面，因此头脑里的思想往往都是相对片面的，所以始终无法把这两条路线给认识清楚。

此刻有了毛泽东所写的《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很多东西大家也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而毛泽东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几乎可以清晰的看到每个决策后面，是因为什么样的作风而造成的决策，因此他越看越气，越写越气，在这两本书里面，就点了很多人的名，也分析了造成他们那种错误决策的很多不良作风。

其中最主要的作风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从当时的历史材料中，几乎可以清晰看到这些作风无处不在的影响，再联想到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战役等等惨状，所以毛泽东在想要整顿这些作风的文章里，才会如此痛心疾首，忍不住痛骂了这种作风。

但是因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这几篇文章是印刷给所有干部们学习的材料，因此语气是十分缓和了，也没有点任何一个人的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篇《改造我们的学习》，以整顿我们的学风的文章里，对那种

主观主义式、教条主义式的学习作风都是怎样批判的，截取重点几段。

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改造我们的学习》

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改造我们的学习》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

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改造我们的学习》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

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改造我们的学习》

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办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批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改造我们的学习》

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
——《改造我们的学习》

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的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上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上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改造我们的学习》

我们从这些话里，既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对这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式的学风的痛恨，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主观主义式的学风到底是怎么表现自己的。

这些话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会发现有很多看起来就像是在骂自己的，我自己有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里面说的一些现象，其实我们自己身上有时候都是有的。

因此，如果说要改掉这种现象，行为，和作风，而且是发自心底的自己想改掉，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这种作风的反面，是什么作风？

这种作风的反面，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三、实事求是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作风的反面，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上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什么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式的学风，那么实事求是的作风又是什么呢？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

我们从这个概念里面，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作风，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它给了我们三个方向，来帮助我们尽可能的实现和做到实事求是。

第一：“实事”是指客观世界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一切事物的时候，必须做到从实际事物出发，这是第一点。

这一点只要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其实是不难做到的。

但是另外一点就有些难了，你要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尽可能的占有你所研究的事物的全部资料。

就像毛泽东要讨论政治路线，就得把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政治决策、理论的种种材料找来加以分析。

没有这些材料，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讨论一个项目，也要尽可能的把这个项目涉及到的种种资料、历史材料、造成的影响等等这些内容资料找到，才能在这些内容之上加以分析，不然如何能说得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呢？

而这种材料从科学上说，你是绝对不可能全部占有的，永远都只能是相对占有的全面一些。

一般，能在不影响重大判断的材料上，不要出现缺失，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

就像我们今天要讨论某段历史，如果我们不能对那段历史的材料有相对的全面的占有，那是很难把历史讨论清楚的。

甚至连讨论一个新闻都是这样，今天反转完明天反转，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谓的“内幕”嘛，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嘛。

包拯破案也是材料占有越多，越能准确分析案情，这就是“实事”这两个字的真实含义。

所以，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开始对历史、军事、政治、国内外的种种材料，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详尽的获取这些情报、材料、信息，其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让各级干部们，在作出决策的时候，有基本的事实作为依据。

这是第一项“实事求是”的关键点：即详尽的占有“实事”的一切材料。

我们说很多人理论不联系实际，就是指他的理论不是在占有详尽的“实事”的材料基础上的空洞讨论。因此，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不可避免，主观主义的错误也难以避免。

并非说大家不懂的教条主义的危害，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而是只要缺乏对事实详尽资料的掌握的条件，那么你就不可能实事求是，而是必然的陷入教条、主观作风。

但是这还完全不够，还有接着的第二项关键点：求是。

《毛选》说“求”是研究，“是”指事物内部联系，规律性。

这就给我们提出要求，必须要有将占有的材料进行分析、处理、消化，从而掌握这些材料内部的联系，找出规律，才能指导我们的工作。

同样是告诉你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纲领，辛亥革命的过程，同样的材料放在不同的人面前，大家分析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蒋介石可以说最后革命果实被窃取，是因为袁世凯卑鄙无耻、阴谋诡计，是因为自己军事力量薄弱，是因为国民党内部分裂，是因为百姓不给力，不支持等等。

可是毛泽东就会说，这是因为他们所依靠的阶级力量，是以资产阶级为主，这个阶级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他们在阶段性的取得成功后，必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上妥协和软弱，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决定的。

所以当时的中国条件下，孙中山不可能在依靠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取得成功，于是到了晚年他才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利用不同的理论去分析同样的材料，得出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谁分析得更科学，更正确，那就只有放到实践中去检验。

所以我们说实事求是，后半部分的“求是”，也就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找出规律、得出结论的过程，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条件：即有科学的理论知识来帮助你分析材料、找出规律。

我们当时的理论是什么？就是马列主义。

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后来经过发展，形成了结合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比如我们说的矛盾论的方法论，独立自主的思想理论，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实事求是，除了详尽占有材料之外，还需要有科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分析、处理，也就是《实践论》说的，来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加工过程。

你加工面粉，需要磨面机，你加工社会学材料、政治学材料、经济学材料，那就

是用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工具。

在运用的过程中，又经过不断的实践，理论也就被不断的创造和发展。

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我们说理论联系实际，这句话常常更侧重于表达了实际的重要性，却往往忽略了理论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当时在党内的错误，最深刻的主要也是教条主义性质的，所以所举的论据都是教条主义性质的。

其实，理论联系实际，这句话本身的含义里面，理论和实际同样重要。

没有理论，你是分析不出什么规律和联系的，你也就得不到科学的结论，也就不能指导你的实践，这样就会出现摸着石头过河之类的问题。

最后你还要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是对的，但是用起来就错了，应该说实践要检验的，应该是理论指导下的真理标准。

如果不那么提，那么大家统统来一顿盲人摸象，摸石过河，等出了问题以后，你连个修整的方向都没有，那样就失去主动权了嘛，变得处处被动，被推着往前走，这种局面下文章自然越来越难做。

以上，就是我们分析的实事求是。

这里做一个总结：

所谓实事求是：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找出事物的规律，从而用这些规律指导我们前进，那么就首先要尽可能详尽的找出要研究的事物所涉及的一切的，尽可能全面的材料。

然后通过科学的理论，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和分析，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加工工具。共产党人的工具就是马列主义。

通过马列主义，对尽可能详细全面的材料，通过加工以后得到其规律，那么我们就用这些规律指导我们去实践，而此时的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

在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真理与实践有出入，甚至重大出入的地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么对材料占有是片面的，所以得出来片面的结论。

要么，是因为我们分析的工具是错误的，或者理论上出现了不合理的情况，因此也会得出经不住检验的问题。

所以，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发展。

我们把实事求是的理论，拿去分析历史，很多问题就可以分析清楚，要注意两点：

错误的来源，到底是理论的问题，还是因为占有材料的问题，这个是绝对不能出错的，一旦出错，会造成极其严重可怕的后果。

比如，因为对下级汇报上来的材料掌握不充分，比如后来下面很多人只说好事，不说坏事，报喜不报忧等等，这些都会给领导层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出现错误的判断。

这时候，我们必须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到底是理论出了问题，还是因为材料掌握上出了问题？

如果你把材料占有上出的问题，归结到理论上，那么问题就严重了，这很有可

能造成你修改理论的结果。

甚至直接催生出一条错误路线。

我们说生病了，要把病因找对，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就要出问题，政治经济路线其实也是这样。

我们明白了实事求是的原理，那么将来希望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总结错误的时候，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的时候，能有一个方向，有一种方法，避免我们犯错误。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认识，我们能逐步通过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第三篇，读《整顿党的作风》

这篇文章同上一篇《改造我们的学习》，还有下一篇《反对党八股》，共同构成了整风运动期间著名的三篇整风文章。

改造我们的学习，以整顿我们的学风；
整顿党的作风，以纠正我们的宗派主义倾向；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我们的文风。

上一篇《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聊了主观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主要包含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一种不重视实践，一种不重视理论。

这一篇，我们则主要聊一下宗派主义。

一、

宗派主义的历史

宗派主义的含义，简单说就是搞派系、拉山头、组织利益小团体，在封建时期也有一种宗派主义叫结党营私。

宗派主义在实际工作中会有若干表现形式，比如：

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外来干部同本地干部不配合；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行政干部不配合；不同地方之间的干部，不同部门之间的人不配合；老干部同新干部不配合。

这些都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本质就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互相不能配合，甚至搞出摩擦的事件出来，不利于团结一致。

这种风气如果不加以整顿，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集团之间就毫无配合度可言，一旦到了军事行动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就会优先考虑自己，最后必然是无法实现团结一致的密切配合，也做不到解放军那样可以指哪打哪的高度协调性和一致性。

因此，扫除宗派主义、实现空前的大团结就变得异常重要。

《毛选》里这篇“整顿党的作风”，把种种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都列举出来，并号召大家一致打倒这些组建小团体的行为作风，发扬一切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作风。

但是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号召会在当时的共产党里得以实现？并能够被贯彻？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并不是共产党内才有这样的号召，国民党也天天号召大家要团结，要服从党国的利益，可是却完全无法落实，这里面原因在哪？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回顾一下共产党历史上那些宗派主义问题造成的严重后果，来看看宗派主义在共产党里面的历史。

1、井冈山时期

从毛泽东领兵井冈山开始，中国真正开始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土地革命，开始了组建自己军队的武装斗争。

应该说，从红军诞生开始，这种宗派主义的影响就一直存在。

第一次比较著名的事件，是朱德、陈毅单独领着红军二十八、二十九团前往湘南的事件，直接造成了后来的井冈山八月失败，同时二十九团几乎损失殆尽。

原因就是，当时的二十九团士兵大多出身湘南，随着朱德上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以后，对于井冈山艰苦的生活有很大情绪，加上本土观念很重，所以借着当时湖南省委要红军出兵组织暴动的命令，非要回湘南去，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这就是一种本土的宗派主义，二十九团把自己的本土那点心思和利益放在了第一位，甚至敢于违抗命令也要冒进湘南，结果遭遇了自身的全军覆没。

而在井冈山时期，作为客籍干部的袁文才和王佐，与土籍的井冈山时期的干部之间，也有着长期的土客籍之间的矛盾，这个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在毛泽东传里面写的井冈山的斗争那部分内容。

其实他们也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土籍和客籍之间成百年来，因为土地问题造成的剧烈的矛盾一直存在，一旦革命处于艰难环境之下，这种矛盾就很容易激化，造成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袁、王事件本质就是这种土客籍之间的宗派主义矛盾下酿成的悲剧。

2，苏区时期

后来红军到了苏维埃时期以后，宗派主义问题还是严重存在的。

我们之前写过，当时在赣西南存在过一种叫“自肥式革命”的革命方式，也就是一些当地的干部领导，组织起来一帮游击队，然后打土豪、分田地，仅仅是为了自己发财，他们并不考虑什么伟大的信仰，也不考虑实现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他们唯一的革命动力，就是打倒地主，让自己有口饭吃。

在这种情况下，当为了组织需要，在红军中要进行对游击队的整编之时，矛盾就爆发出来，因为那些本地干部拒绝整编，拒绝服从领导，只愿意在自己范围内打打土豪，管够自己那点饭菜、田地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地方保护的宗派主义问题，后来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执，造成过非常严重的派系斗争，而这种斗争在肃反运动中，又被同肃清反革命搅和在一起，形成了剧烈的、严重的内部冲突，成为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给革命酿成过极大的苦果。

这些我们之前在苏区斗争的历史里面都详细讲过。

3，苏区后期

到了苏区后期，留苏派到了革命根据地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派主义。

这种宗派主义围绕着两条路线展开，因为博古执行的是王明路线，所以他需要的人，自然就是拥护王明路线的人。

这样一来，凡是不赞成他的意见，不赞成他的路线策略的人，自然也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和排斥，苏区著名的打击“罗明路线”、“打击邓、毛、谢、古”的运动，就是一种宗派主义式的排斥活动。

这一点可以想见到，一个人要推行自己的路线的时候，必然要有一批拥护自己路线的干部，同时也必须打掉跟自己路线唱反调的干部，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自己的团体，也就是拥护自己路线的团体，否则路线也就推行不下去了。

这是苏区后期出现的第三种宗派主义。

在苏区后期，遭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开始着手整顿种种不良风气，其中除了上一篇文章我们提到的主观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风之外，另外一项整顿的很严重的不良作风，就是宗派主义。

我们从文章里是看不到这种宗派主义造成的牺牲和死亡的，但是我们把历史上那些事回顾一下，就知道任何一种风气，造成的危害都可以说是极其严重的，都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通过延安整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党八股算是大面积的扫除了，但是后来建国以后，实际上如果我们再去看一下那段历史，会发现宗派主义又复活了，甚至出现了愈演愈烈之势，乃至后来到了 1978 年后，还多次采用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来解决宗派主义的问题。

二、

宗派主义的基础

所以，从宗派主义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派系风气的形成，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

井冈山时期的宗派主义，主要是封建时代的遗留问题，它的本质是建立在本土利益和本土观念之上的。

包括李文林式的自肥式革命，都是一种本土观念下的宗派主义。

这种本土观点，又带着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大家为了维护本土利益，私有利益，于是大打出手，丝毫不顾忌什么团体利益，党的利益，最后造成残酷后果。

后来随着共产党内部的不断思想改造，以及对军队性质的改造，党指挥枪原则的不断明确，这种把军队看作私有财产，把地盘看作私有财产的基础被逐渐摧毁了，因此到了后来延安时期，只需要在思想教育、意识形态方面加以训练，加以宣传，宗派主义也就容易扫除了。

而两条路线的斗争下催生出来的宗派主义，也同样是要把路线斗争的问题解决，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宗派主义问题。

所以，整风要整掉宗派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通过对原来两条路线的分析，总结，最后在全党内实现一条实事求是的路线。

这就是在整风运动中逐渐明确起来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一条政治和军事路线。

把路线明确了，并且在这样的路线下，队伍不断扩大，根据地不断扩大，抗日的任务也随之完成最后取得胜利，这又反过来验证了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于是由路线之争引出的宗派主义自然也就消亡了。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国民党，为什么他们的教育运动，新生活运动等等都事与愿违，不能达成整肃队伍，统一思想的目的呢？

因此他们并没有扫除派系之间各自为政的产生根源，也就是他们的军队私有，地盘私有的根本性质。

这个性质不变，各地的军阀以自己地盘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准则，那么派系矛盾就永远无法调和。老蒋要统一别人的地盘，别人要保护自己的地盘，于是斗争就永远无法停歇下去。

所以，就算是在蒋介石集团那里，也搞点整风运动，实际上也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毕竟，你不可能用鸡蛋孵出天鹅。

三、

我们读《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整风文章的时候，其实如果只是读原文，对历史不是很了解，那么是读不出太多东西来的。

因为那几篇文章，只是讲了当时整风的方法，号召整风的理念，但是并没有描绘整风的过程，以及种种风气形成的根源。

在实际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为了扫除种种风气之根源，作了很多准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整理了上文我们提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

这两本册子可是起到很大作用，从思想上、理论上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使得正确路线得以抬头，这就给路线斗争下的宗派主义扫清了障碍。

同时，也给主观主义下，那些出现的种种错误理论、政策给予了剖析，便于真正扫除主观主义错误。

除了整理历史材料，找出根源，号召大家起来扫除不良风气之外，毛泽东做的第三件整风的事情是，在党内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几个人坐在一起，互相安慰，假装揭露一下对方的错误，明贬实褒那种批评。

而是，让基层揭发，党内成员互相揭发，自我揭发，勇于坦白，把自己历史上那些事都拿出来整理整理。

哪些地方犯了错，哪些地方是思想问题，哪些地方是策略问题，全部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复盘一遍。

这样，让大家对自己的思想问题，策略问题，以及犯过的错误都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最后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这就是延安整风时期所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当然，这个过程中，因为有的揭发的太狠，也造成过打击面扩大的情况，甚至整得一些干部受了些伤害，但是总体是形成了空前的大团结。

因为真正做到了思想一致。

所以，其实读《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不是说让我们明白整风的意义和好处，因为稍微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团结的重要意义，利益一致性的重要意义。

可是很多人做不到，这是为什么？同样的方法，别人用是管用的，你用起来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把产生问题的真正的根源找出来，并加以铲除，如果不是在根源上铲除，只是在形式上号召，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第四篇，读《反对党八股》

我们现在市场上可以看到很多写作课，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其实很多并没有货真价实的内容。

如果要学习写作，或者提升自己的表达，那么《毛选》中这篇《反对党八股》完全算得上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

尤其是对于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这篇文章读上四五遍都不过分，很有益处，我自己的写作经验最初就来源于这篇文章。

所以我们借这篇文章，正好聊一聊关于写作的一些事情。

《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中例举了八种“八股式”文章的表现形式，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第一种：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我们之前分享过一个观点：写作是思想的表达。

所以，文章如果出现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作者本身在某件事，或者他写的这篇文章里，自己就缺乏相应的思想和观点。

你没有关于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那么写出来的东西自然就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可是很多人在向上级做汇报、写年终总结、述职的时候，又不得不逼着自己去写一些东西，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党八股。

我们在日常表达中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来说去，就是说不到重点，说不出内容，却又乱七八糟的说上一大堆的东西，我们就认为这是讲空话和套话，毫无意义，还惹人反感。

但是呢，偏偏一篇文章，或者一段发言，最难的又恰恰是思想性、观点性上的突破，所以如果我们要在这一点上杜绝空话、套话的陷阱，理论上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塑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这就需要我们大量的实践和阅读，也就是经验和理论的学习。可是我们很多人尽管也明白要多学习，多实践，但是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会觉得效率低下，甚

至学着学着也就没了兴趣。

这是因为我们对于看到的很多书，或者实践中亲身经历的一些现象，并没有能够对其作出分析的能力。

你没有这种分析能力，那么这本书里的思想、观点、内容，其实你是很难吸收的。同理，如果你缺乏对事物的分析能力，那么同样的实践经历，在别人可能就是经验、是教训、是可以用于汲取和成长的养分，可是在你那里，也许就仅仅只是经历过了而已。

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要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要从挫折中学会成长，这是一种很重要能力，可是很多人恰恰是做不到这一点。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缺乏对事物的基本的分析能力。

没有基本的分析能力，实践中遇到的事情你就很难总结好，书本上看到的东西，你也不知道真假，也就无法吸收到有益的东西。

而且，你如果不能对某种思想、观点、事物进行分析的话，你会发现生活里的很多实践，书里看到的很多东西，真是毫无乐趣可言，久而久之，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那么怎么才能学会分析呢？

我们说一个人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会人云亦云，不会随便就被带偏了，这些都是表达的一个意思，这个人是会分析问题的。

而分析问题，其实就是《毛选》里说的：学会将掌握的材料，进行加工处理，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大脑，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工作，这就是分析。

一个能在有限时间里，把别人看来是一团乱麻的事情，全部分析清楚，是很有魅力的，因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分析对了的条件之上。

既然分析问题，就是大脑对材料的加工过程，那么我们就需要一套工具对原材料进行加工。

你工厂里面生产成品件是这样，我们大脑里生产思想、观点、也是一样的。

《毛选》里用到的是马列主义，它分析革命、分析战争、分析政治，用到的是唯物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些都是马列主义的理论，《矛盾论》是唯物辩证法的一种发展，本质还是辩证法。

马列主义是我们分析问题的一种工具，同时它又构成了我们的思想体系、哲学体系，使得我们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毛泽东思想也是如此，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种工具，同时它又构成了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我当然不是说，要学会分析问题，非得学辩证法，非得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任何一个行业，你要学会分析这个行业里的种种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系统化的工具。

这个工具是这个行业规律性的概括和总结，是相对全面的，系统化的东西，而不是零散的和片面的东西。

我们把这种系统化的东西学会以后，它就会成为我们的分析工具，同时它又组成了我们思想和理论体系。

这个体系，在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之中，又不断的更新，迭代，补充和发展。

随着这个体系越来越完整，那么我们能分析和处理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起来，我们的思想和理论也就逐渐完整起来。

这样，你写文章也好，表达观点也好，还会出现空洞无物吗？

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对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而不仅仅只是针对一个行业，或者某种社会存在。

所以，社会学领域，通过《毛选》作为一个突破口，找到我们分析问题的工具，形成我们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是很有价值的。

当然，你通过其他方法、看其他的书，学习其他的思想理论，或者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行。

总之，你要把框架搭好，有了基础框架，才会逐渐补充，更新和发展，否则就是读上一万本书，实践几十年，还是无效理论和无效经验的堆砌，没有意义。

要搭好一个框架，就是要学习系统性的经验和理论，而不是这里看一个观点，那里看一个观点，就跟读爽文一样，没太大意义。

第二种：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今天有很多文章也是这样，以前《毛选》里叫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今天我们的很多文章变了一种形式，比如：制造焦虑，散布恐惧，夸大其词，以偏概全，煽动情绪等等，又或者心灵鸡汤，情绪安抚等等。

这类文章当然有一定的空间，甚至很有空间，其原因在于利用读者的信息差，认知差，来达到其博取点击，获得传播量的目的。

《毛选》中说：

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反对党八股》

原因很简单，这类文章完完全全是为了博取眼球，或取支持，在今天就是完全为了传播和点击，至于是不是真的对社会有益，对公众有益，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了。

第三：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这在今天就是一个定位问题，很多人写作也好，做产品也好，一开始遇到的难点一般都是定位问题。

你写给谁看？这个群体需要这样的文章吗？

你的产品用户群是谁？他们需要这样的产品吗？他们真的有这个需求吗？

如果有，那么你将怎样设计这款产品，使得他们喜欢用，愿意用呢？

这些都是文章和产品的定位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第一步就是失败。

定位问题，并没有什么技巧，它的本质源于你对某个行业或者群体的深刻了解。

对牛弹琴不是牛的错，而是你把琴的定位定到了牛的身上，是你自己的问题。

第四：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毛选》里的话很接地气，你看这个“瘪三”两个字就很接地气，它批判的主要 是语言单调乏味，还喜欢故弄玄虚，在文章里写一些云里雾里，不着边际的话。

我们当然都知道，写文章一定要写的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尽最大可能性把复杂的事情用最通俗简单的语言说出来，当然不是叫你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而是既要把复杂的事情讲清楚，又要尽可能让人家听得懂。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些经验：

第一：在一篇文章里，尽可能只表达一个主题，或者只讲清楚一件事就行了，切不要贪多求全。

第二：在一篇文章里，可是适当的插入一两个当下比较流行的梗，当然梗要和文章相适应，用于增加文章的趣味性。

第三：语言一定要是群众的语言，把专业性的词汇用生动的语言讲出来，是一门艺术，当然专业性的论文除外。

第四：贴近生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

第五：前后逻辑必须经过自己的头脑里过一遍，然后代入实际生活中去对照一番，才不会飘着不能落地。

第五：甲乙丙丁，开中药铺。

《毛选》这一条批判的是内容没有联系性，全是东拼西凑的堆砌之言。

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哪怕写情感专栏，那也是为了解决一些人在情感上遇到的问题吧。

《毛选》里的文章，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我们写历史，是为了分析历史，从中找到一些可以适合解决当下问题的东西。

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矛盾的表现形式，既然要分析问题，分析事物，分析历史，分析种种你要分析的东西，那么你就要分析它的矛盾、分析它的内部联系，也就是本质。

如果不尝试触及本质，那么那些形形色色的现象的堆砌，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而分析问题，首先遇到的是提出问题。

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很多人提的问题真是惨不忍睹，是没有经过思考就

随意抛出来的疑问。

一般来件，我们提出问题之前，一定是对某件事有过一些简单的调查，比如我们研究反右运动，实际上你一定是首先对反右有过一些研究，然后才会遇到问题，才会提出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写文章也是这样，你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哪怕是写架空现实的小说，小说中反映出来的东西，也往往是我们现实中的实际问题，这样小说才会有生命力。

第六：不负责任，到处害人

第七：流毒全党，妨碍革命

第八：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最后三条，是针对当时写文章，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负责任，信口就来，就跟今天传播谣言的一些公众号一样，讲的是信口胡说的文章的危害性。

尤其是一些有一定粉丝量，或者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说的话，写的东西，往往能够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这些东西如果是建立在八股形式，甚至是完全为资本所驱使之下，则危害异常严重。

第五篇，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

一、

文艺作品，本质上是创作者思想和观念的反应，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革命战争年代，除了军事战线的斗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斗争战线，就是文艺战线。

因为意识形态虽然来源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同时它又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

反作用和影响力，一部好的文艺作品，能激发群众的斗志，能让群众认清社会的真相。

比如，鲁迅的文章，能够帮助人们认清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本质，认清封建制度是造成人民麻木、愚昧的根源。

只有当人民认清封建社会的本质以后，他们才愿意起来打倒这种封建制度，打倒麻痹和愚弄他们的封建文化。

比如鲁迅写过一个他儿时的朋友——闰土，在他们都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可以无忧无虑，没有身份观念，没有尊卑观念，没有等级观念，因此他们可以一起捉麻雀，一起嬉戏，一起打闹。

这原本是人与人之间最真诚合理的相处模式。

可是若干年后呢？

闰土再见到鲁迅，首先就是一句：“老爷”。

身份的悬殊，等级的差别立刻凸显了出来，而再看此时成年以后的闰土，脸上显然已经有了极其麻木的神态，甚至被怀疑偷摸占小便宜。

为什么两个原本“平等关系”的孩子，长大以后就变了？不仅身份变了？而且他们的境遇和人性都变了？

为什么闰土变得麻木，甚至可能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鸡鸣狗盗之徒？

如果说人性，那原本都是灿烂无邪的两个孩子，为什么一个人性就变好了，一个人性就变差了？

鲁迅说出来原因：家里没有土地，只能靠出卖苦力和耕种地主的土地，而且这个

地租没有定规，总是变来变去，你收成好的时候，地租就会涨价，你收成差的时候，他们就暂时性的降价，但是降的时候，多半还趁机给你放高利贷，然后后面你就彻底成为地主阶级的附庸，你面对的是永远还不完的高利贷和租金。

除此之外呢？他们还要面对什么？

还要面对饥荒，兵匪，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

在这种境遇下，闰土变得麻木起来，变得会偷鸡摸狗起来，变得迂腐而且产生了严重的等级观念，稍微见到他们头上一个阶级的人们，就不自觉的卑微起来，一副奴才相呈现在他的脸上。

通过鲁迅这篇讲闰土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闰土是怎么形成的。

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那种作家来写，那就不得了了。他们不会去关心批量生产闰土这类人的制度原因，文化原因，他们只会极尽其能事的讽刺闰土，就像前段时间一个读金庸的网络作家讽刺群众一样：

哎呀，这个闰土天生一副奴才心态，见了人就叫老爷，自己卑微怪谁呢？

这个闰土，明明就穷的一批，居然还生了六个孩子，真的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

这个闰土，放着好好的人不当，居然要去行那鸡鸣狗盗之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果然穷是有原因的，人品就不行。

这个闰土，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居然还尼玛去借高利贷，他是傻逼吗？

这个闰土，也不知道去学一门手艺，只知道出卖体力，能不穷吗？

我们假使把这两种意识形态对群众进行输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第一种，是鲁迅式的，从闰土的种种境遇和行为，心态，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去找出病根来，找出批量生产闰土背后的真正原因，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把这些病治好。

鲁迅找到的病根，是封建制度下人剥削人，人吃人，人压迫人的原因，找到了病根，就可以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打倒这种不合理的剥削制度。

这是我们称鲁迅为革命家的根本原因，他的很多文章都是这样的，阿旺嫂、单四嫂、阿Q、孔乙己，这些人的形成和出现，我们都可以看到背后的真正原因。

鲁迅是一个医生，但是他放弃了用手术医治的方式，而是采用了用文章，揭露病根，从而使得病态的中国人民有被医好的可能性。

这是鲁迅式的文艺作品。

而另外一种文艺的意识形态输出以后会是什么结果？

那就是闰土自己都开始觉得自己活该，自己就是奴才，就是卑劣的人，就是人品不好的人，就是人性充满了恶习的人。

于是闰土一定会变得很丧，没有干劲，不想在继续这卑劣不堪的人生，会任由地主继续剥削和压榨，直到最后死去。

然后他的那六个孩子，会继续成为新的闰土，继续为新生的地主阶级所博旭，所压榨。

那时，整个中国会呈现出全民麻木不仁，全民卑躬屈膝，全民敢于承受凌辱的状态，这就是资产阶级作家意识形态输出的严重后果。

二、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文艺战线不重要，一个国家没有先进的文化，没有先进的意识形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它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如何看待闰土这件事上，在战争年代，它会渗透到该不该投降，该不该沦为殖民地，该不该妥协，该不该继续抗战，该不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等等方面面。

体现在今天，也会在各个领域渗透进去。

比如，人民群众要不要当家做主，该不该当家做主，人民要不要专政，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该不该平等，这种平等是口头上的还是实质上的。

这些都是意识形态领域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的内容，而不同的作家，会输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来影响着群众的判断。

所以，其实在文艺战线，始终都存在着极其剧烈的斗争。

由此就有了关于文艺作品衍生出来的三个问题：

第一：立场问题

第二：态度问题

第三：为谁服务的问题。

既然有文艺战线上的斗争，那么就会有立场，你的作品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帮助谁说话就显得很重要。

历来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作家，会极力模糊立场，他们坚称文艺不应该带有立场，他们追求所谓的超阶级，超立场的纯粹作品，理中客作品。

其实，这种超阶级的作品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嘛，你的文艺作品反映你的意识形态，反映你的思想观念，而这种反映本身来源于社会存在。

既然社会存在是分阶级的，那么你怎么可能写出不带阶级立场的作品呢？

但是资产阶级的作家往往反对这种说法，其背后的实质是他们要对无产阶级的作

品和诉求进行专政，只许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绝对不允许有人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去帮无产阶级反对他们的观点。

因此，文艺作品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立场问题。

大家识别这个立场问题，没有什么其他的标准，就是看一点：文艺作品所传达出来的观点，放到现实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对哪个阶级有利。

这是最简单直接的判断文艺作品立场的方法。

第二点，就涉及一个态度的问题。

因为，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存在着落后的一面和先进的一面，当你的作品描写无产阶级的时候，你持的态度是什么，很重要。

他们有缺点，也应该要描写，因为只有揭露出来，才有利于他们改正，但是这种描写不能是讽刺和讥笑，而是指出错误，并加以分析，目的是帮助他们改正。

这就好像你对自己孩子一样，他有错误你是讥笑呢？还是指出来帮助其改正呢？

这是文艺作品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态度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

文艺作品是有服务对象的，资产阶级的作品专门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是他们的立场决定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自然就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也是立场决定的。

而要服务好自己的对象，就必须亲近和了解他们。

前段时间的《后浪》，他们试图站在当代青年的立场上，歌颂这代青年的种种美好，以及他们享受的种种优待。

但是他们的作品却又严重脱离群众，不了解当代青年面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而是把他们想象中的摆拍生活，描绘成了群众真实生活，这就引起了大家的不适。

因为作品如果没有揭露出他们所面临实际问题，那么他们的那些不利的境遇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因此这样的作品就必然遭到群众的抵制。

有些作家，特别喜欢描写人性，但是他们忽略了人性在不同的阶级中表现往往不同。

以前在井冈山时期，一个国民党士兵，一旦到了红军队伍，思想就立刻得到解放，因为他感受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美好，这个时候他作战立刻变得英勇起来，这难道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人性不好，到了红军中人性就突然好了吗？

一个旧中国里，人们表情麻木，思想迂腐，文化落后，你可以说是人性的没落，可是为什么到了新中国的体制下，人们就变得神采奕奕，全民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了呢？

这难道也是人性在前一刻还如此不堪，到了后一刻就变了吗？

所以，没有唯一的人性，只有在一定的阶级环境中的人性，在一定的制度下的人性，在一定的环境中的人性，在一定教育下的人性。

总之，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文艺作品可以探讨人性，但是应该探讨具体的人性，探讨人性背后的教育环境，制度环境，生存环境，成长环境，这才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文艺作品。
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作品。

第五篇，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探讨文艺作品的文章，强烈建议大家多读几遍。

这篇文章讲了很多关于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方向问题，但是归根结底，这些问题都是从文艺作品的立场问题上衍生出来的。

也就是说，立场不对，那么这部文艺作品基本上就算是被否定了一半以上了。

这样一来，大家一定会产生强烈的疑问，难道不为群众服务的立场，就不能是优秀的作品了吗？

难道非得把文艺创作用政治标准来衡量吗？这样会不会伤害了文艺的纯粹性、客观性、艺术性？

这些疑问，如果不把它讨论清楚，实际上就会对文艺创作者造成很多的思想混乱，要么是盲目的追求政治正确，追求伟光正的作品。

要么就是确实拍了一些有深度的优秀作品，却因为一些政治原因，无法上映，反而被埋没了，以至于现在很多观众对广电总局也是怨念颇深。

这些都是今天实际的文艺创造者遇到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就需要有一个充分的讨论。

首先，文艺作品是不是要有一个立场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就是从这个问题下衍变出来的。

其实啊，在我们对于文艺作品应不应该有立场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一个事实：所有的文艺作品本身一定是带着阶级立场的。

不管创作者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它都必定会带有一定的阶级立场。

为什么？

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文艺作品本身就是对创造者社会意识的表达。

意识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反映的就是社会真实存在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客观基础。

只不过，放到文艺作品里面，因为它具有强烈的艺术性，想象性，创造性，因此它其实是以一种剧烈的，夸张的，更加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武侠小说，够夸张吧，看起来脱离社会现实吧，但是真正优秀的武侠小说，背后都是武侠的外衣，反应出来的往往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一种观念形态；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是反应的一种观念形态。

就连独孤求败剑术的几个不同境界，其实大家就会感觉到，它同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领悟是非常一致的。

漫威系列的英雄电影，背后也要反应出正义与邪恶，世界观和价值观。

哪怕是爽文，它同样在表达着它的世界观，价值观等种种形态，而这些形态必然来源于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在这些经济基础上架构出来的作品。

如果有一部电影，全是华丽的招式、特技，但是内容和剧情却完全撑不起来，那么我们也不会认为它是一部好电影。

这就是说：所有的文艺作品，其实都在表现着创作者的社会意识形态。

而自原始社会解体，人类诞生了私有制以来，社会就逐步衍变成一个阶级社会，

人在一定的阶级里生活，其思想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

创作者也不例外，他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阶级里，它的思想也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的作品就不可避免的一定反应出一定的阶级意识出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没有超级的作品，没有存文艺的作品，没有超出社会意识形态的作品。

因为作品本身就是反应社会意识形态的，你怎么能超出意识去追求不存在的超艺术、超阶级作品呢？

这个问题，我想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

结论就是：

社会还存在阶级的时候，就没有超阶级的文艺作品，它总是要反映一定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

随着这个结论的出现，那么我们立刻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如何判断文艺作品反映了哪个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呢？

或者换个问法更有意义：你怎么判断文艺作品是站在哪个立场上说话的呢？

对吧，这也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文艺之所以带了一个艺字，就是因为它往往是把意识形态，通过艺术化、想象化、抽象化、夸张化的加工处理之后，才呈现出来的。

它不像我们写社会评论，立场观点和价值观点表现得很直白。

也不像毛选里的文章，一上来就首先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些理论文章，评论文章，很容易就判断出来立场了。

可是文艺作品里怎么判断？

《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作品，你说它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说话的？

还有很多电影，电视剧，就是讲了一个故事，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的，那么它们又是站在哪个立场上说话呢？

甚至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打着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实际表现出来的却不一定 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种我们又怎么判断呢？

比如前几个月上映的几部战争片，就有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我们必然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以帮助我们来分辨、识别一部作品，到底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的。

这个标准，《毛选》里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马列的一些基础原理探索出来：

我们说马列主义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我们又说马列主义是科学，其实这里面有个先后顺序，不是因为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所以它是科学，而是反过来，因为它是科学，然后它才站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

为什么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实事求是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反映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严重地，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无产阶级是如何被剥削的事实。

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它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必须要组织起来，寻求自我的解放，否则就会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走向灾难和毁灭。”

所以你说马克思一开始就预设了立场吗？其实没有的。

它是因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种种客观事实，然后自觉就成为了站到无产阶级立场的理论作品。

《毛选》有立场吗？看起来好像是有的。

可是我们总说，《毛选》是阳谋，是不断追求实事求是，是揭露客观规律的作品。

《毛选》里一直贯穿始终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客观规律，就是使得自己的主观思想符合客观规律。

然后它就变成了无产阶级最有利的武器。

前几年韩国出品过几部电影，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其中有一部《熔炉》，讲的是聋哑儿童在学校，受到财阀、社会上层阶级欺凌的故事。

这个故事并非杜撰，而是取材于真实案件，不过它通过艺术化的手法表达了出来。

结果它就成为了一部广受好评的电影。

《红楼梦》为什么成为我们的经典文艺作品？因为它对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文化制度、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刻画的很真实，很细致。

相比之下，《西游记》为什么就要差一些，是因为它反映出来的东西，就没有《红楼梦》那么的更真实，更反映封建社会的种种文化、经济、和制度等等。

当然，这只是从思想反映问题上看，另外还要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红楼梦》除了思想反映问题，还有很高级的艺术表达手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越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文艺作品，其政治立场就越倾向于无产阶级。

我们把这个结论代入到一切的文艺作品中去看看，是不是这样？

鲁迅的作品，反映出国民麻木的真实状态，但是它不是片面的反映，而是把形成这种麻木状态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一并反映出来，是更真实的，更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说他的作品具有革命性，《毛选》说他的作品，就是文艺运动的方向。

而我们说的资产阶级的作品呢？他们往往只反应麻木，只反应愚昧，但是他们却喜欢跳过寻求麻木、愚昧的根源，轻易得出结论：群众天生就是愚昧和麻木的，群众天然就是乌合之众，群众就是活该愚蠢受欺负。

因此他们的作品总是片面的，不是实事求是的，不是追求客观规律的。

可是那么解释好像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都有点不能说服自己，于是他们喜欢创造出一些听上去云里雾里，高端时髦的名词来解释形成群众愚昧的原因。

比如：人性论，格局论、思维论，似乎把人性、格局、思维当成群众愚昧的天然原因。

反正找不到群众麻木、愚蠢的理由，那就用人性论来解释吧，谁叫你人性中就是如此呢？谁叫你格局低呢？谁叫你没有富人思维呢？

这样他们以为找到了群众麻木愚昧的根源，然后就可以发扬他们的理论，掩盖住群众被剥削和压迫才是制造愚昧的根源。

他们拼了命的掩盖，拼了命的渲染人性论，其实目的就是继续维持他们站在群众头上行剥削、压迫的实质。

所以，什么样的作品算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作品呢？

没有别的标准，只有一个：它全面客观的反映出社会真实存在的经济基础。

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总理说中国还有近 6 亿人口还处在收入极低的千元水平的

阶段的时候吗？

为什么他的话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就是因为他并没有追求单纯的伟光正，受到群众拥护的原因就是一点：他客观真实的在反应社会经济基础中真实存在的东西。

把这个标准，放到文艺作品里面也是一样，越是真实的反应群众生活，经济生活，生产待遇意识观念等等的作品，就越能受到群众的欢迎。

因为这种作品，天然站到了群众的立场上，就是如此而已。

相反，不管你多么的打着群众旗号，打着伟光正的旗号，只要你反映出来的东西不真实，有弄虚作假，或者十分片面的情况，那么不管口头说得多好，它都不是站在群众立场上创作出来的。

马列毛主义，思想，理论，他们之所以成为最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理论作品，不是因为他们口号喊得多强烈，而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最最真实的反映出社会经济基础的真实状态，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探索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阐明了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

这些东西才是表明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重要依据，而不是口号，毕竟，你随便找几个读过点书的，都能喊出几句漂亮的口号。

大家把这个结论记住：用来判断文艺作品的立场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标准。

那么接着，由这个立场问题，就继续衍变出来新的问题，即文艺作品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问题。

通过上面的结论，我们可以知道：

单纯追求伟光正的作品，未必是群众立场的作品；

同样，揭露黑暗、丑陋、甚至描写群众麻木、迂腐、缺点、错误的作品，也不一定就不是群众立场的作品。

这些都只是表达手法，不是深刻的本质。

本质就是，你写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反映群众的经济生活，反映真实的客观存在的规律，是不是实事求是。

如果你只写群众丑陋，还强烈的讥讽，却不反映丑陋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那么它就不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就是片面的，就不是实事求是的。

资产阶级作家，不会愚蠢到去写完全子虚乌有的事情，但是他们特别擅长断章取义，或者只讲述部分真实，掩盖完整事实的笔法。这是值得警惕的。

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里，我们应该要擅长识别和揭露出资产阶级作家那种喜欢搞虚无主义，片面真实，唯心主义的东西。

另外，文艺作品除了思想的部分，还有一个表现手法，艺术手法的问题。

一般来讲，有为群众服务的心，但是却没有好的表现手法，写出来的东西枯燥乏味，让人读不进去，这并不是我们鼓励的。

反过来，思想如果比较反动的作品，一旦艺术表现手法很高明，则其危害就异常严重，因为它传播性非常好。

所以，无产阶级作家，创作人，往往既需要深刻反映社会真实，又需要有非常好的，优秀的表现手法，能得到群众的喜爱和拥护，才能更好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站稳脚跟。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呼吁好的文艺作品，呼吁为群众服务的文艺作品，到底是在呼吁什么？

其实，我们呼吁的本质，就是客观、真实反映社会群众生活面貌的文艺作品。

不仅仅如此，理论作品、科技文献都是如此，它越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越深刻的揭露真实，越完整的表达出来客观规律性，它就越代表无产阶级立场。

因为到头来，我们都会发现，只有代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才会代表人类大多数人的立场，只有代表了人类大多数人的立场，才是真实的代表着全人类所有人的立场。

希望，广电总局也好，资产阶级作家也好，无产阶级作家也好，他们都能懂得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第六篇，读《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讲的是边区实行的一个重要政策：精兵简政。

起初因为很多人对于精兵简政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才有了《毛选》里的这篇文章，强调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性。

这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但是它背后涉及的历史背景，却是非常值得我们所了解的，因为精兵简政以及当时边区已经开展起来的大生产运动，都是一个背景下催生出来的。

即：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在皖南事变后，几乎已经完全破裂，国民党除了停发八路军军饷以外，还实行了对边区的封锁政策。

而日本则在这一时期对敌后根据地开展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生存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于是大生产运动和随后的精兵简政也就自然发生出来了。

日本对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根据地的物资极度空乏，民力、生

产工具等都遭到极大的破坏。

老百姓连自己都没饭吃了，哪里还能有多余的钱粮供给政府呢？在 1941 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妇人骂“老天打雷怎么不劈死毛泽东”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另外，随着三光政策的实行，我们自己的组织也必须要加以精简，调整结构，以应付敌人的残酷政策。

《亮剑》里面，李云龙命令各营长、连长们各自散去，隐蔽作战，独立发展自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应付日本残酷的扫荡政策。

我们这篇文章，主要讲一下，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运动，大生产运动。

一、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 1937 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这个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从名义上讲，是属于中华民国领导下的一路军队，他们不仅头上的头徽由原来红军的五角星，变成了青天白日徽，另外一个很核心的改变是：他们开始领国民政府的军饷。

这是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当时改编的八路军编制人数是 4.5 万，按照这个编制，他们可以领到每月 60 万法币的军饷。

当时的法币还是比较稳定的货币，一元大概就等于一块银元。

这在抗战初期，对于八路军来讲，是一笔很可观的费用，这笔费用加上一些海外爱国人士，国内正义人士的捐助，几乎占据了整个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 60% 以上。

也就是说，在抗战初期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来源，倒是有大部分是由国民党供给的。

随后我们的根据地迅速扩大，毛泽东开始鼓励根据地的人要自给自足，因为把财政希望放在外援上本身就是一件机会主义的事情。

所以，其实从 1938 年开始，很多根据地就已经开展起来了自给自足的生产运动，以保证根据地扩大的需要。

然而，随着抗日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开始发现八路军扩大的非常迅速，每年都是以成倍速度扩张。

因此，双方的矛盾也越发的激化起来。

后来八路军打响了百团大战，蒋介石才发现原来此时的八路军人数已经至少发展到了 30-40 万军队的规模，离原来一开始的 4.5 万已经天差地远。

因此，随后双方的摩擦开始剧烈起来，皖南事变就是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自然地，随着两者摩擦加剧，原本给八路军那 4.5 万编制的 60 万法币，从 1940 年开始，也就停发了。

然后另外一边，又是日本三光政策的大规模实行，因此所有根据地都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除了军事、政治上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大生产运动也就开展起来了。

二、

大生产运动

早在根据地扩大的时期，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武汉、广州失陷以后，敌人还要继续进攻。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

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

这是在 1938 年就已经提醒大家的了，但是那个时候根据地规模还没那么大，日本对敌后的扫荡还没有大规模开展，因此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 1940 年，随着国共关系日益恶化，国民党开始对边区实行封锁，日本对敌后根据地也加紧扫荡。

根据地生存日益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喊了起来，大生产运动也广泛而正式的开展起来，在这期间，农村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农业互助合作社。

而且这个时候出现的农业互助合作社，同早期农民自发形成的互助组还有不同点，用毛泽东的话说：

“以前的互助组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但中国解放区的互助组，却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农业互助组的方式很简单，大家把生产工具集中起来，个人小农经济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通过集体来办，比如公共塘坝，水利设施，生产工具的共同使用等等，都是明显的改善生产的方式。

而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群众的热情。

但是为什么说，以前农民的互助组不过是改善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呢？

其中核心的变化在于：农民组织起来的互助社，账目是完全公开的，这个互助社里没有包工头，没有地主，都是完全分得了土地的农民。

当时边区有一个著名的同宣耀后殿子村的唐将班子（扎工队）。他们不仅取消包

工头抽空头、扣工人工钱及高价出赁工具等一系列旧办法，而且废除了包工头压迫工人和一系列封建迷信习惯，代之以读报、教唱新秧歌、公开帐目等文化娱乐活动和民主生活。参加这个扎工队的人数很快由 10 人增加到 25 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所有劳动力。他们成为全边区扎工队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新型互助组的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仅只是出现在了农业，也在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与商业等同时开展起来。

毛泽东对抗大的干部们说道：“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这又标志着，不仅在群众中开展起了大规模生产运动，在八路军干部、政府工作人员，还有没有作战任务时期的八路军，也都开展起来自给自足的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

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耕地面积由 1941 年的 1213.2169 万亩增加到 1945 年的 1425.6144 万亩，比 1938 年更是扩大了 7 成；全边区 1940 年改旱地为水地 2.3558 万亩，1944 年水地面积达 4.1109 万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1 年为 45.586 万石，1943 年达 181.2215 万石，实现了自给有余，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而且这种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在另一个方面竟然极大的促进了工业的大生产，原因很简单，农民手里没那么紧迫了，也就有了多余的粮食能用来买工业品，这就极大的刺激了工业的生产。

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边区原来的工业只有清朝时开办的一个延安油矿，经过大生产运动，到 1944 年则办起了 11 个造纸厂、2 个肥皂厂、12 个被服厂、8 个工具厂、4 个印刷厂、3 个陶瓷厂、23 个纺织厂等 77 个公营工厂，职工达 12,000 多人。在公营工业发展的同时，私营工业也迅速发展。比如私营纺织厂，1938 年只有 5 家，年产布 1,260 匹，1943 年则发展到 50 家，年产布 1.2 万匹。私营造纸厂 1941 年 40 家，工人 108 人，年产纸张 1,295 令，1942 年发展到 48 家，工人 139 人，年产纸张 1865 令。另外，私营煤炭和盐业等也都有相当的发展。由于公私工业的发展，至 1943 年，边区的棉纱、布、铁、纸及其它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给。

工业，农业的互相促进，互相发展，从根源上解决了国民党的封锁，还有八路军的残酷扫荡。

这就是 1939 年逐步开始，到 1940 年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大生产运动。

当然，随后两年我们看到的精兵简政，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也就是《毛选》里这篇“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我们这篇解读文章，主要是讲的背景，背景里面主要讲的是大生产运动。

之所以，借着精兵简政这篇文章，写一写当时的整个经济战线上的历史背景，是想让大家知道：在当初那种极度艰难的环境之下，在物质极不丰盈的情况下，在连生存问题都面临艰难的考验的情况下，集体经济非但可以实现，而且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这个大生产运动，被毛泽东评价为同整风运动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运动，是保障革命胜利的根本性的重要运动，可想而知它所占有的历史地位。

所以，至少我们知道，在历史的某个阶段里，某个时期里，在物质不是极大丰盈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集体经济，是完全可以健康成长，并取

得极大生产效益的一种方式。

了解这一点，对于将来我们学习《毛选》第五卷，实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七篇，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一、

这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是一篇极其实现毛泽东军事战略眼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断定斯大林格勒战役，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而此时，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处在艰苦的拉锯之中，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兵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战役，成为后世所说的战争绞肉机。

虽然此时，英美等国家的报纸也将斯大林格勒战役，比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战役，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战争的演变，以及战争的走向作出任何的推论和假设。

而此时即使是苏联本身，对整个战役的认识都还没能作出准确的定论，因为他们此刻正处在这场战争中最黑暗，最辛苦的阶段，整个斯大林格勒处处都是巷战，此时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没有结束。

但是毛泽东此时却精准的判断出，斯大林格勒战役必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并将这场战役的整个过程和走向梳理了出来。

如原文所说：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

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此时，因为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否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没有从外在表现出来，大家只看到这场战役规模宏大，双方都投入巨大兵力，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德军的攻势十分凶猛，因此对战争的走向并没有明确的定性和判断，甚至被双方的攻势所迷惑，看不出德国将要走向失败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写出这篇文章，告诉大家：放心吧，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但将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此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不仅是反法西斯战争将要胜利，我们中国战胜日本的战争，也将来在这个转折点之后，迎来胜利。

二、

为什么毛泽东可以准确判断这个转折点的到来？

在《毛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总是对历史，对事物的发展划分出不同阶段，比如抗日战争，划分出战略进攻、战略相持、战略反攻。

如果只是简单划分自然不难，但是要对每个阶段作出合理规划，并保证这些阶段的实现和到来，就很困难了。

毛泽东可以准确判断每个阶段的临界点，比如判断斯大林格勒战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本质上是因为他准确的把握了整个战争的发展过程，所以自然对于其中的不同阶段可以看得更清晰，更透彻。

所以，把握事物的整体发展，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技能。

我们说推动事物的发展，其根本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就好像阶级矛盾，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推动事物的发展一样。

而要推动事物发展，对于事物矛盾的不同方面，其背后还有一个动力源的问题。

没有任何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是不需要动力源的，就好像抗日战争里面，中国要战胜日本，它背后有除了极少数的汉奸投降派之外，全中国近 4 亿同胞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意志，这种意志就成为了推动抗日战争朝着中国胜利的方向发展的动力源。

反过来，日本也想要取得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动力源是什么呢？

是符合日本极少数大资本家，大企业家，大地主等阶级，在日益激化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中，为了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意志。

也就是说，他们要战胜中国的动力源，就来源于他们国家少数大资本家，大地主的意志。

这里的动力源我们暂且把它认定为一种意志，一种主观意识，就像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也是他的一种意识一样。

但是，这种意识本身作为一种呈现出来的，表面的动力源，其背后还有一个动力的动力源，我们可以说它才是根本的动力源，也就是不同群体的实际利益。

换句话说，意志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中国方面其背后根本的动力源，在于近 4 亿同胞的根本利益。

而日本的核心动力源，在于其国家少数集团的根本利益。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日本少数集团的意志，因为掌握着极强的军事力量，以及各种客观条件的优越性，有发动战争并在一定阶段里占据优势的可能，

但是他们的动力源极弱。

而中国却反过来，其推动战争走向的动力源极强。

任何事物的发展，如果不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且是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志，那么它的动力源就会不断的衰竭，因为它会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

反之，如果它的发展，能够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那么它的动力源就会源源不绝，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阵营，体现这种意志。

而这种不同意志的背后，代表着不同群众的利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他们的动力就来源于对其他国家资源、地盘的侵略和占领。

法西斯的本质并不代表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的利益，它们甚至不代表自己国家大多数人的利益。

因此，当他们发起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没有实现他们侵略和占领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以占据战争资源的目的，那么他们的动力源立刻就枯竭了。

余下所能表现出来的，仅仅只是灭亡前的奋起挣扎而已。

反过来，斯大林格勒战役实现了保卫自己的目的，其背后的动力源还将源源不断的增强和壮大。

所以，虽然双方在战争中牺牲的情况来看，苏联牺牲还更大，损失还严重，但是随后战争的转折点却立刻到来，因为一方动力源枯竭了，一方却源源不断的涌上来。

任何事物的发展，我们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它发展的根本动力源在哪？

这个动力源表面看，是人的意志的体现，但是实际上背后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

我们革命时期的动力源，是广大人民群众，具体指的是农民、无产阶级工人、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左翼。

这就是革命的动力源，他们代表着当时全中国占 95%以上群体的利益，他们也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人民群众。

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分析了革命的动力源，并把每个不同动力源的经济地位，处境都作出了分析，其核心就是要准确的搞清楚，我们的动力源到底包含哪些群体，他们动力指数如何？

事物发展规律既然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做任何事也是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中国发展的根本的动力源。

我们如任何一件事，也应该想想它代表着谁的利益，它为谁创造了利益？它创造利益的同时，是不是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

就好像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损害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利益一样，这样的动力往往遭到极大的反对，最终偃旗息鼓。

你代表着的群体的利益，就是这件事能否发展的根本的动力源。

第八篇，读《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这篇文章同样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即一方面是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而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边区的掠夺和扫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都遭遇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这样的困难，边区和解放区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

而这篇文章，批判的是在大生产运动时期内，出现的两种思想。

第一种：不注意经济问题，而只是在财政问题上想办法。也就是说把精力和思想放在了怎么节约财政开支，怎么多从百姓身上收税等财政手段上，而不是如何发展和刺激经济。经济本身不活跃，财政问题上怎么想办法，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第二种：不注意帮助群众开展和发展经济，却只是嚷嚷着喊经济口号，喊着发展经济，但是却不见政策如何来帮助百姓发展经济，最后还天天想着从百姓身上想办法来扩展经济。

其实，简单说，就是不要老想着在存量上打主意，要多想着去搞增量，而搞增量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另外一条，制定相应政策，帮助发展经济。

针对第一条，具体的措施和办法，就是开展全军、全政府相关人员的大生产，所有人都参与劳动，垦荒，织布，磨面等工作。

针对第二条，具体办法就是建立公营经济，集体经济，由政府出面，帮助群众组织，修建一些个人无法修建的水利设施、集体购买生产工具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农民生产力能够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也能提高。

由此，即满足边区消耗，农民也不至于因为“涸泽而渔”导致生活越发的艰难，总之，全民一起渡过难关。

整体上，我们把这期间的种种发展经济的措施，发展生产的措施，都称作大生产运动。

这跟此前我们所写《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我们必然也好奇，为什么那个时期内，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集体运动，集体生产，全民努力来贯彻一个目标，共同渡过难关呢？
教员把大生产运动，媲美于同整风运动同样伟大的运动。

为什么这样的运动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

这里面本质的原因是一个：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

这是全民运动，全民生产，或者说全民合作去做一件事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这个运动的本身，必须是满足参与这个运动里面的所有人的整体利益。
集体干活的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则可以顺利进行。

反之，如果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与其中某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那么“某个人”就必然跳出来反对，如果这个声音很弱，反对无效，那么也就罢了。但是如果这个声音很强，形成了一个阶级，也就是说集体利益，与某个阶级的个人利益冲突了，那么这个阶级就会一起反对，最后必然产生阶级斗争。

大家用这个思路去观察从井冈山根据地一直到今天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是阶级斗争定律的一个表现形式。

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常常存在着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从全局去看它们的关系，或者说从整个人民群众出发去看，就会发现集体利益是实现人民群众个人利益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没有集体利益，则没有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只有极少数人的利益。

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比如为了抗日，就要多收税，多征收农民粮食，这就暂时性的损害了短期利益，但是它得到的是长远利益。
抗美援朝也要短期让农民经济利益受损，但是它得到的也是一个长期利益。

工业化、发展科技、走技工贸路线等等，都是通过调整控制短期利益，在前期增加投入、又承担更大风险，来实现更好的长期利益的重要发展思路和策略。

换句话说，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只有长期利益才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但是还是和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一样，总有那么些人，只顾短期利益和个人利益，拼了命的为此斗争，这些都是历史潮流中的倒退力量。

我们永远都不得不承认，历史倒退思想的存在，是有其原因的。

比如，大量封建等级思想，资本主义个人私有利益至上思想的存在，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原因，但是存在不一定合理，它永远都是我们应该反对和斗争的。

第九篇，读《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毛选》此前提到过，什么是领导力？

所谓领导力就是预见力，没有预见则没有所谓的领导。这个定义是从对战略的制定，方向的把握上来说的。

没有正确的方向和战略规划，一切事情无从做起。

而任何事情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人去做的，任何的战略必须辅以相应的战术、策略、手段才能生效。

战略方向是不是需要作出调整，也要在实践中去检验，然后根据检验结果，来进行合理的调整、巩固、提高和发展。

这是我们做事的流程。

这篇《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主要是针对开展整风运动，以及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当时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具体领导方法的问题所写。

而全篇文章关于领导方法的部分，始终围绕着两个主题：

第一：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第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这是两个原则方法，也就是说一切的具体的行动始终要围绕着这两个原则展开，脱离了这两个原则，那么一切的领导的所谓方法，都必然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

首先先讲讲这个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里是这样说的：

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这段话意思很明确，它正是我们上面提出的那样一个流程：

即在战略核心层面提出“整风运动”的纲领和号召，这是战略方向的东西，是执行中一般性的东西。

就像扶贫一样，有贫困的地方就有扶贫，这是一般性的战略和号召。

在这个号召之下，要在运动中选择一两个，两三个基本单位，通过深入研究得出

整个项目工作的种种优点、缺点、思想特点，执行过程等等，在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把经验总结出来。

这个颇有选取试点、打造试点的意思，就是从所有整风地区，寻找或是创造出一个、或几个最优试点。

这些试点是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合作中，通过改进方法，解决问题，总结出如何能把事情做好的试点。

取得经验以后，我们就把这个经验进行推广，在推广下去以后，又要各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普遍经验，形成自己的经验，最终推动所有单位把这件事办好。

从马列主义理论来讲：

就是人的认识，是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然后循环往复，不断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过程。

最近流行那句话：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层面之外的钱。

其实所谓的认知，就是你认识到的事物规律，认识到了事物规律，那么就能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事情就容易成功。

不过，这句话不会表达另外一层含义：既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认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从地上长出来，它需要一定的客观环境的作用，又需要主观能动的学习。

你从小生活在一个山沟里，没有接受任何教育，或者接受着极度匮乏的教育资源，这种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是广义上的家庭、环境、社会、学校教育等等。没有这些教育，对事物正确是认知是永远不会有。

但是，有了这些环境，如果你本身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好好学习，那么也不一

定能获取对事物正确的认识。

所以社会意识形态里，如果不强调各种资源的公平，不强调生产资料的公平占有，那么是不可能遏制住两极分化的，是不可能遏制住贫富差距的。

认知的巨大差异，其实会造成严重的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

而这种差异减少的方法，没有其他，就是资源的尽可能公平的分配。

扯远了，拉回来吧。

上面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种方法，既原文所述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其背后的本质就是人的认识论的过程。

所以说《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纲领性的理论指导文章，就在于此。

第二个要说的方法，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这个看起来是一句很简单的话，我们也总是听说要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密切联系群众。

但是这个方法也是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

你要跟群众结合，就要为群众办事，不能光嘴上说着结合，行动上却啥也看不见。

从历史看，一开始我们是通过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罢工等方式，首先与工人阶级结合，后来通过土地革命，开始与最广大的农民群体相结合。又通过建立政权、根据地来发展和巩固这种结合。

这是这篇文章《关于领导的若干方法》之前的结合方式。

我们读第一卷的时候，就看到这种结合方式是经过很多斗争的，著名的就是吉田会议。

军队要不要做群众工作？这是讲的军队要结合群众的问题，是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才真正意义上形成了军队与群众结合。

所以这也不是天上掉下来，或者空喊口号形成的。

极端民主化，也是吉田会议上一个重要问题。它也是同群众结合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因为群众有他们自己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视角和利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往往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大家乱七八糟的胡说一通，每个人发表点意见，看似好像很民主，但是这些意见都是不统一的，这个说一顿，那个说一通，结果一个很小的决定几天没办法定下来。

这就是同群众结合，让群众参与管理，让群众参与生产，提各种意见的弊端。

教员如何解决这种弊端？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民主是一种很好的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手段，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是反动力量和倒退力量，这个没啥好怀疑吧。

所以，你要解决极端民主化的问题，要解决同群众结合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思路一定是这样的：

首先肯定民主的重要性，然后把民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拿出来，具体分析其矛盾，然后根据问题找出解决办法。

如果条件真的不成熟，需要暂时性的放弃一部分民主，那么我们也需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让大家知道哪些条件不成熟，所以只能暂时放弃一部分民主，但是我

们要努力创造条件，使得最终实现民主。

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过程，与这个过程相反的思考方式是：

民主会造成极端民主化，所以民主不行，应该放弃民主。

这样子事情就严重了，按照这个思路执行下去，那么群众永远都不会有民主的权力。

对吧，很简单的道理，后面一种思路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往往也会找一点理论依据，比如：他们会说，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因为实践中出现了极端民主化，所以民主不行，不能民主，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

大家想想，是不是挺滑稽，而且很可怕？

如果大家把这些事情同后来的种种历史对照一下，会发现后一种思想，后一种处事作风，在很多人身上都是明显的。

这后一种作风，被教员称作实用主义，他们的哲学观就是实用主义哲学观。

有人要按照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去做事，所有就必然跟教员思想产生斗争，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讲了什么：就是你们要同群众结合，结合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第一卷里那篇《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就诞生了。

我们重新回顾那篇文章，就会发现背后的指导思想，甚至说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回到这篇文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讲来讲去，讲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其实是这样一个流程：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这其实就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流程嘛，把散乱的群众意见收集起来，然后经过核心领导层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处理，最后得出意见方法，然后到群众中去执行。

然后再继续收集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继续收集意见，分析加工之后，又重新放到群众那里去。

这就杜绝了极端民主化，使得混乱的意见得以集中处理后执行。这也有点像把原材料加工成成品的过程。

你搞包办代替是不行的，短期内或许可以减少很多麻烦，你直接处理了效率会更快，但是长期下去，人民群众的参与权逐渐丢失，久而久之，民主也就无从谈起，最终伤害的是整个体制。

连家里带孩子都是这样的，家长应该让孩子自己学会做自己的事情。

婴儿时期，条件不成熟，必须家长来完成一些事情。

但是等到孩子有一定动手能力，你就要慢慢教会他吃饭，穿衣，学习，写字等等，教会他的过程，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比你直接去把那件事做了更麻烦，所以你总想把包办代替，减少麻烦。

我见过很多这种家长。

可是长远看，孩子自己不能解放自己，最后问题是很多的。

不要包办代替，越早解决问题越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比你去用精英意识搞包办代替从长远看要强得多。

当然革命时期，抗日时期，包括后来一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时期，大家利益比较一致，所以这些道理很容易讲通，因为本来也不复杂。

第十篇，读《质问国民党》

教员是个辩论高手，极其高明那种。

张国焘在回忆教员的时候曾经这样描述他对教员的第一印象：

一位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他的回忆录里自然不会说什么好话，但是这一段，其实也点出了年轻时候的教员思考问题的一些方法，那时候已经有一些矛盾论里思维方式的雏形，只不过后来通过马列主义理论化了。

今天我们读的这篇文章，《质问国民党》，里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即把国民党干的那点事儿通过分析，指出其矛盾之处，让对方根本无法辩解。

为什么无法辩解，因为指出来的东西都是事实，是摆在那里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的，你根本就反驳不了。

比如文中第一个质问：

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置在西北方面的主力就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等三个集团军，都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其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黄河沿岸，对付日寇。这种事实，已经是四年多了，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料近日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即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一军开到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

这不能不使人们发生这样的疑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质问国民党》

这个问题你怎么反驳？你根本就反驳不了，因为这是事实。

沈腾在一次鲁豫的采访中说：如果你长得很漂亮，那么别人说你丑，你是不会介意的，因为你知道那是嫉妒，甚至人家骂你一句“小妖精”，你嘴上怼几句，心里乐的一批。

为啥，因为你知道他说的不是事实。

可是如果你真的长得丑，别人那么说你，你就会很难受，因为你知道他说的的事实，你无法反驳。

《质问国民党》第一个质问，并不是所谓的质问，而是阐述了一种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你在西北地区就是只有三种兵团，其中两个专门用来对付自己人，而对付日本的只有一个军团。

这事你反驳不了，因为它是事实。

如果你反驳，那么你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制造虚假的证据，比如说那里有五个、六个兵团，全是用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

这样一来，或许可以短期欺骗群众，可是我们真希望你这样做，因为只要你开始欺骗，那么我们只需要想办法揭穿你的欺骗行为，那么你在群众那里的威信立刻受到致命打击。

接下来，你还怎么跟我辩论？辩论不了，我会打得你毫无还手之力。

撒谎是最容易被反噬的。

古人说：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要学会辩论，不应该仅仅着眼于技巧，着眼于诡辩术，着眼于偷换概念等等，这些东西往往经不住考验，尤其在事实面前，真可谓一触即溃。

《毛选》本身是阳谋，这个阳谋的理解就是如此：

你把事物实事求是的内容写出来，就是最好的文章了。

鲁迅的文章我们之前就聊过，它的伟大之处，有一个原因：就是把实事求是的真相描绘了出来。

闰土的奴才思想是怎么来的？

单四嫂子是怎么被封建文化给害了性命的？

人血馒头是在什么样的制度文化下产生的？

封建社会是怎么人吃人的？

把这些事实，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写出来，它就变成了具有革命性质的东西，变成了人们很难反驳的东西，之所以难反驳，就是因为它是事实。

《质问国民党》一文，不是因为什么技巧，什么写作手法，而是因为它描述的都是事实，事实就是你老蒋消极抗日，积极反我们嘛。这怎么能说是团结，怎么能说是维护人民利益呢？

所以宣传上，不是老蒋团队没有文笔好的人，而是他们没有真正站队人民立场，但是他们又不敢说，所以就必须要粉饰、要歪曲。

这种粉饰和歪曲，又特别的没有战斗力，就造成了一帮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写手，在教员面前不堪一击。

所谓“质问国民党”，就是把国民党内部性的矛盾揭示出来而已。

当然了，要看清矛盾，分析出对方的矛盾，需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上。

其一：你得对事实有基本的掌握，对材料有掌握，否则你写不了所谓的事。

其二：你得有分析问题的工具。

这两点就是我们之前所说，既需要事实，也需要理论工具，单单有事实，不能把这些事用一定的理论把它分析出来是不行的。

有理论，不基于事实去用，就变成教条主义。

第十一章，读《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我们在读《毛选》的时候，都知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观点：紧密联系群众。

可是联系群众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篇《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背景下，在发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过程中，就其中出现的种种错误观点的一个纠正性质的指导文章。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里面所写的当时出现的种种错误观点，因为看了这些观点以后，你就会发现，历史已经过去 78 年了，可是很多当时《毛选》批判过的种种错误观点，在今天依然有蔓延的趋势，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1、

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

2、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

3、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

4、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5、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

6、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

7、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

8、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

9、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

10、不把合作社看作为群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

11、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

12、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

以上是我们截取的重要的几个观点。

看起来好像很多，但是大家只要稍微代入到今天的生活里，就会看到这些观点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内容。

比如，恩赐观点就是当下一种普遍的流行观点。

恩赐观点的背后，是一种英雄史观、精英主义观点、包办代替行为的综合反映。

再比如：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这一点这几年好太多了，如果往前十五年，大家应该都可以有一种明显的感受。

这些条文，这些在当时被教员批判过的种种错误观点，实际上一直存在，只不过后来在建国以后发展得却反而严重了。

这是因为在解放区根据地之外，后来的建设过程中，有大量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参与进来，必然带来种种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精英主义思想，也必然在实践中产生大量包办代替、利己主义的种种行为。

于是脱离群众便越演越烈，直到最后再想紧密联系群众，已然成为一件极难的事情。

我们把这篇文章中抛出来的那么多的观点总结一下，其实不管是反对恩赐观点，反对不帮助群众生产却只想从群众那里要钱要粮，以及种种的联系群众的方法，这些观点各种不同，各自针对当时出现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

但是背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可以用一句话表达出来，这句话就是后来教员说的：为人民服务。

大家把这句话，代入到上面我们例举的那十二条当时的观点条文，去看一看，比对对比，再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

不仅仅是这篇文章观点各有不同，《毛选》里不同的文章也表达着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如果一定要找出他们的种种共通之处，那就是这样一句话：为人民服务。

有时候我们评判一件事对不对，评判一个政策合不合理，其实没有太多复杂的标准，往往就是这一个：是否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们在开篇解读的时候，首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就提出一个立场问题，其实学习《毛选》，如果没有把它里面的群众立场搞清楚，只是说方法，说故事，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为人民服务，就是一种立场、态度的深刻表达。

第十二篇，读《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这篇文章写于 1943 年 10 月 5 日，我们从这个时间点就能大致知道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

日本方面：正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国民党方面：正在积极商讨反共策略，胡宗南闪击延安刚刚过去没几个月。

共产党方面：根据地正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解决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党内干部正在进行一次自下而上的整风运动，以打倒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党内宗派主义；统一战线方面仍旧在力求团结，反对分裂。

《毛选》第三卷的文章，始终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历史背景中发生的具体事情而写。

这篇《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是针对国民党召开的两次会议所写，即标题所写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国民党召开的这两次会议，其内容以宣扬反共立场，反共态度为主。

针对老蒋这种继续破坏团结，时时刻刻想着消灭共产党的举措，教员写下了这篇评论这两次会议的文章。

一、

说起这篇文章，看完之后简直觉得教员对老蒋才是关怀备至啊，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文章真的就像一个老师给学生分析问题的时候所讲的那些话，真真实实的把国民党心思，以及国民党面临的不同前途给分析透彻了。

文中直接明了的指出了国民党针对共产党可能实行的三种方针：

第一种：现在立刻就开展积极反共，或军事进攻，或政治进攻。

这是国民党反共立场下可能采取的第一种措施。

第二种：暂时先拖下去，将来等抗战结束，或者找准时机再打。

因为他们要顾及国际舆论，国内舆论，害怕自己完全陷于孤立，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反共方针。

第三种：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的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这种方向是共产党主张的方向，背后有全国无产阶级作社会基础，有国民党中的开明人士、社会上其他民主党派等支持，也算是一种可能的方向。

事实上，正如教员所说，针对国共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这三种：
要么现在就打；要么拖到抗日胜利以后再打；要么就是和平解决。

不可能再有其他第四种前途和方向，这是我们可以明确的。

接着，精彩的部分就来了，国民党既然无非有这三个方向，那么换句话说，他的
一切策略、措施无非就是在这三种方向上来制定具体的策略。

而针对这三种策略，就必然会把国共关系推向三个不同的前途，所以此文重点就
是要分析这三种不同的策略之下，国民党会拥有哪三种不同的前途？

历史证明，但凡国民党集团能听进去半句，也不会是后来那种局面，因为这篇文章
把三种策略下的三种前途说得有理有据，已经很清楚了。

可是后来老蒋真的采取了第二种方针，也就是拖到抗日胜利以后，立刻就开始了
对共产党的进攻，于是就得到了教员在这篇文章中已经给他预测好了的结局——
国民党的彻底失败。

我们来看看教员是如何分析的？

二、

首先是第一种，也就是现在抗日还没取得胜利，就立刻开始反共的方针，这种方
针会得到什么样的前途呢？

“国民党中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们，只要你们积极地发动了或参加了内战，
你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投降主义者。如果你们听信投降派的策动，把国民党
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当作动员舆论、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工具，
其结果必然要走到此种地步。即使自己本来不愿意投降，但若听信了投降派的
策动，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结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这是十一中全会后国
民党的第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个危机极端严重地存在着。”——《评国民党十一
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这段话就是说，现在就要准备反共的人，其结果就是走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路
线。

那种已经准备好投降的自然不必说，但是也有一部分国民党人想的是：“一边抗日，一边反共”。

教员剖析了这种想法，直截了当的指出：

你们自己究竟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吗？你们现在名曰有三百万兵，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做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无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你们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能的。只要你们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只能有一个“降”字方针。——《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这段话，其实很深刻的指出了蒋介石军队存在的严重问题，只可惜成年人是难以说服的，成年的利益集团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蒋介石执行现在就立刻反共的方针，那么其结果，必然就是要准备投降日本，因为这正是日本巴不得的事情嘛。

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岂不美哉？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但是教员也估计，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高，原因如下：

“因为他们看见国际大变化不可避免，看见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看见内战就是投降，看见国内人心拥护抗日、反对内战，看见国民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自己已处于从来未有的孤立地位这种严重的危机，看见美国、英国、苏联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发动内战。”——《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要立刻发动内战，面临着国际、国内双重反对，以及巨大的舆论压力，这将使得他们陷于彻底的孤立。

国际上，二战还在继续，英、美都不希望此时中国内战一开，导致日本坐收渔利。而国内，要是此时公然发动反共内战，那就更是陷自己于舆论的孤立之中，这也是刚刚过去不久的闪击延安为什么有悄然结束的原因。

既然抗日战争离胜利不远了，为啥不等抗日胜利以后呢？那时候不仅舆论压力减少，而且能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

所以，国民党最有可能的是第二种方针：

即：“暂时拖，将来打。”

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

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是善于“骗”和“拖”。这些人们之想“打下延安”和“消灭共产党”是做梦也不会忘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投降派毫无二致。只是他们还想打着抗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国内的舆论指摘，所以他们可能暂时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的有利条件。他们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那么，如果采取此种措施，等待国民党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事实上，当下阶段，国民党采取的正是这种措施，我们说要看这种措施之下的前途，只需要看它的现状就可以了。

此时，国民党“先拖后打”的政策下，是一个什么现状呢？

“日本把其在华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百分之四十二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呶呶不休，劝其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出一点两点稍为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先生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国主义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说简单点，这个前途发展下去，国民党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一个在抗日战场上已经为日军所轻视的队伍，你能指望他们打自己人就凶狠起来吗？那是做梦。

除了以上两种方针和前途之外，（这是两种必然导致投降，失败的方针和前途），那么国民党如果想要走向和平、强大之路，只有剩下了一个选择。

那就是和平、民主的解决国共关系问题。

也就是第三个前途，这个前途下，要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呢？不用老蒋你去思考了，教员已经帮助他思考好了，你要么照做，要么就是走向失败，你自己选吧。

这些措施是什么？

那就是：

“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

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抗战到底，制止投降危险，继续合作，制止内战危机，承认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恢复新四军，制止反共运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四五十万军队，不要再把国民参政会当作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的御用机关，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减租减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业，取消特务机关，取消特务教育，实行民主教育，这就是我们对蒋先生和国民党的要求。其中大多数，正是你们自己的诺言。——《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看吧，连具体操作手册都给你写好了。

前两种内战方案，已经作了说明，其前途只能是使得国民党走向失败。

因此，国民党必须采取第三种方案，才能迎来和平，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

三、

看了这篇文章，大家是不是有前文我说的那个感觉？

教员对老蒋简直算是真爱啊，就像一个家长指导孩子一般，种种可能、策略都给你分析清楚了，就差你点头执行了。

你如果觉得教员说得不对，也大可以出来辩驳一番，只是可惜了，他们心中只有自己的阶级统治，始终为自己固有的阶级利益所控制，这些话他们是一句也听不了的，最终的历史，他们选择了第二个办法，第二个方针，其结果，也迎来了教员警告过他们的第二个结局。

第十三篇，读《组织起来》

一、

这篇《组织起来》同样是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所写的文章。

我们一直说，毛泽东思想体系里，一个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那么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该怎么为人民服务呢？

我们回忆一下之前读的那篇《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拥政爱民运动》，里面提到了很多在大生产运动中的错误观点。

里面有这样几条非常值得注意：

1、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是国民党的观点，是错误的。

2、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款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

3、不注意全面的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

4、不把合作社看作为群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

5、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

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几条其实都在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指向也很明确，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将群众组织起来。

二、

为人民服务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和方式，只有一个办法：将群众组织起来。

任何包办代替思想，把群众仅仅看作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思想，不管是在那个年代还是后来的建设时期，都是极端危险的。

后来的著名三年跃进，其造成的危害，背后根源的思想原因，就是包办代替。

比如你说这个浮夸风，瞎指挥风，只能从哪里刮起来？群众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自己在地里种了几斤粮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瞎指挥风？什么是瞎指挥？自然就是不了解实情，不了解农民到底种了多少地，产出多少粮食，只是单纯的派任务，搞不切实际的目标，这就是瞎指挥风嘛。

这个风又只能从哪里刮起来？

归根结底，这个包办代替思想，表现出来就是严重脱离群众。

《组织起来》这篇文章这样写道：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

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做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做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组织起来》

其实这个思想，并不是大生产运动开始以后，才有的思想。

我们稍微回忆一下第一卷的时候，在做军队工作的时候，其实之所以说红军不同于普通的国民党军队，不同于军阀式的军队，其核心就在于红军是与群众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打仗，打的是人民战争，而不是军阀单纯混战。

从军队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做群众工作，从确定了军队的性质和任务以后，就决定了红军是一支人民军队，因为他们的政策始终与群众结合在一起。

所以，大生产运动只不过是《毛选》里群众思想，在政治工作，在生产线上的一种体现而已。

这种体现收获的成绩是伟大的，教员把它比作同整风运动具有同样伟大意义的运动，就是因为它解决了当时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的物质生活问题，造就出这样的主动局面：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组织起来》

“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还有我们的工厂，发展了生产，清查了特务，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

农业劳动英雄、工业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中也出了许多劳动英雄，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
——《组织起来》

这一切都是紧密联系群众之后才取得的成绩。

应该说，教员的群众思想不是说从马列理论上看来的，而是他在实践中，发现一旦联系了群众，则革命事业、生产事业就取得很大的成绩，凡是脱离群众的时候，各种事业就要受到严重挫折。

所以这种实践的意义，又强化了他的群众观，和群众思想。

三、

要实现将群众组织起来，需要一定的具体方式。

在军队里，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官兵平等，军民平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具体措施来实现的。

在生产运动战线上，如何将老百姓，将农民组织起来呢？

组织的方式就是——合作社。

这是《组织起来》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当时的最为重要的组织方式，当然，方式是可以变化的，你不一定是合作社，也可以是其他的什么设，或者什么具体方法。

但是有一点不会变，就是群众必须要组织起来，而不是散乱的个体经济，个体劳作，否则就没有力量。

文中这样说道：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

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组织起来》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组织起来》

这段话很经典，也把当时的合作生产，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作出很好的描绘和呈现。

他表明了这样几个事实：

1，群众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

2，个体经济、分散劳作，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这个如果我们扩展一下，放到资本主义社会里，那就是私有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

3，早期的合作社，是在私有制基础上，所实现的集体劳作。

4，集体互助的合作社方式的生产，首先是群众自己发明的，只要是群众自己创造，并自愿加入的，那就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几个观点，对于后来我们研究建构后的经济形态的变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不管后来的经济如何改革，只能是在这几个观点上的进步和发展，如果说改革中出现了与这几个原则相违背，甚至倒退的情况，那么其具体的策略就一定有问题。

也就是说，不管你改怎么改，以上几个原则只能进步和发展，不能倒退。

比如，你只能把群众往更好的联合起来的方向去改，而不能把他们越发的从联合走向分散。

其二，个体经济固然还要长时间存在，也应该让他们发展，但是总体上，个体式经济的发展，只能说是为了解决实际发展集体经济条件不成熟时的一种过渡手段，切不可让其沿着个体方向泛滥开来。

其三，组织群众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群众自己的意愿，否则就容易出现过左或者过右的思想和策略。

这几点，我们可以在将来研究后来的历史脉络的时候，用作对比，此处暂时先不展开了。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组织起来》这篇文章，其实它告诉我们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没有那么多花

里花哨的东西，其核心就在于把群众组织起来。

最终应该是由群众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是由少数人指挥着群众进步和发展。

组织的方式不一定是合作社，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必然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和发展，但是组织群众，让群众称为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则永远不会变化。

第十四篇，读《学习和时局》

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很明确，是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写的一些原则和标准，以及注意事项。

我们都知道，把一定历史阶段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本身作一个梳理，把事件发生的原因做一个总结，可以实现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但是要能准确给历史，尤其是刚刚发生和经历的种种历史作出一个准确的梳理和评价，并把其中正确的、错误的种种原因找出来，这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其中还涉及到具体的人，比如博古、王明、张闻天等人，甚至如果在张国焘没有叛逃国民党之前，还包括给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出一个梳理和评价，并对他本人定性，这些都是极难的事情。

每个人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政治基础，给这个人定性，往往还会涉及到给这个人背后的杜会基础、群体、政治基础作出一些评价，尺度和分寸掌握不

好，就很容易激化出矛盾。

比如，评价王明错误路线，那么当时执行错误路线那批人该怎么处理？怎么评价？

这条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对自己人的伤害，甚至造成的严重的革命损失，是否会被清算？

对这条错误路线，以及错误路线下的种种原因，往往也是很难被认识的，比如说当时王明“左倾”错误，有一个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这对于很多没有大局观的中农和贫农阶层，他们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当时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人，其实占了绝大多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不仅仅是一两个人反对，几乎是当时所有的高层都在反对，你一清算，也容易激化出矛盾。

这些都是做历史决议所存在的巨大困难，更何况，你还要保证你所写的决议是对的，否则你作出的定论，人家不一定服气。

如果，有人对你作出的历史事件评价和总结不服气，不满意，甚至觉得你的才是错的，那么这个历史决议又如何能起到统一思想和统一步调的目的呢？

这些种种的难题，就构成了写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巨大挑战。

所以，大家千万不能轻视这个历史决议，其实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就只看到过两个历史决议。

一个是教员带领大家，在 1944 年所作，另外一个是 1981 年通过的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

这两个历史决议当然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我们稍后来讲。

以上是关于作历史决议的难点，以及它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

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是，在作这个历史决议的时候，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理论原理，以及这些原理所能引发我们的思考。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要对历史作出科学的，合理的评价，以达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那么第一个最基本的，最核心的，最科学的原理和标准，就是秉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如果说共产党人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评价历史，那么得到的历史结论可能就是蒋介石集团那一套，把所有错误全部归结于人心不古，都是人的问题，最后必然导致各派加剧撕裂。

我们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就知道那些造成错误路线的种种思想上的问题，其实背后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因为人的意识就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嘛。

所以，任何错误固然都是人犯下的，也都是某种思想原因造成的，但是唯物主义者必须还要把造成种种思想错误背后的社會根源和历史根源找出来。

否则，我们就无法预知和判断下一次错误，也无法真正清楚造成错误的种种根源，也就起不到根本上遏制和改正错误的作用。

因此，这就决定了在作历史决议的时候，必须坚持两条标准：

第一：必须找出干部思想上所犯错误的原因、历史环境、以及改正这种错误的详细办法。

第二：除非严重变质和无法挽救的思想，否则就不应该强调个人的责任，而应该着重分析当时的环境，错误的内容，也就是分析清楚错误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而不能只归咎于个人思想和品质。

这两条标准实际上，就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反映。

第二：实事求是的原理

实事求是原理，也是用来分析历史，对历史作出科学决议比不可少的原理。

这就要求，对历史事件，必须作分析，而不是采取一切否定，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分析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时候，会遵循这样的原则：

一方面，指出其当时的政治政策、军事政策、以及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该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红军武装斗争，以及都同意要把土地没收分给农民等基本面上，大家都是一致的。

这些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而不是一味的全面否定。

事实上，向这种需要作出历史决议的重大历史事件，路线错误等问题，是绝不可能出现所谓的一切否定，全面否定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时的历史是如何发生，并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呢？

如果就是简单的一切否定，都是错的，那么这样的历史事件是不可能留下重大影响的。

王明的“左倾”路线就是如此，他虽然错了，但是因为其有正确的一面，比如坚持土地革命，坚持分田分地，坚持武装斗争，坚持保苏维埃，坚持不要打烂坛坛罐罐，这些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的，有社会群众的支持。

因此，才造成了很多路线上的错误。

如果这种社会基础不分析出来，大家一致的地方不分析出来，那么就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也就很难说服人。

这两个基本原理，不仅仅是评价历史事件，读历史会用到，大家仔细想一下，会发现生活里会经常用到。

在家庭教育上，对孩子的教育各种策略，方法，育儿经，其实抵不过四个字：实事求是。

孩子是可以听得进去实事求是的分析的，他犯了错误，不能一味的包容和宠溺，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指责和责骂。

因为这不符合对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孩子有了错误，你需要找出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和这种错误的思想原因，给孩子分析清楚，哪里错了，哪里对了，错是因为什么错？对又是因为什么对？

孩子思想上的问题，要给他分析出来，造成这种思想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还是社会环境？

找出这些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才能让孩子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们也能从错误的根源上，找到家长可以改进的地方，从而起到教育作用。

这不就是生活里的运用吗？

不仅如此，在工作上其实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复盘战略，复盘计划的时候，往往也要分析不同的原因，而不能把所有问题全部归结到员工思想、意识问题上。

即使员工思想真的有问题，那么也要分析这种问题背后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等，从而看是否能找到改进错误，制定正确方案的方法。

我们说找病根，找错误的原因很重要，就是因为病根找错了，则问题永远存在，绝不是换掉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

而怎么找病根？

那就是把错误的思想原因、社会原因、历史原因找出来，最终确定病根。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找病根的基本原理，以及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希望大家可以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上。

既可以分析别人，也可以分析自己。

第十五篇，读《关于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上）

在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党历史上的两个“历史决议”，众做周知，这个 1944 年的历史决议，不管是在当年，还是在历史过后的近 80 年来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争议和质疑。

它在当年所起到的统一思想、团结干部，以及帮助干部分清是非、找出根源，解决实际问题上，所起到的伟大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又为什么被所有人所一致认可并接受？

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实事求是的，是科学的，是用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

和辩证法得出的结论。

那么，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分析历史问题的时候，有哪些原则性的区别呢？

为什么说用唯物史观分析出来的历史，定下的决议是科学的，是实事求是的呢？

用马克思的话说，并不复杂，原则之争在于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这个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

如果你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社会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

那么，当你分析历史上某一条错误路线的时候，就不会简单的认为，这仅仅只是某个决策层、某位领导一拍脑袋就造成的一个结果。

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嘛。

没有一定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因素，是不可能造成决策层或者某位领导头脑里的意识的，没有这种意识，又怎么会催生出这种意识制定出来的政策和路线呢？

对吧，这个很好理解，比如王明“左倾”路线吧，这个“左倾”路线是以王明为代表，多数留苏派的决策层所搞出来的。

这条路线必然辅之以种种政策、方法、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种种战略战术、策略规划等等具体政策。

这些东西都是人的脑袋想出来的，由此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

但是，人脑袋里的东西不是白白出现的，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不管是脑袋里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意识，都必然反映出社会存在。

所以，如果只是把错误路线问题，归咎于人的问题上，而没有找出催生这种错误路线的错误意识，是在何种社会存在（即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背景、社会因素等）下诞生出来的，那么就好像一场大病，没有找到病根一样。

你即使把犯错误的人换掉了，但是如果催生那种错误意识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等因素没有找出来，那么换一个人上去，可能还会出现同样的错误，并不解决实际问题。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就好像一个人对某种物质过敏，你如果不把过敏原找出来，仅仅只是用药物压制一下，那么只要一碰到这个过敏原，其实就还会过敏。

当然，可能换一个人确实就好了，这个人从来不过敏，可是这就大大增加了投机的概率，如果不是过敏这样的小概率事件，而是处理极其复杂的革命事业问题，你找不出原因来，那么就大概还有人会犯同样的错误。

而唯心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所以他们认为所有病根的源头，在社会意识，也就是在人那里，是那个人错误的思想、理论、决策所导致了一切错误路线的后果，因此，只要把那个人换掉或者搞掉，问题也就解决了。

这里面的区别，大家需要细细品味一下。

我们把两种历史观的逻辑线做一个对比，大家可能更形象一点。

比如，王明的“左倾”路线，其错误的逻辑线是这样的：

首先：

从社会根源上分析：

因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里，有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处于破产状态，这些群体大量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使得我党无论党内、党外，都包围着大量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受经济地位的影响和左右，不仅十分摇摆，而且有强烈

的自由主义倾向，要么犯急性病，要么犯妥协悲观病，总是主观和不彻底的看待革命事业，由此制定决策，这种决策反映到领导层面，就会出现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

从思想理论根源上看：

我党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没有自己成熟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用于指导中国的革命实际情况，因此只能借鉴苏联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在这个借鉴过程中，又没有自己健全成熟的组织机构，因此大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被照搬过来。

从历史根源上看：

中国既同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不同，又同普通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不同，而是属于中国特有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又是在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就必然出现极其曲折的道路。

这几种社会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性质、历史背景、客观条件）等综合作用下，催生出了错误的，主观主义式的社会意识。

在这种错误意识的作用下，出现了大量主观主义式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式的思想、理论、方法。

在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下，就出现了：

政治上打击地主、富农，中间派，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当做社会主义革命看待，拒绝联合，搞关门主义，大搞肃反运动等。

在军事上，又反映出来“国与国的战争”观点，因此不愿放弃根据地，出现了堡垒对堡垒，鄙视游击战等军事策略。

在组织上，则自然的清扫与自己意见观点不合的人，借以推行自己的路线，因此

大搞宗派打击活动，在苏区就出现过针对教员的反罗明路线。

这些错误的思想，都是造成了极端的困难的，最大的危害就是丧失了几乎所有的苏区根据地，全军长征。

这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整个逻辑线。

而如果用唯心史观分析王明错误路线：那就只能得出后半部分，即王明在思想上有主观主义，在军事上有堡垒对堡垒，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

所以，王明太傻了，王明大错特错，王明脑子秀逗了，总之王明不行，王明思想大大的错误。跟王明路线有关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统统都是坏人，是阴谋家，都有严重错误思想。

至于为什么他们有错误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又为什么能够被贯彻？唯心史观则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最后往往得出结论：可能他们就是傻吧，可能他们权力欲太大，可能他们私心太重，可能他们刚愎自用，可能他们年纪大了，骄傲自满。

当然，他们不会那么直接说，但是他们表达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虽然他们也会尝试去找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原因，但是他们所找来的历史原因，往往不涉及社会阶级根源，不涉及社会基础。

他们仅仅只从制度上找一找，找原因的主要目的，不是寻找产生错误意识的社会根源，而仅仅只是为了能够证明那个意识是错误的，同时彰显一下他们也是用唯物史观，用马列主义分析历史。

这句话，大家一定记清楚一些，然后带着我这句话的观点，去读一读后来的那个历史决议，大家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

网络监管原因，就不赘述太多了。

这篇文章，要表达的是两种历史观下，看到的不同的历史过程，从而得出不同的历史结论。

这个 1944 年的决议里面，你看不到阴谋论，比如谁谁谁阴谋分裂，谁谁是野心家，谁谁骄傲自满，谁谁个人崇拜。

你只会看到王明的错误是怎么来的，博古的错误是怎么来的，那些留苏派的错误又是怎么来的。

你会看到这些错误来了以后，又是怎么执行下去的，又是怎么贯彻的，从而产生了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人的错误固然重要，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催生这些错误的种种社会根源更重要，因为只有搞清楚了这些根源，我们才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唯心史观，基本上追溯到人的意识那里就停下来了，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所以意识是源头，清除意识，一切就迎刃而解，这才是唯心史观危害最大，也最致命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说唯心史观，得出的结论都是英雄史观呢？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到了意识的源头，推动历史进步的正确意识，阻碍历史进步的错误意识，都是某些人具体想出来，并执行的。

所以历史就被英雄所书写，至于这个英雄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阶级环境催生出了这些正确的，错误的意识、从而产生相应的正确的或错误的决策，他们是不关心的。

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应该说唯心史观有自己的逻辑，有贴近事实的一面。

但是，本质上，唯心史观是唯物史观的一部分，它虽然反应出一部分事实，但是它只反应出从意识到执行、贯彻那一段事实。

至于前半段，从社会环境、阶级环境等社会存在出发，到意识诞生这一段，则被唯心史观给抹杀掉了。

因此，唯心史观不可避免的是片面的，局部的。在这种片面和局部的历史分析中，往往又无法得出科学的历史结论，以至于拿着这种结论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总是手足无措，摸石过河。

这篇文章，我们主要想讲的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分析历史的根本分歧在哪，大家用这篇文章的观点，去看不同的历史决议，或者看不同的历史，会有极大的帮助和指导意义。

下一篇文章，我们在讲一讲毛选第三卷里，这篇 1944 年所写的历史决议，到底说了些什么。

第十五篇，读《关于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下）

这份《关于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主要围绕着自 1921 年建党开始，以陈独秀时期的“右倾”路线、瞿秋白的“左倾”盲动、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以及王明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为主，阐述了这些错误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

从而达到了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由这份“决议”，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错误是怎么出现的？这些错误到底错在哪？然后又是怎么被贯彻的？

其实，如果读过我们在公众号更新的“苏区斗争史”，那么对于这其中所有的错误，尤其是以王明“左倾”路线为统治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错误的来龙去脉，是很清楚的。

这篇文章，我们就当温习一下历史吧，对这些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有一个简单的逻辑线，不仅有助于了解历史，也有助于学会分析历史。

第一个时期：

陈独秀后期“右倾”机会主义，也叫投降主义，或者取消主义等等。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的，在二大上，明确通过了共产党坚决服从一切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

通过这样的决议，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思想、理论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在经济上也没有独立。

早期共产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无偿援助和支持，这一点我在苏区斗争史的第十二章，王明博古上台之谜有详细讲解。

除此之外，我们到底该怎么革命？具体策略是什么？这些东西大家都不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简单领导工人罢工之外，几乎就没有任何革命斗争的策略。

所以，那时候整个共产党是十分弱小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为代表的人侧重于从工人群众那里去找力量和方法；陈独秀为代表的人，更侧重于与国民党合作，通过国民党的力量来实现最终的革命胜利，而把自己看作国民党的助手或依附。

而以彭湃、教员为代表的人，则把关注点放在了农民身上，《毛选》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皆出于此种背景下。

但是，农民力量是分散的，且组织难度大，因此到底要怎么把农民力量用起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用，这是当时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而陈独秀几乎是完全反对教员的农民运动的革命方式的。

因此，当国民党在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支援下，一路北伐都很顺利，很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国民党本身是成立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的，当革命一旦取得胜利，资产阶级是不愿意继续解决农民问题的，也不愿意继续推翻封建主义，他们只是不想因常年的军阀混战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所以一旦军阀混战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他们就不愿意再革命，因为很可能革到他们自己头上。

比如，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对地主的打击等等，这都很直接的体现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利益损失上。

所以，一旦北伐胜利以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资产阶级中的右派等等群体的蒋介石集团，就无法再继续忍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继续发展了。

于是，就有了四一二等反革命政变。

在这个政变快要开始之前，就有很多征兆，比如中山舰事件、江西的 AB 团等事件，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但是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路线，则认为自己革命力量过于弱小，因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步步妥协，不不退让，没有提前做好对方要大规模屠杀自己的准备，导致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来临的时候，毫无准备，任人宰割。

由于没有积极的应对，因此当时的损失很惨重，连找地方躲起来的机会都没有，这是陈独秀时期的第一个严重错误。

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错误，因为那时候我党确实弱小，因此产生依附于国民党身上的思想，是有深刻的党内基础的。

而随后的错误，就直接使得陈独秀直接被开除党籍，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蒋介石的屠杀，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自己儿子的牺牲，大量同志们的牺牲，反映到陈独秀意识里，产生了极大的悲观失望情绪。

在这种悲观失望之下，他得出来结论，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胜利了，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接下来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发展的时候了，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以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为理论的，现在显然不切实际了，所以只有取消革命，将来待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才能引发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他得出结论：当下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意义，这就是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来源，也是他被开除党籍的根本原因。

他错在哪？

他错在，没有看到中国广大农民、无产阶级，还在继续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极端剥削和压榨的命运，而且这种剥削和压榨非但不会好起来，反而会一天天更加的严重下去。

同时，他又看到自身力量之弱小，在敌人面前的脆弱无力，因此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还未到来，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的论断。

于是他主张，让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现在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

以上，是陈独秀错误的整个历史过程。

二、

瞿秋白时期

陈独秀落幕之后，首先就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因为在四一二的大屠杀中，积累了太多的仇恨，且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急于求成，于是立刻出现了“左”的盲干。

也叫“左倾”盲动错误。

在当时的极端情绪下，并没有组织起来首先退却、保存力量，而是直接把力量暴露出来，要以暴动和起义的方式来对抗国民党。

这不正好应了人家的期望吗？

各地的共产党组织，纷纷组织暴动，在中心城市起义，结果就是统统归于失败，被强大的敌人打得晕头转向。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等等都是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很快，这种起义归于失败，大家开始意识到，硬拼是没有意义的，于是纷纷开始转入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等地。

井冈山根据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虽然我们后来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是从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开始展开武装斗争”这个角度去说的，而不是说当时的策略正确了。

后来的湘鄂西、鄂豫皖也都是同样背景下诞生的革命根据地。

瞿秋白领导大家起义和暴动的错误，并没有统治多久，因为起义一旦失败，大家都知道这么干不行，只不过是白白送命而已。

因此这次错误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只不过是仇恨情绪下的盲动，自然也就不会维持太久，便没有影响了。

瞿秋白因此事件，而不再能继续担任核心领导职位，随后即有了李立三路线的登台。

三、李立三路线

李立三路线，则有了较为完备的思想和理论，我们说此前我们的革命思想和理论，都是建立在马列主义、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上的。

那时候，对于革命胜利的渠道，其实自始至终就只有一种——革命起义。也就是从一个大城市展开暴动，然后其余城市纷纷响应，然后在一省或者数省取得较为稳固的革命中心，组织起自己的军事力量，最后慢慢的把革命推向全国。

也就是长时间一直统治着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思想和理论，别说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

所以，信仰城市中心起义，就成了大家所有的梦想。

这时，由于蒋桂战争、蒋、冯、阎投入的近百万军队的中原大战的作用，使得红军和党组织都有了很好的发展。

同时，这种战争，又使得很多人产生了国民党就要在军阀大混战中消亡了，事实是这两次大战，尤其是中原大战，确实规模巨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蒋介石都差点在这次战争中嗝屁了。

所以，立三路线就有了社会基础，加上当时党内盛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作用下，表现出了革命急性病，妄想着很快取得胜利，至少取得革命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所以，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下，夺取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思想和理论就成行了。

这种思想，没有认识到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还没有大量工人无产阶级的中国下，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而农民的分散和无组织，必将使得革命有极大的长期性和艰难性。

没有这样的认识，思想中就会掺杂着大量的主观主义，看不清自己的力量和敌人的力量对比，最终只能是失败。

四、

王明路线：

立三路线也同样没有统治多长时间，随着进攻长沙、以及中心城市的路线失败，随着地下党的暴动中被残酷打击，大家很快认识到了这也是错误的。

立三路线从出现到消失没有超过一年，实际统治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

但是接下来的王明“左倾”路线，则连续统治了四年的时间，从1931年初，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才被陆续纠正过来。

这次损害之大，几乎使得整个革命力量全部损失，也造成了我们众所周知的长征。

因此，理清楚王明路线的来龙去脉，各种根源，就显得异常重要。

王明、博古本身是通过批判立三路线而登台的，而他们背后的支持力量，就是共产国际。

此前，因为李立三跟共产国际唱反调，又惹出了“立三路线”这种错误，因此，共产国际需要更换他们的代理人，这个人最好的人选除了有很好的马列理论基础之外，还需要对共产国际绝对的忠诚。

在这种背景下，王明、博古的机会来了。

在米芾的支持下，王明等人通过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以及周恩来等人的调和主义，从而夺取了当时的最高领导权，这部分内容，我们苏区斗争也有详细讲解。

这群人的错误有这样几个方面：

在政治上：打击中间派，表现在农村就是严重打击地主，搞肉体消灭，富农不分田或者分坏田；因为要大力打击中间派，因此也就在肃反中，对很多中间派的富农出身的，地主出身的人，甚至他们的家庭是这种成分的人，给予了重大打击，甚至是肉体消灭，造成极大的革命力量的损失。

表现在对军阀的联合上，就是一切军阀都是不可联合的，都是最危险的敌人，因此错过了第五次反围剿时，十九路军的联合战线。

表现在党内部，就是打击赞同给地主以出路，给富农平等对待的主张者，主张发展农村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也统统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给予打击。

甚至不是说服、团结，而是残酷斗争——其中就包括了对教员的打击，宁都会议解其军权，开展反“罗明路线”，打击支持教员的人。

不仅在苏区，在鄂豫皖也是一样，打击知识分子（因为这个分子里中间派很多），搞宗派主义，打击不赞同自己意见的同志，对富农也地主，也是采取苏区同样的政策。

在军事上：

表现为要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因此要打国与国的战争，不愿放弃一寸根据地，

因此就衍生出了运动战打成阵地战，游击战打成堡垒战，最后只能六路分兵，节节抵抗，节节失败，最终长征。

在组织上：

大搞宗派主义，赞同自己的都提拔，不赞同自己的都残酷打击。并形成了一个为“进攻路线”服务的组织。

在思想上：

就是主观主义，因为看不到农民的力量，看不到特殊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表现是在农民身上，只有农民群体起来了，农民被组织起来，被发动起来，才意味着群众被发动起来。

看不到这些，就导致他们的一切理论全部沦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始终不能和中国实际结合。

这是王明整个路线错误的表现形态。

但是这些表现形态却有深刻的根源：

简单说：

从历史根源去看，中国共产党始终还处于年幼阶段，没有自己独自的理论体系，也就是后来的毛泽东把马列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理论，因此就只能照办共产国际理论，照办的结果必然是大量教条主义，经验主义。

而且，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既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又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农民起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既反帝、反封建，但是不反资本家，尤其是处于中间派的民族资本家。

这是革命的历史阶段、和当时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王明为代表的博古等人，照搬过来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因此对中间派、

资产阶级自然大加打击。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从社会根源上来看，当时党内有大量小资产阶级存在，小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左右摇摆的思想会包围着我党，必然就反应到领导层上。

尤其是这种思想还会影响到普通群众，群众认为国家要保家卫国，就应该不让敌人打进根据地来，就应该放弃根据地，否则就不是人民的国家。

在这种群众基础的反应上，就导致了军事上始终打不了运动战和游击战，节节退败。

同时，小资产阶级思想，往往还反应在到要去大城市干革命，农民没前途的想法之上，这种思想的作用下，进攻路线始终影响着广大干部，因此有着强烈的社会基础，使得这条路线有很多的拥护者，比如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等其实都是这条路线的拥护者。

只不过后来，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都认识的快，而且组织原则、党性很强，没啥私心。但是一开始执行的路线，却是一致的。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包围和存在，是当时王明路线的主要社会基础。

从思想根源去看：

就是主观主义的片面性，主观主义又分为教条和经验主义，这两者反应到不同的人身上，但是殊途同归，都是片面的。

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全面的认识，缺乏深入的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和研究，因而任何理论用起来，都不能结合实际。

这也是后来延安整风，为什么要大反教条主义的原因，就是要从思想上，方法论

上彻底消除错误路线的影响和余毒。

思想的根源，由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决定，然后又直接作用在具体的政策上，最后形成了一条有完备的思想和理论、组织的错误路线。

这就是王明路线的整个过程。

以上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要阐述和表达的整个共产党历史上的几大错误路线的经过。

只有真正实事求是的梳理出了错误的根源、形成过程、影响等，才能统一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很多年后，有人反对这种分析历史的方法，任何不必什么错误都从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去找原因，实际上这已经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还是那句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思想根源的问题，一定反映社会存在，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社会存在决定的。

没有脱离历史背景，社会环境，阶级影响等因素下的，单纯天上掉下来的错误思想。

这并不是为错误思想找借口，如果是严重的错误思想确实存在，比如某些严重贪污腐化分子，思想已经变质腐化，该枪毙枪毙就行了。

但是即便如此，也需要找出贪污、腐化背后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否则就可能还会有人继续，因为土壤（也就是社会存在）还在嘛。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第十六篇，读《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一、

我们在第二卷读《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里面对文化有这样一个表述：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论》

其实，这句话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比如奴隶时代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当时有保护奴隶主对奴隶人身所有权的相关制度、法律、规则；封建时代则有保护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相关法律和制度；资本主义时代则有一切以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相关法律、制度。

同时为了保证这些法律、制度、规则、分配方式等等生产关系的方方面面完全被众人认可，则必然有一定的文化意识形态用以宣传和保驾护航。

就好像今天有资本家的恩赐观点、狼性文化、加班文化、奉献文化、福报文化等等，他们宣扬这样的文化，本质只是为资本增值所服务。

封建时代的文化，也强烈的反映着当时那种以土地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的文化。

二、

在这篇《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里提到：

在陕甘宁边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宣扬巫神无用，巫神迷信，巫神不科学的观点，仅仅只是宣传这样的观点，起到的作用往往十分微小。

不是说不用宣传，当然要宣传，但是我们更要搞清楚造成这种迷信文化的一定的经济基础。

如果能把这种滋生封建迷信的经济基础加以破坏，则等于是釜底抽薪，迷信活动自然也就瓦解。

这篇文章就举例说明了，有人相信巫神，是因为牲畜死亡率很高，农民又找不到办法，所以每每只能寄希望于巫神，因为除了巫神也找不到合理的方法。

其实，这就好像，当时的农民们普遍求神拜佛、迷信上帝、迷信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是一样的。

当他们感受到了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下的摧残以后，痛苦是巨大的，当这种痛苦施加在他们身上，已经无以复加的时候，他们通常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反抗、要么接受。

可是反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至少有一点希望，哪怕是暂时的希望，比如加入某个起义军、加入某个团体组织、加入某个政权。总之，一定要加入一个当时他决得可行的组织，因为靠一个人对抗阶级压迫显然毫无意义。

可是，当这种组织没有出现，或者他们根本还没看到这个组织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大概率都会选择隐忍。

可是隐忍又太过于痛苦，于是观音菩萨、上帝、神仙就出现了，他们相信这些东西至少可以保证精神上的痛苦得到缓解，实在受不了了，就求神祷告一番，想着只要观世音菩萨哪天发了善心，他们的日子就会得到改善。

同理，寄希望于在封建体制下出现一个包青天、出现一个海瑞、出现一个青天大

老爷，其实本质都是和期望菩萨发善心是一样的性质的。

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就出现了很多连基本理论、逻辑都完全没有的封建文化，像跳大神的、用人体献祭的等等。

这种连寄希望于观音菩萨都不如，观音的理论背后，好歹还有一套理论、是逻辑自洽的，比如多做善事，多行善举，这对社会好歹起了点正面作用，而那种彻头彻尾的迷信，则完全是在剥削经济下，特有的毫无进步意义的愚民文化。

三、

回到牲畜死亡率高，医疗不发达，导致很多陕甘宁边区还有相信巫神的，还有靠算命卜卦吃饭的种种文化，那么，要破除这样的文化，就必须通过科学的医术，来治好牲口的各种疾病，降低牲口死亡率，然后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封建迷信。

可是，当时面临着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正规化的医院、医生、医疗资源太薄弱了，连人所有享受到了医疗资源都极度匮乏，如果还能分配资源到牲口呢？

而且，医学不仅仅需要物资资源，还需要对人才进行培养，起码要有一批医生吧？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难解决，就算解决也是很多年很多年的事情，因为要逐渐培养医生、获取更多的医疗资源，甚至要等到革命胜利似乎才有希望，否则就很难办。

对，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简直是难办极了。

但是如果换一个思路，情况立刻又不同了，这就是《毛选》中所说的思路，讲起来还是我们已经无数便讲过的老一套，大家听腻了的——发动人民群众。

怎们发动？

看原文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是怎么发动群众，联合群众的？

“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其实这段话所要表达的理念很简单，如果感觉力量不够，就必须去群众那里找力量，想办法。在医生、医疗、兽医等方面，如果感觉资源匮乏，那就要想办法把此前很多群众中已经有医学基础的所有人，经过改造以后组织起来，使得他们具备新医学的知识，那资源匮乏的问题就能得到更大程度，更好效率的解决。

这个组织群众中所有可能组织的力量，就是统一战线，用到文化工作领域，用到医学、教育等领域，就成了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医学领域的统一战线，教育工作的统一战线。

而要做到这一步，就要求学习新医学的，不能鄙视学习旧医学的。

学习新教育、新科学的，不能鄙视在旧的环境中搞教育、搞科学的人。

反过来，学习旧医学的就应该诚恳的重新学习自己的知识，踏踏实实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改造自己。

群众的发动，其力量往往体现在若干方面，它不应该是一个口号，它可以落实到牲口死亡率，也就能落实到教育资源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方面。

就好像这篇文章还提到教育的问题——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

其根本，就是一种群众观的表达，用一句总结：资源不够，群众来凑。

第十七篇，读《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这篇《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是一篇在陕甘宁边区的一次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所以它主要内容就是鼓励和强调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和重要性。

这篇文章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教员思想在具体问题上的运用，我们正好总结一下。

第一：实事求是

这篇文章首先提到了大生产运动中必须放在首要核心位置的工作方法，就是——实事求是。

此前的文章里，我们解释过实事求是的含义，即：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要去研究。

因此，实事求是的含义就是：

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从实际存在着的事物出发，而不是从观点、概念、理论出发，拿着某种观点去套、去强行让事物符合既定观点、理论；

同时，通过理论工具、前人总结的一些观点，再结合实际去分析和研究；

最后，通过分析和研究，找出实际事物内部的规律，用这种规律指导我们行动。

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与此相反的工作作风，则自然就是反过来，不按照这个逻辑去做，而是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代替实事求是。

也就是说“实事求是”的反面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违背的是第一条：即一切不从实际事物出发，而是直接从观点、理论出发；比如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直接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拿到中国农村来套用，结果就出现了强烈打击中间阶级，打击富农等；同时，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反对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天天幻想着城市起义的成功，这就属于教条主义。

本文《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也提到：

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这种主观观点，不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的工作作风，工作方式，就是教条主义式的。

那么除了教条主义呢？其实还有一种严重不“实事求是”的作风，叫经验主义。

什么是经验主义，就是说他们也从实际出发，也从一切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去思考问题，制定方法，但是，他们忽略了“实事求是”含义中的第二条：去研究事物的规律。

虽然是从实际出发，但是还要把实际事物的规律找出来，才可以解决问题啊。

要找规律怎么找？想一下我们此前提到过的方法：人的头脑就是一个工厂，马列主义就是加工原材料的机器，必须把实际的原材料，用工具进行一次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外到内，由粗到精的加工过程。

最后才能得出我们需要的实际产品（即工作方针）

而经验主义者，就忽略了这样一个过程，不重视甚至完全抛弃理论，用自己局部的经验去分析和判断实际事物，因此也往往要犯错误。

我们看下《毛选》里是如何评价经验主义的：

“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可以到处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请示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物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的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是“不实事求是”的另外一种作风，即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事务主义等等。

他们遵守了“实事”的原则，即一切从实际事物出发，但是却违背了“求是”的原则，即要用理论、科学将实际事物的运动规律进行总结和研究，从而找出其运动的规律，用于指导实际工作的原则。

因此，这样的人，往往披着“实事求是”的外衣，搞得好像很实际，很务实，但是实际上危害极大，因为他们容易陷入盲目的实践，而且一旦实践出现了错误，不能反过来及时的纠正理论，掉入了理论随着实际走的陷阱。

一旦沦入这种陷阱，就只能出现在既定事物发展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害没有提前应对的措施，只等危害出现以后，才来修修补补，才来解决危害，预防危害的一切手段是没有的，战略上就陷入了处处被动的局面。

这就是与实事求是相违背的两种错误。

前一种教条主义，不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后一种经验主义，不注重用理论指导实践；

这两种危害，在历史上不同阶段都有表现。

我们读这篇《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实事求是”。

第二：独立自主

本文提到的第二个观点，就是独立自主，这也是教员思想里常常用到的一种思想和观点。

关于独立自主，我们此前已经解释过无数遍，这里用这篇文章来再次强调一下独立自主和外部援助的关系。

引文如下：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独立自主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它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却又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争取外援，越来越多的外援不是坏事，而是一件极好的事，应该说这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

你越是独立自主，你往往越能争取到更多的外援来发展自己；

反过来，越多的外援的帮助下，就越能更快的实现独立自主；

这两天播放一部电视剧《觉醒年代》，里面陈独秀的两个孩子，非常强调独立自主，这是好事；但是他们强调独立自主的时候，却忽略了外援可以更好的帮助自己独立自主，结果妄想靠码头做苦力，来实现自己勤工俭学、出国留学的目标，这不是反而降低了早日实现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吗？

所以，合理的看待外援，也是一种辩证法。

其核心在于，我们的基本点，需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上，在此基础之上来争取外援。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这个并不是教员提出来的一个口号，而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哲学观点，不过处处在实践中被运用到。

比如我们所说的劳动改造；思想改造；环境改造等，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这样提到这一改造的具体应用：

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已得了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说：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愿意组织如同我们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你看，劳动积极性是可以塑造的，没有所谓天生懒惰的农民，恰恰相反，农民从来就是最勤奋、最朴实的。

可是旧社会下的剥削和地租、高利贷等的压榨，使得农民失去土地、失去自由，由此也就降低了劳动积极性。

但是通过土地革命，抗日时期通过取消高利贷，减少地租等形式，积极性就又被发挥出来了，创造出劳动互助组，以及生产率的大大提高。

这种积极性就是一种意识，是可以通过环境的改造、条件的变化来重塑和改变的。

只不过看这种环境的塑造是不是塑造的合理，是符合哪个具体阶级的利益罢了。

所谓“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就是这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一种现实表达方式。

第十八篇，读《两个中国之命运》

一、

《两个中国之命运》是教员在中共七大上的开幕词，而七大绝对可以算得上是自 1921 年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开得最团结、最成功、最振奋人心的一次会议。

之所以说它是最团结的，是因为在经过了数年之久的整风之后，全党在思想上达成了一致，实现了高度的统一，也就是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之所以说它是最成功的，是因为在开这次七大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以往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大好条件：

第一，有了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

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帮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之所以说它是最振奋人心的，是因为当时间来到 1945 年 4 月份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经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已经无疑是确定的了，这次胜利不是什么某党某派的胜利，而是全国人民在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团结起来一致抗敌，最后取得的胜利。

它几乎意味着，中国近百年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欺凌之下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完成了推翻帝国主义的使命。

这如何不叫人们振奋人心呢？

七大，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所以说它是团结的，成功的，振奋人心的会议，且从历史整个过程来看，这几乎是唯一一次开得如此胜利又活泼的大会。

二、

这次会议，教员在开幕词中，提出了两个中国之命运，为什么有两个命运呢？又是哪两个命运呢？

其实啊，这是教员惯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和写作手法。

早在毛选第二卷第一篇文章《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他就提出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

其实，说的就是一个坚持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抗日，最后贏取胜利的一套方针和前途；

同时提出它的对立面，即投降路线的那套方针，不愿发动群众的那套方针和办法，由此得出的一个亡国的前途。

通过两种办法的推测和预演，得出两种对立的，相反的，放在一起能引发强烈对比的两种前途，从而告诉大家，只能按照全民抗日的办法，得出胜利的前途才是我们大家一致该走的路，该执行的办法和方针。

这次也是一样，提出的两个前途，一个是光明的前途，自然的另外一个就是黑暗的前途。

什么是光明的前途？

首先是彻底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接着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

而另外一个黑暗的前途呢？

它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就是不联系群众，继续实行国民党专制，挑动内战，让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仍然骑在人民头上，这就是一个黑暗的前途。

这个前途，是国民党要实行的前途，也是我们要坚决抵制的一个前途。

由此，也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那个光明的前途，到底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换句话说，我们要建立的那个所谓的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新中国呢？

三、

这个深刻而伟大的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就摆在了共产党的面前，这个问题包含着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广大的解放区农民，以及城市区域的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等不同阶级，分别享有哪些权利？他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

是否还允许资产阶级的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打倒资本家）将来是否还要继续？跟国民党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

这时候，国共还处于共同抗日的最后阶段，因此就有这一系列的问题。

第二：在经济上，土地革命是否还应该继续？随着国共关系的变化，矛盾是否会发生变化？抗日时期，因为执行统一战线，所以并不采取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式，而是采取的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等等，那么现在如何面对这些问题？还有同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又该采取怎样的相处模式？

第三：在文化上，我们应该宣传和引导什么样的文化？

第四：军事上，既然抗日要结束了，那么军队的问题该怎样解决？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存在两个党派，两支军队？

同时，既然快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了，那么请问将来的外交、教育、知识分子、工业、民主、农业、科技、少数民族问题等等，这每一项事业该如何去发展？

以上这些疑问，这都需要一个蓝图，一个大致的蓝图。

于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划时代的报告诞生了，这个报告描绘出了我们即将要建设一个怎样的新中国？以及该怎样去建设和完成这个新中国？

这篇报告就是《论联合政府》。

《论联合政府》的本质就是一个蓝图，一个有具体可执行策略和方针的蓝图，有了这个蓝图，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创造什么样的新中国？

于是，七大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把这个蓝图描绘出来，以指导大家接下来的工作和任务，于是就有了七大上那篇载入史册的报告《论联合政府》。

这篇报告不仅仅只是一篇描绘蓝图的报告，而且它里面所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政策，与后来建国后的历史，有着太深刻、太重要的影响。

以至于将来的种种建国史的疑问，皆要从这个报告中去寻找最初的答案。

接下来几天，我们就要重点解读一下下一篇毛选长文——《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原文了。

第十九篇，读《论联合政府》（一）

一、

这一篇文章我们来读一下毛选第三卷里最核心、最重点的一篇文章——《论联合政府》

我们上一篇文《两个中国之命运》里说了，《论联合政府》是教员给未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所描绘的一幅伟大的蓝图。

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胜利，虽然还没有明确什么时候可以胜利，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随着中国自己统一战线的完善，群众也被武装和发动起来，组成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苏联攻入德国首都柏林，日本在太平洋战争里越来越被动等条件的发生，当时已经完全可以预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因此，抗日战胜胜利以后，中国应该如何来建设新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土地革命、工业、农业、手工业等等方面，我们要怎么去建设？

就好像你要盖一栋全新的楼房，起码先有一个基本的设计蓝图才行吧。

一个告别旧中国的新中国，在以上若干方面的建设中，虽然不能明确具体每一项应该怎么实施，但是一个大致的方向和纲领性的原则总是要有的。

比如，经济上，资本家应不应该存在？

政治上人民到底可以享受哪些具体的民主权力？如何保障他们的这些基本权力？

军事上，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国民党领导下的军队，该怎么处理？是统一指挥，还是分开办事？

教育上，该怎么去普及农民、工人的教育？

土地革命还要不要继续？如何看待当时还存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继续没收他们的财产，土地，还是和平共处？

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回答，且要立刻有一个大致方案的问题，否则接下来的工作，大家就会陷入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接下来的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于是这篇《论联合政府》诞生了，它描绘的，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

而这个新中国，在这篇文章中，被称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为了彻底搞清楚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内容，我们首先应该先弄清楚一个概念——国家。

你要建设一个你想要的新中国，首先你至少要搞清楚什么才是国家吧？

我们只有弄清楚了什么是国家，国家是怎么诞生的，然后才会对《论联合政府》里所描绘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二、

所以，什么是国家？

对于国家的概念，不同阶级的学者、理论家、哲学家都给出过不同的答案，《毛选》里对国家的理解，自然是基于马列主义原理的。

我们看看在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是怎么来定义国家的。

“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畏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以上两段对于国家的基本描述，其实表达了这样一句通俗的话：“国家是阶级斗争与阶级统治的工具。”

《毛选》第四卷的人民民主专政里这样说过：

“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国家是阶级斗争、阶级统治的工具，它随着阶级的诞生而诞生，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但是因为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那么就必须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用来实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以保证全国更多人的利益，当不同阶级的利益出现矛盾、出现不一致的时候，那么这个专政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将优先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然后才会考虑被统治阶级的利益。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么当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的时候，那么国家的法律、制度、文化等等，都会优先考虑资本家的利益，然后才会考虑工人的利益，而他们考虑工人利益的本质，也是为了保证资本家的利益。

就像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新民主主义，有资本家存在），当资本家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理论上就应该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然后才去考虑资本家的利益，考虑资本家利益的本质，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利益。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利益的理论依据，当然，现实和理论肯定会存在矛盾，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理论，并致力于为实现这个理论而奋斗和努力。

三、

国家的起源

我们上面，只是根据国家的概念，给出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在国家里面的理论依据，和它的真实含义。

但是理论和概念，本质都是从实践中来的，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国家是怎么从实践中来的，那么也就不敢确定关于国家的概念是不是科学的。

毕竟，我们不能说马恩著作里的定义，就应该是真理，绝不是这样，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所以，我们有必要搞清楚，这个关于国家的概念或者定义，是如何从实践中诞生出来的，才能检验其科学性。当然，马恩著作里面的概念也都是这样一个诞生过程。

由此就涉及到国家起源的历史，这里我们简述一下这个人类大致的发展史。

在人类从原始社会逐渐向人类文明社会过渡的漫长年代里，一开始是没有所谓的国家这样的组织机构的，不同地区的人类，通常是以氏族的组织形式，形成一个组织或部落。

那时候，因为文明还处于蒙昧时期，所以对于婚姻、家庭等组织形态也一样是不存在的。

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更多行为更倾向于动物本能行为，在婚姻上表现出来的也就是后来很多学者所说的群婚制。

当然，那时候并没有这种概念对它进行描述。

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女性往往跟不同的男性交配，也就无法确定后代的父亲是谁，因此家族后代往往以母亲为核心纽带，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母系氏族社会。

人类的社会性是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在氏族时期，人与人之间就已经有了最简单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一种公社形式的团结合作的生产关系，大家一致通过打猎、采集、渔业等方式来进行生存所需的生产活动，然后所得到的物资也是供给整个氏族成员共同维持生存。

因为，需要集合大家的全力才能勉强维持氏族成员的生存，所以并没有什么物质产品的剩余，也就没有私有制的概念。

而大家通过互相协作，互相帮助，组织在一起，能够更好的抵御自然界的风
险，能够更好的维持自己氏族成员的生存，所以大家自然也就非常的和睦，并没有太
多撕逼斗殴的现象。

同时，因为氏族这种社会性的存在，人类互相协作、互相帮助的生产关系的存在，
所以人类在自然界的斗争、生产工具的改善、团结抵御风险等方面就非常优越。

毕竟，人多好办事，团结有力量嘛，所以他们在改进生产工具等方面，也是最具有先进性的。

这样一来，火的发明和利用，弓箭的发明，先进石器等等就促进了生产力。

这种生产力的促进，原本也没有明显的体现，直到人类发明了畜牧业，开始学会了豢养动物来维持生存，这样生活资料就逐渐开始有了盈余，人类迎来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有了一群专门从事养殖、放牧行业的专业人员。

这时候物资开始有了盈余，就为私有制打下了基础。

随后，生产力继续发展，随着农业的诞生和出现，生产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于
是农业和手工业又迎来了第二次大分工，有了专门从事农业的，还有专门从事手
工业的专业人员。

而此时，生产工具的改善也非常明显，在青铜、冶炼等技术发明出来以后，生产
力更是大大的提升和发展了。

由此而来，大量的物资盈余出现了，私有制也就随之诞生出来，那些更善于养殖、
放牧、种田的人开始为物资的私有化而斗争。

而这批人里，基本都是更擅长体力劳动的男性，且在母系氏族的分工之中，主要

参与畜牧、养殖、种田等方面的男性。

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过继给自己的孩子，群婚制开始解体，男性要求女性为自己专属，以保证知晓孩子的父亲是谁，最后保证自己的财产过继给自己的孩子，因此家庭就逐渐诞生了。

也是由此时开始，女性的地位开始严重下降，成为了男性的附庸，这种附庸和被压迫的关系，经过数千年的几度衍变，始终都没有完全摆脱经济因素的束缚。

因为大量产品盈余的诞生，不同部落之间，有了这种物资的不平衡，有的部落物资多，有的则很少，这样就会产生矛盾和战争，有了战争也就有了战俘。

被俘虏的那些战俘，就成了最早期的一批奴隶，这样就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随着生产力继续的发展，物资产品的盈余，私有制的诞生，贫富差距也就出现了，部落内部也开始出现了阶级的分化，有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为了保证统治的秩序，保证统治的需要，最早期的统治机构，军队和警察诞生了。这些统治工具的诞生，又反过来为已经取得既得利益，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提供了更好的把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工具。

于是，大量的序幕农场被圈定，大量的土地被兼并，越来越多的自由人、普通人开始沦为奴隶，阶级分化越来越严重。

为了保证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压迫越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奴隶主对奴隶的更好统治，于是越来越庞杂的机构、组织、形式、法律、条文、制度逐渐诞生了，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国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阶级的对立是伴随着私有制而产生的，而国家的出现是伴随

着阶级的对立产生的。

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工具的历史渊源。

不管后来经过了怎样的历史变迁，但是国家的性质和本质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对于国家的起源，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以后，那么在《论联合政府》里所描述的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建设，很多地方我们就能更深刻的理解了。

第十九篇，读《论联合政府》（二）

这篇《论联合政府》的开幕词，也就是七大的开幕词的主题是“两个国家之命运”，而我们上一篇文章解释了国家这个概念的起源，也就是说什么是国家。

从这个“国家”的概念出发，我们就知道当时的中国完全可以说是存在着两个不同形式上的国家的。

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

这两个“国家”在抗日战争中所执行的抗战路线也完全不同，为了说明这两种形态的“国家”的未来，就有必要总结一下在抗日战争中，两个“国家”所采取的不同路线，不同政策的历史。

最后再说明这两种政策的不同，以及未来应该要执行哪种政策和路线。

抗日战争中是存在着两条路线的，一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路线；另外一条是国民党领导下的片面的抗战路线。

只有把抗战中，这样两条路线加以准确的阐述和说明，才能更好的帮助大家所理解什么样的路线下，建立的政府，才是值得群众拥护和选择的政府，大家也才能真正理解“联合政府”的意义。

这就是《论联合政府》在说明其建国纲领之前，为什么要提前说明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的意义。

接下来，中国所有的人，都要面临着两种不同路线的选择，因而也会面临两种命运的选择，到底该选哪种？

就先来看看这两种不同的路线和命运，在抗日战争中具体是怎么表现的吧。

第一，军事上的体现：

在军事上，共产党执行的是人民路线，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服务宗旨不同：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服务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集团、少数人的利益

服务。

即

“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论联合政府》

在基本的宗旨下，一系列的精神面貌，作战方法都不相同了。

2，精神面貌不同：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论联合政府》

3，官兵内部、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不同：

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论联合政府》

4，俘虏政策不同：

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论联合政府》

5，战略战术不同：

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论联合政府》

所以，我们说红军也好，八路军、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学习不了就是这样，双方的宗旨不同，理念皆不同，国民党也就没有发动运动战与游击战必备的条件，即群众的支持，所以这种战略战术他们始终用不了。

6，政治工作完全不同：

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论联合政府》

这就是我们说过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等政治工作。

7，自己生产，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论联合政府》

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你连续三个月不发饷试试？更别说让官兵们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了。

8，全民参与，人民战争

这种人民战争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

其次，有了这样的民兵组织，就可以把兵团划分为地方兵团和正规兵团，地方兵团在维稳、训练士兵、为正规兵团培养后备军、管理地方治安、消灭地方伪军、稳固解放区政权等方面就发挥了正规兵团无法替代的作用。而国民党没有这样的

源源不绝的地方兵团，就必须派正规兵团对所占领区域进行防守，兵源就容易在正规大战中很快陷于枯竭。

最后，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

也就是说，所有的生产建设工作，都可以有组织，有秩序的为战争服务，而将来可以组织起来为社会建设服务。

而不是把民众力量变成零散的，不统一的，由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所利用的工具。

以上三点，又是人民战争的威力的具体表现形式。

这就是发动人民起来，执行全民抗战路线的意义。

用《毛选》的话说：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拚命地反对人民战争。——《论联合政府》

那么，在这样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之下，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承担起了哪些具体责任呢？

文中这样加以说明：

我们可以总结为几个不同时期：

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期间：以国民党正面抗战为主，在此期间，国民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抗日作用。

1938年10月——1943年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力量逐渐减弱，其政策也以抗日为主，反共为辅，变成了“反共为主，抗日为辅”。

在具体承担的抗日力量之上，表现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论联合政府》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

从1943年到1945年，即教员作这个《论联合政府报告》为止，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

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论联合政府》

当然在 1939 年到 1943 年期间，双方所承担的日军力量的比例和方式都是逐渐变化的。

其中，所承担的主力，由百团大战开始，即从 1940 年中旬开始，这才逐渐发生力量对比的变化的持平现象，再后来，出现敌后八路军承担着日本主要军事力量的局面。

而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又主要以广泛的游击战争和运动战为主，没有所谓大规模的会战形式的战争，这是为什么关于大规模会战只有国民党战争的记载。这是因为不同的战争形式和方式导致的。

第二：政治上面的不同

以上是两条路线（即两种不同形态的国家形式）下，在军事上反应出来的结果。

这种不同路线在政治上也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
这就出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两种不同的局面。

解放区的画面是这样的：

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论联合政府》

而国统区的画面是这样的：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论联合政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呢？

原因很简单：

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

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拚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问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论联合政府》

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实际上它来自于我们对于“国家”这个概念的理解，这个世界上国家并不是某种不变的，或者被固定下来的某种物质或是其他，它体现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工具。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大地主、大军阀、大买办所维护的国家，也可以看到一个人民所创造的国家。

因此，不同阶级所领导的国家，就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路线，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局面。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我们需要的国家？才是人民的国家？才是执行人民路线的国家？才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需要建设的国家？

上面，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抗日时期，两种不同国家形态，即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不同局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争取什么样的路线和国家呢？

答案就很显然了，我们要争取的是一个解放区这样的国家。

这就是，《论联合政府》为什么要花大量精力，来总结抗日时期双方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意义，只有让大家看到一个解放区这样的人民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我们才会支持接下来我们要建立的“联合政府”形态的国家，因为我们要建设的本质上，是一个人民国家。

所以，下一篇，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具体的联合政府，其纲领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外交等等需要怎么做，才是一个人民的国家，和人民的政府？

第十九篇，读《论联合政府》（三）

联合政府就要有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这个一般纲领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规定这些内容为一般纲领？

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要理清楚的事情了。

一、联合政府的性质

所谓的联合政府，就是说即将要建立的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性质？

我们第一篇解读《论联合政府》的文章里提到了，国家就是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的工具。

所以，这个新民主主义最基本的性质问题，就是说这个国家应该是由哪些阶级统治，哪些阶级专政，或者说是几个阶级联合专政？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最基本的性质问题，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纲领。

模糊了这个纲领，就意味着你模糊了最基本的国家体制，很多事情你就无法去解决。

比如，如果说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统治的国家，那么当国家制定一项土地改革的措施的时候，就不可能被执行下去，因为国家权力不在无产阶级、农民手里，而是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手里，这样损害到统治阶级的事情，怎么可能被执行好？

甚至，这种土地改革制度从制定的时候开始，就必然带着极大的局限性，而不可能说真正的触碰打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

蒋介石集团也推行过土地改革政策，可是没有用，最后连一个“二五减租”都无法执行执行下去，更不用说执行孙中山提出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地耕”的理念了。

原因很简单，蒋介石集团下的中华民国，根本就是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派统治的国家，所以任何触碰到他们利益的政策，要么制定不出来，要么执行不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我党如何号召发动群众，如果展示出人民战争的威力，老蒋集团就是无法模仿和学习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其最核心、最基本的就是各阶级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

很显然，我们需要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一定不能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所统治的了，这已经被历史证明。

那么它是不是有可能是民族资产阶级所统治，也就是说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答案也是一样不可能。

原因很简单，中国不是一个由自发成长和成熟起来的自己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来推翻封建统治阶级的形式过渡来的。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外帝国主义用枪炮打进来以后，才陆续发展和成长起来，这个阶级从出生的时候，就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大山压榨，不会有自己充分的发展。

但是，以当时的情况看，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呢？也就是说，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毫无资产阶级地位的国家呢？

也不是的，因为当时不仅还没有彻底完成抗日的任务，而且国家经济极端贫困和落后，国民党势力依然还很强大，不能说一个阶级说了算。

所以，简单说就是国家大事，得几个不同的阶级商量着来，所以，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目前统一战线的政府形态。

即：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国家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

这段话翻译一下，就是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不同阶级联合专政的一个政府，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府。

这是根本性质。

当然，具体如何实现，还需要具体纲领来约束，这个一般纲领是根本，一切制度、文化，应该首先不与这个基本纲领相矛盾才行。

这是联合政府的基本性质。

二、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根本要点是围绕着工人阶级领导，不同阶级联合专政来的，而要保证这种制度的实施，就需要一定的组织秩序。

也就是说，人民如何通过国家体制来反应自己的意见，体现自己当家做主的地位，维护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

这就需要一定的政权组织形式，而这种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

即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在集中指导下保证民主。

当然，实际上如果不能保证国家体制里面，是切实的工人阶级领导，各阶级联合专政的话，实际上这一条也很难实行，容易变味，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为什么一定要首先保证，工人阶级领导，各阶级联合专政的含义。

三、

新民主主义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根本原则上要同军阀制度的军队区别开来。

四、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论联合政府》这样说道：

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也就是说，国家掌握经济的根本命脉，发展国有经济，同时鼓励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行业，让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也充分的发展。

土地上，继续实行土地革命，保证“耕者有其田”。

因为按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那么经济必须是公有制的经济，也是不能有所谓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但是我们上面说了，新民主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是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发展国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等集体经济形态，然后还包括私有制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特别像我们今天所看到和经历的经济模式，但是又有些区别，比如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等基本上是已经解体了。

但是从一开始的设计蓝图模式来看，今天的经济模式最初，基本可以说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原型。

文中对新民主主义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这样描述的：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论联合政府》

”

五、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我们知道，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部分，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决定着意识文化，而意识文化必将反过来影响政治、经济等因素。

而我们对文化纲领的基本要求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句话，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

以上是五个方面的一般纲领，也就是具体要怎么执行，具体要怎么实现，那是技术层面的事情，但是不管具体如何实现，都不能超出这个纲领的范畴，因为这是最低纲领，将来还是要向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那时候一般纲领还会继续改变。

而目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都必须围绕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来执行，这是最低的，最基础的要求。

当然，文中明确指出这样一点，即我们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虽然现在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但是将来我们还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

这是我们的理想，并没有什么值得晦言或者神秘的。

文中这样说道：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论联合政府》

这段话非常明确的表明：我们既需要经历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又必然要将自己的目标推进到社会主义和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真正光明正大的理想，是没有什么好晦言，好神秘化的。

不能说，因为今天要联合国民党、联合资产阶级，我们就不敢表达我们的主张，就不敢说将来要推行公有制经济，就不敢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

如果一个理论，一种信仰，你说出来就不灵的，就不能推行了，得保持神秘化，

这种信仰才管用，那么坦白说，这种信仰就算不得一种有价值的信仰。

正是因为它是一种坚定的信仰，所以现在我们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即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是真心的。

将来，我们要全面公有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也是真心的。

里面这样回答那些对新民主义有疑问的资产阶级学者：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变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论联合政府》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各阶级联合专政的联合政府，其实就是一个新民主主义政府。

这个新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不能让私人资本主义操纵国计民生。

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掌握经济命脉，发展集体经济，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既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又要节制它的发展，使得它的发展，本质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无序扩张，变成资本的繁殖，侵略。

而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就要建立和巩固上层建筑，即军事、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使得反过来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基础，使得更快过渡到社会主义。

因为有了我们看到的文化、军事、政治、军事的一般纲领。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与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也不同，社会主义是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地位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所以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也不同。

这就是在抗日战争还未结束，但是即将结束的 1945 年，毛泽东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描绘出来的一幅蓝图。

第十九篇，读《论联合政府》（四）

这篇文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一般纲领之下，必须执行的具体纲领：

1，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

- 2，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
- 3，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
- 4，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
- 5，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
- 6，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
- 7，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
- 8，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
- 9，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
- 10，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
- 11，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
- 12，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
- 13，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
- 14，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
- 15，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
- 16，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
- 17，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
- 18，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
- 19，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
- 20，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
- 21，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
- 22，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
- 23，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
- 24，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
- 25，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

- 26，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
- 27，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 28，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 29，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
- 30，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
- 31，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
- 32，要求改善工人生活；
- 33，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 34，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
- 35，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
- 36，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
- 37，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
- 38，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 39，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

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所有的具体纲领，都是围绕着一般纲领的具体要求，是在一般纲领之下，衍生出来的具体要求。

一般纲领如果无法实现，那么具体纲领就会沦为空话。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原文中，对还处于沦陷区（即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我党解放区，对于上述种种具体纲领的实现情况。

应该说，在解放区，这些具体纲领已经大部分得到了实现，而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则离实现还很远。

当然，其实大家从这个联合政府的报告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国民党集团是断然不会答应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的。

原因无他，这个联合政府，虽然说是不同阶级联合专政，但是实际上它在有一个必要前提：无产阶级领导。

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所谓的联合。

因为，万一出现矛盾，该听谁的呢？

所以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的地位并不起到决定作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可以用来发展经济，但是只能在规定范围内，超出范围，就受到国家约束了，这也是“节制资本”的要旨和含义。

所以，这么干，你说老蒋怎么可能同意，而且我们看看从一般纲领下衍生出来的具体纲领就明白了。

比如：

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

这话说得是谁？对不对，这个很显然就是针对国民党集团的，不惩办不行，可是一惩办，可能里面一半以上都有问题，这事老蒋也很难办。

再比如这条：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

这简直就是说老蒋嘛。

所以，从这个联合政府的报告，就可以看出将来内战的必然性。

当然，这个联合政府的报告，其实里面也有一些矛盾的东西，这个是受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导致的。

当时，一方面要和国民党商讨和平策略，所以就必须是联合专政，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国有经济占统治地位等等。

而且那时候确实也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这种条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应该说《联合政府》里说的是因为经济还很落后，所以还需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这是后来为什么教员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原因。

这一点，我们将来讲到建国后的历史，可以看出来，这里不作主要论述。但可以提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如果允许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出现和存在，那么当生产有了一定的盈余之后，公有制经济的意识形态是不是会受到攻击？

我们本身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脱胎出来的，私有制经济、个体小农经济的思想和意识非常浓厚，生产没有盈余的时候，是容易产生公有制的意识的，这就跟原始社会一样，大家勉强凑合吃饱，也没谁太在意私有不私有，反正没有啥盈余。

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一定盈余之后，这时如果经济基础里面存着私有经济，那么这种私有的意识形态就立刻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毕竟，私有制就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盈余的出现而出现的。

所以，如果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还允许私有经济出现，就容易使得公有制的意识形态完全解体，根本招架不住。

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证明。

所以，我说读《论联合政府》，就是读了一部建国史的前传，只有看了这部作品，后来的很多历史，我们才可以想得通，看得懂。

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将来我们读第五卷的时候，会大量讲

到，也会作出论述，这里只是提前打个基础。

这篇文章就聊那么多，下一篇，我们再从《论联合政府》聊聊关于教员的一些基本思想。

第十九篇，读《论联合政府》（五）

在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之外，必须要辅以主观能动的努力和正确的工作方式，否则建立联合政府的目标就不能实现。

那么实现这样的目标，完成这样的愿望，需要从哪些方面要求自己呢？

这就是涉及到教员思想里精髓的部分了。

此文总结了这样三点鲜明的教育思想特点：

第一点：理论结合实际（实事求是）

这是我们又一次强调实事求是，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的，是马列原理和教员思想最深刻的总结。

实事求是包含两部分，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所有人格外注意到的，是两部分，不是一部分。

这两部分如果丢失了任何一部分，就容易犯错误。

那么，是哪两部分呢？

其一：是“实事”二字，它代表的含义是研究一切问题，从实际事物出发，而不是从定义、理论和概念出发。

这一点在历史上曾经衍生出教条主义错误，衍生出王明“左倾”路线，其核心就在于照搬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没有顾忌到中国实际情况，比如中国的中间阶级是摇摆的，是可能参加革命，参加抗日的，结果从苏联革命理论那里来看，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所以要残酷的打击中间阶级，搞关门主义，这就是教条主义

的一种错误；比如军事上、政治上看不到农民，看不到根据地的发展模式，于是就衍生出城市进攻路线，导致与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对立，还由此把农村路线的游击战争称为逃跑、右倾，把农村工作的政治思想称为右倾逃跑思想。

这些都是教条主义错误，也就是苏联的理论，没有能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因此总是格格不入，导致很多错误的发生。

其二：而“求是”二字。

什么是“求是”，“求”是研究，“是”是规律，也就是说要研究事物的规律，总结事物的规律，然后用规律来指导行动。

这种规律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己直接从实践里总结，一个是从前人的理论中学

习。

总之，不管以什么样的途径，必须有理论来指导实践，缺一不可。

没有理论指导实践，就会变成经验主义，把局部的、一城一池的经验，当做某种普遍经验加以运用，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彻底沦为经验主义者。

也就是毛选中所说的：

“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或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的实际主义和无头无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的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

所以，实事求是这条原则，毛选里侧重讲的是教条主义，理论没有集合实际的情

况，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后者，也就是经验主义错误和危害，绝不亚于教条主

义者。

所以，实事求是是两部分，是两部分，是两部分。

既要杜绝不结合实际，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也要杜绝狭隘的，只依靠自己

局部经验，不学习马列思想的经验主义。

第二点：群众路线

执行群众路线，也要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采用命令的方式逼着群众去做。

这种倾向被称为“命令主义”，即：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论联合政府》

另外一种，被称为“尾巴主义”，即：

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论联合政府》

群众路线此前我们已经有太多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点：批评与自我批评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论联合政府》

批评和自我批评，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有条件的：

第一个条件：双方需要有公有的理论基础，有共同的目标，否则很难互相说服。

第二个条件：这种说服不能触碰到某种既得利益，否则即使他知道你的批评是对的，但是因为利益关系，他也很难去改正。

第四点：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统一战线

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统一战线，是教员思想中的重要部分。

以上，是《论联合政府》提出的几个主观能动性发展的思想和方法。

《论联合政府》是一篇承前启后的文章，其中又包含着许多教员思想，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也是一篇需要研究建国史必须用到的文章。

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本质就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各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个设想和理论，一直持续到了三大改造完成。

但是后来，到了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教员就不再认同新民主主义的这个思想，也不再认同这种联合政府的模式，而是极力要讲新民主主义推向社会主义。

这种思想是如何变化的，我们第五卷再来说这个问题。

第二十篇：总结第三卷：整风、生产、群众路线

当我们读完《论联合政府》以后，实际上第三卷也就等于是读完了。后面还有几篇短文，一篇是再一次的强调军队自己生产，整风、生产运动的好处和重要的文章，这部分内容，我们在这篇总结第三卷的文章里，会再一次提到。

另外三篇是电报和社论，是针对当时美帝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舆论所提出

的警告，这一部分作为背景，我们将在第四卷解读解放战争时期文章的时候，将其背景完善起来。

那么，第三卷我们就以这样一篇总结性的文章来结束吧。

第三卷里的选文，其实总体上看，主要就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这三个主题就是：

整风运动；

大生产运动；

群众路线。

在开篇文章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文章，本质都是围绕着整风运动所写的。

它们的目的很简单，是希望通过整风运动，建立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风、文风，以及对文艺本质的认识。

随后的像《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关于领导的若干方法》、《开展根据地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等，都是围绕着大生产运动来的。

而以上的所有文章，包括后来的《论联合政府》，都极其重点的强调了群众在其中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

比如整风运动的所有文章中，都强调了保持与群众密切结合的重要性，比如你的学风，必须结合实际，联系群众；你的文风，必须为群众服务，学会群众的语言；文艺作品本身的论述里，也阐述了文艺的本质职能就是为人民服务。

关于“大生产运动”里所有的文章，没有一篇有例外，都是分析和强调发动群众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及如何与群众相结合，完成大生产，完成自给自

足的经济工作。

这些文章要么告诉大家群众的重要性，要么告诉大家联系群众的具体方法。

而《论联合政府》就更彻底了，它所有的论述，实际上与其说是《论联合政府》，不如说是在论述如何建立一个人民政府，一个属于群众的人民政府，其中所包含的政治，其实就是人民的政治；所描绘的经济，就是人民的经济；所阐述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所建设的工业，是人民的工业；所要求的土地改革，是为人民服务的土地改革等等。

其实，大家只要把人民路线代入到第三卷中，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里面所有的思想、观点、方法、目的无不围绕着如何发动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来进行论述。

所以，第三卷其实自始至终还贯穿着一条群众路线，也就是人民路线。

这就是第三卷的三个主题：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群众路线。而其中的群众路线，则是始终贯穿着前两个主题的。

接下来，我们分别总结一下这三部分内容的核心要点。

一：

整风运动

所谓“整风”，就是整顿一切不良风气的意思，主要包含思想上和工作上。

整风的整个过程里面，最核心的环节是三个部分：

第一，理论环节。

这个环节主要用到的就是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基础，当然如果是今天整风，那么

还可以加入毛泽东思想等等。

当时在延安的整风，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学习马列著作，让所有干部都能至少掌握一些马列的基本观点和原理。

只有大家用同一个世界观去观察周围的事物，观察革命现象，才有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

比如：理论要结合实际，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列原理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观点，那么不管你怎么教育、怎么批评、甚至处罚，那么都不可能把一个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给改过来。

所以，你要把这个理论交给大家，让大家明白理论结合实际的重要性，并让大家在实践中检验这个基本原理，然后才能把思想给纠正过来，否则就是空谈改造。

所以，整风的第一个重要环节，是普及基本的科学理论、科学观点，帮助大家学会用这些理论和观点，去分析实际工作中的种种问题，以此达到对事物的准确认识，最终统一思想，找出正确的处理工作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 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整风运动的第二个重要环节，即批评与自我批评。

为了统一思想，那么就需要对党的历史，对重大事件的历史，还有对自己本人的历史作一个梳理，使得自己知道当初做的那些事，哪些是对的，对在哪？哪些是错的，错在哪？

由此，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手段，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将历史作一次完整的复盘和总结，使人能够认清其中的种种事件、政策的原委，那么才能更好的指导自己将来的工作。

否则，如果对自己的历史没有清晰的认识，那么很多错误就根本无法改正，很多正确的决策，也往往无法复制，因为你都没有认识到错误，也没有认识到正确，那么你就很难正确的防止错误的再次发生，以及对成功经验的推广及应用。

而这个总结和复盘的过程，就少不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说很多事情需要大家一起来指出问题，梳理出正确与错误的种种脉络。

这个过程，与上述第一个环节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如果没有共同的理论标准，那么正确与错误也就没有了共同的标准，那么谈何批评与自我批评呢？

你说我错的，我不认可，或者我表面认可，但是心里不认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说那个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和留苏派照搬过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吧，我们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总是各执己见，那就决不能得出科学结论。

但是，如果有一个马列主义的原理作为标准，即：理论必须结合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个事讨论起来，就可以得出正确与错误的结论。只不过流程也比较复杂，就是要把两条路线所带来的种种结果梳理出来，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了。

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整风运动的第二个重要环节。

另外，要保证这个环节的正常运动，还必须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任何正确的、错误的决策、思想，都有其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因此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历史事件当时的环境、社会背景等等，而不因过于追究人的责任。

否则，就容易出现整人的情况，借着批评与自我批评，把人整得很惨，或者公报私仇等等。

总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实

现团结的目的，而不是把人整死。

“抢救运动”中的过火现象，就是没有把握好这一原则。

第三环节，树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整风当然是为了统一思想，统一了思想，那么才好普及共同的价值观、方法论。比如为人民服务，既是一种价值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如果在整风中，有人不认为为人民服务是正确的，那么实际上就没有起到整风的目的。

而他要认同这句话，就一定是因为他拥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是马列主义的世界观。

改造一个人的世界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通常是通过树立一些标准，来加以改造和实现的。

这种标准，体现在价值观上。

举个例子：文艺作品。通过整风运动，必须树立起来一个标准，即如何评判一个文艺作品是好还是坏的标准。

这个标准很重要，因为用不同的世界观看待同一个文艺作品，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看待伤痕文学，看待方方日记，看待吃饭砸锅的文章，你不会认为有什么问题，甚至会觉得这些作品也挺好。

可是你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看，就会发现这些作品传播出来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会严重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会严重损害中国革命历史等等。

因此，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就需要设定一些标准，而当时针对文艺作品就有这样三个标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提出民族的，是因为当时的背景是全民抗日，这个标准不是一定的，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但是我们表达的含义就是：你要通过整风运动，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那么就必须设置一些标准，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什么样的东西是坏的。

比如：宣扬投降的理论是坏的，支持抗战的理论是好的；发扬集体主义的精神是好的，只顾自己的小资思想是不好的；着重长远利益是好的，只看短期利益是不好的；善于团结是好的，搞宗派山头是不好的；注重调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是好的，不注重实际，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是不好的；等等。

当然，这些东西在具体人身上，不是那么容易识别的，好人会办坏事，坏人一定情况下会办好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犯教条主义错误等等。

但是，我们首先应该统一思想，起码知道发扬集体主义的精神是好的，小资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是不好的，那么才能更好的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才不至于被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节奏，混淆视听，偷换概念。

二、

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的本质是什么？有人可能觉得是经济，有人觉得是政治动员，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大家要吃饭，要穿衣，可是敌人封锁了解放区，没有办法，我们就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当然有道理，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它总结成一种思想，那么体现的本质就是四个字——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背后其实有一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为什么要独立自主？

因为任何事物除了一般性之外，都有其固有的特殊性。

中国革命事业有其特殊性，红军有它的特殊性，一个政党或者一个人都有其特殊性，如果只关注到了普遍性，用普遍性的原理去套用事物，那么其结果必然出现教条主义，乱弹琴。

为了保证这种特殊性的正确合理的发展，那么就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

也就是说，独立自主是保证一切事物得以按照其特点正确发展、免受干扰、甚至免受侵略的必要且不可或缺的条件。

没有实现独立自主，则一切的个性发展，特点发展，实事求是皆是空谈。

百年近代史，各种救亡图存的办法都想了，可是始终不能拯救中国？原因何在？

因为头上顶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大山，没有独立自主可言啊，所以一切的所谓实业救国，资产阶级救国，本身都没有实现独立自主，因此中国始终无法真正走向强大，其原因也在于此。

而独立自主的过程，往往又是首先从不独立自主开始的，是一个逐步艰难的过程，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广大群众觉醒以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才有了一点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因为群众开始觉悟了；但是直到土地革命之后，又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实际上中国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

一个人的独立自主的过程也是艰难的，但是又是值得我们用尽全力去追求的，因为独立自主其实就等于——实事求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拥有完整人格、精神等等。

而独立自主的另外一个特点，我们此前无数次讲过：在独立自主原则 上，要学会发扬统一战线。

也就是在独立自主之中，求得更广泛的团结、帮助、外援。

不能因为一面，而否定另外一面。

三：

群众路线

这是始终贯穿第三卷的一个观点，任何具体的策略和方案，都可以拥有很多种不同的具体的路线，比如军事上外线打到内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

但是本质上，任何教员思想里的路线的实质都可以用一条路线来包含：即群众路线。

军事上是人民战争，政治上是发动群众，组织上是人民监督政府，文化上是大众科学，经济上是“非少数人所得而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你什么路线，本质上都是执行的群众路线，或者我们说人民路线更贴切一些。

不过我们提人民路线的时候，要记得人民指的是全国大多数群众，不包含损害群众利益的反动派。

所以，我们也可以那么理解，任何一个政策、任何一个决议、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理论，如果它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不是站在群众立场上的，不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是反过来侵害了人民利益的，那么它就一定是一条反动路线。

如果说很多事没有标准，那么这件事就是一个确定的标准，无非是我们需要学会识别一个政策、或者观点背后到底打得什么主意罢了。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路线之争，早起建国前最严重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和城市起义、进攻路线的斗争。

围绕这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衍生出了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路线，但是归根结底，他们与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根本区别，就是一个是人民路线，一个不是人民路线，仅此而已。

这一点，我们在更新苏区斗争和长征的历史中，曾经有过论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而到了建国后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一切的斗争，归根结底也是路线斗争，教员所谓的走资派，其实就是说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那群人。

这个资本主义路线，和社会主义路线，核心区别是什么？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是一个是人民路线，一个人精英路线，这就是最本质的区别。

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卷里有大量关于领导的方法，关于组织群众的方法，关于大生产期间该如何发动群众的方法？

这些方法，只不过都是群众路线的衍生品，你坚持群众路线，自然就会用到这些方法，反之，如果你抛弃群众路线，那么你所有的方法，都必然是脱离群众，这一点没有例外。

那么如何执行好群众路线？

有这样几个方面：

1，方法上：民主集中制，即通过调查研究，科学实验的手段，将群众中间的种

种信息、他们的经济、生活，以及其口述意见等等收集起来，然后通过科学的理论（比如马列毛思想理论）加以分析和处理，最后再运用到群众中去，在运用的过程中，检验其是否正确，然后再根据实践调整甚至重新决策、制定，再运用到群众中去，循环往复，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

2，思想理论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这是我们的强大思想、理论工具，没有它们，就不能指导群众路线的更好实施，就找不到群众路线的种种具体方法，比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辩证法、矛盾分析等等，更没有这条路线的理论依据。应该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强大的群众路线思想武器，理论武器，是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武器。

3，政治上：人民民主专政，没有人民民主专政，那一切的所谓方法、理论、策略就会收到阻挠，那么何谈什么执行呢？

人民民主专政，极容易被忽略，又容易被淡化，但是其实它才是实现群众路线最基本保证。

以上，其实就是第三卷围绕着的三个重要的主题：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群众路线，我们读第三卷的时候，始终把文章的着眼点放在这三个主题上，那么就更容易建立起相关知识点的框架，也更容易消化成自己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开始读第四卷。

第三卷解读完。

附文：毛泽东给刘少奇一封信的 66 处批语。

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批语

按：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起草了给续范亭的一封信，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人性”问题。毛主席对信稿加了很多批语，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这里，把毛主席的批语结合刘少奇信稿的内容摘录如下（【】内“红色”是毛主席的批语）：

刘少奇的信中说：

大概如我们到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

【毛批：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

【毛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何谓人生？

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

【毛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

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

【毛批：即该物之特性。】

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

【毛批：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

并也暴露它最深刻的最基本

【毛批:比较深刻。】

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的认识

【毛批:认识也是无穷的。】

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

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

但人这种东西，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一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所以一般的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的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

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

【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

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

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只有人才特具的。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它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

【毛批: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

【毛批: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

【毛批:动物亦有。】、

理性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的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动之能够自觉的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

【毛批: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

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毛批: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

【毛批: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

但是人所特具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

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

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

【毛批：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

【毛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

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

【毛批：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

【毛批：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从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从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

【毛批：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

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

【毛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

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

【毛批: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

(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

【毛批: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

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

【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

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

【毛批: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

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

【毛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的机械的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

【毛批: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

(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

【毛批: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

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

【毛批: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

【毛批: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

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说话时，应该注意。

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错误，其他一切动物差不多都无犯错误的可能，

【毛批：不妥，竞争生存的学说，说生物由竞争而遗传而择种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错误的要求，只有矿物才无此种要求。】尤其无犯系统严重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

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

【毛批：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

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

【毛批：二元论。】

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

【毛批：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

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

【毛批：不妥。】

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

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的规律化，

【毛批:人的自觉是历史地的，不是绝对的。】

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比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

【毛批: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

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

【毛批: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
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的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

【毛批:这些是对的。】

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

【毛批:但是长久地不自觉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

【毛批:只是社会的。】

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

【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

(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

【毛批：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入唯心论。】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

【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

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

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

【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

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的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

【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

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

【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鸟，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原故。】

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

【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

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末，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

【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

无善恶之可分的。

【毛批:否。】

如果说到底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子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

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所谓的恻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

【毛批:是抽象争论。】

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

【毛批:不成熟也一样。】

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

【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

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

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己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

【毛批:这些都说得好。】

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

【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

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

【毛批:他们是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

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

【毛批: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

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

【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

【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

来信所改四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

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

【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的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

【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

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

才能深刻的认识客观真理。

【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

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规真理自觉的规律化，方

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做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

【毛加：“及将来的人类”】，

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的爱好真理，

【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

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我的意见，略上所述。

尊意以为如何？望加指正。

顺祝

痊安

刘少奇

六月二十八日

【毛批：缺乏唯物的历史的观点】

《毛选》解读第四卷合集

作者：小庄

目录

第一篇， 读《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1
第二篇：重庆谈判前的形势.....	12
第三篇：《重庆谈判》	21
第四篇：内战之前.....	30
第五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41
第六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48
第七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58
第八篇：矛盾的发展和衍变.....	65
第九篇：迎接革命新高潮.....	74
第十篇：转战陕北.....	80
第十一篇：十大军事原则.....	90
第十二篇：次要矛盾.....	98
第十三篇：杜绝包办代替.....	109
第十四篇：粟裕的建议.....	115
第十五篇：九月会议.....	126
第十六篇：辽沈战役.....	137
第十七篇：淮海战役.....	152
第十八篇——平津战役.....	174

第十九篇：新的和平谈判.....	184
第二十篇：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	191
第二十一篇：如何当好一个团队领导.....	204
第二十二篇：读《论人民民主专政》	211
第二十三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221
第二十四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238

第一篇，读《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篇文章作为选入第四卷的第一篇文章，有着其特定的含义。因为从第四卷开始，我们所有的关注点就放到解放战争来了。

本文写于 1945 年 8 月 13 日，是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两天。

而关于整个解放战争，国民党方面称为“勘乱战争”的种种争议和讨论，实际上在一年前就已经进入明面上来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整个第四卷文章是如何围绕解放战争一系列问题展开的，那么我们就需要首先把解放战争之前的相关历史背景作一个铺垫和陈述。

历史背景：

一、

关于国共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内战的种种讨论，早在 1944 年 7 月的一天里，就开始摆到桌面上来了。

那天，一辆载有美国的记者和访问团的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说是一个机场，实际上只是一片比较开括的黄土地。

这一行美国人来到延安的目的很明确：发展到 1944 年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已经成为了一股任何集团都无法忽视的巨大力量，为了制定更

符合美国人利益的对华决策，他们必须要提前深入地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政党，有着怎样的政治理念，以便在战后制定更加符合美国人利益的相应决策。

而美国作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国家，延安方面对他们也很欢迎和尊重，不仅如此，共产党是一心一意求和平的，如果可以通过美国的从中调解来实现双方的和平建国之目的，那么有什么理由排斥呢？

正是因为如此，教员在欢迎这次美国访问团的横幅上写了：“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之所以加上战友二字，除了表达双方都是反法西斯的同盟军之外，还表达了对美军访问团的一种热切的友谊态度。

为了照顾这个访问团的饮食，延安还专门烤了面包来给他们吃。

到了这一年的 11 月 7 日，出任罗斯福总统特使的赫尔利也从重庆飞往延安，随后便开始同中共进行了一场关于战后如何进行国共合作，继续和平建国的谈话。

这次谈话中，虽然赫尔利表现的彬彬有礼，可是骨子却始终渗透着一股美国人的傲慢与对中国共产党的轻蔑。

这种轻蔑表现为他的到来，似乎是一种对我方的“恩赐”。

在双方的会谈中，赫尔利滔滔不绝，但是其所提出的建国方案，却始终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收编姿态展开的。

这种“收编姿态”主要表现为军队和政治两方面的要求：

其一，军事上，所有八路军必须改编，改编后完全服从国民党的命令。其二，所有官兵和共产党成员们，也必须改编，改编以后取得原先不变的职位，获得一样的薪酬和俸禄，并在装备和物资分配上得到平等待遇。

从这两点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赫尔利既不懂共产党，也不懂国民党，他所提出的这两个关键点，被教员称为：“就是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

府里去做官。”

教员对此种提案说了这样一句话：“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要做，就要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

所以，这次谈话以后，教员便不再给这位美国特使滔滔不绝的机会，他告诉赫尔利：“中国的事情很难办。”

随即，提出了双方的合作，必须以联合政府的形式展开，这种联合政府里，所有党派都应该是其中平等的一员，而这种平等必须具有实际意义，而不是名义上的“平等”。

而关于军事，则只有首先实现了各党派之间的平等，才有可能改组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军队。

赫尔利对于中国的极其匮乏的了解，自然不明白教员所说这些话里面有哪些具体含义，会涉及到哪些具体的改组原则。

所以，他表示自己将尽一切能力，去说服蒋介石同意这样的方案。同时，他提出了要教员去同蒋介石亲自见上一面。

这为后来重庆谈判提前预约了一个伏笔。

赫尔利当然不会明白联合政府意味着什么，直到几个月后教员所写的《论联合政府》公开发表，里面详细阐述了如何实现和平建设新中国的种种方案和纲领，国民党内的大员们才真正知道这个“联合政府”意味着什么。

当时的蒋介石侍从主任——陈布雷看完这本《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

以后，只说了两个字：内战。

因为里面很多国民党人都清楚的知道，如果给了共产党以完全实质性的、平等的权力和地位，那么要不了多久，国民党就将被共产党所瓦解。

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的这个政党里充满了腐败和堕落，如果给了共产党合法地位，并给了他们相应的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改革的权力，那么就意味着全国人民会迅速站到共产党的一边，那时候国民党就必然会被共产党的政治攻势给瓦解掉。

因为他们太清楚共产党在政治工作上那种强大的号召力和颠覆能力，他们根本不可能有招架的余地，何况他们自己的堕落和腐败都是彻底的事实。

因此，只有借助美国的力量，依靠强大武力的镇压和消灭，才能维持他们那个腐朽的政府维持下去。

而美国对于共产党逐渐接触，已经可以明确的感觉出来，只有国民党当政，才有可能使得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必须站在国民党的那一方。此前说的什么居中协调、不偏不倚的鬼话，全部抛之脑后了。

这就是后来赫尔利被延安称为“出尔反尔的政客”的原因。

二、

美国完全选择了国民党，这并不能算是一件十分令人意外的事情，可是让人痛心和难受的事情是，就在 1945 年初，苏联同英美，在雅尔塔签署了一个对共产党极度不友好的协议，这个协议被称为“雅尔塔协议”。

当时，为了防止日本人从中国战场上投入到太平洋战场，以及英军所处的印缅战场，因此他们急需一支力量能够帮助快速解决掉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军队。

因此，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把希望寄托在了苏联身上，以求彻底快速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起来到苏联的雅尔塔，跟斯大林一起商讨了这件事情，而斯大林的“要价”也很高。

他提出：不仅要把此前日俄战争中苏联的一切损失和各种权益拿回来，而且要保证苏联在中国大连的权益，恢复租用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哈尔滨——长春——旅顺）。

斯大林的理由是：如果得不到这些权益，他很难跟苏联人民解释他们

为什么要浪费资源去跟中国土地上的日本人打仗。

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对日作战，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前提的《雅尔塔协定》签订了。

而这个协定的签订，对后来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在东北的权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只能把东北移交给国民党，却不能给共产党，一方面因为苏联同共产党又属于意识形态同一阵营，而且此前又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这就给东北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变得十分棘手，这是后话，我们将来再详细聊。

蒋介石在看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以后，也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说道：“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

其实他也懂，什么是国家？我们此前已经论述过，国家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只有阶级的国家，没有抽象的国家。

《论联合政府》的终极出发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联合各个不同阶级一起建设新中国的国家，这个国家领导权要在工人、无产阶级的手里，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权益。

这对于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国民党来说，实际上就是推翻

了他们的政权。

所以，这个方案在蒋介石看来是绝不可能被通过和允许的，事实上，在后来的重庆谈判中，教员也知晓这一点，所以在联合政府的基础报告上，又作了很多让步，以促成和平建国的愿望。

这一点，我们在后来的《关于重庆谈判》中还会继续讲到。

三、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分别给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小男孩”、“小胖子”两颗原子弹。

也就在8月9日同一天，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寂静。六十多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开始突进中国境内，对着伪满洲国首都和关东军的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开始了猛烈的进攻，以摧枯拉朽的速度横扫关东军。

这样一来，国共到底该怎么样的和平建国的迫切任务立刻摆在所有的共产党和八路军面前，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篇文章，将国共历史、国民党的态度，以及国民党要采取的“内战”立场作了充分的揭露和说明，提出了两种可能性：

其一：如果全国性的内战立刻就要打，那么我们也要做好一切战争的准备。

其二：力争一切和平建国的希望与可能。

在这两条方针上，我们首先要争取的是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绝不容许抗战八年的胜利成果被国民党无偿占有和染指。

这就意味着，我方也要开始接受日本战败后的受降，接受相应的物资和土地，这里面就具体是这样描述的：

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蒋介石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绥中段，北宁，郑州以北的平汉，正太，白晋，德石，津浦，胶济，郑州以东的陇海，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究竟这些地方能不能落到人民的手里，现在还不能说。现在只能讲两个字：力争。靠得住落在人民手里的有没有呢？有的，河北、察哈尔、热河、山西的大部、山东、江苏的北部，这些地方的大块乡村和大批城市，乡村和乡村打成一片，上百的城市一块，七八十个城市一块，四五十个城市一

块，大小三、四、五、六块。什么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是靠得住的，我们的力量能够取得这批胜利果实。——《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是关于抗战胜利后首先要力争的东西。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是否要打内战，打内战的依据是什么？前面已经做了说明，因为双方的阶级立场不同。

其二，是否有和平的可能？也是有的，这里面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力量的强大，蒋介石不能再轻易忽视这样的力量，轻易发动战争。

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面临着极大的内部矛盾，他想发动内战也需要解决极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包括：

共产党反对，且有强大军事力量；

全国人民反对；

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也反对。

且国民党诸多内部矛盾，依旧没有解决，所以和平的希望也是可以争取的。

由此，就确定了这篇文章的主指和方针：一方面准备内战，一方面争

取和平。

同时，眼下的具体政策，就是：积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

以上，就是整个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局面和种种可能性。

而后所有的事情，就从这些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出来，它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的权益问题；

第二：关于国共和平建国方针的谈判，尤其是重庆谈判的种种问题；

第三：由雅尔塔协定衍生出来的东北问题；

第四：双方内战的准备问题；

第五：全面内战的一系列政治军事问题。

这就是第四卷所要围绕的大主题“解放战争”之下的具体主题。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解读的一系列文章所围绕着的几个主题。

第二篇：重庆谈判前的形势

第四卷第一篇文章提出了：既要全力争取和平，又要做好一切内战的准备的方针。

在这个方针下，双方首先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接收日本占领地和物资的问题。

亮剑里面也演过这样一幕，李云龙和楚云飞争相占领日本投降后所腾出来的城市、物资等等。

那个表达的比较简化，这篇文章，我们需要把在日本战败后和重庆谈判前这段时期，国共双方势力范围，以及争相受降的相关形势做一个说明。

《毛选》第四卷里第一篇文章提出方针之后，有这样几篇短文：《蒋介石在挑拨内战》、《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这四篇文章，都是针对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双方关于内战和受降问题上的一些电文和评论，颇有些打嘴仗的意思，但是这个嘴仗，根本是为了争取双方的利益，尤其是在受降日本占领地和各种物资，尤其是军事物资上的争论。

所以，围绕着内战前的准备和受降问题，我们需要把当时背景细细捋一捋。

一、

世界各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

在日本投降战败的前后那段时间，尤其是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以后，各国对于中国问题有着不同的态度，而这些态度总体上都对共产党极度的不友好，这种不友好直接体现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利益争端之上。

首先，从英美两国的态度看，尤其是美国，他们也是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的，当然，这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民生、百姓生存状况等情形的担忧，而是因为他们深刻地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其结局必然影响到世界各主要强国在中国的利益。

如果共产党胜利了，那么英美权益就可以在中国得以延续甚至发展，但是一旦共产党胜利了，则其利益必定受损。

后来的结局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因为双方的冲突已经涉及到两种阵营的冲突，所以谁也不敢保证，这种冲突会不会把刚刚从二战泥潭里挣脱出来的这些国家重新拉回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而对于已经被旷日持久、代价巨大的二战折腾的精疲力竭的英、美、苏各国，谁也不希望战争刚刚结束，就再次卷入其中。

这是它们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的原因。

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却又在暗地里源源不断的支持着蒋介石政权，因为这是他们维持在华利益的根本保证。

而最尴尬的就是，苏联在这里面所持的立场。

我们上一篇文章说了，苏联为了取得在东北大连、旅顺以及长春铁路的相关权益，与英美搞了一个《雅尔塔协定》，根据协定的内容，苏联又跟国民党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就是与蒋介石把这个“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确定了下来。

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受降问题上，他们必然要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作出相应的承诺。

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国际局势上看，没有人是完全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包括苏联。

这种不同国家的立场，随即在受降问题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我们首先看看在关于接受日本战败后的占领地，还有接受相关物资的问题上，当时的局势造成了哪些影响？

二、

当时，因为国民党兵团全部都退到了南方数省，整个长江以北没有国民党军团的兵力。

而共产党却完全不同，他们发展和生存的地方，就是日本占领的北方大片土地上的农村地区。

尤其是华北一带，几乎被共产党势力所垄断，这样如果从时间点上，受降方便程度上讲，共产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日本人就在我们家门口嘛，甚至可以说日本人就在八路军的包围圈里，只不过日本人占据了城市，而八路军驻扎在农村。

所以只要日本一撤走，那么共产党立刻就可以驻扎进去，而老蒋却不同，他需要把兵力从南方调到北方以后，才能接受日本的投降。

可是，蒋介石自然不会允许大片北方土地落入共产党手里，所以他不断在实际行动和舆论上展开进攻，开始挑拨内战，污蔑共产党，同时

一方面下令共产党八路军原地待命，不得争抢任何日本占领区，同时，又不断调动自己的军队北上接受日本投降。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毛选》第四卷里，在舆论和命令上驳斥蒋介石的文章《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等。

但是驳斥归驳斥，实际争取利益的时候，双方都是丝毫不放松的。

原本八路军接受是十分方便的，因为他们就在日本占领区的农村地区，但是当时却面临着很大很严重的困难。

就是，只要日本人还占领着的地方，他们只愿意把武器交给国民党，却不愿意交给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没有合法地位，没有取得正统的承认，因此就只能把日本占领区之外的，大量伪军占领的北方各县城先争取过来。

具体争取哪些？争取的成果如何？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一文中有具体描述和记载：

“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

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这是已经争得的，还有计划要争取的：

如：

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所以利益面前，决不能拖拖拉拉，要勇敢果决的去争取自己能争取到的一切利益。

从争取和计划争取的城市来看，始终没有北方最大的城市，类似于北平、上海、南京、青岛等城市，都没有取得。

这是因为，就在同一时间，美国派出了五万军队，在华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陆，名义上是配合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受降，实际上就是等着蒋介石

石的军队前去接收。

这就使得很多北方大城市，依然在受降过程中全部落入了国民党的手里。

而另一方面，东北地区是一直以来，双方都十分关注的重大城市地区，九一八之后就一直被日本所占领。

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扫平了东北一带的关东军，占领了东北各大城市。

原本按照亲属关系上来讲，苏联理应把东北首先移交给共产党，可是因为前面有了《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就使得他们必须把东北全部交给国民党。

因为那时候，国民党依旧是境内名义上合法政权，是在国际上取得认可的中国政权，因此苏联为了在东北的利益，就选择了同国民党签订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自然就只能把权益移交给国民党。

所以，那时候共产党因为没有合法地位，没有被世界认可，因此陷入极大的孤立的世界局势中，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

尤其是苏联的做法，更是一种十分势利的行为，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见当时共产党的种种难处。

唯一好在的地方是：当时因为我军离东北实在是太近了，最近的驻扎部队进入东北锦州一带，只相距一百多公里，以我军动不动就一个昼夜急行军一二百里的速度来讲，任你美国如果帮助蒋介石运兵北上，都不可能赶上我军的速度。

所以，教员几乎第一时间派军队首先进入东北。

进入东北以后，因为苏联不肯将物资转交给我方，而我方在东北又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地下党组织，因此解放军刚刚进入东北的时候，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困难。

好在，苏联虽然只把东北权益和物资移交给国民党，但是他们对共产党军队率先进入东北，也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也就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只要不名目张胆的出现在他们所驻扎的大城市地区，苏联也就当作没看见了。

这给解放军进入东北减少了很多困难，为解放军在东北的农村驻扎和生根，留下了一点空间和余地。

就是靠着这点空间和余地，后来形成了强大而坚韧的东北野战军。

三、

所以，在重庆谈判正式开启之前，国民党政权在苏联和美国的帮助下，加上自己所谓的“正统合法”地位，在受降中几乎占去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几乎占去了全国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所以他们认为只需要在把被共产党占去的部分中小型县城也抢过来，然后控制所有重要的交通动脉，形成一个“井”字型的战略包围圈，然后凭借美军的强大军事武器的资源，就可以把八路军（后改组解放军）全部消灭掉。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还需要准备，因为他们军队全部在南方，要派兵占领这些大城市，以及做好各种内战的准备条件，还需要时间。另外，他们自然不愿意承担发动内战的罪名。

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在接下来重庆谈判期间，发给国民党各大战区的将军们的指令中就可以明白无误的看出来：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待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在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势军事形势，

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哎，老蒋连一份电报，都写得跟阴谋论一样，难怪乎其终于还是要败给阳谋。

以上，是重庆谈判前的双方形势，而接下来，在解放战争拉开序幕之前，还有一场双方的谈判过程，下一篇我们就来说说重庆谈判。

第三篇：《重庆谈判》

一、

1945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给延安发去一封电报，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和平大计。

“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

八月二十日，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又到了：

“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

八月二十三日，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报到了：

“仍盼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十日之内，连续三封电报催促和平谈判，蒋介石自然就首先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动权，如果你不去，那他就有理由说你不愿意和平谈判，不愿意和平建设，以后舆论上我方就会很被动。

因此，8月26日延安召开了会议讨论关于是否由教员亲自去延安的问题，教员当即表示：去，这样就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谈判也是一场战争，教员历来注重出战必胜，而要实现初战必胜的必要条件，就是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要有充分的准备。

这个准备主要集中在谈判计划中，双方的底线和原则，哪些是可以谈判的，哪些是可以让步的，哪些是必须坚持的。

为此，在教员去之前，延安就通过会议大致确定了一些可以让步的地域：

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因为整个南方我们的军队并不占优势；第二步则主要是江南江北一带，因为这些根据地就在老蒋国都南京的外围，你要是守着，老蒋睡不着觉，是无论如何不肯同意的。

所以，在这两个方面作出一些合理的让步，有利于击碎共产党不愿意和平谈判，甚至破坏和平的舆论，因此在去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让步的准备。

从蒋介石的角度看，他一方面需要时间来调动兵力，一方面还要与美

国谈判取得军事援助，所以他需要时间，这是谈判得以展开的关键点。

而从教员的角度看，蒋介石发动内战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虽然蒋介石自己不一定真的认识到这些困难的严重性；正因为他面临着这些困难，所以只要双方都愿意作出一定的妥协，那么和平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只有还有半分丁点希望，我们就必须争取。这是我方的角度看，重庆谈判得以实现的关键点。

而双方都不愿意承担内战的责任，这又是重庆谈判必须展开的基础。

就这样，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那天晚上，蒋介石举办了一个欢迎宴会。这一年，蒋介石58岁，毛泽东52岁。

二、

蒋介石并没有料到毛泽东要来，所以此前国民党根本没有准备任何谈判材料，也没有准备任何关于谈判中的具体原则、方针问题。

这样当毛泽东来了以后，国民党反倒显得很混乱，最后只能匆匆作出一个临时方针：

第一：不得用联合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

第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问题；

第三：军令、政令必须统一。

这三条原则很宽泛，不具体，似乎就是一刀切了。所以很多时候，一

个党派的做事风格，行事作风，往往从具体工作中也可以看出来。

反观共产党方面准备的谈判方案和材料，几乎是细节到考虑对方的种种感受的程度。

谈判的整个过程非常艰难，在与延安此前作出的让步的界限上，经过数日的谈判，实际上共产党方面又作出了超出事先预计范围内的让步，这种让步包括两个核心内容：

第一：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第二：舍弃“联合政府”的提法，改为共产党员参加政府；

而在军队改组问题上，双方则始终僵持不下，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此前的计划中，是共产党军队必须完全改组，听从蒋介石的号令，但是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如果这样要求，会显示出国民党毫无谈判诚意的意向。

因此，在这种基础上，蒋介石也作出了一些让步，允许共产党有一部分军队，但是就军队的数目问题又陷入了极大的僵持之中。

这个时候，我方在国民党内安排的情报人员，其实已经获得了蒋介石的底线的情报，这份情报显示出蒋介石的底线是：

军队问题上，可以让步到十六个师；

政权问题上，可以让出国民代表大会的 7% 的名额给共产党。

也就是说，最终在政治上，最高层可以给 7% 的代表名额，军事上可以允许共产党保留十六个师。

而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毛泽东的工作安排里提到，如到了非让步不可的时候，可以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省府主席。

无法得知，在毛泽东看到这封情报，得知蒋介石准备让他出任一个偏远政府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三、

双方的谈判极不顺利，共产党作出了一些几乎触及原则的让步，尤其是把联合政府的说法改为“参加政府”，这样一来，民主选举、公平选举就不再是一种可以兑现的承诺，这在政治上已经可以说是底线中的底线了。

而就在谈判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已经开始对解放区发动了局部的军事进攻，这就是谈判期间的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战役——上党战役。

上党战役是一次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战役，这次战役我方全歼国民党近 3 万人马，有利的支援了谈判的进行，可以说是第一次以打促谈的代表作。

就像毛选第四卷里《关于重庆谈判》里说的那样：

“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

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关于重庆谈判》

最后，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之后，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这个协定明确了一些基本原则，都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承认了一些民主权力，承认了避免内战。

虽然就解放区政权问题，还有军队国家化问题作出了很多阐述，但是双十协定里面其实没有触及到政权和军队问题的根本，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只不过达成了某种意向。

但是我们都知道，意向这种东西变化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重庆谈判之间，毛泽东将自己在 1936 年所作的一首诗词《沁园春·雪》赠送给了辛亥革命前辈柳亚子，这首词以傲视群雄、大气磅礴的气概赢得了当时诗词界、新闻界的广泛赞誉。

柳亚子这样评价这首词：“毛润之沁园春一阙，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而这首词的重点更在于，它回答了 20 年前教员所著的另外一首词《沁园春·长沙》里那个当时没有得到解答的疑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现在离所著《沁园春·长沙》的时间 1925 年已经过去 20 年了，《沁园春·雪》则公开解答了这个疑惑，答案就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

这里的风流人物，就是人民。

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之后，毛泽东启程离开了重庆，回到延安。

四、

关于“重庆谈判”，我们有一些非常值得学习的东西，这些东西《毛选》第四卷中《关于重庆谈判》里都提到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第一：

“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关于重庆谈判》

这其实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必然结论，它意在提醒我们时刻保持警惕性，合同这种东西，有时候很管用，但是有时候却不一定完全管用，有些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一定能全部兑现，甚至完全不兑现都是可能的，因此我们考察问题的时候，要尊重写进合同里的东西，要争取把一些问题落实到纸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不可迷信写进纸里的东西，因为纸上的东西，始终还是要依赖现实的人去给予实现，能不能写出来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有时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时刻保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处事原则和方法。

第二：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关于重庆谈判》

在谈判期间，局部战争却一直在发生，甚至有上党战役那样较大规模的战争。

所以，和平和战争是一种非常辩证的关系，和平是目的，而战争有时候反而是达到和平目的的手段。

所以，对待一切敌人的进攻、手段，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而不是妥协的方针，才是争取自己合法利益的根本手段，一味妥协退让是要吃大亏的，“四一二”的教训就是反面证据。

而针锋相对的手段则是多样化的，正如《毛选》里说的，有时候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不去也是针锋相对。

第三：

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

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关于重庆谈判》

这是一个关于让步的问题，提到了之所以让出江北部分根据地的原因，在于这些根据地就在南京的“床边”，所以像这样的让步如果没有，那么谈判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破裂，因为这是对方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的底线。

所以，让步也涉及到一些艺术，我们总体的原则是：在不威胁和损害到我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有时候为了达成一些合作，协议，是需要作出一些实际利益的让步的。

这种让步也是一种艺术，需要大家自己去体会其中的尺度，它跟上一条“针锋相对”其实是一个辩证关系的存在。

第四：

重复一个《毛选》里最最常见的观点，群众观点。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

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关于重庆谈判》

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结束了，《双十协定》也签订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协定只有一些意向上的决定，具体执行方案则不可能是那么短短的四十几天时间可以完成的。

所以周恩来为首的一个谈判代表团依旧还留在重庆，对于谈判中的种种细节慢慢谈，慢慢想办法具体落实。

而这段时间里，内战到底是打得起来还是打不起来，就连毛泽东本人都不敢完全确定。

但是，双方对于战争的准备，却已经拉开了序幕，在距离以中原突围为标志性的解放战争正式打响还有半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双方的局部战争，以及和平彻底无望的过程，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阐述。

第四篇：内战之前

一、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可是局部的战争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越发的剧烈。

早在日本刚刚投降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草拟了一份中方受降人员名单，这份名单上写的是可以接受日本占领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军事将领。

当蒋介石看到这份名单上有朱德的名字的时候，便用红笔划掉了。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参谋人员陈布雷等耐心的解释说：“如果这份名单上连一个中共的要员也没有，恐怕不好向国内外的舆论交待。”

可是蒋介石依旧坚持：让朱德待命好了。

陈布雷事后忧虑的说：“先生连这点气量也没有，结果必然会弄巧成拙……”

正是因为上述蒋介石的那句：让朱德待命好了，才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毛选》第四卷开头的两篇文章《蒋介石在挑拨内战》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文章针对的就是蒋介石让八路军原地待命，却让其他国军立刻到指定地点受降所写的舆论反击。

我们为什么说人应该要有一点气量，其实但凡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你不让八路军受降，首先你就理亏了，而事实的结果是：你不让他受降，但是他不可能听你的指挥，就不去争夺日本占领区的，相反，你越不让他受降，他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争夺一切他可以争夺的日本占领区。

反过来，如果你指定部分区域给他们受降，那么至少你首先就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而对方顾忌到舆论，反而不一定敢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乱来。

这就好像若干年后，当解放战争完全胜利，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对于以往的国民党机构的所有人员，如何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教员的方法就很大气：**全部包下来，有饭大家匀着吃。**

原因很简单：你不包下来，他们也是要吃饭的，如果你不匀着点给他们安排，他们就会去抢，去偷，或者就是饿死，社会一样陷入动乱，麻烦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现在大家匀着点吃，原本两干一稀，现在可以改成两稀一干，总之只要社会稳定下来，中国人民总是可以解决吃饭问题的。

所以，一个人大气、心胸开阔的背后，其实考验的是他如何看待事物全局的眼光，考验的是他的战略能力。

如果一个人永远只能看到事物的局部，看到一个点，看不到一件事可能引起的与这件事相联系的其他种种事物的变化，那么这个人的眼界就会受局部事物所约束，从而就会表现出一孔之见。

这也是我们此前第一卷无数次强调过的，用联系和运动的眼光看问题的根本原因。

二、

双方在争夺日本占领区，争夺受降区域的过程中，剧烈的局部战争从

未停止。

国民党大军要向北调动，就必须依靠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几条交通要道。

在陈毅刚刚到达山东解放区的时候，就下令拆毁津浦线上的铁路，禁止国民党运兵北上。

而平汉路上，阻击国民党军，破坏交通线，禁止国民党运兵北上的是刘邓大军。

同时，晋察冀、晋绥解放区则由聂荣臻和贺龙领兵破坏平绥铁路。

在这些铁路沿线上都发生了局部战斗，而在这期间《毛选》第四卷所写的《国民党进攻真相》，就是针对这种双方的局部战争所写。

其中核心论点就是：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国民党进攻真相》

但是如此一来，就不但破坏了交通要道，影响到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会遭遇是否坚持和平的质疑。

对于这种质疑，教员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先解决交通问题，后解决三项问题呢，还是先解决三项问题，后解决交通问题呢？

解放区军队艰苦抗日八年，为什么没有受降资格，而让其他军队从远远的地方开去受降呢？伪军人人得而诛之，为什么一律编为“国军”，并且指挥他们进攻解放区呢？地方自治，《双十协定》上已有明文规定，孙中山先生早主省长民选，为什么还要政府派遣官吏呢？交通问题应该迅速解决，这三大问题尤其应该迅速解决。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国民党进攻真相》

这里就可以明确看出来，在《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关于受降问题，关于解放区是否自治是完全没有达成一致的。

更不要说军队问题了，双方还在受降过程中争夺各自的地盘，军队问题解决更是遥遥无期。

但是，此时离和平彻底无望，内战全面爆发却还有一段时间的距离，原因在于美国的介入。

三、

美国派来了一个新的和平使者，也就是调节国共双方矛盾，希望能促成和平局面的美国大使——马歇尔。

美国此时从自身利益出发，其内部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态度，其中就有两种分歧比较大的观点。

一种认为：应该毫无保留的支持国民党，不仅从军事装备上支持，而

且应该直接调兵帮助国民党，因为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较量，只有通过帮助国民党彻底消灭共产党，则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才能最大化，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有这个实力帮助国民党完成这件事。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之腐败无能，已经达到了极致，虽然在装备、政治地位、掌握的经济动脉、城市资源上依旧占据着无可动摇的优势地位，但是唯独可怕的是不得民心，且内部矛盾重重。相反，共产党虽然各方面似乎都不占据优势，可是他们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而且内部团结一致，所以如果内战爆发，国民党很有可能遭遇失败，所以为了美国的利益，应该调节双方不要爆发内战，这样国民党反而可以存活下来。

而且，一旦美国自己卷入中国内战，极有可能把苏联又拉进来，这样一来就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这样的代价不是美国应该承受的，所以他们主张国共和平。

最终，第二种观点更具说服力，考虑也更加周到，因此美国此时是决定要调节双方和平的，这种调节虽然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的角度，但是却满足了当时中国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派出了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马歇尔来到中国，充当和平使者。

在他来之前，便事先询问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如果蒋介石不肯让步，那么美国就要抛弃他了吗？”

杜鲁门的回答很明确：“美国出于战略目的，也要支持蒋介石。但是如果因为蒋介石不肯让步，导致内战爆发，从而让共产党占据大半个中国，苏联又控制了满洲的话，这将是美国极大的失败和损失。”

实际上，即使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完全预料到战争的结局，他们有人想过国民党会失败，但是没有任何人想过他们会败得那么惨，至少此刻他们也依旧认为，最大的失败不过是共产党占据了大半个中国而已。

归根结底，还是忽视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

在马歇尔刚刚到达中国的时候，就与此前早已驻扎在中国的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魏德迈认为，以他对中国的了解，国民党是一个典型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对于执掌所有权力的蒋介石绝不会作出让步；而出于政治信仰的不同，共产党实际上也不会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想要把他们撮合在一起，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魏德迈的眼光是准确且独到的。

但是，即便如此，和平到此时仍旧没有完全破裂，至少此时的延安就对马歇尔的调停充满了希望。

马歇尔跟此前的赫尔利不同，他没有那种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的恩赐态度，而是本着真诚的和平希望来到的中国。

这也是因为他们的观点，确实是认为国共和平，才是对美国最大利益保证的根本出发点，所以马歇尔的调停是真诚的。

教员当时对马歇尔的调停给予了极大的希望，共产党人是真诚希望和平的，因为内战一旦爆发，此时的共产党军队似乎还不具备抵抗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政权，而且战争对于人民的摧残始终是一件不可忽略的事情。

而且，国民党有美国支持，可是共产党却没有苏联支持。

苏联不但因为东北的利益，跟国民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且斯大林还明确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并拒绝充当中中国问题的调解人。

这一点，直到四年之后，当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斯大林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道：“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国民党内部哗变、投降），中国同志应该寻求同蒋介石的妥协，他们应该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现在看来，我们当初对待中国问题上，确实是做错了。”

所以，可以想见，当时大家一致不看好中国共产党的前景，也不看好他们的未来，究其根源，还是没有看到人民战争的威力。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身体透支极为严重，后来在他身边的师哲回

忆到：“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为此，斯大林专门派来两名苏联医生，经过检查，苏联医生认为是“负担过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

可是，马歇尔的到来，依然让毛泽东精神振奋起来。

在双方的交谈中，马歇尔不但赞同和平，而且赞同应该要成立联合政府，而不是参加政府，双方应该取得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一方附属于另外一方。

为此，应该首先停战，然后就具体问题达成一致。在这个过程中，马歇尔甚至直接对蒋介石说道：如果你们不接受和平，那么美国将停止对你们的一切支援和赞助。

这让延安方面非常震惊，也非常感激，觉得和平真的有了某种希望，虽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只是大战开始之前的错觉。

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这时就连延安方面也认为和平终于来了。因为美国此时的一切出发点确实是支持和平的。而蒋介石如果拒绝了美国，想凭借自己那个腐败的政府取得战争的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所以此时中共也认为和平终于是要来了，整体呈现出一片乐观的心境。

虽然在苏中、东北一带都还在爆发着局部的较为惨烈的战争，但是延

安方面已经认为这是和平之前不可避免的局部战争，影响不了和平的大局。

因此，此时的中共方面，甚至已经开始了军队复原和整编的相关工作，中央给各战区下达了缩编命令，这个缩编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上的缩减人数，命令中显示要在三个月内缩减人数 24 万。

而国民党一方面也在缩编，可是他们的缩编是形式上的，仅仅把原来的军编制，在名义上改为了师的编制，人数却一点没动，甚至还在扩编。

这一举措，使得在解放战争正式爆发的时候，共产党方面因为真实的缩编任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被动。

可以说，在中原突围之前，包括教员在内，延安是呈现出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是有一种右倾情绪的，认为和平真的来临了。

只是这种右倾的乐观情绪，在随后国民党军彻底撕毁协议，不顾停战协定，大规模开始进攻解放区之后，又迅速调整了过来。

正如教员此前所说：“写在纸上的东西，还不一定就是现实的东西。”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但是这个停战协定并没有对蒋介石起到约束作用。

没过多久，我军就发现，局部的冲突不但没有任何减缓的趋势，反而越演越烈，国民党非但没有任何停战的意思，反而加紧调兵进入我解

放区的周围。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延安方面开始意识到，和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只有战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后来马歇尔的一段话，阐述了从他的角度来看，国共不能和平共处的原因：

“国共双方都完全缺乏诚意，而且互不信任，每一方在对方所有建议的后面都看到了邪恶的动机；而国民政府所犯的大错是，对较小的事情也采取强硬的态度，这种态度达不到有益的目的，却引起了严重的僵局。”

其实，这已然验证了此前美国驻中国的一个美军司令魏德迈所说的话：一方面是专制的蒋介石不肯舍弃任何权力，一方面是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不会因为任何利益而背叛信仰。这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战争不可避免。

终于，经过了弯弯绕的各种曲折，经过了一次次和平的尝试，和平始终是无望的。

伴随着蒋介石军队逐渐集结完成，开始首先向着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以中原解放军中原突围为标志的解放战争打响了。

第五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

在以“中原突围”为标志的解放战争全面打响以后，一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采访了毛泽东，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

当时说出这个观点，是因为那个记者提到了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怎么办？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说道：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的谈话》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的谈话》

这是一个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断言，也是教员的一个著

名论点，这个论点当时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有着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在看待这个论点的时候，还不能仅仅只是把它看成一个观点，我为什么说它是论点，是因为这句话不仅仅只是为了打气，增加信心的一句话，而是有着哲学上的理论依据。

也就是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并不仅仅只是一句涨自己志气，灭对方威风的颂语，也不是仅仅只是一句鼓舞人心的话，它是一种理论，一种有科学论证的观点，所以我们称为论点。

而这个论点，在若干年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上，丰富并完善地对这个论点进行了说明和论证。

这次讲话，就是后来整理出来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文章。

为了更好的明白“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后面的逻辑，现在我们将这篇文章摘抄过来。

全文 1600 余字，处处透露着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处处表达出矛盾的对立与统一观点，全文如下：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

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的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

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引文完）

这就是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逻辑论证。

为了更好地便于我们理解，我们需要再加以延伸和解读一下：这里面用到一个辩证法三大规律里的一个重要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如此，它总是在不断的否定中，由一个一开始

的新事物转化为旧事物，然后又在这个旧事物的基础上，脱胎出一个新事物，就这样不断的循环之中，事物呈现出螺旋式的上升画面，从一个低级阶段，不断发展到高级阶段，从旧事物变成新事物，从新事物变成新新事物，从新新事物，变成新新新事物。

（这个过程中，新事物相对于新新事物，就是旧事物）

这个规律本质上是矛盾的对立与统一规律的衍生。

用教员最常用的一句话说，也叫：“一切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否定之否定规律：

首先，一切事物中都必然同时蕴含着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肯定因素是对现有事物存在和继续存在的肯定；而否定因素则是对现有事物的存在和继续存在的否定。

它们是矛盾的对立面的统一。

就好像清政府晚期，它的改良、师夷长技以制夷、派遣留学生求亡图存、掀起洋务运动、变法等等因素，是肯定因素，是要保证清王朝继续存在并延续的因素。

但是同时，它积累的否定因素则越发的多起来，且逐渐战胜肯定因素，成为主导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比如：革命党的起义、农民运动的打击、新思想的输入、底层的反抗等等。

这些因素是晚清政府蕴含着的否定因素，当否定因素逐渐积累到成为左右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甚至决定因素的时候，那么事物的性质就

发生了变化。比如，当革命因素作为一种否定清王朝的因素，成为主要因素，即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时候，事物性质就发生了变化，逐渐走向一个新的中华民国。

而这个新的中华民国，并不是突然之间就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民国，它是在旧的清王朝的基础上脱胎出来的，虽然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它必然还保留着部分旧事物的因素。

这些旧事物因素与新事物因素合在一起，又可以分为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然后在新事物的基础上，又经过再一次的否定，继续向更高级的状态转化，形成新新事物。

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不断的自我否定，不断地向着更高级的状态转化。

而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就是不断地促成这种转化，不断的自我革命，自我否定，自我创新，从而推动事物前进。

而一切推动事物前进的力量，我们都称为进步派，而一切反对事物前进的力量，我们则称为反动派。

在事物发展中，有时候反动派会取得一定的胜利，使得事物呈现出曲折的画面，但是从长时期看，则进步力量一定会战胜反动力量，这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依据。

也是描述事物曲折发展的理论过程。

第六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一、

内战全面爆发

蒋介石全面内战的决心已经下定了，1946年6月10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会上讲话时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共产党）十五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之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

随后6月14日，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了旨在充分提供军火装备的《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三天后，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退出华北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威海卫两地，以及6月7日以后中共军队在山东境内从日伪军手里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退出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退出山东胶济路沿线、苏北以及中共军队在山西、河北两省境内从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

此时，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帮助下，调动已经基本完成，位于内战一线可以用于直接作战的兵力已经达到193个旅，总兵力160万。

内战已经呈现出一触即发的态势。

毛泽东陷入两难的痛苦选择中。

后来胡乔木回忆到：“从 1946 年 5 月底开始，国内形势日趋紧张，我们不仅面临着与国民党破裂的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与美国破裂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党下决心立即面对这两个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50 年派遣志愿军入朝鲜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大知道的是 1946 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定决心。”

当美国与国民党签署了那个《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以后，延安方面也完全明白了：和平已死。

而此时，所处环境最险恶，最困难的，是位于中原解放区的李先念、郑位三所领导的中原解放军。

中原解放区由抗日时期新四军所发展的鄂豫皖根据地扩展而来，抗日战争后期逐渐发展至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处的广阔地域。可是这里是国土的中心地带，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交通便捷使国民党在抗日结束后很快就可以调兵将整个中原解放区包围。

原本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央就已经有了放弃中原解放区的想法，因为那里我们本来就不占优势，何况蒋介石无论如何不会允许有人在他家门口走动，不过那个时候毛泽东的想法是能留多久留多久，这样不但

可以拖住几十万国民党军，而且有利于在谈判中用于交换其他条件。

可是，一旦当内战全面爆发，那么首先可能遭遇国民党包围和歼灭的，就是中原解放区。

所以，当内战信号越来越强的时候，中原解放区也是首先得到情报，老蒋要开始拿他们开刀了。

当中原解放区得到情报以后，立刻给延安发电，告知中原已处于蒋军包围之中，不日他们就要发起攻击，必须立即突围。

这封电报中甚至使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中原军区部队不能及时突围，则皖南事变的结局也许将会重演。”

随后，毛泽东立刻回电，这封回电显示出了教员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决心：

“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决定，不要请示，免贻误时机，并保机密。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这封电报实在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一番，大家是不是想到了点什么？如果大家还记得长征时期，在艰难的转战途中，因为无法取得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内部产生剧烈分歧，一再把红军置入险境之中，博古和李德教条式的一定要把红军带去跟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六军团汇合，

始终不愿意承担独自作出决定转兵的风险，从而导致湘江血战的惨酷、悲惨的教训。

而后，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立主转兵，开始了红军独立自主的作出自己的决定的艰难尝试。

转兵贵州之后，又通过遵义会议，把独立自主决定军事问题用会议的形式正式确定了下来，才有了后来红军的胜利。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封电报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当初红军长征初期，从迷信共产国际到教员领导下独立自主作出一系列决定的过程，对后来的思想、行为上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

不仅仅是解放战争，若干年后，在新中国的建设中，这一思想也直接体现在了《论十大关系》里，可以说一直以来，教员对于地方部队、地方行政机构，对于培养他们独立自主，让他们既能够在战略、原则、方针上实现集中，又能在战役战术上放开手脚、独自做主这方面，是花了很多心思去尝试的。

1946年6月26日，这一天驻扎在河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然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为是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史称——中原突围。

自此，和平已死，中国陷入国共两党的全面内战。

二、

全面内战既然已经打响，那么就必须辅之以相应的解放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践和适应，迅速取得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总结出来，作为军事战略战术的一些依据，给各大军区以执行的原则，是毛泽东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因此，几个月的局部内战之后，一篇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文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完成了。

其核心论点是：

“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着敌人使用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余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是较少援助的，或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人不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或团迅速增援，以利于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或团。**得手后，依情况，或者再歼敌军一个旅至几个旅；或收兵修整，准备再战。在部署上，必须反对那种轻视敌人，因平分兵力对付诸路之敌，以致一路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的错误作战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这就是著名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易懂的方法，用大白话说，就是人多欺人少，柿子捡软的捏。

可是，真正要实现这样的作战方法，却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难点：

第一：情报通畅。

因为你首先要保证情报通畅，那么你才有可能知道敌人的哪路敌军最弱，如果你连敌军的部署和来犯的是哪几路敌军都不知道，如何确定谁才是你要击打的“弱部”和“软柿子”呢？

第二：指挥员准确的临场判断力

这个强和弱是相对的，有时候敌军可能兵力上比较弱，但是因为装备、战斗意识强，则虽弱但强，反过来，有些敌军看似很强，但是会因为孤军冒进、地形受到限制，或与友邻部队不和，那么虽强则弱。

这里面有一个典型的案列，就是粟裕歼灭国民党张灵甫指挥的整编七十四师。

当时情况就很复杂，张灵甫七十四师极强，但是包围粟裕所在军区的其他主力部队也很强，但是偏偏这几支部队矛盾重重，张灵甫过于自负，孤军冒进，且他冒进的地域，机械化装备很难展开，这样一来，其虽强，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又变得弱了，于是成为了粟裕首要歼灭的目标。

所以，对于敌军强弱的判断，是需要多维度去考察的，需要在 N 个条件之下，进行数量的估计，才能判断出来到底该打哪一路。

第三：把分散的兵力迅速集中

我方之所以可以集中三倍、五倍兵力歼灭对手，是因为我们集中兵力的速度很快，因为你只有确定了该打哪路以后，才能迅速把相应的兵力调集起来，围攻一路，这个过程如果耗时太久，那么敌人看出了你的企图，对手也可以集中兵力与你对抗。毕竟，总兵力上看，我方根本不占据优势。

所以，将各路敌军迅速集中，迅速安排打指定位置，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指哪打哪”。

这一点，国军就堪忧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利益不一致，只顾保全自己，所以别说接到了命令并不一定执行，就是执行也往往是很被动，很消极的，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刻的时间耽搁就能改变战局，如果做不到指哪打哪，那就要处处陷于被动。

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国军对友邻部队的增援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我军则刚好相反，他们会为了配合其他野战军，甚至作好牺牲自己的准备，来成全兄弟部队，这种思想统一，目标一致，你好就是我好的作战思想，是国军永远无法具备的。

这也是整风运动带来的良好效应，大家思想和目标永远都是一致的，连价值观和作战风格，风气都是一致的，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其结果就是集体的胜利，大家的胜利，人人只顾自己，其结果就是大家一起

失败。

第四：牵制敌人的部队

你要集中优势兵力，那么你就要有牵制敌军增援部队的能力，虽然我们说敌军内部矛盾重重，但是也只是相对的，毕竟他们也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受蒋介石的调动。

且他们也明白互相支援和配合的重要性，只不过这种协作能力跟解放军差了一个级别而已。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有牵制敌人的兵力，且能牵制得住，这种牵制往往是以少量我军，配合游击队，配合人民群众，钳制住大量敌军。

这就要求什么？要求必须要有群众的配合，否则根本不可能钳制住敌人的增援部队。

这一点，《亮剑》里面的李云龙打平安县城的时候，就用到过，不仅友邻部队配合钳制，而且民兵、游击队、群众都一起用各种方式钳制增援部队。

如果没有游击队、民兵、群众，那么以少量军队钳制敌人增援，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群众很多时候，不仅帮助钳制敌人，还承担起运粮，运水，帮助伤员，充当担架员，就地解决粮食等等问题。

归根结底，集中优势兵力，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那集中优势兵力，也是不可能的实现的。

以上四条，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必备四条原则，没有执行好这四条，那么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不可能实现的，同理，国民党执行不了同样的战略战术，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群众战争，人民战争的条件，所以也就不可能也来一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策略了。

三、

现在，我们需要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再继续研究的透彻一些。

我们说上面有四点，是执行好集中优势兵力的难点，但是上述四点，其实真正考验指挥员的就是第二点，关于指挥员的判断力。

其余三点，更考验的是主帅建军的能力，就是建设出来一支怎样的军队，以及怎样把这支军队打造成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使得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军队。

情报通畅，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自己的信息被保密，敌人的信息有总有地下党、潜伏在国民党系统里的情报人员，以及当地的群众带来。这就需要与群众有极好的关系，内部党员有极高的信仰才行，这都是建设方面要做的事情。

然后“指哪打哪”和“钳制敌军”，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部

队之间是团结一致，思想一致的，同时跟群众关系是鱼水交融的，没有这样的条件，是不可能做到的。

而且，一个指挥员的指挥和判断能力，也直接来源于情报、群众的支持等因素。

所以，建军是在用兵之前的，且具有重要地位的军事能力。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回顾当初教员在三湾村改编军队，初步确定建军原则的时候，要建设一支人民军队，一支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部队有多么了不起了吧？

而后来，在建设军队的过程中，于古田会议确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确定了人民军队与群众的关系，确定了人民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即要打仗，又要做群众工作，普及无产阶级思想等等，这些建军原则和建军思想，是多么的伟大。

最后，还不仅如此，当八路军逐渐扩大，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当各地解放区分散在全国很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如果使得大家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实现后来的密切合作，指哪打哪，那就需要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于是整风运动中，又有了这样一项统一思想的内容，最后才逐步的练成了我们后来解放战争中看到的人民解放军。

在这个基础上，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才能被发挥和运用出来，所以，解放军的战斗力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从他们是一颗人民军队的种子的时候，细心呵护，逐步锻炼，才慢慢成为了一支人民军队。

第七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一、

苏中战役

共产党人所在的苏中和苏北解放区，与南京仅有一江之隔。

当蒋介石把首都从重庆迁回南京以后，无论如何是再也无法容忍卧榻之侧，有共军安睡的了。

就在李先念开始中原突围的那一天，蒋介石任命李默庵接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一职。

而分配给李默庵的作战任务，就是攻击并占领苏中和苏北解放区。

而此时，身处苏中和苏北解放区的解放军司令员的名字叫粟裕。

李默庵要求他手下的师长们好好研究一个人的作战规律和作战特点，因为早在抗日时期，日军就在南京设有一个专门研究此人战略战术的小组，可是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研究出任何眉目。

这个人就是粟裕。

1946年7月中旬，苏中战役打响了。

粟裕还没等李默庵下手，就选择提前向进犯的国民党军进攻，原因是他已经提前收到了李默庵进攻计划的电报。由此也可知我党的卧底和秘密情报工作有多强了。

初战开始，粟裕选择了进攻国民党整编八十三师，当他把作战结果发给军委的时候，教员直接打电报给粟裕：问他是否确定是八十三师？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解放军一向以来，都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弱部为原则，而这个八十三师，是国民党军里一个全副美式装备的整编师，而且抗日时期参加过长沙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等，是一支有名的战斗力极强的中央军嫡系部队。

所以教员当时也不敢完全相信是八十三师，便打电报确认这条信息，并询问歼敌情况。

我们上一篇文章说到解放军一个很重要的作战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弱部。

可是粟裕为什么选择了第一战，即初战就向八十三师进攻呢？

教员不是一向强调保证初战必胜吗？

其实这里面原因并不复杂，粟裕自己就这样解释过：“首战打这个强敌是否没有根据？不，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进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我们定会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

果然，初战即歼灭八十三师十九旅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以及其中六十三旅的一个营，共计三千余人，并有大量缴获。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弱部，这听上去是很简单的道理。

可是，如何判断哪支部队一定是弱的？这就很复杂，非不可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并且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才有可能作出合理的判断。

因为决定强弱的因素是很多的，一支很强的部队，因为轻敌、骄傲、或者部队尚未展开，或者所处地形不利，那么虽强也可能变弱，同理一支军队如果本身装备和人员较弱，但是如果已经作好了足够准备，并且占据有利地形，或者有极强的战斗意识的时候，都有可能由弱变强。

这些都不是仅仅知道了作战原则，就可以判断出来的，必须有长时间的作战经验，才能对决定对手强弱的每一个因素都作出综合准确的判断，最后得出恰当的结论。

而这个过程，非不可要亲身实践，并取得理性认识之后，才有可能办得到。

这是苏中战役的第一仗，后面粟裕立刻乘胜追击，总共连续发动了七次攻击，均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历史把这七

次战役称为——七战七捷。

前六次战役一共消灭了李默庵六个半旅和一个交通总队，而第七次战役更是全歼了敌人九十九旅，消灭敌官兵五千多人，俘虏一万两千余人。

因此，整个苏中战役里，七次战役就一共全歼了国民党军七个半旅，以及一个交通总队，取得辉煌战果。

我们从这个结果来看，毫无疑问在这次苏中战役里，粟裕七战七捷，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教员同志也亲自发来电报祝贺华中野战军取得的辉煌战果。

但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在这次苏中战役里，国民党集团也给了李默庵嘉奖令，表彰了他在这次战役中取得的好成绩。

很有趣吧，双方交战，必有胜负，既然解放区取得了辉煌战果，那么国民党军就可以说是失败了呀，为什么他们还要表彰李默庵取得的战果呢？

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李默庵虚报了战功，欺上瞒下。

其实，虽然国民党军里存在着虚报战功、隐瞒损失的情况，但是如此巨大的损失，借李默庵十个胆，他也不敢把损失说成战功的，能隐瞒掉一些损失就算不错了。

可是为什么老蒋还给他报了战功呢？其中原因，李默庵在若干年后说

了出来：

“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安全为主。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从解放军方面看，他们的作战目的不一样，他们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以歼灭我有生力量为主。经过几次战斗，粟裕部以较少的代价，歼灭我较多的部队，从这一点上看，粟裕也是胜利者，特别是他指挥作战中的卓越的指挥艺术很值得总结。”

这一段话，就把其中原因完全解释清楚了。

二、两种不同的战略

此次苏中战役，我方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敌军以占领我解放区大城市为主，双方都达到了目的，所以双方都认为取得了属于自己的胜利。

教员表彰粟裕，表彰的是他歼灭了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而老蒋表彰李默庵，表彰的是他驱走了解放军，占领了苏中解放区的大量土地。

这就是双方不同的战略目的，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

国民党之战略：以占领核心城市，掌握交通动脉，掌握核心城市资源，

最后形成井字形的战略配置，将解放军驱赶出解放区，使之没有立足之地，最终沦为流寇后，国军再加以清剿，最终赢得胜利。

而共产党之战略：以“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为原则，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最终实现双方力量强弱的根本改变之后，再转入反攻，将其有生力量大量消灭，最终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这就是双方不同的战略，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战略，所以苏中战役里，粟裕赢了，李默庵似乎也赢了，因为他们都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

可是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国民党输了。

三、

那么，两种战略孰高孰低？

看上去好像不难理解，即使不以结果论输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应该要高明一些。

毕竟，人都没有了，谈什么打仗，谈什么胜利呢？

但是啊，这里面要实现解放军这样的战略目的，其实是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的。

这个条件就是：你失去土地、失去城市之后，是否能把人给真正保存下来？

要做到失去土地，还能保存人的重要条件，就是有民心的支撑，而且在农村根据地有广阔的生存空间。

没有这两个条件，换做老蒋易地而处，他一旦被驱逐出大城市，实际上他就会变成失地也失人的局面。

因为他没有民心，如果不掌握大城市资源，那么集团瞬间崩溃，作鸟兽散了，哪里还能存人失地呢？就会变成失地也失人。

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双方的军事力量发生变化，达成了某种平衡，那么解放军就可以很快转入反攻，并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有了民心，所以一旦解放军的军事力量超过国民党军，形势就会立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人都会迅速倒向解放军，国民党立刻就面临土崩瓦解。

所以，我们回到第一卷的时候，解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我们当时就说过，任何的战略战术，都必须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制定，照搬是用不了的。

而解放军所制定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战略，本质上并不是战略本身有多高明，其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这种战略所匹配的，是共产党深得民心的特点。

所以，这两种战略较量的根本，其实在于谁更深得民心罢了。

第八篇：矛盾的发展和衍变

一、

如果说在解放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双方的和平还有一线希望之前，延安对于这场战争还有种种担忧和顾虑的话，那么当蒋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持续了三个月之后，教员就已经有了足够且充分的信心，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彻底战胜蒋军了。

“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毛选第四卷，三个月总结》

“除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毛选第四卷，三个月总结》

所以，有时候纸老虎不暴露实力之前，或许人们还容易被它们的外表所吓倒，但是一旦将自己的实力暴露出来以后，种种矛盾也就跟着暴露出来了。

为什么全面内战的爆发仅仅三个月，教员就已经有足够的信心赢得最后的胜利呢？

就是因为蒋介石的种种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暴露，并且暴露得很彻底，根据对种种矛盾的分析，就可以判断事物的发展趋向和走势，最后判断事物的发展结局。

而蒋介石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主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我们这篇文章就要对其初期作战就暴露出来的矛盾加以总结和梳理，看看它们有着怎样的衍变趋势。

一、政治上、经济，文化上的矛盾反映

1948年底，当解放战争结局已经几乎确定的时候，蒋介石面对国民党上百位将领有过这样的一段检讨：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很显然，蒋介石这段说话，并没有从其所代表的阶级这个根本原因上去总结失败的原因，但是他所说的，失败于接收，确实暴露出了从一开始，国民党内就面临着的政治上的不可协调之矛盾，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早在日本刚刚投降的时候，国共双方都在争相接收日本占领区，可是蒋介石集团的接收却暴露出其政治上极端的腐败和堕落。

而这种腐败和堕落，并没有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而有所缓解，相反，这种矛盾却在整个内战中不断地加剧，最后彻底葬送了蒋家王朝。

当时，他们打着“为国收复失地”的口号，比蒋介石还火急火燎的忙于所谓的“接收工作”，因为在原来的日本占领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金库银行，日军和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已经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财产就是谁的，这就是“个人发家致富”的概念。

比如，随着蒋介石从重庆返回南京的高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到处收集各种小汽车，为各种各样的别墅贴上封条，按照其级别和档次，每一处建筑物上都贴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处长、科长、科级干部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高级家具和名牌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红地毯都给卷走了。

房产、财产抢完了以后，大家就开始查封逆产，这些逆产无所不包，从银行、矿山、工厂，直到某户人家里的家具古董，都可以变成接收将领和官员们的私产。

除此之外，还有更奇妙的操作，原先在南京的汪伪政权以及日本伪军长官，为了不被重庆来的“正宗”官员们追究责任，极尽讨好之能事，除了送钱送礼之外，还想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办法，以行政命令或军事命令，将原来在日本在这个地方印发的纸币，统统兑换成重庆那帮人所使用的法币。

原本两种币值差不多 1:1，可是为了讨好重庆来的人，他们把兑换率

提高了上百倍，有的甚至达到 200 倍。

这样一来，所有从重庆来到南京的官员们，包括很多小基层干部，一夜之间暴富，原先有一万元资产的，瞬间暴增 100 万甚至 200 万，就连原先一些收入很低的小公务员们，都感觉像中了彩票一样。

然后他们拿着这些钱，将底层工商业、老百姓手里的物资资产一扫而空。

最后等到这些伪币都流入到工商业人士、百姓手里以后，很快就不值钱了，紧接着这些伪币就被法币所完全取代，百姓拿着一堆废纸，感受了通货膨胀的巨大生存压力。

因为“接收”可以致富，因此各种军阀、官僚、地方有势力的人，都打着各种旗号组织“接收”机构，根据当时中华民国官方统计：天津出现 26 个，杭州 28 个，北平 32 个，上海 89 个。

这种“接收”致富的文化，长时期的腐蚀着国民党的官员，使得这个集团每到一个地方，就开始大规模先收刮一番。

其实，这只不过是国民党政权系统、文化、制度、管理、法律等整个上层建筑开始走向崩溃的一个现象和角落而已，他们在政治上代表的大资产、大官僚阶级，各地军阀对群众的压迫越来越严重，这种压迫将不断的制造出其对立面。

跟政治上的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上的迅速崩溃。

当蒋介石集团还在向着解放区发动进攻，军事还处于优势地位的同

时，它们的经济上的矛盾，也急剧发展。

1946 年，就是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那一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收入的一倍。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946 年 1 月，上海米价为每担 6 万元，六月即涨到每担 50 万元，到了年底 12 月，已经涨到了每担 110 万元。

物价已经比抗日战争时期涨了 6 万倍，这意味着国民党管辖区的一切农民、工商业者、学生、民族资产阶级，都必然逐渐走向国民党的对立面。

这又是经济上蒋介石所面临着的剧烈的矛盾。

随着这种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百姓和群众的压迫日益加剧，势必就激起群众的剧烈反抗。

而这种反抗首先就从学生和文化人里开始，一次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的事，直接成为了学生反抗运动的导火索，这次学生运动的规模直接超过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时期的规模，可想而知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过程中，矛盾的激化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而在文化界里，为了挽回威信和舆论，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利用特务开展刺杀、逮捕文化人，禁止他们发声的办法。

1946 年 7 月 11 日，就在国民党军全面对解放区展开进攻的同时，民主同盟一位民主人士李公朴，被特务暗杀。

数千人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痛斥国民党特务：“公朴先生不过说了一些没有失掉良心的真话，他不过写写文章，大家都有笔，都有嘴，为什么不可以说话？为什么要用卑鄙的

手段镇压和扑灭民主运动？……我们都会像公朴先生一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回来了，民主是杀不死的。”

结果当天傍晚，闻一多先生真的没能回来，他在西南联大宿舍门口被特务暗杀。

这时候的蒋介石那边，显然已经无力克服这种矛盾，因此他只能奢望于能够借助强大的美国援助，在3-6个月的时间里，将解放军消灭，然后再来整顿政治和经济，恢复文化建设。

可是，他的进攻却又反过来极速的加剧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矛盾的发展，使得整个国民政府迅速陷于撕裂之中。

而在整个撕裂的过程中，蒋军在军事上的矛盾也加速发展起来，如教员所说：

“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三个月总结》

这种军事上的矛盾具体表现为：

(三)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军歼灭二十五个旅。今年二月至六月被我军在东北所歼灭者，尚未计算在内。——《三个月总结》

(四)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

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三个月总结》

二、到广大群众中去

就在蒋介石军队凭借着优势兵力极速向着解放区进攻的时候，它自身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上的矛盾不仅加速发展，动摇着其统治的根基，而且在几个月的进攻里，这些矛盾统统彻底完全地暴露在教员的面前，使得原本对这只纸老虎还不能完全摸清底细的教员，在蒋军几个月的进攻中，完全看出了其面临的种种矛盾，有了必胜的把握。

而解放军的方针，不在乎一城一池之得失，甚至主动放弃一些不能守住的大城市，开始了转移到广大农村去的战略计划。

在这个转移的同时，又不断利用根据地的有利地形，利用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吃掉蒋军的有生力量。

当时，我党确定了以能否深入农村群众作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和标准。

原本解放区就在广大的农村拥有大量根据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虽然退却、失去城市，但是还有地方可以退。

在解放战争初期，比较困难的是东北的情况，因为那里原本是日本的

殖民地，不管是国军还是八路军，当时都没有群众基础和根据地。

后来，苏联又把东北的核心城市全部移交给了国民党，所以这就造成了初期进入东北的解放区十分困难的局面，因为没有群众。

但是，这不妨碍我军的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那时候解放军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

在东北那一边，所有的干部都开始深入到农村，他们将那些原来盘踞在这片土地上的地主、恶霸、劣绅统统从深宅大院里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这些残酷的利益剥削、人身损害以及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平，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土地有关。因此，开展广大的土地革命，将东北那片肥沃的黑土地分给农民，使得东北的农村瞬间容光焕发，那些百姓都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他们支持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的热情如暴风骤雨一般无法遏制地迸发出来。

历史证明，东北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是对东北解放战争起着决定因素的重大事件。

正是有了赶赴东北的一批坚定的共产党员，一批坚定的解放军战士，以及他们所开展起来的土地革命，才有了后来强大的东北野战军。

因此，解放战争初期的过程，一方面是蒋介石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矛盾不断加速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解放军不断在放弃众多大城市的过程中歼灭蒋军有生力量的过程，同时还是解放军不断地在广大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土地改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解放军的力量越来越强，得到群众的拥护越来越多，民心逐渐向其靠拢。

而蒋介石那边，则是外强中干，逐渐走向弱小、崩溃和失败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没有经历多久，两者此消彼长，在随后的一年后，迎来了解放军的全面反攻。

三、

我们以前说过很多次，抓主要矛盾的时候，一定要兼顾次要矛盾。这里面我军在解放战争的军事运动中，必须兼顾甚至投入巨大精力发展土地改革、发展农村土地革命，加强群众运动，就是抓主要矛盾的同时，兼顾次要矛盾的典型案例。

教员在解放战争的三个月总结里这样写道：

“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

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三个月总结》

也即是说，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与蒋军之间的军事斗争。

同时，土地革命、群众运动、建立农村政权、发展游击战争、训练士兵、发展生产等等都是次要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不兼顾次要矛盾，忽视了次要矛盾，那么它就有极大影响，会使得主要矛盾无法解决，甚至将来发展成主要矛盾。

所以，教员说，只有在土地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生产做得好的地方，战争往往就打得比较顺利。

因此，必须在战争中兼顾次要矛盾的发展，“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

这一经验，又充分的证明了抓主要矛盾的同时，兼顾次要矛盾这条原则的重要意义。

第九篇：迎接革命新高潮

一、

1947年2月1日，教员写下了这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视角看，可能不会觉得这篇文章有多了不起，因为1947年2月这个时间点，距离解放军可以转入战略反攻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了。看上去当时确实可以得出革命新高潮的结论。

可是回到写下这篇文章的时间点，那时候的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在我军以“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方针指导下，全军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

这看上似乎是很轻松的事情，实际却面临着很多的困难。随着苏中苏北、山东、华北一带的解放区首府相继陷落，各大城市也都落入国民党手中，很多解放区开始弥漫着一股悲观失望的情绪。

以至于当毛泽东发表《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多干部根本不明白这个“新高潮”指的是什么，他们直接把电报打到延安，想询问这种“新高潮”到底该如何跟下面传达和解释？

其实这种疑惑可以理解，当时随着各大中城市的陷落，而胡宗南大军又对延安虎视眈眈，随时有发动战争，占领延安的可能。

并且，虽然我们歼灭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有很大的牺牲和损失。

如此，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新高潮”的迹象。

教员解释道他提出“新高潮”的依据：

- 一、内战爆发以来，大举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已被歼灭五十六个旅，平均每个月被歼六个旅。
- 二、蒋管区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正在逐步扩大。
- 三、美蒋的政策越来越反动，他们又签署了卖国条约——中美商约，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破产，国民党内部矛盾已经越发剧烈。

而且这些趋势已经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蒋介石大量占领我解放区，甚至开始向延安进犯，恰巧就是他崩溃前回光返照。

应该说，这篇文章就是解放军处在最黑暗的时刻下，教员从这种黑暗之中找寻到的一丝光明。

用发展和运动的眼光看待一切矛盾的运动，就是战略。

而有趣的事情是，就在教员在延安窑洞里勾勒出革命“新高潮”的时刻，蒋介石也在国民政府里对军事形势作了极其乐观的判断：

“我从历史上观察，历代的叛贼，妄图拖垮政府，不外有两个途径。其一，割据一方，负隅自固。其二，四处流窜，极力扩大影响，试图

引起各地骚乱。但流寇不能成功，负隅则却是可怕。但是今天匪寇已无法负隅自固，因为我们打到哪里，就能占领哪里。”

直到此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占领这些核心城市，恰恰就是其覆灭的起点。

二、

随着各大解放区首府、行政中心全面被国民党军占领，蒋介石随即把目光放在了延安。

蒋介石把胡宗南召至南京，详细商讨了直捣延安的作战计划，胡宗南也意识到自己建立“伟业功勋”的时刻要到了。

在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占领了几乎全部的重大城市，可是战果却算不上大，因为他们没有消灭解放军的有生力量，自己的有生力量却处于被大量歼灭之中。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老蒋就把全面进攻改为了重点进攻，而这个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延安。

胡宗南准备了十五万大军，而在延安的部队一共加起来只有两万多人。

一开始教员其实并不想放弃延安，他有过利用西北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解放军的良好军事素质来完成粉碎敌人进攻的计划，但是胡宗南

来得实在是太快了。

原本可以考虑从晋冀鲁豫和晋绥军区调一部分兵力，在外线攻击胡宗南，然后西北内线实施作战防御，这样就可以粉碎胡宗南打下延安的计划，可是我解放军这一次还没有完成调动任务，胡宗南大军就杀到了。

于是，放弃延安终于不能避免。

当时很多延安干部忧心忡忡，因为如果放弃延安，在政治影响上是非常不利的。

不仅仅等于是丢了国都，而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已经长时间的处于一种“国家主人”的状态下生活里近十年，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解放军有撤出延安的可能，因为这里住着毛主席。

当时有一位农民，把自己全部的粮食能用手推车推着赶到延安，他居然找到了毛主席，他说：“我这里的粮食够毛主席吃一年，这样毛主席就不用参加生产劳动，就可以一直呆在延安了。”

无法得知这位农民心底认为毛主席离开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仅仅只是用一种朴素的想法，想要把毛主席留下，让解放军留下。

教员还收到一封农民的来信，来信中写道：“我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清算了一家地主和恶霸，夺回了我们祖先开垦的大好土地。我们清算并夺回了地主夺走的血汗钱，我们买了牛，买了驴，还有取暖的燃料。当我们想起往年春节都藏在山洞里，爬到地道里躲债的时候，再想到

今天有肉馅饺子吃，我们打心眼里感到幸福。我们听说卖国贼蒋介石将要进攻您居住的地方，他的企图绝不会成功，我们即使掉脑袋，也要和他拼到底。”

延安本身很多干部也想要保住延安，师哲回忆到，他当时去找毛主席，说“是否可以保住延安？”，毛主席给他说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这段话既包含辩证思维，又完全洞察了蒋介石这个人的特性，摘录如下：

“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 Q 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致全世界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即是一个世界名城，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那么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这里面对蒋介石的唯心主义特点阐述得很准确：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

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

这段话说的是《实践论》里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原理：主观要与客观一致，当主观思想与客观规律一致的时候，那么事情就能成功，当主观思想与客观不一致的时候，事情就要失败。

蒋介石并没有从红军长征中吸取教训，别说现在已经有了广大农村解放区的解放军，就是当初已经完全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他也没能剿灭，他当初不是攻占了瑞金吗？

所以，这个世界上你怎么想不重要，你想的东西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才重要。

解放战争也好，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也好，都在不断的验证了这条主观要与客观相符的规律。

教员还是离开延安了，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零五天的陕北转战时期。

第十篇：转战陕北

一、

《毛选》第四卷里有一篇《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一文，这篇文章也就八百字左右，跟一篇高中生作文的字数差不多，看上去是一篇毫不起眼的文章，但是其中的背后，却是当时一个重大的、关键的、对整个解放战争进程以及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选择所促成的。

这篇文章中提到的“蘑菇战术”，在后来的影视剧、史书中都给过很多技术层面的分析和赞美。当时教员运用“蘑菇战术”在西北战场上游刃有余、以极少兵力游走在陕北的山谷沟壑之中，最后粉碎胡宗南的剿灭计划，同时还造成西北战场上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大好局面，这种战争的指挥艺术和战场上的魄力，完全不亚于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

随着胡宗南大军逼近陕北，教员等一致认为必须要撤出陕北了。可是往哪里走？中央撤出陕北以后去哪里？原本的意向，是准备渡过黄河，去山西一带，那里有我们巩固且稳定的解放区——晋西北、太行山根据地等，那个地方显然是要安全得多的。

其实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中央渡过黄河去更巩固更安全的太行山或者晋西北等地，都是当时一个最正确的选择，毕竟中央是指挥全国各大解放区战争、土改、统战等一系列工作的首脑机构，那是万万不能出任何风险的，所以安全应该是首要的且最核心的要考虑的要素。

可是，当教员才走到离陕北延安仅百公里的子长县任家山村的时候，便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留在陕北，哪也不去。

他给彭德怀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了一些西北野战军的歼敌方针，最后一句话决定：“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了。”

这一下子，可把任弼时和周恩来给急坏了，尤其是任弼时，他觉得留在陕北的决定实在是太任性了，现在全国解放战争还处于极其艰难的局面之中，各解放区的绝大多数行动和方针，都要靠中央给予相应的指导，有些战役甚至需要中央亲自指挥并决定方针。

这要是有什么危险，那是多大的事？是多么严重的后果？

岂能草率的就那么决定留在陕北？

可是教员有他的理由，在他们转战到清涧县以北的枣林子沟的一个小村庄里的时候，教员在一个叫吴进增的农民家里，开了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上，教员提出留在陕北的这样几个理由：

1、我们在延安十多年，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了，如何向陕北人民交代？

2、有人说陕北的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胡宗南 23 万大军，彭德怀指挥的西北军只有 2 万人），敌人过于强大，出于安全考虑也要离开这里。但是我们留在陕北，就可以牵制住胡宗南二十三万大军，蒋介石就不能轻易的把这些军队投入到其他战场上，就可以减轻其他战

场上的压力。

3、有人主张派军队进入陕北，加强中央的保卫工作。不妥，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进来，群众就更加负担不起了。

这三个理由大家仔细品品，我自己读完以后的感觉，先不说什么战略眼光，胸襟气魄，勇气和胆略等等，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一种朴实的善良。

其实，这三个理由怎么读都会有一些牵强之感，这一点就连我们都可以读出来。

跟中央首脑的安全比起来，这些理由都不能在成为理由了，最早的时候，不是你自己说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吗？

可是你如果还是留在陕北，所处的军事环境一面是黄河天堑、三面是敌人包围，几乎就等同于绝境，万一要是让胡宗南一网打尽怎么办？

上述三个理由，其实核心就在第一个理由，那是教员心底最真实的想法，他就是舍不得陕北人民。

因为如果他不坚持留在陕北，那第三个理由“调兵进陕北，出现的群众粮食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

第二个理由，说是可以牵制胡宗南 23 万大军，其实国民党 23 万大军，要是跟中央机构和教员的安全比起来，那 23 万大军简直可以说是微

不足道了，它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理由。

所以，这个会议上，教员给的这三个理由，其实恰恰反映了他心底的真实想法：他不想一打仗了就离开陕北人民，又不想增加其他军区和陕北人民的负担，所以他既不愿意离开陕北，也不愿意调其他解放军入陕北保卫中央。

所以，他坚决留在陕北，以彭德怀指挥的 2 万人马同胡宗南 23 万大军周旋，这样一边指挥西北解放战争，牵制胡宗南，保卫陕北人民，同时也不影响他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留在陕北、又不调其他野战军进陕北，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既可以保卫陕北人民，又不增加其他解放区压力，还牵制了胡宗南 23 万大军。

可是它偏偏有一个坏处，就是对于这个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的中央来说，太危险了。

所以，任弼时根本就不同意教员的这个提议，可是教员这时候也是倔脾气，怎么说都是不肯过黄河的。

他说：“哪里最安全，人民拥护我们的地方最安全，我看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有保证。”

这就没法争论下去了，显然是决心已下了，既然说服不了教员离开，那最后大家自然是决定都留在陕北。

可是这个时候，教员又不同意了，其实他心里根本就知道，留在陕北是很危险的，不管有什么难以拒绝的理由，危险都是严重存在的。

所以，最后他又建议要把中央机构一分为二，他带一部分人留在陕北，同时分出去一部分人过黄河，这样万一出现被胡宗南给包围了的局面，那过了黄河的那部分还可以继续指挥，不至于真的被一网打尽。

所以，最后会议决定：教员、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坚持斗争，而由朱老总、少奇同志带一部分人过黄河。

更过分的是，教员还说自己身边只留下一个警卫班就行了，其余部队都跟朱老总过黄河，最后朱总坚决不同意，命令警卫团的手枪连、骑兵连和两个步兵连留下来跟随教员。

就这样，一行两百多人就开始了艰难的转战陕北的历史进程。

为了保密，周恩来建议大家都起一个代号，他们各自给自己起了代号：周起名胡必成，教员起名李得胜，任起名史林。

后来，周恩来说：“当时中央书记处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在中央就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其实就是这三个人。”

他们是全国最小的司令部，却指挥着中国整个局面的解放战争。

而上述提到的“蘑菇战术”，就是：利用陕北复杂的地形，同敌人周旋，将其磨得十分疲劳，十分缺粮的时候，再寻机歼灭。

二、

可是危险是严重存在着的，教员在转战陕北途中，在一个叫王家湾的地方住了一个多月。

可是，随后国民党的飞机发现了王家湾这个小村庄里有密集的电台群，因此蒋介石判断毛泽东一定就在那里。

因此他命令胡宗南，就是决心牺牲两个师，也要把这个首脑机构捉到。

于是，刘戡部三万人马朝着王家湾扑来，而这时在教员身边的人一共只有那 200 人，还是朱德硬要给他留下来的。

彭总指挥的西北军 2 万人马都在几百里外的陇东，根本就来不及了。

于是，任弼时再次跟教员发生争吵，任弼时说此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马上行动，渡过黄河才能保障安全。

教员一听过黄河就火了，他说敌人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往黄河边赶，即使不把我们消灭，只要我们过了黄河，就是他们的胜利。

“过黄河，我们迟早要过的，可是现在不是时候，现在向东是绝路，因为这是敌人早就算好了的，就是要我们落入陷阱。”

最后，根据教员的建议，不要往东去黄河，反倒是往西走，这是敌人怎么也料不到的，只要利用好陕北的千沟万壑的良好地形，就能安全躲开敌人的追捕。

1947年6月8日，那晚还下着大雨，刘戡的追击部队，距离王家湾只有一个山头了，这时候教员才带着这一行200多人离开王家湾，走了大半夜，到了一个叫小河村的地方，大家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住进了一个小村庄。

可是，还没等把衣服烤干，刘戡的部队又朝着小河村来了，于是这支小部队继续往西走，陕北的老乡就带着这股小部队，兜兜转转，在敌人的缝隙中行走穿插，却始终不曾被敌人发现。

在转战途中，侦察兵不断把敌人信息带来，等到6月10号那天，侦察兵说有一支部队驻扎在此前我们所在的小河村，另外还有一些人往我们这个方向赶来。

情况显然很危险，可是就是这个时候，教员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敌人今天 12 点很可能会撤兵。

这简直有点像三国演义里的神预测一般，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那么说的理由是什么。

教员解释道：

1，别看他们追得凶，看似离我们很近，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哪里，不然早就围上来了。

2，他们收到的上级命令是占领小河村，到了小河村，可以交差了，也就行了，国民党的兵不会那么积极的去管什么作战任务的。

3，他们只带了四天干粮，现在已经到了第四天，再往前走干粮完了怎么办？老百姓又不给他们粮食，他们必然要回去。

4，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胡宗南和马鸿逵的结合部，他们这些人向来勾心斗角，都想保存实力和削弱对方，他们又不知道我们只有两百人，哪里会拼命到这里来作战？

当然，还是要作好他们追来的准备。

巧妙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当天中午，各侦查兵纷纷送来侦查情报，追兵顺着山沟向保安一带退走了。

这个两百人的中央机构，渡过了最危险的几天。

随后，毛泽东等一行人又回来小河村，在这里，他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叫“小河会议”。

这次会议上，他作出了一个解放战争进程的预计：认为解放战争大概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取得对蒋介石的完全胜利。

同时，他又说道：

“我们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这也用不着说出去，还是要作长期准备，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三个月解决共产党，后来又增加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才开始。”

后来的速度和进程，实际上还超出了毛泽东的预计，但是也是在这个小河会议上，他对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整体战略作出新的估计，那就是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这个陕北沟壑里的最小司令部，就这样开始了指挥解放军由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的一系列战争。

直到后来西北战场上，胡宗南遭到歼灭性打击，毛泽东等一行人才离开陕北，渡过黄河，去了那个叫西柏坡的地方。

第十一章：十大军事原则

一、战略反攻

教员是在陕北一个叫小河村的偏僻村落里作出的战略进攻的决定，事实证明，伟大的决定，未必非得在奢侈的大豪宅里。

而作出这个决定最核心的依据在于这样两条信息：

(一) 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十二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二) 第一年作战，敌人以二百四十八个正规旅中的二百十八个旅一百六十多万人，近百万的特种兵（海军、空军、炮兵、工兵、装甲兵），以及伪军、交通警察部队、保安部队等，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正确地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不惜付出三十多万人的伤亡，大块土地的被敌占领，使自己随时随地立于主动地位，因而争取了歼敌一百十二万人，分散了敌军，锻炼和壮大了我军，并且在东北、热河、冀东、晋南、豫北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收复和新解放了广大的土地。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也就是说，从中原突围开始算起，解放战争的头一年时间里，我们在两个主要原则，

即：

1，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2，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在这两个主要原则的指导下，通过放弃重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换得了歼敌 112 万人的大好成绩。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解放军也付出了 30 万人的沉重代价，但是这已经有了取得最后成功的重要理论依据。

我们说，作出任何决定，尤其是重大的决定，一定要有理论依据，不能仅凭瞎想或者是很主观的认识来作出任何决定，否则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这是其一。

在有了理论依据以后，比如上面教员作出战略反攻的理论依据，就是上面两个核心的信息，加上其余一些综合判断。

有了理论依据之后，这个依据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对的，这是因为情报不一定完全准确，敌我力量的估计也不一定符合客观现实，万一敌人还有较强大的力量，不足以展开对其的反攻呢？

所以，有了理论依据是第一步，这个依据是不是符合客观规律、是不是估计得准确，则需要放到实践里去验证。

因此，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必须经过这两步：

第一：罗列作出决定的各项理论依据；

第二：对这些依据作出量的估计和分析，然后将其放到实践中去验证。

如果失败了，那么就要从这两方面去找原因，到底是依据不对，还是对这种依据的量的估计不对。

长此以往，我们作决定的水平也就越来越高了。

二、

一般来讲，能够把理论依据找的很合理，把形势估计得很准确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能估计得大体上准确就非常厉害了。

这个战略反攻的决定，虽然从后来的历史结果来看，是非常伟大而英明的，但是从当时具体的执行时间点上看，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为了执行这个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决定，以刘邓大军南下黄河，挺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当时，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谢大军分三路挺进，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陈谢（陈赓、谢富治）挺进豫西，陈粟大军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边区。

这三路大军呈品字形战略配置，协同作战，目标直指国土腹地的国民党统治区。

但是这个战略计划，在一开始的时候，却执行的很不顺利，原本刘邓大军首先挺进大别山，是因为当初这个地区内有早些年红军鄂豫皖根据地的基础，所以他们认为到了那里以后，是可以得到群众帮助，快速建立根据地的。

毕竟，解放军作战，脱离了人民群众，所有的战略战术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了。

而这一次执行的又是无后方作战，都是野战军出动，所以如果不能快速建立根据地，而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是有异常严重的危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经过多年的经营就想取得群众的拥护是很困难的，因为以前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红军建立起来了，但是后来又走了，苏区遭受过很大的蹂躏，因此这一次解放军来了还走不走？群众并不敢确定，这就导致一开始的时候，刘邓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区域十分被动，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这种危险造成的是连环效应，陈粟大军、陈谢大军一开始进展也十分不顺利，尤其以陈粟大军遭遇到较为严重的损失。

这些情况，都是与此前预计之中的战略进攻不是很相符的，也就是主观的思考与客观的现实发生了矛盾。

事实上，任何时候，主观的思考和客观的现实都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区别只在于这种不一致的程度有多大，是否造成了极其难以挽回的后果？

一个人能保证大部分时候，或者关键决策上不要太脱离现实，大体符合现实规律，那么这个人就已经很强了。

我们可能不能对标伟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到说话和做事，不全凭主观瞎猜，而是必须要有依据。

然后经过对既有信息的分析以后，在去实践中验证。

哪里错了，就吸取教训改正哪里，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变成一个相对靠谱的人。

三、

在进行战略进攻的决定下，还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战略战术，而经过一年全面内战的经验，在军事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十大军事原则诞生了。

这十大军事原则，被写进《毛选》第四卷：《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原文如下：

- (1)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 (2)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 (3)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 (4)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 (5)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 (6)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 (7)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 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 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

这十大军事原则，至今为很多商业人士研究，里面有很多战术层面的东西，是值得学习的。

但是，所有的这些原则，事实上它并不是没有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人民战争。

其中我们以前就说到的，比如那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作战原则，必须有侧翼钳制得好，才能集中优势兵力，而侧翼的钳制就离不开群众的支持，离不开民兵的支持，离不开支前的百姓队伍的支持等等。

再比如：先打分散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这也是有条件的，我

们之所以可以打分散之敌，是因为我们自己可以分散出去打，因为我们是立足于群众之中，有群众根据地，而且军民一心，兵力可以随时分散随时集中，不像国民党军队离心离德，很难指挥和调动，因此才有利于解放军这种战术的展开。

这也是我们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反复说过的：一切战略战术必须根据事物的具体特点来建立，可以参考，但是往往不能照搬。

这一点，我们就不多说了，《毛选》里对于为什么我们的战略战术老蒋的团队用不了，已经作了深刻的说明：

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第十二篇：次要矛盾

这篇文章，主要解说一下，在解放战争时期，同时开展着的整军运动，整党运动，土改运动，统一战线等几项重大运动的意义，以及相应的方法论。

一、次要矛盾的意义

我们第四卷之前的所有文章，始终都围绕着四个字：**解放战争**。因为这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一切的工作重心都围绕着主要矛盾开展起来。

从一开始的和平谈判、停战协定、联合政府，到后来的全面内战，随即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十大军事原则”等等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着解放战争之前，以及解放战争打响所展开的。

这些当然很重要，因为当时的主题就是解放战争，但是其实当时并非只有这一条主线，同时还有若干重要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着的。

这些工作，主要有四项，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整军运动、整党运动、土改运动和统一战线。

因此我们可以把当时的解放战争当做一系列矛盾的主要矛盾，而把后面几项工作内容，当做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次要矛盾。

此前在《矛盾论》的解读中，我们强调过，抓主要矛盾的时候，一定要兼顾次要矛盾，否则次要矛盾即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使得整个事物的发展朝着我们预计的反方向发展。

这一点，国民党集团首先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他们也面临着解放战争（对方称为勘乱战争）的主要矛盾，同时还面临着内部腐化、经济失衡、脱离群众、背离民心、思想混乱、军阀矛盾等一系列次要矛盾。

可是，从解放战争爆发开始，他们就寄希望于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想要以此在 3-6 个月的时间里解决主要矛盾，然后再来花心思整顿次要矛盾。

然而，这就变成了严重的机主义，想要一击即中，一旦预期之内解决不掉主要矛盾，那么紧接着就会陷入被动，次要矛盾也会逐渐转化成主要矛盾。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实际上国民党依旧保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可是解放军却可以以摧枯拉朽的形式迅速解放全中国，原因无他，国民党内部已经完全走向崩溃，其经济失衡、背离民心、内部腐化已经开始转化成其主要矛盾，自身的运转都已经难以维持，所以军事上自然也就呈现出兵败如山倒的局势。

二、

而反观我方，除了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之外，同时也兼顾着一系列的次要矛盾。

1，整党整军

在整党整军方面，当时开展了著名的“三查、三整”。

三查，在地方上指的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这些内容和形式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就是我们此前已经无数次分析过的整风运动、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队内的民主、发挥支部建在连上的作用，经济公开，官兵平等这些内容。

因为队伍扩大了，而且投诚过来的俘虏兵，国民党军队越来越多，因此在思想上、纪律上、组织上的加强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把之前用来训练红军的那一套流程、方法，在扩大了的解放军中普及开来。

而其中一个较为新颖的方式，是当时十分普遍且具有重要影响力运动，叫诉苦运动。

这是从基层士兵那里发明出来的，因为有很大的作用和影响，所以最后被普及开来了。

方法也很简单，到了解放军队伍里的俘虏兵、国军士兵，会被召集起

来，与解放军士兵一起，大家开晚会一起讨论相互之间的经历，曾经受过哪些地主的压迫，家里人受到过哪些地主、恶霸的欺辱等等，一通诉苦之后，大家就会很快发现，原来所有人都是穷苦人民出身，那么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封建地主老财，拿回自己的土地，夺回做人的尊严呢？

而在解放军的队伍里，官兵平等、军民连心的氛围很快就能把一个人改造过来，于是这些人昨天在国民党军队中作战还很消极，今天到了解放军作战就变得异常勇敢起来。

而如果反过来，我们不重视整党、整军，不统一大家的思想，实际上一定会很明显的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甚至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会使得次要矛盾（军纪败坏、思想混乱、内部矛盾激增）等等，发展成主要矛盾，成为瓦解军队的基石。

2、土地改革

原本我们在土地改革中的经验，经过了红军时代，八路军时代之后，已经是较为丰富的了。

但是因为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之后，就必然涉及到占领原先的国民党统治区，这些地方的土地革命此前并无基础，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犯了很多“左”的错误，这也成为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矛盾。

其突出表现为：性急，企图在几个月内就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过于重视发动贫下中农，不懂得联合富农、中间派、中小资本家、民主绅士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教员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解放区土改方针，这里面有这样几条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1、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这点在老区和半老区亦是如此。——《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2，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3，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在整个战略区是如此，在一个县内也是如此。这在老区、半老区都应如此。——《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4，应当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地改革的本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但要加紧对于他们的教育，防止他们把持权力，妨碍土地改革。一般不宜要他们在本区本乡办事。着重任用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这几条要点都体现出一个很强烈的特点，我们可以总结为：不要四面出击。

其实就是很好的运用统一战线，不要使得自己陷入孤立。

其中提到富农、富裕中农的问题，因为在土地改革中，富农和富裕中农，往往也伴随着高利贷、剥削、较多地租等形式在里面，因此从理论上说，他们也必须是要被革命的对象。

可是，如果一开始土地革命，就把他们列为打击对象，那么就会使得被革命的力量变得较为强大，而我方则容易变得孤立。

因此，就出现了上文中教员提出了分阶段和批次改革：

即先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等把地主势力消灭的差不多以后，这个时候再来对富农动手，这样就不至于一开始就使得富农和地主团结起来，对抗土地改革。

这其实有点像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是每次打击的对象，尽可能小，然后实现逐步打击，各个击破，避免它们联合起来。

这一点要灵活运用，也就是上面我们看到的，即使是打击地主阵营，也要先分化瓦解一番，首先打击最大的，行为最恶劣的地主，消灭他们以后，再逐步瓦解，逐步打击。

总之，总结一句话就是：不要四面出击。

否则就会搞得自己很被动，且容易使得我方力量陷于孤立。

3、统一战线

这其实也是统一战线的一种运用，不仅在土地改革，在制定合理的工商业政策，处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上，也都运用到了统一战线的方法。

这些方法在第四卷《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里面，有很好的说明和体现：

- (1)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
- (2)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
- (3)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

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

(4)关于开明绅士问题。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应当继续留在高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

(5)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在减租减息时期提出鼓励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对于稳定中农、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

(6)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

大家看一下这几项重要指示，就会发现，连第六条那种不要过分的斗地主都提到了。

其实核心就是一个：既要实现我们土地革命的目的，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又不可过分的增加打击面和打击力度，而应尽可能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种思想体现在不同的具体策略上，都是不一样的，今天大家可能不需要旧式的土地革命了，可是背后统一战线的思想，其实始终贯穿着

整个毛选思想，不要四面出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始终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三、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主题——次要矛盾。

我们说主要矛盾可能要花去 60%甚至以上的精力，有时候甚至几乎 90%以上的精力需要集中在主要矛盾身上。

可是，这不意味着次要矛盾不重要，相反，次要矛盾的发展和掌控，其实能为主要矛盾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客观条件。

比如：

土地改革能为解放战争提供更好的兵源、群众基础、后勤保障。

统一战线，能为解放战争保证更多的力量，缩小打击面，减少被动。

整党整军，能够使得军队作战素质更高等等。

反之，如果一味强调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那么其实主要矛盾很可能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次要矛盾转化成主要矛盾，最后是所有矛盾都无法解决，走向持续的紊乱和崩溃。

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解放军这个系统里，大家能够兼顾到次要矛盾？

除了思想上的重视、策略上的辅助之外，它还必须要一定的条件。

拿上面几项次要矛盾举例，比如土地改革，如果一开始在红军时期，没有像古田会议那样的思想整顿、没有已经形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文化，没有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没有此前土地改革的不断试错，没有经历过统一战线中的种种挫折，那么到了解放军时期，在全军迅速扩大的过程中，再想要来一次古田会议、延安整风，那困难可就大了。

苏区时期，在执行统一战线，还是孤立中间派的争论中，就是孤立中间派占据了上风，结果有了当时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拒绝同一切中间派合作，把中间派看作最危险的敌人等一系列违背统战的思想和策略，从而在政治和军事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整个苏区走向了全面的崩溃，最后来了个长征。

这种事情，如果是到了后来解放战争再来一次，可想而知其后果有多么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蒋介石集团，根本无力兼顾次要矛盾的原因，因为每一项矛盾，都难以调和，难以解决，所以他只能冒险发动战争，妄图短时间内消灭解放军。

这种冒险机会主义，又加剧了其失败。

早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前，教员就看出了蒋介石集团所面临的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虽然双方阶级立场不同，但是因为蒋介石内部那些难以调和的矛盾，比如经济腐化、政治腐化、军事腐化、军阀矛盾、脱离

民心等等，短时间内根本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所以这就有了蒋介石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判断，所以我们一面准备战争，一面争取一切可能出现的和平局面，甚至在和平协定、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我们还曾出现过短暂的乐观情绪，认为和平是可能到来的了。

只可惜，蒋介石既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对整个形势误判非常严重。

因此，最后在忽略次要矛盾的发展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使得其整个系统很快就走向崩溃。

这就告诉我们，不仅仅要认识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不同的精力和重点来应付相应的矛盾，而且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任何阶段，都不能忽略次要矛盾。

不仅如此，次要矛盾在其很小的时候，就要花心思去解决，要看到它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发展带来的种种后果，防微杜渐，否则等它发展到越来越难以调和的阶段以后，整个系统处处都是严重的矛盾，那么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第十三篇：杜绝包办代替

一、

我们上一篇文章说了次要矛盾的重要性，这篇文章来说一下包办代替。

什么是包办代替？

简而言之：把需要和别人一起商量，一起参与的事情，采取独自办理的形式完成了，这就叫包办代替。

毛选第四卷里，在提到次要矛盾部分，即关于“土地改革”、“整党整军”、“三查三整”、“统一战线”等政策的时候，有一篇文章专门提到了包办代替的非群众路线。

这篇文章是《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这次谈话的核心，是表达这样一个主题：

即一切党的政策、理念、不光要让领导者知道，也要让基层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知道。

否则，如果仅仅只是领导者和干部知道，群众不知道，那么就会出现包办代替的非群众路线，就会出现脱离群众的情况。

为什么一定要联系群众，而不是包办代替？这一点这篇文章说明得很清楚：

“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

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了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磨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这些话说的是一个意思，群众事情要群众自己来办。

这就好像一个家庭里，家长教孩子一样，你永远都不可能事事代劳，必须尽可能的教会孩子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学会完成自己的事情，你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帮助，但是就是不能包办代替。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教育成本会比包办代替的成本还高，但是长远看，包办代替永远解决不了长远问题。

这原本不是一个很难明白的道理，可是为什么还是有大量包办代替的行为产生呢？

教员在第四卷里这篇《在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分析存在的原因。

二、

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原因之一：

“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这是包办代替的原因之一，属于方法论的层面，因为没有向把思

想工作打通，没有把道理、情况同群众讲清楚，自然就无法取得一致的认识，因此也就无法发动群众积极性。

这种原因往往不是很难解决，因为只要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那么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好了。

文中也提到了，思想上加强教育，贯彻理论群众路线，教给具体办法就可以解决。

原因之二：

没有搭建起，或者说还没有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组成程序和手段——民主集中制。

因为要联系群众，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就必须要有一套流程来保证这个过程得以顺利的进行，且能及时修正相应的错误。

否则，一方面就要出现包办代替，一方面就要出现极端民主化。

如果因为没有建立收集群众意见，没有建立联系群众方法的制度，那么就会出现包办代替。

而反之，如果没有相应的处理群众信息的机制，那么杂乱无序的群众意见收集起来以后，就会混乱无序，使得工作也不能办下去，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

比如，毛选第四卷《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以及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

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

这样就会使得群众的错误意见，以及很多自相矛盾，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意见也被采纳了，于是就要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

因此，建立民主集中制，是保证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第二个重大任务。

民主集中制的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时古田会议上，就着重解决过这个问题，群众的意见通过各级代表大会传达上去，然后在通过相对应的委员会讨论、商议，最后形成集中的决议再向下传达。

执行过程中不断纠正、不断吸取经验，不断的改正错误的东西，最终把事情办好。

没有这样一套机制，那么不是产生包办代替，就是产生极端民主化。

原因之三：

如果说前两个原因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话，那么第三个原因就很难解决了。

这个原因就是群众路线，必须保证领导群众的人和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

上面教员其实已经说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既然是要群众自己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包办代替，那么就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上：即领导群众去争取自己利益的领导者，他们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始终保持一致。

否则，如果群众争取利益的过程，损害到了领导群众的这个群体的利益，那么任你诸多方法和技巧，都会被领导者变着花样的给你玩坏掉。

然后你不断的去找方法层面的原因，找技巧层面的原因，找思想理论上的原因，找来找去，也逃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死循环里去。

这一点，在若干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已然成为了极端地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爆发了革命层面的政治运动。

这些是我们将来在建国史中要继续讲解的部分了。

这里只提出一个条件，即避免包办代替的最为关键，且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领导群众争取利益的群体，与群众本身利益一致。

第十四篇：粟裕的建议

我们都知道，解放战争有著名的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一举奠定了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基础。

但是其实，在三大战役发起之前，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对三大战役的发起以及后来整个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那么说，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影响，或许后来的解放战争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画面，而且它取得最终胜利的速度决不可能有如此的迅速。

这件事或许能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一些自己的思考，所以我们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记录这件历史上似乎没有太多着墨的历史事件。

一、

1947 年中下旬，毛泽东在陕北小河村确定了将战略退却转化为战略进攻的计划。

随后为了执行这样的计划，从解放区把战火引进国民党区域，刘邓大军开始挺进大别山，经略中原，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而此时，蒋介石因为在山东和陕北发动的重点进攻屡屡受挫，损失重大，于是改变其战略部署，在中原集结了六个机动兵团，在加强长江防线的同时，对进入大别山以后的刘邓大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

又因为刚刚进入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大军，在此地并没有像老解放区一样的群众基础，所以他们一进入这一区域以后，就面临着十分严重且险峻的作战形势。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们在这一地区确实损失了极大的力量，在他们刚刚进入大别山地区的时候，一共出发的是十二万三千多人，而等到他们转出这一地区的时候，仅剩下五万八千多人，可想而知其当时生存之艰险，牺牲之惨重。

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刘邓部就数次要求其他战场和部队的策应和支持。

毛泽东认为，如果要迅速扭转战局，一方面拿下中原，一方面改变刘邓的被动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一支部队直接过长江，到蒋介石腹地的江南一带，实施战略跃进，从而迫使国民党从北向南回援，由此既可以解中原之围，又可以打乱蒋介石部署，继续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此时的三大战役计划，还完全没有形成。

从毛泽东一生的历程来看，他一旦作出的决定，尤其是战略层面的决定，往往都是经过各种反复的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的，因此一旦决定

了以后，就不会改变，他不是一个能被轻易说服的人。

这一点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是如此了，这并非缘于他的自信或是自负，而是因为从当时的历史实践去看，没有谁能够比他更了解中国革命，更了解人民解放军，更了解由人民战争所衍生出来的所有的战略战术，所以一般他作出的决定，很少有人能说服他，因为别人能考虑到的，基本上他都考虑进去了。

但是这一次，关于派一支军队到江南一带，牵制国军，经略中原的计划，却被一个人改变了，这个人就是粟裕。

二、

原本 1947 年中下旬，在刘邓刚刚进入大别山区的时候，毛泽东就想把粟裕的两个纵队叶飞、陶勇纵队派去江南，创建闽浙赣根据地。

毛泽东认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粟裕深入江南，就能使得大量国民党军从长江以北向长江以南回援，我军便可转守为攻，逐步实现战略反攻之计划。

但是当时粟裕所在华东野战军刚刚经过数次大战，急需修整，短时期内很难执行如此重大的战略任务，于是粟裕向中央请示并得到了同意，将南下计划推迟半年。

后来到了十月份，毛泽东又提出这个计划，但是也因为当时作战的实际情况不允许，因为流动作战，原先的叶飞、陶勇两纵队伤亡万余人，所以短期内也无法执行这个计划，且当时华东野战军刚到豫皖苏一

带，急需首先巩固根据地，补充物资，所以南下计划又被搁置了。

到了 1948 年初，渡长江南下的事被再次提及，这一次军委直接给粟裕发去了电报，这封电报直接给出了几个渡江方案，让粟裕本人选择一个合适他们实际情况的方案，尽快完成渡江计划。

毛泽东认为：粟裕以“七八万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到一年之久，然后以跃进的方式分批次到达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应付被动的地位，疲于奔命。”

粟裕看到这封电报以后，立即表示执行军委的指示，开始准备渡江事宜，并提出了三月和五月两个渡江的时间点，供军委作出决定。

但是同时，粟裕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将对这个战略计划产生转折意义的影响。

他提出：

“渡江南下，转战千里，兵力恐损失半数以上，且在江南一带短期内难以补充，如今我们已经取得了战略反攻的优势地位，但是在军队数量和作战技术上还未取得相应的优势，如果三个野战军能够在中原合力打上几个大的歼灭战，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那么我们在军队数量和作战技术上都取得优势以后，则战局的发展将急转直下，也必将推动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大家如果对解放战争后来的历史进程稍微熟悉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惊人且富有预见性的计划。

后来的整个解放战争的衍变进程，正是按照粟裕的这种设想所发展的。

当然，粟裕在写这封电报的时候，已经开始准备渡江的船只、物资、以及准备军队的调动了。

他给毛泽东的电报十分委婉，但是已经足够显示出其对渡江南下的战略计划的不同意见，他知道毛泽东一定能够读懂其想法。

一直以来，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中，极少有人提出对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尤其是战略层面的东西。

粟裕当时并非没有顾虑，如他后来回忆所说：

“当时主要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的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但是最终还是决心将自己的判断上报中央，因为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全局是由很多局部组成的，我自己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

正因为这种思考和想法，所以粟裕最终决定把他的想法以电报的形式传给中央，由此，他写下来一封有生以来发过的最长的电报，这封电报多达两千余字，阐述了其认为不应该渡江南下的理由，以及在北方

如何打大歼灭战的初步设想。（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这种设想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吻合），我们来看看电报的主要内容：

1，建议一、四、六纵队暂不要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后来淮海战役的最初设想）

2，派出几个旅或团作为游击部队，破坏敌人兵源、粮源、和其他战争资源，向长江以南敌人的后方，派出一切可能的游击队来策应中原野战军（即刘邓大军）。

3，如上述意见可行，那么建议集中华东野战军大部进攻济南，或围点打援、或直攻济南，在占领济南以后，华东野战军主力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大的歼灭战。（事实上，这里所说的第二个大的歼灭战，就演变为后来的淮海战役了，只是当时粟裕本人和毛泽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歼灭战能大到那种程度）

毛泽东看到粟裕的这封电报以后，当即作了一个决定，要亲自把陈毅、粟裕等人请来，大家一起认真研究一下粟裕的这种战略设想，以最后决定是否作出渡江南下的战略计划。

三、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从陕北去西柏坡的途中，从 1947 年 3 月 18 日晚上离开延安窑洞，中间历时一年零五天的时间，他一直坚持不过黄河，在陕北的千沟万壑中兜兜转转，硬是把胡宗南牵制在陕北一年的时

间。

直到整个陕北战场上，已经摆脱了最危险的局面，取得了战略的优势地位以后，他才决定离开陕北，到另一个指挥中心西柏坡。

1948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渡过黄河，离开陕北。

在从陕北到西柏坡这途中，发生了上述我们所说的粟裕的建议这样一个历史事件。

因此，1948 年的 4 月 20 日，在毛泽东到了河北阜平县城南庄的时候，他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于是电告陈毅、粟裕：两同志数日内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

4 月 30 日，陈毅、粟裕到达河北城南庄，于是一个对整个解放战争历程起着决定意义的会议在这个村庄里召开了。

这个会议整整开了七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当时是一番怎样的场景，或许有剧烈的争执，或许有激烈的意见交锋，或许是在一种轻松活泼的状态下召开的，这些我们已然无法得知。

但是，粟裕陈述的关于在江北打大歼灭战的意见都保存了下来，他的思考主要是这样几点：

1，如果近十万军队转战江南，行程上千甚至上万里，又是无后方作战，又是深入国民党腹地，不仅损失极大，且不容易造成打大歼灭战和进攻大城市的机会。

2，三个纵队渡江南下，未必能起到调动蒋介石大军回援的作用，国

民党中央战场上都是精锐化、机械化部队，蒋介石不太可能调他们去打游击，这样就不一定能起到策应中原野战军的作用。

3，在中原战场上，尤其是黄淮地区，我军已经逐步具备了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如果错过这样的机会，甚为可惜。而反之，如能在黄淮地区实现这样的大歼灭战，那么消灭了蒋军主力，渡江南下就更加主动了。

4，要在中原打大歼灭战，就必须逐渐强大的野战兵团，因此如果分兵南下，就难以实现中原战场上大量歼敌的目的，也就难以短时期内改变敌我兵力的对比。

因此，应该集中优势兵力，依托北方的有利条件，就在我们经营多年的解放区附近，寻找机会，将敌人的有生力量封锁在长江以北，实现歼灭其精锐和主力的目的，最终改变解放战争的敌我力量对比。

这个会议最后作出了决议，毛泽东听取了粟裕的建议，会议决议为：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下，集中兵力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为未来渡江南下作战铺平道路。

这个战略计划的核心变化，其实不在于那几个纵队是否要在当时南下渡江，而是把整个歼灭敌军精锐主力的中心，全部放在了长江以北，也就是说要将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全部封锁在长江北面，利用大歼灭战来消灭他们，完成力量的绝对改变以后，再发起渡江战役。

而后来的历史就是如此，渡江战役是在三大战役完成以后，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才展开了渡江战役。

而那时候的渡江战役，已经不是为了牵制国军回援，也不是为了去建立根据地，而是直接以摧枯拉朽的形势，完成全中国的解放运动。

而紧接着的历史进程，不仅仅如期完成了这样的战略目的，甚至可以说是超出预期的完美的实现了这个战略计划。

应该说，粟裕的这种设想，就是淮海战役的蓝图，而且没有人知道，辽沈战役是否也受到了这个蓝图的某种启发？

但是，可以完全肯定的是，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绝对是把国军精锐主力封锁在长江以北，实现大歼灭的总体战略计划下催生出来的。

所以，其实粟裕对于整个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的重大贡献，或许比我们平常脑海里认为的还要重要一些。

四、

这个解放战争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已经叙述完成了，其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内容了。

其一，正如粟裕将军所说的那样，看问题要把局部和整体联系在一起，局部是整体的重要参考，而局部的决策又必须依赖于整体的判断，否则就容易被局限，或者陷入片面。这其实就是当初《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问题》里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的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即用联系和运动的眼光看问题，这就是战略眼光。

其二，粟裕的建议从提出到被接受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和谐且美好的过程，是民主集中制的又一次完美体现。

而保证这种民主集中制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点是什么？有人可能觉得是因为毛泽东善于听取下级的意见，甚至是涉及重大战略的建议都能很认真的听取下级建议，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民主集中制能良好运行的最基础和重要的条件，不在于个人品质，而在于大家思想和目标一致，互相之间是完全信任的。

它不像国民党集团，不管是蒋介石的决定还是蒋介石部下的建议，每一个决定和建议背后，双方看到的都是邪恶的动机。

因为确实老蒋的很多决议和建议，背后都潜藏着吞并地方军阀、削弱对手势力的动机在里面，所以长久以来，那个集团是涣散，又矛盾重重的，这个时候，你说让蒋介石善于听取建议，底下的将领善于提出建议，这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双方毫无信任基础嘛。

其三、伟大的决策、思想、理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来源于许多渠道，可能是旁人的建议，可能是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可能是自己的实践总结，总之，渠道越多越好。事实上，毛泽东思想里的很多伟大创举，都不是他凭空创造的，那些创举往往来源于其他官兵，来源于实践观察，来源于群众本身的创造。

不仅是这一次的战略决策，从最早期开始就是如此了，比如支部建在连上，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在连上有支部的特务连有超强的凝聚力，受此启发，便有了支部建在连上。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因为一开始看到有人乱拆群众门板，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以及打土豪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加以总结和提炼，才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首先是井冈山的绿林武装的打圈战术，是他们利用大山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术，后来被毛泽东、朱德优化总结之后，结合红军实际情况又创造出来的战术。

这一次的重大战略决定，他吸收了粟裕的建议，这个吸收的过程，也在于他自己对解放战争进程的把握和了解，所以他可以识别出粟裕建议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因此他能及时修正自己的想法，最终采纳了粟裕的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议。

否则，如果我们自己对事物的各种信息把握不全面，事实上下级的建议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难以识别，往往也就不容易被采纳。

这又回到了我们以往《实践论》中重复过的观点：将收集的信息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的过程，就是独立思考，作出判断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就需要我们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有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才能最终作出合理的决断。

这也是贯穿《毛选》全四卷里的一个重要的思考问题的流程和方式。

第十五篇：九月会议

在毛选第四卷里，有一篇文章叫《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这篇文章写于 1948 年 10 月，但是其所述的内容，是关于 9 月份召开的一次重量级的会议中所讨论的内容。

9 月会议，是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因为在这以前，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们都分散在各个解放区从事紧张的解放战争，交通十分困难，不可能举行全体性质的会议。

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举行了一次他们领导集团内的重量级会议。

而双方几乎在同一时间举行这样大规模的内部会议，从时间点上看，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大规模的决战就要到来了。

一、

然而双方开会的氛围和心情此时已经决然不同了。

共产党所举行的九月会议，是在一种乐观、愉悦的氛围之中完成的，

它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所取得的一系列超出预期、令人骄傲的成绩。

这些成绩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质变性质的变化。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两年以来，国民党兵力急剧减少，两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共损失兵力 246 万，加上倒戈、溃散、逃亡的人数，又补充了新增的兵源数量，到 1948 年 9 月份，国民党总兵力从一开始的 430 万下降到了 365 万。

而反观我方，虽然在战争中也损失了近 80 万军队，但是这里面包含很多伤兵，这些伤兵在被医治好了以后，又重新回到队伍里的就有 40 多万。

同时，又有 110 万左右农村青年加入解放军中，同时，还有近 80 万国民党俘虏兵经过改造以后，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

连同战场上起义投诚到我方军队里的数量，加上我方其他的一些损失兵力，此时解放军总兵力已经由解放战争初期的一百二十万，发展到 280 万。

对比一下就是：

内战初期：国军 **430** 万；解放军：**120** 万。

两年以后：国军 **365** 万；解放军 **280** 万。

看起来似乎国民党在兵力上还占据着优势，但是实际情况是，每个月解放军都在不断的歼灭国军至少 7-8 个旅的有生力量，双方的力量还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不仅如此，解放军在解放战争进行的同时，还在搞经济工作、土地改革、政党整风，新式整军运动等等。

在这些运动和改革中，投诚过来的俘虏兵改造很快，整个解放军非常团结。

而同时，蒋介石集团的政治、军事上的腐败、内部倾轧却是急剧的发展着的。

这就使得看似有着相对优势兵力的军队，实际上的战斗力不但比不上解放军，就是同内战初期的自己队伍的战斗力比起来，都已经下降不少。

而且更可怕的是，解放军有源源不竭的民兵组织作为后备军，要想扩军随时都可以。而国民党方面已经要靠拉夫、强迫等手段来补充兵源了。

这只是双方军事力量上的对比。

二、

在政治上面，腐败非但没有任何遏制的迹象，反而越发深重。

即使在紧接着的辽沈战役之中，为了解救危机，老蒋命令空军在天上投下来的粮食、物资，同样会被官员们先收刮和贪污一部分。

在陈诚刚刚主政东北的时候，就发现东北处处都是“留守处”，这个留守处背后都是国民党的官员，上至军长，下至连长都有，他们成立这样的留守处，就是用来倒卖物资、倒腾钢材、储备财产、包养情妇等等。

这样的“留守处”数不胜数，可想而知当时的腐败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而在经济上，也开始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而无法遏制。

当时的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这样说道：

“基层士兵们都十分厌战，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打仗，现在几百万法币还不如一块银元，物价的飞涨使士兵们的待遇严重降低，士兵们开始吃不饱，穿不暖。”

英国作家菲利普·肖特对那时国民党区域内的景象有过这样的描述：

“政府滥印钞票以支撑战争，造成通货膨胀和工薪贬值，渗透性的普遍腐化使得合法的工商业无法生存，所有的这一切使得曾经是国民党核心支持者的那些集团转而反对它了。它太衰弱，太多派系倾轧，以致无法以暴力强加其意志，它太腐败太漠视公众福利，以致于没有了广泛的基础支持，与之相反，毛泽东依靠的是群众的集体意志，而它却已经足够了。”

事实上，截止 1948 年 8 月 19 日，国民党增发的货币达到 604 万亿以上，从而引发了全面的通货膨胀，物价与 1947 年比已经上涨了五百

万倍至一千万倍。

而可怕的是，1947年比之1946年，也涨了上百万倍。

这就是说，你有五百万资产的中产阶级，在一年之内就地破产，沦为了无产阶级。

即使曾经所谓的富豪，也有绝大多数无法维持其基本生活的继续了。

这就使得大量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备了倒向共产党的可能。

后来的事实也却是如此，当三大战役完成以后，全国的解放战争极速推进，原因也在于此。

三、

因此，双方都是召集高层的全体重量级会议，但是双方的会议气氛却迥然不同。

蒋介石的会议开成了一个“反思会”，名曰——军事检讨会议。

会议上，蒋介石有这样一段发言：

“过去两年来的剿匪军事，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招招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讽污蔑，令人实难忍受。

因此大家在会议期间，必须彻底反省，彻底检讨，在会议以后，能有

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才能达成此次会议的任务。

如果今天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对于自己的精神思想还不能彻底觉悟，对于过去那种失败主义的心理还不能扫除净尽，不能重新建立革命的信心和决心，那将来总是要被共匪所消灭，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固然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那时我们真的是上无以对总理和先烈，下无以对全国人民和万世子孙了。”

此番话说得可谓沉痛之至。

而反观共产党这边的会议上，大家都在讨论和畅想着这样一些内容：

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还需要几年能够彻底打倒蒋介石？

我们进入城市的工作还很薄弱，该如何提前准备？

我们占领全国后，需要大批量的干部，这些干部是时候认真准备和培养了。

我们接下来，还要保持每个月歼敌 8 个旅，甚至更多，这样才能更快完成解放战争的进程。

我们计划要在长江以北打上几个大的歼灭战。

四、

这篇九月会议的毛选文，其内容并没有什么好解读的，它就像一个总结性的年终报告，总结了这两年来的战略战役方面的种种成绩，并展望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原文中没有提到蒋介石召开的这次会议，而我把蒋介石的那次会议也阐述一下，作为一个对比。

但其实我更想说明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唯心主义的问题。

蒋介石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在会议上的反思不可谓不沉痛，不可谓不诚恳，不可谓不彻底。

他丝毫没有掩饰这两年来的失败，也预想了足够危险的结局。

可是大家发现没有，他在总结一切原因的时候，把失败的最终归因，归到了“**如果今天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对于自己的精神思想还不能彻底觉悟，对于过去那种失败主义的心理还不能扫除净尽，不能重新建立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这段话暴露出了蒋介石的哲学思想，他把一切的失败最终根源归咎到了人的思想、意志、精神层面。

大家如果读过我们公众号的文章，那么就知道，哲学派系十分繁杂，但是大体上可以根据一切事物的本源的第一性划分，到底是物质还是意志，从而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

赞同一切事物的本源出发点是物质，意识是第二性的，那么就是唯物主义，反之，把一切事物的本源归于意识，物质是第二性的，那么就是唯心主义。

蒋介石这个案列可谓十分贴切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案列，一个会议讲话。如果我们多研究一些蒋介石的各种行为，政策，讲话，思考等等，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

他把一切事物的成功与失败的本源，都追溯到了意识层面。

他在早期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也是这般，认为把人的精神整顿好了，那么一切就会好起来，可是至于精神要怎么整顿？他能想到的就是勤洗手，讲卫生，懂得礼义廉耻等等。

至于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物质环境，比如生存、土地、尊严、教育、平等的制度文化、民主的权力等等，则一切皆无。

因为唯心主义的源头，就是精神，精神再往前，他追溯不到物质层面的东西了。（这里的物质，是哲学上的概念，不仅指土地，生存物质，也包括教育、文化、制度等等物质层面的内容）

所以，他只是不断的强调精神力量，但是追溯不到改造精神的物质力量。

于是，成功或者失败，总之一切事物的发展源头，最终都归于精神，可是恰恰是这样，他们的精神反而是脆弱不堪的。

反之，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他也知道精神力量的强

大。

可是，他不会把精神力量看作是一种天生出现的东西，或者是几句谆谆告诫、高人一等的好为人师、教育人民的语言就能把精神改造好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的源头在于物质，所以麻木的精神状态，一旦通过其物质环境的改造，是有巨大的可能性被改造好的，除非已经彻底腐化的那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土地革命；看到建立民主政权使得农民有说话、生产、建议、民主等等权力；看到妇女也可以参加生产，也可以有受教育的权力；看到军队经济公开、官兵一致；看到士兵与群众保持军民一体的关系；看到士兵们帮助群众组织政权、建立政权、实施土地改革等等。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物质环境的改造，于是才孕育出来解放区一批又一批有着钢铁意志的群众和军队，有着信仰和目标的群众和军队。

所以，一个唯物主义者，才能够真正的把思想、意志改造并发扬出来，这一点唯心主义者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认为一切事物的源头就在精神，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唯心主义者无法往前追溯了，他们无法作答，所以他们改造不了精神面貌。

而反过来，我军内部有资产阶级思想，有旧军队习气和作风的时候，毛泽东的办法是去找出这种思想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

从制度、文化，军民关系，土地等等方面去入手加以改革，而不是把思想、意识看作是一切事物的源头，否则的话，一旦落入唯心主义，则就会认为这些思想是无法改造的，因为它们就是一切事物的源头了，再也无法往前追溯了。

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当然了，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

这取决于是否真正的掌握和领会。

这一点，家里如果有孩子，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实际情况的运用。

如果一个孩子犯了错误，家长把孩子犯错误的根源追溯到了孩子不努力、不上进、不自制、不懂体会家长艰辛、不明事理、抗压能力弱，心里脆弱等等之上，那么这种教育一定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里不是说，孩子不会有这些问题，不努力、不上进、心理脆弱，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追溯到不努力、不上进的时候，还需要继续把原因接着往下追溯，即追溯到为什么孩子不努力，不上进，不体会家长艰辛，不明事理？

也就是说，唯物主义者，必须在发现孩子不努力，不上进的时候，想办法找出背后的原因，而这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有。

如果你发现，孩子成绩下滑，或者孩子犯了其他错误，就仅仅只是把

根源追溯到他不努力，他不上进，他心理脆弱的话，那么你就是个唯心主义者。

唯心主义者容易犯两种错误，因为他追溯到的根本原因，就是孩子不努力等等，于是他要么妄图施加压力改变这种孩子不上进，不努力的态度，要么就是放纵孩子随意去，还借口说不要管孩子太多，随便他怎么发展，开心就好。

两种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追溯不出孩子不努力，不上进背后的物质原因，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改变孩子这种状况，他又很着急，于是就会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往往是语言上的，就跟蒋介石天天号召改造精神，却又没有具体改造措施一样。这种“号召”不管是责骂，还是谆谆告诫，还是语重心长，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没有本质区别。

反之，如果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孩子不努力之后，那么他不努力背后的物质根源是什么？这个需要仔细观察，并找出来。

比如，可能是在校园谈恋爱了？可能是思想上有了困惑？可能是学习方法上遇到了难处？可能是家庭教育上出了问题？可能是在学校里遇到了挫折？等等，都可能成为造成其不努力的原因，一定有这样的原因。

而一个家长，就要尽可能的和孩子沟通，找出原因，然后加以改造疏导，这样才能把一个不努力孩子，变成一个努力的孩子。

唯物、唯心，在生活里处处可见，老板动不动就给员工“不努力警告”、

“不上进警告”，其实背后是一个原理，只不过目的不同罢了。

大家可以按照以上案列，多多联合实际生活去观察，去对照，去强化，唯物主义者在生活里，是能比唯心主义者看问题更透彻的。

这篇文章就聊到这里了。

第十六篇：辽沈战役

《毛选》第四卷里，对于三大战役只有简单的几个电报指示，但是其实这几个指示的背后，却是战略眼光、指挥艺术、政治意志的充分体现。

因此，读《毛选》第四卷，我们有必要把三大战役中的关键点、背景作简单的梳理。

一、

当时间到了 1948 年夏秋之季的时候，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整个局面已经变得十分被动。

数十万大军被孤立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域之内，长春与沈阳之间，沈阳与北平之间，沈阳与大连之间的铁路已经被切断，国民党军的补给全靠空运，处境的艰难又加剧了官兵们的厌战和恐战心理，驻

守东北的国民党军之间，由于嫡系与杂牌之间矛盾的难以调和，导致不少地方杂牌军官有谋求自己出路的意向。（也就是投诚到共产党方面）

此时双方都已经可以完全察觉出：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两个前途，要么固守原地，要么全力突围。至于想要战胜解放军的想法，那是半点也不现实的了。

因此，毛泽东开始有了要关闭东北大门，将数十万的国民党军消灭于东北境内的想法，而要关闭东北大门，就必须要打下锦州，一旦打下了锦州，就等于掌握了自由进出东北的权力。

但是同时，因为当时的东北国军总司令卫立煌采取坚守不出，保存实力的战术，所以解放军无法用运动战歼敌的战术来消灭固守在长春、沈阳、锦州的国民党军主力，只能采取攻坚战的办法。

而早在这一年即 1948 年的 4 月份的时候，林彪就提出就这三个敌人固守点中，选择一个先打，而林彪首先选择的攻击目标是长春。

虽然这并不符合毛泽东关闭东北大门，就要先打锦州的战略设想，但是一般不是特殊情况，毛泽东都会尊重战区司令员的意见和主张，这是因为林彪的意见和主张，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作出的决定，往往是由整个东北军区和野战军区高层指挥员们共同商议的结果，这些将领在战术指挥层面上往往更了解实际情况。

而在当时，东北战场上的情况还不完全明朗，所以虽然毛泽东有想要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夺取锦州的战略意图，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来。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东北野战军对于长春的攻坚战打得并不顺利，不管怎么调动敌人，怎么想办法，对手就是坚守不出，这就使得战场呈现出胶着的局面。

随着时间的流逝，毛泽东要关闭东北大门，在东北境内全歼国民党军的战略设想越来越明朗。

而此时，蒋介石一方也开使察觉到了这种危险的后果，于是他有了将沈阳和长春的军队统统调到锦州的想法，这样一来，如果东北能守则守，不能守还可以及时的把大军撤回关内，保留东北的国民党大军。至少也可以集中兵力，在锦州一带同解放军打一场大决战，只要不被解放军的运动战各个歼灭，那么还是有希望凭借装备优势打一个漂亮的仗的，就算最后还是失败，但是也总算消耗了解放军的力量，那时候放弃东北，不仅可以保留一些军队，而且不至于完全丢掉国军的声望。

应该说，蒋介石的这个战略设想有非常合理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按照这个设想立刻实行，那么辽沈战役绝对不可能是后来那么顺利的结

局。

可是，卫立煌却坚决不同意老蒋的意见，他认为固守在长春和沈阳的军队，如果南下锦州，那么就一定会给林彪逮到机会，在南下的过程中，遭到林彪运动战的毁灭性打击。

应该说，卫立煌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林彪大军正在围困长春的过程中，焦虑着国民党军坚守不出的困局，一旦此时大军调动，南下锦州，岂不是正好给了林彪机会？

卫立煌坚信，只要自己死守不出，林彪就拿自己没有办法。

可是他忽略掉的是，死守也总有个时候，你总归是不能一直守下去的，如果全国的战局没有好转，那么东北的情形也不可能好转，你死守下去不是一样迟早完蛋？

而蒋介石的想法就要高明一些了，只要及时南下，占领锦州，那么就可以配合华北的国民党军一起作战，这样一来，进有可能沉重打击林彪军队，退可到华北、华中，为华北和华中的战局增加力量，如果按照这种设计去执行，那么淮海战役的结局也必然改写。

这也是毛泽东最为担忧和害怕形成的局面。

因此，虽然国军从沈阳、长春出动南下，有被林彪歼灭的危险，但是

只要定下决心，极速前进，还是有很大可能性扭转战局的。

可是作为卫立煌的角度去看，全国的战局关他屁事，他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如果东北在他的手上丢掉，那么将来岂不是要他来替老蒋承担放弃东北的历史责任？

所以，卫立煌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这让蒋介石忧心忡忡，他在日记中写道关于他当时的心情：“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老蒋的这一预测是准确的。

而在解放军方面，也不是没有争执。

毛泽东同华东局、林彪等人的意见也不相同。

当时，毛泽东意识到了东北国军有极大可能放弃东北，逃窜至华北的企图和可能性。

如果他们的这一企图得逞，那么后面想要在东北全歼国军的设想就不太可能了。

而同时，准备在华北、华中打大歼灭战的想法，也会因为东北国民党军的进入，而增加不确定因素。

因此，毛泽东想要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夺取锦州，封锁东北大门

的设想越来越强烈。

而一向精于计算的林彪，向来打仗都是试图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如果南下取锦州，则东北野战军会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首先，围困长春就不得不放弃，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林彪南下，那么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林彪南下锦州的时候，华北的傅作义立刻进入辽宁锦州一带，毕竟华北距离锦州只有百余里，实在是太方便了，而且他们已经收到了情报，一旦林彪南下，则傅作义必出华北，进入东北锦州，参与打击东北野战军，这样一来，如果此时固守沈阳的卫立煌、廖耀湘军团，加上长春的郑洞国军团，突然倾巢而出，立刻从后背尾随而来，那么那时候就不是你要关闭东北的大门了，而是要被华北傅作义、锦州范汉杰、沈阳和长春的卫立煌、郑洞国四路大军包围于锦州城下，那岂不是要遭遇极大危险？

其三、解放军自井冈山红军发展而来，已经有 20 多年，可是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战略战术，从始至终，没有这种大歼灭战的先例，他们打的大多是游击战和运动战，哪怕是后来的大规模运动战，也没有这种带有大决战，大歼灭战的先例。

所以，只从一个局部战区指挥员的角度看，林彪采取逐个围困的方式，显然风险要小得多。

作为整个东北战区的最高指挥员，身负所有东北解放军战士的身家性命

命，所以他无论怎样的谨慎和小心，都是非常合理，需要被理解和认可的。

因此，尽管毛泽东在电报中不断的询问其是否有南下作战的可能性，并让其作好随时可以南下的准备，包括后勤、粮食等等，可是林彪就是一直没有南下的打算。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局面：

即，在国军中，蒋介石的意见同下级部署发生了冲突，卫立煌找各种理由拒绝南下。

同时，在解放军里，毛泽东的意见也可下级部署发生了冲突，林彪也没有南下作战的打算。

二、

可是，有趣的事情来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两党之间，其结果就很说明问题了。

毛泽东不断的在电报中，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讨论南下作战的可能性，从电报上来看，林彪的观点始终停留在继续围困长春，以及南下可能遇到的种种难处之上。

这让毛泽东越来越焦急，但是这种战略性质的决战部署，又不能不讨论，而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必须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执行起来的效果才是最好的。

可是在来往电报中，双方的观点所阐述的可能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大家对形势的估计不同。

林彪所看到的危险以及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只不过毛泽东认为此时已经不是算计得失危险的时候了，应该要拿出一点勇气，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完成全歼东北国军的战略任务。

双方经过一系列电报的分析讨论，最终林彪决定南下作战，但是希望华北地区的杨成武部出动配合，减少危险。毛泽东答应了这一建议。南下的事情原本就这样敲定了。

可是到了快要南下的时候，林彪又发来电报，陈述了种种困难，最终无法确定南下的具体时间。

这就让毛泽东很是恼火，终于忍无可忍，在电报中用了很严厉的语气批评了林彪。

刘亚楼和罗荣桓看到电报以后，方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随后同林彪一起商议，最终下定决心，快速出动，南下作战。

后来当林彪南下作战打响以后，实际上确实出现了几路大军尾随而至的局面，形成了一个就要包围锦州解放军的局面，林彪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于是他又给毛泽东发电报，认为还是应该重新打长春，不要再打锦州了。

这封电报刚刚发出以后，罗荣桓就感觉十分不妥，这样犹犹豫豫不仅妨碍了制定好的战略计划，影响军委决定，而且关键时刻退缩，可能对整个国内战局产生巨大影响。

因为此时，淮海战役的计划实际上已经被提了出来，并开始要着手准备实施了。

于是，他找到林彪一起商议，最后大家立刻决定，还是继续打锦州，赶紧追回那封电报。

可是电报在当晚就已经发出去了，于是他们赶紧起草了第二封电报，又改变想法，坚定的说还是决定打锦州。

这样，就出现了毛泽东刚刚收到一封东北野战军不准备打锦州的电报几分钟，随后便又立刻收到了第二封电报，又重新决定打锦州了。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写的纪念罗荣桓一首诗中所提到的“战锦方为大问题”的由来。

全诗如下：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看到两封前后发来的电报以后，回复了一句：“你们决心打锦州，甚好，甚慰。”

由此，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三、

战场上的局势往往是复杂而紊乱的，绝对不可能存在完全的一劳永逸的事情。

所有的战机往往又同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这些都是需要指挥员去作出准确估计和判断的。

林彪攻打锦州，从战略角度讲，固然是要关闭东北大门，实现全歼东北国军的目的。

但是，同时，也确实存在着，一旦解放军兵临锦州城下，被沈阳、长春、华北的国军倾巢而出包围歼灭的可能性。

这就需要考验最高层指挥员，即毛泽东对种种可能性的判断和估计，到底哪种可能性会战胜哪种可能性？最终才敢于下决心，作判断。

而随着林彪南下作战打响以后，国军确实出动了，沈阳的二十多万精锐部队，开始南下，准备要参与围歼林彪野战军。

同时，华北的国军也出动了。

这样一来，林彪曾经预料的情况就变成了真实。

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国军的出动，却因为所有战区司令之间各自算计、各怀心思而最终没能完成他们想要实现的战略计划。

虽然沈阳的军团，在廖耀湘的带领下出动了，但是他当时的想法，却并不是要去锦州打林彪，虽然是被迫接受的上头的命令，但是他心里却有自己的盘算。

他认为，去了之后就是一场大决战，万一锦州范汉杰坚守不出，保存实力，华北傅作义的军队就是做做样子，那最后自己岂不是要遭到林彪的团灭？

毕竟，让自己的友邻部队先拼，拼得差不多了再出动，一直都是国军的“优良传统”。

因此，从沈阳去合围林彪的廖耀湘集团，进度一直很缓慢，廖耀湘一边想着执行命令去锦州，一边想着留一条退路，即如果发现局势不妙，那就从营口的海路撤退，这样还可以保存全军力量。

只要军队还在手，那老蒋就不会惩办他。

所以，当时从沈阳出发去合围林彪的廖耀湘最终确定了其策略：执行命令，但是走走停停，至少他要等到华北傅作义的军队与锦州的范汉杰会师以后，他才会加快速度，去合围林彪。

可是，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一小时、一刻钟都有可能改变整个战局

的发展。

而华北的傅作义，东北本不属于他的范围，他派出军队进入东北，完全处于道义和看在蒋介石的面上，所以他不可能全力执行这个计划。

而长春的郑洞国，一直处于被围困的局面，且内部已经有国民党地方军队筹备起义了，这支起义军，就是滇军六十军，后来这支军队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出过辉煌的战绩。

这样就使得长春的部队，难以出动参与合围林彪。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原本可以在锦州合围林彪的几路大军：

华北傅作义仅仅只是形势和态度上参与进来；

长春郑洞国，因为遭受长期围困，士气低落，内部又有地方部队起义，也无法参与到合围之中。

沈阳的廖耀湘不敢下决心，一边盘算着合围林彪，一边又时刻准备着从海路逃跑。

于是，原本至少可以突围，甚至重创林彪的几路合围大军，全部因为各怀心思，不肯拼命、痛下决心作战，而最终被林彪各个击破。

1948年10月14日，锦州总攻打响。

廖耀湘没能如期而至；

长春郑洞国被围困，始终没有打出来；

华北的军队在塔山遭遇了解放军顽强阻击；

于是，第二天傍晚，林彪就拿下了锦州。

锦州一失，弹尽援绝的长春内部立刻瓦解，曾泽生率部起义，长春被突破。

剩下的最强大的移动兵团，就是那个此前犹犹豫豫，随后准备要从营口海路逃跑的廖耀湘了。

如果，此时，廖耀湘兵团能够全力从营口海路突围，那么是完全可以突围的，因为营口一带，林彪当时并没有留下较强的军队，仅仅在那里放了一个师的力量。

而廖耀湘此刻还有二十万精锐部队，突破营口防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然而有趣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

就在毛泽东为林彪只在营口放了一个师的安排，而发电批评的时候，廖耀湘的部队已经开始接近营口。

眼看来不及堵上了，可是因为国民党军先期到达营口的部队，遭遇了林彪留下的那个师的顽强阻击，这就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林彪早已派大军堵上了这个撤退的出口。

因为他们看着对方作战如此凶猛，勇敢，又不知道前面遇到的解放军到底有多少人，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误解，以为林彪早就已经把营口封住了，他们遭遇的是解放军主力。

于是，这个先期到达的国军立刻调转方向，往沈阳跑了。

他们告诉廖耀湘，遭遇了强大解放军的主力的打击，因为他们向来夸大其词，再加上当时确实胆战心惊，所以导致廖耀湘也以为营口确实被林彪派主力封锁了。

于是，20万大军，被一个师给吓跑了，这一跑又正好跑进了林彪真正的主力部队里。

就这样，廖耀湘近20万大军，遭遇解放军分割全歼。

这20万大军被歼灭以后，整个辽沈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剩下的就是逐步清理，攻占沈阳，彻底占领整个东北了。

辽沈战役，是整个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具有决战意义的大规模战役，战役为东北的解放，和全国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了有力

的铺垫。

整个战役进程中，我军投入近 100 万部队，国军一共大约 60 万部队，最终我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四、

从整个战役进程的关键点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几点：

首先，战役指挥者看问题的角度和战略指挥者看问题的角度往往不同，可是最终的胜利，涉及到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上下齐心，团结一致。

也就是说，如果决定了的目标，全力执行，和犹犹豫豫，往往呈现出天壤之别的效果。

《毛选》中所说的，国军内部派系倾轧、矛盾重重，其结果就必然在具体的战役中体现出来。

其次，任何战机往往也同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任何的风险，也都往往蕴含着相应的战机。这就需要考验领导者政治智慧，指挥艺术了。而这种指挥艺术，又必须建立在军队素质之上，你再好的战略规划，如果没有一支指哪打哪的军队去执行，那一切都沦为空谈，这一点蒋介石的判断就是很好的体现。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会发现，解放军内的指挥员们，同样

会遇到观点、策略、战略方向的分歧和争辩。

而最终解放军能很好的解决这种分歧，一旦领袖决定了战略方向和意图，就能被坚决的执行。

这里一个关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所有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没有私利，没有只想自己，而都是站在整个战争的角度发生的争执。

因此，他们可以实现党指挥枪。

而反观国民党则不同，他们原本也有一个当时条件下最优解的战略方案，可是因为所有人的出发点，都把自己的利益作为第一出发点，结果就是全部被消灭，各个被击破。

或许，从辽沈战役中，我们能更好的体会到毛主席那句话：

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期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真实含义和运用了。

第十七篇：淮海战役

一、

如果我们把淮海战役的流程简单理一遍，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刚刚完成的辽沈战役里，国民党集团内部所犯过的一系列近乎荒诞的错误，都原封不动的在淮海战役中再一次重演了一遍。

按理说，即使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那起码也需要给点时间让伤疤好了再说吧，可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淮海战役几乎是承接着辽沈战役开始的。

就在 1948 年底 11 月 2 日，东北野战军攻占沈阳，意味着辽沈战役取得全面胜利。

而此时在淮海战场上，真正的大规模歼灭战的作战意图，才刚刚建构完成，两军的正面交锋其实才刚刚开始，可是即便如此，那些在国民党方面原本看起来在辽沈战役中都可以避免的错误，却又紧接着在淮海战役中再一次上演了。

这篇文章，我们需要先把淮海战役的流程进行一个梳理，从其中的关键节点的地方，去看看这场战役中，是哪些因素在决定着战役的走向和结局的。

二、

我们此前说过，原本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毛泽东曾经有过要华东野战军一部南下长江，深入到国民党腹地去作战的战略规划。

但是后来粟裕给毛泽东提出了可以在长江以北，将战场主要集中在我解放区范围内，通过打几个大的歼灭战，来彻底消耗国民党集团的有生力量，待将国民党集团的主力歼灭殆尽以后，再发起渡江战役的计划。

后来毛泽东采用了这个计划，但是同时，自然在华中、中原一带的大

歼灭战的主要策划任务，也就直接的落在了这个战略计划的提出者——粟裕的身上。

1948 年的 9 月 24 日，粟裕构建出了一个“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然后发给了中原局、华东局和军委。

这是“淮海战役”最初的蓝图，但是此时这个计划还处于一个预想阶段，只有方向性上的建议，对其中具体的作战对象，作战任务并没有明确出来。

这个时候，毛泽东通过对局势的分析，将粟裕提出的这个最初版本的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进行了明确的战役规划，使得这个蓝图有了具体的可操作性，他指出这个战役计划的具体打击对象和作战方针：

“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最主要的是钳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歼灭黄百韬兵团。”

那时候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进至苏北新安镇一带，邱清泉和李弥兵团驻扎在徐州附近。

国民党这三个兵团距离较近，一旦黄百韬兵团遭遇大规模攻击，那么另外两个兵团很快就可以增援，因此这个战役规模较大，必须有效钳制好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才有可能歼灭黄百韬兵团。

这个作战计划，虽然经过了毛泽东的具体策划和部署，但是此时所规划出来的“淮海战役”，其实还并不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淮海战役，因为这整个计划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歼灭黄百韬兵团，将解放军的控

制范围伸展到苏北、苏中一带，这样一来，处于徐州的国民党军事集团就会受到巨大的威胁，这样的话，国民党徐州军事集团就有极大的可能性撤到长江以南去，如此一来，解放军在长江以北就可以取得更多重要的城市，并掌握长江以北的主动权。

也就是说，此时的“淮海战役”目的，只是想歼灭一个黄百韬兵团，从而掌握长江以北的主动权，至于其他的国民党集团军，仅仅只是想把他们赶过长江去，甚至只敢设想赶过去一部分。

计划待到打完黄百韬兵团，经过修整以后，明年的秋季之间，再发起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去，消灭长江以南国民党主力。

那时候，不管是毛泽东还是粟裕，都还没有料到，淮海战役会越打越大，最后不仅仅只是消灭一个黄百韬兵团，而是将几乎所有中原、华东一带的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消灭。

也就是后来常被人们所提出的，淮海战役由最初的“小淮海”，发展成了后来我们看到的真正意义上的“淮海战役”，成为了一举奠定解放军取得全国胜利的三大战役之一。

此时我方军队的部署是这样的，整个华东野战军是核心的解放军主力，一共有十五个纵队，为了统一指挥，由粟裕担任整个华东野战军

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也就是说此时的华东野战军全部交给了粟裕指挥。

而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此刻都在中原野战军里，中原野战军此时一共掌握四个纵队，这四个纵队在战场上主要起着配合华东野战军的作战任务的作用。

战役开始实施以后，为了配合粟裕所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发起了郑州战役，想要一举先拿下郑州。

原本设想，像郑州这样的大城市，国民党军必然会有重兵把守，可是一个天降的意外发生了，当他们准备充足的要去打郑州的时候，却发现郑州的守军全部撤走了。

于是，中原野战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郑州。

没有人知道原因，唯一的解释就是，此时国民党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了。

而且，顺势中原野战军又占领了开封，也是同样的不费一枪一弹，因为驻守的国民党军都跑了。

这样一来，原本预计的小淮海战役就发生了变化，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形成了可以从东西两面夹击徐州的态势。

也即是说，通过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作战，将存在一种可

能性，即把整个长江以北，主要驻扎在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事集团，全部一网打尽的可能性。

但是此时的条件依旧还是不算成熟，因为整个淮海战场上，我军的兵力并不占据优势。

但是，此时要将中原野战军同华东野战军联合起来，由一开始的战略互相配合，到后来的直接统一指挥，就变得很有必要性了，因为此时这两大野战军，将有可能通过战役联合作战，实现全歼长江以北，尤其是徐州一带国民党军事主力集团的可能性了。

恰在这时，辽沈战役取得了全面而完整的胜利，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攻占沈阳，于是整个战争局势发生改变。

我军此时，已经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可以在淮海发起大规模的歼灭战了。

因为，经过辽沈战役以后，我军不仅仅只是在质量上大大胜过国军，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胜过了国军。

从局部战役上看，一旦林彪取得东北战场上的全面胜利，那么他就完全可以立刻南下，包围和钳制住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军，这样一来，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歼灭徐州军事集团的后顾之忧也就完全解除了。

于是，这个时候，原本计划的只是歼灭黄百韬一个兵团的小淮海战役计划，开始朝着全歼徐州国民党军事集团的大淮海战役计划转变。

同样地，在辽沈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有了在淮海战场上实施全歼国民党集团军的计划的同时，蒋介石的一个战役计划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形成了。

这个战役计划就是，将驻扎在徐州的整个国民党军事集团主力，全部撤退到淮河以南，这样一来，就可以凭借淮河构建一道天然的防御体系。

而且，蒋介石这个人唯心主义严重，当初项羽四面楚歌，垓下被围的历史，就发生在徐州（古彭城）附近，这就使得蒋介石更加有所忌讳，不愿意在徐州一带同解放军有任何决战。

而且，从实际情况看，徐州乃四战之敌，易攻难守，且后方联络线很长，兵源粮食的补充都很困难，没必要坚守在徐州一带。

于是，蒋介石的主张是全面撤退到淮河以南，坚决放弃徐州。

其实，这个主张不管是从战略和战役角度上讲，都是当时最合理，也最有远见的一个方案了。

原因很简单，从战役层面讲，虽然淮海战场上此时有近 70 万国民党军，但是这些军队都缩在几个据点和交通线附近，离长江还有很远的

距离，一旦解放军将这个集团包围，万一全歼的话，那整个国民党军主力将告覆灭。

而此时，华北的傅作义被华北军区的聂荣臻、东北野战军林彪所牵制并包围，西北战场上的胡宗南主力被彭德怀西北野战军所钳制，阎锡山的山西军队被晋绥野战军锁死在山西一带。

那么，从战略上讲，一旦华东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被歼，那么蒋介石手里就没有能打仗的精锐了。

难道指望那个一直和他作对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吗？

那时候，甚至连南京都没有军队保护，因此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所以，蒋介石主张放弃徐州，是当时最可行也最合理的方案。

可是，在东北辽沈战役上犯过的近乎荒诞的错误，又一次在淮海战场上重演了。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同蒋介石的意见出现了完全的冲突。

他们认为，不应该放弃徐州，而是应该利用好徐州的坚固工事，集中兵力与共军决战。

在国民党的国防部会议上，蒋介石的退守淮河以南的计划被否决了，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蒋介石的话，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有分量了。其中，尤其以黄百韬和邱清泉，坚持要固守徐州，认为国军把那么大一个城市主动放弃，必然招来嘲笑，且在徐州战场上，我们有 70 万大军，粟裕加刘伯承也就 60 万人马，怎么就被吓得退守淮河一带呢？

况且，我们还是凭着徐州坚固工事，被共军那么一吓，就吓跑了，以后还怎么打仗？

这两个人叫嚣得最厉害，却也是淮海战役打响后，死在战场上的国民党最高级别的将领，这就是命吧。

而另外两位孙元良和李弥，是同意蒋介石的方案的，这两货最后居然在先后在混乱的战场中，化妆逃了出来。

原本向这种兵团司令与统帅之间有不同意见是时常发生的事情，可是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则可以很快经过讨论和协商，达成统一的意见和意志，快速准确的先实施起来。

而一旦发生在国民党内部，则变成一场无休止的论战，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成为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

此事，就刚刚在辽沈战役中发生过，沈阳的卫立煌始终不同意蒋介石的意见，最后又带着情绪被迫实施临时计划，结果处处受制，处处被

动，谁的计划都没有被准确实施好，最终导致灾难性的事件发生。

而此时，同样的事情，又立刻在淮海战场上重演，最终争论的结果就是蒋介石的计划没有被实施，同样的固守徐州的计划，也没有被统一实施，因此灾难性的结果已经埋好了第一个因素。

三、

为了能够更统一指挥徐州战场上的战役，老蒋把杜聿明调来了徐州，随着华东野战军开始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淮海战役算是正式打响了。

驻守在新安镇附近的黄百韬集团，一共有近 12 万人，当他发现了粟裕要将其包围全歼的时候，便开始准备要退守徐州，执行他那个固守徐州的军事计划。

原本，即使不按照蒋介石所说的退守淮河南岸，但是只要所有国民党军事集团全部抱团取暖，都固守到徐州附近，相互支援，那么解放军想要歼灭他们也是千难万难，因为你无法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可是，即使是这个计划，最后的结果是，也没有被实施好。

黄百韬带着第七兵团，已经开始准备要退守徐州了，这个时候粟裕正担心，一旦让他们进入徐州，那么再想分割包围就困难了，而且徐州附近国民党军各兵团较为集中，邱清泉和李弥都可以随时增援照应，

那时候仗就不好打了。

可是这个时候，因为国民党内部意见原本就不统一，大家意志不一致，于是蒋介石就帮了粟裕一个大忙，给粟裕送人头来了。

他命令黄百韬等待新安镇以东的一个军，因为他认为粟裕首先的攻击目标就是那个方向的第四十四军，需要黄百韬在必要的时候作出增援，所以就暂时不要撤退到徐州。

蒋介石这个命令已经是昏了头了，你怎么能让一个兵团，去等待一个军呢？

一个军的风险和一个兵团的风险比起来谁大？

就是因为蒋介石的这个错误判断，结果使得黄百韬兵团延缓了近两天的撤退时间，而恰恰就是这两天，粟裕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

这种荒诞的错误，就在国民党集团内部发生了，且这种荒诞的错误已经在辽沈战役中发生过。

这是为什么？是蒋介石完全昏头了吗？

这其实只是表象，没有谁会愚蠢把这种低级错误，且关系全军生命的错误，连续的不断去犯。

发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内部的决策系统，此时已经遭

遇严重的破坏。

所以，才有这种近乎荒诞的错误，接二连三的发生，不仅是辽沈战役中，淮海战役中，这种错误也不断地继续地发生着。

在随后的无数决策里，这种荒诞的决策屡屡可以看到，简直会让你怀疑蒋介石才是我方最大的卧底。

原因就是此时的国民党决策系统已经崩溃，因此作出的决策就不可能再符合实际情况了。

我们都知道，一个决策的诞生，不是谁拍脑袋来的，而是经过对战场信息的收集，然后经过高层系统进行信息的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过程。

然后将分析的结果，形成统一意志，大家去执行。

在执行中，如果不符合实际情况，再将新的不符合的信息传输上去，再加以综合分析，由此形成应对客观情况的种种决策。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最重要的是，所有人的目标一致，个人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

否则，这个决策系统，就必然会因为大家利益不一致，而出现无法统一意志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局势恶化下去，大家就会互相猜忌，互相不信任，于是收集上来的信息也将出现不全面，各怀鬼胎的信息，因此导致决策系统无法作出准确识别，因为谁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

去选择性的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样一来，决策系统就无法客观接受信息和分析信息，它就会遭到破坏，作出的决策就必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纠正，那么整个决策系统就会遭到破坏，一旦积重难返，那么任何人都无法作出准确合理的决策了。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各种荒诞离奇，近乎愚蠢的决策不断发生。

这就是决策系统遭遇破坏的严重后果。

黄百韬看到自己被合围以后，说了这样一段话：“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果垮了，什么都输光了，那将来怎么办？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恩，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可苟免的了，请你转达总统，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的指示奉行到底，我们则是阳奉阴违。”

其实，底下的阳奉阴违，就已经决定了国民党的决策系统必然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了。

四、

当粟裕对黄百韬发动猛烈攻击的时候，前来增援的侧翼李弥、邱清泉部，又发生了同样的类似辽沈战役时的情况。

也就是前来增援的部队，遭遇了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阻击。

明明知道自己的部队远远多于对方的钳制部队，可是就是怎么也打不进去。

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解放军斗志顽强，作战勇猛，其战斗意识远非国军可比。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阻击部队的背后，往往有强大的民兵和支前民工。

这些支前的农民们组成了强大的后勤部队，使得作战的士兵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些百姓把粮食运到前线，又帮助把伤兵抬下火线并照料他们。

解放军不用担心饮水、粮食等等问题。

据战后统计，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一共发动起来的群众，组成的支前民工达 543 万人，其中随军常备的民工有 23 万人，二线转运民工有 130 万人，后方临时民工，有 391 万人。

这是什么概念？

换句话说，淮海战场上 60 万解放军战士，整场战役下来，每个战士平均得到 7-8 个支前民工的照料。

国民党军不仅是同 60 万正规军作战，也是在同后面的 500 多万百姓作战。

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大家可以想象，即使除去临时民工，也有 100 多万民工在整个战场的不同阶段，赶往前线，给战士们送水送粮，帮助安排伤员，帮助处理各种后勤事务，这是多么可怕的力量？

所以，其实从最初的解放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屡见不鲜了，我们的钳制部队的力量总是超出了任何人的估计。

因此，才不断地保证了初期我军始终可以实现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弱部的可能性。

因为不用担心敌人增援，反而将自己包围，就是因为群众发动起来的钳制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五、

黄百韬军团被粟裕围歼了，他临死的时候，对手下一个军长说：“我年老了，而且多病，做俘虏我走不动，而且难为情，我牺牲以后，使别人知道还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或可让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过来。”

黄百韬兵尽粮绝之后，开枪自杀了。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任务，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完全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已经包围黄百韬集团的时候，粟裕已经可以预测到未来战局的发展。

于是，他首先提出了，在歼灭黄百韬以后，可以集中兵力将所有国民党军队堵在徐州，然后将其全歼。

这一次，就明确的将“小淮海”转变成“大淮海”正式提上了作战计划之中来。

毛泽东也已经预测到了淮海战役的衍变形势，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最终将整个徐州一带国民党军尽数围歼的战役计划就此敲定。

但是要实现这个计划，就需要将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起来，方便统一指挥和部署。

解放军的配合从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不像国军那样矛盾重重，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接下来的后勤问题和居中协调的问题。

因为随着战役的进行，必然会有许多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那时候加上原本合并的两军，国民党军的俘虏等等，一下子吃饭的人就会超过百万。

这个问题必须要组织专门的机构来解决。

而且解决这件事的人，不能是亲自负责指挥战役的人，比如粟裕、刘伯承就不行，因为他们有繁重的作战任务、不可能抽身处理这些事情。

同时，这个人应该要做过政治工作，这样能够很好的处理好后勤和俘虏的安排问题。

其三，这个人还需要有一定的威信，能够很好的处理居中协调如此庞大军队的各种任务。

大家可能已经能猜出最合适的人选了，对的，这个人就是中原野战军的政委，邓小平同志。

为了更好的处理好接下来后勤、协调问题，毛泽东亲自指示成立了一个总前委，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前委书记，负责淮海战役接下来因为扩大而带来的协调和后勤问题。

这样一来，淮海战役的部署就比较完善了，待黄百韬兵团被围歼以后，中原野战军把目标锁定了黄维兵团。

这个时候，同样发生在辽沈战场上的事情再一次重演，黄维兵团被围以后，曾经尝试突围，他组建了四个突围师，准备找准一个点，突围出去。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四个师里面，就有一个师的师长是我们的地下党。

这个人叫廖运周，他随即带着这个师到了我们队伍里来，这一下子给黄维的心理打击是致命的。

因为，这个时候，不仅蒋介石，位于徐州的杜聿明也开始有了撤退徐州，转军淮河以南的想法。

这就是最初蒋介石提出的方案，可是这个时候再执行，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全歼，黄维兵团被围困，其实已经非常被动了。

原本，在战役中，制定的方案是黄维兵团，同杜聿明集团下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一起夹击共军，在徐州一带决战的，可是现在又改变了一个计划，杜聿明集团下的三个兵团要撤退了。

原因很简单，随着黄百韬被歼，黄维被围，战局已经急转直下，蒋介石不愿意冒着风险与共军决战。

因为，一旦杜聿明集团覆灭，华北的傅作义也很难幸免，西北胡宗南也没有多少力量，蒋介石就再无精锐了，相当于国民党集团就要覆灭，南京都没有力量可以来保证了。

白崇禧虽然还有一定的力量，可是那支军队不是蒋介石可以掌握的。

所以，从一开始，其实蒋介石就不愿意守徐州，可是因为大家意见不统一，最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就是黄百韬覆灭，黄维也在所难免。

这两个兵团加起来，有二十万以上的人马。

可是，现在老蒋还是要弃车保帅了，在增援黄维和全面撤退徐州的选

择之间，老蒋还是选择了全面撤退。

但是还记得我们上面说过吗？蒋介石的决策系统已经彻底紊乱了，如果这个时候，严格执行命令，全军退守，抛弃黄维兵团，那么至少还可以保存杜聿明集团下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这仍旧是一支强大的主力。

可是，正在杜聿明准备全面撤退的时候，蒋介石那边又变卦了，他在杜聿明集团开始撤退的途中，又让杜聿明派兵去增援解救黄维兵团。

杜聿明之前在同蒋介石商议的时候，就明确说，要么就狠下心在徐州打一仗，要么就决心后撤，不要管黄维兵团了，千万不要再中途变卦。

可是，蒋介石的命令还是那么猝不及防的来了。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对于杜聿明来讲，蒋介石何以又要中途变卦，他已经没兴趣知道了。

因为这个时候，决策系统依然崩塌，所以任何荒诞的决策都有可能出现，这已经不足为奇了。

可是问题在于，此时的杜聿明如果坚决不执行这个命令，带领部队全面撤退，固然是一个较好的办法。

可是谁敢保证，在撤退途中，就不会遭到解放军的分割消灭？

如果撤退以后，军队保存下来了，老蒋自然也不会说什么。可是，万一，最后既违背了蒋介石的命令，又没有把撤退的军队保存下来，那后果谁来承担？肯定是他杜聿明啊。

而如果执行了老蒋的决策，那么全面撤退的机会就再也没有了，那时候同样是有全面失败的危险。

怎么选，杜聿明表示痛苦万分。

就是老蒋的这个命令，使得全面撤退的徐州军事集团暂停了下来，这一停，就是致命的，等后来大家再想撤退的时候，再也来不及了。

这时候就连被围住的黄维兵团，也已经察觉出来老蒋的决策已经完全紊乱了，他这样说道：“我们对蒋的指示，感到莫名其妙，以为蒋的方寸以乱，已经没有整个部署，而是零碎应付了。”

这个时候，其实整个战役中，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已经注定了。

随后，黄维兵团被歼灭，紧接着，杜聿明集团也先后被歼灭大部。

为了更快更好的解决杜聿明集团，最后毛泽东写了一封电报：

就是收录在《毛选》第四卷里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没过几天，1948年就过去了，这一年的年底最后一天，蒋介石的一位幕僚帮助他写下了一封《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文中羞涩又委婉的表达了想要跟共产党和谈的想法。

而在同一天，毛泽东也写下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文中不仅彻底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在这场战争中的种种所做作为，而且重点展望了1949年的美好前途，这一点恰与蒋介石的黯淡失意形成强烈对比。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结尾写到：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这篇新年贺词的题目，最后成为了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要口号。

1949 年刚过去十天，也即是这一年的 1 月 10 日，淮海战役结束。杜聿明被俘虏，关进了解放军战犯管理所，1959 年被特赦，成为文史资料研究室的文史专员，他有一个女婿，这个女婿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叫杨振宁。

孙元良化妆逃跑了，这个人后来去了台北，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很有名，叫秦汉。

李弥也在混乱中逃跑了，后来去了台北。

邱清泉死于这场战争之中。

黄维被俘虏之后，关进了战犯管理所，后 1975 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

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

淮海战役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因为此时蒋介石的所有精锐之师，已经基本被消灭干净了。

在另一个战场，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也已经开始了。

以上历史，就是《毛选》第四卷中，为什么会有《敦促杜聿明集团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等文章的由来。

而蒋介石之所以不断地重复上演同样的错误，是因为此时矛盾的发展已经很难通过创造外部条件，去使得它朝着预期的可能性发展了。

当整个系统紊乱到积重难返的时候，个人的意志就会显得非常渺小，于是各种荒诞的决策都会诞生，这本质就是系统崩溃的前兆。

第十八篇——平津战役

一、

平津战役是在没有过多悬念之下结束的。

那时东北国军已经被全歼，林彪此刻已掌握着百万东北野战军，只需要待他修整完毕，便可南下入关，与华北野战军联合歼灭傅作义集团军。

我们在淮海战役的时候说过，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存在的问题，同样的在淮海战役中表现出来。

是的，大家丝毫不用觉得难以预测，同样的问题会在平津战役中再次重演。

因为，以上国民党集团面临的种种矛盾，已经发展到完全不可调和的阶段，因此只要爆发战争，这些问题就要在战争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要这些矛盾不表现那是不可能的。

就好像一个人的思想形成以后，也一定会在行动中以各种各样的形态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思想要表现资产阶级的行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表现无产阶级的行为。

所以，其实平津战役的整个过程，完全可以说还是辽沈和淮海战役的再次重演。

这个重演过程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出这样一个模板：

首先：领袖蒋介石与战场主帅之间，意见发生矛盾，然后主帅想尽各种办法抵制执行老蒋的决议，辽沈战役时的卫立煌拒绝南下锦州；淮海战役的杜聿明、黄百韬等拒绝撤退到淮河以南；平津战役中傅作义也拒绝将军队撤出华北，都是这种矛盾的重演。

紧接着：主帅们制定的所有军事计划，第一时间都会被地下情报人员想办法先送到解放军司令部。

然后接着：当解放军瞄准一个主力军，开始准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时候，来增援的部队一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击，从而导致增援不力，最终被各个击破。

最后：当全军陷入混乱以后，就开始讨论是突围还是固守，还是投降，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往往都没有结果，于是进一步陷入被动。

最终结果：要么被全歼，要么起义投诚，始终避免不了被快速歼灭的命运。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总是不断的重演？是不长记性吗？是不懂的悔改吗？

不是的，原因就在于国军这种内部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且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所以就会不断地重演、不断地重演。

比如，领袖与主帅、将领之间的矛盾，此时已经无法通过创造外部条件，来促使矛盾朝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了。

所以就只能看着这些矛盾在不同的战役中，以几乎一模一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

所以关于平津战役的过程，实在没有什么好解读的，但是其中几个具体的事件，区别于另外两场战役的一些内容，却值得细细品味一番。

当时辽沈战役还在进行当中，守在华北的傅作义知道东北迟早是保不住的，所以他不得不认真思考华北的未来。

只不过，辽沈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东北国军会溃退

得那么快，战役会结束的那么快。

在辽沈战役还在进行的中途，傅作义想了一个计划，派出两支精锐部队，去偷袭华北军区司令部和位于华北的西柏坡中央司令部。

那时候，不管是华北军区还是毛泽东所在的西柏坡中央，确实都存在兵力空虚的状况，如果行动及时且隐蔽的话，还真的会带来巨大的危险。

可是，我党的地下情报工作非常强大，傅作义的计划几乎第一时间被传递到了共产党内部。

就在这两支偷袭部队还在半路上的时候，我党已经将他们的偷袭计划公布在了《大公报》的报刊上。

上面写着：“傅作义派郑挺锋、刘化南、刘春万、鄂友三、杜长城妄图偷袭石家庄。”

这一下子，不管是去偷袭的部队还是傅作义本人全傻眼了，这还在半路上走着，对手就已经公开在报纸上把国军的偷袭计划给公布了，这还偷袭个屁啊。

其实，当时收集到这个情报的，是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傅作义集团里的一个很小的人物，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甘霖，平时负责一些印刷、刻板的工作。

结果，这份偷袭计划，当时被拿到印刷室刻印了好几份，于是就这样，

所谓的绝密偷袭计划，就被传递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有趣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当时仍旧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虽然他们的偷袭计划已经没有了隐蔽性，可是华北军区的司令部，那时候确实防守极其薄弱，如果他们孤注一掷，继续前进，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写了一封十分高明的电报，这封电报不仅极度蔑视了这种偷袭计划，而且把前来偷袭的军队和傅作义都吓出了一身冷汗，直接促成了偷袭部队的撤退。

这封电报以广播稿的形式四处宣扬，内容如下：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的，在两个星期内，已经由他送掉了东北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也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没有什么无颜见江东父老的羞耻之心，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来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加上坦克和爆破队，真是异常勇敢，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还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 208 师在那里，平绥线上也只稀稀拉拉几个兵了，总之蒋介石整个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集团，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他们却还在那里做偷袭石家庄的美梦。”

这封电报高明之处就在于，毛泽东不仅把傅作义的整个部署、计划都

暴露了出来，明确告诉他们我知道你的偷袭计划，你尽管来吧。更关键的是，他点明了傅作义后方的危险，北平是很空虚的，你不小心的话，我也可以偷袭你。

这就不得不令傅作义胆战心惊了。

在这封电报广播出去以后，前来偷袭的国民党军再也不敢前进半步，随后解放军增援部队也开始朝着石家庄赶过来，于是他们匆匆放弃了这个偷袭计划。

三、

当平津战役进行的过程中，傅作义也知道自己独木难支了，而解放军思考的更多地是如何才能够既保存北平的百姓、文物，使得这个千年历史的古都不至于遭受战争残酷地蹂躏。

所以双方就有了和平谈判，解决北平问题的基础。

事实上，在傅作义最后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之前，他也有过诸多顾虑：

首先，起义到对方阵营以后，对方是否会不计前嫌，不追求其历史上的战争责任？

其次，北平、天津一带不仅仅只有傅作义的军队，而且也驻扎着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要是稍微搞不好，那么自己还没有起义成功，可能就先被蒋介石中央军解决掉了。

其三，自己的意识形态同共产党的理念完全不同，到了对方阵营以后，

会不会将来格格不入，甚至遭受秋后算账？

这些都是傅作义必须去思考的事情，但是同时，要他下决心突围撤退出去，他也决然不肯。

因为，他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之间始终有着一种难以融入的隔阂，到时候如果撤退到南方以后，自己一定会被蒋介石军队所吞并，那时候同样面临着难以预测的命运。

因此，他必须一边同解放军进行谈判，一方面准备撤退的事情，因为抵抗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了，他的主力中已经有一半在张家口和新保安两场战役中所消耗，此时根本无力再做任何有力的抵抗，如果不是因为北平人口稠密、城墙坚固、内有无数文物古迹，可能解放军就直接打进来了，不会磨磨唧唧的跟他谈判。

这场谈判十分精彩，我们后来都知道，我党把傅作义的女儿都给发展成预备党员了，其实当时还远不止他的女儿，他手下的九十二军军长黄翔被策动起义，他的铁甲车总队第一大队长于维哲也被策动起义，他三十五军副军长丁宗宪也被策动起义。

所以，在傅作义本人下决心之前，其实他手底下已经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早已被暗中策反，只待我军要进攻北平的时候，立刻就发动起义配合解放军解放北平。

最后傅作义终于决心起义，可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件极其考验智慧的事情。

傅作义表示：希望解放军暂时不要缴他军队的枪械，待日后一切妥当之后，他绝对不保留任何军队；

同时，为了迅速解决和平解放北平的任务，**可通电全国，停止双方开火，促成和平统一。**

他这封电报直接发给了毛泽东，并说道，相信毛泽东有这样的政治气度，不会急于要缴了他们的械。

可是，两天之后令傅作义完全没有料到的是，他的名字竟赫然出现在共产党中央所公布的一份战犯名单之中。

这一下，他心里绝望了，觉得似乎和谈无望，既然共产党已经把它作为战犯公布，那么自然就是要用武力解决北平问题。

这一下他的沮丧可想而知，但是随后毛泽东给林彪发了一封电报，才解释了这件事情的原委，和平解放北平仍旧要继续。

原来实际情况是这样：

毛泽东想到傅作义所处的环境，除了他自己的军队之外，还有十万人马是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此时如果公开宣布两军和谈，那么就等于将傅作义完全暴露给了蒋介石，那这样蒋介石完全有可能命令其嫡系部队攻击傅作义，那么傅作义就会有巨大的危险。

此前，已经有北平的和平民主人士遭到蒋介石特务系统的暗杀，所以

公布傅作义为战犯，其实有保护傅作义的作用。

其二，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但是不能因为过去之罪而抹杀近日北平之功，也不因近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所以该公布的还是要公布。

这封电报中写道：

“如何和平通电一发，他即没有了合法地位，他本人和他的部署都有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

“傅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就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的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是实际上，则和我们和谈，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者不经过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之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可编为一个军。”

从这封电报中看，我们就可以想见毛泽东之周密，考虑之细致是出乎很多人的想象的。

最后，和平谈判结束，北平也和平解放，为平津战役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自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终于完全奠定。

这是平津战役接近尾声的一个插曲，可是这个插曲其实反映出一个领袖对事物的把控能力。

我们思考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是很难思考得很完善的，但是我们应该要尽可能完善，什么是完善？

就是把一件事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全部考虑进去，不能只考虑一种可能性。

当你把一件事可能出现的种种变化趋势都考虑进去之后，再作出的决定，往往会合理且缜密很多。

这也是《毛选》中最常见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有过这样的观点。

一件事既要考虑成功的可能性，也要作好失败的种种打算，然后从其中的可能性出发，去争取最好的结果，预防最糟糕的失败。

平津战役结束，毛泽东率领解放军车队驶进东交民巷，毫无疑问，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是要强调这个新政权的独立性和其主权，藐视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直接控制下的外交使馆的独立地位。因为自从义和团被镇压以后，中国的军队只要走上这条大街，就是违反条约。可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时过境迁，中国再也不受这种屈辱条约的限制了。

第十九篇：新的和平谈判

一、

在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以后，国民党又开始寄希望于一次新的和平谈判。

这是蒋介石集团被逼无奈的结果，此时的他面临着的是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的巨大压力和矛盾，局势已难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在政治上，国民党的整个系统已经行将崩溃，这种崩溃已经蔓延到了最底层的统治机构和系统。

国民党统治区内，有平民百姓公然在各种商铺、工厂里抢劫物资，可是维持治安的警察根本不会去理会，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跟这群百姓一样去抢商铺和工厂。

这说明，国民党此时的统治机构，已经再也无法按照正常的秩序运转，其信用也已经崩塌到不能维持其基本统治的局势了。

不仅如此，蒋介石本人的信任危机也开始难以维系，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疯狂制造着蒋介石必须下野的舆论，因为国民党内部呼吁和平谈判的声音越来越高，而蒋介石自己心里明白，只要他一天还在台上，共产党就不可能跟他和平谈判，谈判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很“识相”的宣布不再担任总统的职位。

可是这个人偏偏又舍不得放弃自己手里的权力，在“传位”给李宗仁的时候，在文稿里写的是“**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你看，“让位”也让得不彻底，行文意思很清楚，李宗仁得到的只是一个代总统。

但是不管怎样，这都开始预示着蒋介石的统治已经不可能再按照其意志持续下去了。

在经济上，因为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消耗，国民党这些年疯狂的发行金圆券，通货膨胀的程度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1948 年，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 900 万亿，这些财政赤字体现在其所统治的各个地区。

上海的物价指数从 1946 年到 1949 年初，涨了近十四万倍，这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域，是其政治、经济的命脉所在，所以才是十四万倍。

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如广西桂林，粮食的价格比 1945 年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涨了近 27 亿倍。

大家从这个数值可以想象，这种通胀程度意味着底层的百姓根本就吃不上饭了，也绝不会用钱去购买任何物资，因为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它的价值可能还不如废纸。

百姓活不下去，因此只能逃离家乡，土地也自然由此而荒废。

同时，经济危机下，学生、教员、工人、手工业者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日甚一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了，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

军事上，三大战役将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消耗殆尽，此时的蒋军兵力已经从四百多万下降到两百多万，但是这些兵力除了勉强驻守之外，能用于野战机动的部队只剩下 140 万。

并且，这些军队信心动摇、士气不振，根本已经不可能对抗士气大振、英勇顽强的解放军了。

反过来，解放军的数量却已经达到了 400 万以上，且后面还有强大的民兵最为后备军。

外交上，三大战役末尾，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政策已经转变，他们认为：“全力以赴的援助国民党政府是一条规模巨大没有尽头和十分冒险的行动路线。”

虽然他们也不愿意共产主义在世界蔓延，但是他们此时已经觉得：“我们虽然反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并急于在中国帮助和制止此种蔓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失去本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这样做。”

美国的援助一旦中断，又将为蒋介石带来最后的一项致命打击。

所以，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此时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上都已经陷入崩溃，离彻底结束统治，已经没有太多悬念，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二、

在这种背景之下，国民党开始呼吁和平谈判，蒋介石把“代行总统职权”的代总统位置交给了李宗仁。

而李宗仁集团则认为自己似乎还有划江而治的可能性，其实他们压根就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共产党方面并不完全反对这种和谈，但是给出的谈判条件，却几乎可以说断绝了国民党最后一丝希望。

1948年底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成为后来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动员口号。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写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这篇文章回应了和平谈判，并提出了谈判的八项基本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八项条件就会明白，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注：关于这一条，共产党方面提供了一份战争罪犯的名单，其中蒋介石就是头号需要惩办的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注：关于这一条，废除国民党的宪法，那其实就意味着废除其统治的

一切法律基础。

三、废除伪法统；

注：关于这一条，就意味着废除一切国民党统治机器，也就是其政府、司法机构，执法机构、行政单位、政权机构、政府机构都随之废除。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其一切反动军队；

注：这就是要消灭国民党一切军事力量，一个兵也不留。

五、没收官僚资本；

注：这意味着要国民党代表的一切官僚买办阶级皆被废除，其中最大的就包括了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

六、改革土地制度；

注：这就意味着，一切地主阶级统治根基必须被全部废除，土地革命要好无阻力的继续执行。

七、废除卖国条约；

注：这意味着此前国民党的一切外交权力皆被废除。

八、号召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注：换句话说，此后一切国家大事，但凡是被认为是国民党反动分子的人，都不允许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从这八条谈判原则中可以看到，每一条蒋介石都根本不可能接受，因为这跟解放全中国，消灭国民党没有任何区别，何况是八条。

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可是李宗仁却还有希望能划江而

治的美好愿望。

但是共产党方面态度强硬，无论国民党是否同意这八条原则下的和平谈判，我人民解放军都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绝不会因为谈判而耽误了时间。

当周恩来拿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给国民党代表看过以后，张治中的第一反应是：“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口气。”紧接着，他知道：“完了，和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失败既然已经注定了，那么何必拖累国家和人民。”

于是，只要求“词句力求缓和，避免过于刺眼的词句”。

最后，周恩来拿出来一个定稿《国内和平协定》，并声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如果南京同意就签字，不同意我们马上过江。”

在八项原则上写出来的稿子，不管你怎么改，又怎么可能改出一个国民党能接受的方案呢？

1949年4月20日晚，李宗仁和何应钦复电：“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发起渡江战役。

在渡江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毛泽东为此写了一首词，就是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而在此之前的 3 月 5 日至 13 日，在中国解放革命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这段讲话中有一段耳熟能详的段落：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

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毛选第四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第二十篇：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

一、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的前夜召开的。

会议时间是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就从西柏坡转移到了北平，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了那段具有极其预见性的话：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

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这次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被收录在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其核心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夜，共产党要以怎样的政策、方针来应对接下来的局面？

这里面就包括了：

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

工作重心从乡村开始转移到城市；

在城市中要坚决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

继续开展土地革命；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开展外交工作；

应对新的和平谈判；

联合各界爱国人士，实行统一战线；

而这所有一切工作中，又以经济工作，即新中国的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最为重点的工作和需要探讨的内容。

因为像继续革命解放全中国、土地革命、和平谈判、统一战线，都是共产党此前已经有着极为丰富的工作，此时不过是告诫大家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完成最后的解放任务。

而外交方面，虽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可以在平等基础上同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毛泽东当时也很清楚，新中国的成立，其中本就包含着推翻帝国主义这一项重大革命内容，这意味着此前帝国主义与南京政府签订的种种既得利益的条约统统作废，我们将坚决不予承认。比如蒋介石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双边协定》、《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等等，那么必然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短时期内承认新中国，因此，帝国主义是否承认我们，并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此时还不宜着急去解决。但是只要在平等原则上，愿意同我们做生意，那么我们还是愿意同他们做生意的。

“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选第四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所以，其实外交方面，当时也没有需要过多讨论的空间。

后来，很多人说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有关门主义、排外主义，其实这种说法非常无知，不是我们关门，而是人家要封锁你，谁叫你革命打倒了帝国主义呢？

所以，按照那些人的说法，那意思就是不要打倒帝国主义，不要打倒

侵略者，让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肆意妄为，以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那才不是他们口中的“关门主义、排外主义”。

七届二中全会中，特别值得我们讨论，以及对后来一直有着持续争议和影响的内容，是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篇文章，主要讲讲当时的经济构想，以及对后来产生的种种影响，这样也方便我们理解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系列的经济措施。

二、

要理解新中国的经济构想，我们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只有建立了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属于什么范畴呢？当然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生产关系有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即是否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

地位，生产者之间是否平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第三，产品的分配方式（按生产资料分配、按劳分配、按需分配）

而这三个方面里，最为核心和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因为它可以决定着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形式。

很好理解，比如封建时期，地主拥有土地，那么自然决定了他们处于剥削者的地位，被剥削者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跟地主的平等，同理如何分配也就是地主说了算，而不可能真正的是农民说了算。

当然，农民起来斗争能够得到一定的地位和分配形式的改善，但是只要不触及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根本，那么这种改善都只是地主暂时作出的某种让步，不会从根本上触及生产关系中后两项的变革。

反过来，如果地主对土地的所有制变更了，比如开展了土地革命，农民手里有了土地了，不用再依附于地主而生活，那么后面两项生产关系里的内容，就很容易变革。

所以，生产关系起到核心决定因素的东西，只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

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亦或是封建主义，最为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也就是说，从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来讲，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在于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至于，这个理论后来是不是还成立，或者是不是被修改过，那么我们暂且不说，但是至少在毛主席时代，一直沿用的衡量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有了这个理论，我们再来看新中国的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方向，我们才可以看得懂。

那么，既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那么我们在变革生产关系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即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而后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构想，始终没有脱离以上两个基本观点，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而一切的斗争、一切的挫折，也始终是围绕在这两个基本观点之上的斗争和挫折。

三、

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即将开展的经济工作，作了这样几个方面的构想：
第一：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由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如果不坚持这一点，把革命的领导权、经济战线上的领导权交到了资产阶级那里，那么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所以，不管是革命战线还是经济战线，乃至一切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斗争，第一个核心关键的点，就在于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或者他们的什么党来领导。

第二：新中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国家，其必然还保留着封建时代的大量的个体经济、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个体手工业经济等等。

我们上面说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还保留着大量小农经济、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的时候，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盲目跨越到社会主义，即将一切生产资料全部公有，那么也会造成剧烈的社会矛盾，比如资产阶级会起来反对你，相应的社会制度还无法保证公有制经济的运行，意识形态领域也还缺少这种相应的公有制意识，那么种种矛盾就可能爆发。

所以，这种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个体经济，小农经济，必须经过发展、引导、组织、循序渐进的过渡，才能逐渐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第三：占国民经济 90% 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

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不能盲目的追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是按照毛泽东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构想来设计的。

其原理就在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不但不消灭资产阶级，而且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我们的土地革命也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这种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总是落后的，所以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把它们向着现代化，集体化引导，不能放任自流。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词语“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用得十分精准。

谨慎地意味着，必须坚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盲目着急的搞社会主义，只要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那么就不能算是谨慎。

逐步地，意味着这有一个过程，不能一下子跨越，只能是采取逐步过渡，慢慢调整的形式，否则也容易犯错误。

积极地，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努力去引导，不能啥也不做，任这种个体经济、落后的小农经济继续发展，否则再想引导那就很困难了，所以我们要积极地去做。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方向，如果眼下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适应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做的，不是放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是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引导个体经济、分散的小农经济，以及私有制经济逐步向着公有制发展，而不是放任自流。

这种态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很明确了，那时候虽然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还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必须有“节制资本”这样一条原则，也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发展，其发展是有利于国计民生事业的，如果反之，那么就要限制甚至制止它，放任自流是不可能的。

这种逐步引导，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逐渐把个体经济改造成集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在城市，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在，改造成了国营经济。

你可以说这种改造中存在着过急过快的现象，需要调整得更合理，更符合实际一些，但是你不能说这种改造不对，否则那就不是朝着社会主义前进，而是朝着资本主义前进了。

第四：彻底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一切资产；

这一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革命的一个内容，而且在经济层面上讲，一旦新中国没收了这些官僚资本，并掌握了这些官僚资本财产，比如铁路、矿山、国有银行等等，那么它的性质其实就变了，从以前国民党时期的私人财产，变成了新中国掌握的公有制财产。

比如以前属于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财产，就变成了共产党掌握的属于国营性质的公有制财产，这种公有制具有全民所有的性质，所以也可以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财产。

这一部分经济，实际上就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因为它是属于公有制的。虽然当时这一部分财产只有全国产值的 10% 左右，但是一旦共产党掌握，那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不再像以前，属于蒋介石或者某个人的了。

这一部分经济，往往都关乎国计民生，所以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实际上保证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有利于实现上面所说的，逐渐把私有制经济引导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上去。

第五：因为还处于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没有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要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事业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

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毛选第四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也就是，在新中国还处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实际上是要在一定限制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

这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盲目无序的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又不能不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忽视了第一点，会犯左的错误，忽视了第二点，会犯右的错误。

第六：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新中国必须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先进的工业国，没有工业化的建设，那么谈经济的发展是不切实际的。

而要实现建设强大的工业国，就必须处理好同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原则就是必须要有贸易统制。

这个贸易统制，就是说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在平等贸易的原则下来恢复和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这是因为新中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上脱胎出来的，如果贸易不能被很好的规范和统制，那么就可能出现国民党时期的，在贸易中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满足资本家和买办的利益，从而使得国家的工业化、

现代化都发展不起来。

第七：苏联在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是可以很快的。

四、

好了，以上是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部分所做的报告的核心内容。

我们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其中关于土地革命、解放斗争、统一战线等等，都是已经很熟悉的工作了，以前我们也对这些内容都有过单独的分析。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主要分析一下其中关于经济建设的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内容，将会为我们将来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史提供很好的根据。

因为实际上，后来的经济建设，就是照着这个构想去实施的，其中有吻合的部分，也有不吻合的部分，但是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对照，看看后来的经济建设和当初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构想到底有什么差异。

我们可以说，在毛选第三卷里讲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内容，承接到七届二中全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朝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设想，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切都是连续的，不是割裂开的。

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中，关于经济建设的构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新中国建国初期，有三年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是因为我们就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来的，我们当时的一切制度都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制度。

其二，到了 1953 年，经过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后，我们为什么要逐步地的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只要条件允许，我们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是一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只有如何保证平稳过渡，也就是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谨慎地、逐步地过渡，不要因为着急而犯错误的问题，没有过渡还是不过渡的问题。

其三，如果过渡到社会主义早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调整，甚至暂时恢复到新民主主义呢？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原则，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恢复就像打仗一样，暂时的撤退是为了将来的进攻，暂时的弯路，是为了将来的直路，暂时的放弃，是为了将来的拥有。它是一个辩证关系，而不是说，过渡到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否定了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里面是有很多原则性的问题的。

事实上，这也是毛主席一直坚持不能动摇的东西，即是说，你可以调整社会主义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慢慢改善，但是你不能说丢掉社会主义旗帜，这是一个底线和原则，这个底线和原则从七届二中全会就可

以看得出来了。

这也为后面我们解读建国史打下一个基础吧。

第二十一篇：如何当好一个团队领导

一、

第四卷有一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文章开头就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其实就是把如何当好一个小型团队的领导的工作方法作了讲解和分析。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首先，什么是团队的领导？

很多人认为领导就是颁布任务，如果说领导只会派任务，定指标，搞命令主义那一套，那就不能叫领导，只能叫派发员。

所谓领导，就是要带领着团队达成既定的目标，要完成带领团队完成目标的任务，那就必须要有提出方针、策略、计划、办法的能力，因为有了方针、策略、计划、办法，任务才可能完成，否则团队成员靠什么去完成任务呢？

所以，之所以叫“领导”，是因为你有带领着团队成员完成任务的义务，而不是只享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这一点是首先要明确的，然后我们才来看看这篇文章中总结的一些具体方法。

1，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注：团队成员把问题都摆到桌面上，这一条在今天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团队里不要搞神秘化，成员之间要互相谅解。这要领导自己有意识的培养这种风气，自己带头做起，才能收到效果。

2，“互通情报”。

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注：团队成员互通情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也取决于不同行业，不同工作性质，因为企业毕竟跟共产党组织不一样，企业成员有竞争关系，有业绩竞争的可能。但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是要尽可能培养这种精神的。

比如像产品部，设计部，市场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培养这

种团队文化、团队氛围，把业绩间的竞争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营造一个好的氛围，对所有成员都好，这一条可以作为一种团队文化，有意识的去培养。

3，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注：这一段我全文引用了，因为实在是太过经典。作为领导，只要不摆谱、不觉得领导和成员之间有一种等级上的高低，而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跟团队成员相处，那么才有可能建立起一种“不耻下问”“互相讨教”的氛围。

按照教员的说法，老师也要向学生请教，何况是领导。因为按照民主

集中制原则，领导的信息往往也来源于下属，如果没有这种氛围，不但于自己作出决策、判断，制定规则、方法等不利，而且下属搞不好还会欺骗你。

4，学会“弹钢琴”。

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注：这里就是一个抓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的方法。主要矛盾是重点，但是次要矛盾不能抛弃，必须统筹兼顾。

5，要“抓紧”

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注：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6、要做到“胸中有数”

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考验一个人是否了解实际情况的标志。

有时候，很多事情讨论的时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对事情的性质、严重程度估计不同。道理一听都是对的，但是因为心中无数，所以判断和把握不同。

就像开车，刹车、离合的作用你都知道，但是没开过，就掌握不好度，

那就容易翻车。

胸中有数，来源于领导自己亲身的实践、调查，不能当口头司令。

7，开会要事先通知

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8，“精兵简政”。

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9，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10，力戒骄傲。

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11，对团队成员要有十分的了解

团队成员往往复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做事风格。

一个团队，固然要有统一规范的纪律，但是在这之外，必须对每个成员的个性有所了解。

用教员的话说，要估计他的成绩和错误，一个人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有了这种估计，那么才好对每个成员有深刻的理解，做到奖惩分明，任务派发合理，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帮助他做好自己的工作。

说起这个，网上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案列吗？任正非说他们公司有一个科学家，整天也不知道他干嘛，也不知道他计划怎么干，这个人又不善沟通，不善于打交道，任正非给他发信息，他只会回复恩、啊、哦之类的，结果这个人放在那里十多年，突然有一天他宣布把 2G 到 3G 的重点算法突破了，就这一下，华为在这个技术上就领先全世界了。

这个案列是任正非采访时说的，大家可能觉得他格局大，或者公司有

钱，原意投入研发。

这些肯定是对的，但是公司对于这个人肯定有相当的了解，如果说他的团队领导对这个人不是有足够的了解，公司也不会那么啥也不管的放他在那里十几年。

结语：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篇文章，是非常实用的管理技巧，虽然运用的对象和体制不一样，但是核心思想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第二十二篇：读《论人民民主专政》

新中国即将成立，伴随着共产党执掌政权，就会有很多对于共产党理念并不了解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国学者、以及一些民主党派的爱国人士、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基层干部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等，他们会有很多的疑惑，这些疑惑涉及方方面面。

比如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共产党的建设理念，于是乎就有人提出种种询问和质疑。

“你们独裁”，

“你们不民主”，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帮助，可是你们总是刺激英美国家”，

“你们如何对待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工厂、资产？”

“人民，人民指的是哪些人？”

因此，为了回答这些质疑，为了把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讲清楚，毛泽东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即：《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

什么是国家？

为了解释清楚为什么共产党要代表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把共产党人的理念中，国家是什么讲清楚，只有清楚了国家是什么，才有可能理解人民民主专政。

什么是国家？

文章用一句话解释：

“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段话直接点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基本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这一点我们此前也说过，国家法律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国家机器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但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不同，资产阶级是想要永生永世的统治下去的。

而无产阶级国家，是为了在阶级专政的过程中，逐步的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所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而实现共产主义。

所以，从理论上讲，如果有一天阶级消灭了，那么作为阶级统治的工作——国家机器，自然也就随着其作用的衰退而消灭了，当然也可能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机器，比如起到调节内部矛盾、管理社会资产等完全为人民服务的机器。

解释清楚什么是国家，是理解共产党的一系列执政理念的最基本要求，因为它所有的政策、纲领、以及后来所颁布的宪法，始终都是围绕着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来行使其功能的，不理解这一点，忽略了这一点，其实是看不懂里面具政策背后的含义的。

二、共产党的由来

国家是什么解释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共产党是怎么来的？

今天稍微熟悉一些党史的自然不会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疑惑，但是那时候生活在民国的很多人，尤其是除开解放区的农民、工人，以及知识分子之外的人，他们都是不久之前还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下，接受国民党宣传的人，所以他们对于共产党，对于他们自己刚刚经历的改天换地的历史，是当局者迷的。

怎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国家就换了主人了呢？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党派？他们是怎么赢得胜利的？他们会怎么对我们？

伴随这些疑问，那么就要说明一下共产党的历史和由来。

因此《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了这样一段历史：

共产党不是突然出现的，从鸦片战争开始，那些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和探寻国家的出路，找寻富国强民的思想、理念、方法。

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一路走来，统统都失败了。

这里面或因为是没落统治阶级的自救，或因为所依靠的阶级力量不足，或因为领导者投降叛变到地主、买办阶级等等。

总之，种种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理念最终都破产了，中国始终处于黑暗之中而看不到希望。

这一轮寻找下来，中国的历史自鸦片战争开始已经过去了八十年。

此时，量变开始朝着质变转化，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迎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此前种种思想和理论的尝试与破产，一群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时候，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一大批青年人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随之中国共产党便成立了。

所以，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部分，在五四运动之前，也就是马

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前的革命单独看作一部分，而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这之后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被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

起初，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与国民党之间有了第一次合作，孙中山也欢迎这个革命，孙先生说过：“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但是实际上，此时孙中山所说的唤起民众，指的不过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去唤醒，但是实际上由于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下的软弱性，他们是无法承担这一历史责任的，只有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这一的历史责任。同时，孙中山指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世界上其他国家。

原因就是长时期以来，帝国主义是不会平等待我们的，他们带来的只有殖民式的剥削和掠夺，所以一切与其他国家的联合必须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

但是没多久孙中山去世了，蒋介石在北伐胜利以后，随即倒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怀抱里。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能独自开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直到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随后共产党终于在今天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而中国共产党的“在国内，唤醒民众”，指的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结

成国内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在孙中山所说的“在国外，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在共产党此时的条件下，就是：联合苏联，联合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

三、

那么接着有人就说了：“你们这边倒，倒向了苏联。”

因此文章给予回答：

“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后来历史学家对此颇有争议，说来说去，还是旧调重弹，指责毛泽东时代只会一边倒，后来甚至一边倒都困难，因为和苏联关系破裂。

其实，没有人愿意一边倒，而是中国的历史告诉他们，必须在平等、保持主权领土完整的基礎上去跟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发展各项事业。

只有什么人认为可以牺牲主权、抛弃平等外交去谈“不一边倒，”“不封闭锁国”呢？

只有一种人，那就是跟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的买办。

而新中国后来的历史不是证明了，正是这种一边倒，倒出来了工业化，

倒出了四三方案吗？

又有人说：“你们太刺激了。”

说这话的是指共产党人对官僚资本家，反动地主、以及帝国主义买办的政策太过火了。

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这样，不刺激它也是这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还有人说“我们要做生意”

言下之意，还要继续跟以前的买办、地主、还有帝国主义国家做生意，你们这么一搞，生意没法做了。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回答是：“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以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这个回答也很清楚，我们是要做生意，但是必须在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做生意。

又有人说，“那我们不需要援助也可以。”

其实，援助还是要的，那时候能够平等对待我们的世界大国中，只有一个苏联，而且中国的发展，包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都是属于世界革命浪潮的一部分。

所以，必须联合苏联开展国家建设。

而历史证明，我们最初的工业化、国防现代化，确实是苏联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

还有一种说法：“你们独裁”。

这个说法，在小说《亮剑》里，李云龙家岳父就表达过这种说法，意思是缺少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

其实，历来的自由都是相对的，国家既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就必须站在其所代表的阶级上来规定一定的民主和自由。

资本家有了压迫劳动者的自由，就没有劳动者反压迫的自由，地主有收租和规定地租的自由，就没有农民耕地发展生产的自由。

所以，国民党要建立大地主、大买办的专政独裁，我们自然也要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独裁。

但是这里面却又有本质不同，无产阶级的独裁，是为着消灭阶级，消灭独裁，消灭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而努力的。

反过来，资本主义的独裁，则只是为了少数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资本家服务的。

四、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

所以，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

通过上面的历史简述、相关问题的解答，我们已经可以形象地看到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这个国家是这样的：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

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为什么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最后，提一下文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历来这个问题被很多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所忽略。但是实际上，它成为后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隐患，直接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个隐患，他后来一直努力致力于消除这个巨大的隐患，可是终于还是没有成功。

文中有这样一段，大家去看一下：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

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后来开展起来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其实就是对于把农民组织起来，改变其分散、落后的个人经济的一种探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那么上层建筑也容易坍塌。

但是上千年的封建个体经济，改造起来何其困难？毛泽东在此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困难，并用了严重二字来形容对于农民的改造和教育，以及对他们的经济基础的建设，即集体经济的建设。

这一点，其实为后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埋好了伏笔。

将来，我们会具体讲到这方面的内容。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起点来关注一下。

第二十三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序言：

第四卷就快要结束了。

本卷最后还剩五篇文章，分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

观的破产》。

这五篇文章是针对同一件事情所写的评论和发言稿。

这件事就是在 1949 年的 8 月 5 日，美国发表了讨论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白皮书，这卷美国发表的白皮书名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叙述从 1844 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到 1949 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时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

其实，美国之所以要发表这卷白皮书，首要原因是想甩掉自己在对华政策中援助蒋介石这一策略最终惨败的责任，因为历史此时已经完全证明，当初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策略是完全地错了。

所以，美国在这卷白皮书里，一方面大力抨击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意思就是说美国援华政策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蒋介石集团的无能，而不是美国的策略失误。逻辑是不是很奇怪？你找了个无能的扶植对象，难道不正是策略的失误吗？

所以，这份白皮书实际上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蒋介石第二天在日记中写道：“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国务院此种措施，不仅为其美国痛惜，不能不认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耻。”

这份白皮书不仅严重得罪蒋介石，同时也严重得罪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白皮书里所写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极度美化了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把侵略说成是“友谊”，把掠夺说成是援助。

同时，文章中大力鼓吹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说共产党是“极权主义”。

这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了某种文化入侵，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文章中就说：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你看，已经有了在中国文化入侵的对象和目标了。

正是因为这卷白皮书已经有了文化入侵的性质，有了拉拢中国一部分“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性质，所以我们才看到毛泽东如此的重视这件事，竟然一连写了五篇文章来批评美国的白皮书。

要知道，此时的新中国政权刚刚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很多知识分子中并不普及，所以美国的这卷白皮书，实际上对于共产党在刚刚解放的大城市中巩固政权、巩固意识形态方面是很不利的。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看到了第四卷最后的那五篇文章。

五篇文章除了反驳和批判了美国的白皮书，更为重要的是，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将他们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历史，将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的原因和历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剖析。

所以，我们学习这五篇文章，真正的核心应该是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历史的方法。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文章中说道：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但是，这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得出的结论，即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要用阶级斗争去解释历史。

而要真正理解好，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要理解阶级斗争里所包含着的最基础的矛盾是什么，因为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背后的基本矛盾。

所以，要理解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就要理解阶级斗争中所蕴含着的社

会最基本的矛盾。

什么是社会最基本的矛盾？

有两个：

其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其二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所以，我们接下来解读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原理，其实就是解读这两个基本矛盾的根本原理。

甚至可以说，第四卷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内容，就是我们从中学并了解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掌握分析历史的方法。

其实，分析历史，就是学会看待世界，因为一切事物都有历史，所有的事物发展，构成了世界，我们对它们的看法，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

如果，我们能理解好这两个最基本的社会矛盾，对于塑造我们完整的，成体系的世界观、认识论都是有极大意义的。

正文：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什么是生产力？

所谓生产力，是指人们改造自然，使其更好的适应人们的需要的物质力量，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不是简单的个人能力相加，而是个人生产力通过一定的结合方式，比如分工、协作、配合等，形成整个的生产力，所以其本质是社会生产力。

生产力有三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劳动者自然指的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是劳动。

劳动资料，是指用于生产具体产品的工具、设备等。

劳动对象，就是我们所加工的事物。

比如，一个人用一口锅煮了一锅饭，那么人就是劳动者，锅、电或者火就是劳动资料，米和水就是劳动对象。

二、那什么是生产关系呢？

生产关系是什么呢？它也有三个方面。

1、生产资料所有制，比如生产工具、工厂、机器、土地、原材料等等。即一切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归谁所有？是归个人还是归集体，还是归全民所有？这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2、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比如奴隶主和奴隶关系，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老板和雇工之间的关系，以及因为共同拥有生产资料所有只是社员们的相互协作关系等等。

3、产品如何分配。比如奴隶时代完全按照奴隶主的意志分配，连奴隶都是奴隶主的，封建时代按照土地拥有权，谁掌握生产资料，谁来分配，也就是按照生产资料分配，资本主义时代同样是按照生产资料

分配，只不过形式上更加进步。

而社会主义，原则上是按劳分配，因为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嘛，它区别于前面三个历史时期的根本点，就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换句话说，国家的土地、煤矿、稀土、钢铁原料、生产工具等等，理论上都是公有制，大家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取成果。因为劳动能力、个人能力、知识水平、技能水平不同，所以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而是按照劳动能力获取。

这就是社会主义原则上的按劳分配，那么很多人说了，这玩意你不好量化呀，个人能力怎么量化？

比如我负责挖矿，你负责种地，那这个成果怎么量化？而且，假如我是搞机械设计和生产的，那么我们在研究了新技术之后，生产了新的设备、开发了新的技术，那这个新的设备或技术，其实既是产品，也是生产资料，它是按劳分配给我自己呢？还是属于公有制范畴呢？

所以，实际问题非常复杂，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里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所以往往被资产阶级所利用来达到分化无产阶级的目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任何生产关系肯定都会有很多实行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你可以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去想怎么解决，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最基本社会主义原理。

从上面几项生产关系的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生产关系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其实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形式。

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有相应的分配关系。

所以，根本上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

而马克思理论，划分社会形态的根本依据就是社会生产关系。

怎么理解？

就是说，划分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根本依据，就是看它们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产，奴隶主拥有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奴隶本人，那么就是奴隶社会。

封建时代，地主拥有土地，拥有土地所有权，于是跟农民结成租赁关系，按照租赁土地的方式确定分配方式。

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拥有工厂、设备、原材料、而且处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有了大规模机器生产，因此必然又出现雇佣关系，以及相应的分配方式。

而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则生产资料开始变成公有，不再是私有性质，但是这里面也分为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比如以前的合作社，合作社成员组织在一起，生产资料归这个合作社所有，那么另外一个合作社成员就没有这种所有权。

社会主义理论上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是公有，但是又不完全是全民所有，而是分为不同的集体，有集体所有制的成

分。

那么像国营企业、国家掌握的生产资料、资源，则就属于全民所有，由共产党组成的人民政权按照计划来调节和分配。

到了共产主义，则理论上连集体所有也没有了，一切生产资料皆为全民所有，那是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

以上说了那么多，除了解释一下基本概念之外，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即衡量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体制，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根本依据在于其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看它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公有还是私有？全民所有还是混合了集体所有？

然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配合相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形式，来确定其到底是什么社会形态。

总结说就是：

生产关系才是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

生产关系才是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

生产关系才是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

而生产关系里面，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因此也可以说，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起着规定社会形态到底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作用。

二、

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

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是纯粹的某种社会形态。

奴隶社会实际上是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在奴隶社会时期，同样会存在着局部的原始社会形态，即使到了封建时代，考古学家们依然可以发现以氏族形式存在的某些部落有着原始社会的性质。

恩格斯在《私有制、家庭、国家的起源》一书里面，仍然描绘过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仍然有陆续被发现的氏族部落。

同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国家，仍然可以看到封建主义的经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一种生产关系往往以萌芽状态、统治状态和残余状态分别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

即使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依然可以看到封建时代的个体手工业经济，比如农村有些老人编织竹箩筐售卖、做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品，完全就是个体手工业的那种，这就还属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性质，当然，因为我们国家全面的土地改革，所以租种地主土地的现象，应该可以说是彻底的消灭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同理，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实际上西藏地区也存在着几乎奴隶时代的农奴生产关系，这些都说明任何历史阶段都没有纯粹的某种社会生产关系，因此也就没有某种纯粹的社会形态。

我们今天除了有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有集体生产关系，同样还有

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甚至还存在着封建时代的残余生产关系，这就是历史复杂性的一面。

但是，如何判断一个国家从总体上看，是属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呢？

同样的，看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起着绝对地支配作用。

如果说社会主义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并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它总体上是社会主义形态。

同理，如果一个国家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着绝对统治地位，起着核心支配作用，那么毫无疑问，它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三、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说过，衡量一个人的功与过，就看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是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还是阻碍了历史向前发展。

那些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进步的，我们认为是有功的，阻碍历史进步，开倒车的我们认为是有过的。

当然，人都比较复杂，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在某个阶段开倒车，但是另一个阶段就推动历史进步。

所以，一个人往往是既有功，又有过，至于是几分功，几分过，要作出具体评价、准确评价是很困难的，不过这是我们分析一个人功与过的标准，有时候具体怎么评价，只能交给历史了。

因此，如果我们把历史分为几个大的社会形态，从人类诞生阶级以来，可以从奴隶时代算起，那么将奴隶时代往封建时代推动的人，那就进步的，同理，阻碍推动的自然就是退步的。

移用到今天，那么我们的历史任务，自然就是把社会朝着社会主义形态推动，扫除还残留的封建社会形态，然后促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转化，这就是推动历史进步。

反过来，如果说的是把原本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反而推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就是彻底的开历史倒车。

当然，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既“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当下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因。

但是，这种生产关系总是要走向灭亡的，这是因为这种生产关系是伴随着它的对立面，即不断创造无产阶级，创造剥削和压迫而出现的，是不断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出现的。

而且，一旦有了资产阶级的存在，即使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它也是不会自己灭亡的，你不去推，不去革命，它绝不会自己跑出来，请让我们灭亡吧。

就像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不能发展生产力吗？
也可以啊。

但是当他们从进步阶级开始转向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阶级的时候，他

们会自己跑出来，说，请让我灭亡吗？

不会啊。

因此，这个时候封建社会就必然伴随着它的对立面起来反对它，推翻它，它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

这个反对它们，推翻它们的过程，就是阶级斗争。

而这种反对，这种阶级斗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发展到剧烈而不可调和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看到的暴力革命了。

所以，原则就是，在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尽一切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转化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上去，这就是推动历史的进步。

如果说，等到资本主义和其产生的对立面矛盾已经根本无法调和的时候，再去考虑将资本主义经济转化到社会主义经济，那么就只能有一种途径，就是痛苦的暴力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说：“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力，但是过程痛苦，而且时间要长”的原因所在。

那么，如何判断到底哪种生产关系，更适应国家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呢？

这也是很严肃很认真的问题。

如果说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以与之相适应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超前了，而不管

是落后还是超前生产力发展要求，其实都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表现，只要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就会随之而来桎梏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不能盲目地追求先进的生产关系的。

比如，在人民公社初期的时候，因为过于强调公有制，把个体所有制过快地向集体所有制靠拢，把集体所有制过快的向全民所有制靠拢，这就是刮起“共产风”的根源，过于的强调只有共产主义才可能实现的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自然也就导致平均主义泛滥起来，这就严重损害了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了生产效率的降低。

毛泽东曾经严重批评和纠正过共产风，就是因为很多人盲目的强调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即全民所有制，因此出现了一平二调，把集体所有制的财产也调拨去搞全民所有制，这就大大损害了集体成员们的利益，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所以生产关系当然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上是可以判断某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

原则是这样的：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原则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因此，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因为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也就是劳动者也就是人来创造的，所以劳动者是否具有以及多大程度上具有劳动积极性，是衡量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客观标志。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便由此而来，因为阶级的存在，因为阶级斗争的存在，因为不同阶级的矛盾的存在。

于是在现实的生产中，就必然会出现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的时候，便不利于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同理，有利于无产阶级积极性的时候，又常常会不利于资产阶级的积极性。

不仅如此，有时候，短期的积极性具有诱导作用，因为群众的视角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和服务。

比如，分田单干，就肯定可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是短暂的，是短期利益战胜了长期利益，是不合算的，但是农民有时候看不懂这些，也就容易在阶级斗争中败下阵来。

因此，就需要共产党来领导和规划，按照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进行统筹规划。

可是共产党也是由人组成的，有的地方就有左派、中间派、右派。如果其内部右派势力大于了左派势力，那么他们也会打着激发群众积极性、提高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的口号，来开展他们的阶级斗争。

因为群众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很难识别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

同时受个人短期利益的驱使，农民和群众反倒有可能站到了右派分子一边，为右派摇旗呐喊，从而使得真正的左派们陷于孤立，于是阶级斗争中往往就会失败。

这不是因为左派领袖的思想错了或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且群众还无法识别和把握自己的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因此力量对比差距过大，历史就出现了短暂的倒退和复辟现象。

因此，结论就是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是一件极其复杂而难以判断的事情。

它的判断难点不在于真的难以识别或统计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而在于另外两个原因。

第一：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存在一个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局部发展和整体发展，个人发展和集体发展的辩证关系。

群众总是容易被短期利益和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所局限的，这就给及时调整合理的生产关系增加了难度。

第二：因为阶级斗争的存在，就会使得一些人同样打着发展生产力的旗号，用短期利益代替长远利益，从中实现右派利益的最大化。

这就使得衡量和判断哪种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加大了难度。

综上所述：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因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始终要不断地去调整生产关系，以更好的激发和鼓励群众的积极性，通过群众的积极性去发展技术、发展科学生产，最终发展生产力。

理论上，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是很容易识别的，只需要调研一下群众的积极性，有短期利益冲突和长期利益冲突的时候，认真的跟群众解释和说服就好了。

如果很难说服，那说明短期利益此时也要兼顾，也很重要，那就适当调整生产关系，兼顾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就好了。

就像我们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化一样，既要工业化保障长期利益，又要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以适应长期利益的发展。

可是，为什么从历史上看，每次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往往伴随着暴力革命？明明改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一件难事啊？

根本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在于阶级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

封建时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必然损害奴隶主的利益，因此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反对，绝不会不经过斗争，他们就自然和谐的赞同封建时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规则。

同理，资本主义时代要反对封建时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必然要经

过斗争。

新中国也是一样，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也必然撼动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也是要起来反对的。

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后面我们会说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归根结底都会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说，阶级斗争始终伴随着自有阶级以来，人类历史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

所以，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那句话：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第二十四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一、经济基础

人类社会始终有两大基本矛盾：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这一章我们主要聊一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首先，理清一下基本概念。

什么是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也就是说，体现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延伸发展出来的分配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分工关系、经济地位关系等经济结构，以及由这种经济结构引起的就业、失业、工资、消费、交换等等经济活动，都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

井冈山上军队实行经济公开、实行供给制就属于其经济基础的范畴。

大家只需要记住，一切以生产资料所有制衍生出来的生产关系的种种内容，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

上一篇文章我们说了，任何社会、国家都不会纯粹的只有一种生产关系，往往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都有，谁占主体地位，那么这个国家就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形态。

我们国家之所以称为社会主义，并兼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因为理论上我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起着领导和支配其他经济形态的作用。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并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后，那么由这种生产关系而带来的阶级的分化，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诞生并逐步发展。

这种矛盾可以在居于领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支配下，得到更大程度的缓和、调整，但是缓和和调整的方法，不可能彻底解决这种矛盾，以往的阶级社会里，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为了本阶级的长治久安也往往实行某些改革，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但是这些改革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暂时缓解阶级矛盾，真正能解决这种矛盾的，只能是改变社会形态的社会革命。

二、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制度、设施、文化以及思想体系等内容。

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

政治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设施的总和，包括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立法、司法等，其实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就是国家机器。

观念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文化、宗教、哲学等，这些我们常常统称为一个名词——意识形态。

其中，我们之前解释过关于国家的概念，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或者单纯的机器。国家的本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意味着国家是阶级的国家，是不同的阶级在掌握着这些工具。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于其经济基础。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同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占据统治地位，就必然决定着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占统治地位。

反过来，上层建筑又通过调控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意识来服务自己的经济基础。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现实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却远远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不是简单地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比如，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表面上看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和比例。

但是，上千年以来的封建经济基础，以及近百年出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其上层建筑的极其巩固。

其中，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的三座大山，实际上是封建时期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

同理，在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的时候，推翻的也是其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

而意识形态领域的上层建筑却是极难推翻的。

换句话说，革命可以推翻旧的经济基础和与这种经济基础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但是却极难推翻与旧式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上层建筑。

而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旧式上层建筑，会反过来严重影响你构建新的经济基础。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最早认识到的人，就是毛泽东。

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所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尤其是其中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非常复杂和难以解决的。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这种矛盾就非常激烈，只要人民公社遇到一点困难，就会涌现出一股单干风、解体风、黑暗风，这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问题，是人民公社化，集体所有制真正的对手。

而同时，在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中，既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又有作为旧社会和新萌芽的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

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又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这样一来，不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尤其是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的

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本身的矛盾，就构成了一张十分复杂、纵横交错的矛盾网。

而这些矛盾最终都要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四、

阶级斗争

旧的上层建筑是一定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直到它开始严重阻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就会有新的阶级起来，推翻旧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我们从历史上看，就会发现社会主义社会，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这就意味着一个重要转折，即以往的阶级斗争，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对立。

为什么那么说？我们想想阶级是怎么诞生的？

阶级的诞生有两个前提，一个是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导致产品开始出现了剩余，这就为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

而伴随着私有制出现的，就是阶级的诞生。

私有制的出现，使得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有了激烈的矛盾。

不同的利益团体，根据其所处的不同经济地位和掌握生产资料的不

同，分化成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随着社会两大基本矛盾的发展，其阶级矛盾也逐步发展，阶级斗争也就发展起来。

而社会主义，因为其主体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就为按劳分配而不是按资分配提供了保障。

按劳分配从根本上消除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而使得人们的利益不再处于绝对对立状态。

大家仅仅是在拥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对于实现路径、方法、路线、理念上的不同而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很好地得到调和的。

五、

我们在第四卷最后的两篇文章里，侧重于基本理论的梳理，主要讲述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而这些矛盾，只要是存在私有制的状况下，就一定且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同时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

私有制产生的阶级矛盾，也必将通过社会革命的手段才能最终解决。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我们拿着这些观点去看待新中国成立以

前的历史，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不仅如此，《毛选》里实际上也把这段历史描述的很清楚。

稍微了解近代史的，就知道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的利益，是属于这几个阶级的政党，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就是这几个阶级的中华民国。

同理，共产党代表的则是工人无产阶级和其同盟农民阶级，最后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本质上是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组成的工农联盟，以及加上民族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民主绅士等组成的统一战线，实现了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

这就是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似乎就很少见到主流媒体继续用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去解释随后的历史了。

这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阶级斗争不是仅仅存在于革命阶段，它同样存在于还有阶级的任何历史阶段，只不过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方式不同。

但是，历史的演进始终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和产物。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读《毛选》第五卷的时候，就要把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放进去，在这个过程中，去解读从革命时期转移到经济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了。

第四卷完

毛选解读第五卷合集

作者：小庄

目录

第一篇：不要四面出击.....	2
第二篇：恢复国民经济.....	8
第三篇：为什么评电影《武训传》	14
第四篇：对形势的判断和估计.....	69
第五篇：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	78
第六篇：农业合作化的两个积极性.....	96
第七篇：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	104
第八篇：资本主义改造.....	114
第九篇：如何读《论十大关系》	125
第十篇：反右的前前后后.....	134

第一篇：不要四面出击

《不要四面出击》是第五卷中一篇实用性很强的文章，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混乱无序状态，往往原因就在于四面出击，结果无故分散了力量，处处分散，处处失败。

用《毛选》里的话总结说，那就是：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进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毛选第五卷，不要四面出击》

那么， 不要四面出击在具体运用中是怎么体现的呢？我们这篇文章正好聊一聊。

一、

不要四面出击有这样两个重要含义：

其一：非但不要四面出击，而且在重点进攻的那一面，也要对其进行分化，力求每次都能实现集中所有力量，彻底解决一部分实际问题，然后再集中力量，逐步解决下一批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第四卷在提到土地改革的时候，对于新解放区要如何改革，曾经有这样一个策略：

“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这一阶段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

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要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毛选第四卷，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这段话我们一定要认真品读一下，原本土地改革，其实是需要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全部拿出来，进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平分的，但是即使是在土改这一个方面上去看，那也必须要分阶段，首先分化出地主和富农，先中立富农，不要去动他们，等打击完地主以后，再来收拾富农，以免树敌太多、太强。

而其中，即使是先打地主，也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要将其进行区别，首先打击大地主，再逐步打击中小地主。

这就是我们说的不要四面出击，即使一面，也要进行分化出击。

这一点跟我们做产品，尤其是做细分产品的项目很像，非常值得大家研究学习。

细分产品要做好的根本原则，其实就是不要四面出击，要尽可能的把所有资源用到足够细分的领域。

以什么程度为标准呢？

以你在这个细分领域中，能保证足够的精力把它做到超越同细分领域

里的绝大多数产品，至少保证它成为一款盈利，且可持续的产品。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产品，做一个项目，发现好像做不出差异化，做不出自己的风格，完了还赚不到钱，于是走入了一个死胡同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用到这个“不要四面出击”的原则？

适当的将项目缩小，再缩小，细分，再细分，细分到你可以有把握把它做出差异化，做出自己的风格为止。

如果，不管你怎么细分，似乎也做不出效果，那么如果这个项目还不赚钱，那么很显然只能说这个项目不适合你，应该要考虑一下其他项目了。

其二：不要四面出击的另外一个含义，即是说任何时候都应该要有一个工作重点。

这一条考验的是我们抓住事物主要矛盾的能力，在某一个阶段内，一定不要采取平均主义的方式应付所有困难，而是必须在某个阶段，全力解决最主要的矛盾。

到了第五卷，新中国成立了，但是其实成立之初，还是面临着很多很多的矛盾的。

比方说，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特务、反革命还没有镇压和肃清；国内还有部分地区并未解放；国民经济还处于极大的衰落和混乱之中；解放军不熟悉城市工作的方法；国内还有大量土匪盘踞在山区、边缘区

等地为祸乡里；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基层人员关系还不融洽等等，这些都是极其困难的问题。而这所有的问题里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则是所有问题中最最重要的问题，是主要矛盾。因此，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的迫切任务，就是集中精力恢复由战争创伤带来的经济凋敝。

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兼顾次要矛盾，其他工作也一样要做，但是必须选取工作重心。

这种工作重心有时候当然也会因为外界因素的变化而被打乱，比方说刚刚开始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打乱了，因此工作重心不得不由恢复国民经济，而暂时性的又放到抗美援朝的事情上来。

这种事情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核心一样没变，一个阶段只能集中最主要的精力，来处理主要矛盾，而其他事情必须服从主要矛盾的变化，围绕着主要矛盾去统筹兼顾的解决所有问题。

二、不要四面出击也是一种统一战线

不要四面出击，其实也是一种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教员常说的一句话：“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因此，就必然会走那么一个程序：团结大多数，中立一部分，集中力量打击少数反动派。

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公式，作为党派是需要时刻在这个公式中间自己这样两个问题的：团结谁依靠谁？中立谁打击谁？

只要这个社会还有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么这两个问题就时时刻刻是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我党历史上，其实一直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而发生过无数次的矛盾和路线斗争。

陈独秀时期，是一个依靠农民？还是依靠工人？还是依靠国民党的问题，而由此衍生出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李立三时期，是一个依靠工人暴动，还是依靠农村武装来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问题。李立三过分看重城市暴动的力量，忽略了农村红军才是将来夺取政权的核心武装力量，结果就闹出了一条“立三路线”。

张国焘时期，同样还是围绕着城市进攻路线还是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交锋。其实城市路线和农村路线，本质上还是没有绕开是不是要依靠农民，以及如何依靠农民的问题。

因此，我们 also 可以说，所谓的路线问题，其实根本上就是一个：团结谁依靠谁？中立谁打击谁的问题。

前几天听到一个说法，说是以前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手段十分高明，

但是这四十年以来，统战的策略越来越显得一塌糊涂了，不知道为什么对于统战工作，会后退毛主席时期那么多。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因为统战的核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拉一派，打一派的问题，其根本问题是在于团结谁依靠谁？中立谁打击谁的问题。

这样一看，大家是不是就很容易想明白了。

如果你所依靠的阶级力量变了，那么统战工作自然也就随之改变。

比如最为著名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其实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

这里面首先解决的是依靠工农群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然后团结一切民主爱国人士，包括爱国的地主、乡绅、国民党，总之一切可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是团结的对象，这就是团结谁依靠谁的问题。而中立谁打击谁，指的是中立那些摇摆动摇的人，比如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处于动摇状态的那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中可能处于中间状态，两不相帮的人，先中立他们。然后打击投降派、汉奸、日本侵略者、伪军，这就是解决的中立谁，打击谁的问题。

如果统战工作，不首先明确以上的“依靠谁团结谁，中立谁打击谁”的问题，那么就没有所谓的搞得好的统一战线。

所以，不要四面出击是一个呈现出来的结果，对于我们很多工作其实也是一样，也会遇到“依靠谁团结谁，中立谁打击谁”的问题，只不过可能具体工作，指代的内容不同而已。

因此，这篇《不要四面出击》除了要告诉我们学会分化敌人、困难，集中精力一部分一部分解决，避免四面出击之外，另一个还要告诉我们的问题就是：要搞好统一战线，不仅是简单的拉一派打一派，更重要的是想清楚拉哪派，打哪派？以及自己依靠的是哪一派。

第二篇：恢复国民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快就消灭了南方国民党残余军队，因此，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便首先是恢复国民经济，治好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

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做过的重要决策，以及其决策背后思考问题的方式，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如何处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国民党成员？

国民党集团在城市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比如严重的通货膨胀、物资紧缺，商人唯利是图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民族资产阶级缺乏原料、资金，因此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等。

这些问题虽然说可以通过政策手段、行政命令进行干预和调整，但是根源上则必须调入大量的粮食、棉布，动用大量资金才能真正解决。否则，如果连工人开工的基本原料、吃饭穿衣都无法解决，那么你什

么策略其实都不能缓解经济情况的持续恶化。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蒋介石之所以在三大战役之后立即土崩瓦解，根本无法采取游击战的形式同当初红军一样死中求生，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其经济完全崩溃，信用全面崩盘造成的。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大量的物资资源、资金才能根本上稳住物价，恢复经济元气。

因此，从老解放区农民那里调大量的物资、粮食，其实就成为了当时稳住物价，恢复经济的根本手段。

但是即使这样，财政还是非常吃紧，在制定 1950 年财政预算的时候，就出现了两个大难题。

一个是军费的开支占比极高，达到了 38.8%，另外一项就是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基层组织、干部、军政人员的消耗。

军费的问题是自己内部问题，解放军一向就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所以当战争缓和下来以后，将军队重新转变成生产队和工作队，在参军之时同时参加生产劳动，保证自给自足，至少保证缓解国家开支，是相对容易办得到的。

当初在延安，因为日军的扫荡、国民党封锁等原因，八路军就是开展大生产运动，自给自足来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所以这还不算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人员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大笔的开支会急剧增加财政负担。

因此，管不管这批人？要不要承担这批人的各种消耗和费用？这就成

了当时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

有人认为，现在国家开支那么拮据，国民党和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为什么现在还要承担这群人的费用？

这么说其实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是手头宽裕，那么倒也不会那么计较，可是现在是用农民的粮食、物资支援城市经济，我们自己的军队都需要劳动生产，凭啥还要管国民党留下来的那批人？

但是毛主席却不是那么看，他说的是：“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一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办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当时养一个政府人员需要的费用折算成小米）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件事看上去似乎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大家如果仅仅从这件具体的事情去看，无非就是觉得眼界宽一些，政策好一些，考虑更周到一些。

然而，这件事背后的意义却不仅于此，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全局观点，是一种站在整个国家和人民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观点。

把这种观点放到后来很多历史事件中去看，就会很容易想明白很多事情。

比如：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富裕，但是如果只是少数人的富裕，还有多数人处于贫穷状态，那么实际上就会出现很多你根本无法解决的矛

盾和困难。

就像那些遗留下来的国民党人员一样，从全局看，你包下来也是要吃那么多粮食，你不包下来，那要么就是饿死、要么就是动乱、要么就是去偷去抢，这些问题不管是哪一件，都比你包下来要严重，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

饭可以匀着吃，这种困难虽然暂时难，但是是可以挺过去的，只要安排合理，那批遗留下来的国民党人员也是劳动力，是可以参加社会建设的。

而如果不管那批人，那短暂或者局部去看，好像节省了国家财政，但是从全局看，只会增加动乱和不安定的因素，而且你的粮食也省不了，因为他们会想其他办法去搞，搞不到就是去偷去抢。

这种批量性的社会问题，用法律和道德去解释去约束非但毫无意义，而且根本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当然，要改造这批人的思想也是一个极难的问题，后来因为这个问题，也衍生出极大的困难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出来，这是后话。

但是从这一个很小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全局性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我们总说社会需要公平，其实什么是公平？就是考虑问题要从所有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要尽可能照顾到所有人，使得大家都有积极性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去管理国家问题，去享受到公平的权利，同时也各尽所能承担起自己的义务。

要公平就不能只为一部分人考虑，也不能只从一个局部、一个短暂的利益去考虑，而是从全局、从大家、从长远的利益去考虑一切矛盾和问题。

二、全面土改，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根本途径

上面我们说，恢复国民经济根本上需要农民的物资、粮食、棉花等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不可能是无止境的，必须要可持续才行。

在刚刚成立新中国的时候，根本办法是从原先的老解放区运物资和粮食到城市来解决燃眉之急。

但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总归不是个办法，老解放区一共也就一亿多人口，而新解放区则占了3亿以上人口。

因此在新的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使全国的农民都分配到土地，尤其是以前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的农民都分配到土地，才是可持续解决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

这一点，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

要解决财政问题，根本上是要解决经济问题，否则任你如何想办法，也不可能想出什么好办法。

而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时期，就在于解决中国占

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土地问题。

他们的经济不好转，那全国的经济也就不可能好转。

这个道理在 1950 年年初的新中国是这样，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其实还是这样，只不过看你是从全局出发，还是从局部出发，是从大多数人出发还是从少数人出发，仅此而已。

毛主席当时就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该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后来的历史当然也是按照这种计划去做的，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后，就是从农业上汲取剩余来帮助完成工业化，工业化也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主要内容。

这里只说明一点，考虑一件事情的可持续性，考虑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根本上就是考虑绝大多数人的可持续发展，舍此再无其他。

以前，在革命时期，要完成民主革命的胜利，根本上就是考虑中国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土地问题、经济问题、平等问题等等。

后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根本上考虑的还是需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经济恢复，即土地改革的完成，要让他们的经济有了改善，整个国家的经济才会真正的恢复和改善。

再到后来的工业化，也是一样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付出，才有了第一代完整的基础重工业体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把国民党的旧人员包下来，还是彻底完成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其实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从全局去看，从全中国去看问题，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看到大多数，看的更全，看得更远。

第三篇：为什么评电影《武训传》

在《毛选》第五卷里面，有这样一篇十分特殊的文章，就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说它特殊，是因为很多人无法想象，为什么毛泽东会亲自撰文来要求掀起一场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不就是一部电影而已吗？

它到底拍了些什么？传递了些什么？又造成了什么影响？

毛泽东要求讨论这部电影，背后又传达出他什么样的思考和想法？

所以，我们这篇文章就主要来聊一下这篇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文章，

背后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含义。

一、《武训传》到底拍了些啥？

这部电影 3 小时 16 分钟，时间还是比较长，有兴趣的可以在 B 站上搜索到这部电影，但是没有字幕，而且画质很模糊，看起来实在有些费劲。

它中心讲述的故事只有一个，即主人公武训，其身份是一个乞丐。

在清朝末年，穷人家的孩子是终身都很难上学的，而这个武训为了能够让穷人家的孩子也可以上学，于是就通过行乞来积攒钱财，从而寄希望于能够帮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

因此，就有了武训行乞办义学，然后帮助穷人孩子能够上学的故事。

武训的这种精神值不值得我们感动呢？应该说是非常值得我们感动的，因为一个乞丐居然也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思想，而且又是靠行乞来建设义学，这事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这部电影在 1951 年的时候上映之时，掀起了非常大的轰动，那时候原本这种精神文化食粮就很少，所以这部电影上映以后，十分轰动，很多评论社、报纸给了极高的评价。

有人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

有人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的斗争。”

还有人说“武训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等崇高品质。”

而且，这部电影当时是根据真人故事加以改编拍成的，所以在当时就更加引起了很多人的赞扬。

二、武训已经不是武训本身了。

武训这个人物自己本身受限于封建时期的文化禁锢，他能在封建时代的背景下，想到通过乞讨的方式去兴办义学，帮助穷人家的孩子读书，这当然没什么问题。

可是，在毛主席看来，武训本人是一回事，后来的人怎么去宣传武训这件事的意义又是另外一回事。

武训的思想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在当时那种封建制度的条件下，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

教育资源在那个时候是完全被封建阶级所垄断的，而武训办义学的方式又是封建时期的，地主专政之下的乞讨，这种乞讨也往往是向着地主阶级乞讨，通过所谓“良心地主”的施舍和恩赐，来实现穷人读书的憧憬和幻想。

这仅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所兴办的义学，传授的东西也一定是封建时代三纲五常类的东西。

因此，武训本身其实没什么可讨论的，因为他毕竟生存在封建时代，我们也不能要求他硬是要起来造地主阶级的反。

但是，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又十分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动态，这部电影在当时宣传出来的思想，就是武训那种封建奴性、卑

躬屈膝、向地主阶级跪拜以求得施舍兴办学校的思想，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它不仅仅是一件完全不现实的事情，而且鼓吹了向统治阶级跪倒的文化，而恰恰是这部鼓吹这种文化的电影，通过恩情、感动、情绪、无私、行乞办学的外表包装之后，得到了观影群众的热烈鼓掌。

因此，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所以，在文章中，他说道：

“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

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所以，其实武训这个人本身不是重点，他怎样想怎样做是一回事，但是后来的人怎样宣传他是另外一回事。

当时很多人想不明白，武训这样的品质明明是值得歌颂的，为什么会引发毛主席的批评？

这是因为毛主席批评的不是武训，本质上说他批评的是把武训的那种思想包装成为人民服务、包装成爱国、善良，借此向人民群众宣传的这种行为本身。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迫切需要普及和宣传马列主义的文化，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动地位。

可是，这部电影传达出的内容不但容易麻痹群众，而且透露着非常严重的卑躬屈膝的思想。

而马列主义则是要向一切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思想作斗争的，所以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这篇讨论《武训传》的文章。

为此，毛泽东还专门派人到山东去做调查，因为电影是根据真人改编的嘛，所以他派人去调查一下，武训在历史上到底是怎么办学的，那个义学在现实中到底存不存在，以及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些调查汇总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我们文末把这份调查报告也附录上去，非常值得大家一看。

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很深切的看到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极端重视，这种重视说到底，就是深怕人民群众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欺骗而吃亏，怕他们失去了反抗精神。

其二，他希望群众可以看穿那些用善良、发展、正能量、忠孝节义等等包装出来的剥削文化。而要使群众具有这种识别能力，就需要在文化宣传、意识形态工作上花大力气进行改造。

后来，在文化界的种种运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运动，其实本质上都和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有关。

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要在文化上翻身，要防止文化被剥削阶级垄断，就要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下，办出自自己的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宣传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思想理念。要保证这一点，在当时就是必须通过革命、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才能保证人民的这些权利。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文化领域的批评运动，毛泽东是要借此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次运动中，电影的导演孙瑜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是毛主席专门嘱咐要安排好他的工作，批判不能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普遍存在着的非马克思的思想、观点。

这次电影事件，只是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一部分，后来关于文化界的

问题，还有专门的文章讨论。

文末：附上《武训历史调查记》

这份当时的调查报告曾经刊载在人民日报上，但是我们也不可全信，因为关于武训的电影批评在前，这份调查报告在后。大家可以当作历史去看，非常有趣。

《武训历史调查记》

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摘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革命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武训家乡的革命军。他们不是太平军，也不是捻军，而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地方性的农民革命军。这种事实，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作为大家判断的根据。有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答复：究竟是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批判武训、蔑视武训的人们呢，还是宣传武训、歌颂武训的人们呢？

我们所得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上的人物”是这样的：

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正当武训打出“乞行兴学”招牌（据从前的记载，武训生于一八三八年，即道光十八年，武训开始打出这块招牌是在一八五九年，即咸丰九年，武训二十一岁）一年以后，即当武训二十二岁的时候，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广大地区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的农民起义。就在武训出生的堂邑县柳林镇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刘贯庄上，产生了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他领导的农民武装叫黑旗军。并且就在武庄一带，黑旗军曾与满清政府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过。（《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

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当时山东的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的农民，成千成万地卷进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但武训没有，他不但脱离了这个浪潮，而且跑去依附了镇压农民的垂死的压迫阶级。宋景诗则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浪潮，并且成了当地农民群众的最有名的领袖，站在历史时代的最前面。这些起义虽则以各种宗教的名义出现，如白莲教、八卦教、幅教等，但其本质都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深刻而爆发起来的农民革命。土地的集中，剥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灾荒，使陷

于痛苦深渊中的农民，勇敢地组织起来，向反动统治阶级宣战。在《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四、五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武训所生活着的年代里，那一带地区曾连年不断地发生灾荒。武训生的那一年，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螟虫伤稼”，二十二年是雹，二十四年是水，二十六年是旱、风，二十八年是大水；咸丰七年是“飞蝗蔽天，禾稼都尽，大饥”，八年又是“大饥，人食麦苗，大疫”；光绪元年又是“大饥”，二年“大旱”，三年“大饥”，四年“大饥”。和这些并列的，是“粤匪”、“教匪”、“捻匪”、“贼”……四处“蔓延”、“窜扰”、“声言均粮”等记载。

《冠县县志》上也这样说：“咸丰十年冬，岁饥。乡众聚众抗官闹漕，土匪乘机蠢动，……揭竿响应，旗分五色，乌合万余人，暗结南捻，同举反旗。”（第十卷第十三页）

那些旗号和农民领袖的姓名，据《馆陶县志》（第八册第十三、四页）所载为：黄旗张善继、孙全仁；红旗郜洛文、张宗孔；白旗程顺书、石天雨；蓝旗左临明；花旗杨朋岭；大绿旗杨泰、杨福龄；小绿旗雷凤鸣、王振南；黑旗宋景诗。照反动统治阶级的供述，其起因是：“自官军与太平军相持于大江南北，河南、山东捻匪又起，继以咸丰七年之凶荒，流民失所，……各县顽民有习八卦教者，乘机作乱，分张旗帜，以应方色。”（同上书同页）

先让我们来看统治阶级所写的宋景诗的略传：“宋景诗堂邑县西北小李官庄（即现在小刘贯庄——笔者）人，常习拳棒，与馆陶县王占基友善。王因案系狱，……宋与死党十八人劫狱，……揭竿而起，号黑

旗队。其众日多，遂不可制。”（《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

再让我们来看当地农民所说的起义真相究竟是怎样。在堂邑县西北的萧集，我们访问了一个过去是贫农，现为新中农的七十一岁的萧洪飞。他告诉我们他从自己叔父那儿听来的关于宋景诗造反的缘由：宋是一个卖豆腐的，很穷，但学得一手好武艺。当时那一带的田地，有大粮地和小粮地的区别。缴大粮的是好地，缴小粮的是沙碱地。大粮地每亩四百钱，小粮地每亩一百钱。满清政府依据地主的请求，要增加小粮，减低大粮，但大遭农民反对。因为大粮地多数是在地主手里，小粮地的绝大部分却在贫农和中农手里。增加小粮，对农民说来，无异于要刮削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肉。农民眼看不能活命，就商量反抗。宋景诗积极参加反抗，成了头儿。但不久宋被关进冠县牢里。农民们说，宋景诗既然为大家坐牢，不能不救。于是集合了十八个人去劫狱。劫狱出来就正式造反。他们利用赶集，集合同党。不多几集，就约齐了八九百人，干起来了。

这时的武训却在干“竖鼎”和磕头的玩艺儿，提倡所谓“行乞兴学”。这个萧集的老农民还讲了宋景诗的农民队伍和柳林镇对立的原因。他说，柳林尽是“好户”（地主），他们就是主张“减低大粮，增加小粮”的。柳林周围五十二个村庄的地主遭到了农民的反抗以后，纷纷搬到拥有当时最顽强的地主武装“民团”的柳林去，高筑起围子，防御起义农民。

那个“民团”的名称叫“永清团”，由柳林大地主“杨十爷”即杨鸣谦当团长。这个团，比起堂邑境内其他十四、五个团来，要顽强得多。

《山东军兴纪略》(卷十四) 中有下面几句话可以显示当时统治阶级对那一带的“民团”的不信任：“莘、堂、冠、馆，乡团畏祸，与匪首鼠。……朝城民团，与匪分合，亦不可测。”而柳林团呢？却被称为“良团”(《山东通志》)。在当时地主阶级间，也流传这样的话：“柳林团能杀能战，樊寨团英雄好汉，惠丰团半私半官，堠堌团熊种王八蛋，小固团见面就散。”这说明了柳林和另外一个村庄樊寨两处的地主武装是反动的核心；也说明了宋景诗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各地“民团”均非其敌，甚至还和他互通声气，供给粮草，“半私半官”。这是柳林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新中农)、七十二岁的韩祝龄(中农)告诉我们的。

堂邑县城西北四、五十里的武庄、小刘贯庄、柳林，在地图上恰好鼎足而三，大体上成一个三角形，相距很近。武庄距柳林五里，武庄距小刘贯庄七里，柳林距小刘贯庄十里。东南角的柳林是地主杨鸣谦他们的堡垒，西南角的小刘贯庄是宋景诗他们的起义地点，北边的武庄是武训的家。宋景诗的起义从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起，连续四年，直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才失败。这一年武训是二十五岁，闹了五年的“行乞兴学”了。在这期间，这一带，包括聊城、堂邑、冠县、馆陶、莘县、寿张、临清等好几个县的农村，都卷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漩涡。一边是农民武装抗粮，攻城占县，“发狱火库，毁武营、官廨”，“穷民连廒粟出城”，“从乱者如归”(《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二)；一边是满清专制王朝的军队和地主的“民团”，据守围子，和起义农民对抗。刀对刀，枪对枪，壁垒分明，水火不容。武训在宋景诗起义

那一年是二十二岁，他东望柳林，西望小刘贯庄，决定选择了柳林的道路。为了迎合当时地主、绅士和满清统治者举办“义学”的愚民政策起见，他以“行乞兴学”为招牌，投靠了地主阶级和满清官僚，成了他们的驯顺的奴才。

对于宋景诗和武训这两个“历史上的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对前者是钦佩的，怀念的；对后者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他们称黑旗为“咱黑旗”，他们称武训为“武豆沫”！

和萧洪飞一样，萧集的另外四个老人，七十岁的萧振如，七十岁的萧怀祥，七十岁的萧泗汉，六十四岁的萧桂树（他们过去都是贫农，现在都是新中农），也都称颂宋景诗的起义，他们眉飞色舞地谈着这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们说他“王法好，光要草料吃头，不抢不砸”。在柳林东面的后路堂村，有一个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最初是佃户，后为地主，现为中农。他是武训同时代的人物，他比武训只小十岁，在武训死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九岁），在闹黑旗时，他已十二岁，记事儿了。不凑巧，当我们访问他时，他刚有病，精神不行。特别是关于武训的事，他简直没有劲讲。可是当我们一提到宋景诗的时候，他的兴致马上来了。说了几句之后，竟挣扎着从炕上坐了起来。他兴奋地说：宋景诗是“穷儿，好拳脚。他堠堌不打，小匣不打，单打柳林”。“黑旗不抢不砸，只要吃的。”

和宋景诗同村的贫农王立成（八十一岁）也向我们夸奖黑旗军的纪律：“宋兵可有规矩。宋景诗有命令：不杀百姓，不抢百姓。不采花盗柳，不胡作非为。有乱来的，就地正法。”王立成说，那时候老百姓对柳

林有仇，柳林是地主集中的地方，宋景诗打柳林最得人心。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郭继武和韩祝龄还记得黑旗有这样几句话：“攻克柳林团，吃饭不作难，先杀十团长，后杀步老先（也是一个地主，乔庙人——笔者）。”

杨鸣谦行十，故号“十团长”。宋景诗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果然打败了他，把他杀死。

关于杨鸣谦的死，现在躺倒在堂邑县文庙里，做了那儿一所学校校舍台阶的“永清团团长杨参军庙碑”上有些记载：“三月二十四日在圩墙遥见宋逆带领数十骑，似来谍状。公即率丁一队往追，不意伏贼突出，众寡不敌，……奋力血战，遂俱死。”

今年七十岁的贫农潘耕申和七十八岁的中农潘耕历，告诉我们，他们所住的王二砦，离小刘贯庄只二里地。当时，他们村上参加黑旗的有六十多人，他说，差不多村上所有的壮年人都是“在旗”的。因此，他们的村和小刘贯庄，同被统治者称为“贼窝”。他们从同村的一个才死了二年的老年人王德来的嘴里，时常听到关于“黑旗反”的故事。那时，王德来已有十几岁，因为离小刘贯庄近，所以时常去玩。据他谈，宋景诗“巧计杀杨十爷”的经过是这样：宋景诗在柳林南门外遍插旗帜，叫喊杀敌，杨得知就去南门。但宋布置了伏兵，利用垒起的土坯作掩护。杨一出来，就中了埋伏。

在柳林南面的王樊庄的七十岁的中农王维修，除了告诉我们，他曾经听见老人们称赞宋景诗怎样“杀富济贫”外，他还记得宋手下有几个出名勇将。例如：起义前就和宋相好的憨二扁担；一字不识，却当了

宋的军师的三疤拉眼；小个子，骑大马的杨二马鞯，“他要一把青龙偃月刀，蹬里藏身，只见马，不见人”；还有王百灵、王二秀、狼头罐、肉翅膀等，都是名将（杨二马鞯、狼头罐、肉翅膀等名字也见之于《山东通志》）。他说：“宋部下共两千多人，有八百好汉，都骑马。”民间传说的这些农民勇将的力量，即使是统治阶级也不得不加以部分的承认。《冠县县志》说他们“精技击，娴刀法，有勇惯战，皆百人敌”（第十卷第十三页）。《山东通志》也说：“宋景诗所领黑旗，多相从习学枪棒之徒，人数既多，略知阵法。”（第三卷，第三三四六页）满清统治者称宋景诗为“降匪”、“叛匪”，是由于宋曾一度有所谓受招抚的事。《冠县县志》载，咸丰十一年五月宋《乞降胜营》（第十卷第十三页）《临清县志》中也提到，“咸丰十一年冬十一月，胜保击宋景诗于卫河南，降之”（第一册第十五页）。咸丰十一年是一八六一年，到次年同治元年，即一八六二年的十一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且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堂邑等县，进踞州城（指临清——笔者）车营街一带”（同上书同页）。这一仗，宋景诗从冠县的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并且打进了州城，大败清兵，“自此宋声势愈炽”（同上书第十六页）。“招抚”以后的情况，《冠县县志》也有记载，说宋景诗“不听调遣”，“叛迹显著”，“名为官军，实是跳梁”（第十卷第十五页）。《馆陶县志》则说他的起义规模更加扩大，“各旗联络，有数万人”（第八册第三十五页）。为什么清兵不又去剿呢？“惟时胜（指胜保——笔者）营已南行剿捻，不克回顾，东抚谭（指山东巡抚谭廷襄——笔者）仍有慰抚劝令助剿之意。”很明显，这时的统治者

只能作一些无效的劝说。下面几句更活画出他们的窘相：“力不能制，优容姑息，只得以不攻城劫狱为幸”（均见《冠县县志》第十卷第十五页）。可是他们没有如愿，宋景诗还是“攻城劫狱”，并且越来越会打仗。这不但是农民至今还这样传说，并且也是统治阶级所承认的。上面所提到的萧集的五个老年人就说：“宋景诗回来以后、更会打仗了。”满清统治阶级的历史家则无意中大大赞美了宋景诗的善战，和大大讽刺了清兵的怯弱：“遇官军惯用横截法。官军猝不及防，即首尾不能相顾。副都统遮克敦布、营官谦禧，尤畏贼如虎。蹑贼常在十里外，贼行亦行，贼止亦止。时人有‘谦不打，遮不动’之谣。”（《馆陶县志》第八册第三十五页）

另一个败在宋手里的清将是提督恒龄，地点在冠县清水镇，时间是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六月，正是宋景诗杀死杨鸣谦之后三个月。王立成兴奋地讲述至今还流传在他村子小刘贯庄农民中间的这一场胜利的战斗：“僧王（指僧格林沁——笔者）的前锋恒大人（指恒龄——笔者）在小刘贯庄外二里地窑上扎营，用铜炮轰。那时候，宋景诗不在小刘贯庄，他在三十里外的幞头村。小刘贯庄的人去报信。宋景诗说：‘你们只顾在小刘贯庄喊杀放箭。’接着，宋景诗就去抄后路，从村后去包围了清兵，杀得恒大人落花流水。宋景诗一个人能敌二十个，周围的人哪敢回手，个个吓迷了。”

最后，僧格林沁和直隶总督刘长佑合军攻宋景诗（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二十九页），宋景诗才败于专制王朝的、以帝国主义武装来装备的、所谓“拐子洋枪队”。但在交手的初期，这个“亲王”也

还是吃了败仗，而最后他所得到的“胜利”，也仅仅是“正史”上的所谓“宋景诗败走”（《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五页），和劳动人民口中的黑旗的巧妙的撤退。听了当地老人们的谈话之后，觉得《临清县志》上的几句文章还算是记实的：“宋……为患四年，以僧邸军威之盛，仅乃胜之，卒未闻被歼。”（第一册第十六页）

那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的记忆力真好。他记得黑旗反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那是不错的；他也记得“僧王发兵”是在“八月里”，那也是不错的。《临清县志》（同上页）说：“同治二年秋八月，僧格林沁督兵至州，叛匪宋景诗败走。”

路延林形容清将的轻敌，很是生动：“到八月里，僧王发兵，说‘黑小子们不够垫马蹄子’，立马出征，可是头一仗就打败了。”

让我们用前面曾经介绍过的王立成的原话，来给那聪明善战的农民革命领袖写下他的最后一页的战绩吧：“恒大人带兵逃回柳林，禀告僧王。僧王只得自己亲带五百红孩儿，骑白马，穿红袍，打洋枪，来打宋景诗。宋吃不住洋枪，退到了小刘贯庄。他一面在围子上插旗，下战表，三更造饭，四更对敌，准备打仗；一面叫全村人带起东西走。僧王看见围子上明灯亮烛，并且听见一片敲锣打鼓的声音，却不见宋景诗的兵出来。僧王说：‘黑小子为什么不出战？’等到天明，他跑近寨子一看，但见寨门大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们所访问的农民们谈到了当时清兵和柳林地主“民团”所进行的恐怖暴行，说是“大抢三日”，许多人被杀死，吓死，割去耳朵。小刘贯庄妇女不少被柳林的地主们抢走。和宋景诗同族的人，不是被杀，

便是全家逃亡外省，从此改名换姓，子孙几代都不敢回原籍。我们访问过现住赵郎砦的宋克义（五十一岁，新中农），他是宋景诗堂兄弟的孙子。他说他的祖父到处躲藏，最后还是被柳林团搜出来了。柳林团说不能叫他好死，罚他驮极重的沙袋，活活折磨死了。他的父亲因是遗腹子，出世以后即改姓陈，才保留下。他家另一支逃到河北的武城县，改名换姓，就在那儿落了户。

王立成也很难受地谈到宋景诗撤退后，小刘贯庄受地主的残酷镇压和报复的情形。“宋景诗走了以后，俺村遭了殃。三里以内，给洗了。全村八顷地入了官，给了柳林杨家。柳林杨家又租给别村的十一户来小刘贯庄种地。柳林杨家把宋景诗家的祖坟平了，撒了骨，把宋景诗爹的棺材也抬到柳林去。把宋景诗的娘活钉在东昌府城门上，五只钉子，两三天才死。……”

这时候，武训却在闹“行乞兴学”，向人民的敌人磕头！

关于宋景诗的结局，统治者的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投捻南奔”（《冠县县志》第十卷第十五页）。有的说他“投叛练苗沛霖，又投亳州捻匪……同治十年总兵刘永清诱至州，醉而缚之，乃伏诛”（《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有的说他在“同治九年……假名徐连升，往来归徐陈毫之间。……十年二月获景诗”（《山东通志》第三卷第三三四九页）。

至于农民群众的说法，那是另一种。他们对宋景诗，充分流露了他们的怀念之情。宋景诗的同村人王立成告诉我们，这个为农民爱戴的“宋丫头”（农民们说，宋景诗平日说话不多，闲静如女子，打起仗来却

勇冠全军。这个名称疑是这样说开的) 最后是“往西跑啦！一直跑到口外，改名换姓，在桂花县落户，教了一百个徒弟，活到八十岁。”武训的歌颂者孙瑜曾在电影中捏造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农民周大，来和武训相比，并硬说周大和武训有友谊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关系，而称之为“一文一武”。但是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很明显的，革命农民与反对革命的统治阶级的奴才，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的。如果武训的歌颂者一定要把武训捧为“一文”，那么，那堪与匹配的“一武”，不是别人，正是与宋景诗为敌，帮助满清统治者屠杀农民的柳林团团长杨鸣谦及其继任者——他的亲侄亦即武训的恩主——杨树坊。因叔父“剿匪”、血洗宋景诗的小刘贯庄有功而被赏赐小刘贯庄八顷地的杨树坊，正是提拔武训，替武训在柳林修第一所“义学”，被孙瑜、李士钊们捧为“开明绅士”之一的那个人。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武训和杨鸣谦或杨树坊才是“一文一武”，一鼻孔出气的血缘亲属。非常合理，武训和杨鸣谦一同受到了满清王朝的褒奖，武训被赐与“乐善好施”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仪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他们不愧为替反动统治者服务，帮助满清王朝，对革命人民执行所谓剿抚兼施政策的两匹忠实的走狗！

柳林老人谈宋景诗

柳林镇（即“武训镇”）城门

柳林在武训时期是地主堡垒，周围五十二个村子的地主集中在这个围子里抵抗宋景诗的农民革命军。武训“恩主”杨树坊之叔杨鸣谦就是

柳林“民团”的团长，为宋所杀。

二、武训的为人

武训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他有两个哥哥（武谦、武让），四个姐姐，他排行第七，唤做武七。我们在堂邑武庄武训的曾侄孙武金兴家里查看了武家的神主，知道武训的父亲武宗禹是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死的，母亲崔氏直到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才死，那时武训已三十五岁，并非象许多传记以及电影所描写的那样，武训的母亲也是在他年幼时死的。可见劳动人民所说的，武训发迹后不顾家，不顾母亲，倒切合事实。

当家里生活困难的时候，武训曾跟着他母亲要过饭。虽然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个职业叫化子，但他从此染上了不关心庄稼活、不爱劳动的游民习气。到他十六、七岁的时候，他母亲设法弄他到馆陶薛店张变征家抗活，就连一些庄稼活的基本常识也没有。崔庄（他母亲的娘家）的王汤传（七十五岁，中农）说：“豆沫不懂庄稼活，连豆子跟棉花都分不清。有一次人家叫他到地里去打棉尖，他把豆尖给招掉了。”

张变征即张老变，或张老辯，是武训的远房姨夫，是个贡生，有四五顷地，家里雇了几个人种地。薛店的张晓峰（七十四岁，贫农）说：“武七不算抗活，姨家拿亲戚待承他。他啥活也不会做，出粪铡草都不会。推车子架不准，摇摇晃晃，担水不使手，遛遛跶跶。”因此，张老变只叫他看管“树行子”（果茶园），或者做一些喂猪、喂牲口的轻便活。至于他的工钱，薛店的老人说，顶多不过“三鞭”的标准—

一四吊钱。当时“头鞭”（劳动力最强的雇工）一年的工钱是八、九吊，“二鞭”的工钱是五、六吊。如果照薛店群众的说法，武训仅在张老变家抗活一年，那么工钱顶多四吊；如果照堂邑群众的说法，抗活两年，那么工钱顶多是八吊。张老变是否骗了这笔工钱？群众的说法不一样。有说给了他哥哥，有说给了他自己，有说没有给，其中说给了的较多。薛店的张士珍（五十岁，贫农）说：“武七只抗了一年活，工钱很少，给他哥哥支走了。武七大闹了一场就走了，没有再抗活。”

经过我们多方调查，除了张老变家之外，再也找不出还有第二家武训曾去抗过活。既没有另一家“张举人”，更没有另一个“李老辩”。武训一生五十九年中，就只有一年（或两年）比较上还算能说是“劳动”过，此外再也没有了。

武训从张老变那儿回家以后，在决定今后抗活还是要饭的问题上，和他母亲、哥哥起了冲突。武金兴说：“俺老老奶奶和俺老爷爷都叫他抗活去，不愿他当要饭的。”可是武训认为要饭比抗活舒服，所谓“不如讨饭随自己”。他赌咒说：“我出家了，你们别管我！”从此，他就脱离了贫农家庭，背离了劳动人民，“当了大要饭的”（武金兴）。难怪封建统治阶级要表扬他的所谓“亲戚朋友断个净”的态度，因为实际上就是他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断个净”。从那时起，他结交的尽是一些流氓、光棍、地主、恶霸、阔和尚和大小官僚。当地群众说他年轻时最欢喜上崔庄找他的舅舅崔老华，那人是个有名的光棍，“他专吃别人”。王汤传说崔老华干过衙门里的“赋房老总”，武训和他最合得

来。可以设想，武训从崔老华那儿学到了不少“专吃别人”的本事。后来，武训就在许多县行乞，结识了各县的流氓，竟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流氓头子。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青年。按照社会鄙视不劳而食的习惯，象他那样年轻力壮的人，要饭是不会得到同情的，也不会有多少人给他。因此，为了达到不劳而食的目的，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八十六岁的张洪鲁（堂邑夫人寨人，中农）说：“豆沫壮着哪！”他还用手比划着说：“脸有这么宽，腰象案板那么粗！”我们问：这样壮实的人要饭，人家为什么肯给呢？张洪鲁说：“他疯迷了呀！”但是另外的人却说：“疯迷了，他对钱财可不糊涂。”这就是说，人们懂得他是装疯，上当的人不多。

装疯既不能长期骗人，到后来他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了。但“义学”决不是他的发明，更不是装神弄怪什么“大梦三天”以后想出来的。“义学”在武训之前便有了。据“临清县志”说：“义学之设，始于清初，由城及乡，逐渐扩充”（第三册第十一页）。这种“义学”，绝大多数是满清王朝办的。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临清有九个“义学”，其中只有三个是私立（绅士捐建），其余都是“官立”，由知州创办。到了光绪年间，临清“义学”增至二十五处。可见越到后来，满清专制统治者越爱“兴义学”，“义学”在那一带越是发展。在堂邑、馆陶也是如此，在武训常跑的村庄萧集、杨林和千户集，就都在武训之前有了“义学”。武训行乞，到处跑，又接触封建上层分子，便悟出了打起“兴义学”招牌必然对他有利的道理。

果然，这块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阶级的赏识，馆陶县娄塔头的武进士娄峻岭马上看重了他。当地群众说，娄进士谁都不夸奖，却说：“武七能成大事。”

武训装疯卖傻骗钱的方法是很多的，但是他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他对地主的态度和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不同。他对地主阶级是到处磕头，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娘”。堂邑、馆陶的地主们说武训的“嘴甜着哪！”“脾气好，怎么要他也不恼。”对劳动人民呢？武训的外孙唐勤习（连二寨人，七十五岁，新中农）说，有一回武训拿了几个杏子到他家，给了唐勤习兄弟们，唐勤习他们以为是舅爷爷送的，就吃了。刚吃完，武训就伸手要钱。张洪鲁说：“就别让豆沫撂下东西，他撂下什么涨什么。他撂在俺家二升红高粱，第二天来拿就要涨。”七十四岁的贫农石东海说：“谁沾着他，谁被害。”“放钱七百算一吊。”自从武训正式要饭以后，是否如武训宣传者们所说他干过出粪、铡草、拉砘子、轧棉花、纺线、推磨等项工作呢？据我们调查，除了铡草、推磨之外，其余都没有。而铡草、推磨也不过是在要饭时候所表演的节目，目的是好伸手要钱或要干粮。我们问过几十位老人，只有两人说见过他推磨。其中之一说他推磨带上“驴遮眼”，当许多孩子围着他看的时候，他又学起驴叫来了。连二寨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说：“光听他喊推磨，没见他真推过。”当我们向该村的张春华（八十三岁，中农）访问武训当年的劳动情况时，刚一提到铡草，他便说：“铡草铡草，没人来找。”这是劳动人民对武训的评语，应该说是很恰当

的。连武训本家的武克科（七十八岁，中农），武玠（七十岁，中农）等人也说：“要饭是正事，干活稀松。”

武训一边嚷着“兴学”，一边装做疯傻，用尽各种哄骗讹诈的办法，从劳动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笔钱（据馆陶的群众说有四、五十吊），交给馆陶武进士娄峻岭替他放债，利息三分。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堂邑县官郭春煦的“义学正碑文”说：“同治初年，将前分业地三亩，变卖得价京钱一百二十千。”事实上，武庄的人们和武金兴都说卖地是真，但并未分家，卖的也不是三亩。武金兴说：“俺家宁死不出地，他一卖就是五亩七。”武训三兄弟共有十二亩地，他的份地是四亩，怎么能卖五亩七呢？据说他所持理由是没有娶妻，但是武金兴说更重要的是怕他凶，只得依他。武训把卖地的钱加上放债所得利息，又经过大恶霸杨树坊等人帮他放债，他的财产就越积越多了。他把整注的找娄峻岭和杨树坊等人替他经营，零碎的自己放。张洪鲁说：“豆沫五百钱也不肯存在身上，隔一天就看涨。”不使他的就下跪，还不起的他就说是“坑”（即赖债的意思）了他的“义学”钱。武训就这样经过高利贷的道路，很快又变成一个地主。有的农民还起他的高利贷，把土地给了他；有的农民交不起租子，也把土地抵押给他。这样他的土地和高利贷数目便逐渐增加，到最后共达一万七千吊（“临清县志”第十二册第九十页至九十一页）。武训终于如愿以偿，打着“兴学”的招牌，披着乞丐的衣裳，爬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

武训柳林“义塾”的基地是一个小地主郭芬捐的。郭芬为什么肯捐这

块地呢？郭芬的本家郭培先（七十三岁，新中农）告诉我们这样一段故事：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办学，有一天碰上豆沫就问：“豆沫，你老喊兴学，为啥几十年不兴？”武训说：“没地盖房子。”郭芬说：“没地好办，东门外有我的地。”武训没得话说，磕了个头就走了。后来杨树坊和武训谈了话，武训不得不答应，这才“刘备招亲，弄假成真”，在杨树坊等人的命令之下，在武训五十一岁的那一年，也就是从他二十一岁打“兴学”招牌起正满三十个年头的那一年，他才和杨树坊合办了柳林镇的“崇贤义塾”。

自从这个学校办成之后，武训就不仅是流氓的首领，地主家的熟客，又成了官府的上宾。堂邑县官郭春煦请他吃饭，山东巡抚张曜召见了他。武训在郭春煦的宴席上得意地唱道：“摘摘帽，出出火，修义学的就是我。”郭春煦为什么要结识武训呢？柳林“义塾”的学生，现年八十一岁的老秀才倪瞻云对我们说：郭春煦外号郭糊涂，本来因事就要丢官了，忽然发现了武训，赶忙上禀，因此有功，保住了纱帽。继柳林“义塾”之后，武训又办了馆陶县杨二庄“义塾”，但武训出钱较少，主要是用的了证和尚的庙产。说到了证和尚，也是一个和武训颇为相象的人物。他同样是穷苦出身，但当了和尚以后，就到北京活动过。回到馆陶，陆续掌管了三个庙的庙产。仅其中西刘庄一个庙，便有土地一百七十亩。除土地外，了证也放了四千余吊钱的高利贷。虽则是一个大地主和大债主，他也和武训一样，实行苦肉计，故意“一条棉裤穿九年”。对自己的穷本家，则是“一升半碗都不借”。据群众说，武训在三十岁左右就拜了证为师，是为了想在钱上打了证的主意，

而了证则是利用武训勾结官厅的名望和势力，借兴学以保庙产，他们就这样互相结合起来办了杨二庄“义塾”。

至于武训在临清的第三所学校，则是在临清的大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的控制之下直到武训临死的那一年才开办的，刚一开办，武训就死了。

武训宣传者们高兴歌颂武训的“孝行”和“友爱”，这事我们也作了调查。和这种歌颂相反，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武训早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七十九岁的郭继武说：“他娘他哥都没沾他的光，他娘死的时候还不是象一条狗一样。”有人说他娘死了他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在武训正患财迷病的时候，这可能是事实。群众说，武训把要来的干粮拿去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的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李士钊在他的《武训画传》中说：“武训为了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放过四十石红高粱赈济灾民。我们多方调查，群众都说没有这回事。关于武训不娶妻的故事，武训的宣传者也认为是一项重要的“苦行”。据我们调查，武训确没有娶妻，却是拜了许多女人做他的所谓“干娘”。清末的武训宣传者陈代卿，在他的“慎节斋文存”卷上的《武七》一文内说：“武七未没数年前，每见少妇，必叩头乞为义子。或讶而诘之，则曰：吾天罚寒乞，目不识丁，今生已矣，愿来生投善地有福读书耳。”为什么修来生一定要拜干娘，而且一定要拜年轻的干娘呢？这使人们很难理解。但武训用迷信的话头掩盖他拜干娘的行为，去对

付那些“讶而诘之”的人们，这是可能的。清末山东提学使罗正钧所编“乞人武训兴学始末记”收录陈代卿此文，改称《武七小传》，却把这一段叙述删去。一九三四年临清武训小学校长国民党人郭金堂所编《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也是这样。这应当是这些武训宣传者们所谓“为贤者讳”的道理，认为这一点如不删去，会显得武训不象个完全的“圣人”。但“未没数年前每见少妇”也不甚确切，据群众说，武豆沫是在他一生中拜了经过他选择的许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妇做干娘。武训自己也公开地唱：“说一百个媒，认一百个干娘，吃一口妈妈，死在路旁”（“吃妈妈”即吃奶）。武训晚年在临清有一位干娘，现年七十多岁，青年守寡，生了个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我们在武庄访问时，见过一位老太太，八十多岁了，他自己也不隐讳她和武训的关系，说豆沫吃过她的“妈妈”。在场的武金兴的妻子听了生气地说：“你干么说这个！”这位老太太说：“干么不能说，人家（指武训）不是凡人！”在她的心目中，武训不但成了名，而且成了神，她感觉她和武训有这类关系是光荣的。但此人却非武训的“干娘”，而是他的族弟妇，年轻时就守寡。

四十二岁以后大发起来的武训，确实还是披着一件叫化子衣服，往来于堂邑、临清、馆陶、冠县一带地方，但已经不是乞丐，而是一个大债主和大地主了。杨树坊的孙子七十岁的杨光汉（地主）说：“武训晚年的工作主要是催租、讨息、检查学校，拿着各县绅士们替他立的缘簿到处募捐，并推销《太上感应篇》、《阴骘文》、《灶王经》、《劝世文》等“善书”。

孙瑜和李士钊，都说武训反对立牌坊。据我们调查，确实没有牌坊，只有一块“乐善好施”的匾额，我们拍了照片。孙瑜和李士钊的根据，大概是因为郭春煦在其“初次请奖详文”（兴学始末记，即罗正钧所编书，下同）里说过：“此案例奖，本可建坊。惟该乡民并不好名，即蒙奏准，断不为此，则是旷典仍同虚设。将来拟由卑职遵照奖案，改给匾额，悬挂义学，合并声明。”我们认为这一“声明”是有原因的，郭春煦不过用自己的嘴代替杨树坊说了话，不愿意武训建坊的是杨树坊。因为在当时社会上，建坊影响极大，且必建于武庄而与柳林“义学”分开，这对杨树坊很不利。匾则影响较小，且可“悬挂义学”，对杨树坊较有利。后来张曜不听郭春煦的话，还是奏请清帝“俯准堂邑县民武七自行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并已获准。但这和杨树坊的利益冲突，到底不能实行，还是挂匾而不建坊。为什么建坊就算“好名”，挂匾则不算“好名”呢？这是说不通的，因此孙瑜和李士钊率性把这段挂匾的故事也隐讳起来，说成武训反对建坊，反对接受清帝的荣典。但当地群众却说，武训曾着人抬着这块匾在柳林镇上游街数日。武训死后，武家和杨家不断斗争，武家竟至被杨家迫死两条人命。这两条人命，一条是武训的助手武茂林（此人上了孙瑜的电影），一条是武训的过继来的孙子武鲁林。到后来，武家才从柳林学校将这块“乐善好施”匾额打黑夜里抢回去，挂在武庄的武家。我们是从武金兴家里看见这块匾，并从武金兴和柳林、武庄的群众口里听到武杨两家长期残酷斗争中杨胜武败的经过以及黑夜抢匾的“最后优胜”故事。

就在武训生前，武训这个流氓大地主和他的合作者那些有功名的大地主朋友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我们看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大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利用。一到利害冲突，武训斗他们不过，总是迁就妥协，但是心里不甘。据群众说，武训很想在死后替他自己修个祠堂，但杨树坊不肯。武训的忠实助手武茂林，看了过意不去，他又有心在武训死后承继武训的行乞兴学事业，他就向武训说：你死之后我一定要替你修个祠堂。武训立即从炕上跳下来给武茂林磕了一个头，表示感激和拜托。这是武训临死以前不久的事情。因为武茂林经管过武训的财产，柳林学校立起以后他也还能代表武训和杨家所派人员共同经管学校的财产，此外，武训很可能还有一部分未交给学校的私产，例如某些房产和某些放债是由他管理着，所以武训一死，武茂林就不顾杨树坊的反对，修起祠堂来了。群众说，当时杨树坊反对很坚决，说“钱是义学的，不能修祠堂”，并且不许武茂林过问武训的财产和学校。但是武茂林还是要修。没有钱就向商人赊购材料，动起工来，祠堂居然修成了。那边杨树坊坚决不认账，声言武茂林和“义学”无关。这样一来，赊卖材料的和包工的人们发慌了，大伙儿向武茂林要钱。杨树坊又威胁武茂林，说商人们要向县里告他了。武茂林这才知道自己走进了绝路，一索子吊死在武训祠堂的门口。群众认为武茂林也是个流氓，但对他死得可怜这一点，却表示很大的同情。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武茂林是“活活被杨家逼死的”。只有在一九一三年任过武训学校董事的穆仲山（柳林镇人，六十六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流氓武茂林，和武训没有

任何关系，连跑腿工作也没有做过，死是他自己要死的，并没人逼迫他。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显然歪曲了事实。穆仲山又说，武茂林死前做了两块神主，放在祠堂里，一块写的是武训，一块写的是武茂林自己，然后才上吊。我们认为这点可能是事实，因为武茂林是以武训的继承人自居的，武训生前也可能以此托付他。武训虽然和杨树坊合作，但有很大的矛盾，武训认为只有武茂林这一类人才是最可靠的人。

武茂林是武训的远房侄孙，一生帮助武训干所谓行乞兴学，结果被杨树坊逼死。武鲁林是武谦的孙子，武克信的儿子，在武训晚年过继武训为孙，被杨家控以“抗不交学租”，县官捉去拷打重伤，放出来，第二天就死了。我们在前面说过武训不顾家，这是他少年和中年的事。到他老年，大约是对杨树坊控制过严不满，同时社会舆论也对他不满，还是请求杨家允许拨出了四十余亩地以作武家祭田的名义交给武鲁林的父亲武克信耕种，同时以每年交租钱十串给学校的条件满足了杨家。此事曾在官厅立了案（见兴学始末记，说是四十亩，武金兴告诉我们是四十余亩）。但杨家后来硬夺回去，否认祭田，肯定是学田，派武鲁林送重租，武鲁林出不起，发生争讼，因此人被活活打死，地被夺去。这就是武家“两条人命”的公案。群众对于此事一概同情武家。当武金兴向我们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和他都感觉难过。武金兴沉痛地说：“我们和杨家有仇！”

关于武训的流氓帮口问题，武训是否有私产问题和武训死后三所学校的情况问题，我们也作了一些调查。这三个问题有连带性，我们就将这些说在一起。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当过“赋房老总”的武训舅父崔老华是个流氓。我们又提到武茂林是个流氓，武茂林并且是武训用做在堂邑方面替他经管大部分财产的一个贴身亲信人物。

在堂邑方面，武训还有一个亲信人物，名叫许谨传。他是赵郎寨人，死了多年了。我们在他后代的家里找到一本武训的“地亩账”抄本，证明他曾替武训管理过一部分土地。根据这篇“地亩账”所载，光绪十七年十二月至光绪十九年十一月武训买地五十六亩多，约值一千吊左右，这里边就有赵郎寨的地。但这五十六亩多的地是武训在光绪十四年开办柳林学校以后买的，不但在光绪十四年六月堂邑知事郭春煦的“初次请奖详文”（兴学始末记）所列武训兴学捐款七千余串之内不可能有这一笔，就是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武训死后（武训是这年四月死的）堂邑知事金林的“二次请奖详文”（兴学始末记）所列武训兴学捐款，还是光绪十四年郭春煦的同一个数目，并未增加一文。因此我们断定，光绪十四年以后武训在堂邑方面所增加的财产是他的私产，并未捐入学校。许谨传就是替武训管理这部分私产的一个人。在武训死后，许谨传的长子许功珏，曾被杨家以“抗不交学租”的罪名关进牢里过。根据这一点，就可知道武训生前没有交出的私产，凡是被地主们知道了的，在武训死后都被地主们以学田名义夺去了。武茂林手中也很可能有这种性质的财产。武训在光绪十四年以前所积的财产是否全部捐给柳林学校，也是可疑的，很可能有一部分未交出而由武茂林管着，武茂林之死可能也和这点有关，不过我们未找到确实证据。

许谨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兴学始末记”所载靳鹗秋的呈文里有一段说：“赵郎寨、王二大寨等村，旧有善书会一道（原文如此，疑有误——笔者），武训捐助京钱二百余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内。许谨传等欲为武训立碑，武训不许。每年齐社一次，武训不论有何事故，必亲身到社，并遍阅每年所印善书簿记。又自取各善书若干卷随身携带，到处施放”。这个“善书会一道”看来象是个会门组织，许谨传是个头儿。武训则因出了许多钱，成了这组织的大头儿。由此可知，许谨传也是一个拥护武训那一套，并帮助武训工作的人，是武训的亲信人物之一。他很有些象武茂林，不过他干的是“善书”，不是“兴学”罢了。

根据我们在馆陶的调查，那里也有一个武训的亲信人物，名叫汪信远。此人是个有九十来亩地的小财主，杨二庄人。据群众说，此人好赌，爱管闲事。因为赌的原故，他借了武训十几年的债，还不起，将四十亩地和九间房子折给了武训，充为杨二庄学产，但地还是归他种，并且因此汪信远就成了武训在杨二庄学校的代理人，做了这个学校的首事和管事员之一。因此武训于汪信远有恩，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另一个首事和管事员是了证和尚的外甥，举人老爷，杨二庄人，名叫汪毓藻。他是了证的亲信，后来在这学校教过五年书。汪信远和汪毓藻代表武训和了证两派，武训和了证死后，他们二人为争学产打官司，成了对头。两人子孙的意见也是冲突的。一方面汪信远的儿子汪景东（四十九岁，现在是中农）和汪景东的侄儿汪毓芳（三十九岁，中农）都说，杨二庄义学是武训依靠汪信远办的，了证只出了一些钱。另方面

汪毓藻的儿子汪宪章（七十八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则说，义学是了证办的，武训只出了“十吊钱”。我们又在杨二庄义学里看见两块碑，同是光绪十五年所立，同是馆陶县知事彭元熙写的。一块完全吹嘘了证，根本不提武训。另一块则以吹嘘了证为主，附带替武训吹了几句。这种怪事，当然只能以地主和流氓的矛盾来解释。

在临清方面，也有一个帮助武训管财产的亲信人物，叫于殿元，也是个流氓。于殿元在光绪二十二年武训刚死几个月后向临清州官控诉靳鹗秋的禀状上说：武训“有心在临清另创义学一所，伊一人因独力难办，伊知身（于殿元自称——笔者）自幼专心善事，命我与伊帮办。有赵一琴主盟，与身结拜生死之交。……讵武训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间染病，身日夜侍奉，至将死之时，命身当面立誓，以后如不诚心接办，天诛地灭。讵有恶衿靳鹗秋……将义学霸持，诓去缘簿不给，复不准接办”（兴学始末记）。临清州绅士张階等则代替靳鹗秋反诉于殿元：“武训创修义学，于殿元巧与结盟，不过与武训作伴，义学中并无伊之姓名。且于殿元之素行邪正，职等概不得知，但伊在夏津因盗案被押，武训当堂保释。嗣后在义学看门谋食，此外毫无操劳。伊于缘簿内竟托使京钱三十余吊，职等知伊从中取利，因此将伊逐出不用”（同上书）。于殿元，鲁西夏津人，打上述那个官司的时候他是五十三岁（同上书）。于殿元诉状中所说的赵一琴，是当时临清的有声望的大绅士，是个举人。武训和于殿元“结拜生死之交”，要赵一琴主盟，赵一琴也肯出面为他们主盟，我们判断是和争夺临清学校管理权一事有关的。武训愿意赵一琴一派辅导于殿元在他死后接管这个学

校，而不愿意靳鹗秋一派管这个学校。故靳鹗秋方面的人也不能否认武于结盟赵为主盟一事，而只能说“巧与结盟”。

上述诸武训亲信流氓人物，除崔老华做“赋房老总”，许谨传为武训经管《善书》，未干“兴学”这把戏之外，武训、武茂林、汪信远、于殿元，都是干“兴学”的一型人物。武训一死，武茂林、汪信远、于殿元都受到地主阶级的打击，武茂林被迫自杀，汪信远被排斥，于殿元被逐出学校。他们和阿Q不同，不是“不许革命”，而是不许“兴学”，因为地主阶级不要这类人物了。

因此我们断定，武训生前，在鲁西一带，有一个相当大的流氓帮口，而武训、武茂林、许谨传、汪信远、于殿元及其他我们尚未查出的人们，则是这个帮口的核心人物。武训的社会基础是流氓帮口，以此去与地主和官僚合作，加上特殊的“兴学”关系，地主就临时地利用他，官僚则想利用得更广更久些。这一点，我们从武训死后各处“义学”皆先后因争学产停办，后经官府扶持才又继续办下去这一事实，获得了证明。

武训和他的合作者大地主们之间的矛盾，在武训生前就有了，只是没有爆发。其原因之一，是武训有省城官僚的支持。州县官是听大地主的话的，但也不得不顾及省城官僚的意旨，因此武训还吃得开，还能和大地主杨树坊等共同管理校产。武训一死，三所学校都发生对财产的争讼。地主们把武训的亲信一脚踢开，不要他们。接着是几派地主互相争斗，闹得乌烟瘴气。在堂邑方面，是巡抚出来调停，挂上“武训初级小学堂”的牌子，名义上不算杨家学堂了（兴学始末记载武训

疏族“陆军司务长”“五品顶戴”武昌达，在宣统元年控告杨家说：“前数年与今年之学生、俱系姓杨者，与杨名远在四服之内，郭、穆、常、柳、韩、赵等姓一个无有”), 管理权也从杨家分出一份给另一派地主，称为“帮理”，敷衍一时。在临清方面，学校本来是武训和临清关包税商人施善政合作办起的。武训死后，施善政也因贪赃被抄没，学校就被另一派大地主夺去，并且说钱都是他们出的，武训并没有什么大功劳。以上堂邑临清两方面的斗争，大部分可从“兴学始末记”所载流氓和地主、地主和地主间的控诉、反诉及官厅往来文件中找到根据，一部分是我们从群众中查得的。馆陶方面，则是汪信远和汪毓藻为争校产打官司，结果是学校由官办，校产归公。这方面的材料，是我们从馆陶群众中查得的。我们从武训生前和死后这三所学校的情况看出，不管地主也好，武训这批流氓也好，主要地都不是什么真正为了兴学，而是为了争这笔财产的管理权。

根据上述各种材料，使我们了解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及其流氓兄弟们和地主阶级有矛盾，但在他生前这种矛盾还没有表面化，主要靠了官僚尤其省城官僚方面的维持。武训一死，他的学校先后瓦解，财产被地主霸占侵蚀，他的亲信都被打击。当地群众对于武训是嫌恶的，但对于受打击最惨的他的代理人，例如武茂林，则是

寄与同情的。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某些思想错误的人们也喜爱这样一个人物，而为之尽力宣扬。这样，就迷惑了许多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因此，揭露武训和武训宣传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

在武训死后，在鲁西及别地出现了一批吃武训饭的人。其中的一人是临清的号称“武训第二”的王丕显，是一个借兴学发财的学棍，这里不来详说。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栋。武金栋，堂邑武庄人，是武训的疏族，现年七十八岁，他就是现存的一个活武训。他在武训死后一意学武训，见有钱人就磕头，低眉顺眼，出口成词，到处募捐，很积了一笔钱。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到过南京，为国民党所赏识，捧为活宝。他和我们见面，还是口中念念有词。他对群众的态度很坏，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在土地改革时把他当作了斗争的对象。我们找他谈话，柳林镇的群众很感诧异。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群众指着说：“为啥这家伙又来了！”

“乐善好施”匾额

匾上的文字是：“五品銜署东昌府堂邑县正堂郭稟奉欽差帮办海军大臣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山东抚提部院张奏奉旨乐善好施光緒拾五年三月日立”

三、武训学校的性质

武训办了三所学校。堂邑县柳林镇的“崇贤义塾”，是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办成的。武训和了证和尚合作，而主要是用了证的财产办成的馆陶县杨二庄“义塾”、成立于一八八九年，即光绪十五年，这个年代，和以前一些关于武训的著作的说法不同，我们是根据现存于杨二庄的两块石碑上的记载。临清镇御史巷“义塾”成立的那年，也就是武训死的那年，即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经过调查，我们认为，三所学校的性质是一样的，那是为地主和商人办的学校，但“崇贤义塾”是最典型的一所，我们就把重点放在这所学校的调查上。因为“崇贤义塾”是武训的第一所学校，而武训在这所学校成立的第九个年头才死去，无疑的，他在这所学校上用心计是特别多些。柳林镇位于堂邑县的西北部，距堂邑城和临清城均为四十余里，是一个较堂邑县城还要大些的集镇。

根据我们调查的材料看来，柳林镇这所学校，无论是在学生成份方面，或者是在教师和首事人（校董）的成份方面，对于劳动人民说来，都称得起是一所不义之学。

武训学校的不义的性质，几十年来被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等反动统治者的宣传所粉饰和掩盖着，他们宣传武训兴的是“义学”，为的是“贫寒”。而目前的武训宣传者们，例如研究武训七、八年之久，并亲自到堂邑调查过的孙瑜；聊城（距堂邑四十五里）人氏，自称研究和调查武训将近二十年的李士钊，却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孙瑜）；“这位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觉者”，

早已“实践”了“教育为人民”，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和“人民大众的牛”（李士钊）。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是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散布反动思想，欺骗人民群众的。

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例如穆仲山（堂邑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穷人念书。”当我们问是否他自己听见过，他说他听见过，并且补充说：“我那时已经十三、四岁了！”其实武训死的那年他才十一岁。最妙的是他为了和我们谈话，陡然长了四岁年纪，对我们说他是七十岁。我们经过其他方面的调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岁。可是，劳动人民萧振禄（堂邑县萧集村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为新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的学校穷人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现在的学校才是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为了彻底查清武训学校的内幕，我们访问了不少的老年人。其中记得最清楚、讲说得最详细的，是堂邑县倪屯村的倪瞻云。他崇拜武训，称赞“义学”，可是他肯说老实话，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不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现年八十一岁，在“崇贤义塾”读书达七年之久（一八九〇年——一八九六年，即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二年），并且是个秀才。这位记忆力很好、精神颇佳的老人，还笑迷迷地对我们

说：“武训还做过我的媒人哪！”他告诉我们，“崇贤义塾”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学生中，有一些是跟着老师来念书的秀才。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他那一班学生共有五十多人，因为年代太久，他只记得起三十四人。这三十四人当中，就有二十三人进了学（秀才），一人中了举。下面这份经班学生调查表，主要是根据倪瞻云的述说，加上其他一些人的意见列出来的。

表1 武训“崇贤义塾”经班学生调查表（一八九〇年——一八九六年）（略）

表2 武训“崇贤义塾”经班教师调查表（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八年）（略）

表3 武训“崇贤义塾”蒙班学生调查表（一八九五年）（略）

表4 从石碑上抄下的“崇贤义塾”第一批首事人的名单（略）

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

我们将武训学校的调查集中在柳林镇，将武训高利贷的调查集中在临清镇。这是因为武训的学校，柳林是典型，而武训的高利贷，则临清是典型。

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他的剥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债，剥削

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在临清的时期，从光绪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〇年——一八九六年），武训所进行的剥削，其主要形式为高利贷。那时候，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当时的劳动人民之前。他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武训究竟有多少财产？由于我们现在得到的材料还很不充分，这个问题不能确定地回答。而且几种材料，互有出入。多数材料说武训前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所积财产总数为一万七千余吊，其中堂邑九千余吊，馆陶五千余吊，临清三千余吊。

临清州官庄洪烈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所作《武训遗像记》（《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第六十八页）中，就是这样说的。另一说是武训在临清的财产不止三千吊，而是二千两银子。武训死后一年（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临清州绅士张隣、钟维岳等十七人，曾两次禀请州官给奖。在他们的禀状（同前书第八十一至八十三页）里，就是这样记载的。

根据他们的记载，武训在临清遗产的项目和数量是这样：

1. 御史巷义塾宅房一所 四百两
2. 修理和添建费 一百两
3. 当田地六亩 八十七吊
4. 买铺房一所 二十六吊
5. 当铺房一所 一百吊
6. 贷放给钞关经书 六百两
7. 零户贷放 一千余吊

合计总数为二千余两。从上表看，除第一、二项共五百两外，其余五项共一千五百两都是他进行剥削的资本，而其中投资在房地产上的，比起放债的部分来，要小得多。而且一部分房产，其来历也还是高利贷。买价二十六吊的那所铺房（租户为一剃头铺，本文后面还要提到）就是原屋主无力偿债，折给武训的。因此我们说武训在临清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

第七项零户贷放一千余吊，究竟是多少吊呢？根据武训死后临清“义塾”首事人之一增生靳鹗秋的稟状（《兴学始末记》第八十一页），从光绪十七年到二十二年武训死为止，零户放债部分为一千三百五十六吊。

武训贪婪地吮吸着用这笔资本剥削得来的利息，除流氓帮内和“干娘”方面，他必然要花费一些以外，他舍不得多花一文。他把所得的利息，再全部转为资本，继续“驴打滚”，追求更大的财产。他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一方面是为了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一方面也是为了必须保持这“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他的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

不错，在他的收入中，除已投在学校校舍和开办费上以外，其余资本所生利息无论如何总还要抽出一点来用为学校的经常费，如付教师束修等，但是很显然，这是他不得不花的一点开销，没有这点开销，他就当不成大债主、大地主、大名人，也爬不到封建统治者的宝座脚边去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债主在临清镇的剥削情形。

武训进行重利盘剥的对象是劳动人民，但他直接放债给劳动人民的时候却很少（特别是在临清的最后几年当中），除非有抵押品。他不相信穷人，他“认钱不认人”，这是临清镇上一个见过武训的今年六十九岁的搬运工人孔昭文说的。武训经常通过地主、绅士、银钱号，或者地痞、流氓，去剥削劳动人民。他自己的歌《穷的使，富的保》，就说明了这件事。这是他放高利贷的原则。

还有一条附带的原则：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算账。这是临清镇上一个八十五岁的杂货店经理赵名选告诉我们的。和武训同村的武庄的两个老年人（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武克科（七十八岁）、武玠（七十岁）和乔庄的林雪亭（六十九岁，中农）也都说，武豆沫要“三辈人烟”才放。他们还记得，武训一面放债，一面常唱这样一个带着诅咒和威胁意味的歌：“谁要把我武七坑，老的少的不安生。先长疮，后生病，人亡家破死个净。”

武训无论在堂邑，在馆陶、在临清放债，其利率都是当时的最高标准，月利三分。这是上述各地被调查的人所一致肯定的。但也有例外，他向地主豪绅或银号存钱，由他们转放高利贷，利率就只能比最高标准低一些，以便地主他们为他经手放债，也得到一部分好处，也就是说合作放债，利益均沾。例如放给钞关经书的六百两，其利率为二分二厘，这是张陪禀状上载的。这种情形比较少、武训的多数放款还是三分利，比普通要高。梁启超在给武训作的传记中也不讳言：“息则视常加重。”今年七十岁的秀才于明轩，证明武训放三分利是公开的，

合法的，普通人不行。据他说，在满清时代，当地有这么一条规矩，衙门里判断债务官司，如果发现放的是三分利，官可以没收债款。可是武训却可以不顾这些。

七十六岁的富商赵镜波也证实了这点。他记得武训常放钱给殷实铺户，三分行息，按月结账。他也说，如果穷人要使他的钱，就必须有抵押品。

现在在临清武训小学（临清“义塾”的后身）当教员的郭华庭（三十八岁，中农）谈，他过去曾听见他的祖母说过这样的事。武训在他们村上乞钱，当人家不给他，说没有钱的时候，武训马上掏出钱来说：“我有钱，我放给你。”他就这样硬放给人。当然，那人是武训估计能够回本付息的“好户”。

武训只要积满一吊钱，就拿去存放给地主和殷实买卖家。他经常采用的办法是跪下磕头。“一吊钱每月要三十个制钱的利”，这是贫农冀熙亭（七十三岁）讲的。他在满清时代和人家合伙开过钱铺。

除了临清镇上，附近乡村中，武训亦常去活动。校场村大地主李惠兰是武训的高利贷合作者之一。河西地主李廷扬也是一个。魏浚哲（贫农，过去曾做衙役，商人，七十三岁）、张紫绶（中农，过去曾开过钱铺，七十岁）都还记得有这样的事。

武训对他的这些高利贷合作者是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上面所提到的赵名选告诉我们：有一回，武豆沫上河西老官寨地主进士张东瀛家去放钱。张东瀛不但拒绝，并且和他冲突起来，打了武豆沫一巴掌。过了十来天，武豆沫又去张家，向张东瀛赔罪，小心问好：“进士老

爷！你还生气不生气？”这事曾为人们所传，是实在的。

但武训在临清的主要的靠山还不是那些普通的地主富户，而是那个替他办御史巷“义塾”的施善政。他投靠了他，住在他家（“寓钞关街施善政家时，声誉大著”，见陈恩普：武训先生兴学碑文），也死在他家（一说是病到严重时，从施家搬到义学去死的）。这个施善政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临清钞关世袭四大包税者《经书》——俗称《经程》——之一，并且是四个当中的头一把交椅，临清的一霸。他生活得很是阔绰，临清的老人说他“吃尽穿绝”。

临清直隶州是当时南北运输要道——运河上的重要码头之一，临清关的税收为数颇巨，由州官直接经管。《临清县志》云：“临清钞关创自明初。……乾隆中叶专委临清州牧兼理税务。其时所解税款多或六、七万两，少或二、三万两。其余浮收，则均归中饱”（第四册第十一页）。历任州官虽则抓住这个买卖决不放松，但他究竟不能亲自动手去捞钱。他把这件事委托给包税者“经程”去干。上下合伙，通同作弊。那时候，施善政等“经程”向满清专制朝廷每年包缴税银六万六千两，多余的钱由他们分赃。临清至今仍流传一句话，叫做“够不够，六万六”，可见这个买卖在当时是如何耸人听闻。现在临清的一些老人们说，全部收入可达包银的十倍，有的说是二三倍。据《临清县志》所载，估计至少是二十五、六万两（同前书前页）。

这数目是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另一州官杜宾寅到任，“清除积弊”后，所缴的税收总额。杜查办了施善政等四大“经程”。这是根据刘季重说的。他今年六十二岁，是贫民，过去开过印刷字号。

但这件事的发生，已在武训死后四年。当武训在时，临清施善政是当地数一数二的有钱有势的人物，而“乞丐”武豆沫就巴结上了这样一个好人。临清的“义学”是他包办的，大宗的高利贷是他经手的。这个施善政，就像杀人刽子手杨树坊一样，到了孙瑜、李士钊们的笔下，又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开明绅士”。

施善政所以要利用武训，理由是很明显的。施善政是个收入极多的包税者，他必须采用种种方法来保持他的受人觊觎的肥缺。他曾办“募善会”，每到冬季施粥；他曾控制一个名为“大仙会”（一贯道前身之一）的组织，扶乩讲道，散发善书。武训所出售的善书，除了他自己在堂邑赵郎寨办的善书会以外，即取自该处。他支持武训办“义学”，对他的包税是有利的，“义”学掩盖了括削。这个世袭的，但是没有官衔的包税商人，自须与“五日京兆”（临清州官时常撤换，有几个月就调动的）的官府多多联络，而武训在当时已是一个煊赫一时出入官府的人物，柳林镇上挂着“钦差帮办海军大臣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山东巡抚张曜“奏奉”光绪皇帝所赐的“乐善好施”匾额，褡子里藏着张曜所赏的黄绫“官捐簿”，他曾“遍谒历任学院及邻邑府厅州县”（刘子舟：义学正武公传），“所有州牧县令，以至抚藩臬道，亦各表钦慕之诚”（沙明远：纪武训兴学始末）。施善政能控制这样一个为封建统治者所宠视的“善士”在家里，当然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弊。

那时候，武训和官府关系之密切，在统治阶级上流社会中声望之隆，除了上面这些文字记载可资证明外，曾在当时当过盾甲兵的李汉邦

(八十六岁，贫民)的话，也可参证：“武七，没人敢惹他，州官陶锡祺也不当他是外人。”

我们在劳动人民中听到的故事，更显得出武训勾结官僚的面目。上面提到过的搬运工人孔昭文讲了一个故事。武训放了二十吊钱给一个姓张的衙役，那衙役是个流氓，想吞没这笔钱。武训对付的办法是睡在衙门口过夜。到第二天早晨，武训抓起自己拉的一堆屎要吃，过路的人围着看奇事。武训嚷着要张衙役还债，这件事就闹开了。这事不能不闹得州官陶锡祺也知道了，大名鼎鼎的武训躺在自己的衙门口吃屎，死也不肯走，实在不像样子，只得命令那个张衙役赶快把本利一并还给武训。孔昭文说：“你看武豆沫本领多么大，衙役都不敢坑他的钱，他连络上了大官儿。”这位年近七十的搬运工人谈到张衙役的时候，还脱下衣服绞成一股，当作发辫，盘在头上，两手握拳，生动地形容了一下这个流氓的蛮横神气。可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畏之如虎的流氓，也不是武训这个更厉害的流氓的对手。

武训依附权贵，放债收息，在临清这地方，除有施善政为他经营外，他还把成十吊的钱，放给临清的银钱号、商店和地主。

那时候临清为南北货物交流之地，粮船络绎，市面繁荣。单是兑换元宝、碎银、放款出帖（银票）的银钱号（包括小的钱铺）就有七、八十家。最大的三家是：马市街的“际元”、锅市街的“聚兴”、青碗市口的“永亨增”。临清老人们说，当时有一句俗话叫做：“南际元，北聚兴，中间夹着个永亨增。”

这三家大银号各有联号。“际元”、“际昌”、“际泰”……叫做“际字

号”，都是碾子巷大地主徐家“徐大头”所开设。“聚兴”、“宝兴”、“玉兴”……叫做“兴字号”，都是在乡下拥有三十顷土地，在镇上拥有一百来家铺子的冀耀祖“冀老耀”所开设。“永亨增”、“永馀厚”……叫做“永字号”，都是东大辛庄大地主孙家“孙百顷”所开设。

据调查，武训与这三个大地主都有关系，不是放钱给他们本人，便是放钱给他们所开设的字号。存放钱数每次约二、三十吊，或五、六十吊。

供给上项材料的是郭宗周（茶馆掌柜，六十七岁）、张琴轩（城市贫民，七十三岁）、李玉岭（小贩，过去曾做衙役，六十九岁）。

武训怎样通过地痞流氓去放高利贷，是过去曾做衙役的魏浚哲说的。魏曾经认识一个卖鸡肠子的小贩。小贩的老婆是个赌鬼，经常使武豆沫的钱，每次数目不超过两吊，利息三分。武豆沫怕她坑账，每次只放一个月，到期本利清还。还有一个流氓赌棍叫吕腊月儿，武豆沫也经常通过他把高利贷放给下街卖包子的、做小买卖的、卖纸元宝的。

魏浚哲那时住药王庙街，常见武豆沫三天两头上那儿去放账收账，但都是小注儿的。

武训也偶而直接放钱给劳动人民，但更充分暴露了他的残酷无情的高利贷者的面目。

上面已经说过的张琴轩，知道武豆沫放过一笔钱（十吊左右）给两个管理运河闸门的闸夫，名叫沈广泰、尹成方，是两个苦力。两人为了日夜在头闸口运河上守河的需要，在那河岸上盖了一间小屋。武训这

笔借款即把这间小屋作抵。他们借了这笔“驴打滚”后，再也无力偿付。武训执行债权，把这间屋子没收。武训没收了这两个苦力的遮蔽风雨的泥打墙的小屋后，租给了一个剃头的，在那经常有船夫歇脚的运河口上，开了一爿剃头铺。新房东武豆沫按月去收房租，每月八百文。《兴学始末记》上也提到这所小屋，并说那剃头铺姓王（第八十三页）。这房子现在还在，我们拍了照片。张琴轩对这件事发表了他的意见：“穷人那敢欠他的，有衙门替他收账呢。”

七十八岁的中医朱镜波说，他在柳林镇的北面五里地焦庄有一家亲戚。那年他十六岁，去亲戚家作客。那天正下雪，在田野里碰到了武七，样子不跟平时一样，弯着背，背了一只木箱。朱很奇怪，问他干什么。武训告诉了他。原来一个串书馆的卖书小贩欠了武训一笔债，再也还不起，武七便把那只书箱没收了。

在我们所访问的上面的一些人中，凡属劳动人民，都说，当时他们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钱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或者用当地土话来说，是“财迷转向”。

他们讲他不大跟穷人拉话，穷人家也不睬他，“谁也不答理谁”，“穷人又没有什么给他，他跟穷人说话干么呀？”武训走在街上，老低着头，不看人，但决不会差过“好户”和大铺子的门，他不是去募化，便是去放债要债。只有地主、绅士家和衙门是武训经常去跑的。人们说：“豆沫随意进出官衙门，狗都不咬他。”有人更说得好：“人眼看不透豆沫，狗眼却看得透。”

事实已很明白，武训既不是劳动人民，也和劳动人民没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他们还说“豆沫”这绰号的意思，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他“没有骨头”、“没有一点刚气”。他们说，武豆沫哪里糊涂，在放账上更不糊涂。六十五岁的城市贫民陈茂林（过去曾作经纪）听说过，武训在腰带上打着许多结，用来标记他放出的账项，不会弄错。对这样一个精明苛刻的典型高利贷者，地主阶级歌颂道：“自一缗至千缗，其利之相积，错落万端，而日利、月利、年利又纷歧杂揉，变幻无不至。训既不知书，复不通数理，惟恃一心记忆，则纤微奇零，无弗综贯。故身为债权者数十年，未尝有债务纠葛事”（沙明远：《兴学始末记》）。后面这一句话，充分流露了他们对这样一个勾结官府，倚仗豪门，因此谁也不敢少他一文账的杰出的高利贷者的赞叹和羡慕。

但李士钊和孙瑜，对武训的高利放债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李士钊采取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态度：“低利贷款给贫农买地……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生产力，保障他们的生活”（《武训画传》第九八页）。孙瑜采取了加以“美化”、尽情歌颂的态度：“又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小桃墓前的两株桃树开满了花。五十岁的武训坐在两人合抱的野栗子大树根，欣然听着茂林向他细谈二十年来的积钱总账。……微风起处，几个小蝴蝶翩翩飞过，迷失在落花的一阵香雨中”（电影小说《武训传》第一五七页）。

但是，读者们，我们是不应该迷失在这样一个精巧布置的谎话的*****阵中去的！

武训经常出入的地主豪绅家

这是临清碾子巷徐家大门。徐是大地主、大豪绅，又是大银号“际元”的老板。武训常去“际元”存款，出入“大夫第”。现在这屋子已归公家，作为商会会所。大门匾额油漆已褪色，但“大夫第”三字的金色仍旧闪着光亮，可以想见当时的威风。

临清砖城东关残垣

太平军在一百余年前守此，清兵攻破之，大肆烧杀，城内有两处万人坑。市街被夷为田畴，至今荒凉一片。我们曾在东关内访问当时的一个盾甲兵，他说武训和常时州官等均有交往。

武训没收苦力的屋子

这是临清运河上头闸口的一所屋子，原系两个闸夫所建，因欠武训高利贷，无法清偿，被武训没收抵债。武训据为己有后，出租给王姓理发铺，每月去收租。

解放后此屋连同学校校产一起归公。现仍有人住，但无人去收租了。

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孙瑜说：武训是“封建主义统制阶级压迫下一个平凡的农民”（《武训画传》序）。李士钊说：武训是“被压迫农民阶级的先觉者”和“模范劳动者”（同上书正文）。的确，我们可以相信，孙瑜和李士钊二人的“立场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同上书著者序）。可惜的是，武训本人却和他们作对，“先生一生的重要事迹”（同上书正文）和他们所宣传的，硬是不“一致”。武训既不是什么“平凡的农民”、“模范劳动者”，也不属于被压迫阶级。他是一个大债主，又是一个大地主，而且是一

个凶恶的具有特权的大债主和大地主。武训的特权，特别表现在他的土地剥削方面。

据我们所知，武训在堂邑有地，在馆陶有地，在临清有地。他在别县是否还有地，我们就来不及调查了。就是这三县的土地，仅据我们调查所得，已是三百多亩。其中以堂邑的地为最多，因为他在堂邑有特权，可以不缴粮赋。堂邑县官郭春煦曾将武训的田产“据稟申详，免捐银米，上宪明批，准银米悉由官捐，永以为例”（贾品重：武善士墓志铭）。因此，我们就将关于武训土地剥削情况的调查集中在堂邑，也有一部分是馆陶的。

我们找到了武训买地文约的一部分，称为“地亩账”，共三册，都是武训逐年买地文约的抄本。这三册“地亩账”上所载文约有一部分是重复的，经剔除重复后，共得七十四笔，计土地二百八十五亩多。这三册“地亩账”分为两大册和一小册，前者是在堂邑武庄武训的曾侄孙武金兴手里找到的，后者是在堂邑赵郎砦曾替武训经管过财产的许谨传的后代手里找到的，都是很难得的历史材料，只可惜后者是被人剥落、剩下不多的残本。

从这三本“地亩账”内所列年代看，武训早在三十岁时就开始当地，四十一岁时开始买地。最初不过一亩、半亩，为数甚少。到四十二岁的时候，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掠夺，仅在这一年当中，即向二十一个农民夺取了土地六十三亩余，仅在三月一个月当中，即买地八次之多。次年，又向十四个农民夺取了土地一百零四亩余。到五十五岁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拥有近三顷土地的大地主。但这还是限于我们所找到的文

字材料，看来还只是武训所占有的地产的一部，或大部，决不是全部。例如，据我们调查，武训在柳林镇还有土地二十二亩一分九厘二毫，连同三册地亩账上的数字，合起来就超过了三顷，共计三百零七亩三分二厘四毫六丝。

现在根据这三本“地亩账”，将其置地时间、方法、地点、原主、亩数和地价等项，列表如下：

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每张文约上的地亩数，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我们见到的七十四张文约内，有三十八张，都是三亩以下的数字；十亩以上的，只有五张。武训每次置地的数目如此细小，足证大都是贫苦农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卖给武训。武训之成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内（从他三十岁算起），用各种残酷的方法，逐步地积累起来的。

表内所列地价参差不齐，原因之一是土地好坏不一。堂邑有一大部分是沙碱地，地价较贱。又表内光绪五年四月十三日买自娄士林的五分五厘零五丝地，买价达四十九千余文，那是因为连同房屋在内的缘故。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三日买自武克岐的一亩七分五厘，买价达五百五十千，其原因也是如此，也是宅基连同屋子。武训把这两所屋子拆了，搬到柳林去盖“义学”。

表内所列地亩数，到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为止，共二二八·四八八五亩，这数字与郭春煦的初次请奖详文（《兴学始末记》）所列数字是极相近的。郭文称：“至光绪十二年冬，统计与买地二百三十亩有零，

用去地价京钱四千二百六十三吊八百七十四文。”我们核计表内这二二八·四八八五亩的地价，其数字为四千一百六十九吊二百四十九文。为什么比郭的数字小一些呢？那主要是因为表内有二亩七分八厘五毫二丝的土地没有地价数字。如果以郭春煦所报地数、除所报地价总数、得出的每亩平均价格补入这笔地价，每亩以十八吊五百文计，二亩七分八厘五毫二丝的地价即为五十一吊五百二十六文，加上四千一百六十九吊二百四十九文，即为四千二百二十吊另七百七十五文，与郭春煦所报的数字只差四十三吊另九十九文钱。郭春煦所报是到光绪十二年冬季止，“地亩账”所载二百二十八亩多是到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止，这里有一年又九个多月时间武训置地数字无记载，可能即是这个四十三吊另九十九文差数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我们所得的地亩账到光绪十一年三月为止，是相当完整的真实历史材料。但是地亩账上也即是表上所有的自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到十九年十一月，武训练置的土地五六·六四四一亩，却始终未见诸满清官吏或地主们的呈报文字内。因此我们怀疑，武训除了所谓学田外另有地产，这种地产可能是他私人占有的。此外，地亩账内缺少从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二日起到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为止的六年又九个多月的记载。从光绪二十年起到武训死的那一年光绪二十二年为止，这两年多的置地记载，我们也未找到。武训越到后来积钱越多，所买的地也可能增加。所以我们说我们找到的三本地亩账仅是他的地产的一部或大部，决不是全部。

武训的凶恶，除了表现在他放债的方法方面外，又表现在他向贫苦农

民夺取土地的种种方法上。据我们此次调查所知，他所采用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农民借了武训的高利贷款，到期还不起，只得把土地当给他。这是武训开始占有土地的主要办法。中布砦的张玉池（二十九岁，中农）的曾祖父，便是因为使了武训的钱还不起，把两块土地（共六亩二分九厘二）当给了他。连二砦唐勤习（七十五岁，原是贫农，现在是新中农）说，武训还是他的舅爷爷，可是有一次唐勤习的父亲要求武训借给他十吊钱，武训不管亲戚不亲戚，借钱就得缴抵押品，他向唐勤习的父亲说：“行呀，你指给我哪一块地吧？”连二砦的张春华（八十二岁，前为贫农，现为新中农）也说：现在连二砦的七十二亩地，原来是西二庄（属馆陶）人种的，因为西二庄的贫农借了武训的高利贷还不起，把地当给了他。

二、武训把已经占有的土地租给农民，农民交不上租，把自己原有的少量土地折卖给他。这是武训后期扩大土地面积的主要办法。西二庄王茂礼（已死，本材料由该村李文兰口述）自己有十二亩地，租了武训二十来亩地，每亩租价八百文制钱，合二斗米（五十斤），两年能种三季，丰年每季能收二斗米，可是因为地洼，常被水淹，经常是三季收不上两季。王茂礼因为交不上租，逼得把自己的十二亩地全折给武训顶了租子，自己只好带了全家五口人去要饭。

三、农民因婚丧喜事急需用钱，把自己的土地当给他，可是到期无钱赎，便将当地变为卖地。在前面表中有光绪六年正月乔庄王学笃卖给武训一亩八分一厘地，文约上这样写着：“言明十年为满，期到许赎，

以至十四年归于义学正。”又写：“死地活口，不许当卖，许本人赎。”可见王学笃是到十年还拿不出钱去赎回一亩八分一厘地，但是又不能用更高的价钱当给别人，所以到了十四年，便把土地给了武训。又同表所载光绪九年三月间，夫人砢的迟万仓把八亩地当给了武训，那张文约上便注明：“十年三月初七日找钱二十二千文，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找钱五十八千文。”可见在当地之后，迟万仓两次需要钱用，最后终于把土地卖给了武训。

四、有的农民虽把土地卖给武训，但在一定时间内，原地户还保持土地的使用权，群众把这种形式叫做“卖马不离槽”。但是如果到期交不起地租，便连土地使用权也取消，土地完全由武训支配。上表载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夫人砢迟万德把一亩六分八厘五毫三丝宅基卖给了武训，文约上写道：“租价钱二千六百七十文，租价钱八月十五日交到，如若不到，将宅基收回。”又，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年关），布砢的张珩松把自己的三亩一分四厘五毫土地卖给了武训，文约上写道：“当日张珩松租回，言明共价四千七百三十文，八月十五日为期，钱不到罚钱三百文，张岩松保。”这就是说：张珩松在年关因为要钱用便向武训交出了自己的土地，然后变为租佃关系，耕种自己原有的土地，并且立下文约：如果第二年秋后交不上租，不但要丧失佃权，而且还要被“罚钱三百文”。这种“罚钱三百文”的办法，一般是很少见的。可见这位穿着叫化子服装的封建大地主武训，比起一般地主来还要毒辣。

在上述各项举例中，有些是在“地亩账”上载了的，有些是“地亩账”

未载的，可见“地亩账”所载并非武训在堂邑馆陶二县所占土地的全部。

以上是武训当时向农民夺取土地的主要情况。在武训死后，一直由地主集团把持的柳林学校校董会，利用了武训原有的剥削基础，向农民继续进行掠夺。一九四三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伪军、民团的残酷掳掠之下，在堂邑造成了死七万多人的大灾荒（堂邑原有二十七万人口，现在仅有二十万人口），柳林武训学校以杨家为首的校董们还正式作了决定：“查本校旧有学田在连二砦者七十余亩，本年因该处地价较高（按因灾情较轻——笔者）武训镇（即柳林镇——笔者）地价较低（按因灾情严重——笔者）经本校董会议决：将连二砦附近学田尽数价卖，即以所得地价，尽数购买武训镇附近地亩。”这时连二砦的土地价格，据该村梁连之讲，上等地值八十元，中等地值六十元，下等地值五十元，而武训学校的校董会在柳林附近买的土地，则最多出二十五元。连二砦的土地平均按中等计算，武训校董会在灾荒年一年所掠夺的土地即有一百亩！由此可见，今天当地农民对武训及其学校的管事人的鄙视与仇恨，实在不是偶然的。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农民说“武七是地主，杨光汉是恶霸地主”。夫人砦的杜汝真，也因为被校董会夺取了土地的租佃权，逼得全家流亡，饿死了他的老婆和孙子。还有个东王信村的林玉其，因为荒年被柳林学校夺去土地，全家十九口人饿死了八口！就是武训过继的孙子武鲁林，也因为欠了一年学田租子，于民国十六年被抓到堂邑县给活活的拷打死了。他的儿子武金禄流亡关外，最近才回来，他的侄儿武金兴到一个小油房做学徒，他

的老婆和弟妇都到地主家当做饭女工。武金兴对我们讲这段历史的时候直掉眼泪，他说：“俺老爷爷（武训）和俺爷爷（武克信）到处磕头，图了个啥呀？！”

大地主武训以“兴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却又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缴不行。”在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有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姓名的，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的不小了。

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全文完）

第四篇：对形势的判断和估计

在《毛选》前四卷里，有很多篇文章都提到这样一个主题：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而这些对形势的判断和估计，一定是同时伴随着党的重大路线、方针、决策和任务的。

因为，对于当前形势的不同的判断和估计，一定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方针和决策，因此最终确定接下来的任务。

比如，在井冈山时期，有著名《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其中就有对当时的形势分析。

苏区时期，就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中也有大量关于当时形势的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有《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抗日战争中期，也就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也有专门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文章，就当时的形势进行判断和估计。

抗日战争胜利后，和接下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以及转入反攻阶段时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这些《毛选》中的文章都是在历史的重要关头，通过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和分析，由此而决定接下来的重大任务的。

这和我们作出重要的决定，规定接下来的任务也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我们能这样一道程序，即作决策的时候先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并逐步加以练习，使得我们对于事物的形势分析越发准确，那么作出判断和决定的成功率自然也就可以大大提升。

一、

建国后，其中最考验对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形势作出准确估计的，就

是抗美援朝战争。

我们这篇文章，就以抗美援朝这个决策是如何作出的，来看一下对形势的估计和分析的重要意义。

首先说一下当时的背景：

1950年6月，全国人民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

美国对朝鲜战争迅速作出反应，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

6月27日，美国空军和海军开始入侵朝鲜的领海和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同时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扰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就在第二天，也就是6月28日，毛主席就在当时的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表明了立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紧接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作出决定，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随即陆续将驻扎在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加上原来就在东北的四十二军和几个炮兵师联合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一共有二十五万五千人完成集结，开始整训，以应对接下来随时可能出现的变数。

但是，要最终确定是否出兵朝鲜，是否要正面和美帝国主义硬抗，这个决策是极难作出来的。

从客观原因上讲：美国当时的钢产量是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

总产值是二千八百亿美元。而当时中国的钢产量是六十万吨，还不到美国的一个零头的零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

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不愿意因为援助朝鲜而敢于冒险和美国直接冲突。

中国出兵会带来一系列可能性，比如美国空军会不会大规模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会不会轰炸东北和国内的大城市？

如果和美军正面冲突，那是否有打赢的把握？会不会引起甚至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如果出现两军陷入僵局的局面，那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会受到多大的影响？会不会引起国内反动势力、隐藏着的特务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水？

这些都是当时出兵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而从当时主观原因上说，即使是在我们内部，大多数人也是反对出兵的。

当然，原因也主要集中在上述客观条件上，大多数人觉得这会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建设，而且有太多不可控因素，不像打国民党军队那样有信心和把握。

这种不同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和风细雨，但是在当时却是存在着很大

争议和动摇的。

这种动摇可以从一件事中体现出来。

当时，毛主席在 10 月 2 日下午召开了讨论出兵援朝的会议，为了提前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报，这封电报实际上是预设了一定要出兵的结论。

在这个出兵的结论之下，讨论出兵会导致的种种可能性，陈述了出兵的必要性，分析了出兵所需要的苏联支援。

然后就等着会议开完以后，在这封电报上加以修改，然后发给斯大林。

电报主要内容包括这几个部分：

一、确定出兵援朝。

二、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作好与美帝进入战争状态的准备，并估计到美帝空军轰炸我大城市、东北工业基地的准备。

三、认为只要在朝鲜战场初期能够实现歼灭美军一个军的任务，或大量歼敌，那么接下来双方的战争规模就不太可能扩大。因为美军会更加慎重对待这场战争，但是反之，如果不能有效阻止和歼灭美军，则其气焰立刻嚣张，很可能发动大规模战役，甚至侵入中国领土。

四、目前已调集十二个师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可以开进朝鲜，第一阶段暂时停留于三八线以北，弄清各方面情况，同时等待苏联武器援助。

五、从战斗规模看，我军装备落后，需要苏联在武器方面给予支援，然后我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加上苏联武器援助，那么就有把握歼灭美军。

六、随后将逐步往朝鲜派兵。

这六条实际上是毛泽东自己草拟的，原先计划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就把电报发给斯大林，商讨武器援助以及空军援助等问题。

这说明，在当时，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定已经是下定了，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会议上很多人都不同意出兵，大家都反对，那这份电报就不能发出去了，因为那么多人反对，实际上就无法作出出兵的决定，自然也就不能把一封已经写好的出兵计划发给斯大林了。

最后会议结束，只能发了一封这样的电报：“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二十年以后，当毛泽东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在那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说：算了吧。后来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最后我们才做了决定，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都去，我看也要感谢苏联，它总是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后来彭总也说：“这个决心不容易下，这不仅要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二、

关于是否出兵的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它不是路线之争，不是思想之争，不是理论之争，不是策略之争，它不像以前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等等。

它仅仅只是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物的形势估计和判断不同。

大家争议的不是该不该出兵，而是能不能出兵。

所有人都知道，人家打到家门口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肯定应该出兵，所以这不是个该不该的问题。

可是最终很多人不赞同出兵，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形势和环境的估计不同，从而产生了能不能出兵的顾虑。

因为过于把美帝估计的强大，把我方估计的弱小，同时把我们内部的经济恢复看得更难、更无法战胜，所以多数人才不赞成出兵。

井冈山时期，苏区时期，林总就是因为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过对于形势的估计和分析，来作为支撑接下来的任务和方针的依据。

而且，形势和环境它不是稳定和不变的，相反，它时刻处于变动之中，比如，一开始计划中认为苏联肯定会提供帮助，至少保证其能出动空军，否则如果没有空军支援，那么因为我们不掌握制空权，那么在朝鲜的粮食问题，就会非常难以解决。

它不像是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打，可以依托周围的人民群众，这场战争是在朝鲜打，因此很多时候无法直接从群众那里解决粮食问题。一旦粮食路线遭到敌军空军的打击，战争就会增加很大的变数。后来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因此，必须苏联出动空军，那么出兵才会更有把握，可是临到决定出兵的时候，苏联那边又反悔了，一开始说愿意出动空军帮助，但是后来又说空军只能在中国境内保驾护航，不会直接进入朝鲜领空，这样一来朝鲜战场上的变数就会增加。

这些新情况的出现，都需要作为领袖的人去加以分析和判断，作出正确合理的估计，否则都有可能遭遇巨大挫折和失败。

因此，在决策过程中，毛主席需要对世界大局势作出正确的估计和判断，又要对国内各种因素都作出估计和判断，对敌友我三方的发展趋势都要进行全面的了解，才能在那种局面下，作出出兵决定，并指挥战争的发展和进程。

三、

在作任何决策的过程中，都加入这样一道工序，即：对当前事物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会大大保障决策的正确性。

因为很多决策，它不是一个道理和逻辑通不通的问题，绝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优劣利弊同时并存的，一劳永逸、都是好处没有坏处的决策，

那就不需要选择了，直接上就行了。

抗美援朝就是这样，它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又有极大的风险性，如果对形势判断和估计错误，那么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你看蒋介石在发动其所谓“戡乱战争”的时候，对形势的判断和估计就产生了极大的错误。

他过于高估了美军装备、以及其掌握之兵力、税收、国家权力、交通要道的重要性，同时他又低估了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威力，低估了群众的战斗力，低估了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和毅力等等。

因此，战争的走向最后完全超出了其预计。

当然，这种对极其复杂事物的判断和估计，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但是我们有了这样的思想，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加入这样一道工序，久而久之，是可以大大提升对形势的判断力的，也能降低生活中很多风险。

最后，重复一个在以往的文章里已经数次提到过的作出决策的流程。

首先，需要的是收集尽可能全面的信息，这是基础。

然后，是对信息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判断。

接着，就是把得出的结论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去验证和发展。

最后，在决策与事物发展情况不一致的时候，就是调整，甚至重来，循环往复，那么也就逐渐能够作出准确的决策了。

因为人获取信息和分析信息的结果，始终是与真实信息的全面性和分析的准确性之间有矛盾的。

人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只能是相对全面，分析也只是相对准确，所以就需要每次作出决策的时候，对形势进行判断和估计，有了这样的估计，就不会轻易认为只要逻辑自洽，这事就能办成的误区之中。

而是能够尽可能保证逻辑性和现实性的一致，这就是对形势进行估计和判断的意义。

第五篇：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

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年，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继续取得辉煌胜利的三年。

这三年的时间里，全国性的土地革命、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也已经提前完成，三反五反运动也已经结束。

于是，一个新的课题就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这个课题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新中国逐步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一、

为什么不巩固新民主主义？

为什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还得从新中国解放前，共产党对于革命

的认识和经济建设的认识开始说起。

首先，在1949年以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我们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点我们此前解读《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已经详细分析过，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面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其革命对象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俗称的三座大山。

这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会去革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命的，非但不革它们的命，而且还要联合，还要用统一战线去团结他们，这里面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

当然，这个联合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联合，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设想，是一面扶植，一面限制。这是什么意思？关键点就是：支持和鼓励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事业的资本主义发展，限制那些有害于人民、有害于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早在1945年毛泽东发表的《论联合政府》里面，就已经明确过：

“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毛选第三卷，论联合政府》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有利于无产阶级，

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相反地，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毛选第三卷，论联合政府》

“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毛选第三卷，论联合政府》

这里面关键的地方正如上面所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是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同时自然也就要保证私有制，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但是这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个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实现），一个是禁止其操纵国计民生。

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主要是利用，利用其活跃经济和发展经济，在利用的同时就是限制，限制其向着有害社会和民生事业的方向发展。

这是在 1945 年还没有推翻国民党统治时期，毛泽东对于经济发展的纲领规划。

到了 1949 年，国民党统治已经濒临颠覆，那么在此时，毛泽东又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呢？

1949 年 3 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样设置了一个纲领，我们来读一下，认真体会一下：

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

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选第四卷，七届中二全会上的报告》

大家看到没有？其实和此前《论联合政府》里提到的观点还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 1949 年的时候，共产党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设想，还是一面限制，一面发展。

发展是为了国民经济，限制是为了不使其操纵国民经济从而无节制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国有经济，把国有经济放在第一的位置，保障其在全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但是，即使是在 1945 年，国民党还存在的时候，《论联合政府》里也不屑隐瞒其政治观点：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屑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和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论联合政府》

这就是说，我们总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消灭私有制的。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社会主义条件还不成熟。

以上，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纲领。

其实这个经济纲领我们今天听起来还是很熟悉的：

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掌握经济命脉，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

在这个基础上，也鼓励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要对其进行限制，不能任其泛滥，尤其不能使其操纵国计民生，因此也要保障私有制合法地位。

那么，为什么后来，我们又开始了社会主义过渡，走向了完全的公有制经济呢？

这就要让我们把时间拉到 1953 年了。

首先，我们要清楚，所谓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到底是过渡什么？

这一点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所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它在当时的意义包含全民所有制，比如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制，所有人民都有份；同时还包括集体所有制，比如地区的合作社、集体组织、集体工厂、集体产业等等，属于这个集体里面的所有成员所共有。

而将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建立起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对于当时是否要将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存在着大约这样四个观点：

- 一、开始准备过渡，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 二、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
- 三、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 四、确保私有财产。**

后面三种观点，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程度不同。

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上根本上说就是继续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保证私有制的合法地位；

第二种观点，是不巩固，也不变更，认为可以由新民主主义自发的走向社会主义，或者等到某个阶段以后再搞社会主义。

第三种，本质上和前两种没区别，就是不能撼动资本主义私有制。

应该说，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特点，此前之所以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因为当时的全国农民绝大部分处于分散、落后的个体状态，集体组织除了在老解放区较多，在全国尤其是新解放区来说，还非常少。

其二，经济还十分落后，国民经济因为战争受到极大的创伤，同时还要继续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其三，全国土改没有完成；

其四，大规模的工业化还尚未开展，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仅仅三年的时间，在需要支撑抗美援朝的巨大支出上，国民经济的恢复居然奇迹般的迅速完成了，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以往建国前的最高水平 20%。

这个速度远远超出了毛泽东和当时中央的设想。

不仅如此，在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之际，国营工商业的产值同私营工商企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 1952 年 9 月，国营上升到 67. 3%，国营经济已经超过了私营经济。

同时，在农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超前完成了土地改革，而且农村中的自发合作组织，主要是互助组开始发展起来，在老解放区，参加合作社、互助组的比例高达 70% 以上，就算是新解放区也达到了 40%。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除了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其他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都成熟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分歧就在于，是否一定要等实现国有工业化建设完成以后，再去建设社会主义呢？

因为按照苏联的经验，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可是中国是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脱胎成立的，没有自己的工业化

基础，尤其是重工业基础，那么是不是要按照苏联那样等到资本主义完成了工业化以后，才能去建设社会主义呢？

毛泽东认为不必如此，中国有其特殊条件，他认为可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实现工业化。

也就是说，一边改造所有制，一边实现工业化。

后来的工业化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个设想的高明之处，也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我国的工业化基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条件？

这就是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统购统销、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诸多形式。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进入城市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个极大的烂摊子，它烂就烂在国民党此前基本把民族资产阶级压榨干净了，企业停工、工厂破产、工业失业，所有财产已经被国民党消耗和洗劫干净。

这个我们第四卷末尾已经讲过很多了。

这看上去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们都知道，坏事有时候也会变成好事。

正是因为国民党把民族资产阶级搞得太惨，破产太多，所以这就给了共产党进入的机会。

除了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管理之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就由共产党来提供原料、调集粮食、加工订货等方式又重新扶植起来了。

比如，当时有很多工厂，因为破产关闭，但是又因为国家给订单、给

原料，甚至有的地方给资金，这样又扶植了起来。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共产党帮助他把破产倒闭的工厂盘活自然是好事，求之而不得，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控制力度就大大加强了，开始出现了公私合营、国家收购、包购包销等等方式来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国家开始逐渐掌握了资本，于是这种资本主义实际上开始转变成国家性质的资本主义。

国家会按照发展国计民生的事业去发展企业，而不是按照利润去发展企业，不是按照资本家的个人私利去发展企业。

这一点很重要，大家记住这一点，后面会在具体问题中很明显的体现出来。

而国家提供的这些资源、资金、粮食等等，很大程度上又来自于农民，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又有了支持国家的物质基础。

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家对资本和资源的控制逐渐加强，计划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而这种计划经济，又恰巧能够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强大的支持。

因为，计划经济可以实现将最有限的资源，合理的安排到最合适的去处，保障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下成立起来的新中国有物质基础，同时又是坚持独立自主、领土完整的条件下来完成国家的工业化。

正是由于当时的种种条件，使得毛泽东有了可以开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

二、

那么，为什么要那么着急？或者说，为什么不可以等新民主主义再成熟一些呢？

原本啊，在1950年的时候，毛泽东的设想仍旧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等足够成熟的条件以后，再思考过渡到社会主义。

他在1950的时候还这样说过：

“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以后，在各种条件都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当然，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国民经济恢复得那么快，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肃清土匪等运动会如此迅速的取得成功。

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完全是快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由。

历史已经无法给出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推敲这个答案。

毛泽东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在三反五反运动快要结束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

“在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该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于中国主要矛盾的判断，他已经认

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了。

而一直以来，所有的重大政策，实际上始终都是围绕着对于主要矛盾的判断来展开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判断？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除了在三反五反中，看到的资本家的种种唯利是图的现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糖衣炮弹的进攻非常激烈。

从后来的历史对照着来看，毛泽东不仅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预测到会有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而且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历史的发展不仅印证而且加强了他的这种判断。

所以，如果再按照新民主主义秩序稳固和发展下去，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进攻只会越发的难以控制，甚至会严重腐蚀和搞垮上层建筑里的意识形态。

当然，这只是我们对照着历史的一种猜测，但是当时的一件事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猜测。

那就是著名的“新税制事件。”

《毛选》第五卷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家读原文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这里我解读一下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

这篇文章里核心内容，就是批判薄一波的，认为当时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贴几段原文：

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的批判才是对的。——《毛选第五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毛选第五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毛选第五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毛选第五卷，反对

资产阶级思想》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毛选第五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来，批判薄一波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批判他，其实根本上是批判整个受到资产阶级影响和进攻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

这次批判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解放以前在征税的时候，有很多税收来源于商业交易，而随着加工订货、统购统销比重逐渐增加，而这些环节的征税点此前并没有形成，那么随着商业交易减少，那么税收自然也就减少，但是国家的开销却在增大，于是就要制定新税制来增加财政收入。

这很合理吧，可是任何一种税制都必然影响到其中不同的社会成员。在薄一波主持下制定的这个新税制改革里，有两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加入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同时又变更了征税环节。

也就是说：新税制里采取了国有企业、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一律平等

纳税的规定。

同时呢，变更了批发商的批发营业税，把它改到了由工厂缴纳。

这两条关键的改动，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我们都知道，国营商业的职能和私营商业是完全不同的，国营商业本质不是一个赚钱、赚利润的机构，当然它也要赚钱，但是它的性质却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承担着为人民服务、合理调配资源的职能。

比如：国营企业所得的利润除了成员工资和投入再生产，其利润是要全部缴纳给国家，用于发展国计民生事业，投入基础设施等建设的。

而且，国营企业有时候还会做赔本的买卖，比如有的地方粮食滞销，为了合理配置资源，有时候就会调动轮船、军舰来运输粮食，运费很高，这从赚钱上看肯定是亏的，但是从整个社会上看，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民实际问题，而且有利于农民持续发展，更有利资源的统筹规划。这么说，可能大家还不一定理解，我们只需要看看离我们最近的抗疫之战就明白了，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国营企业的职能就不仅仅是赚钱，而首先是保障社会的和谐安定，保障人们的基本权益。

所以，有时候国营企业不但不盈利，甚至可能是亏本的。

私人商业就不同了，他们一切向利润看齐，所以亏本的事情一定不会做，因此同样是商业活动，其实国营的成本要比私营的高。

但是呢，比如国营的合作社，他们和私营商业比，如果货物进价一样，那么实际上成本上来说，私人企业成本是要低的。

而且，国营企业还要担负员工的福利、保障他们的住房、休息时间、孩子教育等等，不可能按照私营企业那样去压榨员工，所以这一点上成本又会高出一截。

这就导致了，进价一样，纳税一样的话，国营企业将毫无竞争力，因为私营企业只需要有点利润就可以卖，现金流越充沛越好，而且纳税上还很难把控。

因此，所谓的“公私一律平等”，其实就是不平等。

而且，当时这个税制的制定，没有通过中央讨论，就搞出来，还登在了人民日报上，因此才有了这次批判会。

所以，大家返回去再看看教员写的那些批判的话，就立马可以领会了。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虽然只是一个案例，但是正如毛主席批判会上所说：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毛选第五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应该说，此时毛主席肯定已经从很多不同的社会现象，以及党内出现的种种思想上看出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蔓延很严重。

从这个角度看，大家又可以想明白另外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毛主席非

常重视意识形态的问题。

在一部《武训传》、《清宫秘史》等电影上，也要花很大精力去讨论，在后来的《评红楼梦》问题上，又十分重视的加以批判，原因就是因为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泛滥很快，很迅速，不仅在社会上蔓延，而且在党内蔓延。

这次针对新税制的批判，是在 1953 年 6 月-7 月份的财经会议上开展起来的，批判的同时，毛泽东开始阐述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

所以，实际上他也是要借着这个新税制的事件，开始准备要为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准备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批判了薄一波，但是毛主席在发言中又保护了他，因为他发言中批判新税制的时候，首先作了自我批评，说道：“在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我的错误在于：（1）抓的少，抓的迟，（2）统得死了，我也有份，（三）……”

总之，一共列举了 6 条责任，他这么一说，实际上就解放了薄一波，让大家不要再追究个人的责任，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批判的目的不是处理个人，而是要把思想讲清楚，同时提高大家的认识，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作准备。

三、

在这次批判会（当时的财经会议）过了仅仅一个多月，过渡时期的总

路线就出台了。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除了是因为客观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比如国民经济恢复、国营经济开始居于领导地位、统购统销和计划经济的建立、农村互助组与合作社的成立等客观条件之外。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尽快推动建设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因为这才是从根源上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糖衣炮弹进攻最有效措施。

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公有制经济基础，那么资产阶级思想是根本不可能遏制住的。当然，有了经济基础，如果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异常顽固的话，很可能还是会复辟和反扑。

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确实是即使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已经建成了，还是难以阻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蔓延，这又是后话了。

但是从当时来看，不管是客观条件的成熟，还是历史原因的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总算是要拉开序幕了。

而这种过渡的实质，就是变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这场过渡和变更中，伴随着的另外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国家的工业化，这是我们下一篇文章要聊的主题了。

第六篇：农业合作化的两个积极性

我们上篇文章提到，在国民经济恢复完成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又基本具备以后，毛泽东便开始思考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事情。

于是在 1953 年下旬，毛泽东同党中央一致商议之后，出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方案。

所谓过渡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就是一句话：“一化三改”。

一化：指社会主义工业化；

三改：即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而改造的实质，就是变更生产资料所有制，将千百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所有制，变更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而其中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最艰难且极其复杂的任务。要把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打下基础，为消灭私有制下的剥削和两极分化奠定经济基础，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在第四卷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过：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毛选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

但是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面临着的困难其实还远大于苏联，因为中国基本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尤其是重工业体系。

因此，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会更加曲折和艰难。

探索农业社会化改造的历史，就是探索农村合作社，一直到后来的人民公社的历史。

其中很多关键点值得分析和推敲，尤其是关于集体和单干的积极性的问题。

大家后来无数次的争论，到底是集体积极性好，还是单干积极性好？

集体似乎容易产生大锅饭的问题，单干又注定是分散、落后，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无法快速建立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

从长远和战略上看，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合作社的形式或者人民公社的形式组织生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有益的，这一点即使是后来把分田单干吹上天的人也无法否认。

唯一有争议的就是：集体化到底会不会带来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问题，尽管它有一百个好处优于单干，但是只要存在平均主义的问题，那么就会损害农民积极性，那么这事就必然难以持续干下去。

所以，衡量集体化好还是单干好的根本标识是什么？

就是农民的积极性。

哪个好，哪个对农民有利，那么农民自然就倾向于选择哪个。

即使说，有时候会出现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但是只要把道理说通，把集体化的好处解释到位，这些冲突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克服的，即使花费时间长一些，集体化一定也是可以办起来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何去判断农民的积极性呢？

一、两个积极性

毛主席在提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就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单干和集体化的两个积极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不管是单干还是集体化，对于刚刚从封建主义时代解放出来，分到土地的农民来说，都是存在着积极性的。

否认真干有积极性，或者否认集体化有积极性，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当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曾经这样描述这两个积极性：

“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这种个体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积极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为什么当时毛泽东会有这种判断？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着这两种积极性。

首先，在农业互助组、合作社方面，在刚刚解放的时候，就有很多农

民自发的组织起来了。

他们为了克服单干的缺点，自发组织了互助组、合作社，通过把力量集中起来，实现统一经营，合理安排劳动力，兴修水利，购买农具设备，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等单个人难以办到的事，来共同增加农业生产。

这种集体作业特别是在共同抵抗自然风险方面，发挥出了极大的优越性。

这种组织其实还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后来和平时期自然又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尤其是老解放区，土地分配已经有好些年的地区，农业互助组、合作社的比例非常高，这些都是农民的自发行为，所以你能否认合作社的积极性吗？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还没有摆脱私有制束缚，也就是说大家还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互相协作，组织起来共同对抗风险，集中力量解决个人难以解决的事情。

至于，单干的积极性，就更加不必说了，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前都是给地主种地，现在是给自己种地，这种积极性自然也会反映到国家层面。

所以，其实不管是单干还是集体化，都是有一定的积极性的，因为它们都能实际性的带来增产，带来好处。

但是，哪一种积极性应该加以引导，使其从长远看，从战略层面看，更有利于农民的未来前途呢？

这个自然不用说，那就是集体化。

二、引导集体化的积极性

既然存在着两种积极性，那么两种积极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更应该引导群众往哪方面的积极性去发展？

我们看看毛泽东的态度：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组这件事看得极为重要，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又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毛选第五卷，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种农民的积极性，毛泽东是坚决的要把集体的积极性加以引导和发展，使得它走向社会主义的。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要抹杀单干户的积极性呢？也不是，只是说国家政策更加倾向于鼓励集体化，引导集体的积极性。

毛泽东在合作社草案中就批评了不顾单干户的积极性，而采取的急躁态度：

“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条件，过早地、不合时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的举办高级社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就在农村中完全达到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左倾的错误思想。”——《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同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所以群众总是积极响应其号召，当国家提出要搞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就可能引起单干户受到歧视，为了避免单干户受歧视，毛主席还专门在决议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贷给互助组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组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当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三、

为了在实践中更好的落实好这样的思想，使得实际工作中确实不会影响到单干户，同时又能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集体化上去，那么实际上就必须制定几个原则，脱离了这些原则，那么就很难在实际中贯彻这种思想。

第一个原则：自愿互利原则。

换句话说，搞集体化，如果不是建立在自愿互利原则之上，那么就一定会出现强迫命令，因为下面执行层为了更好的实现集体化的速度，更好的完成党的指示和任务，那么就很可能加快或者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

这样一来，主席所说的要照顾单干农民积极性的话也就无法在实践中落实了。

所以，在农村集体化，合作社的过程中，就有这样一条原则：自愿互利。

所有集体化的过程中，都不能违背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

其中，互利原则，指的是富农、中农、贫农之间组成合作社，搞集体化，那么这其中一定存在着富农吃亏的现象。

所以毛主席特别告诫要自愿互利，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要坚持这个原则。”

第二：检验合作社办的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增产。

要想将大规模的农民，从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上扭转过来，不是靠的强压，而是真正的让合作社增产，只要加入合作社以后的农业增产，农民获益，这种获益超过单干，甚至远远超过单干，那么农民就会自发地，越来越多的自愿加入合作社。

反之，如果搞合作社还减产了，那么这种合作社的优越性也有无从说起，自然不能巩固，甚至会解体。

有了这样的两个根本原则，那么就可以保证农业生产合作化，在引导集体化的积极性和单干户的积极性方面，起到合理的约束，避免不合时宜的损害了单干户的积极性。

所以，在农业生产集体化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忽视单干户，而是在两种积极性上作探索。

当然，从理论上讲，如果鼓励单干户，那么其结果必然容易将其引向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方向。

反之，鼓励集体化的积极性，那么其结果就是把农业引向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只有兼顾两种不同的积极性，才能避免过左或者过右的倾向。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一定要坚持走社会主义

道路？一定要坚持将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这里面，当然有马列理论在起作用，读过马列基本原理的都知道，资本主义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

所以，社会主义有其优越性。

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理论原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实事求是。

如果，在当时的环境下，本身发展还不适合搞社会主义，仅仅因为理论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所以就搞社会主义。那么这事就不能作为制定战略、决策的出发点，否则就是非常危险的教条主义。

也就是说，当时之所以选择将农业引导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将农民组织起来，将私有制变更为公有制，其实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在当时一定是更有利于国家发展生产力。

否则，优越性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才会有上面那个原则，集体化一定要更能增产，那么才能把合作化事业大面积铺开，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建设巩固的社会主义。

因此，下一篇我们将接着讨论一下，在当时的农业合作化上，其优越性到底是如何体现的？其中有哪些是理论问题，有哪些是实践问题。

第七篇：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

一、

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是从理论出发的产物，而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的要求。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理论上的优越性，因为那毫无意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根本上说必须体现在实践之中，**衡量标准在于其对生产力的促进和发展。**

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急于搞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想要尽快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更所有制关系，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变，其最终目的也是想要发展生产力。

也就是说，他认为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即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的途径。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二、

既然说要发展生产力，那么就要搞清楚，从当时的中国去看，到底什么是需要发展的生产力？

也就是说，在的那个阶段，**衡量生产力的标准是什么？**

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标准是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吗？是轻工业产品的大量生产吗？是消费品如单车、摩托车、电视机、电冰箱的普及吗？是用粗放型资源换取外汇进口轿车吗？

很显然，这些东西在当时那个阶段，都不是衡量生产力的标准。

可能大家从我们这篇文章的题目中已经察觉出来了，在当时最重要的衡量生产力的标准，就是工业化。

没有工业化，单靠个体生产，小农经济，或者说单靠把群众组织起来互相协作便想要大规模提高生产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事实上，这一点谁都看得很清楚。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实现工业化仅仅只是一种幻想，“实业救国”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前，是根本就走不通的，这一点资产阶级的革命已经尝试过了，最终还是失败了。

毛泽东在 1945 年的《论联合政府》里就指出：

“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毛选第三卷，论联合政府》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在各项稳固政权的运动都取得胜利以后，接下来实现国家工业化，大规模提高生产力，将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就变成了最艰巨和最重要的任务。

三、

那么，实现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既然要提高生产力，要实现工业化，那么如何变更当时的生产关系，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呢？

这里面最关键的一招，就是实现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农业合作化，集体化。

我们一定不能把农业合作化和国家工业化孤立起来看，而是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看。

其中关系是这样的：

首先，当时的新中国，在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上说，还是十分低下的。

而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农业、工业原料、甚至还需要用农产品交换技术。

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就得来源于农业积累。

那么，在既没有实现工业化，但是又需要大量农业资源以支撑工业化的现实背景下，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用毛主席的话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还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毛选第五卷，关于农业合作化》

要解决这个矛盾，根本上说就是要大规模提高农业产量。

而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农业合作化，一个是农业机械化。

从前者来看，单纯地实现农业合作化，把农民组织起来增加粮食的产量，这种增加是相对有限的。

比如，1952年底，在老解放区组织起65%的互助组，新解放区组织起25%的互助组基础上，粮食增产了有400亿斤，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2.5%。

虽然增产不多，但是也总比不增产好吧。

而且从1953年开始兴办起来的农业合作社，其中又有80%以上的合作社是较原来单干增产的，那么这就说明这条路是可靠的，又是可以增产的。

大家一定觉得，增产比例那么低，似乎离工业化所需要的巨大资源消耗不成正比。

其实，农业合作化的意义，远远不止增产这10%——20%的粮食，它最根本也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一旦农民组织起来，这就为接下来逐步的机械化、科学化、水利化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大家在农村呆过的都知道，如果全是分田单干户，那么要普及机械化、兴修水利、改善农田、改善经济作物等都是非常困难的。

单单是协调成本、沟通成本就大得吓人，甚至因为意见难以统一，很多事情根本办不成。

而且，像大规模机械的运用、大型水利项目的修建，这些往往都是需要集体的力量来完成的。

所以，如果不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那么将来的农业机械化、科学

化、水利化都会非常难以推进。

即使能够推进，但是如果是以农村集体为对象，那么其推进方式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式的承包，股份制，资本下乡等方式来推进机械化，这种形式伴随着的就是农民失业、失去土地、种土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但是又找不到其他出路，最后进程沦为农民工等等现象的发生。

所以，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就当下来可以说可以少量增产粮食，从逐步长远的角度来看，就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科学化的普及，那时候才是大大增加生产力的时候。

只有农业生产力提高了，才能解决上述我们所说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大增，而农业作物的产量又很低之间的矛盾，只有解决了这个矛盾，那么才能有发展工业化的资本，才能完成国家工业化的根本任务。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

“如果我们不能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垦荒，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毛选第五卷，关于农业合作化》

因此，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集体化，就能逐步的向机械化、科学化迈进，只有如此，才能为下一步大大提高粮食产量而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后来化肥的逐步普及，乃至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普及，到后来引进四三方案等等，都是缘于最初的农业合作化的设计，没有这些条件，后来的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科学化等，是很难实现的。

那么反过来，我们实现国家工业化又是为了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大大提高生产力，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现代化的工业国。其中，就自然也包含着对农业的促进和发展作用。

社会主义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的经营基础上，才有可能被使用，或者才能大量使用。

而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之间的这种互相促进的关系，互相发展的关系，就是提高生产力最有力的保障。

因此，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这两件事，是不能孤立起来看的，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减弱另一方面。

农业合作化的根本目的，就是一方面促进工业化，一方面创造工业反哺农业的有利条件，最后逐步走向正向循环，良性循环，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强国。

五、

上面所说的国家工业化，根本上指的是重工业，基础工业。

而在农业和重工业之间，还有一个轻工业，这个轻工业主要就是用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工业，当然也不止于此。

比如增加棉布产量、制造生活用品、消费品和家电产品等等。

而轻工业的发展，其实也不是孤立的，它跟农业和重工业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轻工业发展一方面需要重工业提供基本的电力、能源、原材料，稀有金属等等。

同时，在消费端，它又需要在中国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购买力。

只有农民有了强大的购买力，才有可能持续带动轻工业的发展，而农民的购买力，就必须要有农业的大规模发展，乃至乡镇工业的发展，没有这些条件，农民的购买力是出不来的。

而要实现让农民具有强大的购买力，那就必须要发展农业，也就必须要发展农业集体化，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此，实际上，不管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都跟农业集体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相互促进的。

六、

在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形成内循环的过程中，

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就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路线的同时，还有一条资本主义的路线同时存在。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毛选第五卷中，《关于农业合作化》这篇文章的一段论述：

现在农村中存在的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毛选第五卷，关于农业合作化》

可是这条资本主义的路线，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实现工业化呢？

答案是很显然的：不能。

在私有制基础上，一方面是农村的两极分化很厉害，一方面是农业的剩余根本不可能被提取运用到工业化上，私有制下，根本不能做到社会主义那样调动资源，把有限的农业积累，全部集中起来为工业化出力。

你试试让资本家缴税去发展国家工业化，这事靠不靠谱，在当时极其有限的资源下，是否可以实现？

所以，没有集体的组织，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统购统销的政策，没有逐渐的农业机械化，怎么可能发展农业为工业提供资源呢？

没有农业剩余提供资源，工业化根本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而这每一项，都是建立在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基础上的呀。

所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可以从当初的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中看出，没有农业合作化、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对国家工业化的支撑，就不会有相互促进的发展，就不会有第一代领导下的工业化的实现，也就不会有后来生产力巨大的提升。

只不过，一开始这种生产力的提升，并没有直接体现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上，而是体现在了为后代谋幸福的基础工业、重工业上。

这就是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含义，就是农业合作化，把农民组织起来搞集体化，搞公有制的意义。

它非但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大规模的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因为发展工业化就是发展生产力。

而不是把生产力简单理解为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

当然，不是说不要改善，而是为了将来的大改善，眼下往往就要勒紧裤腰带，暂时只能小改善，甚至不改善。

我想，这并不是一个很难懂得的道理。

第八篇：资本主义改造

资本主义改造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什么？

我们完全可以说是革命，是变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场革命运动，但是这场革命在当时却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并且完成的时间异常迅速。

这想来是有些不可思议的，因为变更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会严重触及到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此，研究这场变更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怎样进行的？又为后来留下了哪些隐患？以及跟后来的历史事件有着哪些内部联系等等问题，对我们在解读建国史，以及后来的改开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否则后面的很多东西我们就看不懂。

因此，这篇文章，我们主要先来解读一下整个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从中去解答上述的种种疑问。

一、

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

首先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时候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是一个可以说不能再烂的烂摊子了，这里面在经济上就表现出严重的通货膨胀，投机泛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等。

我们前面说过，国民党的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的彻底崩溃。

所以，如何解决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

此前我们已经说过，根源上是发动土地改革，解放全国农民的生产力，让更多的物资、粮食可以生产出来支援城市工商业。

土地改革是根源，那么在具体的帮助和扶植工商业的过程中，是怎样操作的呢？

不同的地方以及不同的企业当然都有不同，但是在当时几个较为普遍

的方式就是公私合营、加工订货、提供原料的形式。

所谓公私合营：就是对于那些破产的企业，由共产党提供资金、资源、渠道等帮助，通过改组成公私合营的方式，重新使得破产企业和倒闭工厂又活了过来。

加工订货：就是由国家给那些因为没有订单而被迫歇业、停业的企业提供订单，将国家每年所需要的各种物资的订单给到他们，使得他们又可以重新开工。

提供原料：推翻的三座大山里面，有一座叫做官僚资本主义，共产党对待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是没收。

而官僚资本主义，又往往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着很多民族资产阶级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来源。

因此，合理分配原料，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的满足国家生产计划的需要，而不是资本利润的增值就有了可能。

那么，有了这样的良好条件，就为国家掌握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在三年的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国家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通过以上几种方式来帮助和扶植民族资产阶级的重新恢复和发展。

在这个帮助和扶植的过程中，实际上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控制力度也就越来越强。

这在当时来看，是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措施，是为了更好的恢复国民经济，恢复工厂和企业的关键步骤。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也逐渐认识到，以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在通过加工订货、公私合营、原料提供、工人监督等形式，同旧时代的资本主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了新式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我们叫做——国家资本主义。

当然，在1949年刚刚开始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还只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

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资本的发展已经不单纯只是为了资本增值服务，它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更多的承担着一种社会职能，其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和人民创造价值的职能越来越凸显出来。

毛泽东在1953年的时候，对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逐渐演变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是这样描述这种经济的：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是这只占全部利润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泽东

文集第六卷，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从整个国家资本主义形成和诞生的过程中来看，在当时可以说是既满足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同时又满足了资本家重新发展的需要。

从建国之初，到 1952 年的三年恢复国民经济中，通过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商，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的统购统销的策略和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企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提供原料、公私合营等等方式应运而生。

这在当时是最好的满足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要求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另外一点就是，当资本逐渐掌握到国家手里同时，名曰国家，但是国家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资本也必然要经过具体的人进行管理，这就为滋生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作风埋下了隐患，这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来再聊。

二、要让资本家绝种

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就为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道理很简单，公私合营也好、提供原料也好、加工订货也好，主动权其实都掌握在了国家的手里。

有了这样的条件，到了 1953 年，当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提上日程，也

就是开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那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自然也就可以提上日程了。

原本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很快改造它们，在第一步改造过程中，实际上只设计了将那些还没有被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先逐步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逐步将其完全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波动呢？也是有的。

有不少资本家在当时就说是“上了贼船了”。有少数的资本家则以停薪、停伙、停工要挟，也有出现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拒绝改造。

而在改造之中，也出现了过急过快的情绪，国营部门在加工订货的订单分配、原料的提供上，往往只照顾国营和合营企业，没有照顾那些中小私人企业，这就使得中小私人企业举步维艰，因此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甚至是工人失业。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以后，就提出不能过急过快，也要照顾到思想还没有转变的企业，给他们活路，要逐步改造。

他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在工业中，原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这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

因此，在头两年整个改造都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到了1955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这一年，在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同步进行的农村合作化改造进度神速，在毛泽东作了《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后，在农村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不可能按部就班的进行了。

因为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改造和农村合作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农村实现了合作化，那么这就意味着以前混乱的自由市场开始进入到国家的计划经济。

农民组织起来了，其商业活动就被很大程度上控制在了合作社里，因此，实际上此时国家就掌握了广大的群众消费市场。

你民族资本家的东西，再想卖给广大群众，往往就需要经过合作社这个最“垄断”的渠道。

这样一来，国家就切断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那么资本家就再也无法独立存在了，即使存在也非常艰难。

这就为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创造了高速度的条件。

毛泽东说：

“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的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从长远来看，改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变更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用毛泽东的话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后来，当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以后，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当然，这是一个长远规划，但是同时也暴露出一些过急过快的因素，使得改造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巩固。

三、

和平改造

改造的过程，并没有因为国家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比如加工订货、原料供应等，尤其是农村合作化之后的市场主动权，因此就实行暴力改造。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中小资本家，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赎买。

赎买的方式，有别于对待官僚资本主义的没收方式，而是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作价，然后由工厂的工人们在往后的若干年里，替工商业者生产足够的利润作为补偿。

这里不是说一次性支付多少钱来购买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而是通过往后的生产来给足一定的利润，充当生产资料的作价。

比如：假设你是当时的一个资本家，你的工厂所有生产资料作价 100 万，那么这 100 万就由随后的工人阶级在生产中通过产生的利润来支付这 100 万，同时每年再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偿，这个补偿在当时叫作定息，也就是说每年都按照 100 万股金的 5% 左右的年息给予补偿，当然这个补偿是有年限的，当时规定的是 7 年，后来又根据不同地区和企业的情况有所延长。

这就是当时的和平改造，这种改造如毛泽东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 1949 年对官僚资本主义那样的全部没收、一个钱也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恶转，一个是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

在改造后的公私合营企业里，国家对原来的私人工商业者采取发放定息的办法，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作为生产资料作价的溢价补偿，当时宣布这种办法七年不变，后来又延长了三年，直到 1966 年才停发。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和定息制度实行以后，原先的私营企业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是企业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原先由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所有和使用。

二是生产地位的变化，资本家不再是企业的统治者，而是以公职人员

的身份参加企业的生产管理，其中很多人转型成为了企业的经理人，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一样。当然，这帮经理人的存在，也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经理人重新掌握产权埋下了伏笔，这一点我们将来在改开史中会讲到。

三是通过定息制度，逐步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资本家的定息收入，只取决于一开始的生产资料作价，即投入股金的多少，而不取决于企业经营的利润。

这样的特点，实际上就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雏形了。

为什么当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能取得如此迅速的胜利，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很弱小，他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所以没有形成强大的阶级力量。

第二，由于第一个原因，那么自然就有了第二个原因，即他们对于国家的依赖程度极高，订单需要国家给，原料需要国家支持，甚至资金和粮食在当时也靠着国家供给和支持，到了后来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连市场都依赖于国家和农民，这样就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得他们可以朝着社会主义，朝着为国计民生服务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型。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当时走进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是共产党主观的努力，主观的将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去引导和改革，再加上客观上条件的成熟和允许，才有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成。

检验一项改革或者制度的好坏，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力可持续发展，这里说的是可持续发展，不是短暂的某种发展，近视的某种发展。

如我们上期所说，在当时衡量生产力发展的标准，不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改善是要改善，但是一时改善不了太多），因为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国家的工业化。

国家的工业化代表着当时生产力最显著的发展，因为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让人民群众享受到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巨大福利，只是这个过程比较漫长。

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手工业的改造，在当时的巨大作用，就是实现了国家对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使得一切国家资源包括资本，都能按照国家的意志，集中为工业化服务。

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能够在独立以后，迅速完成工业化的秘密，而工业基础在当时远超中国的印度，却在后来数十年的发展中，始终未能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业化任务的根本原因。

这个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社会主义。

第九篇：如何读《论十大关系》

一、

读《毛选》里所有的文章，不管是第几卷，都必须用联系和运动的视角和观点去解读。

看当时的历史也是这样，各种历史事件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绝不是孤立的。

比如：第五卷最后讲到反右派运动的时候，反右就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此前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波匈事件、三大改造后遗症、国际上的反共运动、内部官僚主义问题等等一系列事件相互作用、相互推进才造成的结果。

我们这篇文章暂且不聊反右运动的事，反右运动我们后面要单独写几篇文章来聊。

这篇文章，主要总结一下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当时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即三大改造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毛选》第五卷里总结了十大关系，而其中所有的关系根本上都是围绕着三大改造和工业化的总任务来进行描述的。

《论十大关系》是一篇高屋建瓴的文章，是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站在全局的视角上把控前进方向的文章。

我们学习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学习站在全局的视角上，用联系和运

动的眼光去观察周围一切事物的发展，这是《论十大关系》的精华所在。

二、

三大改造和工业化的关系

三大改造指的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变更以前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而这三大改造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就是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因此，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业化这三者之间就必然产生极其重要的相互关系，它们每一项工作之间都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制约，推动着当时新中国向前发展。

那么，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在当时国民经济刚刚恢复以后，新中国的发展方向有哪几种？

第一：重新回到半封建时代的生产关系。

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为什么说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在刚刚完成的土地革命中，土地依然是属于私有制，只不过以前是地主的，现在绝大部分都分给了农民。

但是即便如此，农村中的贫富差距仍然存在，这种差距如果不能及早

的减小，那么要不了多久，就立刻会出现新的地主，这个时候大量的剥削阶级就会卷土重来，农村的迅速分化就必然使得中国重新倒退回半封建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里面去。

尽管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了新中国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并没有触及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化。

而且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新中国它不是突然之间成立和诞生的，它本质上是从旧中国的母体中脱胎出来的，根据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新中国是在旧中国基础上的一种扬弃。

其中有着巨大影响的，就是旧社会的意识形态还深深的扎根在群众的脑海里。

所以，如果还继续保持土地的私有制经济基础，那么配合着旧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样的上层建筑，就必然存在着又倒回封建时代生产关系中去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

这一点，其实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了。在 1949 年 12 月 10 日的一次东北农村座谈会上，高岗在报告中就有这样一个汇总：土地改革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 60%—70%，吉林约 2/3，黑龙江的显著上升户占 54%。上升户中一部分添了车马，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因缺乏劳动力或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或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一小部分人已经开始向前一部分人出租或出卖自己

的土地，或借款借粮。

毛泽东听后说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天严重起来，解决的办法，就是积极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变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所以，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引导和掌握好经济的发展方向，那么就有倒退回半封建时代生产关系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

从这个角度，大家也能理解，为什么新中国刚刚成立，毛主席会专门关注讨论和批评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以及发起的评《红楼梦》等运动了。

根本原因就是注重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一边继续扫除封建思想，一边又防止旧社会思想复辟。

第二：走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有，你只需要按照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共同纲领里制定的经济政策，那么就很容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即：由国家掌握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命脉，而在其他方面鼓励和发展资本主义。

走这条路就简单了，不需要搞几大改造那么麻烦，只需要按当时很多

人说的那样，搞几大自由就可以了。

比如：雇工自由，贸易自由，贷款自由，租地自由；
在农村，只需要搞搞三自一包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必须回到刚才说过的一个历史事实里去，就是新中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国家。

这个国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

但是，它还没有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没有现代化，没有强大的国防、科技。

它跟很多发展了百年以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

而要想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否则你不可能走向工业国，走向现代化和国强民富的道路上去。

而当时新中国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贫弱，除了搞点纺织业、手工业之外，跟科技、重工业相关的东西，资本家们一样也搞不出来。

如毛主席说的那样：“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不对外掠夺，那么要想迅速走向国强民富，走上现代化工业的道路上去，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中国最为广大的

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所有资源都往工业化方向倾斜，这样才能完成我国迅速富强的历史使命。

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不可以，但是依靠当时那点纺织业、手工业、甚至一些轻工业，想要靠它们完成原始积累，那当真是做梦也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而在农村，如果不组织起来，你想要从还存在着严重封建小农经济思想的农民手里，把粮食、工业原料收集起来发展工业化，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怎么办？

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国家计划，实现所有制的转变，才能将有限资源最大化的用于建设工业。

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的关系。用此前我们说过的观点重复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舍此再无其他出路。

三、农业合作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

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的关系已经说清楚了，但是同时三大改造里的两个重大任务，即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改造之间，又有什么紧密的关系呢？

既然实现了农业合作化，那么实际上农村这个资本主义的最大市场，就被国家掌握在手里了。

而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往往又是从农村获取，实际上国家就掌握了农村市场和工业原料两项法宝。

有了这两项法宝，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乱来，它就不再只是简单的资本增值，而是具有了为国计民生服务的性质，因为国家掌握了资本的命脉，实现了我们上篇文章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

这样，除了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威胁国计民生之外，还可以按照国家需要引导生产，使得生产更合理的为国家工业化服务。

所以，农业合作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键联系，就在于农业合作化以后，就切断了农民与资本家的内在联系，使得资本不能按照资本的意识，通过自由市场的方式来剥削和压榨农民。

同时，又为将来在工业反哺农业，尤其是将农村改造成工业农村，把农民就地转化为工人打下来可以预见到的基础。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那么随着工业进程的发展，随着农业本身的发展，即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就会有大量农民逐渐失业，然后沦为廉价劳动力，被时代所抛弃。

因此，在当时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不仅能发展中国，也为能够实现共同富裕、保障农民利益打下基础。

这就是农业合作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间的关系。

四、

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

除开农业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生产安排上，也有相互之间的关系。

当时国家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把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了重工业上，因为一切轻工业、农业的基础都是重工业。

比如，钢铁、稀有金属、煤电、能源、石油等等，没有这些重工业，那轻工业和农业机械化所需要的一切设施都无法保障。

所以，重工业是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重中之重。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不需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呢？当然不是。

我们开篇说了，任何一项事业、事物、工作之间都是有关系的，要学会用联系和运动的眼光去观察一切事物。

重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而且要从农民身上取得原始积累，除了统购统销的行政性手段之外，还必须要用到工农业剪刀差。

如果你没有轻工业来生产生活必需品，那么你拿什么去同农民交换呢？

如果不交换，那么剪刀差又如何实现呢？

因此，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就是以重工业为主，但是要统筹兼顾到轻工业和农业，使得轻工业和农业能够满足重工业的基本需求。

既保障农民、城市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又不能改善太多，而是基本能够把剩余积累用于重工业之上。

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前说的，抓主要矛盾，但是要兼顾次要矛盾的意义。

五、

《论十大关系》里一共论述了十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围绕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原文。

对于我们来讲，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是，学会用联系和运动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的发生和发展。

从三大改造和工业化，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毛主席是怎么分析问题，怎么去探索复杂事物的内部联系，从而得出我们必须要走社会主义路线的结论的。

我们常常说要抓住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停留在现象上，那么怎么抓？本质讲的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分析这种内部联系，就要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去分析，去推演，最后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如果不注意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以及一种事物的变化可能随之而来引起的种种可能性，那么就不能做到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就不可能谈什么预见和领导，也就没有什么理论指导实践的说法。

第十篇：反右的前前后后

一、

国际背景：

整风反右是建国以后的毛泽东时代里，被认为在政治斗争领域，仅次于文革和大跃进的第三大历史事件。

然而这个历史事件同社会主义的改造一样，绝不是孤立发生的，它不仅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也与后来的大跃进和文革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因果联系。

那么，整风反右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呢？这一点，我们首先要从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起。

1956 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在年初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这也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首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与苏共内部代表，搞了一个秘密报告，名曰《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之所以被称为秘密报告，是因为这个报告当时只在苏联内部高层传达，并没有告知同来参与这次代表大会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代表。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被公开披露出来，这一年的 6

月 24 号，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一时之间，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

因为报告的内容，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全盘否定斯大林。

报告说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处置错误等等。

这些揭露和批判全部集中在斯大林个人身上，对曾经的一位共产国际运动中的重要领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这种全盘否定，使得当时很多国家的修正主义思潮全部迸发了出来，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因此而解体崩溃。

如何看待苏联的这份秘密报告？

对于这份报告的评价和分析，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也涉及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个人崇拜的态度。

为此，毛泽东组织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在承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更多的从社会、历史、共产主义运动中去分析错误的根源。

同时，在整体评价上，毛泽东给斯大林作了一个三七开，也就是七分功三分过的分析和评价。

有趣的是，在二十多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几乎以照搬的方法，给毛泽东也作了这样一个三七开的历史评价。

就在这份秘密报告之后没过多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爆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

这两个国家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但是都先后发生了严重的右翼分子、劳动工人的暴动，由此引发了内部政变，尤其是匈牙利直接发展为推翻和改组政府的暴力运动，人民民主专政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的事情发生了，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

直到苏联直接派军队进入匈牙利，才平息了这场叛乱，暂时性的重新稳定了政治局面。

如何判断波匈事件的性质？

对于这两个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中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能说是导火索，或者外部原因。

而更多的原因，则是其内部矛盾积累和爆发的结果。

毛泽东这样分析归纳过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被简单的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没有镇压。”

所以，既然苏联出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已经揭开了修正主义上台的序幕，而匈牙利更是直接发展为叛乱和暴动，那么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发生在中国？

对于毛泽东总结的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中国肯定也是存在的，但是如何判断这些问题的性质？如何决定处理这些问题的方针？

以往马克思和列宁那里，都没有系统论述过，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定后，在从经济基础上消灭了资产阶级、消灭了资本家、消灭了小生产以后，国家的矛盾该怎么分析？怎么处理？

这些严重的问题，就摆在毛泽东面前。

二、

人民内部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国内各种矛盾应该怎么看，怎么解决？

这篇文章认为在当时已经从经济上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还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

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一个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的。

这一点，整风运动时期我们已经说过，所谓的团结-批评-团结，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达到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的目的，实现团结的最终结果。

而在 1956 年下半年的中国，刚刚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各种社会矛盾积累是非常之多的，其中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非常严重的。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三个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成型，也成为了后来十年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于敌我矛盾，毛泽东认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

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已经把阶级矛盾、敌我矛盾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

而人民内部矛盾，则被认为是当时普遍存在，而且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重要的矛盾。

因此，发动一场整风运动，由群众出来参与和帮助共产党整风，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将已经积累起来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作风扫除，从而为接下来大规模的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就成为了毛泽东迫切要提升日程的事情了。

原本在毛泽东的预想里，通过延安整风那样的活动，造成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生动活泼、个人心情舒畅，既有纪

律，又有自由的政治局面。

有了这样的政治局面，又有了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三大改造，那么接下来必然出现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

然而，最终的结局却事与愿违，甚至走向了反面。

三、

两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有两种，之前在延安的时候，之所以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马列基本原理，群众干部揭发等方式进行整风，并且大面积扫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是因为当时的整风并不触及大家的根本利益。

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是在利益根本一致的原则下，通过整风来改正自己的缺点，扫除不良作风。

你看延安时期的整风，主要整了些什么？

第三卷的时候我们就写过，其中主要有教条式的学风、八股式的文风、宗派式的官僚风、教条和经验主义为形式的主观主义作风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不触及有这种作风的人的根本利益，反而能够帮助大家改正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看问题的方式，学会实事求是等基本观点和技能。

博古以前即使因为教条主义犯过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问题都是见得光的，是个人能力不足与经验不足，而又身居高位造成的错误，

这些错误往往有很深刻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往往又不是个人原因。

所以，通过整风运动，是容易统一思想和认识，实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

可是 1957 年的整风，则完全与延安时期的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从后来的历史对照着看，在 1957 年的时候，实际上要整顿的对象，已经不是在革命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整风了。

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阶级，即官僚特权阶级。

所以它就已经不是整顿个人的能力问题，整顿思想问题，整顿作风问题了，而是涉及到打掉已经形成了特权新阶级的问题。

这种官僚主义，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看做一个人的作风问题，而应该是阶级斗争，是群众与已经形成的一个新阶级的斗争。

而所谓的整风，其实从原理上我们也知道，它只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即大家在利益根本一致的前提下出现的矛盾，而处理不了阶级对立的矛盾。

正是因为如此，1957 年的整风，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要失败了，而反右运动，则是这次整风失败直接造成的严重后果。

四、

大鸣大放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亲自决定发动的这场整风运动，其目标就是为了扫除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这自然就遭到了党内一股强大力量的反对。

而真正被发动起来的，则主要是当时的党外民主党派人士，以及知识分子和学生。

这就意味着，一旦整风失败，那么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学生们，是没有后备力量支持他们的，而这个群体又缺乏广大的群众基础，缺乏跟工农群众的联系，因此这就为他们将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57 年，当毛泽东整风的讲话和号召发表以后，整风运动开始陆续开展起来，一开始都是在相对正常的轨道上前进，但是 5 月 1 日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号召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后，整风迅速升级，鸣放运动开始大规模发展起来。

很快，在这之前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人们胆怯地发表不满意见的涓涓细流，便在 5 月和 6 月初的会议上汇成了批评社会批评政治的滚滚洪流。中央强迫干部们不得压制这些言论，这似乎证明了党的领导人关于真诚地希望得到批评这种诺言的严肃性，由此，人们的批评越来越大胆，意见也越来越尖锐。报纸大量报道了有关批评的发言和讲话。人们用越来越严厉的语言表达长期受到压制的思想和感情。在允许知识分子表达他们意见的不长时间里，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下至日常琐

事中的不满，上至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盘指责。许多人只限于呼吁学术专业范围内的自主权，但是其他一些人则直接论及根本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诸如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问题。

最重要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是出自那些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判断现有制度的人，也就是指责共产党人背叛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诺言和革命理想。结论是一致的：共产党人已经抛弃了革命传统，正在变成一个“新阶级”。共产党人正在制造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不是致力于消灭不平等。如：

“党在过去领导群众革命的时候，是站在群众中间，解放后，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不是站在群众中间，而是站在群众背后统治群众，领导的职务不同已经不是身份不同，一些人强烈意识到自己是当官的，就是吃饭和唱戏时他们也要有专门的位置。”

人们指责党的官员和干部采取传统达官贵人和国民党官僚的态度，并享有相似的特权；

他们住在特殊的住宅里，雇有佣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就读，享受专门的度假胜地、娱乐设备和医疗条件——所有这些都与群众无缘并且以牺牲群众的利益为代价。

一位批评者问：“那些享有很高生活水平的人是谁？”“他们是党员和干部，过去他们穿着草鞋，但是今天他们却坐着小轿车穿着中山装。”

一位老革命者在致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即便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但是这个阶级也正在萌芽和发展。”

一些人批评工人未能参加工厂的管理，没有自由工会，以及在城市无产阶级中制造分裂的工资差别制度和奖金制度。党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农民，以及党从劳动群众那里占有日益增多的社会的产品份额的权力，这意味着将产生一种存在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新的分裂。实际上，这些与文革中造反派的言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无数人指出过 57 年的右派与文革造反派起码在言论上的相似性。后来党内高层也有人承认：“如果没有反右，文化大革命可能 1957 年就发生了。”

在城市百花运动中，大学学生最为激进也最不受约束。著名的“大学风暴”于 5 月 19 日开始于北京大学，学生们在校园建筑和教室里张贴大字报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教室里无人上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以说是这次运动最大的创造和发明。学生的批评意见与那些知识分子的意见很多是一致的，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学生的“鸣放”运动带有更明确的政治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准政治性的组织，这些组织发放传单，组织集会，出版油印小报。讨论会常常变成了斗争会，党的干部和大学管理者成为斗争的对象。一些学生领导人很快便在全国知名，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抨击“新阶级”制度，到 6 月初，日益

发展的学生运动（这时已从大学扩展到中学）变得越来越好斗，有时甚至发展成暴力行动。学生占领了大学的办公机构，向政府和党的机关发动进攻，并扣押甚至殴打了学校干部和党的干部。学生们还企图“走向人民”，组织工人和农民参与斗争，但没有成功。

如果大家对后来的历史略有所知就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已经是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一次预演。

只不过，这一次，毛泽东对他们并没有采取支持态度，所以学生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五、反右运动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

这意味着此时已经有了对右派进行反攻的准备。

原本按照毛泽东原先的估计，由于共产党有着崇高的威望和治国业绩，在群众中有着极强的号召力，是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的。他真诚的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的报刊和杂志公开这些批评，借此在党内形成一定的压力，从而促使各级领导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避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泛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成为一种制度，就能避免产生一个新的官僚阶级，也能肃清各种资产阶级思想。

但是公开鸣放的结果，却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如果只是在具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错误上的批评，毛泽东非但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说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可是，后来陆续出现的批评，则开始逐渐变了调子，由党外批评的性质，变成了右派的猖狂进攻。

这种批评涉及到了两个原则性问题：即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

一方面毛泽东希望通过体制外的力量，来约束体制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

但是，当这种力量变成一种要质疑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时候，那他就绝对不可能容忍了。

因为，这两项原则，是唯一可以确保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一旦被触及，他就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当时确实存在一批右派分子，比如 5 月 21 日，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了“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的其实就是代替党委制，他说现在的大学生对党委制很不满意，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等等言论。

5 月 22 日，罗隆基提出要设一个“平反委员会”，专门给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人平反，而实际上三反和五反重点打击的都是不法资本家，

而且却有打击错误的，共产党还是会根据材料进行平反。

这个时候，他们提出要专门新设“平反委员会”，实际就是要为资本家开后门。

这些发言言论未必是最激烈的，但是其性质却是非常严重的。

当这些触及原则的发言出现以后，实际上毛泽东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之前是他说的要放开让大家批评，放开让大家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当这种批评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触及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他又不可能接受。

于是，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指示，一方面肯定批评的主流是好的，一方面又对右派的过激言论作了准备：

他说：“自从开展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的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在内，基本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错误，大有利益。”

“另一方面，最近一些天，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上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这就是后来被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

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

六、反右扩大化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经济基础已经变了，也就是说所有制的形式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更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但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却还不可能马上变更和适应这种经济基础。

人脑子里的固有观念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且社会主义改造中必然会有伤害到资产阶级的情况出现。

因此，资产阶级的右派进攻，尤其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对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的质疑，是一定会存在的。

因此，对右派的反攻是有一定必要性的。

可是后来的反右却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毛泽东最初估计全国的右派只有 5000 人，并且要求按照实际情况划分右派。

但是在邓小平主持反右工作以后，这个数字却指数级倍增，他批判对右派的“温情主义”，主张严厉镇压右派，甚至要求各地按照指标来清理右派，这样一来不是右派的也被划为右派，最终达到了 55 万人的惊人数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后果？

原因很简单，一开始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中，他们的很多批评都是针对自己所处单位的领导的。

可是我们上面说了，此时的官僚主义已经同延安整风时期的官僚主义不同，延安时期的官僚主义，那叫缺点和毛病，比如爱摆臭架子、打官腔、命令主义、欺负下属等，这些都是缺点和毛病，但是其本身没有形成一个利益阶级。

但是 57 时期的官僚则不同，如很多鸣放中的内容所说，此时他们身上的官僚主义不是缺点和毛病的问题，而是特权的问题，也就是说此时的官僚俨然已经有了特权阶级的萌芽。

所以，党外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批评，必然遭到极力的压制和处理，而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认为领袖是站在自己一边的，是主张自己批评官僚主义的，你凭啥来压制？

于是批评就更加激烈，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自然地这种批评也就常常容易越界。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真正的右派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质疑，于是中央层面也开始了对右派的反攻，这就立刻给了此前受到压制的真官僚报复打击的机会。

于是，就有了中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里所说的那种情况：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批正直的包括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优秀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

连。大量的所谓右派言论，只是对党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也都被当做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并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

后来，毛泽东也发现了这种情况，于是在随后的两年里，发出了关于分期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到了 1964 年，当时被错划的多数人都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但是这一过程，后来被历史都加给了 1978 年那次右派平反。

反右扩大化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后来很多历史学者都说这次反右开了很不好的先例，使得后来的知识分子一度都不敢开口说话。

其实这是后来的误读，反右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却不是知识分子不敢开口说话，因为即使当时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罗章联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他们是直到 1982 年以后都没有被平反，还是认定是右派分子的人，这些人在当时非但还是可以自由说话，而且仍旧有选举权。

不仅如此，他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而且还可以自由与其他右派成员聚会、聚餐。

这样的右派，你能说谁迫害他了吗？

所以，其实在毛泽东能控制的和视野范围之内的右派，即使是提出了质疑共产党领导，进攻社会主义制度的那群人，除了在舆论、观点之

争上，有过激烈的争论，有过不同理论的相互进攻之外，并没有对这些人有过任何所谓的“打击迫害”。

真正受到伤害的，是在扩大化的过程中，遭到官僚打击的知识分子，这导致的严重后果不是知识分子不敢说话，而是官僚主义的再一次稳固和强化。

这种官僚强化，将会在接下来的大跃进之中，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巨大挫折。

而这种挫折，又成为了后来十年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全文完